中国古文字基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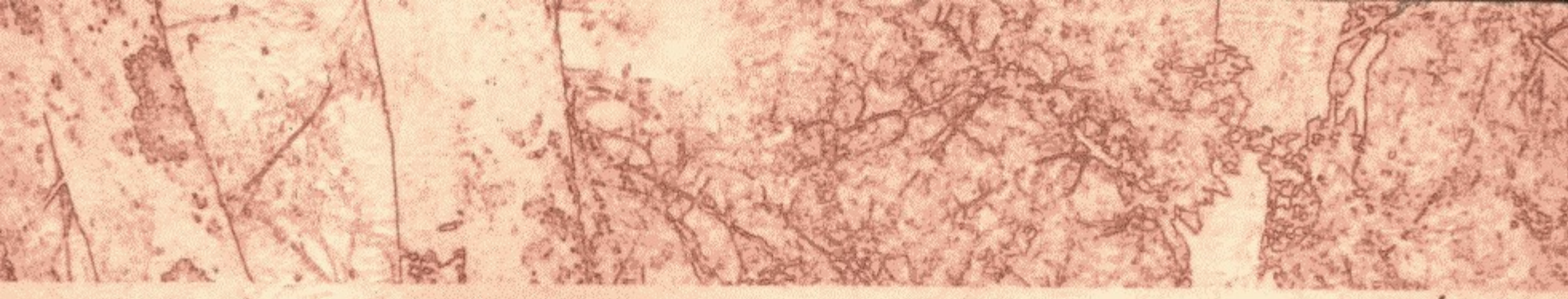
【朱顺龙 何立民·编著】

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
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
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
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
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
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
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
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
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
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
被古文字学证实了，
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

——〔美〕张光直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复旦文博系列教材 *



朱顺龙　1964年生于上海。1981年入复旦大学学习，1991年获博士学位。师从胡厚宣、杨宽、吴浩坤诸先生。1991年至今，任职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现为复旦大学文博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日书道·文物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从事古文字学、文物学的教学、研究与鉴定。著作有《春秋史》、《陶瓷与中国文化》、《三峡古物记奇》、《国宝72》等。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

【朱顺龙　何立民·编著】

＊复旦文博系列教材＊

ISBN 7-80681-596-1

9 787806 815960 >

ISBN 7-80681-596-1/K·142　定价：36.00 元

复旦文博系列教材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

【朱顺龙　何立民·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朱顺龙、何立民编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80681-596-1

Ⅰ.中… Ⅱ.①朱…②何… Ⅲ.汉字：古文字—本科—研究生—教材 Ⅳ.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828 号

中国古文字学基础

编　　著　朱顺龙、何立民
责任编辑　任海平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政编码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5.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200

ISBN 7-80681-596-1/K·142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1
第一节　中国古文字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学习古文字的基本方法及其意义 ……2
第二章　汉字的发展沿革 ……6
第一节　汉字起源的传说 ……6
第二节　汉字的萌芽、起源时期 ……8
第三节　汉字的逐步成熟时期 ……11
第三章　汉代小学的兴起和隋唐文字学研究的发展 ……17
第一节　小学的萌芽与兴起 ……17
第二节　汉代小学的建立和发展 ……18
第三节　汉代童蒙正字字书的编定 ……20
第四节　汉语训诂学和方言研究的发端 ……22
第五节　《说文解字》与汉代小学研究 ……26
第六节　六朝隋唐的文字学成就 ……29
第四章　两宋金石学的鼎盛和元明文字学研究的低迷 ……37
第一节　“二徐”的《说文》研究 …… 37
第二节　宋元明时代对“六书”的探讨 ……39
第三节　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和繁荣 ……40
第四节　宋元明时期的字书、韵书编纂 ……45
第五章　清代考据学的崛起和金石学小学的复兴 ……50
第一节　“乾嘉学派”的相关贡献 ……51
第二节　“《说文》四大家”的成果 ……54
第三节　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和繁荣 ……59
第四节　清代大型字典、词典的编纂 ……63

第五节 晚清甲骨学的奠基及"罗王之学" ……64
第六章 20世纪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72
第一节 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创立及其对古文字学研究的贡献 ……72
第二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文字学进展 ……77
第三节 建国后古文字学以及甲骨学研究成就之一 ……88
第四节 建国后甲骨学研究成就之二 ……92
第五节 西周甲骨学 ……99
第六节 建国后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新进展 ……102
第七节 战国文字的研究 ……107
第八节 国际显学——简帛学研究的巨大进展 ……109
第七章 海外学者有关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 ……127
第一节 20世纪前期的相关研究……127
第二节 20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的甲骨文、金文研究 ……131
第三节 20世纪下半叶海外学者的竹简帛书研究……136
第四节 台湾、香港地区的古文字学研究 ……142
第八章 甲骨学——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一……151
第一节 殷商甲骨文…… ……151
第二节 殷商甲骨文的基本内容… ……157
第三节 甲骨文单字释读 ……162
第四节 殷商甲骨片释读 ……177
第五节 西周甲骨 附：甲骨大事简表 ……200
第六节 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206
第九章 商与西周金文——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二……217
第一节 青铜器简介 ……218
第二节 金文的研究 ……220
第三节 金文的年代 ……222
第四节 金文的内容 ……224
第五节 商、西周金文句读释读 ……227
第六节 殷商西周金文的书法艺术……244
第十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三…… 251
第一节 概述 ……251

第二节　金文选读 ……252
第三节　战国货币文字选读 ……284
第四节　战国玺印文字选读 ……294
第五节　战国兵器刻辞选读 ……299
第六节　春秋战国金文的书法艺术 ……305
第十一章　春秋战国石刻铭辞——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四 ……311
第一节　石刻铭辞研读 ……311
第二节　诅楚文研读 ……317
第三节　战国秦高奴禾石权研读 ……318
第十二章　春秋盟书文字——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五 ……320
第一节　侯马盟书 ……320
第二节　温县盟书 ……323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简帛文字——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六 ……326
第一节　简牍帛书概述 ……326
第二节　简牍帛书的形制 ……327
第三节　发现竹简举例 ……330
第四节　战国竹简文字选读 ……335
第五节　帛书选读 ……350
第六节　春秋战国文字的书法艺术 ……352
附录
表 1:春秋战国出土简牍帛书一览表 ……361
表 2:汉晋简帛出土情况一览表 ……363
表 3:甲骨文著录书目全、简称对照一览表 ……365
表 4:青铜器著作举要 ……371
常用甲金篆隶文字备查 …… 374

后记 …… 朱顺龙 399

第一章　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中国古文字学是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关于学习古文字的方法，王国维、陈梦家、于省吾、唐兰和杨树达等人曾有过专门的论述。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些便于初学者学习的方法。学好古文字学，对于研究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中国古文字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中国古文字学是以考察汉字产生、发展与演变，研究并解读出土古文字资料，并藉此对中国上古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进行探索的一门学科，分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材料(如甲骨卜辞、金文等)为对象，着重于文字的释读，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古文字的概念可上溯至汉代。东汉许慎曾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①]班固也说"张敞好古文字"。[②]

目前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早有成熟体系的古文字是甲骨文字，它出现在殷商后期，是一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有少量纪事刻辞。因其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即商王盘庚迁殷后的都城旧址，又称"殷墟文字"。甲骨文中除了有许多象形字(很接近于一种线条化的图形，采取实物的某个特征，突出其形象，

只追求字像实物以表意,而不拘泥于笔划的增减和字形的正反向背)以外,还有其他多种汉字的造字方法,体现了汉字由发展进而成熟的过程及其面貌,因此,甲骨文是我们研究古文字的第一类内容。

随后出现的金文是铸或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旧称"钟鼎文"。它与甲骨文相当接近,属于同一结构体系。不过,由于铸刻的原因,比起甲骨文来,金文字迹较大,笔划较粗,圆笔较多,也有少数方笔的,总体上比较匀称简单。这是古文字学范畴中的第二类内容。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各地出现了"语言异声、文字异体"的局面。诸侯列国应用的文字呈现了明显的地方特色,书写材料也渐次丰富,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战国文字体系,这是古文字学的第三类内容。

第四类内容是近些年来兴起并成为又一门国际显学的"简帛"学,它以出土的竹简、帛书为研究对象,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进而对其反映的思想文化等内容展开深入的探讨,解决了许多重要课题。

因此,按照目前较为通行的说法,古文字学大致包括上述四个文字分支: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以及简帛文字。汉代学者习惯上把隶书称为今文,而把秦以前的文字统称为古文。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着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按照这种意见,可以认为古文字就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第二节　学习古文字的基本方法及其意义

古文字因年代久远,字形复杂,读音变异,使今人在学习它们的时候,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学习古文字,应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是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在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些考释文字的方法,如偏旁分析法、历史比较法、辞义推勘法、辞例比较法,等等,对古文字考释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这些方法过于专业,不太适合初学者或一般爱好者。相对而言,以下一些步骤可能对初涉此道者较为适合:

一、熟悉相关历史文献,开阔视野,加强文化修养。

二、结合汉语言发展史的线索,参考民俗学的相关资料,理解古文字的时代

背景。

三、以小篆为基础，熟悉早期汉字的形体，然后再上溯甲骨文、金文等先秦文字，循序渐进，逐步掌握汉字发展的一般规律。

《利簋》及其铭文

对于今人来说，熟悉中国的古文字，相当于掌握了一种语言工具，有利于从事与此相关领域的学习、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有利于中国古代史的学习和研究。

中国古代史中的先秦史的研究，是必须利用古文字的。先秦典籍主要用古汉字写成，西汉时的典籍是用隶体写成的，我们现在所见的《诗经》、《尚书》、《史记》、《汉书》等史料远非本来面目。要证明这些史料的可信度、订正史料错误，甚至补充其不足，除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外，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依靠地下不断出土的古文字资料。[③]例如，利用甲骨文资料来考订《史记》的真实性，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王朝的世系中有“报丁、报乙、报丙”三王，而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人通过缀合甲骨文整理出的商代世系中，“三报”的顺序却是“报乙”、“报丙”、“报丁”。这一订正，不但纠正了《史记》的错误，同时还考证出了“报”字的原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考订工作，证明了《史记》的可靠程度。[④]李济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寻。”[⑤]另外一个例子是：根据《尚书·牧誓》的记载，武王灭商是在“甲子”之日的早晨，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的铭文即证实了这一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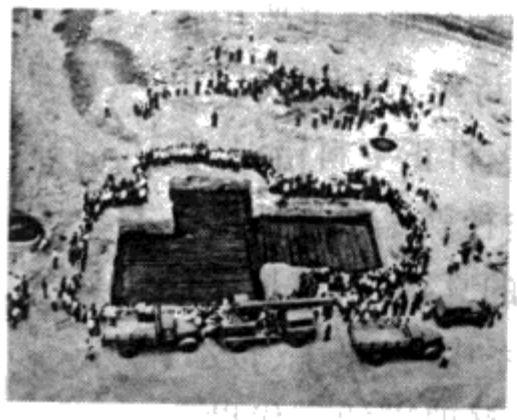
我们在古文字中看到的史料是多方面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等等，无所不包。例如，根据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可以了解中国青铜器冶铸业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明显的例证。另外，近些年来陆续发现的战国古文字资料，又给古代史研究增加了崭新的内容，并且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

浙川下寺楚墓 M2 遗物出土情况

第二，有利于从事考古学的学习和研究。

以古文字证古史，离不开考古学。古文字学

浙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



曾侯乙墓

该墓为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墓中共出土随葬品一万件以上。共有铜器铭文二千八百多字;竹简文字有六百多个。加上其他器物上的文字共约一万余字。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或作持)”之类的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作为一门边缘学科,既可归入语言文字学的范畴,又可归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其中,与历史考古的关系至为密切。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古文字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是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的直接获得者,在墓葬或遗址中,如伴有古文字资料的发现,即可赖以解决墓葬的年代、主人等关键性问题,从而弄清考古对象的具体细节。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确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所出编钟的铭文和竹简文字。张光直先生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⑥

第三,有利于提高古籍整理的水平。

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流传到今天,不少地方已有很大变化。有些字句出现不同的写法和讲法,如何明辨是非、进行取舍,利用古文字来考证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古籍整理所涉及的字形、音韵、训诂与古文字都有直接的关系。杨树达的《积微居小学述林》、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等著作阐述了古籍中文字、声韵、训诂和古代文献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离开了古文字,整理先秦典籍时,遇到的许多问题将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于省吾曾经指出:“我们有时看到敦煌发现的古钞本或宋元刻本,其文字偶有异同,便视同秘籍,诧为瑰宝,然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量古文字,如果与地上史料相印证,基本可以恢复先秦典籍的真面目,较之古钞本与宋元刻本的珍贵又当如何?”⑦

因此，要想提高古代文献的整理水平，注意利用古文字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不仅如此，有时文献典籍的内容涉及到一个朝代不同的统治思想，古文字的解读就会更加复杂，其意义也就远远超出了“整理”的范围。

注释：

① 《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② 《汉书·郊祀志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③ 如公元 279 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时发现的《竹书纪年》，为战国时魏国的编年体官史，记有夏、商、西周、春秋晋国和战国魏国史事。它可以校正《史记》等史书上的错误，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④ 司马迁利用太史令的便利条件，在其父司马谈编纂文书的基础上，网罗散失旧闻，考核古迹传说，尽可能详尽地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述了商代的历史。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历史唯一能够凭借的比较完备的文献资料。

⑤ 《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序》，见《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11 页。

⑥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⑦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第二章　汉字的发展沿革

汉字从古至今，经历了起源、发展和成熟等几个时期。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形态的文字相比，汉字的发展体现了一脉相承而无间断的特点。综合其整个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先秦古文字阶段，秦汉隶书文字[①]阶段，两晋、隋唐至20世纪中叶应用的真书（正楷汉字）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推广应用的简化汉字阶段。

第一节　汉字起源的传说

结绳之政与神话传说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利用过结绳记事这种方法。我国古代文献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庄子》说：“昔者……民结绳而用之。”《老子》第八十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直至现代，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在使用着，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一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根据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世界上许多民族在发明文字之前，确实有一个用实物帮助记忆的阶段，如利用结绳、在实物上刻划符号、堆石等方法。其中结绳法最为普遍，这可以古代埃及、古波斯，近代美洲、澳洲土著居民以及解放前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等为例。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先民以绳打结为标记，用来记叙事件、沟通信息等，自有其客观需求，但也有其局限性。鲁迅曾说：“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结绳记事，只是个人或群体用来帮助记忆的工具，不能用于交流思想，因此不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也不等于文字，

结绳纪事图

积石证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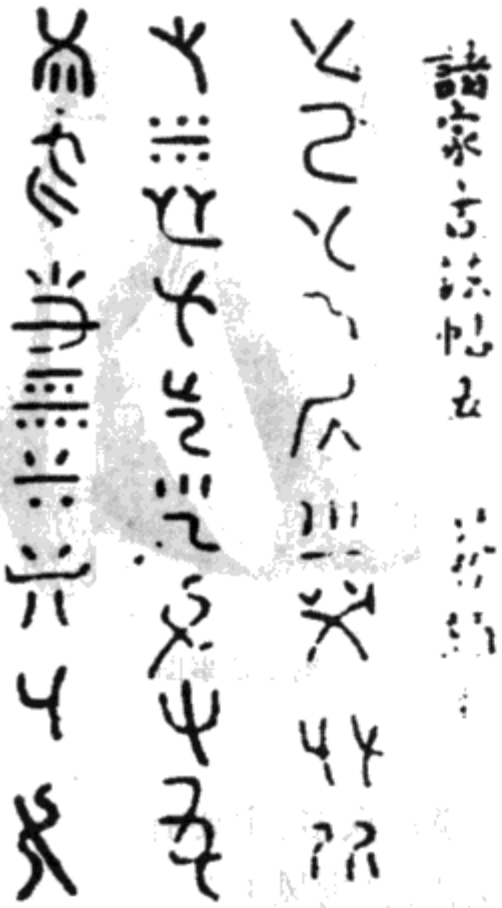
刻划证事图

不可能发展到文字阶段。

有关汉字起源还有许多神话传说，其中所谓的文字形式说法众多，主要有伏羲画八卦的“龙书”、神农作的“穗书”、黄帝写的“云书”、少昊氏的“鸾凤书”、高阳氏的“蝌蚪文”、高辛氏的“仙人书”、尧的“龟书”、大禹的“钟鼎文”，等等。这些原始氏族首领和部落联盟酋长各代表了史前某一个时期。文字的创造发明，很大程度上不是由某个人单独完成的，但透过神话传说的表层，可以探究到汉字起源的一些基本线索。

仓颉造字的思考　在诸多的汉字起源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最有代表性。这种说法，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3]仓颉是否确有其人，历代说法多不一致。他的身份也颇为扑朔迷离。司马迁、班固等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一些古代文献的记载，则明显带有神话的味道。如王充《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府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并不可信。一般认为，犹如“燧人氏”代表钻木取火，“神农氏”代表农业种植那样，仓颉造字应当代表了一个文字起源

仓頡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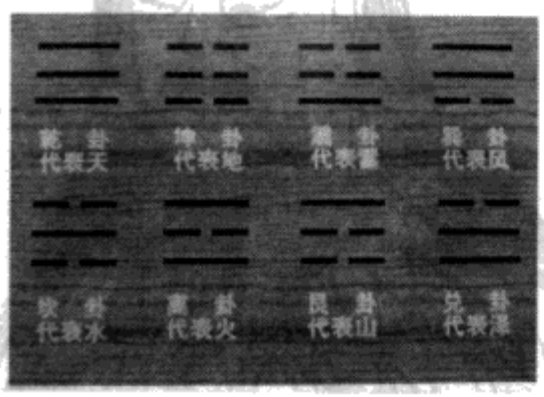
传说中的“仓颉书”

过程中的历史阶段。鲁迅说过，“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耳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4]这深刻说明了众多传说与文字起源之间的关系。

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汉字产生，绝非由一人于某一时期所独立创造，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某些必须使用文字的社会群体长期摸索、使用，然后约定俗成的结果。仓颉造字说，或者可以看作是对先人创造文字的一种追忆，或者是对文字初创期某人所做的整理、规范工作的代称。

“卦爻制作”与表意符号 比仓颉造字的传说更接近事实的，是卦爻制作和表意符号的出现。先秦文献有“庖牺作八卦”的说法：“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5]不过这一记录并没有直接说八卦是文字的前身。后来，宋代的郑樵明确提出了“文字起源于八卦”的观点。[6]

伏羲画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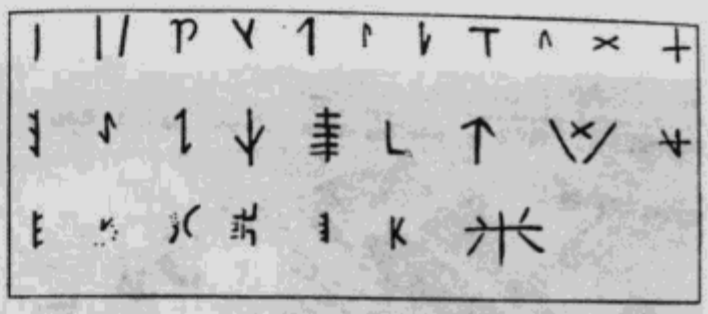


八卦符号及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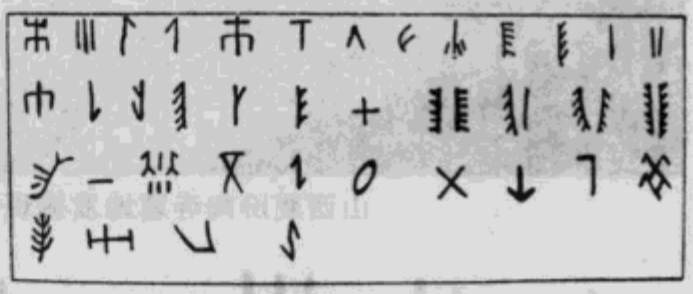
客观地说，八卦是古代从事占卜、巫术活动的巫师根据算筹等制作的代表卦辞的符号，包含了较为丰富的信息，用来象征各种事物。《周易》中的阴阳八卦符号和六十四卦的卦象、爻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与人、人与事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联变化的过程。这种形式单纯的表意符号，实实在在留存了先民最初的社会人生观和数学算法，透过其中的记述文字和“卦爻制作”的事实，我们也可以想见先民用一些简洁符号记录语言和思想的影迹。至于与汉字起源是否有联系，目前尚无肯定的结论。

第二节　汉字的萌芽、起源时期

现有考古资料证实，汉字的萌芽发生在公元前5000年或更早些时期。在公元前4000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后的



半坡陶符



临潼姜寨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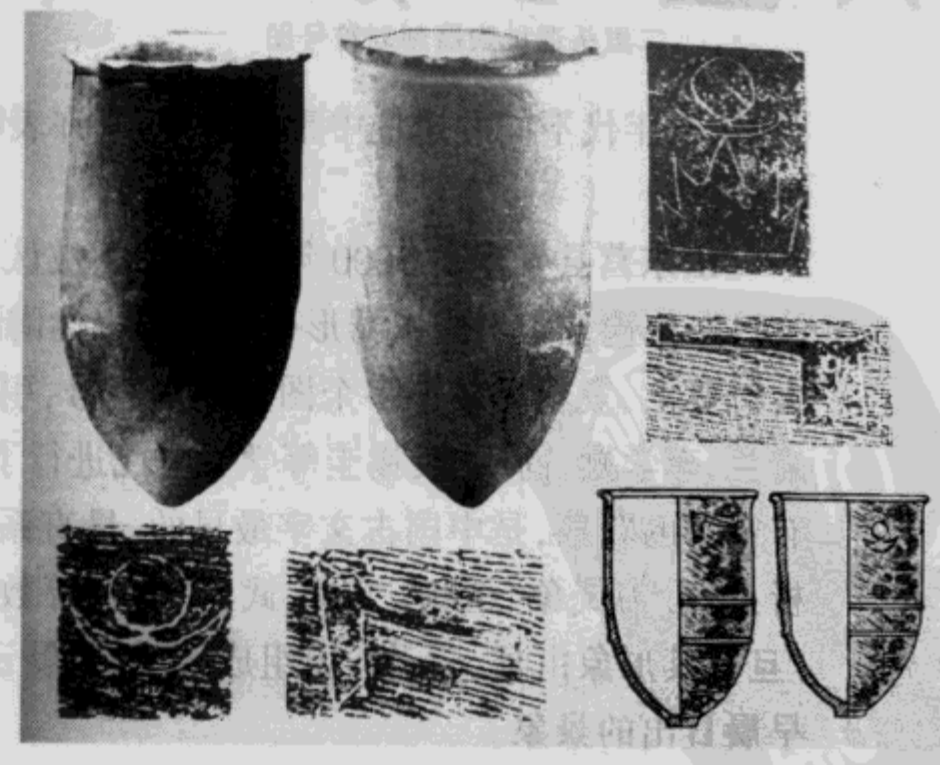
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了刻划符号，有的甚至被认定为文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18个，可以归纳为八种，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文字。于省吾将其中的几个刻划符号释读为“旦”、“镈”和“斧”字[7]。唐兰也释读了“灵”、“炅”和“斤”等字。[8]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仅“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尚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将这些陶符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铭文相对照，确实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有些刻划符号，与青铜器上的族徽更为相似。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看，这种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与汉字的产生、发展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客观而言，它们处于汉字的萌芽阶段，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字。

新石器时代陶符　汉字由萌芽状态发展到应用于文献记录，经过了一个长远的过程。萌芽时期的汉字以半坡遗址和其他同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陶符为代表。

半坡遗址属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其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年。据统计，

大口尊



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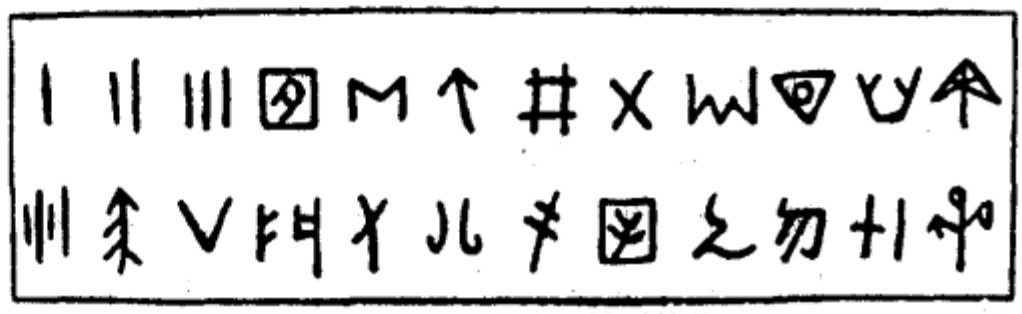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现场

二里头遗址陶器刻划符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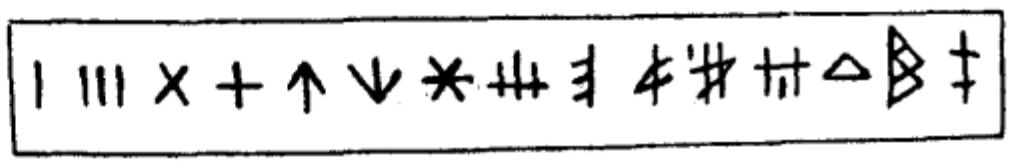
半坡陶器上有各种刻划符号一百九十余个，其作用目前还不清楚，有些符号与目前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很相似。这些符号均为单独使用，看不出它们与语言有何联系，不过，其中类似数字的符号，很可能是数字的前身。有学者指出，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9]

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屡有发现这种类似半坡数字的符号。1972~1974 年陕西姜寨出土的陶器[10]、1974 年在青海乐都柳湾[11]以及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陶器上都有类似符号[12]。姜寨也属仰韶文化，年代比半坡稍后。柳湾为甘肃马厂类型文化，时间约为公元前 2060 多年，与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子崖遗址年代相近。这些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在年代不同的遗址中重复出现，或许表明了它们在当时已被较为普遍地使用。

山东莒县发现的 5000 年前的陶文，被认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字雏形。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器形硕大的代表性陶器——灰陶大口尊。在众多的陶制大口尊上，发现了二十多个图形刻划符号，引起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于省吾、唐兰、李学勤、高明、裘锡圭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肯定它们同中国最早的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古文字最早的、最直系的源头。从陶文的形体、结构来分析，可分为气象、植物、工具、武器、制陶等数种。其中的陶文“ ”，于省吾释为“旦”。其形象由日、云、气、山组成，象征早晨云气承托着太阳出现在山上，描绘了早晨日出的景象。



二里头夏代遗址陶器划符号



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陶符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扁壶上，书写的朱书文字是一重大发现。研究表明：其文字与殷墟甲骨文非常相似，反映四千多年前即至迟在夏代前期，属于同一系统的文字已经用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区，就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特点而言，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载有朱书文字的陶扁壶残片整体看，很可能不是古代文字零星的遗留，而代表了一份完整的“文献”。

文明萌生期陶符　在夏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出土的陶器骨片上，发现了一二十种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已经接近甲骨文。这些符号，为研究文字成熟之前的发展阶段提供了若干线索。[15]

目前对于汉字起源的理解，大致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刻划符号，一是象形图绘。这两方面的因素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遗物中早已并存。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后期的陶器上，已经可以发现图画因素转变为象形文字的迹象。原始的刻划符号和象形图绘，经过社会生活和长时间的淘炼，为汉字的诞生起了铺垫作用。至于文字是否还存在其他起因，则有待于新的考古发掘和对现有资料的进一步研究。

第三节　汉字的逐步成熟时期

汉字的成熟，当以甲骨文的出现为显著标志。由此而下，依次为金文、战国文字等。

甲骨文　主要是指殷墟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字，是中国商代后期（前 14~前 11 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也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现在一般认为，夏商之际开始形成相对完整的文字体系，同时也开始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殷墟的商代刻辞甲骨，是 1899 年秋在河南安阳被发现的。安阳是殷商晚期

的都城,殷商灭亡后,渐成废墟,称为"殷墟"。这里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商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佐证。[16]

随着殷墟甲骨的发现,西周甲骨也于1954年在山西洪洞面世,以后在北京、陕西和河北等地也有发现。陕西周原岐山凤雏遗址出土的一批商周之际的甲骨文,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周之际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扩大了甲骨学的研究范围。

目前全世界十多万片甲骨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大陆约有八九万片,台湾地区、日本各有约两万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甲骨学考古与研究成就斐然,已发现甲骨文单字有四千六百多个,现已识别出其中的一千多个,基本掌握了甲骨文以象形、假借、形声等六种造字方法及基本词类、句子形式、结构序位。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所以殷墟甲骨文内容几乎涉及商代社会各个领域。

甲骨文还受到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主要原因是其中记述了传世史书中罕存的商代历史,包括文化礼制、地理甚至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天象记录。其中有密集的日食月食记录,据此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予以证实。

金文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据现有知识,青铜器上有铭文始于商代的二里冈期,殷墟期数量增多,至西周而大盛。一般认为,金文限于先秦时期,也有的把秦汉时期也包括在内。魏晋以后的青铜器物,有的仍有文字,但不在古文字学的金文范畴之内。金文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是由于其内容丰富重要,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礼制、政治、文化、经济等情况,能补充文献之不足。

金文的整个发展过程,长达千余年,无论是字体、文例还是内容特点都有很大变化,所以研究金文必须从分期入手。

商代二里冈期的青铜器,发现有铭文的只有少数几件,文字均系铸成,个别为凸起的阳文,一般为阴文。字数限于两三字,有的是器主的族氏或名字,有的是所祭先人称号,还有的似与器的用途有关。商代晚期即殷墟期的金文,数量比二里冈期明显增加,而且时代越晚,字数越多。但总的说来,铭文大多仍很简短,内容和二里冈期相似,即或为器主族氏、名字,或为先人的称号,复杂一点的则兼记上述两者。这一时期金文字体多与甲骨文相近,用词也多类似,如以周祭记作器时间等。成组青铜器有时有同样铭文,如小屯五号墓出土大量器物上有"妇好"二字,可供综合研究。

西周早期金文是商代金文的继续和发展。商代流行的那种记族氏等的简短铭文仍然存在,同时出现了许多长篇铭文,记载重大史事。如周康王时的小盂鼎,字数已近400个。这样重要的金文资料,前人多说其价值足抵《尚书》一篇。

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事多见于金文记载。如武王伐纣见于利簋,所载日期、干支与文献密合。西周早期金文字体多雄肆,中期则转趋规整,文章格式也逐渐固定化。多见于西周中晚期的册命金文,叙述周王对臣下命赐之礼,与当时职官制度极有关系,从所赐舆服还可考见其时等级的区分。这一时期又有一些金文涉及法律、经济等方面,如几件裘卫器物的铭文,分别叙述了裘卫与矩伯间的三次交易,或以土地交换土地,或以土地交换毛裘皮革,说明土地已可转让,且有以货币计算的价格,是非常珍贵的史料。与土地转让有关的,还有师永盂等器铭。

西周晚期的金文多为长篇。其中毛公鼎达497字,是迄今发现的最长的金文。这时金文多反映战争及社会动乱,如虢季子白盘、多友鼎等记伐猃狁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随着周王朝的衰落,有些金文也趋于简单。如梁其诸器,就出现一些脱漏错讹,这在早、中期金文中是罕见的。

西周金文多数为周王朝官吏所作,诸侯国的金文相对来说较少。到周室东迁后的春秋时期,王朝衰微,金文陡然减少,而诸侯国的金文却大量出现。这个时期,不但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就连若干小诸侯国也有金文,其地方性显著加强。

晋、郑、齐、鲁、楚等国金文,在春秋金文中最为重要,所记内容非常广泛。如晋国的晋姜鼎,记晋文侯辅立周平王的功绩;齐国的庚壶,记齐灵公伐莱等战役;楚国的令尹子庚鼎,也可与《左传》相印证。秦国金文,如宝鸡出土的秦公钟与天水出土的秦公簋,其字体与东方列国不同,已开后世秦篆之先。

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个别刻成的铭文,在铭文中错金也有发现。中期后半起,北方晋国逐渐流行一种笔划头尖腹肥的字体,可能即汉晋人所谓"科斗文";而南方各国则流行以鸟形作为装饰的美术字体,即所谓"鸟书"。这两种特殊字体都流传到战国早期,有的在汉代还有孑遗。南方各国金文多刻意求工,用韵精整。

战国早期金文基本继承春秋时的统绪。由于诸侯分立已久,文字的地方性更为突出,形成《说文》序所说"文字异形"的局面。大体上说,西土的秦和东土六国分为两系,而东土又可分为三晋、两周、燕、齐、楚等亚系。各系不仅文字结构剧变,金文的用词和格式也有许多差异。

战国中晚期,金文以刻成的为主,内容转为"物勒工名"的形式,即记载器物

的制造者、使用者、置用地点、容积重量等,有的还用干支、数字作为编号。此类金文有助于研究当时职官、地理、度量衡制等,也有很大价值。

与此同时,还有少数传统形式的铭文存在,有的还是长篇。例如战国中期末的中山王方壶铭 448 字,中山王鼎铭 469 字,内容记中山乘燕国内乱、齐国进军占领燕都之机,举兵伐燕,取得大片土地。这是文献所缺书的重大史实。

秦代金文一般均为"物勒工名"之类。具有特色的是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的诏版、诏量、诏权,有的还加有秦二世胡亥诏书,称为两诏。

汉代金文沿袭秦代传统,格式更趋规整,已发现的汉代金文数量很多。20 世纪 30 年代容庚有《秦汉金文录》及与之配合的字编《金文续编》,其中汉代金文占主要部分。考古发掘还发现有成批成组的有铭青铜器,对研究汉代各种制度较有意义。特别是金文中的职官如与汉印结合研究,将会起较重要的作用。

汉代仍有少数特殊铭文,如满城陵山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壶,两件均有"延寿祛病"等语铭文,与常见者不同。新莽时期的青铜器,制作格外规整,由于仿古,也有诏版等,需要专门研究。

战国文字及其他 古文字学意义上的战国文字,主要是指春秋后期至秦统一这段历史时期内,齐、燕、韩、赵、魏、楚、秦等地所用各种文字的总称。它是汉语古文字晚期的书写形式。从字体上看,既包括笔画圆转的篆书,也包括笔画方折的古隶;从书写材料看,则包括金属、玉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丝织品等多种。

战国文字资料最早被发现应该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前期。汉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秦始皇时期颁布的"挟书律",许多秦火之余的战国古籍得以保存下来。例如,河间人颜贞秘藏《孝经》、北平侯张苍所献《左传》,特别是后来影响巨大的孔壁古文的发现,更大大促进了战国文字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始石经的刊立与汲冢竹书的发现,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正始石经每字多载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又称"三体石经",石经古文与《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形体接近,因此也是研究和释读战国文字重要的参证之一。西晋时期,今汲县民不准盗掘战国魏王古墓,得竹简 75 篇,包括《周易》、《纪年》、《穆天子传》等 16 种,约十万余言。当时,政府立即派出荀勖、束晳等著名学者,对此进行整理研究。

历经唐宋元明清直至 20 世纪,随着战国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战国文字研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成为可以和"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比肩的国际显学。[12]

注释：

① 隶书在秦代已经出现，可称秦隶或古隶。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竹简，简文即为墨书的隶体。秦代对汉字的演进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它结束了战国以来文字的混杂局面，为隶书的广泛运用打开了通道。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云梦秦简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鲁迅《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4 页。

③ 在《韩非子》、《淮南子》、《世本·作篇》、《吕览·君守》、《说文解字》等文献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④ 同②。

⑤《十三经注疏·周易·系辞下》，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6 页。

⑥ 郑樵：《通志·六书略》，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70 页。

⑦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 年第 2 期。

⑧ 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 年第 7 期。

⑨ 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 年第 2 期。

⑩ 姜寨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市，是一处母系氏族聚落遗址，面积 55000 平方米，发现房屋百余座。聚落的中心是广场。四周有五组建筑群，每组都以一座大型房屋为主体，附近拥簇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体现了母系氏族的凝聚力。详见《姜寨》，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⑪ 柳湾位于湟水北畔乐都县柳湾村一带，墓地总面积为 11 万平方米。发掘出原始社会不同文化类型的墓葬 1500 座，出土文物约三万多件。墓葬内的随葬品多种多样，尤其是在陶容器上表现最为突出。以彩陶壶与器形较大的彩陶瓮为主，还出现不少新的造型别致的器物，为过去所罕见。详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编：《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⑫ 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县龙山镇以东武源河畔被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是中国“龙山文化”的最早发现地。遗址年代约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2000 年，遗址南北长 530 米，东西宽 430 米，总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参见傅斯年：《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

⑬ 莒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是古东夷少昊部落后裔建立的文明古国之一。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莒地先民最早崇拜太阳并有历史的传承。参见《大汶口》，文物出版社 1974 年版。

⑭ 大口尊是上古时期的祭祀礼器，在莒县陵阳河、胶县三里河、诸城前寨、大朱家村、杭头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量出土，其形制和所饰篮纹大致相同，其胸部刻有释图像文字二十余个。有的陶文涂朱，有些许神秘色彩。

⑮ 二里头是中国青铜时代已知年代最早的宫殿遗址，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村，面积约三平方千米。1959 年发现并开始发掘。遗物除铜、玉、陶、石、漆器外，还有骨、蚌器。青铜器包括工具、兵器、礼器、乐器和装饰器。在陶器、骨片上发现刻划符号二十多种，有的可能是原始文字。卜骨出土数量较多。学术界对该遗址的认识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它是夏代都邑故址；有人认为遗址第三、四期属于早商文化，当时这里可能是汤都西亳，而第一、二期可能是夏代晚期遗存。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⑯ 1973 年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甲骨四千多片，内容丰富，地层关系明确，对确定甲骨的分期有重大价值。1991 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 1583 片，是为又一次重要发现。近年来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了两处甲骨坑，发现牛肩胛骨、龟版、动物骨骼、骨料近 70 块，还有少量的陶片。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殷墟小屯南地新清理出 5 层甲骨共二百多片，并在祭祀坑中首次发现一商代铜块和五片罕见的木块，及一副蚌饰项链和一个骨制蛙首刻刀，从而丰富和补充了 1973 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实物资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⑰ 详见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三章　汉代小学的兴起和隋唐文字学研究的发展

汉字发展到汉代，基本成熟。受战乱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汉代人对于上古文字的音、形、意也已不甚了了，所以，探索研究上古汉字，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小学”由此兴起。而传统认为的文字、音韵、训诂三家学问，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张揖、顾野王、陆德明，以及颜师古、李阳冰等人的努力下，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一节　小学的萌芽与兴起

“小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旧称，但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先秦时主要与“大学”相对，指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初级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主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也就是一些礼仪和文化知识方面的基础课程。到了“大学”则要学习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所以在古代，也把“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内容称为“小学”。其中“书”，也就是“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造字和用字方法，这属于文字学的范畴。后来人们逐渐就用“小学”作为文字学这一学科的代称。①

通过分析先秦流传至今的典籍，可以知道此时已经开始了语言文字学的初步探讨，主要内容是围绕文字起源、文字结构分析、字形规范整理和字书编纂等方面展开。

关于文字的起源这一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即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当时的主要观点有结绳说、仓颉造字说和八卦说三种。这些说法虽然具有很强的神话色彩，但仍可从中了解到去古未远的春秋战国时代对这一问题的朴素认识。

汉字构形理据的分析　春秋时期，已有人开始试图解释汉字构形理据。《左传》中有三处分别对“武”、“乏”以及“蛊”字进行了分析。战国时代，分析汉字构形理据的做法更加流行。②这种分析，虽说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但的确反映出当时

对汉字的结构以及构形依据有了一定认识。战国时期的诸子著作中也有很多引用古代器物文字的记录。《礼记》曾引用《汤盘》的铭文来告诫世人,[3]可惜这件器物没能流传下来,无法辨认其真伪。

另外,文字学的传统六书理论也开始萌芽。如《周礼》最早记载了"六书"的名称。[4]汉代郑众、班固、许慎等人有关"六书"的说法,都来源于《周礼》,只是名目和顺序略有不同。[5]

字形的规范整理和字书编纂 一般看来,字书既指解说汉字形、音、义的著作,即后代的"字典",又指童蒙识字的课本。文字学史上的第一部字书《史籀篇》,即是一部童蒙识字读本,《汉书·艺文志》曾收录此书。现在普遍认为"史"是官名,"籀"是人名,他曾在周宣王时期任太史,负责过文字形体的规范和统一的工作。《史籀篇》早已失传,但是《说文解字》中还有部分遗存,从遗存的字形看,非常接近西周晚期的宗周故地文字。[6]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施"书同文"运动,"罢不与西土文字合者"[7],用小篆作为标准字体统一六国古文。主要方法有四种:确定偏旁形体,固定偏旁位置,选定偏旁种类,规定书写笔数等。当时李斯运用这些方法,根据《史籀篇》,用小篆自题作《仓颉篇》。同时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三书上承《史籀篇》,下启《急就篇》等,对后世的童蒙识字教育和正字运动,影响极为深远。

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如下特征:第一,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密切,并且在这种联系中产生了语言文字学理论与方法的萌芽。这可以当时孔子以及后来诸子的名实之争为例。胡奇光说"名与实"是小学的研究主线是很有道理的。[8]第二,通过考察此时编纂的诸多童蒙读物,可知非常注重儿童正规的识字教育。第三,童蒙读物同时具有"正字"功能。既便于正字,又便于传播、便于接受。

第二节 汉代小学的建立和发展

小学建立的历史背景 西汉立国以后,对文字的重视程度甚于秦代。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相国萧何制定了影响有汉一代的文字政策。《汉书·艺文志》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按照这一说法,当时似乎已开始采用以"字"取士的办法了:谁识字、用字合

格，就可以为官。在识字9000的基础上，如果还可以辨识出“六体”，即：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就可以做一个史官。因此，在求贤取士方面，加重文字辨识等内容的考核，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继承前代编辑童蒙读物的传统，继续编纂识字课本。如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平帝时扬雄作《训纂篇》等，各以韵语的形式，向儿童进行有效的“集中识字”教育。

再次，体现在汉赋的“形美”方面。“形美”的基本手法之一，是将同一义符的形声字加以类聚，以形容某一事物的情态。鲁迅曾指出：“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嶜崚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9]胡奇光指出：“这种原子主义的表达方式，自与识字课本以类相从的编排体例有关。”[10]清人袁枚也说，买一篇赋，可以“当类书、郡志读”[11]。事实上，作《子虚赋》、《上林赋》的司马相如，编过《凡将篇》；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的扬雄，编过《训纂篇》；作《两都赋》的班固，也编过《续训纂篇》，说明汉赋大家，往往都是文字学家。

新学科的诞生，多伴随着新材料的出土。孔壁古文等大批古文资料的发现，促使人们研究训诂，探求“古文经”中古字的奥秘。要读懂“古文经”，首先应该弄懂古字。因为《仓颉篇》中多古字，汉代的学者就多从此入手，来研习文字训诂。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受诏校书秘阁，发现古文经的珍贵，其子刘歆因而创立古文经学。鉴于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的流弊，他感到有建立文字学的必要。刘歆根据刘向所撰《别录》，撮其精要，写成《七略》，于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上奏。他们把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为“小学”。“小学”的定名，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奠定了基础。

班固著《汉书》，删取《七略》部分成《艺文志》，保存了我国历史上关于“小学”的定名以及著录的最早记录。[12]刘歆的“小学”，看起来全为识字读本，其实《史籀篇》、《仓颉篇》、《元尚篇》等，却是从籀文到小篆的字书。“小学”把通古今文字放在首位，这就与萧何律法相呼应。除此之外，“小学”还要求通“造字”规律，这与《艺文志》所说的“六书”是“造字”之本是一致的。[13]

小学的创立，刘氏父子有倡导之功，但他们在语言文字学的具体研究上似无令人瞩目的成就。事实上，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小学”创始人应该是扬雄、杜林。[14]他们分别借鉴了西汉宣、平时期召开的两次文字研究大会的成果并有所发扬，杜林还写成《仓颉训纂》、《仓颉故》等考释性的著作，开辟了文字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总体而言,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环境,从而积累了一定的研究经验,涌现了不少人才。在研究方法上,汉代小学逐渐趋于定型,研究对象更加明确。汉字的"小学"最终得以建立和发展。

汉代小学的特征、分期及其成就 汉代小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西汉初年"壁中书"等古文经的发现,司马迁的相关研究,社会上对所出铜鼎的认识,以及《仓颉》、《急就》等正字童蒙之书的写就,均为文字学研究的初步状态。第二期:西汉中期以后小学家张敞、杜林、刘向刘歆父子、扬雄等对文字学的重视,以及新莽、东汉前期的文字改革,都对小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期:东汉中晚期,经学家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人,分别在不同的领域,对小学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同时,音韵学也得到了初步发展。

汉代小学的主要特征,有如下方面:

第一,古文经的出现,推动了小学的创立,两汉的古文经学家,同时就是小学家。同时,小学教育逐渐成为解决古代书面语言的实际问题,进而达到解释经典的高度。小学的发展受经学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将原为征实之学发展为把理论观点依附于经学、文学等考释之中。

第二,汉代小学的成就中,包含了方法论的成熟、理论体系的完备,以及与这一学科成熟相关的代表作和数量众多的学者。

这一时期,大量的字书、解经著作中蕴含了小学研究的方法论。合秦代三书而成的《仓颉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崔瑗的《飞龙篇》等,成为儒家经学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直接反映。通过西汉刘向、刘歆、扬雄、张敞、桑钦、杜邺、杜林,东汉许慎、郑玄等学者的不断努力,使小学的研究形成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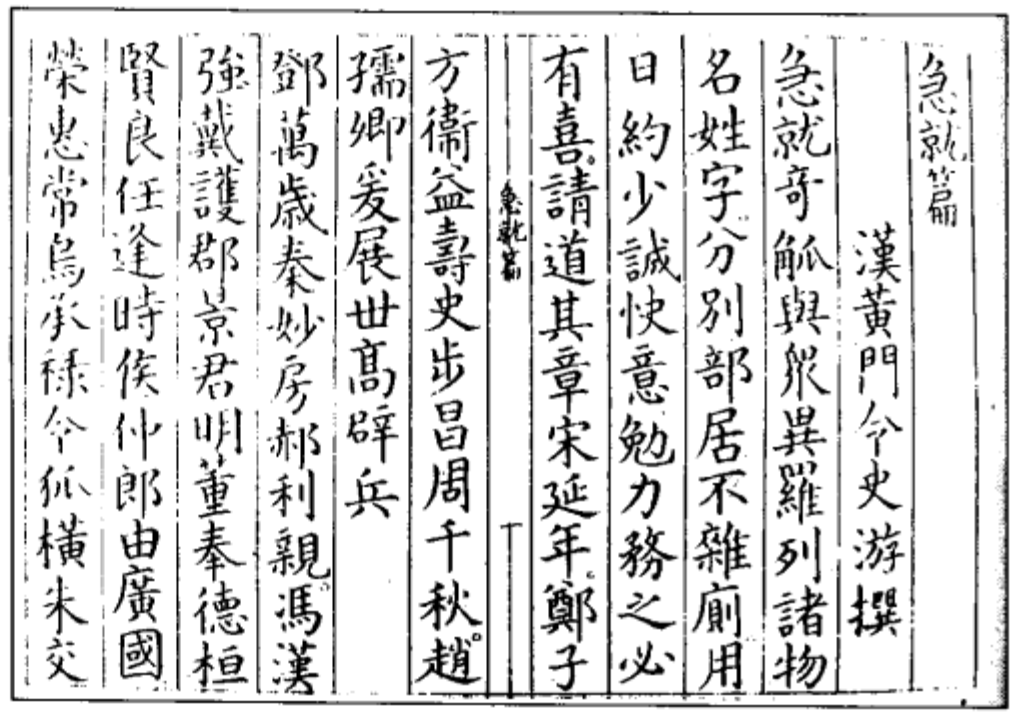
第三,产生了一批"小学"名著。《尔雅》、《方言》、《说文解字》以及《释名》的问世,成为汉代小学的标志。

第三节 汉代童蒙正字字书的编定

"秦三仓"与"汉三仓"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政策,李斯等人用小篆字体写出《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作为文字书写的范本而颁行全国,以便于推广和运用。所谓秦、汉"三仓",就是《仓颉篇》在秦汉时期不同的文本。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李斯《仓颉篇》为七章,赵高《爰历篇》为六章,胡毋敬

《博学篇》为七章。到了汉代，“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总名仍旧是《仓颉篇》，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秦三仓”，共计约三千三百字，小篆的常用字基本包括在内。


急就篇
漢黃門令史游撰
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物
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
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
有喜請道其章宋延年鄭子
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
孺卿爰展世高辟兵
鄧萬歲秦妙房郝利親馮漢
強戴護郡景君明董奉德桓
賢良任逢時侯仲郎由廣國
榮惠常烏承祿令狐橫朱交

《急就篇》书（古逸丛书收录仿唐石经体写本）

西汉宣帝时，秦代流传下来的《仓颉篇》多用古字，时人多不能看懂。宣帝于是召集能识读这些古字的学者，来朝廷教读《仓颉篇》。[15]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朝廷聘请沛人爰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中讲习文字。扬雄采集讲习内容，编成《训纂篇》，作为《仓颉篇》的续篇。[16]《汉书·艺文志》说：“至元始汇总，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扬雄续作的《训纂篇》合计89章、5340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郎中贾鲂又续扬雄《训纂篇》而撰《滂喜篇》。因为《训纂篇》最后二字为“滂喜”，贾氏取以为篇名，也体现出其续作之意。后人以“秦三仓”为上卷，《训纂篇》为中卷，《滂喜篇》为下卷，也称为“三仓”，这就是所谓的“汉三仓”。

清人孙星衍在《仓颉篇序》说：“《三仓》三卷者，晋张轨所合。”[17]《隋书·经籍志》载：《三仓》三卷，晋郭璞注。由此可知晋朝人合秦汉五部字书为“三仓”。

另有一部分模仿《史籀篇》、《仓颉篇》而作的字书，如：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元长作《元尚篇》。这三部书再加上述的“三仓”，就是秦汉时期影响巨大的八部童蒙正字读物。

《急就篇》　《急就篇》是汉代学童的识字课本，由汉元帝时期（前48年~前33年）的黄门令史游写成。

“急就”，即速成之意。全书以大众喜闻乐见的三言、四言、七言押韵的语句，写在简牍上，便于学童诵习。全书有32章，分章叙述各种名物，如姓氏人名、锦绣、饮食、器物、虫鱼等常识性的内容，共2016字。

《急就篇》开头几句是：“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

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说出了这本书的名称、内容、编排方式等,为后世的蒙书如《三字经》、《百家姓》等提供了范例与借鉴。为帮助学童认读和记忆,《急就篇》在篇次与内容上,尽力把偏旁相同的字放在一起,如“桐梓枞松榆椿樗”,偏旁为“木”,都是树木的名称。另外,内容的广博,也可以使学童识字时,掌握一些基本知识。[18]

《汉书·艺文志》将《急就篇》列为“六艺略”,是“小学”十家之一。原书可能是用隶书写成,但东汉时书法家喜欢用“章草”书写,魏晋时钟繇、皇象、索靖、卫夫人、王羲之等都有书法写本,唐代颜师古、宋代王应麟等有注本,元代赵孟頫、邓文原有草书或正楷临摹本,又有明代杨政松江府学石刻本。现代学者高二适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订》一书,代表了近人的研究水平。

第四节　汉语训诂学和方言研究的发端

汉人因探究儒家经学的“微言大义”而引发了对经籍版本、文字异同的论争,进而开始注重汉语训诂和对方言的研究,出现了几种各有特色且影响深远的文字语言著作。《尔雅》、《释名》和《方言》就是其中的三部代表作。

《尔雅》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也是汉语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同时它又被当成一部汉代大儒解经的作品。这本书后来被列为“十三经”之一,[19]具有很高的政治和学术地位。

“尔”的意思为“近”;“雅”是“正”,即雅言。在古代,“夏”经常假借为“雅”,因

《尔雅》(唐开成石经本)

此雅言就是华夏语，也就是当时中原通行的汉语标准语。[20]

先秦时已经有了《尔雅》的雏形，西汉文帝、景帝之后正式成书。该书作者有很多种说法，魏明帝太和年间，博士张揖认为，《尔雅》创始于周公。[21]郭璞《尔雅序》："《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22]周祖谟认为《尔雅》由汉人所纂集，在汉武帝之后，汉哀帝、平帝之前成书。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说，该书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而是战国到汉初学者陆续汇集解说经传的资料，逐渐增益而成的集体之作。

今本《尔雅》全书有三卷，按照所解释词的内容分类共有19篇。《释诂》、《释言》、《释训》三篇，主要收录动词、定语和状语等一般语词，将同义词列举在一起，用一通用的词语解释；后16篇主要是解释名物制度、天文地理、草木禽兽等专有名词。19篇的篇目分别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鱼、释鸟、释兽、释畜。

《尔雅》解释字词的方法，主要是训诂学上的义训法，即用今语解释古语，用当时的通行标准语解释方言，或者用近似下定义以及描述性的语言解释名物。分别举例如下：

一、"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用今言"始"字，解释古语"初"以下各字。

二、"斯、诊，离也。"齐陈等地方言曰"斯、诊"，通用语则是"离"。

三、"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小而重，'岿'。"

前人对《尔雅》非常崇拜，将其列为儒家经典。历代不仅有大量注疏本出现，而且还有仿作、续作，形成了可与"说文学"比肩的"雅学"。汉代为《尔雅》作注的人很多，主要有樊光、刘歆、李巡等。三国魏时孙炎也有注本，但都已亡佚。现在通行的本子由晋代郭璞作注，宋代邢昺疏证，对于《尔雅》体例多有阐述，发前人所未发。

从宋代到近代，研究《尔雅》者不下二

釋名序
漢北海劉熙成國撰
熙以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於近代或典禮所制
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先謙曰吳校名作多云各本多誤名聖人於時
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爲之名故興於其
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各有義類
蘇輿曰文獻通考十八引義類作類義先謙曰吳校於作與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
蘇輿曰通考引以下有然字當據補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
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蘇輿曰通考引無此八字作即物名以釋義
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
之博物君子其於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塞蘇輿曰此語不
全下有奪文可謂之士蘇輿曰此亦有奪文聊可省諸
序　一

刘熙《释名序》

十家，主要集中于校正文字、校释《尔雅》、补正郭注邢疏、解释体例等方面的研究。校正文字可以清人阮元的《尔雅注疏校勘记》为代表。校释《尔雅》主要有清代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补正郭注邢疏的，有周春《尔雅补注》和潘衍桐《尔雅正郭》等。解释体例的著作，可以陈玉澍、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对于《尔雅》的释词体例、古今雅俗的命名等多有创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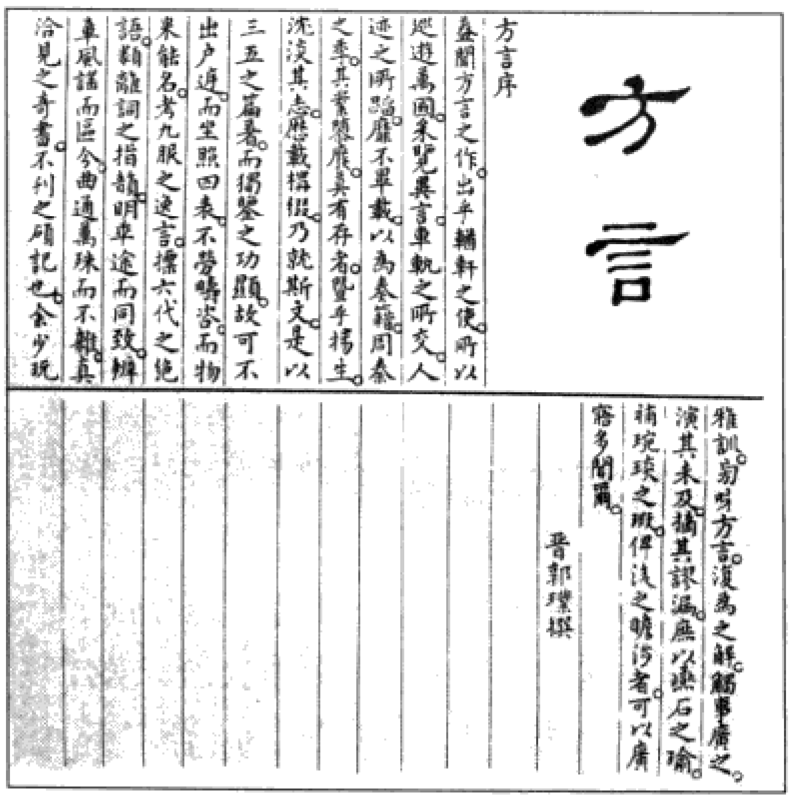
近现代对于《尔雅》的研究侧重于《尔雅》体例阐释、"雅学"体系等研究，多是已有说法的总结[23]，缺乏清人"引端竟委，触类旁通，豁然尽见"的考据精神。

仿照《尔雅》的体例、内容加以增广的著作，最早的是《小尔雅》。另外，还有三国魏张揖《广雅》、明代方以智《通雅》等。仿照《尔雅》而另辟蹊径的著作，有宋代人陆佃《埤雅》、罗原《尔雅翼》等。

作为一部主要解释经籍中的疑难字、诠释所见名物的百科全书式的词典，《尔雅》总结了先秦至汉初古籍中的同义词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籍中一些字词古义、古汉语的演变发展。其中包含的名物等珍贵史料，对于了解上古社会的文化、名物等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按词义编排词汇，也开创了辞书编纂的新体例。另外，从《尔雅》的内容看，它以事物的类别为分类的依据，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古人逻辑思维达到的高水平。美中不足的是，该书解释过于简单笼统，很难区分每个词的真正含义。

《释名》 《释名》也是一部解释词义的书，东汉刘熙著[24]。全书共八卷27篇。《释名》27篇的篇目分别为：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

扬雄



方言

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跡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為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摽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為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晉郭璞撰

晋郭璞《方言序》（明万历时刻本）

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

《释名》最主要的特点是，从语音的角度来解释词义的由来。[25]《释名》认为语音与语义有着内在的联系，词义来源于语音，读音相近的的词，它们语义应该也是相近的，因此可以用这种方法推究事物名称的来源。如："日，实也，光明盛实也。""月，阙也。满则(复)阙也。"[26]像这样的从音以求义的方法，在训诂学上称为"声训"，也叫"音训"。后来，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即谐声的偏旁也有意义)，清代王念孙"就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理论，[27]都受到《释名》的影响。

《释名》中的音训，已采用近似现代的描写语音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字的古音，以及与方言的关系。如："天，豫、司、兖、义、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

书中解释的大量词汇，可与《尔雅》、《说文解字》等书相参证，有助于了解古籍中的词义。刘熙在书中所加的声训有的则没什么根据，方法上也不太谨严，缺少科学性。但远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有学者对语源或是词源的问题作出探讨与总结，开创之功不可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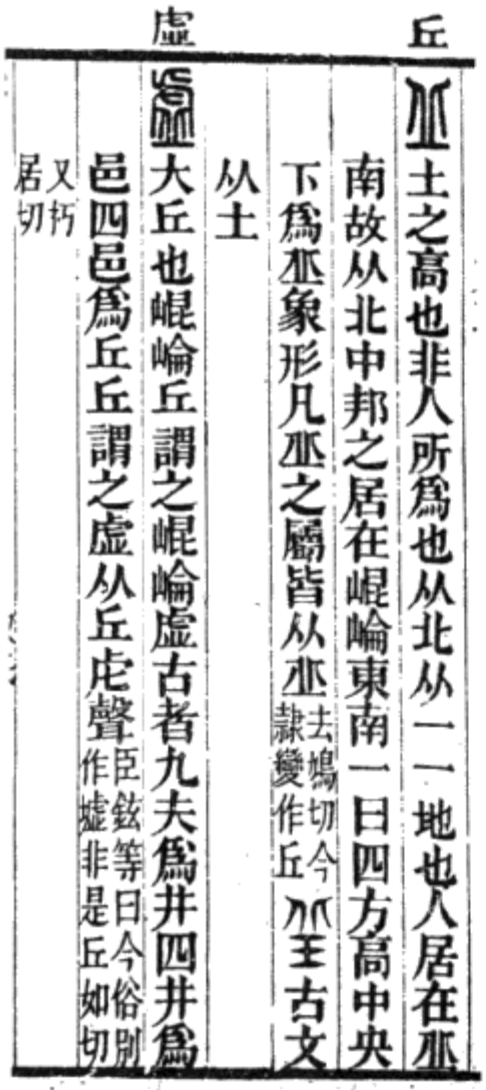
历代对《释名》进行的研究较少。直到清代，才陆续有学者进行整理研究。毕沅所著《释名疏证》，参考先秦两汉的古籍对《释名》进行校正，并对其中的解释加以说明，纠正了《释名》中的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书后还附有《续释名》、《释名补遗》各一卷。毕沅之后，王先谦又著有《释名疏证补》，这是一部集解性著作，适于参考。[28]

《方言》　《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辞典，全名是《辖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由于全名太复杂，所以历代多直接以《方言》相称。全书现存十三卷。

关于《方言》全名的意思，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辖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辖轩"，即一种轻便的马车，专供皇帝委派至各地调查方言的使者乘坐。

关于《方言》的作者，历代多有争论。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常璩《华阳国志·先贤女总赞》、郭璞《方言注》等认为作者是扬雄，清人戴震、钱绎等也持此观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返复推求，其真伪皆无显据。故从旧本，仍题雄名。"[29]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怀疑此书非扬雄所作。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先秦时期，已有人从事方言的整理研究，扬雄在前人基础上，利用各方人士来京的机会，用27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成这部著作。

许慎



丘

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丕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崐崘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丕象形凡丕之屬皆从丕去鳩切今隸變作丘 丕古文从土

虛

虛大丘也崐崘丘謂之崐崘虛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謂之虛从丘虍聲臣鉉等曰今俗別作墟非是丘如切又朽居切

《说文解字》释字举例

《方言》搜集西汉时期各地方言，进行综合和分别的比较研究。所收方言地域广泛，包括今天的甘肃、陕西、河南、山东、河北、湖北、四川等地，除了汉语方言之外，还收有部分少数民族方言。书中对于汉代通用的语言与含义，以及汉代之前的地方方言，都有专用名称说明。从中可以了解汉代方言的大致分布范围。

《方言》的体例基本上仿照《尔雅》，把意义相近的词汇排列在一起，首先用通用“雅言”作概述性的说明，然后按照不同地区的方言一一进行解释。如：“嫁、逝、徂、滴，往也。自家而出为之嫁，由女为出而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30]

在中国方言史上，《方言》被誉为第一部“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在世界方言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代学者有许多人为《方言》作注疏。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晋代郭璞的《方言注》[31]、清代戴震的《方言疏证》[32]、钱绎《方言笺疏》以及今人周祖谟《方言校笺》等。

值得注意的是，《方言》以活的方言口语为研究对象，不受文献和文字形义的局限，还注意到由于时间和地域不同所引起的语言变化情况。这种良好的传统也是现代学者研究语言，特别是方言研究所应该继承的。

第五节 《说文解字》与汉代小学研究

汉代对文字学研究最有成就者，无论从方法、理论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当推许慎及其《说文解字》。

许慎生平以及创作背景 许慎字叔重，东汉豫州汝南郡召陵县人(即今天的河南省郾城县)，生卒年不详。他早年做过“郡功曹”，并被举为“孝廉”，后任太尉南阁祭酒等职。参加过永初四年的“校书东观”的工作。他曾跟随贾逵学习古文经学。许慎博通经籍，受到马融等人的推重，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赞誉。生平除著有《说文解字》之外，还有《五经

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可惜今已不传。[33]

两汉时期，经学昌盛，士人多以其作为一种伸张政治主张甚至猎取利禄的手段。许慎对于这种不顾语言文字自身的规律而任意说解经书的行为极为不满，为了纠正时弊，他对语言文字的规律性作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讨，《说文解字》即在这一背景中产生。[34]当然，要完成《说文解字》这样体例完备的著作，肯定有相当的积累。早于《说文解字》的《尔雅》以及当时的识字课本《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急就篇》等，也许都是许慎编纂《说文解字》的素材。《说文解字》成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由其子许冲上书朝庭，颁行天下。

《说文解字》全书连叙共十五卷，按小篆"分别部居"的原则，分为540部，始于"一"部，终于"亥"部，收字9353字(今大徐本为9431字)，重文1163字。许慎首创文字结构分析法，即按540部首分门别类，每字兼用形训、义训和音训等方法，作形、音、义(文字、音韵、训诂)的解释说明，连同解说共133041字。

六书理论　在说解文字中，许慎实践了"六书"理论。所谓六书，是指分析汉字的构造规律，从而总结出汉字的六种造字(或用字)的方式。[35]

一、"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指事字，就是在用象形方法不能表达事物的特点时，利用标注符号的方式，指出所表示事物的特点与意义的一种造字方法，如"刃"、"上"、"下"等字。

二、"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字，即根据实物形状和特征，用规范化的符号和线条来造出的文字。如"水"、"日"、"月"、"龙"等字。

三、"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即由形符(或义符)与声符构成的汉字形式。形声字的出现，是汉字由表意到表音的巨大发展。甲骨文中，有的象形字笔划多、区别大，写起来不免有困难，并且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现有的汉字不够使用。所以在原来象形字、指事字等单体字的基础上，加一个声符或者意符，便成了形声字。

四、"会意者，比类合意，一见指挹，武信是也。"所谓会意字，即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而成的汉字形式。它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复合字体，当然它的字义也应该为其组成象形符号的复合义。说文中凡是提到"从某某者"，全部为会意字。

五、"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关于转注，简单说来，凡属于同义词，彼此可以互相解释的，即为转注。许慎把转注排在会意之后，说明它是以意为主，"同意相受"戴震解为"互训"。因为《说文》说："老，考也"，"考，老也"，

考老互训,“建类一首”则指部首而言。有些学者主张必须同部互训才是转注,例如草部有“蓨,苗也”,“苗,蓨也”,即同意相受。从情理上讲是可以说得通的。

六、“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简单地说,假借字就是人们利用一些读音相同的字,来代表不同的意思。假借字的发生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字义不容易在字形上表现,取同音之字代用,不作新字,如我、汝、其、来之类。一是当文字不够用,借字来顶替。许慎所举令长是秦、汉官制,令是司令,长是首长,皆属字义的引申,虽非本义,但不能称为假借。另一种情况是本有其字,写字的人提笔忘字,用同音字代替,只要音同便可假借,但是仍不免产生“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的情况,古籍中这种现象很多,学习文字的人应当理解。

表1:古代三家“六书”说名目与次序

班　固	1.象　形	2.象　事	3.象　意	4.象　声	5.转　注	6.假　借
郑　众	1.象　形	4.处　事	2.会　意	6.谐　声	3.转　注	5.假　借
许　慎	2.象　形	1.指　事	4.会　意	3.形　声	5.转　注	6.假　借

表2:今人三家“三书”说比较

唐　兰	象形文字	象意文字	形声文字[36]
陈梦家	象形	假借	形声[37]
裘锡圭	表意	假借	形声[38]

历代有关“说文”的研究　许慎的六书理论影响很大,为后人分析与释读甲骨文、金文等材料,提供了方法与借鉴。但是历代学者多盲从许慎之说,牵强附会,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39]。因此近现代学者对“六书”提出了怀疑,并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中可以唐兰、陈梦家、裘锡圭等人为代表。另外,又有学者从汉字构形等角度展开了新的思考。[40]

历代研究《说文》的著作非常多,大多集中于字形学——“六书”,字义学——“训诂”,字音学——声韵等方面,形成了“说文学”(或称“许学”)。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利用说文成果的字书和研究著作,惜多已不传。唐代李阳冰对《说文》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于许慎的观点。宋太宗时期,徐铉等重新校订《说文解字》,此本为“大徐本”,其弟徐锴的《说文系传》为“小徐本”,二徐把许慎原书的十五卷每卷分为上下二卷,共三十卷。我们现在看到最早、最完备的版本,就是此二徐本。[41]

清代是研究《说文》的鼎盛时期,尤以“说文研究四大家”成绩斐然。他们分别

是:段玉裁及其《说文解字注》,桂馥及其《说文义证》,王筠及其《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朱骏声及其《说文通训定声》。近代章太炎、黄侃等学者,又把《说文解字》从经学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尝试运用新的方法,把它发展为语言学的研究,并从理论的角度对古今语言的变迁作了探讨。[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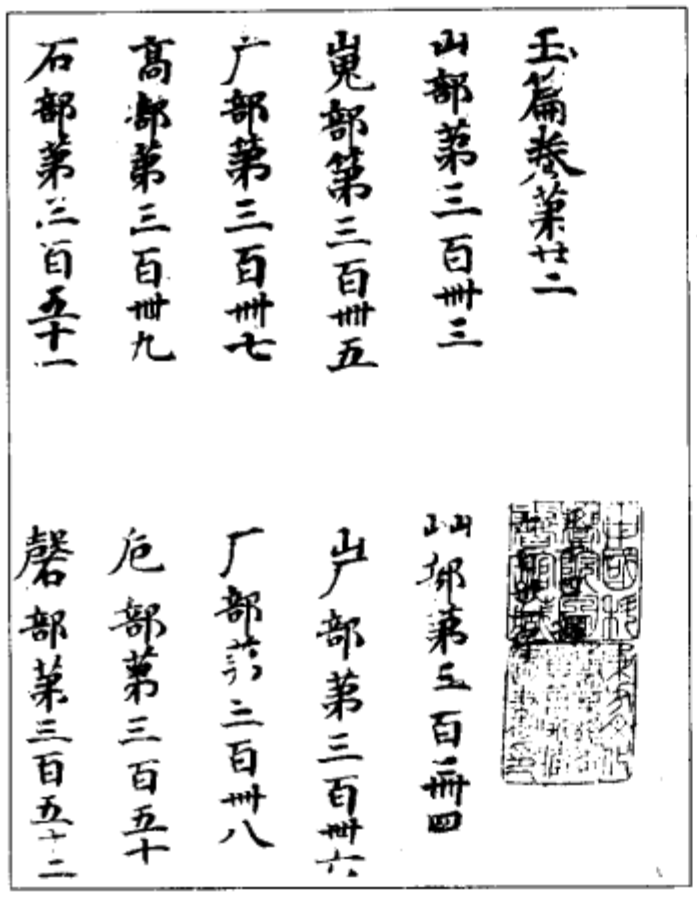
许慎在文字学上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但是他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只是战国文字,因此某些解释不免有错误之处。现代学者可以充分利用商周甲骨文、铜器铭文、战国文字等新的出土材料,突破传统的说文研究,进行更具科学性的探索。

第六节　六朝隋唐的文字学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发展呈现两方面的变化:汉代萌芽的正书,已逐渐走向成熟,并有取代隶书的趋势;政治动荡不堪,国家分裂,造成文字异体现象严重,汉字数量急剧增加。这一状况,促使字书编纂势在必行,由此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小学成就。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有:三国魏张揖的《古今字诂》、《广雅》、晋吕忱的《字林》(六卷)、南朝梁顾野王《玉篇》(三十卷)等。这些字书多采用许慎的"六书"原则,以及部首分类法。[43]除这些字书外,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记载,还有多种文字著作,惜大部已亡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黄氏逸书考》以及任大椿《小学钩沉》等人多有辑佚之作,可部分体现魏晋六朝的字书编纂成就。

这一时期,金石学开始萌芽并有所发展。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九中,多处提到有关商代的史事和遗迹。到南朝梁元帝时,古器物出土渐多,好事者每每搜集之,以附庸风雅。与此同时,纸张得到了普及,墨拓技术已经出现,文献流传趋向成熟,于是有《碑英》一百二十卷问世。这可能是见于记载

《广雅》书影



《玉篇》(书影)

的第一部著录金石的著作。

到了唐代，著录金石和记述古迹的风气渐盛，吴协的《三代鼎器》和徐浩的《古迹记》，可说是宋代金石学著作的滥觞。可惜这些书今皆亡佚，无法知道书中有关古代器物与事迹的记录情况。

《广雅》与训诂学 《广雅》是三国时期魏明帝太和年间博士张揖所写的一部训诂学著作。[44]原书为上、中、下三卷，后分成四卷，今本被分成十卷，共有16913字。[45]全书体例与《尔雅》相同。张揖作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补充《尔雅》解释的不足，他把典籍中《尔雅》所没有的“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广物易名”的内容都详细考定，著在书中。

《广雅》的篇目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其中，释诂、释言、释训是解释一般的字义，其余各篇是解释各种名词。《广雅》尽力搜集了汉代及以前的经传注释、字书、训诂等著作，保存了大量的汉魏以前词汇和名物等知识，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一部与《尔雅》相似的训诂学著作，它兼有普通语词的解释和百科词汇的汇编等内容，因此文献价值很大。其缺点和《尔雅》一样，解释失于笼统、模糊。

《广雅》在清代得到了很好的整理，这应该归功于王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写有《广雅疏证》十卷，他们以曹宪的本子为底本，参考其他文献进行了校订，历时十年写成。此书利用“就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的理论，分析文字的形、音、义，增加了《广雅》的学术价值。[46]除了王念孙之外，还有钱大昭的《广雅疏义》二十卷等，但影响与价值均不及王氏之书。

《玉篇》与楷书 《玉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楷书字典。梁武帝大同九年(543年)太学博士顾野王撰。[47]写成后呈给当时武帝之子萧绎，经萧恺删削后流行于世。

全书三十卷，内容与体例参考了《说文解字》、《字林》等字书，但比先前的《字林》多出四千多字。共分542部，比《说文解字》多两部，并且部首的次序也有改

变。

在编纂体例上，主要按照义类相近的原则编排。然后每字下面标注字义，详细列出见于古籍上的例证和注解，这些例证是按照先经传，再子、史、文集，最后是字书和训诂书，如果字有异体，也分别标注出来，层次清晰，论述详备。

唐高宗上元年间(760~762年)，孙强对《玉篇》所引用的注解进行删改，增加大字，收录文字22561字，世称“上元本”。后来陈彭年又重修《玉篇》。经过修订，原书特色荡然无存，[49]这虽然是一大损失，但是《玉篇》前后的其他字书都先后亡佚，独有《玉篇》经过多次修订，得以存世，也很值得庆幸。

顾野王原本大部分在宋代亡佚。清末，黎庶昌、杨守敬、罗振玉等人在日本发现唐代传本，共62部，2052字，包括第八、九、十八、十九、二十四残卷和二十二、二十七两个完整的卷子，断定为“顾氏原轶”。可以推定，这是唐代到中国的留学生和僧人传抄带回日本的。

陈彭年的广益版《玉篇》历经元明清各代，又有许多刻本流传。

隋唐时期，国家重新统一。先前汉字分歧混乱的状况，严重阻碍了正常的文化交流。此时，楷书经过发展完全走向成熟，并取代了隶书的正统地位。无论是士人学习经典，还是国家颁布法令，都迫切需要统一的文字规范，重新编纂供当时人适用的字书。因此，这个时期有正字功能的“字样”之书大量出现。在隋代，可以曹宪编《文字指归》四卷为代表。唐代这类字书更是数量众多，如颜师古的《匡谬正俗》、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张参的《五经文字》以及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等。

除“字样之书”外，隋唐时期还有两类字书产生。一类是全面解释汉字形、音、义，即解释《说文》、《玉篇》体系的字书。著名的有武则天时期所编纂的《字海》(一百卷)、颜真卿《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等书。另一类是注释经典文字的音义的字书。著名的有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唐玄宗天宝年间何超的《晋书音义》等。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价值甚高。

在训诂学方面，孔颖达、颜师古、贾公彦等人编纂的《五经正义》等书，[49]融合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家的注疏成果并有所突破，对训诂学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50]

《说文解字》产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较少有人进行整理和研究。至唐代，李阳冰第一个对它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一些不同于许慎的观点，开中国研

究《说文》之先河，有较大影响。然而后人多盲从许慎《说文解字》的神圣地位，对李氏研究多加否认，如五代末宋初徐氏兄弟以及部分清代说文研究者的言论即为代表。现在看来，前人从“宗许”角度出发，认识多有偏颇，李阳冰至少对《说文解字》的保存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匡谬正俗》 颜师古著[51]，此书是一部纠正古籍中前人各种误解、订正古书传写的讹误与俗音俗语差异的著作。但此书未几完成，师古即去世。后来他的儿子符玺郎颜扬庭把《匡谬正俗》编定为八卷，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十二月八日，上表献于朝廷。

全书共182条，涉及面很广。前四卷共55条，皆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凡127条，皆论诸书字义、字音以及俗语传承的差异等。他著述的基本原则是“依古不从流俗”，“事非稽考不妄谈说，必泽古昔，信而有征”(《急就章注·序》)。基本方法是“训诂、小学及前贤文章皆相附会，可以无惑”(《匡谬正俗》卷七)。

本书今有清卢见曾所刻《雅雨堂丛书》本、清黄丕烈礼居影印宋抄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等。

《经典释文》 “释文”意思是为古籍注音。先秦古籍经过长时间的传抄流转，以及语言的变化，后人很难阅读，因此汉魏以来有许多学者对流传古籍加以注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即是其中非常有名的一种。

陆德明所释的经典，有《周易》一卷、《古文尚书》二卷、《毛诗》三卷、《周礼》二卷、《仪礼》一卷、《礼记》四卷、《春秋左传》六卷、《公羊》、《穀梁》、《孝经》、《老子》各一卷，《庄子》三卷、《尔雅》二卷。全书共为经文9992字，传文6129字加以音释，合计为16121字。

在古代，文字一般多以声寄义，该书为古籍注音，就等于为古籍文字注义，故其体例是“摘字为音”，兼释“经”、“注”，即摘出经典正文和注文中的单字，加以音释。一般条目不但摘出被注字，还连带摘录两三字，以便读者按句寻检。《孝经》和《老子》二书则抄录全句。陆德明在序录中指出：“唯《孝经》童蒙始学，《老子》众奔夺乖，是以二书特纪全句。”[53]

全书除用反切或直音的方法给难字注音之外，兼及辨别字义。例如：“经”字，为大结反，有直结反，今天“大”在“定”部，而“直”则在“澄”部。对于经典异文也多所考证，并记载了多种版本的异同。它是我国早期对众多古籍中的疑难文字进行集中解释的“音义”总集之一。

另外，陆德明还兼收各家的训诂来解释文义，使后人得见古音古义。这些解

释现在有的已经亡佚失传。如《尔雅》刘歆、樊光和孙炎等人的注解，《庄子》向秀、司马彪的注解等由此而流传下来。

武华编纂的《经典释文索引》，收入全部陆氏加了注解的字，并标明它们在通志堂本《经典释文》中的卷、页、行数。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排列，后有笔画检字以资对照。此书可与中华书局出版的《经典释文》、《经典释文汇校》配套使用。

注释：

① 汉代刘歆首先在《七略》中提出"小学"之名，主要是指周秦以来的字书及"六书"之学。隋唐时期，小学的范围有所扩大。《隋书·经籍志》记载：小学主要包括体势、声韵、训诂以及金石刻文等方面的学问。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把书法、书品等方面的著作也列入"小学"类。宋代，小学著作渐次明确为训诂、音韵、文字三个门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出，文字学应包括三方面的书籍：体制之书，如《说文》类；训诂之书，如《尔雅》等；音韵之书，如《四声谱》等。王应麟《玉海》、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小学类》等也有类似观点。此时把蒙学、礼仪等方面也归入"小学"类，使"小学"的范围更加庞杂。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其有兼举两家者，则各以所重为主"。此时小学固定的含义是指文字、训诂、音韵三方面的学问和著作。其中文字学（近代以后又别分为古文字学一支），主要侧重于文字形体以及与字形有关的探讨；音韵学则主要是研究各个时期汉字语音的声、韵、调系统的发展规律；训诂学侧重于字义的考释，但范围最为宽泛，有关校勘、句读，以及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也包含在内。有时，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词义学等方面很难截然分开。在有关著作中，训诂学著作最为庞杂。清末以来可以章太炎等人的观点为代表。章氏指出，语言文字之学不应仅限于离析性的考释，还应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他很赞赏乾嘉学者"以音韵通训诂"、"以音韵证字形"的原则，这些观点为语言文字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思路。

② 如《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者谓之公"等等。见《韩非子》（四库备要本），第165页。

③ 《礼记正义·大学》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见《十三经注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3页。

④ 《周礼·地官·保氏》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⑤ 有关《史籀篇》的说法众多，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史籀篇》是西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为太史所作。许慎《说文解字序》也说："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唐代张怀瓘《书断》则明确说，"周宣王太史史籀"，姓史名籀。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叙录》提出"太史籀书"是《史籀篇》的首句，意为"太史读书"，提出成书时代的疑问。推断其字体处于石鼓文与秦始皇刻石之间，是春秋战国间秦人所作。唐兰《中国文字学》指出史籀就是《汉书·古今人物表》中的"史留"。史留是战国时周元王（前475~前469年）时代的人物，"元"与"宣"音近，《汉书·艺文志》所说周宣王恐怕是元王之误，后人因误传误，都说成是周宣王时代的史籀了。

⑥ 许慎:《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5页。

⑦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⑧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⑨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⑩ 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⑪ 详见《汉书·艺文志》。

⑫ 即"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参看本节附表1。

⑬ 关于二人的相关成就,可以参看《汉书·艺文志》,及《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卷八十八《汉书·儒林传》等。

⑭ 《汉书·艺文志》记载:"《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⑮ 许慎《说文叙》记载:"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庭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⑯ 孙星衍辑:《仓颉篇三卷辑本一卷》,《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2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⑰ 详见《松江急就章》,上海书店1987年版;王国维:《校松江本急就篇》,《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138页。

⑱ "十三经"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⑲ 历代对于《尔雅》的解释:《汉书·艺文志》注引张晏云:"尔,近也;雅,正也。"汉代刘熙《释名》:"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清代阮元说:"尔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国近于王都之正言也。"

⑳ 《进广雅表》称:"昔在周公,撰述唐虞,宗翼文武,……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参见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㉑ 见郭璞《尔雅注序》,《十三经注疏》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7页。

㉒ 参见黄侃《尔雅略说》,收入《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申小龙:《雅学史论纲》,《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6、8期。

㉓ 刘熙,字成国,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青州北海人(今山东潍坊、高密一带),汉献帝建安年间曾避居交州,著有《释名》27篇及《孟子注》,惜已亡佚。

㉔ 详见周祖谟《书刘熙<释名>后》,载《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

㉕ 引自《释名·释天》。

㉖ 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㉗ 毕沅的《续释名》包括《释律吕》、《释五声》两部分,辑录自《太平御览时序部》,因为"不忍弃置,又不敢羼入,故就其所引,正之以《白虎通》,参之以《史记》、《汉书》,别纂一篇,不以列于补遗而别为《续释名》"。《释名补遗》是从古籍中辑录出有关《释名》的遗文,并附有辑录的韦曜的《官职训》、《辩释名》等内容。

㉘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39~340页。

㉙ 见《方言》卷一。

㉚ 郭璞的《方言注》，是《方言》的第一个注本。郭璞发挥了用活的方言口语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用晋代方言与扬雄所在西汉后期的方言作比较，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些词语意义的变化发展。

㉛ 戴震的《方言疏证》，以《永乐大典》本与明本相校勘，又多方搜集古籍中引用《方言》、《方言注》的内容，相互参照，辨析很翔实，很有参考价值。

㉜ 参见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3年版。

㉝ 相关背景知识，可参见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3年版。

㉞ “六书”中，所谓造字法，是指制造新字的法则，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能够产生新字，所以是造字之法。用字法，主要是指应用现有文字，采用新的法则，赋予新的意义和用法。不过，转注、假借虽不能产生新字，但其性质到底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前人多有争论。详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前编序跋六书部分，中华书局1988年版。

㉟ 参见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8页。

㊱ 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5页。

㊲ 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6页。

㊳ 详见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中华书局1999年版。

㊴ 参见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㊵ “小徐本”即《说文系传》，南唐时期写成，内容多作者研究见解。“大徐本”增补421个“新附字”，每字下注有唐代孙愐的切音，并解释许慎的说解，释文前标有“臣铉曰”、“臣铉等曰”以区别于许慎之说。另外，《说文》版本流传很多，著名的还有“校订小徐本”，祁俊藻刻本，根据顾千里的宋抄本和汪士钟的宋刻残本校订而成；“校订大徐本”，毛晋“汲古阁本”，据宋刻本翻刻；孙星衍“平津馆本”，据宋本重刻；陈昌治校订的孙星衍本，中华书局本，据陈昌治本校订而成。

㊶ 参见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中华书局1999年版。

㊷ 宋代司马光的《类篇》，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以及清代官修《康熙字典》仍然继承了按照部首编排汉字的规则。这都说明了《说文》分类法的巨大影响力。

㊸ 张揖，三国训诂学家，唐代颜师古《汉书叙例》中记其：“字稚让，清河人，一云是河间人。太和中为博士。”《北史·江式传》也提到：“魏初博士清河张揖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除《广雅》流传至今外，《埤仓》、《古今字诂》在宋代已经亡佚。

㊹ 王念孙《广雅疏证》删掉衍文96字，补充脱漏的509字，共有17326字。

㊺ 详见周祖谟《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载《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㊻ 顾野王(519~581年)，字希冯，吴郡吴人，顾煊之子，南朝陈建国后，为太学博士。

㊼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陈彭年、吴锐、印雍等奉旨重修《玉篇》，天禧四年(1020年)雕版印行。共三十卷，542部，22873字，名为《大广益会玉篇》。《大广益会玉篇》在上元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字减注而成，与原本《玉篇》相比，多出大字5956个，删去了原本中的部分义项，删掉顾野王的案语，例证也保留很少，原来书中标出的异部重文，也删略殆尽。具体可以参看《大广益会玉篇》前言，中华书局1987年版。

㊽ 《五经正义》是唐代太宗时，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的一部官书，共一百八十卷，其中《毛诗正义》四十卷，《尚书正义》二十卷，《周易正义》十四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

㊾ 关于《诗经》,孔颖达等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之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诗正义》。关于《周易》,他们选用三国王弼的注为官定注本。然后把晋人韩康伯的续注,补入王注中,成《周易正义》。《尚书》主要是选取伪孔安国的《尚书传》,为正统注本。修《礼记正义》,主要以皇侃的义疏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补其不足之处。《春秋左传正义》以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为底本,并为之再加疏解而成。《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五经正义》的撰著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大量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

㊿ 颜师古,名籀。少传家学,博闻强记,精文字训诂之学,善属闻。隋文帝仁寿年间,荐授安养尉,不久弃归长安,以教授为业。除著有《匡谬正俗》一书外,还撰有《五经定本》,作为经学的标准文本,颁行天下;同时又令师古"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宜剖析,曲尽其源",录成样本,作为楷书文字的书写标准使用。

(51) 陆德明(约550~630年),隋唐间经学家。名元朗,吴县人。以经学著称于世。隋炀帝时,被征为书学士。唐李世民拜他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并命中山王乾从其受业。贞观元年(627年)拜国子博士。陆德明论著甚多,有《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经典释文》三十卷等。其中《经典释文》最著名,为汉魏六朝以来研究经典音义的总汇。参见《经典释文》前言,陆德明、黄焯,中华书局1983年版。

(52) 《经典释文》第1页,陆德明、黄焯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四章　两宋金石学的鼎盛和元明文字学研究的低迷

在宋元明六百多年中，中国的小学研究表现有三：

第一，文字学有很大发展，表现为《说文》研究的兴盛和字书、辞书等大量编纂。五代宋初，徐铉、徐锴兄弟对《说文解字》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徐锴撰有《说文解字系传》，徐铉等人奉诏对《说文解字》进行了校订，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完成。二徐从事的工作，对于《说文解字》的传播、使用以及研究都有很大贡献。

此外，南宋郑樵著有《通志》一书，其中《六书略》部分，对许慎的“六书”理论展开探讨，具有很大的启发。明代很多字书的编纂即吸收了郑樵等人对六书的研究成果。

第二，音韵学获得很大发展。上一时期已经兴起的研究在本时期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如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等。由此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古音学，代表作有《古音辨》、《毛诗古音考》等。此时编辑的一些大型韵书也有很大的影响，如《广韵》、《集韵》等，两书充分继承了《切韵》的成果，增加了大量的字和注释，对于当时写作韵文、考课取士极有使用价值，也为后人研究这个时期的语言文字提供了极大便利。

第三，金石学在宋代走向成熟。此时文化的繁荣、大量文物出土以及在皇室崇尚金石古物的推动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鉴藏研究文物成为风尚。许多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铜器、石刻等方面的研究。著名学者如欧阳修、王黼、赵明诚、薛尚功等，他们在实物鉴赏的基础上，还著有大量学术著作，真正开始了金石学的研究与探索。

第一节　“二徐”的《说文》研究

许慎的《说文解字》经过唐代李阳冰的整理后，大行其世，许慎原本反而很难

《说文解字系传》书影

看到。到了五代后期，南唐徐锴著《说文解字系传》，指斥李氏之“谬见”，试图恢复许慎说文原貌。后来，徐锴兄徐铉又奉诏校订《说文解字》[①]，对此书的传播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徐铉、王惟恭、句中正等人校订的《说文解字》，增补 19 字入正文，又补 402 个“新附字”，附于正文后。在每字下面，皆注有唐孙愐切音，并对许慎原文加以解释，释前标注有“臣铉曰”、“臣铉等曰”，以示与原文的区分。经他们校订增补的《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此刊本为现存最为完整的《说文解字》本。《四部丛刊》初编及《续古逸丛刊》均有影印本。

徐铉弟徐锴同为文字学家，著有《说文解字系传》(《说文通释》)，世称“小徐本”，共有四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为“通释”，是本书的主体，把《说文》的十五篇都一分为二，随文解释许氏的说解，着重疏证古义与诠释名物。凡自为诠释或引书之处，均加有“臣锴按”、“臣锴曰”字样；卷三十一、三十二为“部叙”，阐述《说文》540 部排列次序的意义；卷三十三至三十五为“通论”，阐述文字结构的含义；卷三十六为“祛妄”，着重对唐人李阳冰的“篡改”以及“谬说”，提出不同看法；卷三十七为“类聚”，列举表示同类名物的字，并说明它们的取象；卷三十八为“错综”，从人事推演古人造字的意旨。卷三十九为“疑义”，论列《说文》所缺字以及与小篆字体不合的字；卷四十为“系述”，是作者自序，说明以上各篇著述旨趣。

后人评价二徐说文解字之学，认为“大徐本”多“述而不作”，“小徐本”则是“有述也有作”，差不多每字加上“臣锴按”、“臣锴曰”标明自己的观点。他推崇许慎，但不囿于许说。如对于六书的看法，他没有按照许慎的次序排列，而是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次序排。现在看来，这一用名和排列次序是科学的，是徐锴对许慎“六书说”的发展。

徐锴继承了汉以来的“声训”方法，又独创了声韵相同的字互训的方法，丰富发展了“因声求义”之法。[②]这对清代段玉裁、王念孙有很大影响。所以周祖谟说：“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是清代文字训诂之学的前驱。”[③]

另外，徐锴还编有《说文韵谱》，亦依孙愐《唐韵》分部，非常便于检索。

第二节　宋元明时代对“六书”的探讨

郑樵与《通志·六书略》　唐以后的学者在研究《说文》的同时，对文字学的“六书”理论也展开了研究，虽成果各异，但是奠基作用不容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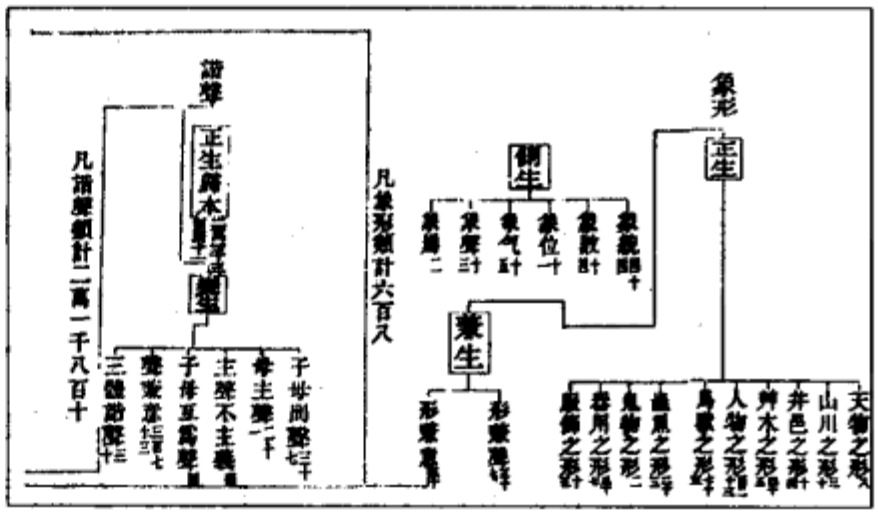
在宋人的六书研究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郑樵。[④]他先后著有《象类书》、《六书证篇》、《六书略》，前两书已经亡佚，但基本观点在《通志·六书略》中都有体现。

他分象形为“正生”、“侧生”、“兼生”三种，记有18类。其中，正生之类分为天地之形，山川之形，井邑之形，草木之形，人物之形，鸟兽之形，虫鱼之形，鬼物之形，器物之形，服饰之形。侧生之类分为象貌，象数，象位，象气，象声，象属。兼生之类，又细分为形兼声，形兼意。他还指出：“象形，指事文也，会意字也。文合而成字，文有字母，母主义，子主声，一子一母为谐声。谐声者一体主义，一体主声。二母合为会意，会意者二体俱主义。合而成字者也，其别有二，有同母之合，有异母之合，其主义则一也。”

另外，书中对某些表意字字形的解释明显胜过《说文》。例如《说文》说“止”字“象艹木出有址”，《六书略》则认为“象足趾”；《说文》说“步”字“从止相背”，《六书略》则认为“象二趾相前后”；《说文》说“立”字“从大立一之上”，《六书略》则认为“像人立地之上”；《说文》说“走”字“从夭、止，夭者屈也”（从段注本），《六书略》则说“夭”“像人之仰首张足而奔之形”，“步”、“立”、“走”等字一般都看作会意字，《六书略》却收在象形类里等等。郑氏精于金石文字研究，上述见解，显然受了金石文字中较古字形的启发。

其他研究成果　郑樵《通志·六书略》对后来张有的《复古篇》，宋元间戴侗的《六书故》，元代阳桓的《六书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六书故》成书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为数目、天文、地理、人物、动物、植物、工事、杂疑等九部。每一部字又按照指事、象形、会意、转注、谐声、假借，分别排列，不确定的则归入“某之疑”。共分为479个细目，其中188个是文（即独体文字），45个疑文，246个是字（合体



郑樵《通志·六书略·六书图》

字)。这种分类法,比《说文》多有重叠的部首分类要先进一些。但是,因为有时杜撰字形,立论粗疏,分析也不够严谨,因此受到后人的很多批评。不过戴氏解说文字也有其独到之处,这也是后人所承认的。

宋元明时期,学者对六书的分类和探讨,虽然多琐碎主观,有诸多不科学之处,但对以后文字学的理论发展,还是有相当的启发作用。

第三节　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和繁荣

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开始有人研究辨识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汉宣帝时,张敞曾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发现的尸臣鼎。许慎著《说文解字》也很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上的"前代之古文"。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史迹也有记述。唐代初期,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但这一时期对金石学专门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少,基本上也没有著作问世。

真正把研究古代器物作为一门学问,始于宋代。金石学在宋代兴起,绝非偶然。一方面,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大力奖励经学,崇尚古代礼仪。于是朝廷及士大夫均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另一方面,前代的学术积累也为此时金石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等都有了明显进步,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新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墨拓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了方便条件,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另外,宋代帝王的喜好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石学的"金",多指古代有铭文的各种铜器,其中以钟鼎彝器为大宗;"石"主要指有文字图像的石刻,以碑碣墓志为大宗,还包括摩崖、造像、经幢、石阙等。宋代金石学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多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北宋曾巩的《金石录》一书最早使用"金石"之名。至清代,王鸣盛、王昶等人才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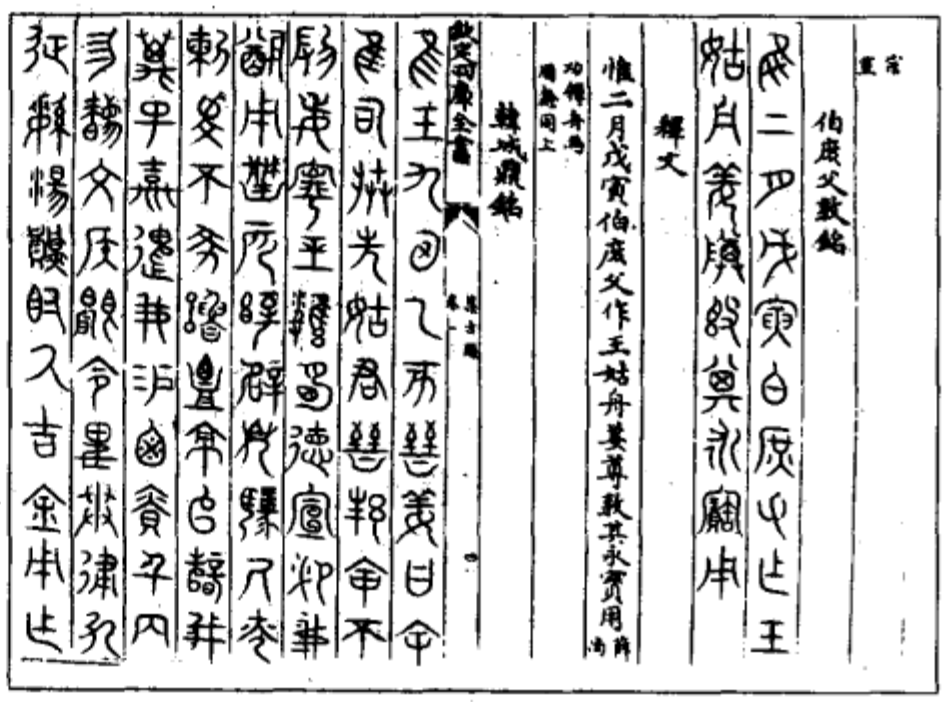
对于金石学的含义,有学者指出:"'金石学'者何?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其制作之源,与文字同古;自三代秦汉以来,无不重之;

而成为一种专门独立之学问，则自宋刘敞、欧阳修、吕大临、王黼、薛尚功、赵明诚、洪适、王象之诸家始。历元明至清，斯学大盛。”⑤

宋代金石学卓然自成一家，主要体现在：

一是大批专研金石的学者出现，如刘敞、欧阳修、吕大临、王黼、赵明诚等。二是大量金石学著作面世，如《集古录》、《宣和博古图》、《金石录》等。三是研究方法上也趋于成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近代考古学的前身。学者对器物进行科学的记载，收录有尺寸、容量、重量等各种数据，并按照比例记录器物的图像，对铭文进行详细的考证；他们还初步提出了铜器的分类与命名，这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尤其是郑樵《通志》中别立“金石”一门，自此金石学一科，成为专门之学。

宋代的金石学范围较广，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古器物之学与金石文字之学。据容媛《金石书录目》和杨殿殉《宋代金石佚书目》所列两宋金石著作，约有九十种之多，而其中有代表性的约有十余种，可见当时研究风气的热烈。


伯庶父敦銘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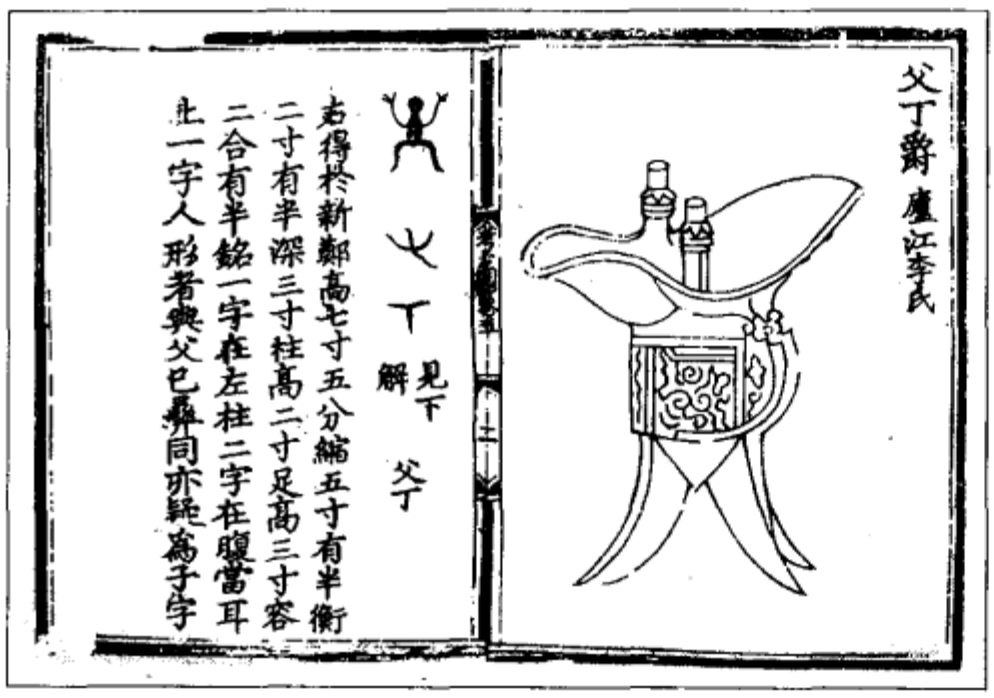
釋文

《集古录》书影（四库全书本）

《集古录》：宋代金石学研究成果之一　《集古录》，北宋欧阳修撰⑥，又名《集古录跋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研究金石铭刻的著作。此书共十卷，收录周秦至五代的铜器铭文、碑版、拓本和跋尾等共有四百余篇（各种版本篇数不尽相同）。以碑版为主，铜器仅20件。

欧阳修平生收集金石铭刻真迹拓本，并装裱成轴，多至千卷。此书所收，皆嘉祐、治平年间所作跋尾。其内容偏重于评论，目的在于补苴史传之缺谬。即所谓重在评论“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⑦欧阳修的跋尾，很为后世所重视。因为是随得随录，所以《集古录》有卷帙次第，而没有按拓本的年代次序来排列。据作者自序，成书于嘉祐八年（1063年）癸卯。后世刻本乃以拓本时代先后为序，而于每条之下附列原来卷帙的次第，并有更易补正之处。

熙宁二年（1069年），其子欧阳棐作《集古录目》。《集古录》只录有跋尾，而《集古录目》则包括了欧阳修家的千卷之藏。对其家藏碑版，仅列书撰人名氏及



《考古图》书影

官位事实与立碑年月。是书久已失佚，陈思《宝刻丛编》所引《集古录目》最多，清代黄本骥据吴荷屋钞本辑录五百余条，按立碑时代辑为五卷。《集古录》及《集古录目》二书，通行本以《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较好。

《考古图》：宋代金石学研究成果之二　《考古图》，吕大临撰[8]，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和古代文物图录书。书成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收录了当时宫廷及私人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这部书体例严谨、记录详实，每件器物图文并茂，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另外出土地点、收藏处所等以事实为据，并且还有考证，真实可信。

全书共十卷，第一至第六卷为鼎、鬲、甗、簋、壶、爵等商周铜器，今本目录为138件，实有143件。第七卷为钟、镈等乐器，目录为10件，实有15件。第八卷为玉器，目录上列有13件，其实只收录了9件。第九、十卷为秦汉器，目录为63件，实收67件。目录为224件，实际收录234件。

书后所列“所藏姓氏”，除秘阁、太常、内府之外，共有37家。其中三家没有一件器物列入图录，且遗漏了四家，实际上共有38家。私人收藏各家中，以庐江李辟(字伯时)所藏收录最多，有62件，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其他多少不等，少的只有一两件。书中考释经常引用庐江李辟所编纂同名《考古图》的说法。

《考古图》中有九十多件器物，出土地是可以考证出来的，大约一半以上出土于陕西各地。该书在编排上也注意到了共存伴生的关系，如第三卷收“得于河南河清”的“单癸彝”，同时还附有同时出土的鼎、觚、盉等五器。另外该书根据器物的形制、文字以及出土地点推断其年代，如第一卷的“饕餮鼎”，根据形制、文字及出土地点推断为“商器”，这是一种很有预见性的推断，为我们研究青铜器提供了方法，即使对于商周的典章制度也有参考价值。虽然在定名等方面错误在所难免，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抹煞。

《宣和博古图录》：宋代金石学研究成果之三　简称《博古图》，旧题王黼等

奉宋徽宗敕编纂，一说为王楚编纂。大观元年(1107年)开始编辑，宣和年间成书。著录了当时皇宫宣和殿所藏的自商代至唐时的铜器869件。

《宣和博古图录》书影

全书共有三十卷，各种器物均按照时代顺序编排，分类著录了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斝、觚、斗、卮、觯、角、敦等20大类。每类器物都有综述，每一器物都是先描摹图像、勾勒铭文(或是拓本)以及释文，并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等，有的还附记出土地点、收藏情况及器物颜色。对铭文和释文也有简略的考证。绘制的图形很精确，在图形的旁边还注有“以元样制”或是“减小样制”等以表明图像与实物的比例关系。可惜，明代的缩印本，把比例全部删去。

这部书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包含了一些著名的重器，如晋姜鼎、齐侯镈等。根据实物的形制以订正《三礼图》的错误之处。《博古图》中所定的名字如鼎、尊、罍、舟、卣、爵、斝、觚等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清代评价说：“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考订。当时集之功亦不可没。”[9]

另外，书中所著录的铜器，多数在靖康之乱时为金人掠到北方。少数流散到江南的，则见于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中。

此书流传的版本很多，如元代至大重修本、嘉靖七年(1528年)蒋暘翻刻的元至大重修本、万历二十八年吴万化宝石堂刻本，其中以蒋暘翻刻本为最好。通行最广的则是清代康熙十七年(1752年)黄晟的亦政堂重修的宝石堂本。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代金石学研究成果之四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薛尚功著，[10]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

薛氏此书主要依据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黻的《宣和博古图》编纂而成，但搜罗更加广泛。按照钟鼎原器款识，依样摹写，并增加了释文，有考证短文，对原器的出土地点及收藏情况等，多有记载。全书共录有夏器2件，商器209件，周器253件，秦器5件，汉代铜器42件，共511件。

书中对于铭文的考释确有精到之处。如《考古图》中释蚉鼎为周景王十三年，郑献公蚉立。薛尚功同意《宣和博古图》的说法，认为是商器。《宣和博古图》释父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书影(四库全书本)

甲鼎铭作“立戈父甲”,此书则作“子父甲”。立论多有根有据,有定伪刊误之功,是南宋金文著录书中流传至今的一部重要的著作。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缺点,如薛尚功认为的夏代器,其实应为吴越之物,商代器中也有许多是周代器,周代器中石鼓文应为秦国器,并且还有些作伪的铜器混入其中。宋代金石学处于草创时期,鉴别不准确,考释有错误,在所难免。

这本书宋刻本非常罕见。明末崇祯年间朱谋垔声称有薛尚功手书本,并刻印出版,此说较为可信,但是刻板与原本一并亡佚,并且传写错误很多。清代人阮元曾以宋代刻本相校对,质量较高。后来又有缪荃孙据其藏的陆友桐临写的汲古阁校本,重新校对,是现存各本中最好的本子。

洪适《隶释》:宋代金石学研究成果之五 汉人隶书多存于碑刻,将隶书搜集摹刻,并整理成书的是宋人洪适。[11]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隶释》、《隶续》、《隶纂》以及《隶韵》四部著述中。今《隶纂》已经亡佚,《隶韵》也有缺失。

《隶释》,二十七卷,书成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其中第一至十九卷,著录汉魏隶书碑刻凡183种;第二十卷是辑录《水经注》中的汉魏碑目;第二十一、二十二卷为欧阳修《集古录》;第二十三卷是欧阳棐《集古目录》;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卷是赵明诚的《金石录》;第二十七卷是无名氏的《天下碑录》中的汉魏碑刻部分。每碑标目下面都说明郦道元、欧阳修以及赵明诚书中是否著录。此书为考释隶书而作,每碑皆依文字写定,并加以解释,兼有考察史实之处。

相比《集古录》和《金石录》,此书文字考释更加精密。《四库全书总目》称:“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最为精博。”[12]胡朴安也称此书在文字学上有两大价值:笔画之变更,用字之假借。当然因为初创,疏漏之处也在所难免,但无害弘旨。

《隶释》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刊本、清乾隆四十二年汪氏刊本等。清代人黄丕烈撰有《汪本隶释刊误》一卷,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刊刻,分别用叶氏、袁氏、周氏所藏本校勘汪氏本,颇为精审。

赵明诚《金石录》

宋代金石学注重器形、花纹、出处、铭文等方面的研究。从考据着眼，与经典参验，方法上确实比《三礼图》等有所进步，使金石学有了纯学术的意味，但由于受传统思想束缚，又缺乏科学的手段，未曾进行形制、花纹方面的深入分析，也没有进行科学化的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这一时期金石学不仅完全依附于经学，还具有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色彩。

在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他用科学的方法，从实际出发，亲自观摩与试验，从器物的形式、花纹等方面考证古代器物的用途，从而更正了《三礼图》中的许多错误。他曾对商周时期空柄甬钟的悬挂方法与鬲足中空的用处的考察，都是通过试验作出判断的，因此他的结论多少具有科学的成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13]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宋代许多金石学家不惜倾家荡产，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北宋灭亡后，赵明诚被迫举家南迁，最后忧愤成疾，抱恨终生。他的妻子李清照，常常助其搜求金石，整理器物，在其故去之后，李清照变卖家资，才得以将《金石录》整理付梓。

第四节　宋元明时期的字书、韵书编纂

宋元明时期很注重字书的编纂工作，在文字应用、规范、传播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时期编纂的字书大体有如下三类：第一，以考订文字形体为主。研究者或致力于寻求文字形声讹变和字划流转情况的探察，或推求文字隶、楷演变的规律，写就一批有价值的文字学著作。如宋郭忠恕的《佩觿》、张有的《复古篇》等。第二，形、音、义三者并重合编的字书。如宋王洙、司马光等的《类编》、明梅膺祚《字汇》、明张自烈《正字通》等。第三，专门考释古籀、汉隶以及钟鼎文字的字书。如郭忠恕的《汉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等。另外，还编有一些韵书，如《广韵》

等。

《佩觿》 郭忠恕著[14]。书名"佩觿",取自《诗经》"童子佩觿"句,"觿",为古代解结之具。"佩觿",即童子佩之,以解疑惑之义。

此书共有三卷,上卷备论文字变迁的原因,分为三项:一是造字,郭氏认为造字始于象形,而古文、籀文写法本有差别,篆演化为隶,形体变化更是严重,后人妄析字形,读音变异以及避讳、讹变等导致了文字的讹变蔓芜;二是四声,认为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方言的分合,以至"同言异字,同字异言",甚至音义相同而字形不一,于是四声很难分辨;三是传写之差,因为使用过程中的传抄讹变,遂使文字更加芜杂。清代人钱大昭《说文统释序》即是根据此部分扩充而成。中下两卷,则是取字划疑似,读音接近,易于混淆的字,按照平上去入四声分为十部,把相应的字划归一类,注明其音义的差别。卷末还附有与《篇》、《韵》音义异者15字,辨正舛误者119字,为不知名的后人所加。

此书虽小有疏舛,但"忠恕洞解六书,故所言具中条理","忠恕所论较他家精确多矣"。[15]

有泽存堂本、《续知不足斋丛书》本、海宁许氏仿宋刊本等多种。

《类篇》 旧题为司马光撰,书中有司马光案语。根据书后跋语,知此书由王洙奉诏开创,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相继修纂而成。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范镇出镇陈州后,司马光接续这项工作时,书已经完成,只是缮写未完,司马光缮写并奏进之,因此才有司马光编纂此书的说法。

此书凡十五卷,每卷又分上中下,实际有四十五卷。末卷为全书目录,乃遵从《说文解字》之例。其分部及各部次序安排完全依照《说文》。

全书收录31319字,重音21846字,共有53165字。卷首有苏辙序,指出编辑的体例共有九项。每个字先用反切注音,随后释义。与《玉篇》类似,以音义为重,不逐字分析字形构造;但有异体的,都标注在正字之下,有的还附有篆文;该字的异音异读,则在解释字义之后加以说明。补充了《说文》、《玉篇》所缺少的内容。

《类篇》通行的版本是《楝亭五种》本以及粤东本等。

《字汇》 明梅膺祚撰。[16]全书以地支标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连同卷首以及末尾的附录,共有十四卷。收录33179字,分部全部依照楷体。卷首有膺祚从兄鼎祚序,作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字汇》当完成于此时。

《字汇》在编排体例上完善了部首检字法。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根据楷体字形的特点,以使用方便为目的,把《说文》部首简化合并为214部。第二,部

首的排列顺序，依照字画多少排列。第三，每部中的字也是按照笔画多少进行排列。第四，首卷后附“检字”，排列不易辨明部首的难检字。另外在每一卷卷首列有一表，载明该卷部首以及每一部首所在页数。《字汇》所采用的这套检索方法，是字书发展的一大进步，它适应了楷书字体的特点，比以前的字书更加实用方便。清代的《康熙字典》即沿用此种编排体例。

《字汇》对每个字都是先用反切注音，后释义，并酌引书证；有的还在注释末尾，采用《说文》的分析，一一指出字的本义，并说明字形的含义。如：“刈，倪制切，音艺。割也。《离骚》：愿人矣时乎吾将刈。又姓。”（刀部）

当然这部书也有诸多缺点。如在每个字下标注所谓“叶音”，并且还把“叶音”与“又音”并列。虽然梅氏沿袭的是宋人的说法，但是随意改变读音的做法毕竟不科学，在使用上也造成很坏的影响。另外，引文多只写篇名，不标注书名及所用版本，想查找原本也不方便。有的还是随意截取，使用材料很不严谨。但这部书因为注重实用，很受到一般读者欢迎。因为非常流行，相应出现了许多增补、删减以及袭用其书名的字书，如《正字通》、《字汇补》、《会海字汇》、《文成字汇》等。

通行的《字汇》是清代刻本，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都有刻本。

《广韵》 此书是现今保存最完整、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韵书。宋代陈彭年、邱雍等人奉旨编撰而成，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一说成书于景德四年）。书成后皇帝赐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它是我国第一部官修韵书。

《广韵》在《切韵》、《唐韵》的基础上增广而成，全书分206韵，收单字26194字，比《切韵》增加1.5倍；注文191692字，比原本《切韵》增加若干倍。《广韵》注文引证丰富，使韵书具有一般字典或辞典的作用。

《广韵》书影

在体例上，全部是按照汉字的声调分卷。在一卷之中用韵作单位。同属一韵的字汇集在一起，称为一韵。每个韵有一个名称，又叫韵目，这些韵目都是每个韵开头的第一个字，它

与本韵其他字同韵。一个韵中的一个音节为一个小韵。在小韵的代表字下首先注出词义,末尾用反切注音,最后标出这个小韵包括多少字。

该书完整而详细地记录了南北朝到宋末的语言系统。今天的学者可以《广韵》为桥梁,上推古音(两汉以前的语音)、下证今音(现当代语音)。所以说《广韵》是研究汉语语音史、当代汉语方言不可或缺的典籍。另外,作为韵书,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一直起着供文人写作诗文查找韵字及辨析字音、字形、字义的作用。

《广韵》从刊行到现在版本很多,有简本和繁本之别。现代周祖谟《广韵校正》,搜集资料全,校雠方法精,是目前最好的校本。⑰

注释:

① 徐铉(916~991年),五代宋初文学家。文思敏捷,文章承晚唐骈俪之风,体格隽秀。又与弟徐锴俱精通文字学,号"大小徐"。长于书法,喜好李斯小篆,隶书也较出色。

② 参见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92页。

③ 参见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

④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一生勤于著述,《通志》是郑氏一生学问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集天下书为一书",共二百卷。其中,金石、图谱、校雠三略,属郑樵独创。

⑤ 参见朱建心《金石学》,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页。

⑥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一书。

⑦ 参见《欧阳文忠公全集》。

⑧ 吕大临:宋代金石学家,字与叔,京兆蓝田人(今陕西蓝田县)。精通六经,特别是《礼》,著有《礼记传》、《孟子讲义》、《东见录》、《考古图》等。另外,他还有《考古图释文》一卷,是《考古图》的姊妹篇,对《考古图》所收的铜器铭文进行了考释。该书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96件,除了个别解释简略之外,对其中的85件,进行了详尽的考释与论证。

⑨ 参见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83页。

⑩ 薛尚功,字用敏,钱塘人。根据曾宏父《石刻铺叙》,这本书作于绍兴十四年,当时他正担任江军节度判官,在郡守林师说的帮助下镌刻而成,用石计24片。宋亡以后原石即已不存。明末清初拓本亦不易得。现存宋拓石刻残卷、残页分藏上海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当初为石刻本,所以称为"法帖"。参见《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前言,辽沈书社1985年版。

⑪ 洪适(1117~1184年),南宋金石学家、诗人、词人,洪适诗文论著甚多,四方传诵。《隶释》二十卷、《隶续》二十一卷,是其重要著作。据其弟洪迈说:"吾兄文惠公区别汉隶为五种书,曰释、曰缵、曰韵、曰续,四者备矣,惟韵书不成。"现只存《隶释》、《隶续》二种。是书为考隶而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

⑫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35页。

⑬ 请参考夏鼐《沈括和考古学》，《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⑭ 郭忠恕（？~977年），五代宋初画家、文字学家。擅画山水，尤精界画。所绘重楼复阁，颇合砖木建筑的营造规矩。兼通文字学，善写篆、隶书。所著《佩觿》三卷，阐述文字的变迁，并考证历代传写的错误，对辨别一般形音义相近的字有参考价值。又汇编古文字为《汗简》，是研究古文字学又一重要参考资料。

⑮ 参见纪昀《四库全书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48页。

⑯ 梅膺祚，字诞生，宣城（今安徽宣城县）人，履历不详。

⑰ 常见的本子还有张氏泽存堂本、《古逸丛书》覆宋本、涵芬楼覆印宋刊巾箱本、曹刻楝亭五种本、乾道五年黄三八郎本（《巨宋广韵》）、覆元泰定本、小学汇函内府本等七种。前五种称繁本，后两种称简本。所谓简本是元人根据宋本删削而成。繁本和简本主要表现为注文的多少不同，个别韵收字多少也略有不同，但音系是相同的。其中宋乾道本《钜宋广韵》曾于清末传到日本，而在国内失传，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经籍访古志》影印出版。据周祖谟考证，此本与楝亭五种本相近。

第五章 清代考据学的崛起和金石学小学的复兴

清代初期，由于文字狱的泛滥，[1]言论遏制，思想禁锢，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广大知识分子对政治噤若寒蝉，埋首于经学古籍之中，做繁琐的考证校阅工作。同时有感于明代的空疏学风，一些学者力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这两股学术洪流，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达到极盛，形成了以考据学为代表的“乾嘉学派”。

清代是传统文化的总结与集大成时期。随着考据学隆盛，其中的传统“小学”研究也达到了全盛。这一时期，学者真正由字“音”入手，注重形、音、义三者的综合考察，[2]许多前代未了的重大问题得到解决，成果远居前人之上，并涌现出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王引之、江有浩等。这批学者的一系列著作，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江有浩的《音学十书》等等，足以傲视前人，启迪后学。

除小学外，清代的金石学得到复兴和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出土的铜器数量，远超宋代。对铭文的考释，更加严谨详细。并且已不限于研究青铜器、石刻，还根据出土文物，扩展到钱币、兵器等各种古器物的研究。他们研究的目的也很明确，即以古代铭文“证经辩史”。金石学这种证经补史的作用，使其完全变成了经学的附庸。[3]毋庸置疑，清代学者充分认识到金石材料的史料价值，并且尽一切可能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充分结合古文字学、小学的成果，因此著作和成果，都大大超越了宋代。

清代官私著述相当繁盛，金石书目琳琅满目。据容媛《金石书目录》统计，清代金石学著录将近一千种。官修书目以《西清古鉴》为代表，私人所修书目以《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为代表。在金石之外又有了陶、骨、玉、瓷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范围之广，用力之深已经超出了金石学的范围。在有关金石学的研究著作中，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商周铜器说》，以及清末钱玷《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曹奎《怀吴山房吉金图》、刘宫海《长安获古编》、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吴

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端方《陶斋吉金录》等都有一定影响。这些书都是研究古代文物文字的重要参考书。

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很多学者开始展开初步而富有启发价值的探索。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后，对甲骨开始了搜集与研究，前后所得甲骨约一千五百余片。他的收藏后来转到刘鹗手中，连同自己的收藏，刘鹗从中精选出1058片，印成《铁云藏龟》一书。随后孙诒让根据此书写成了第一部甲骨学研究专著《契文举例》，开启了甲骨文研究的序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王国维二人，他们吸收新的科学方法，在甲骨的搜罗、著作和甲骨卜辞的科学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罗王之学”，为甲骨学及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乾嘉学派”的相关贡献

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是近世学者争论较多的话题，一般而言，多认为有如下因素：第一，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使清代经济得到恢复和很大发展，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固，形成了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学术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另外，清朝康雍乾三朝文网严密、文字狱频繁，也促使了当时学者走向远离现实全身避祸的考据学一途。第二，从纵向文化发展看，乾嘉学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系统即经学和史学都有深入的清理和总结，这是中国文化史的必然结果。经学方面，面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东汉古文经学复兴也在情理之中。我国的史学传统可以分为“求真”与“求用”两途，时代不同而各有侧重。乾嘉时期，承平已久，史学受考据学影响，“求真”考虑更为明显，尤其是对古史的订补，更是贡献巨大。

乾嘉学派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考据学的成果，以经学为中心，涵盖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辑佚等学术领域，重实证、长于考据。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其中又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较为著名的学者有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钱大昕等。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其中较为著名的学者有任大椿、孔广森、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戴震在音韵训诂学上的先驱作用　戴震是清代乾嘉学派学术的集大成者，他上承江永学术，治学广博，对于文字、音韵、训诂、历算、名物制度皆有涉猎，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他将这些方面的研究，都看成治经明道的手段，从不把其当

成目的。[4]其学术贡献主要包括哲学思想、自然科学以及考据学三个方面。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著《论性》、《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中。自然科学成果主要有著作《筹算》、《考工记图注》、《算经十书》等。

戴震在声韵、文字学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答江慎修论小学书》、《转语十二章序》、《答段若膺论韵》、《声韵考》、《声类表》等论著中。他对六书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是字之体；而转注、假借二书则是用字法，是字之用，即“四体二用”法。这对六书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把古韵分为九类25部，特别是祭部独立更是他的创见；他还把阴阳入三分，阴阳可以对转。发现了非入声韵与入声韵相配的对应规律。他还发现了汉字古音与古义之间的关系，认为“故训声音，相为表里”、“疑于义者，以声考之；疑于音者，以义证之”，揭示出“因声求义”的方法。这对段玉裁、王念孙的相关研究很有启发。

另外，名物训诂方面的著作如《考工记图注》、《经考及经考附录》、《方言疏证》等也有很大贡献。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学成就 王念孙(1744~1832年)，语言文字学家，江苏高邮人。早年从学于戴震。乾隆四十年(1755年)中进士。历官工部主事、郎中、直隶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等。罢官之后，潜心著述，以文字、音韵、训诂的卓越成就，为一时学者推重。其学甚为渊博，虽不出汉学门径，但不囿于汉学藩篱，治经不专宗一家墨守成训，而诸说并列，务求其是，尤精于训诂之学。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部训诂学著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上。

乾嘉时期，在朴学影响下，《尔雅》、《方言》、《说文》都有了精善的注本。《广雅》一书作为汉魏时期文字训诂之书，也为当时学者所重视，但由于《广雅》所收的字和训释来源非常庞杂，想做出好的注解，不具有坚实的小学、历史学、经学功底，是很难成功的。桂馥曾经指出：“治《广雅》难于《尔雅》，《尔雅》主释经，多正训，《广雅》博及群书，多异义，一；《尔雅》有孙、郭诸旧说，《广雅》惟曹音，二；《尔雅》为训诂家征引，兼有陆氏《释文》，《广雅》散见者少，无善本可据，三也。此非专且久不易可了。”[5]

王念孙根据前代文字学多重形不重音的局限，用十年时间，旁征博引成《广雅疏证》三十二卷，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广雅疏证》用为《广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经传，旁采众说，考证精博，疏通故训，并且改正原书错字、漏字、衍字等讹误甚多，颇具创见，其学术价值不仅超越《广雅》，而且若干见

解也为同时期训诂诸家所不及。⑥

概而言之，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校订今本文字的讹误，增补脱略，删去衍文。校勘之学是王氏所擅长的，他以“影宋本”（即皇甫本）与各种明刻本互校，以证得失，同时还采用《说文解字》、《玉篇》、《一切经音义》、《集韵》以及《太平御览》等书，考证唐宋以后诸本之误。

二、援引古籍，探求书中故训的依据。王念孙充分利用《尔雅》、《方言》、《说文》以及其他古籍，针对某一故训贯穿群书，援引准确，独标其解。特别是书中所言“解者多失”之处。

三、列举音同字异和声近义同之字，比类合谊，以互相发明。⑦王氏在训诂方面，不拘泥于前人说法，而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即音以求字，因文以考义，所以立论扎实，解说精当。他虽然是为《广雅》作注，但是处处解释汉魏时期的文字故训。其中，“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更是音义结合，见解准确。这种方法为研究训诂、文字开辟了一条道路。

可以看到，《广雅疏证》提供了大量有关汉魏时期文字孳乳、繁衍、声音通转以及语义变化的信息，他提出的“诂训之旨，本于声音”的纲领以代替先前的以形为主的纲领，这是训诂学、文字学的一大革命。

王念孙还撰有《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分《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共十种，对于古义晦误，写校妄改，都一一辨明，用力甚勤。考证一字，往往罗列古籍，旁征博引，令人信服。且能以归纳法得出古书致误缘由，更属难能可贵。此书虽有错改本文等疏失，但贡献远大于缺点。⑧王氏二书，在当时即引起极大反响。

另外，王念孙在音韵学方面也有贡献。清代音韵学，特别是古音学，发端于顾炎武，之后，江永创获很多。至戴震、段玉裁发展更是迅速。段玉裁在《六书音韵表》中分上古韵类为十七部，密于顾氏的十部、江氏的十三部、戴氏的十六部。王念孙撰《诗经群经楚辞韵谱》，以“同声必同部”为分合标准，将至、祭、盍、辑诸部独立，分古韵为二十一部，自成一家。

王念孙之子王引之，也是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其学力主通核，不尚墨守，以文字训诂最为专精，与其父并称“高邮二王”。代表作是《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

《经义述闻》三十二卷，主要是校正《周易》、《尚书》、《毛诗》、《周官》、《仪礼》、《大戴礼记》、《礼记》、《左传》、《国语》、《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儒家典籍

书的古训，并疏通文字的假借。其中训释部分大都记述其父王念孙之说，表明“家大人曰”，并且参以己意而成，为其代表作。

《经义述闻》嘉庆本自序说：“述闻者，述所闻于父也。”道光本自序又云：“过庭之日，谨录所闻于家大人者以为圭臬，日积月累，遂成卷帙。既有大人之说触类推之，而见古人之诂训有后人所未能发明者，亦有必当补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当改读者。不揆愚陋，辄取一隅之见，附于卷中，名曰经义述闻……”⑨

该书与其父《广雅疏证》用义相同，即也是充分利用“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其本字”的方法，旁征曲喻，博稽载籍，订正历代学者误说，在训诂学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得到当时汉学诸家交口赞誉，许为千古“绝学”、“海内无匹”而且被抨击汉学的理学家认为是“汉唐以来，未有其比”。

《经义述闻》初刊于嘉庆二年(1797年)，是未完本；道光七年(1827年)重刻于京师，也就是现在的通行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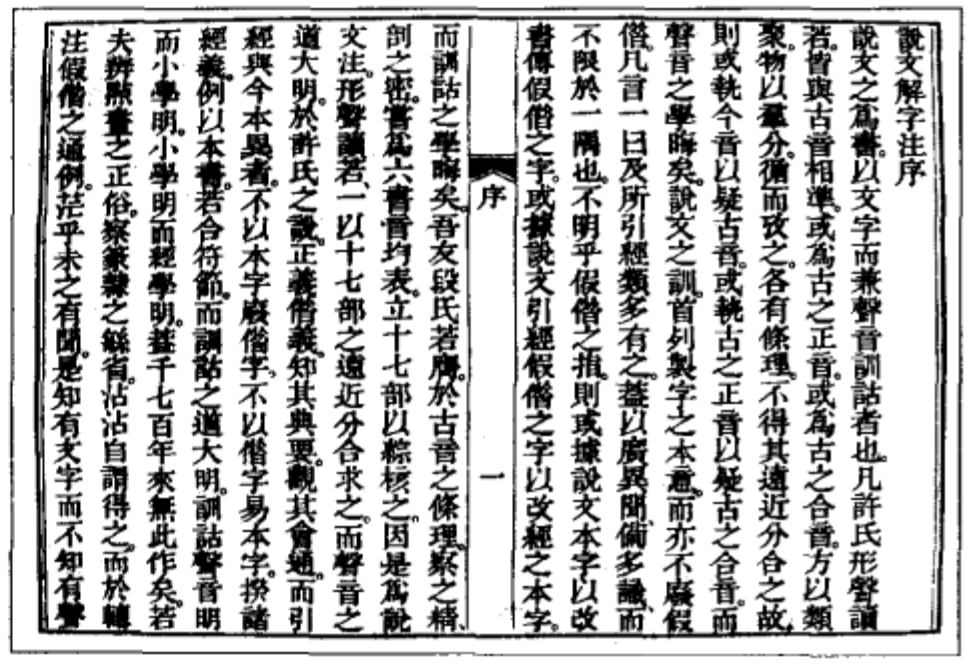
其另一代表作《经传释词》十卷，是专门研究古文虚词的著作。共搜集九经三传及周秦两汉古籍虚词160个，分字编次，博搜例证，考其源流演变，尤其是对诸词特殊用法的训释，多具卓见，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虽间有武断之处，但可补《尔雅》、《说文》、《方言》诸书之缺，亦不失为一部足资参考的文字训诂学名著。

第二节 “《说文》四大家”的成果

有清一代，因为经学的隆盛，相应带动了小学的巨大飞跃，作为小学经典的《说文解字》也得到极大的重视和研究，出现了“家有洨长之书，人习说文之学”的“许学”热潮。前后研治《说文》者不下数百人，完成专著上百部，影响较大，在后世广泛流传的也有数十部之多。⑩

清代研究说文的著作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对《说文》全面研究和注释的著作，以“《说文》四大家”为代表；二是对说文原书进行校勘和引经考证的著作，如段玉裁的《汲古阁说文订》和钮树玉的《说文解字校录》；引经考证方面，则有吴玉缙《说文引经考》等。三是以金石甲骨文字补订《说文》的著作，如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名原》等。四是对说文进行综合研究和资料整理的著作。如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等。而研究说文成果最卓著者，即是被称为“《说文》四大家”的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

声》、《说文解字义证》、《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等。


說文解字注序
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凡許氏形聲謂若。皆與古音相準。或爲古之正音。或爲古之合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循而攷之。各有條理。不得其遠近分合之故。則或執今音以疑古音。或執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而聲音之學晦矣。說文之訓。首列製字之本意。而亦不廢假借。凡言一曰及所引經類多有之。蓋以廣異聞。備多識。而不限於一隅也。不明乎假借之指。則或據說文本字以改書傳假借之字。或據說文引經假借之字以改經之本字。

序　一

而訓詁之學晦矣。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嘗爲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核之。因是爲說文注。形聲謂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備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若夫辨點畫之正俗。察篆隸之繁省。沾沾自謂得之。而於轉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聞。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聲

《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序言(部分)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居说文四大家之首的是段玉裁，[11]他师事戴震，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其《说文解字注》始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才次第完成，前后历时31年。

《说文解字注》问世后，很快就赢得了崇高声誉，被公认为解释《说文》的权威性著作。王念孙盛赞此书是许慎以后，“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12]具体而言，段注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校勘《说文解字》，使《说文》有可信的版本流传。因为《说文解字》在宋初有徐铉、徐锴兄弟的“大徐本”和“小徐本”。后来汲古阁刻本与宋代本又有不同，段玉裁鉴于此，首先做的即是校勘工作。他利用所见到的不同版本，又结合《经典释文》、《文选注》、《一切经音义注》、《玉篇》、《集韵》等对宋刻本进行校正勘误。

第二，总结许慎说文的通例。段玉裁广搜材料，对于许书条例和写作旨意，融会贯通，从发凡起例，进行阐述，这些都详细记载在注中。如关于“一”、“元”、“天”以及“读若”、“一曰”、“某属”等解说，都蕴涵着对许书体例的阐释。

第三，对于语言文字学的巨大贡献。虽然《说文》是以字形为主的字书，但段玉裁的研究则不受此限制。他对于文字的形、义的研究三者并重，并且三者互相推求，力求用语言学的观点来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用音韵为骨干进行训诂等都做出了新的探索。相比而言，说文四大家中其他三家，则只是偏重于一个或两个方面的探索。这都在许书各字的分析考释中有很好的体现。对于《说文解字叙》的注释，更体现了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精深的造诣。

第四，在词汇学、语义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于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门径。最为显著的是他关于同义词的看法。如分析“讽”、“诵”以及“盈”、“溢”、“满”等的细微区别，都显示出他的高超之

处。[13]

当然,段注也有其不足。除了时代局限外,有时犯盲目尊许和过分自信的毛病。书中很少看见批判许慎的地方,甚至许慎解释错误的,段玉裁也详加附会,以致于错上加错,最典型的即是许、段二人对"为"字的看法。加上自信过头,有些地方难免过于武断。这在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所以,其后钮树玉作《段氏说文注订》,徐承庆作《说文段注匡谬》,王绍兰作《说文解字段注订补》,徐灏作《说文段注笺》等都试图补段注之失,虽各有发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谬为谬者,转增烦扰。

总之,段注校订许书文字,阐释许书通例,对文字的形、音、义及其关系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论述,自成一家之言。对当时以及现在都有着很大影响。

段书旧有经韵楼原刻本,后又有苏州书局翻刻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刻本影印行世,惟原刻本误字不少,苏州局本稍胜,学者可参考冯桂芬《段注说文考正》,冯将原书误处均已校出。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朱骏声(1788~1858年),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博学无书不读,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举乡试,为安徽黟县训导。著作甚多,刻版的见有《说文通训定声》和《传经堂文集》十卷两种。

《说文通训定声》凡十八卷。朱氏不拘泥于许慎旧制,以其所订古韵十八部重新编排《说文》。全书以1137个谐声声符为纲,按音分别归属于古韵十八部。[14]并从《周易》64卦中,抽出18个卦名作为韵部的名称。丰部、升部、临部、谦部、颐部、孚部、小部、需部、豫部、随部、解部、履部、泰部、乾部、屯部、坤部、鼎部、壮部。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总目部分

每字的解释都是均《说文》本训,引群书古注为证,即所谓"说文";次陈述字的引申义和因文字假借而产生的假借义,即所谓"通训";最后举出上古韵文中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其中主要部分是"通训"。"通训"部分,

又有“转注”和“假借”两项。凡一字数训，在意义上有连属的称为“转注”，在意义上没有连属的称为“假借”。这跟许慎所说的转注和假借的定义已全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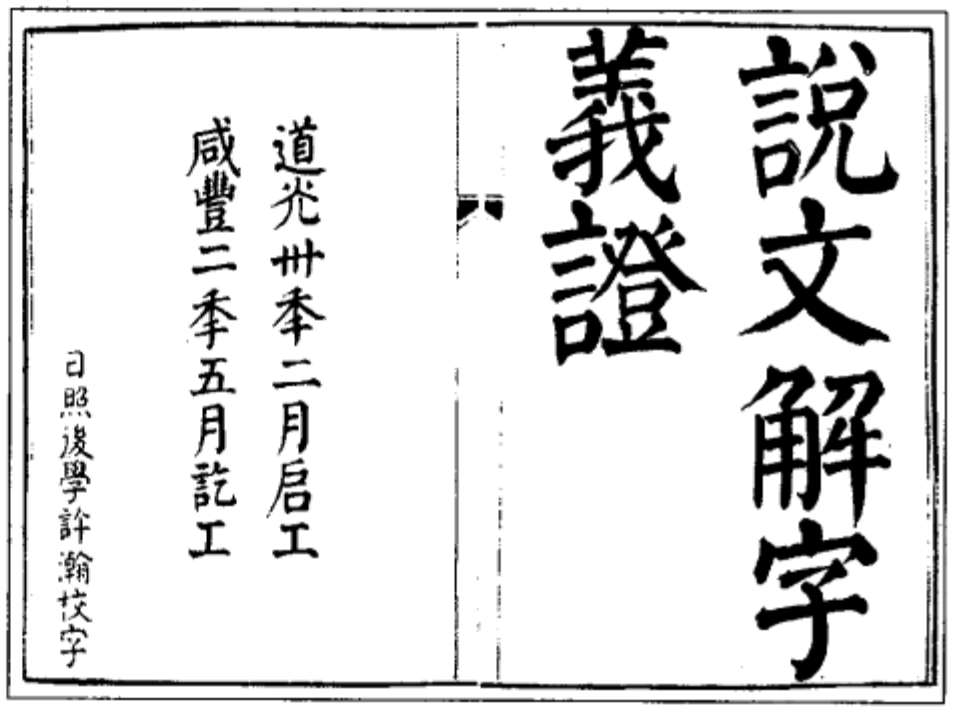
对于《说文解字》中的许多疏漏，如：字有不见于正篆，而见于说解中的；有具有偏旁，而没有正篆的；有只见于小徐本的；有别的书引《说文》的等现象，本编都增补在内。其有见于《方言》、《广雅》和子史传记中的也别列于每部之后，以备考索。全书共收字17240字，极为丰富。书前有“检字”，以便检查。总之，这部书不是专门为解释许说而作，乃是在《说文解字》本训之外，详举其他意义，以辨析何者为引申义，何者为假借义，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说文通训定声》始作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历时十数年，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才完成，二十九年在歙县学署雕版成书。现在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1736~1805年)，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进士，曾任云南永平知县。平生博闻强记，尤喜小学金石之学，工篆隶。著述除《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外，还著有《说文统系图》，以及《札朴》十卷、《缪篆分韵》五卷、《晚学集》八卷、《诗集》四卷等。

《说文解字义证》一书体例，先以大字分列许书原文，然后取南北朝隋唐人疏解经传旧式，低一格双行小字疏解；若与古籍所述《说文》内容不合，则在疏解之前顶格双行小字列出。自谓“取证于群书，故题曰《义证》”。桂馥还删去徐铉新附字，而收集古籍征引许书而为今本脱漏之文字及解说分列于相应各部之后。首一字作楷书，以示与许书原文区分。至于许书叙目，则小字双行随文而注，不再更作义疏之体。

《说文解字义证》的最大优点是材料丰富，偏重于字义的考证和说解。桂氏治《说文》之学四十余年，其书旁征博引，广收用例，材料之丰富，远非他书所及。《说文解字义证》所引《诗》、《书》、《左传》等书，也是一律标注篇名；如有异文，一并予以注明。对于桂书，前人评价各异。陈庆镛于《说文义证·叙》指出：“段氏尚专确，每字必溯其原；桂氏尚闳通，每字兼达其委，二书一时之伯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书影

仲。”王筠在《说文释例序》中也指出:“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庐古籍,不下己矣也。”

桂书的缺点是对许书错误之处,加以附会。如《说文》:“为,母猴也。”桂馥则附会说:“母猴也者,陆机云:楚人谓之沐猴,馥谓‘沐’、‘母’声近。”我们现在知道许慎的解释是错误的。“沐”与“母”就是声近也不能据此就推导出“为”应该训为“母猴”。

《说文解字义证》卷帙浩繁,桂氏生前无力刊行。道光年间,李尚煜获其遗稿。咸丰元年(1851年),经过许瀚祥校订后,由杨尚文出资刻入《连筠簃丛书》。因为印数有限,流传不广。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经过山东日照,许瀚祥家藏刻版,俱数毁于战火,因此印本流行至为稀少。同治三年(1864年),张之洞重刻此书,这就是所谓崇文书局刻本。现行本为中华书局据崇文书局整修本,书前有笔画检字,书后有四角号码检字,极便于读者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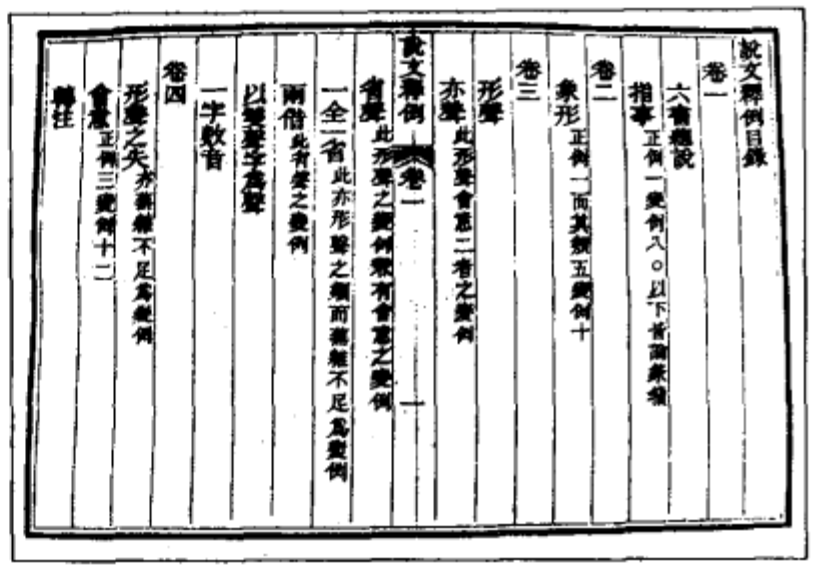
王筠《说文句读》与《说文释例》 王筠(1784~1854年),著名文字学家。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年间举人。长于《说文》研究,著有《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等。

王氏研究《说文》,注意字形分析,综合分析各家之说,为后人指示门径。在说文四大家中,他是唯一注意文字学普及工作的学者。

《说文句读》即为初学《说文》而作,[15]共三十卷。王氏从诸家所引资料中加以选择,取材谨严,考订审慎,解释简明,删繁举要,又加上句读,很便于初学者使用。不过,书中也杂有作者的见解,如《凡例》中指出:“惟两家(桂馥、段玉裁)未合者,乃自考以说之,亦不过一千一百余事。”此书的缺点是所引资料多未核查原文,多有讹误,且有的不标注引文篇名,难于核对。今通行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据清同治四年(1865年)王氏刻本而作的影印本,在书框上加了正楷字头,并附有笔画索引。

王筠《说文句读》书影

《说文释例》共二十卷,成书于道光丁酉(1837年)。前十四卷说明“六书”及《说文》的条例、体制,后六卷列出对于《说文》的一些疑问。各卷后均附有“补正”,常用金石古文补正《说文》的形体和说解。其中有不少独特



王筠《说文释例》目录书影

见解，创获颇多。

如关于“指事”，他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八：“独体指事”为正例，“以会意定指事”、“省体指事”、“借象形以为指事”等为变例；“象形”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十；“会意”有正例十、变例十二。他对“假借”、“转注”的看法也很值得重视，指出：“假借者，一字数义，何为其数义也，口中之声同也；转注者，数字而一义也，何为其数字也，口中之声不同也。”此外，他还提出“同部重文”、“异部重文”、“分别文”等观点，对后世的文字学研究很有启发。

他还著有《文字蒙求》一书，也是一部很好的入门参考文献。《清史稿·儒林传》称：“其书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于人。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桂段之劲敌。”

第三节　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和繁荣

元明时期，金石学研究停滞不前。进入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古器物的大量出现以及有些皇帝的倡导，金石学开始复兴，并取得了远超宋代的杰出成就。

纵观清代金石学二百六十多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金石学的复兴期——清初到雍正末叶。

这一时期，金石学刚刚复苏，著作不多，研究的对象偏重于石刻，青铜器研究基本没有进展。即使是石刻的研究，也是出于证经补史的目的。代表学者是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顾炎武《石经考》、《求古录》、《金石文字记》，黄宗羲《金石要例》，万斯同《汉魏石经考》、《唐宋石经考》，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李光璜《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杭世骏《石经考异》等。

第二个时期：金石学的繁荣期——乾隆朝至光绪二十五年。

在这一百六十多年间，金石学得到了飞速发展，出现了大批的学者和为数众多的著述，金石学真正迎来它的“黄金时期”。其中，又以乾隆后期，嘉庆、道光两朝和同治末到光绪朝的金石学著作出现最多。代表人物主要有：王昶、阮元、张廷济、孙星衍、瞿中溶、刘宝楠、刘喜海、吴式芬、戴熙、陈介祺、吴云、陆增祥、潘祖荫、陆心源、吴大澂、王懿荣、刘心源、叶昌炽、盛昱、端方以及稍晚的罗振玉等。

这一时期的金石学著作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金”与“石”并重，但著录时多分开。第二，地方与断代金石志得到极大发展，典型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毕沅《中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阮元《两浙金石志》，孙星衍《京畿金石考》等。另外，刘喜海《海东金石苑》还是著录朝鲜古代碑刻的专著。金石学家们深刻意识到：“金石实一方文献，可以考证都邑、陵墓、河渠、关隘，古今兴废之迹，大有裨于政事，不独奇文妙墨，足垂永久。”[16]第三，著录与研究范围不仅限于铜器、石刻，还兼及瓦当、陶瓷、玺印、古玉、铜镜、钱币等。第四，开始有学者进行金石学史的初步探讨，如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李遇孙《金石学录》以及陆心源《金石字录补》等。

第三个时期：金石学的衰弱以及向现代考古学的过渡——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初。

清末民初，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且及于明器和各种杂器，也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和王国维是这一时期集大成的学者。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和朱建心《金石学》等著作，则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此同时，因为考古学的逐步发展，金石学逐渐脱离原来的陈旧研究方法，吸收了先进的思想和科学观，并融入考古学、古文学学的发展视野中去。

陈梦家曾十分公允地总结了清代金石学的成就，计有五个方面：

一、古物范围的扩大。北宋以来的所谓金石学是以铜器与石刻为主的，而石刻则多为秦以后的碑版。至此而有金石以外的古物出现，北宋以来的所谓金石不能涵盖这些新出现的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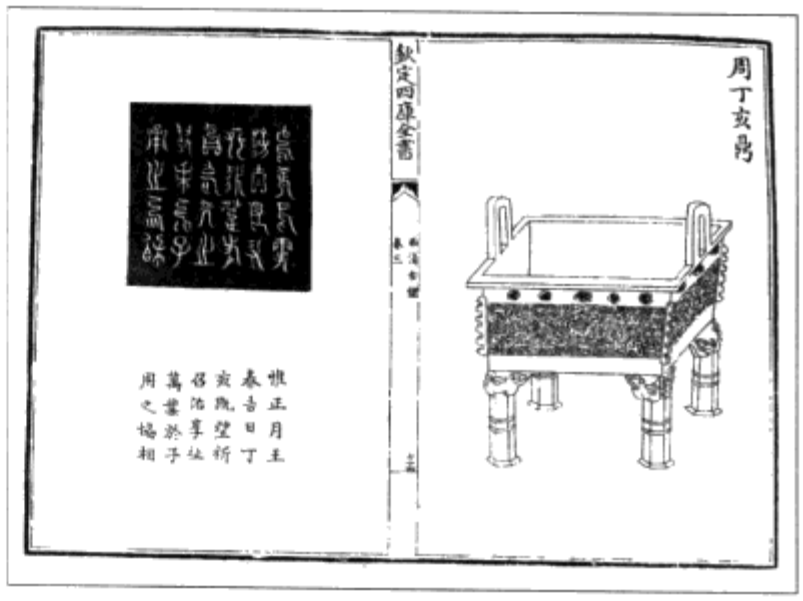
二、品类的专门化。许多附隶于金石范围内的古物如镜、鉴、符牌、货币、印玺、玉器、陶瓷、砖瓦等，至此已发展为分门别类的搜集与研究。

三、数量与内容的丰富。自阮元开收藏与研究古物的风气以后，许多私人大量收藏古物并整理发表，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

四、注意器物铭文与文字学、历史学之间的联系。

五、石印术和照像术的输入，为古器物的传播、交流提供了基础。

“西清四鉴”：青铜器的主要研究成果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四鉴”。“西清四鉴”是《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四部金石学著作的合称。它们摹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四千余件。乾隆十四年(1749年)由梁诗正等奉敕编纂。乾隆十六年编定，遂被收入《四库全书》。



《西清古鉴》书影(《四库全书》本)

《西清古鉴》四十卷，著录商周至唐代青铜器1529件(彝器1436件、镜93件)。卷首列有参加者名单，分监理、编纂、摹篆、绘图、武英殿缮书、校刊、监造七项。每卷先列器目，然后绘出器物图形，附有铭文的拓本或是摹本并加考释。对每器还记录高度和重量。该书所绘的器物图形多经过缩小，但是没有标注比例，铭文摹绘失真，又多改写、缺讹之处，释文、考订也很疏陋。书中还收录不少伪器。书中附录《钱录》十六卷，著录了历代钱币。

后来，王杰等人又奉命把内府所藏的铜器编纂为《西清续鉴》。其中甲编二十卷，附录一卷，著录商周至唐代的铜器944件，另附有唐代之后的铜器和玺印31件，共975件。乙编二十卷，著录盛京(今沈阳)故宫所藏古代铜器910件。《西清续鉴》在乾隆五十八年完成。

另外，清廷又把收藏在宁寿宫的铜器600件、铜镜101件编纂为《宁寿鉴古》十六卷。这三部书的体例、收录铜器中存在的真伪等问题与《西清古鉴》相似。

以上所述的四种书，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因为搜集的器物一向深藏宫中，外人不易得见，总体来说作为资料，还是很有价值的。这四种书加上《砚谱》的编纂，不仅收录汉唐礼器、乐器、兵器，还兼收铜镜、砚台、玺印以及钱币等物，这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7]

这个时期，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研究范围较广，并且有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搜集的铜器铭文、碑刻、钱币及玺印等铭刻资料更加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已有显著提高。对玉器、镜鉴、兵符和砖瓦、封泥等，也都开始进行专门研究。据容媛《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700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约二百年间却有906种之多，可见其发展之盛。在御纂“西清四鉴”的影响下，民间金石学著作开始大量增加。钱玷最早将其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又有程瑶田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及有关记载，作《考工创物小记》，以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丰，后由朱为弼协助编录为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着重收录铭文摹本、释文及考证，其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是汇集诸家器物而成的第一部著录书。

此后，著录之书即分为两类：一类仿照宋代吕大临《考古图》体例，以记录铜器图像为主，并附铭文和考释，类似于后世的图录性著作，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一卷，刘喜海《长安获古编》二卷，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一卷，端方《陶斋吉金录》八卷及《续录》二卷。还有一类即仿照《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体例，仅收铭文，以考释为主。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彝器款识法帖》一卷，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五卷，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吴式芬《攈古录金文》九卷，吴大澂《斋集古录》26册，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另外，还有根据金文资料或兼及其它铭刻的古文字著作。著名的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字说》，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

石刻及其他研究成果 清代中晚期石刻著作为数甚多，代表性的是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记》，成书于嘉庆七年(1802年)，收录周至元代碑刻目录八千多种(含少量瓦当)；王昶撰《金石粹编》，成书于嘉庆十年，收录秦至宋金碑刻及少量铜器等共一千五百余种。另外，较为有名的还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及《跋尾》，武亿《金石三跋》及《金石续跋》，严可均《铁桥金石跋》，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端方《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石目》，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毕沅、阮元合撰的《山左金石志》，傅云龙《日本金石志》，叶昌炽《语石》等。

除了以上提到的金石研究著作外，还有一些有关钱币、古玉、玺印、陶瓷、砖瓦方面的重要著作，主要包括钱泳《唐赐铁券考》，戴熙《古泉丛话》，金锡鬯《晴韵馆收藏古泉述记》，倪模《古今钱略》，李佐贤《古泉汇》，沈巍皆《泉宝所见录》，张崇懿《钱币新编》，唐与崑《泉布汇考》、《制钱通考》，瞿中溶《奕载堂古玉图考》，吴大澂《古玉图考》，端方《陶斋古玉图》，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汪启淑《汉铜印丛》，袁日省《汉印分类》，瞿中溶《集古官印考》、《集古虎符鱼符考》，朱琰《陶说》，端方《陶斋藏砖》、《陶斋藏砖记》、《陶斋藏瓦记》，朱枫《秦汉瓦当图记》，程敦《秦汉瓦当文字》等。

第四节　清代大型字典、词典的编纂

有清一代，官方或是个人编纂了大量的字书和词典。其中较著名的有《康熙字典》和《经籍纂诂》两种。

《康熙字典》 成书于1716年，由陈廷敬等30人，历时七年完成。该书广泛收集古籍尤其历代字书韵书中的字，达47021字，是当时一部收字最多、注音释义最丰富、体例最完备的字典。《御制序》称此书为“博采经史以及汉、晋、唐、宋、元、明诗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罗博证，使有依据。”[18]

《康熙字典》吸取许慎《说文解字》、顾野王《玉篇》、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等各家之长，以《字汇》、《正字通》为蓝本，加以增订而成。

按照补收编排者，共有214部，依笔画多少分别排入子、丑、寅、卯等12集，每集又分上中下。这种依部首排列汉字的方法对后来影响很大，许多辞书都模仿它。每字之下先注音，后释义。注音先用《唐韵》(实即《广韵》)的反切，后用《集韵》、《洪武正韵》等的反切，然后用直音。解释字义多来源于《说文》、《尔雅》等字书及古代各种典籍，都注明出处。

为了解决部首难查的困难，书前有按笔画排列的《检字》，如“止”“允”等。我们如果不知道入哪一部，可以查《检字》“四画”，“止”下注明“部首”，“允”下注明“儿部”，就容易找到了。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印本书后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康熙字典索引》，查字更加方便。

《康熙字典》内容多，编纂时间短，难免有些错误。它注意到引用古书解释字的古义，但忽略了今义，解释又过于简单，如果不太熟悉古典文献可能会感到不方便。道光年间王引之等编《康熙字典考证》，改正错误达到2588条，使用这部书时最好参考《字典考证》。

《经籍纂诂》 嘉庆三年(1798年)，阮元[19]在任浙江学政时，组织人力，编纂了这部训诂学字典，该书主要汇集文字古义，为阅读先秦两汉的古籍或出土文字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经籍纂诂》一书共收录13349字(异体字不在内)，按《佩文韵府》的文字次序排列，由上平声“一东”、“二冬”、到入声“十六叶”、“十七洽”，共106韵，分为一百零六卷。另外有补遗一百零六卷，附于各卷之后。

阮元

《经籍纂诂》的字义都是从唐朝及以前的各种典籍中搜罗来的，主要是古代的“小学”书，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书中的训诂材料，以及其他各种古籍中本文或注疏中有关训诂的材料。一字多义，在字头下顺序排列，每种意义都举古籍中训释的语句为证。打开一卷书，同韵的字都在，检查一个字，各种古籍的解释都罗列眼前。读者可以根据所列资料，分析哪是常用义，哪是特殊用义，并且可以在这种对比中找到原来注解的不当之处，给以订正。

《经籍纂诂》首先按照各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来排列，每个字义下先排列儒家经典，然后再轮到其他，隐含“尊孔读经”的目的。

王引之在序文中指出该书的长处是“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也说明了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部我国古代训诂学资料的索引，对于我们阅读唐代以前的古籍有很大的帮助，因而也是学习古汉语的重要参考书。

该书按照《佩文韵府》中的水平诗韵106部编排，完全是依据当时一般读书人的习惯来的，只是现在很少人熟悉《佩文诗韵》，查寻某字在哪一卷很困难；世界书局版《经籍纂诂》，书前附有《目录索引》，文字按笔画多少编排，下注明页码，可以补救难查的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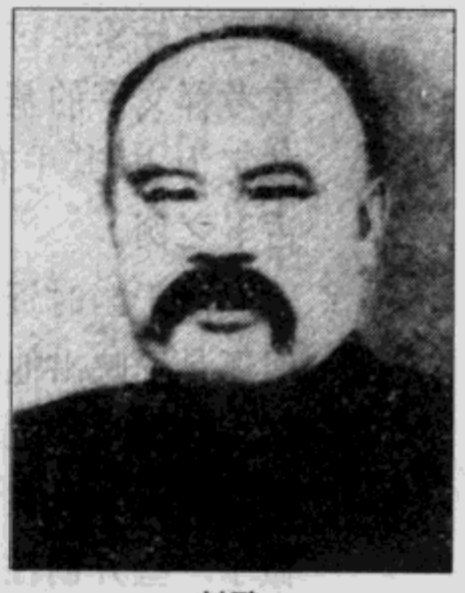
此书由于是多人合作完成，讹误就在所难免。另外，没有为字加注声音，一字多音或是声调不同的字经常混淆不清。所以，我们使用《经籍纂诂》时应该核对原书。

第五节　晚清甲骨学的奠基及“罗王之学”

19世纪末发现的甲骨文，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甲骨文经过搜集整理之后，一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学问。到20世纪初，在罗振玉、王国维的极力倡导下，逐渐成长为以甲骨文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甲骨学派。更有意义的是，甲骨学的发展和深入，为中国考古学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刘鹗《铁云藏龟》 1902年，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清旧债，将其父生前所藏甲骨大部分卖给了刘鹗。[20]此外，刘鹗又收得民间甲骨300片，其子亲往河南收得一千多片，前后共得五千多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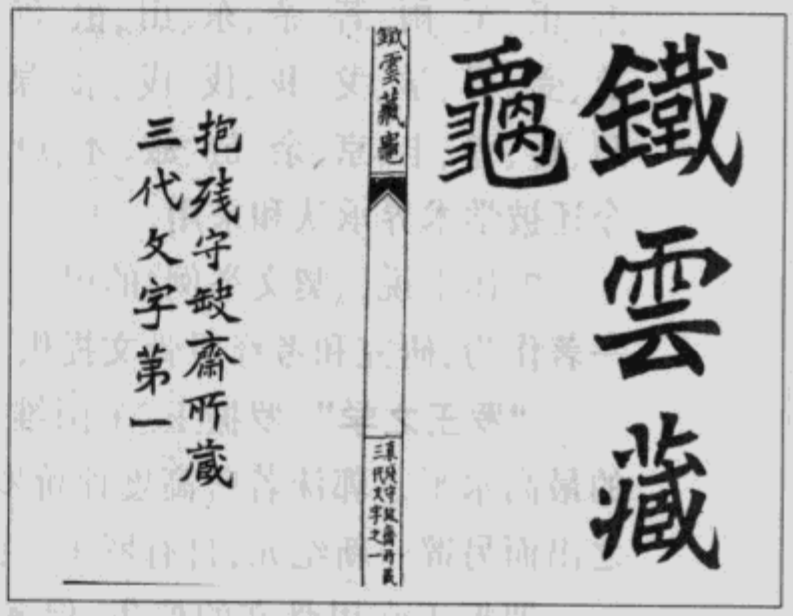
刘鹗从中精选甲骨1058片，编辑为《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殷墟”甲骨文历史上的第一部著录书。



刘鹗

在《铁云藏龟》自序中，刘鹗记述了发现龟甲兽骨文字以及王懿荣收藏甲骨的过程，还论述了文字从古籀到隶书的发展过程。第一个提出了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这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随后他又在自序中说明了刊印此书的目的：“然斯实三代真古文，亟当广谋其传，故竭半载之力，精拓千片，付诸石印，以公同好。”[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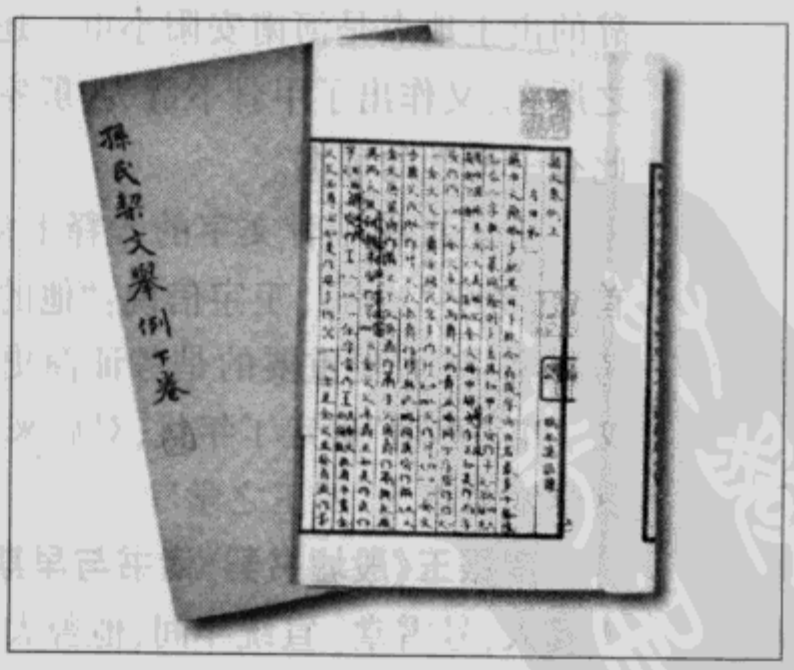
作为甲骨文字的第一批先睹者，他颇感幸运。这篇自序，可以说是中国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篇成书的学术论文，被胡适评价为研究甲骨文字的“开路先锋”。《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观赏、摩挲的“古董”，变为广大学者研究的资料，在甲骨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



《铁云藏龟》书影

《契文举例》 此书是孙诒让撰写的第一部甲骨文研究专著。[22]书成于1904年，由上海蟫隐庐石印问世。

孙氏具有极其坚实的古文字研究功底，其晚年恰逢甲骨文字的出土发现。当他阅读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著录著作《铁云藏龟》后，开始了甲骨文的研究。他是我国历史上从事甲骨文综合研究的第一人。



《契文举例》书影

《契文举例》分为上下两卷，共十篇：释日月、释贞、释卜事、释鬼神、释人、释官、释地、释礼(上卷)、释文字、杂例(下卷)。

其中，《释日月》主要解释干支字及纪日纪月法，《释贞》考释甲骨占卜制度及辞例，《释卜事》考释甲骨占卜的内容范围，《释鬼神》考释甲骨卜辞中涉及的鬼神祭祀对象，《释人》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人物，《释官》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官名，《释地》考释卜辞中所涉及的方国及地名，《释礼》考释卜辞中涉及的典礼制度。以上各篇从

标题看好象是讨论甲骨卜辞所反应的内容和相关的商代文化制度,但事实上是在考释文字的基础上来谈的,宗旨仍在于文字考释。下卷《释文字》以考释一般文字为主,其中有少数文字的考释在上卷各篇中已经涉及;《杂例》为考释甲骨占卜之例。

由于当时资料有限,孙氏对有些甲骨文字考释还不到位,甚至有错误之处,但还是反映出他在甲骨学研究中敏锐的眼光和深厚的治学功力。孙诒让对甲骨文考释的精彩之处很多,绝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今天看来,基本已无可取"[23]的状况。孙氏在甲骨文的考释方法、卜辞凡例、文字演变、殷商史实等方面,同样做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字考释的大量结论,例如:易、韦、复、中、出、内、永、卜、占、正、至、雨、若、帝、东、田、祖、渔、追、降、先、德、省、见、蜀、册、率、叀、专、兹、及、受、得、学、戈、我、伐、戉、求、泉、姘、妾、嫔、克、自、矦、啚、众、爯、冓、帚、鬯、乃、喜、登、丰、京、余、斿、旅、才、唐、匚、鼎、车、爵、弓、豕、马、禽、隹、雀、萑等,至今还被学术界承认和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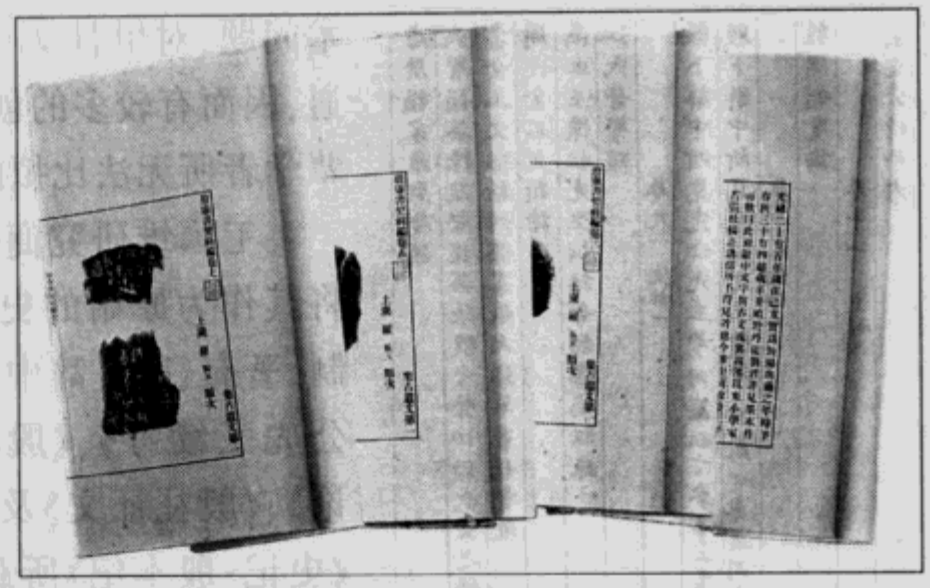
整体上说,《契文举例》的甲骨文字考释"得失参半"。在甲骨学初创时期,这一著作为,研究和考释甲骨文提供了基础和方向。

"罗王之学" 罗振玉、王国维及其学生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晚清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郭沫若曾高度评价罗、王二人的学术成就:"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决非过论。"[24]

罗振玉在甲骨文的搜集、保藏上用力甚勤,促成了甲骨学史上第一部著录书《铁云藏龟》的出版。他开启了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的先河,查明了甲骨卜辞的出土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还结合文献记载,从而确定了小屯为盘庚迁殷之所在,又作出了甲骨卜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的重要推断,《史记·殷本纪》自此有了科学的证据。

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考释上多有发明,他的最大成就,是在甲骨学研究中首立"考史"一目。王宇信说:"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等,不仅考释文字,而更重要的是考证商史,是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的重要论文。"以"称谓"确定了年代,对后来的甲骨断代影响很大。由于他们的巨大贡献,其学术被尊为"罗王之学"。

罗振玉《殷墟书契》诸书与早期甲骨文的贡献 罗振玉(1866~1940年),浙江上虞人,号雪堂。宣统年间,他曾大批搜购出土的甲骨。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清室



《殷墟书契》书影

"遗臣"自居，与王国维流寓日本京都，从事甲骨、彝器、敦煌文物的搜集整理研究。著述甚富，流传较广的有《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

宣统二年(1910年)，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当时所见的也不过只有一千片甲骨，罗氏自己也只藏有七八百篇甲骨。随后，他命自己的亲戚到安阳搜买甲骨，前后所见甲骨达到了三万多片。根据这些资料他选编了《殷墟书契前编》二十卷。在《国学丛刊》上石印发表了前三卷，共录甲骨294片。辛亥革命后他到日本，重新编纂《殷墟书契前编》八卷，1913年以珂罗版印行，共收录甲骨2229片。1932年在上海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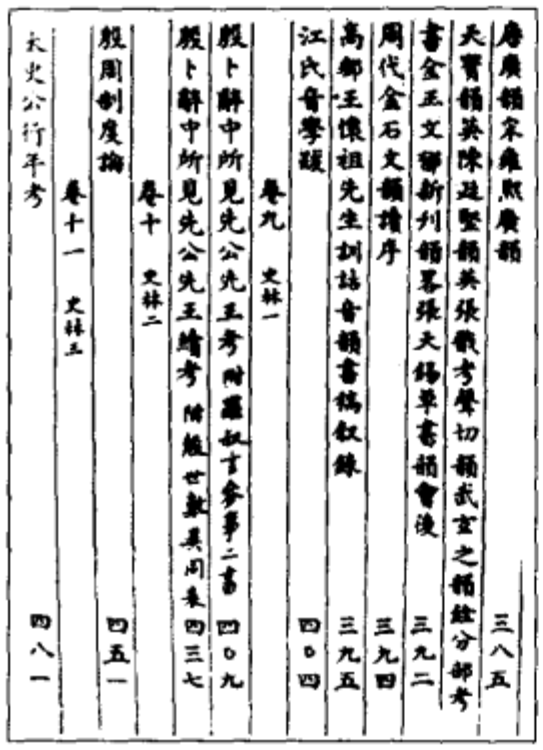
1914年罗振玉又以他所藏的大片甲骨及字细难拓的小片甲骨编为《殷墟书契菁华》一卷，共收录甲骨68片。1916年，又在自己所收藏的甲骨片中，把《殷墟书契前编》所没有收录的1104片甲骨编为《殷墟书契后编》。1933年，他还根据自己所收集的甲骨拓片编订为《殷墟书契续编》，收录甲骨2016片。

罗振玉通过个人的力量，搜罗甲骨，并且编辑出版，奠定了最初甲骨文著录的基础，为甲骨文的保存作出了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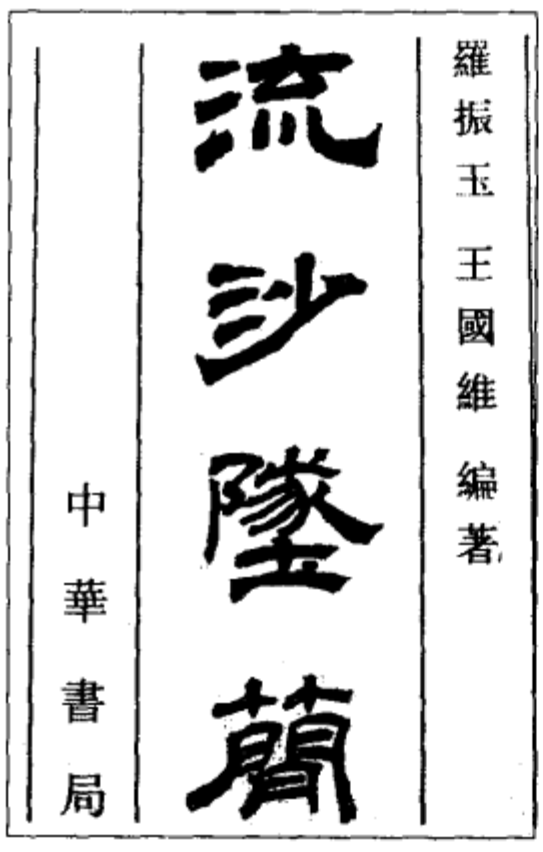
另外，他还著有《殷墟书契考释》一书，被陈梦家先生誉为"成为后来字汇的基础"。该书初版于1915年，1927年又出版有增订本。

书中文字考释部分不仅有罗振玉自己的意见，他还分别采纳了孙诒让、王国维、王襄的观点。此书的编写体例，陈梦家指出是按照没有印行的罗振玉的另外一部著作——《殷商贞卜文字》手稿本的类别排列的：数名、干支、天象、地形、居住方位、鬼神祭祀、人类形体、饮食、动物、植物、器用、火部、人等部、又等部、止等部等内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甲骨文字典草创期的分类繁杂混乱的特点。

王国维的甲骨文、古史研究以及罗王的简牍学研究　王国维治学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新发现，采取新方法。他在治学方法上，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同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考据方法，成功地结合起来，创立和提倡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强调要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同时，又以阙疑的态度，谨慎地对待学


唐廣韻宋雍熙廣韻 三八五
天寶韻英陳廷堅韻英張戩考聲切韻武玄之韻絃分部考
書金玉文部新刊韻畧張天錫草書韻會後 三九二
周代金石文韻讀序 三九四
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叙錄 三九五
江氏音學疏 四〇四
卷九 史林一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附羅叔言參事二書 四〇九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附殷世數異同表 四三七
卷十 史林二
殷周制度論 四五一
卷十一 史林三
太史公行年考 四八一

《观堂集林》中《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之目录



《流沙坠简》书影

术问题，对甲骨文、金文所作考释，力求形、音、义都能说通，因而有较多的创获。这样，他便取得了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成就。

王国维研究商代甲骨，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的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及《古史新证》等论著。他第一次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根据卜辞加以纠正，又提出商周之际礼制截然不同的独到看法。他还是从称谓上来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

王国维为进行金文研究，从编辑《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入手，对宋代以来著录的金文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又作《两周金石文韵读》和《两汉金文韵读》，以期“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他不仅先后撰写数十篇重要器铭的跋语，而且将金文资料用于西周历史和有关问题的研究，著有《生霸死霸考》、《明堂庙寝通考》、《古诸侯称王说》、《鬼方、昆夷、玁狁考》等。同时，他还进行古器物的研究，曾撰写《古礼器略说》，订正一些器物的名称，辨明它们的用途。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这些研究，真正显示出王氏深厚的学术功底。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多收录于他的《观堂集林》和《别集》中。

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楼兰、敦煌所获汉晋木简，交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博士整理和释读，于1913年在英国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古所得中国文书》，以出土地点分作三编，共收录木简和文书991件。沙畹将手稿寄给时在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罗、王二人对这批木简作了仔细考释，题为《流沙坠简》[25]，1914年在日本出版。这是第一部有图影和随文考释的简牍研究著作，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小学术数方技书”和第三部分“简牍遗文”由罗振玉考释，第二部分“屯戍丛残”则由王国维考释。罗、王二人利

用简牍实物，结合文献资料，对汉代历谱、书体、两汉边塞和烽燧系统、玉门关址和楼兰故城、海头位置、汉代边郡都尉府职官制度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作了详尽的考释，实为简帛研究肇始阶段最重要的成果。

王国维的简牍研究另外一个突出贡献表现在对汉简历书的考订上。他从汉简历谱上记有初伏、中伏、后伏和腊的现象，联系史籍所载，证明自秦德公开始的六月三伏之节和冬日“腊祭”，在汉代已演变成“朝野重伏”和“腊祭百神”的社会习俗。此外，他还对历谱中的十二日、血忌、反支等历法问题作了考证，勾勒出比较系统的汉代人日常生活里的各种禁忌。他还对《急就章》、《仓颉篇》和医方所载药名作了考证，并指出简中的九九术与后人所记不同，“殆唐以后刊本所追改，非原书之旧矣。”他从汉简书体总结出汉字书体的演变轨迹，“藉以知书体之变迁，窥简牍之体式，其裨益亦甚巨。”及对楼兰、尼雅文书史料价值的肯定等，也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继《流沙坠简》之后，王国维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如《敦煌简跋十四则》(1914年)、《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1914年)等。王国维在《流沙坠简》中收录1907年敦煌汉简598枚，详加考释，奠定了汉简研究的基础。可以说他是近代汉简研究的开创人，他很注意把汉简的内容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恢复汉代烽燧的排列和组织，这是极有见识的。他对汉简研究的某些论点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到第二阶段中居延汉简的研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声誉。

注释：

① 文字狱：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清代文字狱，一般以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鑨《明史》案为起始，下限则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贺世盛《笃国策》案。

②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云：“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还指出造字“有义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而得其义”。

③ 孙星衍《答袁简斋前辈书》曰：“经文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解。”

④ 戴震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度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见戴震《与段茂堂论理书》，《戴震全集》(第一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⑤ 见《广雅疏义序》。

⑥ 王引之于《石臞府君行状》中说"学者比诸郦道元注《水经》,注优于经云",段玉裁《广雅疏证序》也说:"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⑦ 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云:"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察,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见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⑧ 徐复:《广雅疏证弁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⑨ 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⑩ 丁福保说:"许氏《说文解字》一书,沉霾千载,复发光辉,若段玉裁之说文注,桂馥之说文义证,王筠之《说文句读》及释例,朱骏声之《说文通训定声》,其最杰著也。四家之书,体大思精,迭相映蔚,足以雄视千古矣。其次,若钮树玉之说文校录,姚文田、严可均之说文校议,顾广圻之说文辨疑,严章福之说文校议,惠栋、王念孙、席世昌、许槤之读说文记,沈涛之说文古本考,朱世瑞之说文校定本,莫友芝之唐说文木部笺异,许溎祥之说文徐氏未详说,汪宪之系传考异,王筠之系传校录,苗夔等之系传勘记,戚学标之说文补考,田吴炤之说文二徐笺异等,稽核异同,启发隐滞,咸足以拾遗补阙,嘉惠来学。又有订补段注而专注一书者,如钮树玉之段氏说文注订,王绍兰之说文段注订补,桂馥、钱桂森之段注钞案,龚自珍、徐松之说文段注札记,徐承庆之说文段注匡谬,徐灏之说文段注笺,皆各有独到之处,淘段氏之诤友也。此外,又有钱坫之说文斠诠,潘奕隽之说文通正,毛际盛之说文述谊,高翔麟之说文字通,王玉树之说文拈字,王煦之说文五翼,江沅之说文释例,陈诗庭之说文证疑,陈瑑之说文举例,李福孙之说文辨字正俗,胡秉虔之说文管见,许槤之读说文杂识,俞樾之儿笘录,张行孚之说文发疑,于鬯之说文职墨,郑知同之说文商议,肖道管之说文重文管见,潘任之说文粹言疏证,宋保之谐声补逸,毕沅之说文旧音,胡玉缙之说文旧音补注等,不下数十家,靡不殚心竭虑,索隐钩深,各有所长,未可偏废,六书之学,浸以备矣。"见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自叙》,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⑪ 段玉裁(1735~1815年),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江苏金坛县人。师事戴震,并结识钱大昕、邵晋涵、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商讨音韵、训诂之学,颇为契合。段玉裁博闻强记,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著作有《六书音韵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

⑫ 王念孙:《说文解字注》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⑬ 具体可参看周祖谟《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收录于《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郭在贻《〈说文解字注〉与汉语词汇研究》、《〈说文段注〉与汉文字学研究》、《〈说文段注〉对说文学的贡献》(收录于《训诂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

⑭ 作者在《凡例》中说:"六书,形声之字十居其九。是编就许书五百四十部舍形取声,贯穿联缀,离之为一千一百三十七母,比之为十八部,以著文字声音之原,以正六朝四声之失。"这里说的"母",指的是谐声字的声符。参看《说文通训定声》凡例,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⑮ 作者在自序中指出:"道光辛丑,余又以《说文》传写,多非其人;群书所引,有可补苴。遂取茂堂及

严铁桥、桂未谷三君子所辑，加之手集者，或增、或删、或改，以便初学颂习，故名之曰句读。”见王筠《说文句读》，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⑯ 孙星衍：《京畿金石考·自序》，见《续修四库全书》本。

⑰ 详见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⑱ 陈廷敬（1638~1712），字子端。顺治十五年（1657年）进士，除了主编《康熙字典》之外，还修纂有《三朝圣训》、《方略》、《一统志》、《明史》等。他诗文俱佳，主要著作《午亭文集》五十卷。

⑲ 阮元（1764~1849），清代学者、文学家。仪征人。阮元提倡朴学、曾在杭州创“诂经精舍”，在广州创“学海堂”，培植罗致学者编纂《经籍纂诂》。阮元在经籍训诂之外，还研究天文、历算、地理等，著述颇丰。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书。

⑳ 刘鹗（1857~1909），江苏丹徒人，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我国近代著名小说家、金石学家，著有《铁云藏龟》、《老残游记》、《铁云藏陶》、《铁云藏泥》等。

㉑ 刘鹗的《铁云藏龟》1903年由抱残守缺斋墨拓石印，线装六册出版。不分卷，共272页，无著录片号。1931年5月，上海虫蟫隐庐石印出版。1959年，台湾艺文印书馆重印三序本（初版本有罗振玉、吴昌绶、刘鹗三序）精装一册，另附严一萍“跋”。

㉒ 孙诒让（1848~1908），晚清经学家、文字学家。字仲容，号籀廎。自幼勤奋好学。在校训古籍、诠释古文字和考订名物制度等方面，卓有成就。生平著作甚富，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尚书骈枝》、《籀序述林》及《温州经籍志》等。孙氏的甲骨文研究主要反映在他的《契文举例》和《名原》两部著作中。

㉓ 此种评价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罗氏认为其“未能洞悉奥秘”，“未能阐发宏旨”（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序，1910年；《殷虚书契》自序，影印本，1913年）；王氏称“其庶几无可取”，“谬误居十之八九”。见1916年12月2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两信札，《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64、167页，1927年。

㉔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㉕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六章　20世纪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20世纪，中国古文字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随着田野考古学的诞生与进展，被誉为“世界显学”的甲骨学，除了“甲骨四堂”为代表的大陆学者之外，更多的包括日本、美国、英国等地的学者，在文字考释、卜辞以及商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成就。青铜器和金文研究，也在考古学的影响下，摆脱传统“金石学”的束缚，涌现了诸如郭沫若、容庚等大家。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几十年中，战国文字和简帛学研究十分热烈，形成了新的“国际显学”。它们是解放后随着大批古文字资料出土，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重点。①

第一节　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创立及其对古文字学研究的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今文经学家认为《周礼》、《左传》在内的许多古书都是刘歆伪造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将疑古思潮推向高潮，他们扫荡了传统的古史观念。但是，无论疑古派还是传统派都拿不出新的体系来证明“上古的信史”。于是学术界认识到真正的古史只能从实物着手，才可以得到公允的答案。

李玄伯（李宗侗）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中指出：“若想解决古史，唯一的办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向发掘的方向走。”②

李济指出：“在我们认定的题目范围内，除甲骨文字，可作的工作甚多。自然，这遗址的重要，全是因为有文字存在，时代上没有疑问。所以一切无文字而可断定与甲骨文同时之实物，均有特别研究的价值。就殷文化全体说，有好些问题都是文字中所不能解决而就土中情形可以察得出的。这里显而易见的几个问题，如：这个地方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忽然埋藏

着这些带文字的甲骨？又何为而被废弃？关于这些问题，就是只有甲骨文字的人，也有时不免要问问。但是要实际解决它们，却很费一番手续。这个题目虽然可以提开问，却并不能提开解决，只有整个的问题解决后，这两个问题也随着解决了。”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传播至中国，外国学者在中国开展了频繁的考古活动，为中国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促进考古学在中国真正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殷墟”的科学发掘　安阳“殷墟”发掘应该是真正意义上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李济④、董作宾、傅斯年三位学者共同努力促成了这一盛举。

从1928年10月13日董作宾到安阳主持第一次试掘开始，到1937年6月第十五次发掘结束，在这短短十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共进行了十五次科学发掘。其中，除了1934年10月到1935年年底，在洹河北岸候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三次发掘未见甲骨文出土外，其余十二次均有甲骨文出土。尤其是1936年3月开始的第十三次发掘，仅在YH127坑一个灰坑内，就发现了一万七千多片甲骨，其中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龟甲约有三百多版，创造了甲骨文发现以来的奇迹。殷墟发掘总计十五次，共发现有字甲骨近三万片，是整个发掘工作中收获最大的一项。

在殷墟发掘的间隙中，河南博物馆也于1929年10月和1930年2月进行过两次殷墟发掘，共发现有字甲骨3650片，由关百益选拓800片编为《殷虚文字存真》一书，后又由孙海波选拓出930片，编为《甲骨文录》一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但在1938年和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和东京帝国大学考古教研室曾经在安阳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此后，直到解放前夕，除了陆续发生一些私人盗掘外，殷墟发掘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殷墟发掘工作在开始阶段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甲骨。随着发掘工作范围的扩大和发掘经验的丰富，也逐步注意到铜器、陶器、骨器、蚌器、象牙器和玉、石器等其他文化遗物以及建筑基址和墓葬等，但注意最多的仍然是甲骨文。在参加殷墟发掘的学者中，有一些人由于从事殷墟发掘而走入甲骨文研究的行列，并对甲骨文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最早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后来即成为甲骨文断代和商代天文年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而在殷墟发掘后期参加

殷墟发掘甲骨文简表

次数	日期	主持者	参加者	发掘地	甲骨数量	著录书目
一	1928 年 10 月 13 日至 30 日	董作宾	张锡晋、郭宝钧、王湘、李春昱、赵芝庭	小屯	854 片	《殷墟文字甲编》
二	1929 年 3 月 7 日至 5 月 10 日	李济	裴文中、王湘、王庆昌、董光忠、董作宾	小屯	740 片	《殷墟文字甲编》
三	1929 年 10 月 17 日至 21 日，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2 日	李济	王湘、张蔚然、董光忠、董作宾	小屯	3012 片	《殷墟文字甲编》
四	1931 年 3 月 21 日至 5 月 11 日	李济	刘耀、马进贤、关百益周英学、刘屿霞、郭宝钧、董作宾、石璋如、许敬参、马元材、王湘、李光宇、梁思永	小屯、后冈、四盘磨	782 片	《殷墟文字甲编》
五	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	董作宾	李伯英、王湘、马元材、张善、刘耀、石璋如、梁思永、刘屿霞、郭宝钧	小屯、后冈	381 片	《殷墟文字甲编》
六	1932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李济	石璋如、马元材、周学英、李光宇、刘屿霞、吴金鼎、王湘、董作宾	小屯、高苔字、王裕口霍家村、小庄	1 片	《殷墟文字甲编》
七	1932 年 10 月 19 日至 12 月 10 日	董作宾	马元材、李光宇、石璋如	小屯	29 片	《殷墟文字甲编》
八	1933 年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25 日	郭宝钧	刘耀、石璋如、马元材、李景聃、李光宇	四盘磨、小屯、后冈	357 片	《殷墟文字甲编》
九	1934 年 3 月 7 日至 5 月 31 日	董作宾	冯进贤、祁延霈、尹焕章、刘耀、石璋如、李景聃	小屯、候家庄、后冈、南霸台	457 片	《殷墟文字甲编》
十	1936 年 3 月 12 日至 6 月 24 日	石璋如 郭宝钧	孙文青、潘悫、高去寻、祁延霈、尹焕章、李景聃、王湘	小屯	17804 片	《殷墟文字乙编》
十一	1936 年 9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	石璋如 梁思永	王思睿、李永淦、魏鸿纯、石伟、王建勋、高去寻、尹焕章、王湘	小屯、大司空村	2 片	《殷墟文字乙编》
十二	1937 年 3 月 16 日至 6 月 19 日	石璋如	张光毅、李永淦、魏鸿纯、石伟、王建勋、潘悫、高去寻、尹焕章、王湘	小屯	559 片	《殷墟文字乙编》

发掘工作的人员，有些则成为当代卓有成就的甲骨学学者，著名的有石璋如[5]、郭宝钧[6]等。

殷墟发掘对于甲骨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甲骨学研究从原有的文字考释和历史考证阶段，进入到依靠现代科学方法和手段进行全面研究的新阶段。

董作宾对甲骨文分期断代、历谱研究的贡献　董作宾不仅主持参加了多次殷墟发掘，[7]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甲骨文综合研究。他创立的分期断代学说，对甲骨学、殷商考古学以及商史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发现后，虽在不久后被考证出是商代晚期的文化遗物，但是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帝辛(殷纣王)灭亡约二百七十三年，经历过八代、十二位商王，甲骨文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当然应有早晚或先后的不同。能否根据甲骨文内在的规律将它们分出不同的时期，已经成为甲骨文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早在董作宾之前，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试图着手进行探讨。1923年，王国维在对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进行研究时，发现卜辞中在记载祭祀祖先时，对于祖先的称呼有所不同，便断定这是不同时期的甲骨文。他又根据商代晚期的商王中只有武丁的父辈为阳甲、盘庚、小辛，判定具有父甲、父庚、父辛称谓的甲骨文一定是武丁时代的甲骨文。他还根据武丁的三个儿子分别为祖庚、孝己和祖甲，判断具有父丁、兄庚、兄己的甲骨文一定是祖甲时代的甲骨文。他的这种依据商王世系和称谓判定甲骨文时代的方法，对董作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后来终于成为后者创立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中最重要的两项。

董作宾对甲骨文开始进行分期断代研究，主要是受所谓“大龟四版”的启示[8]。他在对这四个龟腹甲的甲骨文进行考释时，发现其中一个龟腹甲上，每一条卜辞中在干支之后和“卜”字之前都有一个相当于人名的字，他认为这些相当于人名的字都是当时参占卜问卜的史官的名字，他把这些史官称为“贞人”。在这个龟腹甲上共有六个“贞人”的名字。他们既然同出现在一个龟腹甲上，当然应当是同时在商王朝任职的史官，而凡是有这些贞人名字的甲骨文都应当和这个龟腹甲上的甲骨文同属一个时期。这就是董作宾在1931年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上《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所提出的著名的贞人断代学说。

通过研究，董氏将甲骨分期断代分为五期十项标准。所划分的五期为：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位商王)

董作宾的甲骨缀合实例之一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代两位商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代两位商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两代两位商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两代两位商王)

十项标准是: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他还根据甲骨资料,利用十年的功夫完成了宏篇巨制《殷历谱》。提出了解决殷周年代问题的主张,其中殷商纪年为:

盘庚　28年　前1398~1371年

小辛　21年　前1370~1350年

小乙　10年　前1349~1340年

武丁　59年　前1339~1281年

祖庚　7年　前1280~1274年

祖甲　33年　前1273~1241年

廪辛　6年　前1240~1235年

康丁　8年　前1234~1227年

武乙　4年　前1226~1223年

文丁　13年　前1222~1210年

帝乙　35年　前1209~1175年

帝辛　64年　前1174~1112年

董作宾由贞人的发现到以十项标难和五期分法为经纬的甲骨文分期理论的创立,使甲骨文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向被人们视为混沌一片的十多万片甲骨文资料,从此鸿蒙凿破,成为可以划归前后五个不同时期的有条理的史料。研究者不仅可以据以探讨甲骨文不同时期文例、字体的发展变化,更可以探讨不同时期的史实、礼制的发展变化,把有关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在甲骨学研究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除了上述贡献之外,董作宾还主编有《殷墟文字甲编》(1948)和《殷墟文字乙编》(1948~1953年)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13047片,为甲骨文的著录与传播也作出了贡献。

第二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文字学进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文字学有了很大进展，这可以体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古文字学诸领域研究，都有了很大进展。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甲骨四堂”作出了巨大成就；[9]在青铜器以及金文研究方面，突破了传统金石学的框架，出现了大量的著录书和研究成果。第二，古文字学研究队伍更加壮大，海外许多学者都加入到古文字学研究领域内。许多深研“小学”的学者，转而研究古文字并且取得重要成果。

从殷墟发掘开始到解放前夕，甲骨学度过了三十多年的艰苦历程，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首先是研究队伍的扩大与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在这一阶段，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已近三百人，出版的甲骨文著作已增加到七十多种，著录和公布的甲骨文资料已有四万多片，共发表有关甲骨文与商代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与专著八百多种。其次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方法的日渐科学化。这一时期，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比较重要的著作出现。除前述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人的专门著作外，郭沫若、唐兰、胡厚宣、于省吾等学者也都有重要论著出版。[10]

甲骨学的主要进展——唐兰、胡厚宣对甲骨研究的贡献　唐兰在甲骨学方面的代表作是《天壤阁甲骨文存》和《殷墟文字记》。[11]《天壤阁甲骨文存》于1939年由辅仁大学墨拓石印，线装图版、考释各一册出版。前有自序，后附检字，著录甲骨共108片。甲片主要依据王懿荣旧藏拓本，与著录出版的《殷墟书契续编》重16片，《殷契佚存》重七片。《殷墟文字记》写于1934年，是作者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当时为手迹石印。原打算公开发行，因为卢沟桥事变，未能付梓。1981年，中华书局即据此影印出版。在这两部书中共考释甲骨文字一百多个。关于考释文字，他总结和突破了前人的成果，把孙诒让提出的偏旁分析法，继续发扬光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还释读了甲骨文中的兕、秋等难认字，在文字的释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颇有收获。

“甲骨四堂”之外，对于甲骨文研究用力较勤、收获较大的学者，是参加过殷墟发掘工作的胡厚宣。[12]他是一位以毕生精力专门从事甲骨学研究的学者。20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曾参加过殷墟的科学发掘工作，并亲手整理过殷墟发掘所得的绝大多数甲骨文。他不仅为殷墟第一至第九次科学发掘所获甲骨的总集《殷墟文字甲编》的三千多片甲骨文作过释文，而且参加了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所发

《甲骨学商史论丛》书影

现的YH127坑出土的一万七千多片甲骨的实物整理工作，这些甲骨后来曾是第十三至第十五次殷墟发掘所得甲骨文总集《殷墟文字乙编》的主要内容。

这个时期，胡厚宣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曾获国家科学著作奖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这部系列文集中。

《甲骨学商史论丛》，自1944年至1946年三年间共出四集九册，收录论文三十多篇。文集中，先后解决了商代卜龟的来源、记事文字的类别与意义、商代的农业生产与气象问题、商代的宗法与封建制度、商代的疾病状况等有关甲骨学与商代史上的重要问题，其中有关“四方风名”的考证与“一甲十癸”说法的考辨更为学者专家称道。其内容之丰富，引证之广博，立论之精当，方法之独特，实为甲骨学中一座里程碑。几十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充分肯定了胡厚宣在考古、文字考释、历象、断代、辨伪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胡厚宣倡导一种对丰富的甲骨文材料“应用最科学的方法，去统计、分析、解释，作一种精密的研究”，并进行“通盘全部的彻底整理”的研究途径，他研究甲骨文，“旨在综合所有甲骨，作一全面的彻底整理，以期解决甲骨文中的一些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对后世学人有很大的影响。

徐中舒在《甲骨学商史论丛》序言中指出：“余生逢甲骨之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先生、南阳董彦堂先生、望都胡厚宣先生。此三人者，或资丰富之收藏，或与发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迹，不但有墨本可据，且得摩拂其物，而较其点画卜兆，故其所得弥为深切，实为甲骨学划时期之学者焉。”[13]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内藤戊申评价说：“《论丛》不是通史，但几乎包含了殷代史的主要方面，确可称为殷代研究的最高峰。由于此书，一举而确定了胡氏在甲骨学界的地位，与王国维、董作宾先生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

除唐兰、胡厚宣之外，其他一些学者也在甲骨文字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于省吾在治经学、小学之余，[14]专门研究甲骨文字的形义，先后出版了

《双剑誃殷契骈枝》初集、续集、三集，其中不少考证很有价值，对于甲骨文的形义源流解说精当，见解颇新。

罗振玉、王国维的弟子商承祚，编印了《殷墟文字类编》一书，开创了将甲骨文按《说文解字》部首分门别类辑录成集为专书这一先例；后来，他又编印、考释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书。孙海波辑录各家成说，将已经释读和未释读的全部甲骨文单字摹写编次，编印为一部比较完整的甲骨文字典《甲骨文编》；湖南醴陵人朱芳圃，则除了编有《甲骨学文字编》外，还编写了《甲骨学商史编》一书。此外，吴其昌著有《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三续考》，杨树达作《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5]，丁山撰写过《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张政烺作《奭字解》，陈邦福著《殷契辨疑》，胡光炜作《甲骨文例》，周传儒写《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陈直著《殷契剩义》，徐仲舒著《耒耜考》，余永梁著《殷墟文字考》……等一系列论著，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见解新颖，影响广泛，在甲骨学的发展史上都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总之，经过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唐兰、于省吾、胡厚宣等学者前赴后继地探索与耕耘，以及国外部分学者的努力，甲骨学已经成为一门规范严谨、资料丰富，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学科。

青铜器研究　这一时期，青铜器与金文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青铜器著录图书大量出版。这包括清宫旧藏铜器著录、私人藏器著录、古董商人过眼录、地区铜器集录以及新出铜器著录等。

第二，青铜器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分类、定名方面，容庚、唐兰、陈梦家等都有卓越贡献。对于铜器定名，宋、清两代金石学家都作了不少工作，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不科学和易混淆的缺点。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有一部分专论青铜器定名的论文，如《说毕》、《说觱》等，将实物器形、铭文与文献资料充分结合，旁征博引，立论精确，为后世学者所接受。王氏之后，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对前人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多有创见。

第三，青铜器开始了类型学的研究。类型学，又称标型学、型式学。最早由瑞典学者蒙特留斯提出。[16]中国学者应用此理论始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如苏秉琦对陶鬲的分析就是范例。而在青铜器研究中，首次应用此理论则始于李济。他注意对铜器进行目、式、型的划分，并依照器形的变化来推断时代的先后关系，对殷墟青铜器形制的发展和墓葬分期断代作出创造性的贡献。[17]

第四，青铜器分期、断代及其分域研究亦有相当的成果。北宋以来的金石学

《金文编》书影

在青铜器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即是不注重先秦青铜器的确切年代,而只以"三代"通称。所以,对青铜器进行准确的分期断代,就迈出了青铜器研究脱离传统经学附庸——金石学的窠臼,而成为新时期历史科学的重要一步。

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郭沫若,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对此有详细叙述[18]。除郭沫若外,还有许多学者也作了一定的工作。如胡光炜与曾昭燏合作《古文字变迁论》,主张对铜器与纹饰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将青铜器发展分为三期的主张。1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出版,采用郭沫若的分期法,对下编诸器的详细年代进行明确的说明。1946年,陈梦家《中国铜器概述》一文,也有"时期"和"地域"部分的叙述。在"地域"一节,他将东周列国铜器分为东、西、南、北、中五系,在各系中指出其铭文文法、文字、器形特征。这是在郭氏所分国别基础上,进一步所做的青铜器文化区系工作,富有创造性。

在诸多的金文研究者中,容庚取得的成就十分突出。容庚(1894~1983年),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著名古文字学家。1922年他携《金文编》上京求学,得罗振玉、马衡的赏识,被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部研究生,192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次年转入燕京大学任教授,并主编《燕京学报》,1927年起任北京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1946年任岭南大学教授,直到逝世。他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和篆刻学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先后发表专著三十余种,论文七十多篇,其中《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尤为海内学术界所推崇。

《金文编》是继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之后又一部内容丰富、体例严谨的商周金文字典[19],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所收字大体按《说文解字》次序编排,各字上注篆文,重文列每字之下,均注明出处,其中有疑义或不可辨识者则列入书末附录。另外还附《采用彝器目录引用书目》、《采用彝器目录》和楷书笔划检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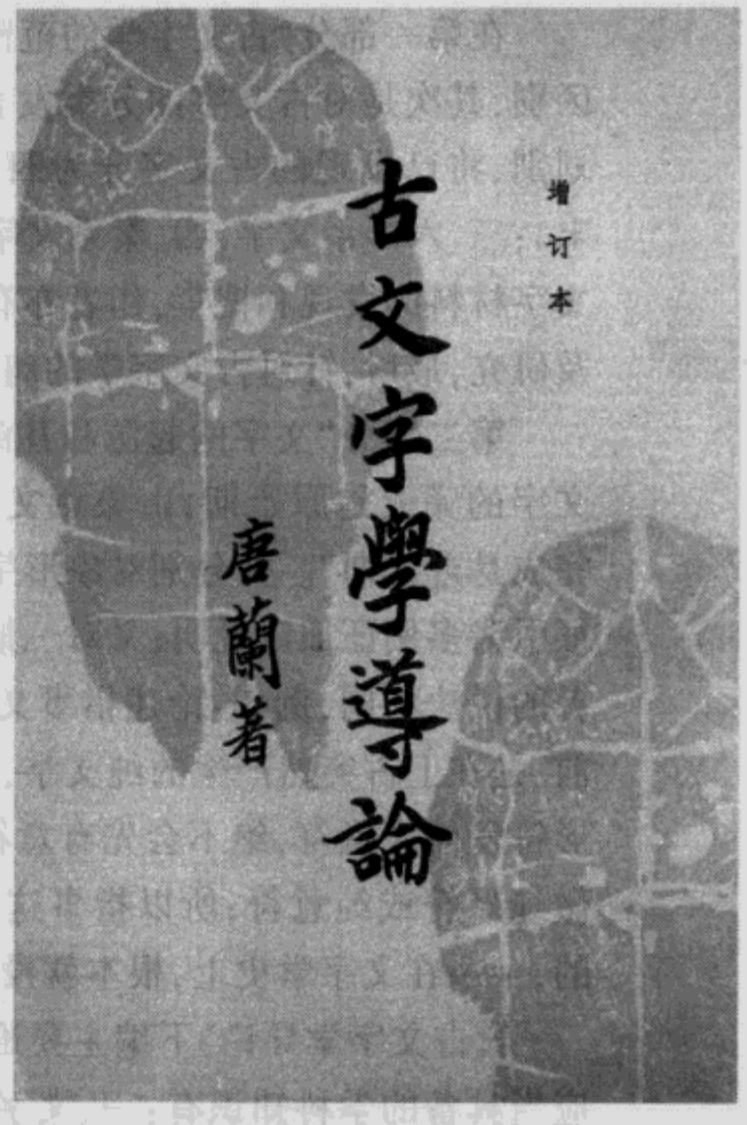
《金文编》摹写文字,参考《周金文存》等多部著作,选择笔划清晰、结构不同

的字，按其大小粗细和结体，谨慎精微地摹写下来。考释文字方面，释文往往结合《说文》等古代典籍，兼采各家考证之说，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书中立说大多可信，并且还给《说文解字》订正、补正了若干字，因此具有较高的价值。

随着新材料的出土以及金文研究的进展，《金文编》的收字已有缺漏，其附录中的字也续有释出。尽管如此，《金文编》仍然是研习金文者所必备，对于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发展史及中国文字源流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容庚还编著有《金文续编》一书，专收秦汉金文，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该书根据秦器12件，汉器六百六十多件，收字951个，重文6084字，附录34字，重文14字，总数为7083字。书末附录采用各器铭文一卷及楷书笔画检字。

《商周彝器通考》是其另外一部关于商周青铜器的综合性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通论，详述青铜器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分十五章。下编是分论，将青铜器按用途分为四大类。全书共三十多万字，附图500幅，征引广博，考据详备审核，堪称材料宏富、图文并茂的巨著。这是一部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并加以科学分类的著作，是研究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



《古文字学导论》封面书影

唐兰的古文字学理论　唐兰依靠自己在文字学领域的深厚学养，在《古文字学导论》与《中国文字学》两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古文字学研究的完整理论。

《古文字学导论》“自序”说：“过去的文字学者，对古文字无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学，结果文字学和古文字是分开的。”鉴于这一不足，唐兰尝试将此隔阂打通。《导论》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从古文字学的立场去研究文字学，计分为“古文字学的范围和其历史”及“文字的起源和其演变”两大部分；下编则阐明了研究古文字学的方法和规则，计有“为什么要研究古文字和怎样去研究它”、“一个古文字学者应当研究的基本学科”、“古文字的搜集和整理”、“怎样去认识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的戒律”、“应用古文字学”等六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古文字学的范围和其历史”中，首先论述古文字和近代文字的区别，其次是对古文字的分类发表新的见解。作者着眼于时代的区分与地域的划别，将已发现的古文字分为四系：一、殷商系文字；二、两周系文字（止于春秋末）；三、六国系文字；四、秦系文字。并据此探寻各时代文字演变之轨迹。对于古文字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作者亦有详细描述，还述及秦代以前到清代以后的著录及研究，最后，针对古文字学的萌芽及发展做了总结。

第二部分“文字的起源和其演变”，区分文字之演变为三期：“由绘画到象形文字的完成是原始期；由象意文字的兴起到完成是上古期；由形声字的兴起到完成是近古期”。并分别对象形字、象意字以及形声字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且征引诸多例证加以说明；又对三期文字的分类提出己见，部分内容与传统文字学者的说法不同，例如：论述指事文字问题时，认为：“学者们常以为指事字在象形前，是在上古突然产生的纯文字，……文字是由图画逐渐变成的，上古文字只是从形符发展成意符，绝不会先有意符，尤其不会先有形意具备的文字，而后来反分做纯形符或纯意符；所以指事这个名目，只是前人因一部分文字无法解释而立的，……在文字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指事文字。”

《古文字学导论》下编主要论述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作者认为，古文字学者应当具备的学科知识有：一、文字学；二、古器物铭学。除此之外，作者认为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尚需辨别真伪，并自己动手搜集材料，且依经验加以整理。本书亦简单介绍如何认识古文字，以及辨识古文字所用的方法，例如：“对照法或比较法”、“推勘法”、“偏旁的分析”、“历史的考证”等等；其中对历史的考证又详加论说，认为其中包括：一、图形文字的研究；二、字形演变的规律；三、字形通转的规律；四、字形的混淆和错误；五、文字的改革和淘汰；六、每个字的历史的系列。认为认识古文字时，除了字形的研究外，还需要从“字义的解释”、“字音的探索”两方面着手。

作者以自己研究古文字的心得，提出研究古文字有六条戒律必须注意：一、戒硬充内行（指不要妄想以极短的时间变成一位全知全能的专家）；二、戒废弃根本（指文字学与古器物铭学的基础）；三、戒任意猜测（指须有精确的根据，不可依据主观的猜测）；四、戒苟且浮躁（有些人拿住问题就要明白，因为不能完全明白，便不惜穿凿附会，久而久之则越学越糊涂）；五、戒偏守固执（有些人研究问题得到一些新见解，却守住不再容纳别说，因而阻碍学问的进步）；六、戒驳杂纠缠（有些人用一种方法，不能彻底，有时精密有时疏阔，这是驳杂；有些人缺乏系统知

识,研究一个问题时,连自己也没有明了,这是纠缠)。

另外,本书在论说部首分类时,采用新说,认为应当以象形字为部首,由象形字分化之单体象意字均属部内;由原始象形字或单体象意字所分化之复体象意字则隶属于“科”;由象形象意孳乳之形声字则隶属于“系”。认为此一分法可使每一原始象形字所孳乳之文字组成一系统,由此可以窥见文字孳乳及演变的情形。本书另一项创见,是认为形声字应当一律改成左形右声,且只许两合的情形,并主张将声符改成拼音形式。

《古文字学导论》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张政烺先生所言:“中国古文字研究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但很少理论性的著作,唐兰同志这部书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20]

《中国文字学》分为“前论”、“文字的发生”、“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化”、“文字的变革”等五大部分。

“前论”部分略述中国文字学的内涵、中国文字学与语言学的差别;认为中国文字学的范围仅指文字形体,而声韵学研究字音是属于语音学,训诂学研究字义是属于语义学,二者应为语言学的一部分。书中对于文字学的新领域——古文字以及中国文字学的发展也作了简要的概论。

“文字的发生”部分针对中国文字起源的传说加以辨明,分别讨论中国文字不起于结绳、八卦;再由“书”、“契”的意义结合考古材料,论证“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还从文献数据配合地下发掘的器物文字,论说文字的发生必在夏代之前。

卜辞通纂　目次

一　干支
二　数字
三　世系
四　天象
五　食货
六　征伐
七　畋游
八　杂纂
别录之一
一　中央研究院藏大龟四版
二　新获卜辞拓片

《卜辞通纂》目录

第三部分先对六书说加以批判,认为“许氏给予六书的界说过于简单,而不能确定所举的例,每一条又只有两个字,所以后来人的解释就人各一词”。作者在书中又对指事、会意、转注等项目论述许慎的解说或例字,并提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认为三书足以涵盖一切中国文字。接着又说明古今文字构成的过程有:分化、引申、假借、孳乳、转注、緟益等六项,作者将其名为“六技”。同时继续讨论形声文字、记号文字与拼音文

字的相关问题。

“文字的演化”分为六节，依序探究“演化”的意义，绘画、锲刻、书写、印刷等记录语言的方式，以及字形的行款形式、结构笔划等课题。并分文字的演变有趋简、好繁、尚同、别异、致用、观美、创新、复古等现象。

最后一章“文字的变革”，从古文字、大篆、小篆、八体、六书、杂体篆，叙述到隶书、楷书、草书，乃至于简体字与新汉字——注音字、拼音字、新形声字、新汉字等，并对各时期书体的特色与问题作了描述。

《中国文字学》确立了中国文字学的名义和研究对象、明确了中国语言文字在世界上的地位，解决了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提出新的“三书说”。由此体现了唐兰的文字学理论新的进展。

郭沫若的甲骨学研究成果 就在董作宾从事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同时，1928年，东渡日本旅居的郭沫若也开始潜心研究甲骨文。从1929年到1937年，郭沫若编著了六七种甲骨文论著，在甲骨文字考证以及有关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都有许多新的见解，为甲骨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根据已出版的甲骨著录书籍和国内外私家收藏的甲骨文，进行精心挑选、分类编排，并作详尽考释，编成《卜辞通纂》一书[21]，这是甲骨文研究很好的一种入门著作。该书正编收录甲骨800片，别录129片。正编所收甲骨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略游、杂纂等八项分别编排，逐片进行考释，在每项内容后面附有总结。别录有一部分是当时中央研究院所藏的大龟四版、《新获卜辞》拓片、何遂所藏甲骨等内容，另一部分是从日本征集到的甲骨精华129片。

《卜辞通纂》通过精详的考释，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将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的八项内容的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了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可以纠正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的内容，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从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中，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此书1933年在日本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殷契粹编》是郭沫若从刘体智（号善斋）所藏的2.8万片甲骨中，选取1595片并加以考释研究而成的著作，1937年由日本文求堂出版。此书编排和考释体例基本上与《卜辞通纂》相同，后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换用新的拓本，增加文字，由胡厚宣考释附于书后，并经于省吾的校阅后加以出版，科学出版社出版时

把于省吾的看法以眉批的形式,录于书中。

郭沫若在这两部书中的研究成果很多,例如,从卜辞中辨识沃甲和阳甲,使殷先王世次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解决;通过断片缀合,为王国维提出的先王上甲之后世次应为匚乙匚丙匚丁说增加了确证;释帚为妇,以妇某为人名,进而推定为武丁之妃。《殷契粹编》与《卜辞通纂》集中了殷墟科学发掘之前的出土甲骨的珍贵部分,所作的考释也多有创见,能帮助读者由浅入深地系统了解甲骨文字的全面情况。

在甲骨文考释方面,郭沫若还有《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影印,1930年)以及《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古代铭刻汇考续篇》(1934年)等研究成果。《甲骨文字研究》是他专门从事甲骨文文字考释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古代铭刻汇考》一书,其中有九篇是专门讨论甲骨文的有关问题的,因此他将这组文章定名为《殷契余论》。《古代铭刻汇考续篇》一书,也有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文章三篇。

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贡献实际上并不仅仅在如上方面。他还首先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以1929年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为例,该书共收入五篇论文,其中与甲骨文直接有关的是《卜辞中的古代社会》。这篇文章,开创性地利用古文字材料系统地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第一篇论著。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后,曾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另外,他也将视线转到甲骨文断代的问题上,在编纂《卜辞通纂》一书的过程中,产生了与董作宾大体一致的一些看法。他在收到董作宾寄赠给他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时,感到董作宾的"五期、十标准"和他的某些见解是相似的,他的有关贞人的一些看法也可为董作宾的说法提供补充。同时,在进行较多甲骨断片缀合的同时,他还提出残辞互补问题等。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和书写方面,他也作了深入的研究。[2]

郭沫若的金文研究　郭沫若关于商周金文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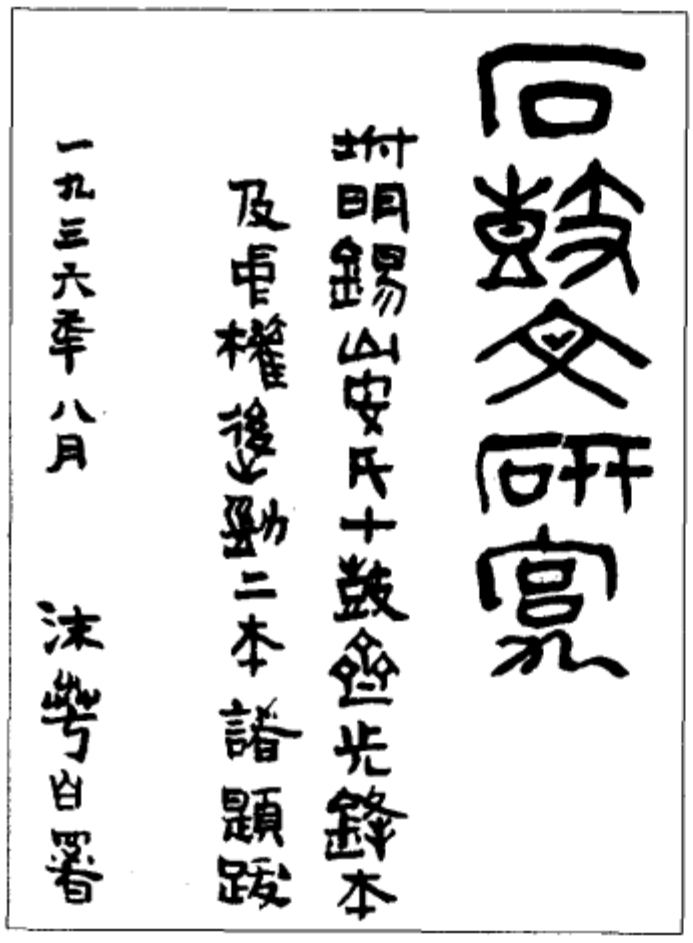
和青铜器的著作较多,学术贡献甚大。他早在1929年初步研究西周金文时就写成《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以后的一段时间接连出版了六部专著:《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大东书局石印,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金文丛考》(1932年)、《金文余释之余》(1932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年)等。在《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和《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年)二书中,也收入了相当一部分研究金文的论文。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青铜器时代》一文,并对陕西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作了研究。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是三部青铜器铭文著作的合集,即《两周金文辞大系》、《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总称。1957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简称《大系》,共八册。总目共分七项:诸家著录目、著录目补、目录表;列国标准器年代表;图编序说—彝器形象学试探;图编;录编;补遗。其中"图编"专辑图像,"录编"专辑铭文。西周铜器按年代排列,以列王为顺序,从武王至幽王,收162器,大部分是当时王臣所有器物;东周器则按国别排列,如吴、越、徐、楚、江、黄、邓、蔡、许、郑、陈、宋、腾、薛、邾、鲁、杞、纪、祝、莒、齐、戴、卫、燕、晋、苏、虢、虞、秦等32国,收41器。所录器物大都有图像与铭文拓本,铭文用楷书释读,并简要考释。是研究两周历史的较有系统的编年史料,也为研究两周青铜器断代与区分国别奠定了基础。

"录编"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铭辞324器。考释部分与《录编》相对应。

郭沫若根据可靠资料,科学地概括了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断代分期。他按铜器形制、花纹、文字(包括文体和字体)三方面的特点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他认为商代末期青铜器制作"已臻美善",中国青铜器的滥觞时期"尚必在远古"。所分其余三期,相当于商


石鼓文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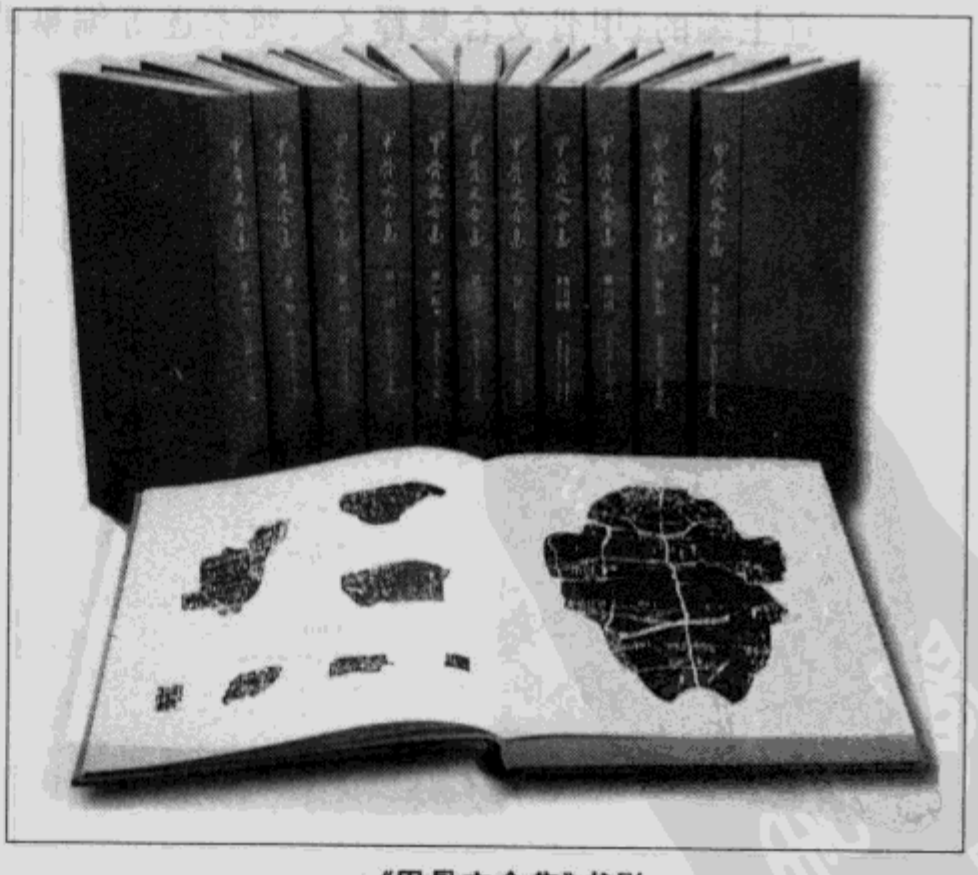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八月 沫若自署

《石鼓文研究》书影

代后期至战国末年,对其发展作了概括的论述。1945年所作论述,又另加战国末年以后的“衰落期”。如此的分期和论述,便使青铜器研究在发掘资料甚少的时候,突破金石学和古器物学的范畴,走上考古学的轨道,作出了青铜器研究的划时代的贡献。

郭沫若还创立了标准器断代法,对两周时期的有铭铜器,特别是西周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根据标准器断代,就是先选定从铭文可知年代的器物,以这些铭文中的人名事迹线索、文辞体裁、文字风格和器物花纹形制为标尺,对未知年代的器物进行断代。这种开创性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现代考古学方法应用于商周铜器研究,从而取得较大的突破。例如参考甲骨文资料,考定戊辰彝为帝辛二十年之器,使商代末年从此有了标准器;推断商代铜器中的图形文字为古代国族的名号,即所谓图腾的孑遗或转变。又如,根据器物形制和花纹的对比,否定毛公鼎作于周初的成王或昭穆时期等旧说,将其年代改订为西周晚期的宣王;判定众说纷纭的秦公钟和秦公簋作于春秋中期偏晚的秦景公时期等。增订后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共收西周之器250件,东周之器 261 件,分别按王世和国别编次,并且附以适当的考释(除附见之器外,全书实收324器)。这就把“一团混沌”的传世铜器,第一次变成完整的体系,成为可供古史研究利用的科学资料。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比较法,至今仍为金文研究者所沿用。

郭沫若特别强调图像学的重要意义,指出研究商周铜器的当务之急是对花纹进行分类和断代。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中,按照器类和年代顺序,罗列当时能够找到的图像资料,第一次作成两周铜器的参考图谱。该书的序说《彝器形像学试探》和《青铜器时代》一书又曾举例说明铜器形制和花纹的演变情况。[29]



《甲骨文合集》书影

郭沫若改变传统上的“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他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标准器断代法,影响很大,至今

仍为金文研究者所沿用。

此外,郭沫若还对石鼓文等石刻资料的研究作出一定的成就,著有《石鼓文研究》(1936年)、《诅楚文考释》(1947年)等。[25]另外,又曾根据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时期王、谢等家墓志,重新提出王羲之《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以《兰亭序帖》为唐人依托之作,曾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热烈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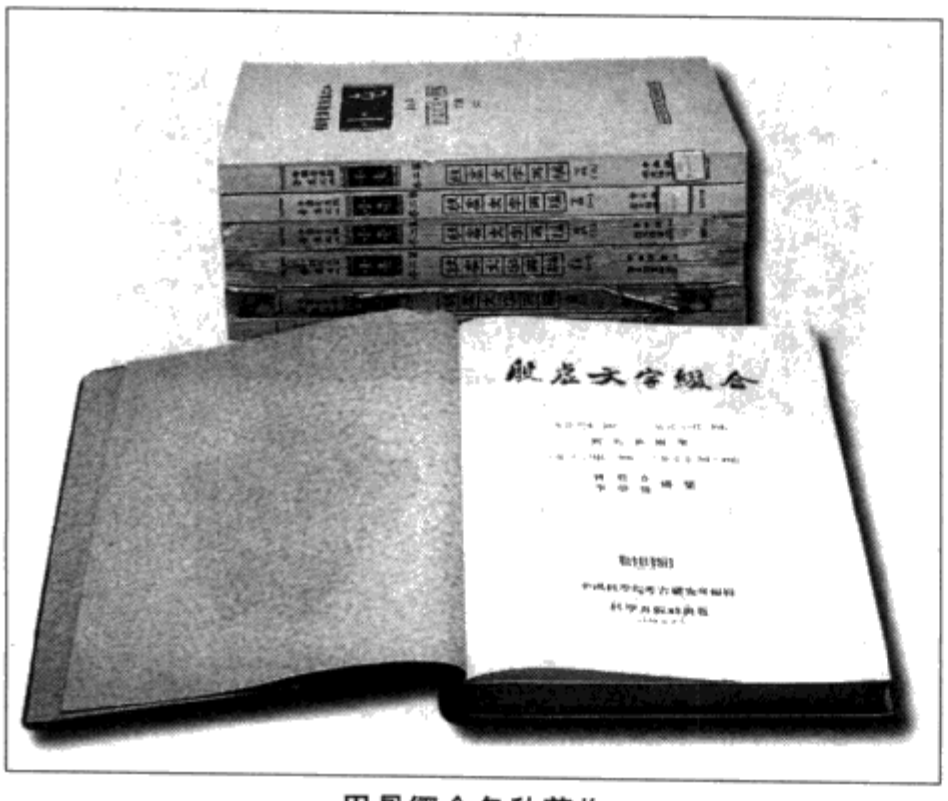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建国后古文字学以及甲骨学研究成就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除了出版集成性大型资料汇编《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战国文字编》等外,梁思永、尹达、夏鼐、苏秉琦、贾兰坡、安志敏、邹衡、马衡、于省吾、杨树达、李学勤、王仲殊、陈梦家、郭宝钧等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历史学家都发表了这方面的重要论著。

总体来看,建国后的古文字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伴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出土,战国文字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进展。这是至今五十多年来最为明显的进展。特别是大批楚国简帛的出土更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第二,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以及秦汉简牍帛书文字都出现了大型的资料汇编著作。甲骨学方面,典型著作有郭沫若、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释文》,姚孝遂等编纂的《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摹释类纂》,彭邦炯《甲骨文合集补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甲骨文编》,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编《甲骨文献集成》等等。青铜器以及金文研究方面,代表著作有王世民等《殷周金文集成》,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容庚《金文编》,华东师范大学《金文引得》(殷西周卷、春秋战国卷),戴家祥《金文大字典》,



甲骨缀合各种著作

王国维缀合的甲骨文

周法高《金文诂林》,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等。

第三,古文字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随着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大量更加可靠的古文字材料的出土,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对于文字,不再是简单的释读,而是在排比事类、勘对文献的基础上,比较新出土的文字资料,利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科学的方法,综合出土状况、年代特征、礼制葬俗等内容对文字进行全方位的历史与文化的考察。

第四,一大批总结性、理论性的著作问世。甲骨学方面,有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西周甲骨探论》;青铜器以及金文研究方面,有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修订本)、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修订本)、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等;战国文字方面,有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简帛研究方面,有陈梦家《汉简缀述》、李均明等《简牍文书学》、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沈颂金《20世纪简帛学研究》等。理论性或通论性的著作则以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建国后再版的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以及高明《中国古文学通论》等为代表。

资料整理研究型的巨著——《甲骨文合集》与《甲骨文编》　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即是对古文字资料进行了大规模整理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甲骨文方面,代表著作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编》(修订本)、《甲骨文献集成》等。

由郭沫若任总编辑、胡厚宣负责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资料汇编,共13分册(图版部分),著录殷墟甲骨41956片,凡能搜集到的稍具研究价值的甲骨已尽于此,是甲骨著录和缀合的集大成之作。

甲骨文从它在1899年被发现到现在,总共出土了约十万片之众,出版约七十多种的甲骨著录书。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外学者分途并进,共同

努力,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甲骨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学者们普遍感到,在甲骨文的流传、掌握和利用方面,仍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因而,对国内公私收藏的甲骨文资料重新拓印、统一挑选、剔出伪片、全面整理、科学地汇编为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总集,久已成为中外学术界深所期望但又不易着手的巨大工程。1956年,多年来就有志于进行这一工作的胡厚宣、桂琼英夫妇,将他们已着手的这项科研课题在中国科学院提出,很快就被列为国家科学研究"1956年至1967年历史科学远景规划"的大型重点项目。这一项目的成果就是后来的大型甲骨文资料总集《甲骨文合集》。编集工作正式开始于1959年。编集过程中,工作人员先后到过国内44个城市,访问了九十多个收藏甲骨文的单位和四十多个私人收藏家,并对他们所藏甲骨进行鉴别、精选和拓印,然后汇合八十多年来国内外已出版和已发表的甲骨文资料以及分散在国内外公私藏家手中的甲骨实物的传世拓本、照片与摹本,进行系统的选片、辨伪、去重、缀合和分期、分类等艰巨、繁重而又细致、认真的一系列工作;历经二十多个寒暑,几经波折,时辍时续,终于在1979年完成。

《甲骨文合集》的图版部分共13册,总共著录甲骨文41956片,系由目前国内外藏品的十余万余片甲骨文资料中精选出来的,约占全部现存甲骨文总数的四分之一,这应该说是囊括了所见甲骨的精华。因此,凡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甲骨文资料大体上已被收进《甲骨文合集》中。因而,《甲骨文合集》是一部既不同于全集,也有别于选集的精粹毕集的合集。

选出的甲骨片,由编辑的学者们进行科学处理,如换用更清晰的拓本,校对重复的甲骨片。他们曾对六十多种主要甲骨文著录书进行过认真的对重,同时还把新拓的甲骨文著录书与这些甲骨文著录书进行互校。据初步统计,他们在编集过程中,校重有一万四千多片次,校出各种重片六千多片,占《甲骨文合集》所收甲骨文资料总数的七分之一强。经过这一工作,不仅彻底清理了旧的甲骨文著录书的重出现象,同时也为《甲骨文合集》避免出现重片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中的辨伪和缀合工作,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体现了这项工作的学术水平。他们在前人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前人的工作成果而又大大超越了前人,全书共缀合甲骨文一千六百多片。这一工作使得原来残缺零乱的碎片得以复聚,使原来无法通读的许多内容变得通畅明了,还增添了不少新的材料。

《甲骨文合集》在编排方法上采用了分期分类的编辑方式,它既照顾到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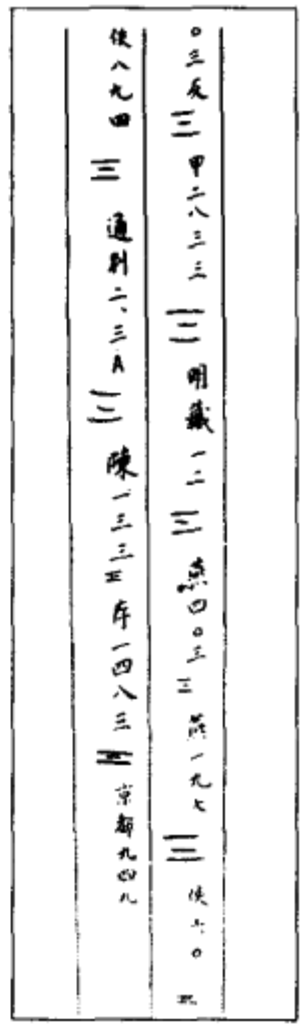
《甲骨文编》书影

文本身时代的先后关系，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全部甲骨文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分期分类编排。在纵的方面，它依照目前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将材料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为商王武丁时期及其以前，另外字体纤细、称谓特殊的自组、子组、午组卜辞也附于本期之后；第二期为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为廩辛、康丁时期；第四期为武乙、文丁时期；第五期为帝乙、帝辛时期。在横的方面，它又在每期中依照内容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四大类别，在每个大类之下又分小类。其分类原则大体为：一、阶级和国家，包括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等若干小类。二、社会生产，包括农业、渔猎、畜牧等小类。三、思想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气象、医学、祭祀、鬼神崇拜等小类。四、其他包括文字等不宜划归以上各类者。这种分期与分类互为经纬的编排方法，使四万多片混沌一团的甲骨文资料成为条理分明的科学资料，为研究者的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与此同时，《甲骨文合集》还将散见于各书之中被分割开的原属同一卜骨的正面、反面与骨臼的拓本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编号来处理，这就使甲骨文原有的面貌更为清楚，内在联系更加明显。

总之，《甲骨文合集》一书无论从材料来源、编排方法上讲，还是从工作的深人、细致、全面、系统等方面看，都远远超越了前人。它既是八十多年来甲骨学各项成果的结晶，也是甲骨学开始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迈进的重要标志。

当然，它的缺点也是有的，通过学者使用过程中的反映，我们知道该书有漏收重要甲片、有的选片不精、一些缀合有误、分期不很清楚的情况。为此启动了从1996年开始的《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工作，这是《合集》编纂的继续。《补编》由彭邦炯主持。共收录甲骨13450片，补收了原来《合集》漏掉而又很重要的一些资料，重点是收录分散于海内外见于书刊上和从未刊布的的资料。除了近几年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甲骨续存补编》未收之外，基本囊括了20年



《甲骨文编》"迄"字

《甲骨文字释林》封面

来海内外著录与缀合的新成果。同时还推出了《释文》、《来源表》、《缀合表》等索引和附录资料，可以相互参考。

如果说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是目前最好的甲骨文字的集释性字典，[26]那么孙海波撰的《甲骨文编》应该是目前最流行的甲骨文著录字典。[27]该书共十四卷，合文一卷，附录一卷(修定本为二卷)，检索一卷。

《甲骨文编》征引的著作达40种，考释文字充分吸取了前人和当下学者的新成果，反映了甲骨文字考释的新水平。

该书以收集甲骨文的字形为主要的功能。书中所考释的甲骨文单字也由初版本的1006字增加至1723字，其中见于《说文解字》的共有941字，合文371字，正编和附录共计收录4672字，甲骨文中所见到的已识和不识的单字大体上收罗全面。

《甲骨文编》仍然依照《说文解字》部首字序编排，每字以篆文为字头，下列甲骨文各字形，并且还在每一字形之下标注引自某书的某页某片甲骨。字形丰富、摹写也较精确。考释文字博采各家之说，总结出自己的观点。这种编写体例也照顾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在甲骨学界广为流传。

当然这部书在考释文字、引用资料以及编排体例上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如考释文字是经常把不同的文字放在一起，如山与火等，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另外还把可以合并的异体字分成多个字。另外在解释字义时，有的忽视了本义、引申义与假借义的区别。[28]

第四节　建国后甲骨学研究成就之二

甲骨文考释的新进展　建国以后，甲骨学研究中一项很重要的进展即是甲骨文的考释工作又有了新的进步。其中以于省吾、杨树达等学者的贡献最具代表性。

于省吾所著《甲骨文字释林》一书，是他在殷墟甲骨文字考释方面的总结性

著作，也是他古文字研究的代表作。于省吾对古文字的考释，一向以考文释义精审周密而著称。他坚信古文字是客观的存在，它们的形、音、义是可识、可读、可寻的，只要方法得当，经过深入钻研及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多数古文字还是可以被正确认识的。这种理念在《甲骨文字释林》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这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有文章53篇，是删改他在40年代出版的三部甲骨文著作而成（《双剑誃殷契骈枝》（1940年）及其续编（1941年）、三编（1943年）。中卷和下卷共有135篇文章。其中有九篇改自已经发表了的论文。二篇是由收录在《骈枝》及其续编的文章修改而成，其他的文章都没有发表过。另有附录两篇。总共190篇文章。此书以其简练的文字、精到的论证、谨严的方法闻名于学术界。共考释前人未识或虽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约三百字，占全部已识甲骨文字的四分之一还多。从而使该书成为罗振玉、王国维以来考释甲骨文字的最重要的著作。他对古文字的研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结合许多有关学科的知识来进行，从而合理地解决了“玄鸟生商”、“《尚书·召诰》中一段500字的话到底是谁说的”等久悬未决的问题。

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文章是考释单个或者多个甲骨文字，也有几篇是综述文章，于省吾考释古文字的态度十分谨严，强调要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相互关系”，“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他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字形之间的“纵的关系”，反对没有充分根据地任意考释古文字。[29]

另外，他在文章《释羌、苟、敬、美》中又开辟了文字考释的新途径，指出“在我们已经看到和掌握大量古文字的今天，不应局限地或孤立地来看问题，需要从事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30]。

于省吾还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对先秦等古代文献典籍的考证方面，他著有《双剑誃尚书新证》（1934年）、《双剑誃诗经新证》（1935年）、《双剑誃易经新证》（1936年）、《双剑誃诸子新证》[31]、《论语新证》[32]、《泽螺居诗义解诂》[33]、《泽螺居楚辞新证》[34]、《急就篇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等多部（篇）论著，并因而被推许为“新证派”的代表人物。他另有考释单字论文多篇。晚年准备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金文考释编成《吉金文字释林》，惜未能完成。

杨树达、裘锡圭等人在古文字考释中也作出了很大贡献。杨树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廎甲文说》、《卜辞求义》、《卜辞琐记》等几

部著作中。[35]

裘锡圭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有不少新的创获。他于196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释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自此以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论文,并在其他一些有关铜器铭文研究的著作及其注解中,对不少目前考释难度较大的甲骨文字进行了解说,其成果已集中收入其专著《古文字论集》[36]等书中。裘锡圭文字考释精到,论证严密。使不少长期困扰甲骨学者的"疑字"、"难字"经他解说以后,学者们涣然冰释,无不称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裘锡圭在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释向前推进了一步。

甲骨片缀合研究的新进展 建国以后甲骨文研究的另一项成就,是甲骨文的缀合与辨伪工作。甲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由于骨质松脆,甲骨背面经过钻、凿和烧灼,出土时极易碎裂,再加上出土后又屡经转运、转卖和各种人为的损坏,往往一片完整的甲骨几经断裂最后成为碎片,并常常分属几个藏家,弄得身首异处、面目皆非。这种支离破碎的甲骨文碎片,如果不经复原,就很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固有联系,使研究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很早就有学者注意把原来同属一片而散在各处的甲骨文碎片拼接在一起,使之复原为一片,这就是甲骨文的缀合。它是甲骨文研究工作中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

最早尝试甲骨缀合工作的是王国维,他在1917年曾将《戬寿堂所藏甲骨文字》中的一片与《殷虚文字后编》中的一片加以缀合,发现了自上甲至示癸的商代先公世系次序与《史记·殷本纪》所记不合,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1933年,董作宾在王国维缀合工作的基础上,又再补缀上一片,使这片甲骨更为完整。同年,郭沫若在编纂《卜辞通纂》的过程中,曾经缀合过三十多片甲骨,随后又在《古代铭刻汇考》一书中补充了经他缀合的甲骨断片的八个例子。董作宾后来在编写《殷历谱》一书的过程中,又缀合过许多甲骨碎片。这些缀合工作曾经给研究甲骨文与商代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建国以后,致力于甲骨文缀合工作的学者也有很多。例如,1950年,曾毅公曾将他多年的缀合成果汇集成书,编印为《甲骨缀合编》,共收录已缀合甲骨396片,取材于32种主要甲骨文著录书,其中不少都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比起他在解放前出版的《甲骨缀存》一书,规模要大得多。《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两书所收录的甲骨文资料,都是解放前殷墟发掘所得,它们在出土之后屡经周折,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搬运,其中多数原来比较完

整的甲骨都已破碎成为失掉原有联系的碎片，这种状况曾给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使这些失去联系的甲骨碎片重新会合，郭若愚曾经精心拼接，缀合出324片。随后，曾毅公、李学勤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拼合，缀合出尚未缀合的甲骨158片，并于1955年汇合三家缀合结果，印为《殷墟文字缀合》一书，共收录缀合甲骨482片。

另外，台湾的张秉权、严一萍等学者对此也有很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缀合工作在最近一些年来，又有新的异军突起，这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缀合甲骨文试验工作的展开。随着电子计算机进入到现代生活，1973年国外开始尝试利用电子计算机对甲骨文进行缀合。1974年，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这一方面的探索。根据童恩正、张升楷、陈景春等人的报告，他们选用了殷墟第三次发掘中在大连坑出土的263片卜甲和殷墟第四次发掘中E16坑中出土的154片甲骨，编出程序，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缀合试验，结果成功率达到40%左右。虽然还不算十分理想，但它毕竟开创了将现代技术应用于甲骨文研究的先例，是甲骨文研究通向现代化的一个可喜的先声。

甲骨学断代研究的新进展　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方面，建国之初就有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37]在断代一章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甲骨分期断代的认识。他对董作宾的五期说进行修正，提出了“三个标准”和“三期、五期、九期综合分类法”，[38]不过正如陈氏所言“我们将安阳出土甲骨分为九期，这是一个可能的断代分期法，在应用上是有困难的”。另外，他还对董作宾十项标准中的贞人、坑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贞人是断代的基础”，陈梦家将“武丁以迄帝辛的卜人，分别加以断代。其可以分组的，特别将各组汇合而成的称谓，详加援引”。并“对某一时代或某一组卜人，试分别其早晚”。共考订出贞人120个，比董作宾的《断代研究例》多出了四倍。[39]除了上述的“综合分类法”之外，他还特别提出了“午组”、“自组”、“子组”的分类和断代的问题，应该属于武丁时期，而不是董作宾所认为的是文武丁时期，这对于“揭穿文武丁时代卜辞之谜”这一学术界探索多年的问题颇有贡献。现在这一论断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关于“坑位”的断代，陈梦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并对此进行详细的探讨。

建国以来，甲骨分期断代研究，除陈梦家外，同时或稍后的李学勤、林沄、彭裕商以及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岛邦男等人，都有很大贡献。特别是彭裕商，他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断代》，以及后来他与李学勤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对甲骨的分期断代展开了详细探讨与深入研究。王宇信、杨升南在《甲骨学一百年》

中详细分析了“坑位”断代的局限性，概其论点有二：一是时代背景的局限以及考古发掘报告没有发表，“科学发掘”的甲骨不具有明确科学的层位关系和伴生出土物“类型学”的分析价值，较难用现代科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二是甲骨除科学发掘外，多为盗掘品很难有可靠的“坑位”可供参考。[40]

纵观建国以来的分期断代成就，董作宾的五期说，没有完全过时。诸位学者沿着董、陈等学者的研究，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主要成果如下：

第一，明确甲骨分期断代与分类是两件事情，在分类基础上提出分期断代的新方案——“两系说”，《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即是其代表作。由于董作宾的“五期说”把甲骨的分类与商代王世的断代混淆，因此学者对此多有校正。陈梦家、李学勤等均有详细论述。陈梦家在五期分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午组”、“𠂤组”、“子组”等以典型贞人为名的分类方式。经过学者的多方研究，现在一般公认了这批甲骨卜辞应该属于第一期的武丁时代。同样引起争论的还有“历组卜辞”[42]的断代问题。

历组卜辞

李学勤根据自己对甲骨的整理先是提出九组说（后来又重新分作十组），[43]然后又公开提出了自己的“两系说”。[44]王宇信也指出：“新的‘分组’说的提出，是用‘两系’说取代董作宾分期断代方法的一个新探索。”[45]彭裕商完全接受了李学勤的“两系说”并有详细论述，在《殷墟甲骨断代》一书中，他对殷王室早期（武丁到祖甲早期）的甲骨卜辞进行了分类和断代，他将甲骨卜辞分为宾组、出组、历组、“𠂤宾间组”、“𠂤历间组”以及非王卜辞等组，并认为应该“使用考古学的方法，先分类，再断代。分类的主要标准有字体和卜人……确定年代的主要标准有称谓系统、考古学依据、卜辞间的相互关系等。其中称谓系统可以确定绝对年代（王世），其余两项可推求相对早晚。”而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中，在彭书基础上，又增加了“何组”、“黄组”、“无名组”卜辞等，对整个晚商二百七十多年的甲骨做了分类与断代。（如下图所示）

（村北）　𠂤组→𠂤宾间组→宾组→出组→何组→黄组

|　　↑

→　历间组→历组→无名组→无名黄间类—

图表来源：《甲骨学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第二，进一步明确了甲骨分期断代的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定位，充分认识到甲骨与甲骨文作为考古遗物的共性与特殊性。甲骨都从地下出土，因此它首先是一种考古材料，特别是科学发掘出土的甲骨更应该从考古学角度进行分析，与殷墟考古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对甲骨进行分期断代时应充分注意甲骨出土的层位关系、伴生出土物等。另外，对甲骨进行分类，还要利用考古类型的原理对甲骨文字进行分析。另外，我们注意到：在甲骨分期断代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等人都是亲自参加考古发掘或是充分重视考古发掘材料的。

另外，甲骨学作为古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又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因此，甲骨分期断代绝对离不开甲骨文字的考释、甲骨文所蕴涵信息的充分发掘与提取等方面的进展。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材料，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与甲骨文考释与不同认识有密切关系了。

第三，随着甲骨分期断代研究的深入，天文学、测年技术、田野考古也提供了有力支持，这可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例。这项工程整合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考古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在统一预期的学术研究规范和目标下，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在研究途径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工程要求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出土古文字资料）、典型考古遗址等进行尽可能多的分析。当然由于我国考古学发展的特殊性、与历史学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工程的科研目标设置和实施都有诸多不如意之处。

尽管如此，断代工程在考古学、天文学、古文献学、天文学以及测年技术等方面，对甲骨的分期断代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测年方面，应用了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碳14年代测定法。而甲骨测年的目标是利用AMS法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举行测验，再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测年不仅从技术上具有强力支持，对于测试样品的选择也同样严格。其选取规则是：卜骨中有称谓、时代明确者；有天象记录者；有年祀者；有重要贞人或重要事件者；地层关系明确者。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选。经初选、复选，确定了150片取样对象，最后采集了107片卜骨样品，另外还选取了九片殷墟文化一至四期无字卜骨的样品作为测试结果的参考。

总之，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甲骨分期断代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许

多问题,我们认识到:甲骨文的考释工作仍然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工作,没有准确的考释,利用这些材料得出的结论就不可能准确。应该紧紧围绕"甲骨"分层次的研究,如首先重视甲骨文字的研究,其次是甲骨本身钻凿、甲骨科学分析,再次是甲骨伴生物的考古学分析,再次是同期考古遗址分析所提供的佐证与启发。明确甲骨材料的考古学与古文字学定位,考古学的研究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本身都有诸多局限,应该结合二者的长处融会贯通,才可以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作为甲骨分类依据的字体(类型学分析)与贞人(考释与信息解读),个人分析起来主观性都特别强,如何减少分析的主观性,增强结果的可信度很值得我们思考。学者试图建立分期断代的模式,这本身很值得赞赏,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明确分类、分组、断代、年代学分析等方面的关系,充分结合现存的十多万片甲骨,分类、分组有统一明确的认识和标准,断代有充分的依据,年代学分析有现代天文学、先进测年技术的支持,从材料的分析、方法改革、手段创新、理论总结诸方面入手才可能有更大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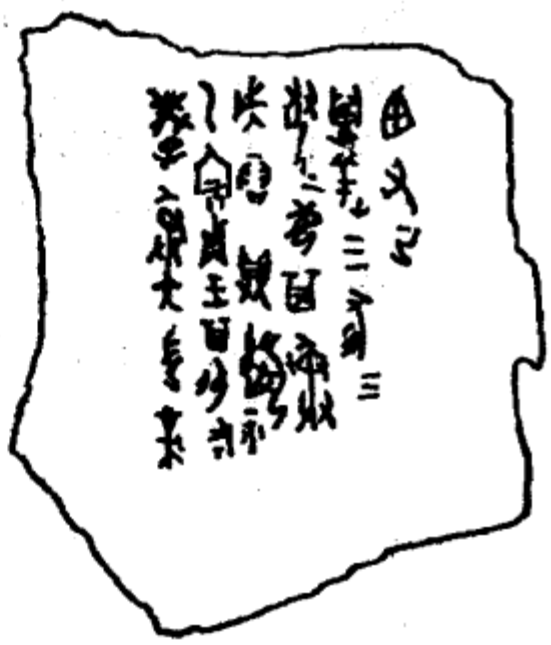
甲骨学综述性著作的问世 建国后,在甲骨学的总结与综合研究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这可以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86]、严一萍《甲骨学》、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王宇信和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为代表。

陈梦家所著《殷墟卜辞综述》,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考古发掘资料,结合自己多年的精深的造诣和研究心得,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的研究历史、内容、方法等作了全面的科学总结,并结合文献予以印证。该书系统阐述了从有纪念意义的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到1955年半个多世纪有关甲骨文的研究成果,是甲骨文研究史上真正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总结之作。

全书共有二十章,分为:绪论、文字、文法、断代、年代、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区域、先公旧臣、先王先妣、庙号、亲属、百官、农业及其他、宗教、身份等内容,另外还有总结及附录两章。第一章绪论,总结了甲骨文发现和研究的历史,是56年来的"甲骨文发现的总结";第二章和第三章文字文法部分,对甲骨文字考释及其方法还有文法作了概述;第四、五章对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法"有所发展和纠正,特别是"午组"、"自组"、"子组"的非王卜辞的区分与考订,更具有重大的意义。第六到十九章则全面阐述了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内容。

他对董作宾的贞人说和甲骨断代有所补充和纠正,将所谓文武丁卜辞,区分为自组、子组和午组,首先作出它们应属武丁时期遗存的推断,这是本书非常有

价值的部分。关于断代，陈梦家既不赞成胡厚宣的四期分法，又对董作宾的五期法进行了细化修正，提出“九期分法”的观点。



周原出土的甲骨文

他对于贞人也多有发现，共考订出贞人120个，比董作宾的《断代研究例》多出了四倍。他提出“午组”、“自组”、“子组”的卜辞应该属于武丁时期，而不是董作宾所认为的是文武丁时期。现在这一论断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殷墟卜辞综述》的不足之处是作者对于商代社会性质及发展没有明确地认识，只是简单的罗列一些现象，没有理论性的综述。对于一些细节问题的解释过于牵强。虽然如此，本书作为第一部甲骨学研究成果的总结之作，有着继往开来的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诸家分期说比较(见本节附录)

第五节　西周甲骨学

西周甲骨学是以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龟甲兽骨文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1940年，何天行根据文献记载，曾推断周人应该有甲骨文。[47]因为无实物出土，没有引起学者足够重视。不过在学者全力研究殷墟甲骨文的时候，能够提出陕西有西周甲骨文发现的问题，不仅是甲骨学深入研究的反映，而且是学者对甲骨学研究眼界更加开阔的标志。

第一片可确定的西周卜骨实物，是1951年在陕西邠县发现的，没有文字。西周有字甲骨的首次出土，是1954年在山西洪赵坊堆村。这次发现的有字甲骨仅一片，骨的背面臼部被削去三分之一，靠近臼处有钻窝16个，不规则排列成数行，中下部靠近左边处另有钻窝5个，形成纵列一行。卜骨正面相当于背面钻窝处有经过灼烧后显出的卜兆，兆旁刻有8个甲骨文字。[48]继上述发现后不久，在陕西的长安[49]、扶风、岐山，北京的昌平[50]、房山[51]，安徽巢湖[52]，河北邢台等地[53]，先后发现有西周甲骨文，于是西周甲骨的研究，构成了甲骨学的新分支。

在出土西周甲骨的诸多遗址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岐山凤雏村建筑基址和扶风齐家村灰坑遗址。1977年，陕西省周原考古队，在对岐山县京当公社凤

雏村西周宫殿建筑基址进行发掘清理时,在该基址的西厢房2号房基内的H11和H31两个窖藏中发现了卜用甲骨一万七千多片。其中卜甲一万六千七百多片,为龟腹甲;卜骨三百多片,为牛肩胛骨。这批甲骨经过清洗整理,共发现有字甲骨289片,总共刻有903字,其中合文12个。扶风齐家村,也于1979年9月发现和采集到西周甲骨22片;其中有字甲骨六片,共有102字。尤为重要的是,这里出土的一块带有刻辞的较为完整的龟腹甲,仅缺甲尾和甲桥部分,背面共有方形凿孔35个,正面刻有卜辞四条23字,均在卜兆附近。

扶风齐家村灰坑龟腹甲的发现,弥补了过去由于出土的西周有字龟甲均很碎小,对其特征的观察受较大局限的不足,同时也开阔了人们对于周原甲骨原有面貌的认识。

自2004年2月开始,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又陆续出土西周卜甲七百余片,其中有刻辞者82片,经初步清理,已发现可辨识文字350字。在西周考古中,这是仅次于1976年以后周原遗址出土甲骨的重大考古新发现。其中属首次发现的“周公”字样出现了五次,其中一号甲骨上刻17字,二号甲骨上竟达38字,后者也是迄今为止所见字数最多的西周甲骨。[54]

随着西周甲骨的大量出土,西周甲骨学也有了很大发展,成为甲骨学的重要的分支。从50年代初期到现在,西周甲骨学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

萌芽期:以1956年李学勤发表《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为标志。虽然有陕西邠县、河南洛阳、山西洪赵等地出土西周甲骨,但出土有字甲骨数量实在太少,部分学者囿于成见仍以为是“春秋或较晚的东西”[55]。1956年,李学勤明确指出,山西洪赵坊堆村所出甲骨“应当是西周的”、“认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实在失之太晚”[56]。从1950年学者就提出存在与殷墟甲骨通例不合卜辞这一问题。随着大量甲骨的出土,到李学勤提出“西周甲骨”的观点,学者探索了五六年之久。从不认识到认识西周甲骨,这是甲骨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发展期:西周甲骨被认识后,随着有字甲骨发现的增多和材料的不断公布,进入研究的第二阶段,即西周甲骨学的发展时期。此时,凤雏所出有字甲骨,数量多且内容丰富,自然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依据这些材料,学者们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研究,即文字释读、分期、周原甲骨的祖属等。

文字的释读 为了认识西周甲骨刻辞的性质以及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每批材料公布前后,都有学者对其进行文字和内容的考释,这是将材料应用于商周史研究的必备工作。王宇信[57]的《西周甲骨探论》[58]第二篇《西周甲骨汇释》作了很

好的总结。他汇集各家之说，参以己意，对出土西周甲骨的文字进行考释，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字考释的成就。

西周甲骨的分期　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为陕西岐山凤雏所出的甲骨进行分期。因为，此遗址所出甲骨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也较为重要，这就为学者进一步探索它们的分期提供了可能。

目前，关于凤雏所出甲骨的分期，较为系统的意见有如下几种：

徐锡台在他的著作《周原甲骨文综述》中，根据对字体（特别是“王”字不同写法）、甲骨文内容以及甲骨伴生物（特别是出土陶器）的分析，认为“周原出土的这批甲骨，有一部分相当于周王季晚期[59]或文王早期，大部分卜骨属于文王中晚期，极少数卜骨可能属于武王时期和周公摄政时期”。王宇信则认为周原甲骨其实没有一以贯之的世系作为分期断代的基础，但是甲骨中常出现并且写法各异的“王”字，确是探索甲骨分期的“一把钥匙”，搞清了这些王的时代，才可以把这些甲骨刻辞从事类、书体等方向进行分期。他把诸多“王”字，分为四个类型，根据甲骨所记史事，推断周原甲骨时代是从商王帝乙一直到西周成王、康王时期。无“王”字的26片甲骨中，按照事类，文王时期有六片，武、成、康王时期共有53片。[60]

1997年，台湾学者朱歧祥出版《周原甲骨研究》一书，其中下编第一章在王宇信论述的基础上，为周原甲骨分期断代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考察了王氏以“王”字形体变迁断代的基础上，他强调“殷商文字与周原文字既然具有因承关系，吾人在探索周原甲骨‘王’字的纵向差异时，首先需要掌握的，是‘王’字的殷代甲骨的常态流变，从而可以更了解周原甲骨的定位”[61]。通过对比殷墟甲骨和周原甲骨“王”字的异同，他发现：周原甲骨中同时混杂有殷人和周人甲骨，二者都用“王”的称谓。其中，作“王”、“ ”形的应为商王帝辛（纣），作“ ”的相当于殷第四期卜辞的王，时限或在武乙、文丁之间；而周王的“王”字多作“ ”形。此外，朱歧祥还根据“贞”、“虚字用法”、“正”字等方面的研究，讨论周原甲骨的时代。这些探索，不仅为分期研究扩展了思路，从而使西周甲骨的断代增加了新“标准”，同时，对于解决学者关于周原甲骨的祖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周原甲骨的祖属问题　根据文献记载，周原甲骨所在的岐山是周人的发祥地，因此出土甲骨当为周人之物。但由于对出土甲骨上的商王宗庙名——“文武帝乙宗”、“文武丁必”祭祀商人先王，并“周方伯”等内容理解不同，学者对其祖属产生了争议，争论焦点如下：王玉哲根据殷商末年商周民族矛盾的背景、祭祀

传统以及周原非龟甲产地等方面，认为周原甲骨不是周族所有，而是商王室之物。[62]徐锡台[63]、陈全方[64]、徐中舒[65]、高明[66]、田昌五[67]、杨升南等人[68]，都认定周原甲骨是周人之物，只是在个别有争议的甲片上，有不同角度的论述。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较能普遍接受的意见是王宇信、朱歧祥等人提出周原甲骨大部分是周人之物[69]、小部分是殷人遗存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注意到以上各问题之所以有分歧，甚至是相反的结论，是因为对周原出土的部分甲骨的内容，即含有商王宗庙名、所祭商先王、方伯以及辞主的王等方面内容的甲骨，有不同认识所致。因此，这部分甲骨的研究，是整个西周甲骨学研究的关键。不过，2004年5月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出土的七百多片甲骨，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也反映出西周甲骨学研究正方兴未艾。

第六节　建国后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新进展

青铜器的发现与材料公布　新中国成立后，田野考古发掘为青铜器铭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在众多考古发掘中，往往有惊人的发现。如1976年发掘的安阳小屯村五号墓(妇好墓)一墓即出土青铜器四百六十余件，其中礼器210件；1987年发掘的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青铜礼器与用具一百四十余件，此外尚有65件青铜编钟。特别是有的窖穴中竟存有同一家族数代的有铭青铜礼器(最为典型的当属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西周微氏家族器群和眉县杨家村窖藏单氏家族八代器群)，更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70]。

发掘出土的青铜器资料，大都在较短时间内，以考古报告的形式公布于众。近年来，出土青铜器较多的陕西省、河南省及云南等地的考古所、博物馆还出版了地区性的青铜器图录，如《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71]、《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72]、《云南青铜器》[73]等。此外，集中出土青铜器的重要遗址也出版了图录，如《殷墟青铜器》[74]、《盛世吉金》等[75]，重要的收藏单位也有图录出版，如《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等[76]。这些图录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系统而详尽地介绍该省或该遗址青铜器的重要发现，或附以专题性论文，故极便于学者研究参考。

此外，还出版了一批青铜器综述性著作，比较重要的有《殷周青铜器通论》、《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中国青铜器》、《古代中国青铜器》等[77]。

《殷周青铜器通论》是在1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的基础上吸收、参考近十余年青铜器发现和研究之成果重新编写的。反映了1941年到1958年之间

青铜器的新发现与研究新成果。比之容著，有些内容更丰富了，其中如对“青铜器时代”的讨论、“青铜器的年代考订和分期”、“关于青铜器技术上的问题”等章节皆是《通考》所未有或言之甚少的。但图片大减，甚不便于读者。

《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为郭宝均遗著，邹衡、徐自强整理[78]。本书取材于出土的成群的资料二千余器，以几个地点可靠、时代明确的分群定位划分时代的界标，作为进一步比较其他器群器物类型的尺度。

《中国青铜器》作为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编写的文物教材之一[79]，是综合论述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著作。全书四十四万多字，共分八章。其中第四章专述青铜器铭文，并附有不少图片。第六章是“华夏族以外地区的青铜器”。该书主要根据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新成果所写，把很多分散的资料集中提炼而成，免去初学者翻检的麻烦。

《古代中国青铜器》是一部系统、全面、综合地反映宋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中国先秦铜器研究成果的大型专著[80]。全书114万字，书分上编和下编。上编是通论，由八章组成。分别对青铜器的起源、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史、青铜器的分类与定名、青铜器纹饰、青铜器铸造与加工、仿造、伪造与辨伪等方面进行系统总结。下编为分论，共六章。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商代青铜器、西周青铜器、春秋青铜器、战国青铜器及东周时期边远地区青铜器为题，每题一章，分别论述了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特点、器物组合、纹饰变化等特征，并附有器物出土情况登记表。本书强调考古学方法的运用，以科学发掘出土的新材料为主线，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分型分式，排比归纳，分期排队，找出其发展的脉络。以此为依托，与传世铜器相比照，对传世铜器作了判断与解释，体现了考古学的新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作者还注意青铜器的分期排队，将自二里头文化至战国晚期的青铜器逐一分期排列，清晰地体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青铜器资料汇编与工具书　王世民、陈公柔等主编的《殷周金文集成》[81]、《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8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编《金文引得》，《中国青铜器全集》，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等是代表性的成果。

《殷周金文集成》于1984年开始出版，至1995年4月全部出齐，共18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积数十年心血、经过长期集体努力编纂的大型铜器铭文摹本、拓本汇编 。共收录青铜器(为便于研究者查考，兼收个别铅器、金银

器、铁器等)11983 件,铭文约十万字,器物说明约百万字,是一部大型考古学参考文献[88]。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六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此书在《殷周金文集成》和"金文电脑资料库"的基础上直接编排而成。《释文》内容包括《集成》中的全部铭文、图像、说明资料,以及铭文对应释文,开本较小而方便查阅,为古文字、古史、古器物学者,以及博物馆、图书馆提供一套准确、翔实的历史资料。另外张亚初编定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写的《金文引得》诸书,内容和性质与《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基本相同,增加了铭文释文引得、引得检字等内容,为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中国青铜器全集》,共 16 册,收录的器物主要按时代分地区编排,并附有铭文拓本,力求全面展示中国青铜器发展面貌。全套共分成夏商(第 1 册)、商(第 2~4 册)、西周(第 5、6 册)、东周(第 7~11 册)、秦汉(第 12 册)等。

借助青铜器铭文进行分期断代的研究 有关青铜器的分期断代问题,主要集中于商周时期,特别是晚商殷墟青铜器与西周青铜器的探讨。在这项工作中,青铜器铭文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对殷墟青铜器进行分期研究的是李济。他的《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89],将中央研究院在小屯发掘出土的青铜器组合分成甲乙两种,对甲种墓所出鼎、爵等五种器物进行类型学分析,并将乙种墓出土的觚、爵两种器物分成四个序列。这种分析方法,在青铜器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意义。1964 年,北京大学邹衡发表《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李济的研究基础上,将殷墟出土青铜器作了进一步分型、分式的排比分析。这篇文章奠定了对殷墟文化分期断代的基础,至今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

青铜器时代的断定,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之别,相应形成两种不同的断代方法,一是标准器断代法,一是历朔断代法。系统的标准器断代法为郭沫若首创,郭宝钧在《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中,做了新的拓展研究。这种方法主要是推考西周青铜器的相对年代。而历朔断代法,主要是用于铭文具有年、月、月相、记日干支等历日要素齐备的青铜器,求其所属王世具体的王年,亦即建立在西周列王年代体系之上可用公元纪年表示的年代。自 20 世纪初以来,学者基本上都运用这两种方法展开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研究。其发展大致可分如下两个时期:

1949年之前的研究为第一期，代表人物是郭沫若、唐兰等人。郭沫若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以及有关论文中。这一时期，唐兰围绕“康宫”问题，发表《作册令尊及作册令方彝铭文考释》一文，支持罗、王的观点，他不只称“周公宫”为周公之庙，“康宫”为康王之庙，还对京宫、康宫作了新的发挥。认为京宫祭祀太王、王季、文王、成王，于康宫康王以下诸王，然后按照“昭穆”之法依次命名，昭王名为昭，其庙即康昭宫，穆王曰穆，其庙名为康穆宫。共王更为昭，则懿王为穆，依次类推，则至周幽王宗周灭亡，康宫更祀九世，因称“康宫为其总名，而昭穆以下各为宫附丽于康宫也”。对此，郭沫若持有不同意见[86]。

1949年至今是第二期。代表人物是陈梦家、唐兰、李学勤、刘启益等人。此时“康宫问题”仍是争论的焦点，唐兰、陈梦家都有专文论述此问题。陈梦家在论文《西周铜器断代》系列论文中[87]，支持郭沫若的“康宫非康王之庙”说。针对郭、陈二氏的不同观点，唐兰先后写了《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与《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两文，进一步申论康宫即康王之庙的论点，主张“铜器上有了‘康宫’的记载就一定在康王之后”，并依此作为西周铜器的标尺，把令方彝、令簋以及相关的数十件铜器定为昭王之物。又指出令方彝中的周公是第二代周公，“周公子明保”则是周公旦的孙子，令簋中的“王姜”为昭王之后，伐楚为昭王南征之事等。这些结论都是其康公说的申论，把郭陈二氏的观点大都推翻。自此以后，学术界多从唐兰之说。

李学勤专门论述西周铜器断代的著作是《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此文利用特定的器群兼顾器物间横纵的联系，在比较中建立成序列的标准器，为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他详细研究了两处窖藏出土的这批同一家族、绵延数代的铜器群，从器形与铭文内涵、字体、纹饰几个方面对昭王至孝王时期的青铜器作了推定，并将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下限定在孝王、夷王之间。

除了上述各家研究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此也作了深入的探讨。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王世民、陈公柔等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中[88]。同时，刘启益、杜勇、彭裕商、张培瑜等人也有相关成果问世[89]。工程的具体目标之一就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先后出版了《西周诸王年代研究》[90]、《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等书。经研究，“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相当的王世为：早期——武、成、康、昭，中期——穆、恭、懿、孝、夷，晚期——厉、宣、幽”。

青铜器辨伪研究 大约从两宋以来，历代都有造假仿冒先秦青铜器的现象发生，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又先后有不少重要论著发表。上世纪70年代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张光裕的《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用55件伪器分别予以详细分析阐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要的青铜器辨伪论著有：陈佩芬《青铜器辨伪》[89]，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的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的提高。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90]，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的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特点。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91]，在容庚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此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92]，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与《铜卣辨伪》[93]；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杜迺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程长新《铜器辨伪浅说》等等。其中，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

近年来，铜器辨伪的主要进展是在青铜器冶铸技术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当以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为代表。

第七节　战国文字的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肇端于汉代，当时对古文经书的整理开启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先河。宋代郭忠恕的《汗简》和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则是全面著录战国古文形体的最早著作。这两部著作在今天日益显现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85]

清末以来，随着古文字资料整理著录之风盛行以及出土战国铭文的剧增，战国文字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不能不提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该书收录了如古玺等众多战国文字形体并加以隶释，其中许多隶释是非常精当的。[86]

王国维对战国文字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建树和创新，他的《史籀篇疏证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文章，在战国文字宏观研究、古文和籀文的真伪、来源、使用地域等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战国文字研究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这个时期，因为大量战国文物的出土，许多学者对铜器、货币、玺印以及陶文展开广泛探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另外，在战国文字著录、材料汇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文字考释方面，20世纪40年代末朱德熙有关寿县铜器铭文的研究文章，在方法论上为科学的战国文字研究提供了典范。

建国以来，是战国文字全面发展繁荣的时期。这一方面得益于大量考古材料的出土，另一方面得益于大批学者的参与和努力。战国文字研究终于摆脱了金石学的附庸地位彻底独立出来，成为古文字学研究非常具有活力和前景的学科。

建国以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战国文字资料大量出土，新出土的资料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数量巨大。这一时期，战国资料的出土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仅竹简一种，典型的即有随县竹简、郭店竹简、包山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第二，门类齐全。铜器、兵器、玺印、陶器、石器、货币、盟书、竹简都有不同数量的出土。第三，断代明晰。因为出土的资料，多为科学考古所得，因此在断代上有着很可靠的依据。在其中所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中，最具代表性的分别是竹简、铜器和盟书三种。

建国以来战国文字研究的繁荣　20世纪50年代，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的面世，标志着战国文字研究走上了科学系统的轨道。该文按照地域把战国文字分为“齐国题铭”、“燕国题铭”、“三晋题铭”、“楚国题铭”、“秦国题铭”等

五个范畴,把战国文字资料与历史、考古研究紧密结合,对某些字的考释也很见功力。[97]

在考释文字方面,以朱德熙[98]、裘锡圭的贡献最为巨大。他们合作或分写了许多颇有深度的考释文字的论文(分别收录在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他们古文字功底深厚,掌握资料娴熟,方法谨严,论据有力,对未识战国文字多有收获。[99]

另外,一批可作为直接断代标准器的铜器研究,直接推动了战国文字的发展。如郭沫若、李学勤、陈梦家、唐兰、于省吾等人对蔡侯墓铜器群的研究,殷涤非、郭沫若、谭其骧、商承祚、于省吾、黄盛璋、朱德熙等人对鄂君舟节、车节的详细探讨,裘锡圭、李家浩等人对曾侯乙墓铜乐器铭文的隶定与研究,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等论文所作的对战国兵器铭文的详尽探讨等等,都对战国文字研究的深入广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侯马和温县盟书的研究方面,郭沫若、唐兰、朱德熙、裘锡圭、张颔、高明等学者均有专门论著。

石刻文字方面,唐兰提出石鼓文为战国文字说,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诅楚文、行气玉铭、守丘石刻等也有专门的研究论述。

在货币研究方面,王毓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郑加相《中国古代货币史》、王献唐《中国货币通论》等书,是建国后较为重要的专著。有关货币文字的考释,首推裘锡圭《战国货币考》(12篇)创获最多。另外,商承祚、马非海、朱活等人还编辑有多种货币文字字典,非常方便读者使用。何琳仪《古币丛考》、郭若愚《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以及黄锡全的两部著作《先秦货币研究》、《先秦货币通论》等也成绩卓然。

在玺印研究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罗福颐,他不仅著有通论性的著作《古玺印概论》,还编纂有《古玺汇编》、《古玺文编》两部工具书,是建国以来对古玺印整理和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堪称集古玺印大成的"双璧"性著作。改革开放以来,石志廉、黄盛璋、李学勤、裘锡圭、曹锦炎等人也获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以往对战国秦印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近年来王人聪《秦官印考叙》、王辉《秦印通论》等进行了详细的资料梳理与文字研究工作。有关陶文的研究,较为零散。比较典型的研究可以高明的《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与葛英会合编)两书为代表。[100]

关于简牍和帛书的研究,解放以后,因为出土资料的大量增加,很多学者对

此展开不同方面的探讨,在国际上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简帛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等文字资料，为战国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素材,极大地刺激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全面展开,掀起了古文字研究领域中对战国文字研究的热潮。从此有关战国文字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资料积累和理论建树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此时的战国文字研究已经与甲骨文研究和金文研究真正并驾齐驱,并从古文字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分支。

第八节　国际显学——简帛学研究的巨大进展

简帛学是20世纪特别是90年代以来飞速发展的一门学科，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门显学。所谓简帛学即是应用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从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文书学等角度,对出土的简牍、帛书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的一门学问。

1901年2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故城发现一批汉晋木简和残纸，揭开了20世纪简牍和帛书研究的序幕。此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日本大谷考察团的橘瑞超等人先后到新疆、甘肃等地的尼雅、楼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相继又发现数量巨大的汉晋木简和文书,这就是20世纪初年震惊世界的四大发现之一(其他三项为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明清故宫内库档案)。这场考古大发现恰逢中西文化交流、融会之际,伴随着新材料的出土,加上借鉴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革命,促成了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的进程。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利用新发现的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而总结出来的全新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简牍和帛书的发现与研究,迄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简帛研究的崎岖与坎坷经历,总结简帛学演进的阶段及其主要特点,以期推动这门学科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简帛学发展的三阶段　简帛学是一门新兴学科,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于八九十年代,回顾简帛研究的百年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14~1949年为创始期,1950~1978年为发展期,1979年至今为繁荣期。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是以王国维、劳干等人为中心进行的，王国维《流沙坠简》以及他写的部分文章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1930年以居延汉简的发现为契机，劳干做出了开拓性的功绩，他的《居延汉简考释》以及二十多篇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中，[100]在继承罗、王二人简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把此前研究范围局限于考释和零星的史地考证扩大到对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领域做全方位的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在论文《两关遗址考》中[102]，他结合新出土的汉简材料，对玉门关、阳关遗址的位置以及历史发展重新作了考察，分为一、太初以前的玉门关；二、汉代的玉门新关；三、阳关遗址；四、唐以后的玉门关等部分，订正了王国维认为玉门关西迁之说。另外，他还根据简文“刺史治所，迫断冬狱”的记载，肯定刺史有固定治所，平息了史学界关于刺史有无治所的争论。其他如屯田、客庸、符传等问题也多有创获。劳干研究范围广泛，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是早期居延汉简研究领域中作出贡献最大的学者。

居延汉简的出土，是简牍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不仅因为其数量巨大，而且使得研究者能够依据实物，即根据简牍的材料、长度、制作、编缀、容字等方面，对中国书籍制度的起源做出新的解释。马衡结合出土简牍实物资料，写出《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一文，[103]他从材质及其兴废之时期、形式及其装置之法，全面论述了中国书籍制度的演变过程。

作为一种古老的书写材料，简牍有其独特的常用词语、符号、书体书式及文书结构等，在这方面，陈槃的贡献最大。其《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之续》两篇文章，对诸如“不害日”、“秋射”、“使女”、“爰书”、“亭与传舍”、“家弟”等问题作了释读说明，澄清了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此外，他还有《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下)，对木简上所绘木偶、符箓的研究，考证精深，尤为后人所称道。

黄文弼于第一次蒙新考察期间(1927~1930年)，在罗布淖尔北岸发现了一座西汉烽燧遗址，出土了新疆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简牍，共有71枚，简文有“居卢訾仓以邮行”，正是《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所载的“居卢仓”。他采用逐简释文，随附考证的方式，对这批简牍作了考释，就汉朝在西域的职官，邮传、仓储等项制度以及往来交通、屯戍给养、地理、历日、器物、古籍残片，澄清了一些相沿已久的误说。这种从实物出发研究简牍制度的方法，是从考古学上研究简牍的最早尝试，虽然还不成系统，但却极具先驱意义[104]。

在这一阶段从事汉简研究的还有夏鼐，他于1944年在敦煌小方盘城等三处遗址中发掘了49枚汉简，写有《新获之敦煌汉简》，[105]作了精辟的研究，澄清了近

人将汉武帝征和年号释作延和的错误，并对王国维、劳干二人对于玉门关址的考证作了分析，提出玉门关的确切位置及设置年代的新看法，认为不可能有玉门关西徙之事。

除了上述学者外，其他致力于汉晋木简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资料的搜集和敦煌、居延简牍释文的补正，如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1934年)及《流沙坠简补正》(1935年)，金毓黻的《劳干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补》(1943年)，陈邦怀的《汉魏木简义证》(1934年)，容肇祖的《西陲木简中所记的"田章"》(1932年)等；二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进一步考证，如陈直的《汉晋木简考略》(1934年)，傅振伦的《汉武帝年号延和说》(1937年)，张维华的《汉置边塞考略》(1940年)及《汉河西四郡建制年代考疑》(1942年)等，都是这一时期简牍研究的重要成果。

对1942年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帛书的研究则有蔡季襄所作的《晚周缯书考证》(1944年)，该书临摹了帛书的图形与文字，并初步认定其性质为当时祷告神灵所用，开帛书研究之先河。

纵观第一阶段的简帛研究，在整理、考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尤其在西北历史地理研究和以简证史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罗振玉对简牍历谱的考释、对"小学术数方技书"的重视、对简牍书体在中国书法变迁上的认识。王国维对西北史地的考证，做到了简牍与历史学的紧密结合，他们所创立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黄文弼、夏鼐走出书斋，深入西北戈壁沙漠实地考察，根据简牍实物，结合文献记载，使西北史地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

由于战争的缘故，资料缺乏，致使无法进行连续系统、科学的探索，因此该阶段的研究工作尚有许多不足，可主要表现为：一、除居延汉简外，其他简牍和帛书都被外国人掠夺而去，因而学者研究大部分脱离了实物，只能依据照片，进行归类、整理、考证、释读，使得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束缚了研究的发展；二、简牍研究受考据学的影响，限于释文考证和个别文句的解释，孤立地分析问题，无法系统、全面地将大量简牍资料作归纳处理；三、简牍研究方法单调，与其他学科脱离；四、参与研究的人员较少，由于简牍大多出土于西北边境，加之多属断简残片，文字模糊不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价值。尽管有众多的局限，但是，王国维、劳干等人所开创的简牍研究，已经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更多简牍和帛书的问世，简帛学也在不断逐渐成长、壮大。

第二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简帛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首先表现为

资料的公布。1959年《居延汉简甲编》出版,收录了部分图版。1980年《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问世,公布了1930~1931年出土的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些原始资料的出版,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参与居延汉简的研究,包括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突破,考古学和古文书学的方法被引入简牍研究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如运用地层学方法对遗址的科学发掘,使得简牍的断代变得容易,进而对简牍的缀合也极为有利,特别适用于西北边地如敦煌、居延等地所发现的时间跨度较大的简牍研究。这一阶段以陈梦家、陈直的成就最为突出。

陈梦家原治甲骨卜辞和金文铜器,后转而研究居延汉简,他结合考古学的方法,对汉代边境防御及烽燧制度、官吏俸禄等问题作了疏证和考实工作,研究所及包括汉代职官、吏俸、量制、烽燧、地理、年历、简册制度等许多方面,共完成14篇论文,后结集成《汉简缀述》一书出版。[106]

另一位对居延汉简有精深造诣的是陈直[107],他融通先秦各种文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以证史籍之讹,先后写出《史记新证》、《汉书新证》、《敦煌汉简释文平议》、《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甲编释文订误》等。他的研究偏重于经济制度,如《两汉经济史料论丛》、《论居延汉简八事》等。在《论居延汉简八事》中,他指出若以曹魏屯田之制来衡量居延屯田,则纯为军屯性质,至于赵过之代田法首先推行于居延,而敦煌并未实行。他写的《居延汉简研究》[108]一书,包括居延汉简的综论、解要、释文校订、甲编释文校订、系年等五种,涉及汉代西北边地的屯田、烽燧、过所、戍卒、职官、律法等方面。其他如对汉代邮驿、名籍、天田、上计、秋射、葆官与直符等项制度的考证,也都颇有新意,可以说是一部全方位研究居延汉简的著作。

这一时期简牍研究成果还有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1954年)、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1957年)、沈元《居延汉简牛籍校释》(1962年)、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田卒簿籍》(1963年)、陈邦怀《居延汉简考略》(1964年)、于豪亮《居延汉简中的省卒》(1963年)等,涉及汉代的戍卒、边防防御、地方行政机构各个方面,推动了简牍研究的进程。

帛书研究,主要围绕长沙子弹库展开。1959年,李学勤发表《战国题铭概述》[109],将子弹库帛书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十三行的一篇是关于天灾禁忌及《月令》式的刑德思想;八行的一篇是涉及五行、四时及九州形成的神话;边图格式则与《山海经》相似。随后他又发表《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10]首先论定帛书边文的十二月名与《尔雅·释天》十二月名相关,从而指明帛书四周的十二图像象征

十二月神，神下注神名及职司，兼记该月禁忌。这两篇文章对楚帛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陈梦家写于1962年的《战国楚帛书考》，[109]是一部专门考证楚帛书性质的著作。全书分叙说和考释两部分，其中“叙说”部分包括：帛书的出土及其图文的结构、纪元前400年间的“月令”、帛书与月令内容的比较、帛书的年代、国别与性质、帛书的月名与三正等。他将楚帛书内容与公元前四世纪的“月令”比较，认为帛书的性质与《管子·幼官》、《周书·月令》、《王居明堂礼》、《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礼记·月令》、《洪范·五行传下》等书相近，因而推断帛书应属战国中期的楚国月令，而帛书四周十二章就其方位与内容来看，应是较早形式的月令。

除此之外，还有安志敏、陈公柔《长沙战国缯书及其有关问题》(1963年)、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年)等文章，综合各家摹本考释，侧重于帛书的具体文字和图像的释读，指出帛书的作用在于“呵护死者的灵魂”、“镇压邪魅”、“辟除不祥”等。这个时期，台湾的董作宾、严一萍、香港的饶宗颐、澳大利亚巴纳以及日本的林巳奈夫等人，对帛书也展开了研究。与简牍研究相似，这一阶段的帛书由于实物流散海外，各家的摹本考释皆不尽相同，只能泛泛论及，无法做深入的研究。

综观这40年的研究状况，简牍整理方面以《武威汉简》最为突出，[110]在著录方式上立下了新的里程碑。武威汉简是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的一批竹木简，内容以《仪礼》为主。该书分叙论、释文、校记、后记、摹本、图版六部分。叙论清楚地叙述了简册出土的情况，整理的经过以及这批材料对了解汉代简册制度和经学的价值。校记以简本与今本对照，见其异同。释文说明置于校记之中，尽可能使释文外观接近原简形貌。摹本据原简形式临摹，编次同于释文。该书除释文和照片外，还有完整的摹本，并且对释文、摹本和照片的体例都有详细的交待。它的出版为古代文书著录立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20世纪70年代，全国各地相继出土了一大批简牍和帛书资料，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定县汉简等，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涉及范围更加广阔，可以说是简帛的大发现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导致科研工作严重滞后，受影射史学的影响，简帛研究为政治服务，领域局限于儒法斗争，因此，除了在文字释读方面有一定的进展外，其他研究乏善可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以陈梦家为代表，在研究方

法上略有创新，但是总体说来，并没有突破前一阶段的局限。

纵观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简牍和帛书的出土数量剧增，特别是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帛书的发现，更是简帛学研究史上的空前盛事，尽管研究只停留在释读整理阶段，但学者们对其潜在的巨大价值已有了充分的认识，为下一个阶段简帛研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受当时史学界主流观点的影响，简帛的经济史研究较前有了进展，比如对屯田制度的研究等。三、简帛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过分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研究，而对于简帛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尚未得到揭示，如医学、宗教文化、书法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甚至是一片空白。

第三阶段 此阶段的研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学术界拨乱反正，逐渐走向正轨，简帛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伴随着简牍和帛书的不断出土，如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简牍、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学术界也日益认识到简帛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大量战国时期楚简的出土，为研究先秦学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研究高潮。

这一阶段标志性成果之一是居延汉简研究跃上了一个台阶。首先是居延汉简资料的公布完备。1980年，《居延汉简甲乙编》一书出版，发表了1930年出土的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资料，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的研究，均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外，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一书，[19]第一次公布简牍的全部图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1998年，台北出版了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

其次，考释工作更加严谨准确。《居延汉简甲乙编》虽然改正了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甲编》两书释文中的许多错误，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甲乙编》问世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文章，如裘锡圭《汉简零拾》(1981年)、《〈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正、续共8篇)(1982年)，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居延汉简释地》(1981年)、《释居延汉简中的草书》、《居延汉简丛释》，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1982年)、《〈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评议》、《〈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质疑》(1983

年)等,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

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以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对照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以《居延汉简甲乙编》的释文为底本,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1991年在中国举办的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裘锡圭著文《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就如何准确释读汉简文字方面的问题,做了精采的发言,并归纳出:一、应该注意不要释错草体字;二、应该注意不要释错古体别体;三、应该注意不要误合二字为一字或误分一字为二字;四、应该注意残片的缀合;五、应该注意通用字的原形;六、应该注意文义等六条,为简帛文字的准确考释总结出有规律可循的意见。

另外,薛英群著《居延汉简通论》,将历史、地理、考古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简牍的分类整理、汉代屯田、符传及赋税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方面,都有创获,是居延汉简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随着简帛数量的不断增多,在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逐渐深入。资料方面先后出版了《武威汉代医简》、《睡虎地秦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楼兰尼雅文书》、《包山楚简》、《敦煌汉简》、《望山楚简》、《战国楚简汇编》、《云梦龙岗秦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墓竹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二、三册)等一大批简帛整理成果。

同时简帛研究人员也在扩大,出版的专著也一年比一年多,还发行了专门刊物《简帛研究》、《简牍学研究》等,各种学术会议相继召开,有力地推动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档案学,乃至古文字、语言、音韵、训诂、天文、历法、数学、医药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了海峡两岸和中外学术交流。

20世纪70年代后发现的简帛,基本上有两类:一是中国西北地区烽燧遗址和内地墓葬中出土的简牍,主要内容为边塞屯戍和郡县的文书档案记录及日常应用的文字,大多零散,完整的并不多;一类是各地战国秦汉墓葬中出土的简牍和帛书,主要内容为墓主随葬的遣册和墓主生前喜好的书籍、簿册等,这些陪葬之物,内容完整,抄写正式,多属经籍范畴。在这两类研究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成果,主要有《云梦秦简研究》[13],收集了于豪亮《秦简中的奴隶》、《秦简〈日书〉记时

记月诸问题》,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裘锡圭《啬夫初探》,高敏《秦汉时期的亭》以及其他学者撰写的秦简专题论文18篇,并附有云梦秦简资料、论著目录,是全面深入研究云梦秦简的高水平论著。《汉简研究文集》收录了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考略》和《居延烽火考述》,吴礽骧《汉代烽火制度探索》,薛英群《汉代官文书考略》,任步云《甲渠侯官汉简年号朔闰表》,黎泉《汉简书体浅析》,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等15篇文章,内容包括某些新发现简册的考释与探讨;汉简中某些问题的专题与综合研究以及汉简某些资料的辑补等,代表了汉简发掘、整理和研究的新水平。《秦汉简牍论文集》则收录了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释文及何双全的考述和薛英群、李学勤、谢桂华、李均明、侯灿、张俊民、高大伦等人的研究论文,并附有简牍论著目录,全面反映了80年代简牍学的研究成就。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简帛学研究呈现更为繁荣的局面,简帛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等。刘书根据照片对校释文,改正错误,补充注释,广泛征引与数术有关的资料,对《日书》的数术涵义加以阐释,并探讨了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年代、内容与性质、《日书》甲种与乙种的关系、《日书》所见秦楚社会现象、祭祀活动、所反映的阴阳五行学说、原始疾病观念以及《日书》与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等问题,收获甚丰,是秦简出土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日书》的著作。陈伟《包山楚简初探》在详细考释古文字的基础上,对简文所体现的楚国制度作了系统的考察分析,尤其深入讨论了文书制度、地域政治系统、身份与名籍以及司法制度等问题,还对当时楚人的卜筮、祷祀以及丧葬方面的一些习俗也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尹湾汉墓简牍综论》[116]收录有裘锡圭《神乌傅(赋)初探》、谢桂华《尹湾汉墓所见东海郡行政文书考述》、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等尹湾汉墓简牍的研究论文近三十篇,涉及简牍的发掘、保护、整理、考释等工作,从多角度、多层面对这批珍贵文物进行了论述,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李均明、刘军合著《简牍文书学》,对简牍文书的质材、文字、符号、版面及文体、稿本、分类均作了较详尽的考述,着重对书檄、簿籍、律令、案录、符券、检楬等六类文书中的具体文种举例说明,揭示出文书行政的内在联系,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简牍文书的一般规律,是进行简牍乃至相应时代历史研究的基础。

90年代后期至后来的十年中,郭店楚简、上博藏楚竹书、尹湾楚简等方面成了讨论的热点。

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学者的极大关注，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108]一文指出，郭店楚简内容反映了孔子后儒家向内求学的为学之路，其着眼点不是外在的天道或天命，而是天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给人以命令和命运。这一主题奠定了思孟学派的基本思想格局，一直影响到后来，意义重大。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采用义理与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09]，对郭店楚墓竹简中的重要篇目作了深入研究，认为简书是战国中期以前作成或传抄的儒道著作。郭沂所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110]将郭店竹简放在整个先秦学术思想的大背景中间来考察，由此构建先秦学术思想体系框架，甚至联系到古史重建的问题。作者把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微观与宏观、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目光犀利，视野广阔，见解独到，是郭店楚简研究的最新成果。[111]

上博藏楚国竹书的陆续推出，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112]对其进行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字释读、竹简复原、思想文化研究等方面。其中，《孔子诗论》、《容成氏》、《缁衣》等部分又是争论的焦点。[113]文字释读方面，陈伟对楚竹书(二)中《子羔》、《昔者君老》和《容成氏》三篇多处文字作了考释。罗运环论文《区别符号与贤、安二字的简化写法》和李零的校读记等对校理文字多有贡献。思想文化方面，多集中于对《孔子诗论》、《民之父母》等篇章的研究，饶宗颐、李学勤、朱渊清、周凤五等均有论文发表。[114]

子弹库帛书研究方面，李学勤、曹锦炎[115]、何琳仪[116]、饶宗颐[117]、李零等都有显著的成果。李学勤《长沙楚帛书通论》一文[118]，根据帛书内容，分类编次，确定三部分次第是正书八行为第一篇，倒书十二行为第二篇，其后为四周的一篇。按照帛书的内容加了篇题：分别为《四时》、《天象》和《月忌》。另一位对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有精深研究的学者是李零，他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一书，[119]楚帛书的结构、内容与性质，释文考证等方面，对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一些独特新颖的观点。尤其是释文考证部分，旁征博引，澄清了学术界关于楚帛书的种种误解。此后，他又写了《楚帛书的再认识》，[120]楚帛书的来历、种类和形制、图像、文字，对楚帛书作了全面的探讨。此后，又发表《〈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补正》一文[121]，对1985年以来楚帛书的研究成果作了补充说明，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他的研究代表了目前子弹库楚帛书研究的最新成果。

马王堆帛书的研究，主要有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22]一文，该文从考古学、

文献学的角度研究《周易》,说明《易》的渊源非常久远,它本来是卜筮之书,古人由卜筮的奇偶、阴阳,逐渐抽象推衍出玄深的哲理。指出《易》学的真正创始人恐怕应该是孔子。因此,自战国以下,《易》即有两个传统,《汉书·艺文志》分别系于"六艺"、"数术"二略,而有的书籍则统称为哲理之书。邢文的《帛书周易研究》可以说是研究帛书《周易》的集大成之作[128]。全书包括三部分:上篇讨论《周易》的文献特征;中篇研究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并从卦序入手,考察了今本《说卦》三章的文献学问题,揭示出清人易学中所发掘的帛书卦序研究。

由于帛书《老子》抄写时间早,较多地保存了《老子》原来的面貌,它的出土,解决了许多章节中历来争论的问题,因此刊布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高亨、池曦朝的《试谈马王堆帛书〈老子〉》一文[129],认为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且不分章,多用借字,是两种不同的传本,可以订正今本章次文字之误。庞朴的《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130],指出思孟五行说为"仁义礼智圣",解答了久讼不已的思孟五行说的具体内涵。他又将《思孟五行新考》等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了《帛书五行篇研究》。[131]到目前为止,已有几种关于帛书《老子》的校释著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高明所著《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作为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高明此前曾发表《帛书老子甲乙本与今本老子勘校札记》(1978年),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对一些疑难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认识,是帛书老子研究的最新成果。

另外,《战国纵横家书》[132]、天文学著作《五星占》[133]、以及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等也有许多研究成果[134],限于篇幅,此处略而不谈。

2001年,正值简帛发现100周年的纪念时期,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简牍集成》,共三辑23册,囊括甘肃、内蒙古、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四川、青海、新疆等省区出土的所有简牍资料,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聘请李学勤、裘锡圭、饶宗颐等为学术顾问,由初师宾任主编,李均明、吴九龙、吴礽骧、何双全、宋少华、谢桂华等为副主编。该巨著释文准确,具有权威性。全书第一辑12册已经出版,其余各册也将陆续问世。《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所录内容十分广博,涵盖墓葬、屯戍和收集的散简,包括文书、簿籍、档案和书典等内容,它的编辑出版,不仅从内容上给予广大读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全面的珍贵原始资料,同时还从使用者角度充分地对全书进行整体的文字整理、标点和注释,尤其是对当时历史时期的特定用语、习惯用语以及口语文字所做的考证性释解,扩大了简牍原

始资料的使用价值填补简牍学研究的史学领域的空白，是中国又一新成果。

注释：

① 除了参考本章相关内容外，请参看《甲骨学100年》，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沈颂金《20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李玄伯(李宗侗)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载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一册下编。

③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安阳发掘报告期2，第405~410页。

④ 李济(1896~1979年)，字济之，现代考古学家。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成为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李济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曾多次主持殷墟科学发掘，他所领导的这些发掘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田野工作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后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主编《中国考古报告集》，对20世纪30年代的殷墟发展，包括建筑遗址、墓葬、青铜器、陶器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主要著作还有《古器物研究专刊》、《西阴村史前遗存》等。

⑤ 石璋如(1902~2003年)，河南偃师人。参加了20世纪30年代的12次殷墟科学发掘，在老一代考古工作者中，他参加的次数最多，被称为殷墟发掘的"活档案"。50年代又在台湾各地开展考古活动，足迹踏遍台湾各地。晚年他开展学术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十多部著作。

⑥ 郭宝钧(1893~1971年)，现代考古学家，字子衡。1928年参加殷墟的第一次发掘。他毕生从事商周时代的考古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过山东、河南等地多处商周和战国遗址的重要挖掘。对西周时期的埋葬制度、礼器制度、青铜武器和玉器的综合研究有积极贡献。主要著作有《山彪镇与琉璃阁》、《中国青铜器时代》、《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

⑦董作宾(1895~1963年)，字彦堂。著名甲骨学家。河南省南阳县人。1923~1924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1928~1946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董作宾的学术论文共计约二百篇，内容除甲骨学外，涉及商代历史的许多方面。世界书局和艺文印书馆出版有《董作宾学术论著》(1962)和《平庐文存》(1963)两种。1978年，艺文印书馆又出版有《董作宾先生全集》，分甲、乙编，凡12册。代表作为《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3)、《殷历谱》(1945)等。

⑨ 在甲骨学研究领域，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是贡献最为突出的四位学者，他们的名号中都有一个"堂"字(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字彦堂)，因合称"甲骨四堂"。

⑩ 唐兰说："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⑪ 唐兰(1901~1979年)，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任教，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研究员、副院长等职。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他在研究古文字学、文字学以及古代史、青铜器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他主张把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机地联系起来。此外，他于音韵学、诗

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主要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壤阁甲骨文存》、《中国文字学》等。

⑫ 胡厚宣(1911~1995年)，甲骨学家、史学家。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殷商文化研究会筹备主任，《甲骨文合集》总编辑等。他致力于甲骨文和商史的研究，在搜集和著录甲骨文方面，创立了分期分类的编纂体例，开辟了甲骨文著录的科学途径。他的主要著作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来熏阁书店1951年版)、《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来熏阁书店1951年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甲骨续存》(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以及《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论著目》等等。

⑬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徐中舒序，上海书店1989年版。

⑭ 于省吾，辽宁海城人，古文物和古文字学家。他的《双剑誃殷契骈枝》共考释文字一百多个，是同辈学者中的佼佼者，他总结自己考释文字成果的专著《甲骨文字释林》，共考释前人所未识或已识而不知其造字本意的甲骨文字三百个左右，达到了当代古文字研究的高峰。于省吾通过古文字研究商史，为我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⑮ 杨树达(1885~1956年)，汉语语言文字学家，号积微，湖南长沙人。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教学。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30年代发现形声字声类有假借现象，并收集到声联义的例证数百条。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二十余种；撰有《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说中国语文之分化》论文百余篇。

⑯ 《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滕固翻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⑰ 《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1932)、《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1948)，见《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⑱ 详细见本节“郭沫若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的贡献部分”。

⑲ 王国维在第一版序中指出：“其书祖述中丞(吴大澂)，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

⑳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出版附记》，齐鲁书社1979年版。

㉑ 本书1933年由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了注释与校语，更换了部分的拓本和照片，并且还编制了索引，由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㉒ 参看胡厚宣《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沈之瑜《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郭沫若与中国史学》(林甘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下编第十二部分。

㉓ 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七、八册)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㉔ 关于郭沫若的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贡献，参看《郭沫若与中国史学》(林甘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下编第十三部分。

㉕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册)，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郭沫若与中国史学》(林甘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下编第十四部分。

㉖ 虽然于省吾主编过一套《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版)，由于此书对于甲骨文字诸种解释收录不全，所以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㉗《甲骨文编》与容庚的《金文编》并列为甲骨学、金文学研究领域中最为权威的单字著录字典。

㉘ 另外，金祥恒著有《续甲骨文编》，补充了《甲骨文编》旧版，1959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印行出版。金氏将徐氏《说文》的小篆和解说，另立一行，放在每字之前。使得眉目更加清晰。这是和《文编》略有不同的地方，也是一种进步。因为出版较早，所收材料自然要少些，最好是将两部书合起来看，比较全面。

㉙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

㉚《释羌、苟、敬、美》，参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3期。

㉛ 1938年，中华书局，1962年重版。

㉜ 辅仁大学讲演集第2辑，1941年；又，《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㉝《文史》1963年第2辑。

㉞《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4期。

㉟《积微居甲文说》、《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卜辞琐记》四种著作被统一收入《杨树达文集》第五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㊱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

㊲ 此部分主要依据《甲骨断代学（甲篇）》(1951年)、《甲骨断代与坑位——甲骨断代学丁篇》(1951年)、《殷代卜人篇——甲骨断代学丙篇》(1953年)和《商王庙号考——甲骨断代学乙篇》(1954年)等一系列论文。

㊳ 陈梦家所提出的“三个标准”：“第一标准”是世系、称谓和占卜者；“第二标准”是字体、词汇、文例；“第三标准”是祭祀、天象、年成、征伐、王事、卜旬。“综合分类法”中，“九期”是将甲骨文从武丁以后分到每个王下，“五期”是董作宾的五期说，“三期”是分为早、中、晚三个大概时期。

㊴ 鉴于贞人对于甲骨分期断代的重要价值。除了上述董陈二人之外，还有学多学者致力于贞人的整理与发现。著名的有日本的岛邦男和香港的饶宗颐，其中，饶宗颐在1959年出版《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共考释发现贞人142位(其中“附”4人，“备考”者20人)，并将贞人所参加的活动分项加以论述。不过，现代学者对于贞人以及断代的认识还不尽相同。可以参看孟世凯《甲骨学小辞典》附后的“各家所定甲骨卜辞贞人时期表”和殷涤非《商周考古简编》附后的“各家所定甲骨文卜辞贞人时期表”。

㊵ 详细内容可参看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㊶ 此处三组甲骨主要是指集中著录于《甲骨文合集》(第七册)中作为“第一期附”的甲、乙、丙三组卜辞。另外，还有“文武丁卜辞”(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序)、“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李学勤《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多子组卜辞”和“王族卜辞”(贝冢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等名称。

㊷ “历组卜辞”即是指“五期”分法中属于第四期(武乙、文丁)的甲骨文字较大而细劲且具有贞人

"历"的一组甲骨卜辞。具体可以参看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陈炜湛《"历组卜辞"的讨论与甲骨文断代研究》。

㊸ 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5期),《殷墟甲骨分期新论》(《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㊹ "两系说"首先由李学勤在1978年第一届古文字讨论会上提出。详见李学勤《殷墟甲骨两系说与历组卜辞》(《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8~99页),林沄《小屯南地甲骨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

㊺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1页。

㊻ 陈梦家(1911~1966年),原籍浙江上虞,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转而致力于古文字和历史。他在甲骨学、西周铜器断代及简牍研究等方面多有创见。其论著主要有《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在古史和文字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㊼ 何天行:《陕西曾发现甲骨之推测》,《学术》(第一辑),1940年2月上海出版。

㊽ 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㊾ 参见《长安张家坡村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11页。先后共发现三片有字甲骨,共刻有30字。其中,一块肩胛骨柄部卜兆附近并刻有极细的两行文字,一竖行,一横行;一块兽类肢骨上部相当于钻孔的正面,也刻有字划极细的文字。

㊿ 参见《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遗址共出土有字甲骨五片,共有13字。第一批有字卜甲两片,分别刻有"贞"和"不止"等字;第二批有字卜甲三片,分别刻有"其祀"、"其尚上下韦驭"、"央告"等字。

(51) 《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琉璃河考古队,《文物》1997年第6期。发现有字西周甲骨三片。其中一片刻有"成周"二字。

(52) 《巢湖出土一批西周甲骨》,新华社,《人民日报》1986年8月3日。

(53) 《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参加第三届环渤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报告集》(《文物春秋》增刊),1992年8月。

(54) 《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25日第一版。

(55) 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

(56)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57) 王宇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首先对甲骨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研究,出版了《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甲骨学通论》、《甲骨学一百年》等。特别是《甲骨学100年》(与杨升南合著)是一部长达123万字的宏篇巨作,全面论述了甲骨文发现、发掘和研究的历史及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史的成果,是甲骨文发现100年来,甲骨学商史研究集大成之作。其次,他利用甲骨文资料开展殷商史的研究,包括商政权的形成和发展、职官、战争、田猎、畜牧业、农业等方面。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文字的考释等方面,也颇有成就。他参加编辑的《甲骨文字诂林》广泛收集甲骨文发现和开始研究以来,直到80年代末90年间有关甲骨文字考释的研究成果,加以全面的分析总结,明辨是非得失、最后提出结论性的意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西周甲骨研究方面他也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可喜成

果，发表出版有关论著达15种之多。

㊽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㊾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㊿ 详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208~248页。

(61) 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第74~75页。

(62) 王玉哲：《陕西周原所处甲骨文的来源试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63)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64)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5) 徐中舒：《周原甲骨文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集)1982年5月。

(66) 高明：《略论周原甲骨文的祖属》，《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0期。

(67) 田昌五：《周原出土甲骨文反映的商周关系》，《文物》1989年第10期。

(68) 杨升南：《周原甲骨祖属考辨》，《殷都学刊》，1987年第4期。

(69) 二人著作，见上所引。

(70)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71) 《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年第6期。

(72)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79~1984年共出版四辑，本书选录陕西省解放后出土的从商代至战国的青铜器，是一部供科学研究用的资料性图录。全书共分六册，按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分地区编排。

(73) 《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本书将河南省解放以来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按照时代分地区汇编为三册。第一册为商代；第二册为西周、春秋；第三册为战国。

(74) 《云南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本书介绍的是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全书共有图版249幅，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和镂花饰物分类编排。书中说明对图版作了分析和考证。还附有张增祺等撰写的《云南青铜器概说》一文，根据古代文献辑录了一个年表。书后附英译序言和英译图版目次。

(75) 《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是关于殷墟青铜器研究的一部学术性著作。收录建国以来殷墟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二百余件。

(76) 张廷皓、王建琪：《盛世吉金——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

(77)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分主册与附册。主册包括前言和青铜器器形的彩色照片100幅。前言提出青铜器分期标准，简述青铜器发展历史，为：育成期，即商代早期；鼎盛期，商代晚期至西周昭王时；转变期，西周穆王至春秋早期；更新期，春秋中期至战国、秦；衰退期，上自西汉下迄东汉末。附册对所录的100件铜器也按历史时代分类排列。每器皆作扼要说明，除有器物图像外，重要者还附纹饰拓本。所录系上海博物馆藏品，而且绝大部分是青铜器中的精品，有丰富多采的艺术风格。

(78) 有关二里头文化与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分期问题，可以参考如下论文：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第4期；《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安金槐《对郑州商代二里岗青铜容器分期问题的初步

探讨》,《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等。

㊴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㊵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㊶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

㊸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编:《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春秋战国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002年版。

㊹ 有关《殷周金文集成》的编辑工作,参看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364页。

㊺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1948年第3期。

㊻ "康宫"是西周金文中习见的宗庙之名,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一。但进入春秋以后,这个名词不再被发现,文献中也缺乏记载。因此,种种争论亦由此而起。争论首先开始于由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王氏在《明堂庙寝通考》中提出"康宫为康王之庙说",罗振玉在《令彝考释》(此字见《金文断代方法探微》39页)中,考释自己收藏的令方彝,直接采用王说。鉴于令方彝铭辞的重要性,特别是与不少铜器的断代研究有关,因此后来有许多学者对此器重新考释,其中康宫是否是康王之庙问题一再被提起。概而言之,康宫的性质主要有死人宗庙说、生人宫室说二种。

㊼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年第9、10册,1956年第1~4期。发表的是未完稿。

㊽ 王世民、陈公柔等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古历定朔推步综述》,《天文学进展》1996年第1期;《西周年代历法与金文月相纪日》,《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天再旦与日食》,《地球物理学进展》1998年第1期;《吴虎鼎铭纪时讨论》,《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天再旦"日食与世界时改正数ΔT》,《科学通报》1999年第19期;《《大衍历议》与今本《竹书纪年》》,《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逐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

㊾ 朱凤瀚、张荣明主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㊿ 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3期,上海古籍出版社。

(91) 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

(92)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版。

(93) 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

(94) 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2期。

(95) 参见《〈汗简〉〈古文四声韵〉》前言,李零、刘新光,中华书局1983年版。

(96) 《说文古籀补》(吴大澂)前言,中华书局1988年版。

(97)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7~9期。

(98) 朱德熙(1920~1992年),语法学家、古文字学家。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汉语语法研究、古文字研究等方面。在古文字研究方面,著有《寿县出土楚器铭文初步研究》、《洛阳金村出土方

壶之校量》、《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战国文字研究六种》、《信阳楚简考释》、《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初步研究》以及《朱德熙古文字论集》等。他对古文字的考释与研究常结合语法来进行，在分析古文字的字形、意义之外，还考察古文字的语法地位与作用。

⑨⑨ 详见《朱德熙古文字论集》，裘锡圭、李家浩选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⑩⓪ 战国文字研究的情况，参见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25页。

⑩① 劳干的释文发表后，不断有学者进行补正。主要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分别于1959年、1981年出版；《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则结合新出土的居延汉简，在释文准确性上又有显著提高。

⑩② 劳干：《两关遗址考》，《劳干学术论文集》，台湾艺文印书馆。

⑩③ 马衡：《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见《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1页。

⑩④ 黄文弼：《罗布淖尔汉简考释》，收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375~408页。

⑩⑤ 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考古学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289页。

⑩⑥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⑩⑦ 陈直的研究成果结集为《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

⑩⑧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⑩⑨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9期。

⑪⓪ 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文物》1960年第7期。

⑪① 陈梦家：《战国楚帛书考》，《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⑪② 《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

⑪③ 《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一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侯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侯官所辖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其他地方发现的散简281枚，合计8409枚。

⑪④ 《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⑪⑤ 《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⑪⑥ 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⑪⑦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⑪⑧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⑪⑨ 关于郭店楚简的研究情况，请参看沈颂金《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郭店楚简研究综述》、《国外学术界郭店楚简研究述要》，收入《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582、688~703页。

⑫⓪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二、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4年版。

⑫① 朱渊清等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⑫② 关于近几年来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研究，请参看沈颂金《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研究概述》，收于《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2~648页。

⑫③ 曹锦炎：《楚帛书〈月令〉篇考释》，《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⑫④ 何琳仪：《长沙楚帛书通释》，《江汉考古》1986年第1、2期。

⑫⑤ 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象——三首神、肥遗与古印度神话之比较》，《故宫季刊》第3卷第2

期,1968年;《楚缯书疏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1968年;饶宗颐、曾宪通合著《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

⑫⑥ 李学勤:《长沙楚帛书通论》,收入《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

⑫⑦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⑫⑧ 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1994年第10期。

⑫⑨ 李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补正》,《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⑬⓪ 李学勤:《周易经传的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

⑬① 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⑬② 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帛书〈老子〉》,《文物》1974年第11期。

⑬③ 庞朴:《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

⑬④ 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

⑬⑤ 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文物》1975年第2期;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章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文物》1975年第4期;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⑬⑥ 席泽宗:《中国天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现———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席泽宗《一份关于彗星形态的珍贵资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1978年第2期;顾铁符的《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内容简述》,《文物》1978年第2期。

⑬⑦ 湖南省博物馆、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导引图的初步研究》、《从三种古经脉文献看经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均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马继兴、李学勤《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物》1975年第9期;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七章　海外学者有关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

中国古文字学在海外的研究，大都被纳入“汉学”的范畴。

何谓“汉学”？“汉学”的英文是“Sinology”，目前学术界似乎仍没有统一的说法。广义的汉学是指有关于“中国”的一切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中国边疆及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狭义理解的“汉学”应该是相当于中国人所谓“国学”(中国传统以及学术)的范畴，但是这种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国外学者，因为国外学者所受的教育与文化熏陶异于中国文化，因此他们的研究必然受制于本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则以“局外”研究者的角度进行思考与研究，当然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因此这门“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被称为“汉学”，或是“国外汉学”，以区别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广义的汉学研究中，古文字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甲骨文、竹简、青铜器的大批发现，随着众多西方探险家频繁而来，为海外研究者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1950年代为界，20世纪的海外研究汉学以及中国古文字分成两个时期。前期着重探讨古典汉学对甲骨文、金文、简帛等方面的研究；后期侧重叙述日本、美国、台湾、香港等学者在古文字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

第一节　20 世纪前期的相关研究

明义士的甲骨学研究[②]　1910年，时值25岁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奉加拿大长老会之命，来中国豫北地区传教，驻地在河南安阳。安阳是三千多年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殷商王朝后期的首都就位于今安阳市西北不远的洹水岸边、小屯村及其附近一带。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仅当年登楼自焚的纣王早已烟消灰灭，昔日繁华的王都也已埋在黄土之下，成了“废墟”。

明义士对中国古代文化极其倾慕，在传教之暇，潜心搜集和研究殷墟出土的

明义士所藏甲骨片

甲骨文、铜器和玉器等古代文化珍品。并且利用回国的机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理论和实际发掘的学习。

他最初收购甲骨被当地人以假充真而受骗上当之事,是甲骨学界所熟知的轶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面对一堆腐臭发霉的假甲骨并不气馁,而是不断比较、分析、总结,终于"登堂入室",成为甲骨辨伪的行家里手和早期搜求甲骨的大家。

1917年,明义士在上海出版了《殷虚卜辞》一书。这是他从所收集的甲骨中选出2369件经过研究后编成的。这是一部以出土甲骨史料的拓片为中心内容的著作,至今仍是甲骨学研究的基本参考著作之一。明义士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此时他已收集到甲骨五万片。另外,他还出版了《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1935年)、《表校新旧版〈殷虚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1933年)等书,在甲骨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宁唯是,他还为外国学者的著作,诸如方法敛、白瑞华的《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939年)进行过鉴定真伪的工作。明义士通过刻苦自学,终于成为一位学识渊博的甲骨学家,1931年,史密森学会的年度报告发表了他的《商代文化》。次年,他被聘为齐鲁大学的考古学教授。

1933年,他又出版了《甲骨研究初编》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甲骨学专论的著作。同年还出版了《中国商代之卜骨》一书。

明义士在甲骨学上最大的贡献是:第一个研究出一套鉴别出土甲骨真伪的方法,使得甲骨文研究科学化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得到了李济的肯定。他在甲骨缀合、甲骨分期、商代青铜器和上古中国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以甲骨文字形、称谓为根据对甲骨文字进行了分期,如他指出:"在此时代中之兽骨,未有称'祖己'为'兄己'者,其字形为大。小乙之所以称为'小乙'者,乃其孙之称。因其先祖中已有'祖乙'之称在祖庙中也……属于祖庚时代。"[③]这一论述发展了王国维所开创的称谓分期标准。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明义士回到加拿大。1938年开始在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工作。当时中国战火纷飞,安阳的发掘也已停顿,但加拿大此时尚远离战争,明义士得以继续他的研究,同时他进入多伦多大学攻读相关学科,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早期的的历史,1942年完成的研究商代兵器的博士论文《商戈》,是其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代表作。

明义士收集的甲骨,运到加拿大去的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在抗日战争开始

明义士发表在1928年1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的文章一角，编者在为这篇文章加的按语中说：以外人而具科学兴趣考察殷虚遗迹的，要以本文作者为第一

时送到南京使馆，后由南京博物馆保存，有2390片；一部分埋藏在齐鲁大学，计万余片，1952年清理时发现，多已腐烂，后归于山东文物管理部门。

1960年，明义士的夫人和子女，将他的各种收藏品，包括刻有文字的甲骨4700件，没有发表过的甲骨文拓片2812件，悉数移交多伦多大学。安大略博物馆许进雄教授积十载之功，编成《殷虚卜辞续编》卷一、卷二，分别在1971年和1977年由安大略博物馆出版。明义士原已编有初稿的《殷虚卜辞后编》也经许进雄整理编辑，于1972年由台北的艺文印书馆出版。1917年在上海出版的《殷虚卜辞》，亦于1972年由艺文印书馆重印。至此，明义士所收藏的甲骨的精华大部面世。

反映明义士成果的代表作是《甲骨研究》。[④]此书中关于早年甲骨文出土和流传情况的记述，较为可信，历来为学者所重视。众所周知，早年甲骨的收藏大家，多为身居京师的达官贵人。他们的藏品，多通过古董商之手购得，除罗振玉之弟罗振常等人外，鲜有人亲赴安阳考察。而明义士则不然。他自1910年来华传教的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安阳度过的，与罗振常等走马观花式的考察殷墟大不相同。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获得甲骨出土与流传的最新信息”。[⑤]明义士多年在安阳滞留，“因‘身临其境’而了如指掌，故所著《甲骨研究》记载最为准确、详赡和具有权威性”。[⑥]明义士有关甲骨文发现情况的记载，与刘鹗、罗振玉、王襄等人在公开出版著录中的记述相印证，说明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无庸置疑。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1933年《甲骨研究》石印出版，历时三十余年。此书主要反映了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前的甲骨早期阶段的研究水平。《甲骨研究》既谈到甲骨的用途及整治、卜法，也谈到了甲骨文的内容和价值，并详列了甲骨文的出土、收藏、著录和研究的情况。特别是第八章商代帝系，先以王国维论商先王为准，再以帝名、《殷本纪》、《三代世表》、《古今人表》、卜辞等项列表对照，然后将商远祖、先公、先王名及有关卜辞列出，加以考证。这一叙述全面反映了当时学者对甲骨文中商王王名的研究水平。因此可以说，《甲骨研究》是一部甲骨学

早期阶段研究的总结,它和董作宾的《甲骨学五十年》、《甲骨学六十年》等著作一样,推动和指导了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是研究甲骨学发展史的重要著作。

《甲骨研究》一书,在总结1899年至1928年前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时,将这三十多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书中谈及甲骨文的"收买者"时,以罗振玉以前的收藏家为"前段",而罗振玉及其后的收藏家为"后段";在介绍甲骨学研究的"出版品"时,前一段自《铁云藏龟》(1903年)为始,后一段则以罗振玉的《前编》(1912年)等书出版为标志。在1928年以前的甲骨文"非科学发掘时期",正是罗振玉的收藏、研究,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实现了从前段向后段的前进。因此可以说,罗振玉和王国维及其弟子的甲骨学研究——罗王之学,是1928年以前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因此,《甲骨研究》以罗振玉作为当年甲骨学研究发展前段和后段的分水岭,是非常公允和科学的。⑦

林泰辅的甲骨学研究 林泰辅是日本近代汉学研究的先驱人物之一,又是日本甲骨学研究的泰斗。1887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东京大学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899年,王懿荣首先发现了甲骨文,随后学者们逐渐确定了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这一时期林泰辅接连发表《关于周代书籍的文字及其传来》、《周代金石和经子史传的文字》、《关于清代河南省汤阴县发现的龟甲牛骨》等论文,详细考证了出土甲骨史料在文字学和上古史学上的可信度等问题,充分肯定了甲骨史料的学术研究价值。

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曾说:"罗振玉先生读了此论文后深受震动和刺激,他开始发愤地研究起甲骨史来,以后作出了著名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⑧

1914年,林泰辅以《商代汉字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是林泰辅进行甲骨学研究的第一部代表作,仅比孙诒让《契文举例》晚了十年,是与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基本同时流行于世的著作。

1915年,他又发表第二部著作《周公和他的时代》。王国维读后,回信给予盛赞。1921年,他出版了第三部著作——二卷本《龟甲兽骨文字》。此书对出土的甲骨文字史料进行分类汇编,是国际甲骨学界、日本汉学界进行科学化甲骨学研究的先驱之作。另外,他还有六卷本的《龟甲兽骨文字表》,可惜至今仍未出版。

在他的学生中,贝塚茂树继承了他的甲骨学研究,诸桥辙次继承了他的文字学研究。日本甲骨学界正是因为有林泰辅的甲骨学开创之功,才造就了贝塚茂树、岛邦

男、赤塚忠、伊藤道治等后继者，才可以有20世纪日本甲骨学研究集大成者——白川静及其甲骨学著作的诞生。

高本汉、安特生的青铜器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进行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研究始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9]，而此前的金文研究者往往仅注意铭文的史料价值。1934年，高本汉写出《早期中国的青铜镜铭》(Early Chinese Mirror's Inscriptions)，开始论证有关青铜器年代、分期与产地等问题。

1936年，他出版《殷周青铜器》(Yin and Chou in China Bronzes)一书，1937年，又出版了《中国青铜器研究新探》。张静河对这两部书评价道："把青铜器研究和古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加以论述，借助古汉语理论解决了青铜器中存在的问题，如年代问题、分期问题和产地问题等。"[10]

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说安特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对中国考古学的产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1]除了在地质学、考古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外，他在青铜器方面也有精深的研究。

他首先对中国古代青铜器与奥尔都斯(ordos)青铜器制作风格上的一致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中国大量出土青铜器的时候，当时汉学界的许多学者，特别是日本汉学界和法国汉学界，对青铜器的制作年代有所怀疑，这是因为在制作风格上它们与奥尔都斯青铜器风格上接近，在铭文内容上又与汉唐诗文接近。

在高本汉博士肯定了青铜器铭文真实性的前提下，安特生对青铜器进行了研究。1933年，他发表了《精选奥尔都斯青铜器》(Selected Ordos Bronzes)一文。在论文中，他指出：所谓奥尔都斯青铜器是指在亚洲和欧洲交接地区出土的一种青铜器，在制作风格上与中国出土的青铜器相近。这是因为当时奥尔都斯人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个观点，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得到了国际青铜器学界的肯定和赞同。[12]

1935年，安特生又出版了《古代中国的金匠》(The Goldsmith Ancient China)，在书中，安特生根据考古实物证明了殷代是中国古代金属制作的始点。1943年，又写成《中国史前期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一书，这是安氏中国考古学的总结性著作。

第二节　20 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的甲骨文、金文研究

白川静的贡献　白川静是日本在研究甲骨文、金文以及传统语言文字学方面

均具有巨大成就的学者。[13]1998年,日本政府授予他象征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文化功劳者"称号。

在极为讲究毕业学校以及师承的日本汉学界,白川静无疑是个奇迹。因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既是"国立"、"私立"大学的"双璧",更是日本汉学界的四大研究重镇。如果把日本国土分成关东和关西的话,代表关西地区的著名大学,国立的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神户大学、大阪市立大学,私立大学则有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立命馆大学等。白川静即毕业于私立立命馆大学,后来又在国立的京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白川静的中国古文字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专著《甲骨文金文论丛》、《金文通释》[14]以及《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的构造》和《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等中。特别是十五卷本的《说文新义》和八卷本的《金文通释》更是白川静学术的巅峰之作。

《金文通释》原为授课讲义,从1962年(昭和三十七年)开始在《白鹤美术馆志》上陆续发表,共55辑。

第1辑至第40辑(1962~1963年)为铭文考释部分。其中,第1辑到第33辑所收为西周铜器,基本按照西周诸王世次逐一排列。如第1辑至第5辑分别是武王期铜器、大保关系诸器、周公伯禽关系诸器、康侯关系诸器、王姜关系诸器;第29辑至第33辑分别是厉王诸器、共和诸器、宣王诸器、宣幽诸器等。其中主器198件,相关铜器约有三百余件,共约有五百余件。

第34辑至第40辑为东周列国铜器,作者将列国器首先分为西北、中土、东土、南土四大类,然后将各诸侯国器铭依次纳入。西北类包括秦、虢、虞、苏、晋等国器铭,中土包括郑、邓、宋、陈、蔡、许等国器铭,东土类包括齐、鲁、纪、杞、莒、薛、腾、曾等国器铭,南土类包括楚、曾、黄、吴、越等。四大类共收主器31件(编号199~230),相关铜器约有二百四十余件,两者相加共约二百七十件。

以上40辑发表后,作者又将所见新出铜器,陆续撰写了《补释篇》,并于《白鹤美术馆志》第48~50辑发表。

《金文通释》一书体例精当、考释博洽,显示出作者广收慎取的态度。每件铜器,书中详细搜集材料,分别介绍器物名称、共有多少器、以前学者的断代情况、此器何时出土、收藏情况、著录情况、学者考释情况、铭文行款特点以及异同表现等等。特别是考释部分,白川静将前人及近代学者考释的主要论述几乎全部引用,近乎铭文汇释。读后既可以了解以往学者之间研究的异同,也可以理清各

种学术观点的来龙去脉。

《金文通释》主体是铭文考释，包括正编和补释、补记。除此之外，还有西周史略、金文学史、考古学研究方法、金文学研究方法、历法研究方法、西周断代和年历谱、列国器编年、本文篇器名目次等内容以及非常有用的各种索引。[15]既对金文研究诸方面作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又便于学者利用。

从1960年开始，白川静出版了十卷本的《甲骨文金文论丛》一书。这部十卷本的学术巨著，实际上是由单篇的、对甲骨文和金文中单个汉字研究考证性论文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十卷本的《甲骨文金文论丛》是他另外一部著作《说文新义》的基础。

《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王朝的构造》[16]、《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17]二书，是作者在研究古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力作。前者主要是以甲骨文为资料，探讨古代尤其是殷王朝的祭祀、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后者探讨了从金文所见的社会政治体制，重大军事行动、土地经济情况等。另外，他对《诗经》的研究，也注重用甲骨文、金文进行证明；这也是一个崭新的视角。

自从甲骨文发现以来，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是以新出土的甲骨文来考证和解说《说文解字》。在这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是于省吾，但是他并没有做完。第一个利用甲骨文资料、金文资料全面系统对《说文解字》进行考察的就是白川静。

从1965年开始，白川静陆续出版了十五卷本的《说文新义》[18]，他通过甲骨文金文资料的仔细研究和互证，肯定了《说文》在汉字字义解说上的准确性，达到了当代日本汉学界说文研究的最高峰。另外，他编纂了《字通》、《字训》、《字统》等三部词书，前两种是对汉字和日语词汇的介绍，后一种是对汉字字源的解释，在日本影响很大。他反对贬低象形文字的价值即认为象形文字是未进化文字而表音文字是进化文字的观念。他认为："从象形文字的理论来说，还没有象汉字那样具体、全面的表现言语的文字。"这对当时一味贬低汉字，主张语言文字西化，是一个义正辞严的回答。

除了白川静外，在日本汉学界还有岛邦男、贝塚茂树、赤塚忠、伊藤道治等学者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成就共同奠定了日本汉学界在世界汉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岛邦男的甲骨学贡献　岛邦男对于汉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殷墟卜辞研究》与《殷墟卜辞综类》中。

《殷墟卜辞研究》是一部总结性的研究专著[19],由序论和本论两部分组成。序论包括贞人补正、卜辞中父母兄子的称谓等。本论第一篇为殷室的祭祀,共分四章:先王先妣的五祀,禘祀,外祀,祭仪等。本论第二篇专论殷代社会,共分七章:殷代的地域,殷代的方国,殷代的封建,殷代的官僚,殷代的社会,殷代的产业,殷代的历法。

《殷墟卜辞研究》也是总结甲骨学研究成果的巨著之一。上篇对甲骨文中所见的各种祭祀作了全面总结和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的"周祭"更是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观点。[20]下篇则全面考察了商代的社会情形,特别是其中的方国、地理部分更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此书还附有表格、甲骨摹本以及地图。在地图上的地名间,还注明统属关系和商王巡视日程,与正文论述对照,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殷墟卜辞研究》一书,材料翔实丰富,是作者根据他"在日本所能见到已经刊印出来的拓本著录全部"进行整理、研究而写出的力作。

1967年,岛邦男又写成《殷墟卜辞综类》一书。[21]他将63种甲骨著录中的卜辞逐条按照内容编次,总结出164个甲骨文部首,然后按照卜辞年代,把甲骨单字与称谓3397个依次纳入这些部首中去。单字的隶定主要参考了李孝定所编《甲骨文字集释》,凡能隶定之字均注明汉字,并指出在《甲骨文字集释》中的号码。另外,将他所能看到的甲骨文资料,用摹写原形的方法,将每一部书中的甲骨文,逐页、逐片、逐条、逐字地摹录下来,在每个甲骨文字头下,根据字形及内容排列卜辞。以前的工具书只能满足于读者查阅单字的需要,这本书不仅可以查阅单字,还可以查阅整条卜辞,对于学者的研究的确是很方便的。[22]

《殷墟卜辞综类》的好处是每条材料都有出处,每个甲骨文都保持原形,使用的人可以从中看出它们的时代性,免去许多由隶定而引起的不必要的误会和误解。它的缺点是摹录甲骨文的原形,而没有隶定,对于初学之人而言很难直接加以利用。另外,一些简单而易识的字,往往收得不很齐全,有时候也有一些脱文断句的错误,台湾金祥恒和他的研究生,曾经做过一番校正的功夫,找出不少错误。可惜这一结果尚未完全发表。

贝冢茂树的贡献 贝冢茂树(1904~1987年)曾任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所长、东方学会会长,1984年被授予文化勋章。1928年在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毕业后,升入该校大学院继续学习。1932年,进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贝冢茂树在中国通史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是《中国历史》上中下三卷本。这

是二战后日本的基础教育读本，影响很大。

贝冢茂树受到前辈学者，如内藤湖南、林泰辅研究甲骨文、金文等新史料的影响，充分肯定了甲骨等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和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与战前的"东洋史主流派"无视、否认这些史料的价值态度不同，他不但确认甲骨文作为史料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价值，还认为甲骨文向人们提供的历史知识远远超过作为考古遗迹本身。他还与同仁创办《甲骨学》杂志，使甲骨学的研究有了自己的园地。同时对京都大学所藏甲骨片进行了整理研究，写成了代表当时学术成就的名著——《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1959年3月出版图版，1960年3月出版本文版)。[23]在金文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殷末周初的东方经略考》。

贝冢茂树的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收集在《中国古代史的发展》中。该书分为四部分，分别为序论，中国古代史的两条道路——疑古与释古；第一部，最近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第二部，通过新史料看殷周王朝的文化；第三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考古问题。

其中第一部收集了贝冢茂树此前发表的有关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文章，以及1942年受京都帝国大学之托编写的金文讲义。贝氏如实地记录了学界的进步和发展，也尽量援引中国历史学者的成果并加以介绍。第二部是作者对殷周文化的概观，有六点结论，都是建立在甲骨文、金文的精确分析之上。此书有弘文堂1946年版本，1986年东京中央公论社重印出版。

另外一部代表作是他主编的《古代殷帝国》一书[24]，全书分五章三十节。前附甲骨、殷墟发掘、殷墟出土商代器物等图片，以及"殷代王室世系图"；后附后记、文献目录。其中五章较全面介绍了殷墟甲骨发掘的历史、甲骨文研究的情况、甲文主要内容、商代社会概况以及商代文化遗址等。其篇目与执笔者分别是：龙骨的秘密(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大岛利一)；地上与地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伊藤道治)；殷人的历日(爱知大学内藤戊申)；卜辞的世界(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殷人的故乡(京都大学文学部樋口隆康)。这是一部集多位学者研究成果精华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通论性著作。

除此之外，贝冢茂树还著有《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1953年，与伊藤道治博士合作)、《古代殷王朝之谜》(1966年)、《甲骨文字研究》(1980年，与伊藤道治博士合作)等。

赤塚忠的贡献　赤塚忠(1913~1983年)，也是20世纪后期日本汉学界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曾任东京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古代文化和宗教》、《赤塚忠著作

集》(七卷本),包含了他的主要学术论文。《著作集》第一卷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第二卷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第三卷是《儒家思想研究》,第四卷是《诸子思想研究》,第五卷是《诗经研究》,第六卷是《楚辞研究》,第七卷是《甲骨金文研究》。

赤塚忠的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对甲骨文和金文的解读以及对先秦思想的研究。在甲骨文和金文方面,他的代表作有《鯀、禹和殷代铜盘的龟龙形象》、《甲骨金文研究》等论著。

另外,伊藤道治、松丸道雄、林巳奈夫、樋口隆康等在这一研究领域也都有不同的贡献。

第三节　20世纪下半叶海外学者的竹简帛书研究

在日本汉学界,简帛研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京都大学等科研单位有很强的研究实力。在众多的学者中,以大庭修[25]的汉简研究最具代表性。[26]

大庭修是目前日本研究中国简牍方面最有成效、成果最丰硕的学者之一。早在1951年,他就参加了森鹿三首创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简研究班"。当时,日本全国从事简牍研究者不过三十余人,大庭修便是其中之一。他们主要从事的课题是1952年由日本文部省资助的项目:整理黑城附近出土的汉代文书并据出土汉代文书综合研究汉代史。

就在大多数日本学者的研究尚未与汉代历史挂起钩来,只能写一些启蒙性介绍文章的情况下,大庭修却一枝独秀,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利用劳干释文提供的简牍材料[27],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汉代军事、官僚制度的有分量的论文,成为当时的佼佼者。因此,他亦被台湾简牍学界誉为"简学泰斗"。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几种印有汉简图版的著作相继问世[28],日本学者的研究遂进入重新释读简文的第二阶段。此时,大庭修又加入以森鹿三为首的"图版轮流解读会"。他主要做了重释简文和集成简牍、恢复简册的工作,同时还利用简册提供的史料研究秦汉法制史,突出了他的研究个性和特点。总体而言,他主要开展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敦煌汉简研究。在日本学者依据图版释读简文的第二阶段开始后,大庭修与米田贤次郎合著的《敦煌居延出土汉简(图版解说)》一书[29],只是依据法国汉学家沙畹、劳干著作的原简照片重新解说简文大意而已。针对这一现状,1972

年4月他以关西大学派遣国外的研究调查员身份，赴欧美半年。其间有四个月住在剑桥大学，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去，详细考察了收藏在那里的敦煌汉简，特别仔细地调查了沙氏著作中没有发表过照片的那些简牍。于1973年撰写了两篇论文：《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汉简》[30]、《敦煌汉简释文之我见》[31]。前一篇介绍了该馆所藏中国敦煌汉简的概况，并详细介绍了怎样委托邮局订购这批汉简照片的办法。后一篇是作者逗留英国期间调查敦煌汉简的原简后所考证的释文。在文章中，除原来沙氏、劳氏等人已经发表释文而无需改正者，或当时仍完全读不出来的简文之外，作者将沙氏著作中未刊照片者、沙氏劳氏未释者或已释需订正者，一一作了释文和注记。共为二百二十余枚简牍重作释文，其中未刊过照片的简牍达135枚，超过半数。另对原简的状况（包括是木简还是竹简，是封检还是削衣，简牍木质如何，书写几行，字体大小，墨色浓淡，简上有无标记和残损等）以及沙畹、劳干释或未释，原释是什么、今作何释等等，都不厌其烦地逐字逐句作详细注记。

可以认为，大庭修的《敦煌汉简释文之我见》，是继岩井大慧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查所得文书考释》之后[32]，较之更全面、详细的敦煌汉简考释文章，代表了日本学者敦煌汉简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

二、居延汉简的研究。大庭修对居延汉简的研究要比对敦煌汉简的研究早大约二十年。他主要致力于考证、集成和复原简册的工作中，特别是在恢复汉代诏书简册方面成绩斐然。从1952年开始发表《材官考——汉代兵制之一斑》[33]、《论挈令》[34]、《汉代官吏的任事规定——以休假为中心》[35]、《汉代关所与护照》[36]等一系列研究汉代军事、政治制度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是在尚无刊布简牍照片的条件下撰写出来的，因此论题显得不太集中，研究缺乏系统性。尽管如此，这些单项研究为他后来所从事的复原诏书简册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汉代关所与护照》一文，他从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中找到民间百姓通过关所所持“护照”（即通行证件）简牍材料14例，论述了简文中的“槀”，就是普通老百姓出入关所所持的写明日期、通俗易懂、附有旅行者身份的一种证明书（即护照）。这篇文章也是大庭修集成简牍文书的尝试之作，只不过集成的是互无联系的“护照”而已。关于“护照”的研究，他并没有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上，而不断用新见简牍材料充实自己的观点。例如，自50年代末劳干的图版和大陆的甲编公布后[37]，大庭修看到照相版，方知自己所论述的“护照”，在原简上都是用非常细小的字并行书写的。于是在1982年出版其专著《秦汉法制史的研究》时[38]，修订《汉代关所与护照》一文并收入书中，这时捡出的“护照”简

牍材料已增加到39例之多。他还发现这些简多出自肩水金关。[39]

随着《居延汉简甲乙编》在中国大陆出版并传入日本，大庭修一方面解读原简图版、订正劳干原释文，一方面展开了集成简牍、复原简册的工作。主要成果有《居延出土的诏书册与诏书断简》[40]、《论汉代的诏书形态》等几篇论文。[41]

在《居延出土的诏书册与诏书断简》中，他依据各种版本提供的居延汉简照片，成功地复原了“元康五年诏书”简册，进而论证了汉代颁布诏书时的一般书写格式。据悉，在旧居延汉简中保留册书原来形式的，使旧居延汉简的册书增加到三部。[42]他还认为：通过考证、集成简牍复原起来的诏书，是反映当时社会情况最原始的“活资料”，可补史书之不足。例如，元康五年诏书中讲到有关夏至的礼仪，即自公元前61年五月初三始举行了五天节日庆典，更水火，政府停止办公，士兵放假休息等等。象这样详细记载的汉代礼仪，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因此，它在中国古代文书史上、法制史上都是最应重视的资料。

《论汉代诏书的形态》可视为作者对汉代诏书的各种问题所进行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是作者长期以来通过集成散简零墨、复原诏书简册工作的总结。作者认为，下达公文是上报公文的前提，上级公文必须引用下达公文的全部内容，亦即回信要包含来信的全部内容，这便是汉代公文的一般程式。

1973年至1974年在我国出土的新居延汉简，不仅数量多（近二万枚，是1930~1931年贝格曼所获数量的两倍），而且其中保留册书原来形式的或者还能复原的约有七十余部。1984年，大庭修又根据中国新出土的新居延汉简部分材料，利用他复原旧居延汉简诏书简册的丰富经验，写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其中，《论肩水金关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简册》是根据甘肃省博物馆整理的《永始三年诏书册》以及其他有关论文的基础上[43]，研究新居延汉简的力作。文章首先向日本读者介绍了《永始三年诏书》的出土情况和16枚简牍现存状况以及释文的全部内容，然后提出自己对该简册的16枚简牍排列顺序的看法，并详加考证说明理由；同时对中国学者伍德煦在《西北师院学报》所载论文（《新发现的一份西汉诏书——〈永始三年诏书简册〉）考释和有关问题的部分解释提出商榷。文章论证严谨，显示了大庭修在复原诏书简册方面的深厚功力。

大庭修在复原诏书简册的同时，也将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利用简牍史料研究秦汉法制史。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爰书考》[44]、《居延新出土的“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爰书补考》[45]、《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的研究》等[46]。

在《爰书考》中，作者首先回顾了苏林、张晏、韦昭、颜师古、刘奉世、钱大昕、王先谦等各家对《史记·张汤传》所载“爰书”的解释，举出台湾学者陈槃依据简文所归纳的“爰书”两种性质之不足[47]，又补充大量居延汉简材料，详加考证，重点论述了“爰书”的用途及汉代审判程序。大庭修肯定了苏林、张晏、颜师古对《史记·张汤传》中有关“爰书”的一般意义的注释，并依据出土实物做了大量的补充和研究。[48]

1982年发表的《居延新出土的“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爰书补考》一文，是他在中国新居延汉简出土以后，用新的简册材料补充旧作《爰书考》而撰写的一篇关于法制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新作。其中，第三部分指出了这部简册的问题和意义，有下列三方面：第一，《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提供了民事案件爰书的典型文例，反映出汉代的诉讼手续；第二，汉律佚文的发现也是极其重要的；第三，这部简册不仅是关于一起诉讼案件非常具体的记载，不仅对研究法制史意义重大，而且也是一部研究汉代经济状况的“活材料”。[49]

大庭修在进行法制研究时，十分重视对新出土云梦秦简的研究，并发表了《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的研究》一文。文章首先概观了竹书秦律，涉及了出土秦律的分类及性质、竹书秦律的律名、秦律释文的主要问题、竹书秦律的年代等诸多问题，最后阐述了出土秦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作者认为出土秦律佚文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汉律和魏、晋、南北朝法律佚文，它不仅是研究秦代法制史的珍贵资料，而且有些律文和汉律及汉代官制非常接近，十分有助于对汉代法制的理解与研究。

大庭修现已有多部简牍学专著出版，其中，1982年由日本创文社出版的《秦汉法制史的研究》、1992年由日本同朋社出版的《汉简研究》[50]等，是他多年来从事简牍学以及根据简牍资料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的结晶和系列成果的总结，堪称简牍研究兼法制研究的典范。

三、在简帛学普及教育方面的贡献。大庭修在简牍方面的研究精深且博大。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宽，重视向社会特别是对中青年进行简牍学启蒙教育，为此还撰写了《木简》[51]和《木简学入门》两部入门书。它们不仅为简牍研究专家所必备，而且为社会上的广大读者所喜爱。[52]同时，为适应社会需求，大庭修在《日本美术工艺》杂志上撰写《木简杂谈》系列论文[53]，文中叙述了中国自战国至今所记载和出土的全部竹木简牍之概况。这是向社会大力普及简牍知识的力作，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木简总论。由于大庭修等一批专家的努力，深奥艰涩的简牍学在

《汉简研究》中译本书影

日本得到了很好的普及。

大庭修还亲自动手编纂简牍研究文献目录，为后继研究者提供方便，并适时撰文，回顾简学研究史，介绍已有主要成果，总结国内外研究经验，注意当前动态，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他编写的研究目录有《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等。[54]介绍研究动态的文章有《森鹿三先生与木简研究》[55]、《中国简牍研究现状》[56]、《汉简研究新阶段》等[57]。其中，《汉简研究新阶段》一文，对汉简特别是居延汉简的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扼要的回顾；并根据当时三个重要事件（即：杂志1978年第1期发表了有关1973~1974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新居延汉简的报告和1981年中国出版的收录有1930~1931年出土的居延汉简图版的《甲乙编》以及《文物》杂志1981年第10期公布的1979年10月在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的报告），指出从1978年到1982年，标志着汉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评论了上述论著特别是《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的重要意义。同时展望了中国新居延汉简图版和释文的不久问世，将开创木简研究的另一个新阶段。

随着马王堆简帛、郭店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的先后出土面世，海外学者对此展开了积极研究和热烈讨论。综观这一时期海外学者的简帛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郭店楚墓竹简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于1993年出土，目前已全部发表。竹简发表当月即在美国举行了郭店《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使海内外学者看到了郭店竹简的重要学术价值。此后，每年都有以郭店楚墓竹简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召开，美国重要的学术出版机构一年之内相继推出两部郭店竹简的研究专著，《中国哲学》的郭店楚简研究专号畅销世界并再版重印，这一系列活动已经确立了中国简帛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热点地位。

海外的郭店楚墓竹简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老子》与《太一生水》的研究。艾兰与魏克彬编著的《郭店老子》已由美国古代中国学会出版，从中可以看到韩禄伯、夏德安（美国）、瓦格纳（德国）、谭朴森与汪涛（英国）、戴卡琳（比利时）等对《老子》简文的细致研究。韩禄伯的郭店《老子》校笺已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西方郭店《老子》译注最重要的成果。鲍则岳（美国）新近发表了关于郭店《老子》文献学构成的重要分析。刘笑敢（新加坡）、谷中信一（日

本)等对《老子》的成书特征也作了探讨。艾兰所著《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许多最基本的概念都源于水的形象,与《太一生水》所论相合。她还讨论了《太一生水》与《老子》的关系及其对于解读《老子》的意义。施舟人(荷兰)、贺碧来(法国)对于《太一生水》与道家哲学的关系亦有探讨。第二,郭店儒家文献的研究。艾兰早年曾著《世袭与禅让》一书,从事研究尧、舜传说,使她对唐虞之道学派的属性能有独到的认识。杜维明(美国)则强调郭店竹简对于先秦学派横向研究的意义,并积极关注其与子思、子游学派的关系。池田知久(日本)对五行所见不同学派的影响也有广泛研究。金安平(美国)比照《尚书》对"成之闻之"的缜密分析,罗凤鸣(美国)对郭店儒家典籍所见法学要素的探讨,叶山(加拿大)对于郭店楚墓竹简与子思学派关系的怀疑,顾史考(美国)对于儒家诸简分篇的意见,王安国(美国)对《缁衣》的研究,上述等等,都值得学界关注。第三,简帛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鲍则岳与罗浩(美国)对于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原则与方法有详细的讨论,谭朴森以郭店《老子》为例,设计了一套简帛材料文献学校勘的形式分析方法,对国内简帛学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王堆汉墓简帛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简帛的研究热情,始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简帛的出土。美国白兰汀公司聘请韩禄伯主编"古代中国经典丛书",将马王堆、银雀山等地所出的简帛经典译注出版。最早公布的马王堆帛书材料包括《老子》、黄帝书和《周易》等,均被收入丛书。韩禄伯在美、英、法、德、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多种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帛书《老子》的研究论文十余篇,他译注的帛书《老子》,自1989至1993年间在美国、欧洲连出七种版本。刘殿爵译注的帛书《老子》显示出深厚的国学修养,所论《老子》有可与稍后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对照之处,不容忽视。鲍则岳对帛书《老子》的文献学研究,及其与王弼本与河上公本的比较分析,厚积薄发,亦多卓见。池田知久、岛邦男等也在帛书《老子》研究中取得许多成果。

帛书黄帝书是在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附抄的一组经典,通常被认为具有黄老思想倾向。叶山的《古佚书五种:汉代的道、黄老与阴阳》则认为它们是阴阳家的作品,可与杜维明、皮瑞姆、卡润·特讷(美国)的学说相对比。浅野裕一的黄老道研究与今枝二郎、内山俊彦等家之说,都是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附抄佚书的研究,以池田知久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最为重要。

帛书《周易》已由夏含夷(美国)译成英文,多米妮·赫泽(德国)译成德文。后

者的工作更为细致,并出版有研究专著。池田知久重点研究了帛书《周易》的《要》篇,近藤浩之(日本)则完成了全面扎实的资料工作,并在帛书《易传》"龙"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此外,日本学者并对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春秋事语》有研究,如工藤元男、吉本道雅等。布兰夫·乌米科(美国)也完成了《战国纵横家书》的博士论文。

日本学者赤堀昭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研究,村上嘉宝、大西克也的《五十二病方》研究,山田庆儿对医术与咒术的探讨,坂出祥伸对导引术的考证等等,都是海外马王堆医书的研究成果。欧美学者这方面研究较少,除夏德安《五十二病方》的著名论著之外,只有若干翻译与讨论房中术的作品。

马克(法国)关于帛书《刑德》的研究已是有口皆碑。他与夏德安、汪涛等对新近公布的马王堆帛书《式法》也有讨论。薮内清(日本)对《五星占》,安居香山(日本)及鲁惟一(英国)对《天文气象杂占》的研究,皆属海外马王堆术数类文献研究的重要成果。

就马王堆、郭店以外的材料而言,曾译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安乐哲(美国),与小亨利·罗斯曼(美国)结合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译注的《论语》,内容精益求精,是当代西方中国简帛研究的优秀代表之作。此外,葛瑞汉(英国)对银雀山汉简、傅敏怡(德国)对不同墓葬所出简帛的关系、马克与夏德安对睡虎地秦简与九店楚简日书、叶翰(德国)对尹湾汉简《神乌赋》、韩禄伯及柯鹤立(美国)对王家台秦简《归藏》、大庭修(日本)对西北汉简与法制史的研究等等,内容遍及古代中国研究的各个方面,中国简帛学已日益成为国际汉学的显学。当然,海外简帛研究也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有待于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

第四节　台湾、香港地区的古文字学研究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台湾地区的学术界与大陆联系较少,但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对古文字学及相关课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其中,青铜器、甲骨学的研究,主要由董作宾、李济一手扶持,他们在殷墟发掘材料、甲骨文整理研究等方面继续做出很大的成就。二人的学生石璋如、严一萍、李孝定等,在此基础上把甲骨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简帛研究、特别是居延汉简的研究,则在劳干及其学生马先醒等人的推动下,继续得到发展。

香港地区的古文字学研究，集中在甲骨学、金文研究以及简帛研究诸方面，主要是以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周法高等学者为代表。

台湾地区的古文字学研究　董作宾到台湾后，仍继续自己的甲骨学研究并出版了大批著作。在完成《殷历谱》之后，他继续进行古代年代学的深入研究。相继发表了《武王伐纣年月日会考》[58]、《关于古史年代学的问题》[59]、《中国年历总谱》等论著。[60]

他还着手对甲骨学进行全面的总结研究，撰写了《甲骨学六十年》并对甲骨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董作宾的学生严一萍在甲骨的缀合、综合研究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61]1978年，他在台湾出版了《甲骨学》一书。全书共分九章，是继陈梦家、岛邦男类似著作后又一部系统总结八十年来甲骨文发现与研究成果的综述之作，对于学习和研究甲骨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甲骨学》各章分别为：

第一章，认识甲骨与殷商的疆域；第二章，甲骨的出土传拓与著录；第三章，辨伪与缀合；第四章，钻凿与占卜；第五章，释字与识字；第六章，通句读与识文例；第七章，断代；第八章，甲骨文字的艺术；第九章，甲骨学前途之展望。

另一位古文字学家是李孝定，[62]他的代表作有《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读后记》等多种。

就字义的解释来说，由李孝定编著的《甲骨文字集释》应该是目前较为全面的甲骨文字典。它共有十四卷，补遗一卷，存疑一卷，待考一卷，共约一百五十万字。1965年作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由作者手书影印出版。卷首有屈万里、张秉权序、自序、凡例、目录、索引等。此书是甲骨文字集中考释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甲骨文字集释》体例采用许慎的《说文解字》部首分门别类的方法，每字先列小篆，再列举甲骨文的各种字体形式，接着是各家考释，并详细地注明出处及所在书的卷页，最后是根据各家之说，判断是非，提出自己的看法，有的还有附有金文的各种字体，以相对照。

全书考释的甲骨文见于《说文解字》的有1062字，重文75字，《说文解字》所没有的567字，存疑者136字，总共有1840字。其中辑录59位学者的171种著作或论文，应该说有关甲骨文考释的重要资料大多网罗于此。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各位学者的观点，通过诸家观点的比较，可

以较为清楚地把握字的形、音、义，省掉许多时间来翻阅分散的多种书籍。而且有些书籍，目前已不易找到，因此其方便程度自不待言。

这本书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如甲骨文以及每字后附的金文多是由《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金文编》等书中临摹而成，大多描摹不精，刻写也是粗疏草率，因此要了解各期甲骨文的字形字体的变化，还必须查阅原文。书中征引的各家之说，有的过于繁杂啰嗦，让读者有昏昏然之感。所附的金文多只是抄录形式，缺乏必要的分析。

1948年底，从事殷墟发掘的考古学者李济、董作宾、石璋如等随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李济在台湾期间，致力于整理与研究殷墟发掘资料，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对殷墟和其他商周遗址出土铜器进行系统研究。首先，继续进行类型学研究，重在型式分类与形制演变。他在这一领域的代表论文有《锋刃器》[63]、《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64]、《殷商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等多篇。[65]

另外，李济还主持撰写殷墟综合性、资料性的著作。他与曾在台湾大学学习机械工程的万家保合作，撰写《古器物研究专刊》一至五本，共一百余万字。通过对殷墟出土的170件青铜容器的分析，由万家保对铸造技术予以研究，李济在此基础上，深入讨论器物制作、形制、纹饰、礼器用途等内容，最后发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一文予以概括总结。[66]另外，他还与参加殷墟发掘的高去寻等人编著《小屯》、《侯家庄》两套考古发掘报告。

同样，高去寻、石璋如等人在相关研究领域也有很大的收获。大约在1961年后，石璋如渐渐退出台湾考古的舞台，而专注于整理、研究由大陆带来的安阳殷墟出土的资料。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依据殷墟地面地下的建筑遗存及墓葬的研究，进行建筑物的复原工作，并将复杂的考古现象加以关联，探求殷代的营造仪式、兵马战车的组织及宗法礼制等，以图重建当时的制度。这些成就对于甲骨的断代研究、重现殷商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香港地区的古文字学研究　有关香港的古文字研究学者，最值得一提的是饶宗颐。[67]他治学六十多年，早年致力于地方史志研究；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近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至今已出版论著五十余部、论文四百多篇。

饶宗颐在古文字学研究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甲骨学、简帛学等方面。

他在甲骨学方面的代表作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通检》(主编)、

《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等。

1959年11月，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出版。[68]全书二十卷，上、下二册。卷一《前论》谈及殷代以前的占卜与卜用甲骨分布、商代甲骨的属类、龟卜占书源流、占卜事类与《周礼》作龟八命等等。卷二《贞卜人物记名辞式释例》，不仅全面列举了卜辞的各种句型，还对“卜”、“贞”二字作了详细考释。卷三至卷十七为《贞卜人物事辑》，将有关贞人占卜之辞进行了全面整理。卷二十为附录，书后还有补记及索引。

在简牍方面，以饶宗颐为首的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小组，较早地对云梦睡虎地秦简展开研究并在1982年出版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着郭店楚简、上博馆藏楚竹书材料的不断公布，饶宗颐对这两批材料又进行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郭店楚简的出土和公布，将会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以代替20世纪初受西方冲击下的新文化运动。在研究方法上，饶宗颐重视回到文本，把古文字学与历史文献学及考古材料结合起来，提倡“三重证据法”。

在帛书研究方面，饶宗颐撰有《楚缯书之摹本及图象———三首神、肥遗与古印度神话之比较》[69]、《楚缯书疏正》等文章[70]，分别对长沙子弹库帛书的内容和性质作了探讨。饶宗颐与曾宪通合著的《楚帛书》深入总结了子弹库帛书的研究情况[71]，此书包括楚帛书新证、楚帛书十二月名与《尔雅》、帛书之内涵及性质试说、楚帛书之书法艺术、楚帛书研究四十年、楚帛书文字编等几部分，书后附帛书全图、文字摹本及隶定本，对子弹库帛书作了详细的总结，认为它是楚国天官书的佚篇，而非历忌之书，可以说是楚帛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香港地区在金文研究上主要的代表作品主要是周法高等人编著的《金文诂林》系列，包括周法高[72]、张日升、林洁明编著的《金文诂林》[73]，台湾李孝定《金文诂林读后记》，李孝定、周法高、张日升编著的《金文诂林附录》，周法高编著《金文诂林补》等。

《金文诂林》以容庚第三版《金文编》为据，依照《说文解字》次序编排，分卷一至十四，共收1894个字头。图形文字列为附录上，不识之字列为附录下。每字之下，先列字形，后列文句，最后给予汇释。

该书不仅仅是一部集成式的考释之作，其中周法高、张日升、林洁明三家的按语和注解也体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周法高旧著有《金文零释》一书，现大半收入《金文诂林》。另外，他评论白川静《金文通释》及其他论著的结论也一并收录。张日升之说共322条，他主要从语言学角度，仔细分辨金文各字的具体用

意、总结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74]林氏之说，据周法高统计约有三万言166条，主要以按语形式出现。内容主要有补充所引用的《说文》内容、综合各家之说提出新见解、补充各家考释某字的缘由等。[75]

另外，三位学者对于上古音韵特别重视。因此，他们在解释词义的时候，很注重通假，并且从上古音韵方面进行讨论和总结，[76]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由李孝定撰写的《金文诂林读后记》，1982年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于台北出版。此书主要是为周法高《金文诂林》一书作按语，因此需要结合《金文诂林》而读。

《金文诂林附录》根据容庚增订三版《金文编》之附录[77]，以图形文字之不可识者为附录上，形声之不可识及考释犹待商榷者为附录下。该书仿《金文诂林》之体例，汇录诸家考说及李孝定新撰考释千条于各字之下。至诸家于所收之字有只加释文而无考证者，亦择要采入。

周法高完成《金文诂林》、《金文诂林附录》后，于1978年回到台湾，继续编著《金文诂林补》。该书"历时三年半而书成"，作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七，于1982年5月出版。

据周氏《金文诂林补自序》云"补编体例，与正编大体相似，而微有不同"，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补编增录三十年来出版之铜器铭文七百于通，逐字编为索引，附于各字之下"；二，补编在容庚《金文编》基础上，增收三百余字；三，诸多整理工作，概由自己亲自完成，如整理墙盘与中山王四器等；四，补编收录日人研究成果较多，如加藤常贤《汉字的起源》，赤塚忠《稿本殷金文考释》，白川静《金文通释》、《说文新义》，这些内容均由林洁明翻译，吸收入《金文诂林补》相关部分。

注释

① 由美国费正清博士(John King Fairbank)开创的所谓中国研究，是以对外交、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三者研究为核心内容的，费正清博士的研究现代看来与"国情研究"类似。

② 此部分参考了方辉《明义士的甲骨收藏与甲骨学研究》一文，《殷都学刊》1994年第1期。

③《殷墟卜辞后编·序》。

④ 明义士：《甲骨研究》，方辉整理，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⑤ 明明德：《甲骨研究》，序二，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⑥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⑦ 王宇信:《踏破铁鞋无觅处 ——祝方辉博士整理明义士〈甲骨研究〉出版》,《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

⑧ 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年),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主要著作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23年),《藏语和汉语》(1931年)、《诗经研究》(1932年)、《汉语的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4年)、《汉文典》(Grammata Serica,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1940年)、《汉语》(1949年)、《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学简论》(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1954年)。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影响最大。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的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另外,他在青铜器研究上也有很大的成就。

⑩ 见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995年版。

⑪ 参见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⑫《远东博物馆馆刊》。

⑬ 白川静(1910~),1943年立命馆大学法文学部汉文学科毕业,曾任立命馆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著作主要有《甲骨文文学论丛》(十集)、《诗经研究》、《金文通释》(56辑)、《说文解义》(16辑)、《字统》、《字通》等。先后荣获菊池宽奖、朝日奖和"文化功勋奖"等。

⑭ 白川静:《金文通释》,神户白鹤美术馆(1962~1984年)。

⑮《金文通释》索引和图表部分是该书的一大特色,极便于学者利用。索引包括:语汇索引(包括音序和笔画索引二种,其中音序索引是按照日语假名顺序排列)、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官制身份索引、纪年日辰表、干支表、铭文索引(铭文索引部分,又详细分成廷礼册命表、纪年纪日法、都邑宫庙、王在·王命、廷礼右者、赐与、品别类、稽首·对扬、嘏辞、铭文文字、金文图像、诸表等)。

⑯ 白川静:《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构造》,东京平凡社,昭和47年(1972年),温天河,蔡哲茂译,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7年版。

⑰ 白川静:《金文の世界:殷周社会史》,东京平凡社,昭和46年(1971年)(昭和51年(1976年)印)。

⑱ 白川静:《说文新义》,神户市白鹤美术馆,昭和44~51年(1969~1976年)。

⑲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昭和23年(1958),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学研究会出版,温天河、李寿林译,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版。

⑳ 详见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自序,鼎文书局1975年版。

㉑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日本汲古书院1967年版。

㉒ 另外,借鉴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的经验,姚孝遂等人主编了《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殷墟甲骨刻辞摹释类纂》等书,分别由中华书局1988年、1989年出版。

㉓ 贝塚茂树纂辑《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195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图版篇一、二册,本文篇(释文)一册于1960年出版,全书收录甲骨3246片,图版前有凡例。此书所收甲骨,皆注明拓本为龟甲(S)亦或是卜骨(B),按时代分期并再行分类著录。主要分成祭祀、求年、风雨、旬

夕、田猎、往来、方国征伐、使命、疾梦、卜占、贞人、杂占等12项。本书是收录日本所藏甲骨最多、代表当时日本甲骨学成就的一部著录书。

㉔ 贝冢茂树主编:《古代殷帝国》,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京都みすお书房出版。

㉕ 大庭修:现任日本皇学馆大学校长、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大阪府近飞鸟博物馆馆长。精于中日交流史、秦汉法制史、简牍学。代表作分别是《江户时代中国文化传播之研究》(1986年日本最高学术奖——学士院奖,该书有戚印平等中译本,杭州大学1998年版)、《秦汉法制史研究》(创文社1982年出版,有林剑鸣翻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汉简研究》等。

㉖ 此部分重点参考了赵汝清《日本学者大庭修简牍研究述评》,《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㉗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四川南溪石印1943年版。

㉘ 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8号,1959年版。

㉙ 大庭修、米田贤次郎:《敦煌·居延出土汉简》(图版解说),《书道全集》,1958年版。

㉚ 大庭修:《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汉简》,《古代史讲座月报》7,学生社,1973年版。

㉛ 大庭修:《敦煌汉简释文之我见》,《关西大学文学论文集》23卷1号,1973年版。

㉜ 岩井大慧:《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查所得文书考释》,《学灯》51卷第10号,1954年。

㉝ 大庭修:《材官考——汉代兵制之一斑》,《龙谷史坛》第36号,1952年。

㉞ 大庭修:《论挈令》,《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3号,1953年。

㉟ 大庭修:《汉代官吏的任事规定——以休假为中心》,《圣心女子大学论丛》第4集,1954年。

㊱〔日〕大庭修:《汉代关所与护照》,《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论丛》第16辑,1954年。

㊲ 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1,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考古学专刊》乙种第8号,1959年版。

㊳ 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的研究》,创文社1982年版。林剑鸣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㊴ 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的研究》,创文社1982年版;《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

㊵ 大庭修:《居延出土的诏书册与诏书断简》,《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论丛》52辑,1961年。

㊶ 大庭修:《论汉代诏书的形态》,《史泉》第26号,1963年版。

㊷ 据悉,只有永元五年到七年的所谓"永元器物籍"(由70余枚简牍组成)、永光二年的"侯长郑赦予宁文书",以及大庭修复原的元康五年诏书册。

㊸ 大庭修:《论肩水金关出土的<永始三年诏书>简册》,由姜镇庆译为中文载于《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㊹ 大庭修:《爰书考》,《圣心女子大学论丛》第12辑,1958年。

㊺ 大庭修:《居延新出土的"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爰书补考》,《东洋史研究》第40卷第1号;姜镇庆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2辑,1987年。

㊻ 大庭修:《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的研究》,《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27卷第1号,1977年。

㊼ 陈槃:《居延汉"秋射"、"爰书"两简述证》、《〈居延汉秋射爰书两简述证〉补记》,《中央日报》1947年8月4日、8月18日。

㊽ 作者归纳出"爰书"之要点如下:一、汉代把"改(易)为口辞之书"即向官府申告个人私事的文书叫做爰书,并根据内容还在爰书上冠以"秋射"、"自证"等词;二、爰书的文体原则上以"某自言"作为开

头的，这种文体大概与下级官吏呈报给上级官府的文书一定要用“敢言之”，和上级官府下达给下级官吏的文书经常要用“敢告”这种格式是差不多的，自证爰书可能是以“证所言”作为结束语；三、爰书既经提出以后，则由官府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处理，先由官方肯定所述是否属实。

㊾ 同㊺。

㊿ 大庭修：《汉简研究》，徐世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1) 大庭修：《木简》，学生社出版1979年版。

(52) 参见林剑鸣：《日本学者对中国简牍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12期。

(53) 大庭修：《木简杂谈》1~12期，《日本美术工艺》460~472，1977年；13~18期，载同一杂志的473~479页，1978年。

(54) 大庭修：《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28卷第4号，1979年。

(55) 大庭修：《森鹿三先生与木简研究》，载森鹿三著《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同朋社出版1975年版；另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姜镇庆译文。

(56) 大庭修《中国简牍研究现状》，《木简研究》创刊号，木简学会编，1980年版。

(57) 大庭修《汉简研究的新阶段》，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1987年。

(58) 《文史哲学报》第3期，1951年12月。

(59) 《大陆杂志》第13卷6期，1956年9月。

(60) 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61) 严一萍(1912~1987年)原名城，又名志鹏，字大钧，以号行。嘉兴人。东亚大学法科政治经济系毕业。1950年由香港去台湾。严一萍专治甲骨文，在台湾创办艺文印书馆，任经理并编辑《中国文字》杂志。著有《殷墟医徵》、《殷商史记》、《陆宣公年谱》、《新睦新志初编》(仅成卷首及卷一至卷二，共三卷，余皆未成稿)等。

(62) 李孝定(1918~1997)，字陆琦，湖南常德人。著名古文字学家，1935年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从胡小石先生学甲骨，毕业论文为《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补》，一生致力古文字之学，由此开始。后又从董作宾先生专攻殷墟甲骨文。1959年，在以前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以孙海波《甲骨文编》为底本，重作《甲骨文字集释》。在金文研究方面，着有《金文诂林附录》(与周法高、张日升合编)及《金文诂林读后记》两著作。 他毕生致力学术，在汉字研究方面，总结经验指出“穷其原委，贯其会通”，可为后辈学人治学之方轨。

(63) 《锋刃器》原为《记小屯出土的青铜器》的中篇，分别发表于《国立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告》1952年第4期；《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四册。本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分析殷墟出土的刀、削、戈等锋刃器及其性质变化等。

(64) 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本文根据出土资料，清理殷代中期到战国末年豫北青铜戈形制变化脉络，特别是从实战需要的角度，剖析促成性质变化的深层原因。

(65) 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四本。本文从类型学角度分析小屯和西北冈发掘出土的40件觚形器纹饰，并据此讨论小屯与西北冈遗址年代早晚关系。

(66) 《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七本，1976年2月。

(67) 饶宗颐，(1917~)，广东潮安人。史学家、经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文学家和书画家。现为香

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兼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1962年获法国儒莲汉学奖(Prix Stanislas Julian)，又曾为法国科学中心(C.N.R.S)远东学院研究员，1980年被选为法国亚洲学会(Societé Asiatique)荣誉会员，1994年获法国巴黎索邦大学高等研究院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并获法国文化部颁授的艺术文学勋章。饶宗颐教授著述甚丰，有《楚辞书录》、《老子想尔注校笺》、《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海外甲骨录选》、《甲骨文通检》、《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选堂集林》等。

㊽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㊾ 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象———三首神、肥遗与古印度神话之比较》，《故宫季刊》，第3卷1968年第2期。

㊿ 饶宗颐：《楚缯书疏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8年第40本。

(71) 饶宗颐、曾宪通合著：《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

(72) 周法高(1915~1994年)字子范，号汉堂，原籍江苏东台，寄籍南京。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主任等。他涉猎广博，在语法学、文字学、语音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卓越建树，是享誉国际的语言学家。代表作为《中国古代语法》、《金文诂林》。其中，《中国古代语法》由《造句编》、《称代编》、《构词编》三编组成，是语法学领域中重要的著作。

(73) 周法高：《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

(74) 详见《金文诂林》1534"婚"字条、1084"似"字条、0711"央"字条、0214"德"字条等等。

(75) 详见《金文诂林》1432"汤"字条、1097"俘"字条、0455"爽"字条、1311"狐"字条等等。

(76) 如三位学者对《金文诂林》"皿"、"尹"等字的解释。

(77) 李孝定、周法高、张日升：《金文诂林附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第八章　甲骨学——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一

甲骨学是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以出土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为研究对象。甲骨学的内容包括：文字释读，卜法文例，分期断代研究，文字内容和社会历史考证等。甲骨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史、古代科技史以及古文字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本章首先简要介绍甲骨学相关的背景知识，然后按照五期学说，选择典型甲骨片，进行释读与分析，由此学生可以对甲骨学有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除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其中，甲骨文“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发展的基础。

殷墟甲骨文是殷王朝占卜的记录，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在现知的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而且为大家公认的约有1500个，已占单字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能释读的文字中有很多属于人名、氏族名和地名等。这些文字有的可以隶定其形而不知其义，有的知其义不可得其读，因为这些单字在我国传统的文字、音韵书籍中没有记载，“字书所无”，故准确的考释难度非常大，一般考释文字的著作都把它们放在附录中。

第一节　殷商甲骨文

商代甲骨文的发现者、发现地点、发现时间　据记载，约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在田间耕作时就发现了甲骨。人们起初留意甲骨并公开搜求，只是意外地发现了这种古物具有药用价值。由此可见，甲骨发现的历史是很早的，只是当时不认识而已。①

有关甲骨文的最早被确认有多种说法。据说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在北京

王懿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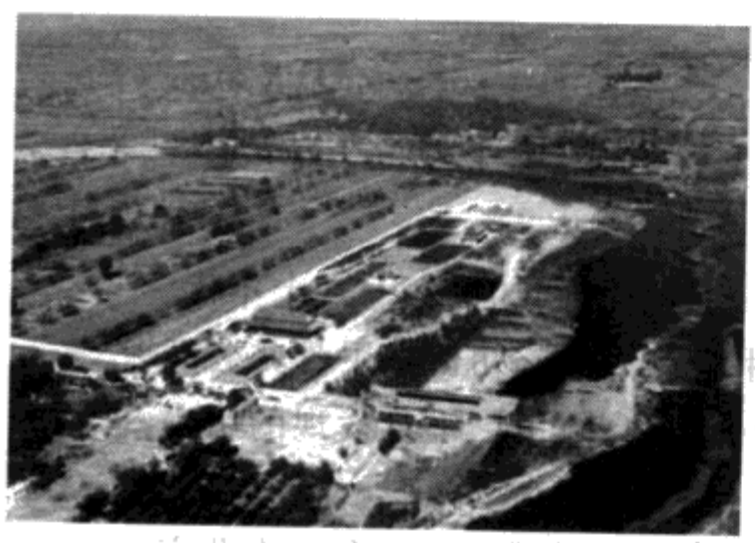
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身患疟疾，[2]派人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同仁堂购买龙骨(一种动物骨头，当地误以为“龙骨”)。骨头买回来后，发现上面隐隐约约地刻着符号。王氏是金石学家，精通铜器铭文，这些符号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经初步研究，他认定这些符号应该是古代的一种文字。

关于这一传闻，加拿大明义士曾说：“一八九九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二两。回家研究，颇有所得。”因此他认为，“王廉生(王懿荣字)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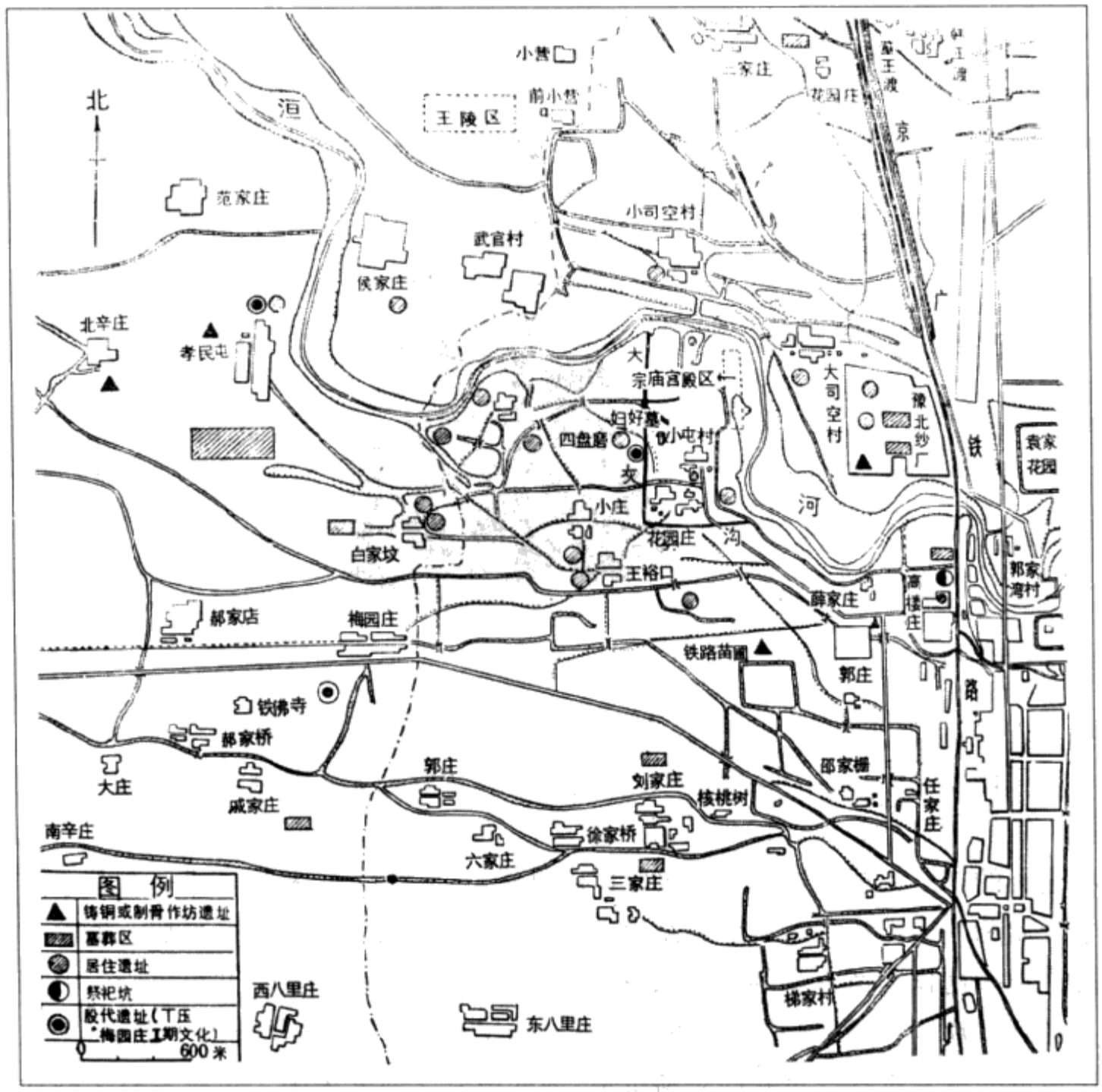
还有一说，认为甲骨文是清光绪戊戌、己亥间出土于彰德府西北五里的小屯，后经估客携至京师，为王懿荣所得。[4]

陈梦家对甲骨文的发现之说有所辨证。他指出，安阳一带多年产中药，村中有个叫李成的人，以剃头为业，以出售龙骨粉配制的刀尖药为副业，还把这些龙骨成批卖给药材店。因为“龙骨”不能有字，就只好把字刮去才能卖掉。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甲骨开始被古董商当作一种商品贩运到北京出售。当时山东潍县有个姓范的商人，常来安阳收买古物。范贾知道士大夫重视带有文字的骨头，就到小屯收购甲骨，再转到北京高价出售。

近年来，学者们通过调查和访问，对王懿荣吃中药发现甲骨文提出了疑问，一是北京菜市口在清朝光绪年间并没有“同仁堂”这个中药店，二是中药店的龙骨向来是捣碎后出售；三是当年的有字甲骨无人要，因此需将字迹刮去后才能卖掉。如此等等，说明甲骨的发现始于何时，如何被发现等问题尚未搞清楚。但认识和研究甲骨的第一人当推王懿荣，这一点目前没有疑义。[5]


殷墟鸟瞰图

由于大量收购，“龙骨”身价倍增(如曾任直隶总督的端方和王懿荣每字出纹银二两收购)，小屯村民、古董商人、文人学士，竞相挖掘、收售、收藏甲骨文。据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记载：从1904年冬至1928年春，有名有姓，并知甲骨去向的甲骨私人发掘就有十余次。古董商为了垄断古物，牟取利益，他们隐瞒出土地点，使甲骨的发现地始终无法确认。[6]后来，罗振玉派其弟弟罗振常亲赴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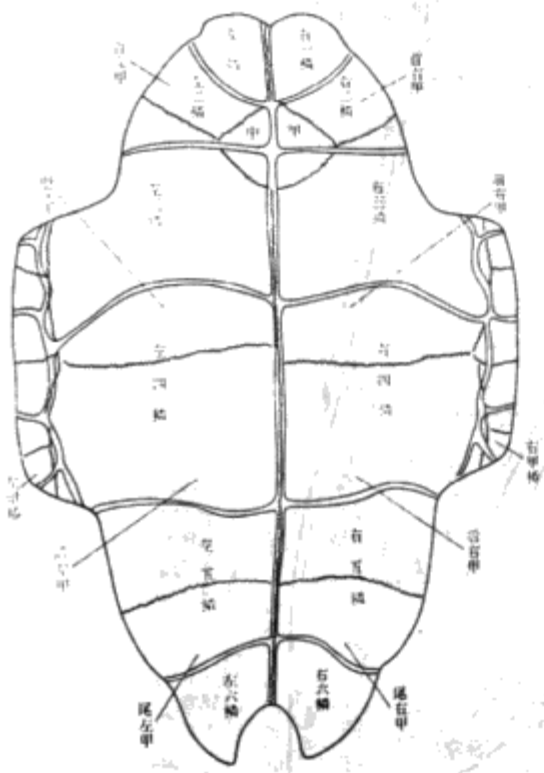


殷墟遗址墓葬分布图

调查，最终搞清，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甲骨出土地点从此真相大白。

殷墟——商代都城、甲骨故乡　殷墟横跨洹河南北两岸，古有“北蒙”、“殷邑”等名称。甲骨文中又称为“大邑商”、“邑商”，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3300年。自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的二百多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商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商灭亡后这里沦为废墟，故此后又被称为“殷墟”。⑦

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空前发



龟腹甲图解

牛肩胛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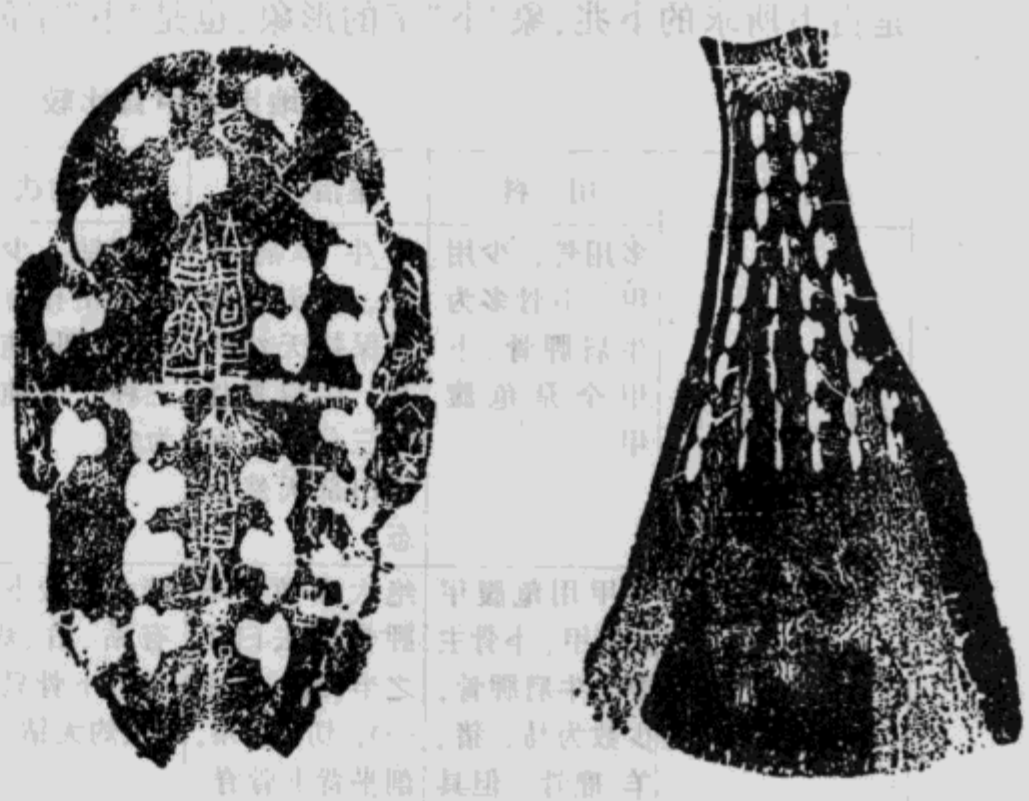
达，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典范之一。殷墟以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谨的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体现出恢弘的都城气派；以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而闻名于世；以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烧造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享誉世界；而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的甲骨文在世界文明史上更是独领风骚。

殷墟发掘 1928~1949年，甲骨文进入了科学发掘和发展时期。所谓“科学发掘”，是反映从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之中，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的15次大规模发掘。15次发掘硕果累累、成就巨大，标志着西方现代考古学开始和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相结合，也表示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形成。殷墟发掘是把殷墟作为考古学的标尺来进行的。15次殷墟科学发掘，共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多片，由于科学发掘有明确的坑位和层位的记载，并伴有出土器物，因此比传世的甲骨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金石学的局限，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对小屯南地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有字甲骨四千余片，更加完善了殷墟的发掘内容。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曾指出：“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70年前开始的殷墟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并且证实，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因疑古思潮而陷入迷茫的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⑧

甲骨文的材料 主要有龟甲和兽骨两种。龟甲以比较平坦的腹甲为原料，便于占卜后契刻文字。兽骨通常用牛的肩胛骨为材料，也是因为这个部位较为宽阔，有空间刻字。此外，还少量利用羊、鹿、猪的骨头。商代畜牧业十分发达，为占

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材料。殷商时期,安阳地区河流纵横,水草丰茂,乌龟等水生资源非常丰富。从占卜使用的龟甲看，大部分材料均取之本地。也有少量体形较大的龟，来自于东南亚一带的进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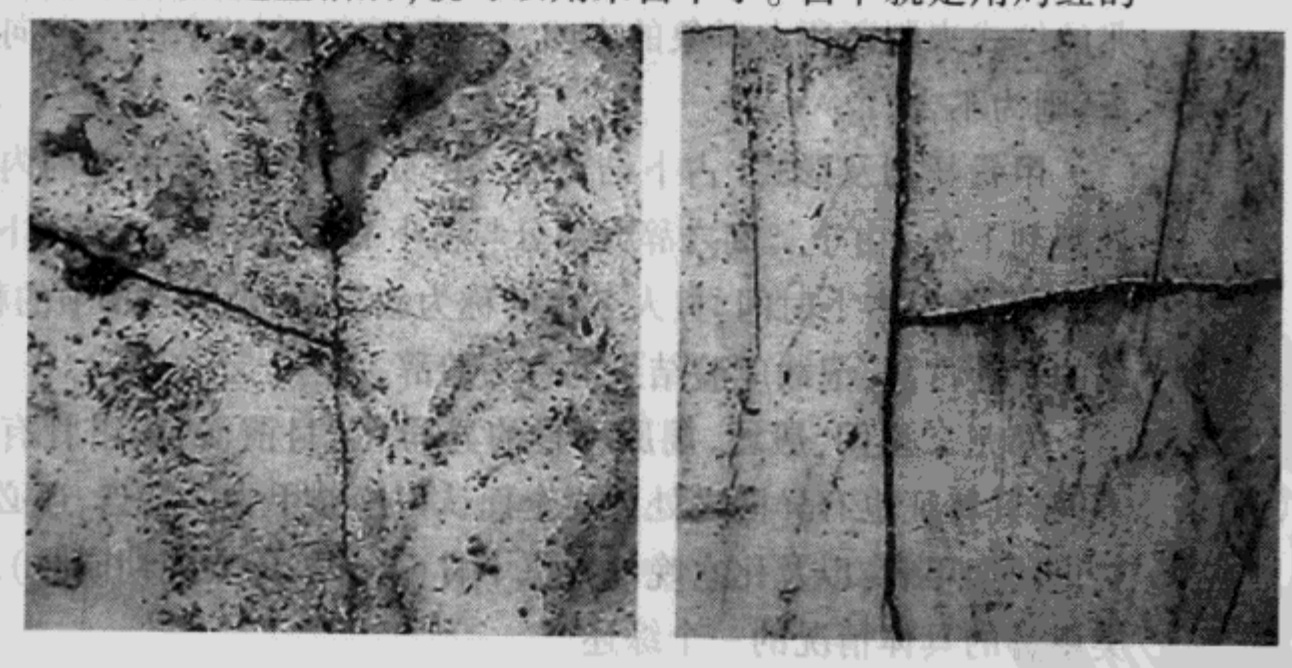


甲骨钻凿痕迹示意图

甲骨的加工　龟甲兽骨在使用之前,都要进行加工整治。其程序是:去皮,剔肉,切割。具体做法为:龟壳自腹甲与背甲之间一截为二,然后削平外缘使其平整。背甲从中脊平分为二,锯掉凹凸之处以及首尾两端,中间穿孔。牛的肩胛骨的整治,首先把臼骨从长的一面切掉三分之一,使其成半圆形。再将臼角向下向外切去,使其成一正角的缺口,随后把直立的脊骨连跟削去磨平。甲骨经过整治后形成片叶状,厚约5毫米左右,牛的肩胛骨又是略厚些,可达10毫米左右。

甲骨钻凿　钻凿是整治甲骨的重要工序,是占卜的前期工作。所谓钻,就是在甲骨的背面钻一个圆形的槽;凿是在钻槽的一侧凿出一个椭圆形的穴。

甲骨占卜　甲骨在完成上述整治后,就可以用来占卜了。占卜就是用灼红的铁钎烫灼经过钻凿的槽穴，由于这一部位相对较薄，在受到高温后就会发生爆裂，烫灼的反面按一定的方向呈现出由兆干和兆枝组成的裂纹(即兆纹)，这就



表示“吉利的”卜兆

是占卜所求的卜兆,象"卜"字的形象,也是"卜"字的来历。商代的贞人们根据卜

三地出土甲骨比较

出土甲骨	用　料	整治方法	钻、灼法	刻辞情况	字体
郑州二里冈甲骨	多用骨，少用甲。卜骨多为牛肩胛骨，卜甲全是龟腹甲。	猪牛羊肩胛骨、牛头盖骨多保持天然状态。牛肩胛骨约三分之二保留臼部天然状态。	多用钻，少用凿。钻孔有尖圆、平圆、钝圆三种，以钝圆为多。	在牛肋骨、肱骨上刻字，为习刻。未发现在卜骨、布甲上刻辞。	暂无发现文字。
殷墟甲骨	卜甲用龟腹甲和背甲。卜骨主要为牛肩胛骨，少数为马、猪、羊、鹿骨。但具有刻辞的几乎全是牛肩胛骨。	绝大多数牛肩胛骨削去臼卜之半(或三分之一)，切去臼角，削平背卜骨脊。龟腹甲保留甲桥。背甲对剖。	绝大多数卜甲有钻、凿、灼，多数卜骨只有凿、灼无钻。	大多数甲骨在正面刻辞，少数在背面、骨臼部位刻辞。	大中小三体字形，笔风雄浑、刚劲，纤细、轻巧均有。
周原甲骨	主要是龟腹甲，部分为牛胛骨，不用背甲。	龟腹甲背刮削平整，甲首经掏挖后留有厚边缘，牛胛骨削去背面骨臼和中脊部分，但未切骨角。	卜甲一般施方凿，卜骨背面施圆钻。卜甲的灼痕较大，卜骨灼痕较小。	甲骨刻辞绝大多数施于正面。	字迹甚小，有的要用几倍的放大镜才可看清楚。

兆的纹式来判断所卜对象的吉凶。一般而言,"卜"字的一点向上,表明吉;若向下,则为不吉。

甲骨契刻及形式　占卜结束后，由贞人们把本次占卜的内容在卜兆相邻之处契刻下来。由于契刻之辞大部分与占卜有关,故称"卜辞"。卜辞的格式分为四个部分:记录占卜时间、贞人名字的称为叙辞,记录所问事项的称为命辞,记录兆象的称为占辞,记载应验结果的称为验辞。

郑州二里冈、殷墟、周原甲骨的异同　就目前而言,甲骨有地域和时期上的不同,其特征也有异同之处。要全面认识殷墟甲骨的特点,还必须对比比它早的二里冈期甲骨,以及比它晚的周原甲骨(部分与殷墟晚期同时),上表就是对这三类甲骨的具体情况的一个综述。

第二节　殷商甲骨文的基本内容

反映农业的甲骨片

反映军事的甲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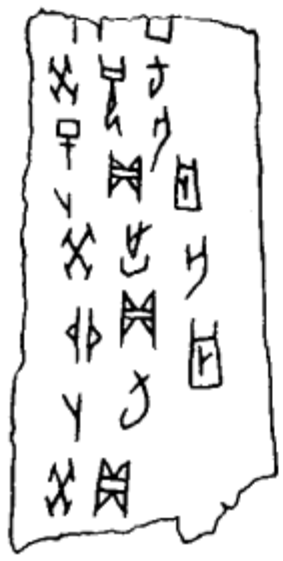
反映田猎的甲骨片

殷商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精神生活具有独自的特色。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代社会里，宗教世界观占据着支配地位。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所以殷墟甲骨文内容几乎涉及商代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气象、农业、祭祀、征伐、田猎、刍渔、行止、卜占、营建、梦幻以及疾病、死亡、吉凶、灾害、诸子、诸妇和家族等等。随着殷墟以及其他遗址考古工作的展开，还会发现更多新的甲骨。甲骨文研究揭示了中华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农业　在现有的甲骨文中，关于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的卜辞仅次于祭祀、征伐和田猎等事类，说明农业是殷商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从甲骨文看来，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中，记录最多的是黍，现在叫黍子，又叫大黄米。又有稷，就是谷子、小米。黍、稷是商代的主要粮食作物。殷人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农业已成为商代的支柱产业。年岁的丰欠对于人民的生活有直接关系，所以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卜问年岁丰欠（求年）的记录。

商四境之内，分布着许多的农田。商王在祈年时既希望“中商受年”，也希望“东土”、“西土”、“南土”、“北土”都能获得好收成。右上图所示的甲骨，是指播种黍苗，“年”表示获得好收成。

军事　商代的周边分布着许多部落，由于种种原因，它们与商王国经常发生战争冲突。甲骨文中记录了许多商代战争的情况和战争的方式。根据甲骨卜辞反映，商代各个时期都有对外战争的记录，祖甲时期有对晋方举兵的卜辞。廩辛康丁至武乙文丁时期有对羌方和召方直接的军事冲突的记录。帝乙帝辛时期，主要与东方的夷人作战。涉及的战争用词也非常丰富。有“追”、“侵”、“牧”等等。右图甲骨文所说的“登人”，就是召集军队的意思。甲骨文中经常可见商王随同大将蒙侯虎、望乘御驾亲征的记录。此外，甲骨卜辞中，还有一些常见的武将人名，



反映占卜的甲骨片

反映祭祀的甲骨片

例如沚𢦚、雀、亘等。

田猎 商代狩猎活动十分频繁，卜辞中常有狩猎的记载。猎获量最多的动物是鹿类和狐，其他还有豕、兔、马、鸡以至虎、兕象等。有时，一次猎获鹿可达几百头，足见其规模之大。对于各级贵族来讲，狩猎除了是一种娱乐活动外，也是和“祀与戎”的古代军国大事相联系的：即一方面进行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以擒获作为祭品。

占卜 商代巫术活动的核心是占卜，由“贞人”主司其事。“贞”是问卜的人，人数甚众，形成“贞人集团”。在武丁盛世以前，巫权与王权是相对独立的。而自祖甲改制以来，不仅卜事减少，占卜的范围受到更多的局限，而且商王亲自占卜，有意疏离贞人，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在所有五期甲骨文中，早期和中期的贞人数量都达到了十个以上，至晚期，数量减少为两三个，表明了王权与神权的统一。占卜的目的是为了定吉凶，即对兆象形式作出的一种结论，并用以指导各类活动。

祭祀 由于对世间的万物还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商代的先民们认为自然界的许多现象都由一个看不见的神在主宰。因此，“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祭祀之风泛滥。在商人的观念中，祭祀河、岳、山、雨，是因为它们有力量，希望其不带来灾害。在商王朝的统治者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由上帝鬼神来主宰的，风雨是否调顺和收成能有多少也得由上帝鬼神来决定。祭祀它们的时候，往往要使用牺牲，即是高级贵族特许的祭品。商代祭祀使用的牛、羊牺牲各有两种写法；一是常见的以头部代表全躯的牛、羊字。一是在牢圈中特别豢养的“牢”字。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而分别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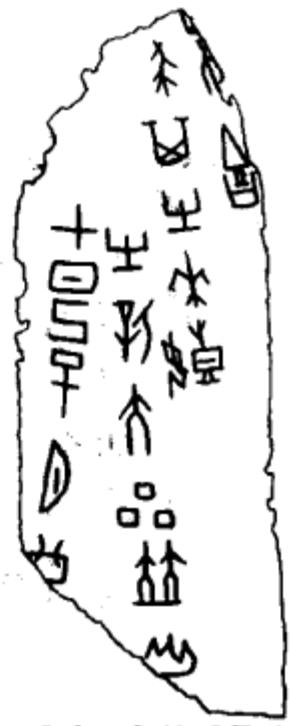
自然天象 商代十分重视天象的观察，对不同气象的把握也有相当的精确度，甲骨文中描述天象的词汇非常丰富。无论是农业、种植业，还是相关的畜牧业，都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风调雨顺，则农作物收成好，畜牧业所依赖的牧草也充足。天旱不雨，或淫雨泛滥，都会对当时的农业和畜牧业造成灾害。殷商的晚期都城所在地殷墟濒临洹水，既有用水之便，又易遭受水患。甲骨卜辞中对雨的占卜非常多，可见雨是当时生活中最需要考虑的内容之一。由于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必然形成对“雨”的神化心理。他们希望有一个雨神能接受自己的祈求。其他如风、雷、电等自然现象也都成为人们敬畏和崇拜的对

象。

疾病　甲骨材料中所记录的殷代疾病是多方面的，有疾口、疾止、疾目、疾耳、疾自(鼻子)、疾齿、疾骨、疾首等等。甲骨文记录了生病后向祖先神灵祭告禳灾祛病的丰富资料。

往来　商王朝的活动包括巡视、盟会、狩猎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内容，因此其交通往来十分频繁，对于出行安全和送往迎来的祝福祈求也是商代占卜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错　商代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已有明确记载，战国时荀子曾说："刑名从商。"并在考古发掘和甲骨文中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名目繁多，主要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各种文字。甲骨文中的"执"字，就是以枷拷锁人之形，是古代拘人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割鼻子的"劓"字，砍去腿的"刖"字，砍伐奴隶的"岁"字等等。


反映天象的甲骨片

称谓　甲骨文中所见亲属称谓很多，有：高祖——祖——父——兄、弟——子——孙，高妣——妣——母——妻、妇——子母、子妇，但这些称谓，既用于直系，也用于旁系，并非直截明了，尚应视具体场合而定。还有一些平行亲属称谓，如：大父——大母父——中父——父——小父；二父、三父、多父、公父、多公；大母——中母——母——小母——多母；小妾；三兄、四兄、多兄；多妹；大子——中子——小子——多子；二子、三子、四子、五子等等。其所指直、旁系抑或嫡庶概念，也均须纳入有关语言环境方能明析。不过这些亲属称谓几乎均在区分性别的基础上序其长幼，长幼的范畴大致贯彻于当时一切可能的亲属关系上，显然与商代贵族族氏家族结构形态和继承制度有密切关系。

反映疾病的甲骨片

反映往来的甲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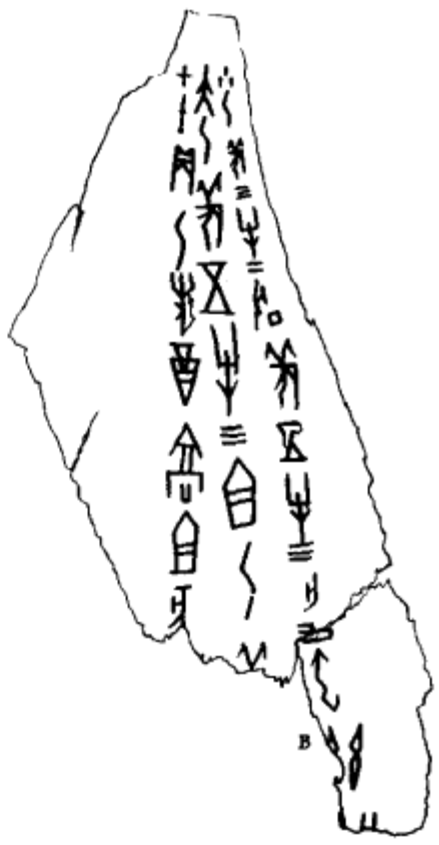
畜牧业　商代的畜牧业也非常发达。后世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猪)，不论在甲骨文或是在郑州早商和殷墟遗址中都已发现。商代的家畜，除了食用和用作劳

反映刑锴的甲骨片

反映称谓的甲骨片

动外,大量的用为牺牲。在祭祀坑和附属于贵族墓葬的兽葬坑中常有成批的兽骨发现,与甲骨卜辞中的用牲记载,往往可以相互印证。当时用牲的数字达到惊人的程度,少则数头,数十头,多则二三百头,甚至经常准备着上千头牛来供祭祀使用,如卜辞云“不其降册千牛千人”,便是其例。商代奴隶主贵族一次能够集中如此大量的牲畜,反映了当时畜牧业繁盛的情况。

人们开始经营畜牧之时,牲畜的刍秣依赖自然丛生的野草,人们只是逐水草而居,由于殷商畜牧业极为昌盛,近郊的自然草木已不能满足牲畜的需要,屡屡迁徙而不胜其烦,渐渐产生了刍秣的种植。甲骨文中有专门反映种植刍秣的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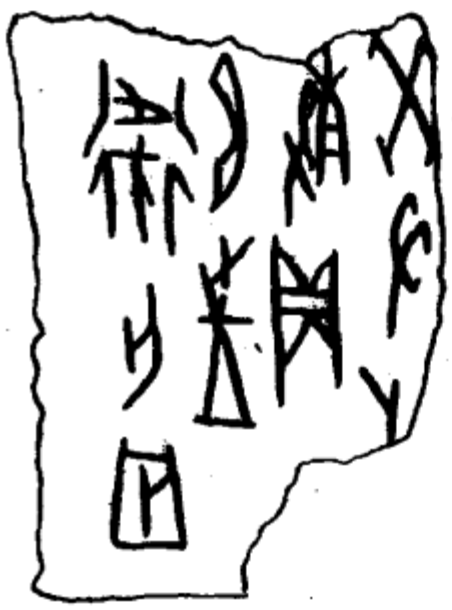


从祭祀中大量使用动物可见商代畜牧业的发达

地名 商代行政区划包括了王畿和封国两个层次,到商代后期,王畿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从卜辞和文献得知,兹邑、大邑商、天邑商和商邑处于王畿的核心地带。王畿内的行政区划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郊野,甲骨文中称为鄙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这些区划中,邑又是最基本的区划单位。这些不同的地区都有明确的地名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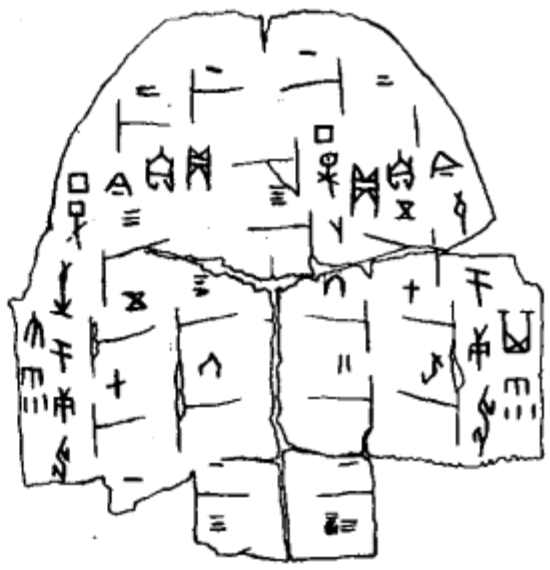
记载着“天”、“月”、“年”(祀)等时间概念的甲骨片

时间 商代表示时间的方法是,用一年四季持续不断进行的祭祀的“祀”来表示“年”字,以太阳之圆缺一次为一月,月有大月小月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大小月相间,两个月连续为大月称“频大月”。以太阳之温凉寒暑嬗变一次为



记载着地名的甲骨片

记载着官吏"小臣"名称的甲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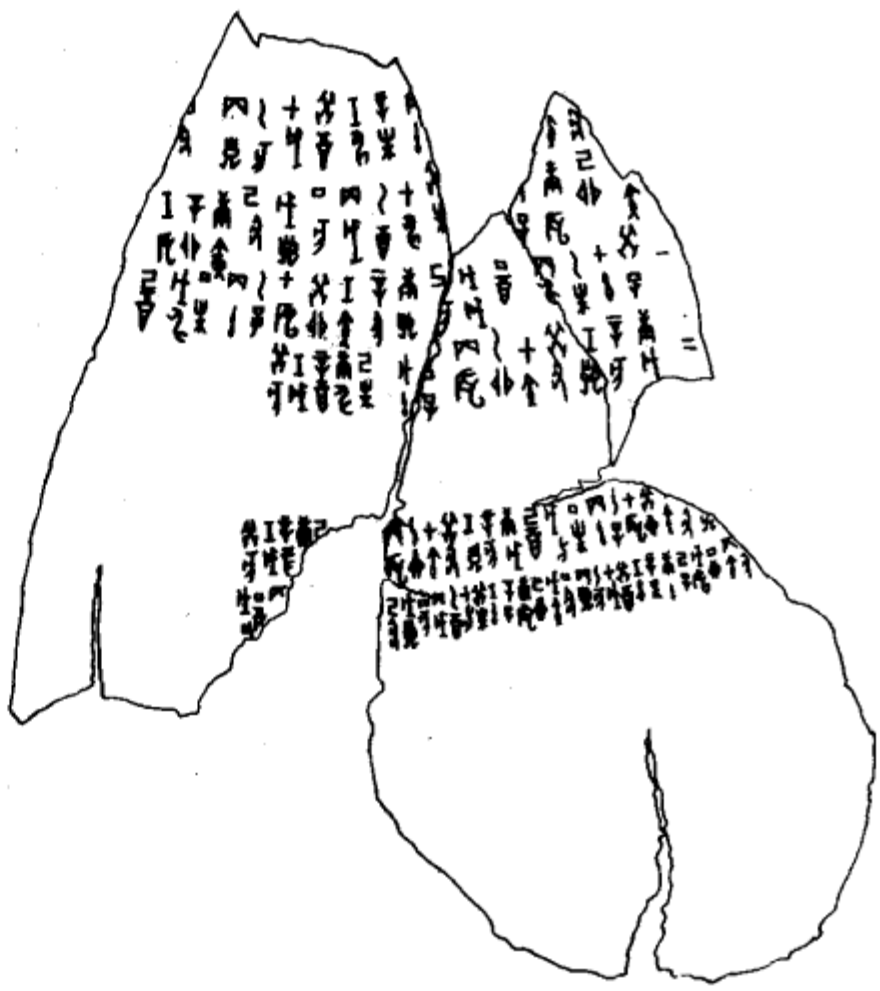


记载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字的甲骨片

一年，用闰月调整阴阳之差，即三年一闰，十九年而七闰，全年平均365.14天。武丁、祖庚时于年终置闰称"十三月"，祖甲以后始改为年中置闰即置闰于当闰之月，并改称一月为正月。另外，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纪日，即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顺序配对，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60日一周循环使用。在出土的商代武乙时的一块牛胛骨上面刻着完整的60天干地支，两个月共计60天，这也许就是当时的日历。

职官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商王之下设有各种官吏，大体可以分为文职官、武职官和史官三大类。文职官的名称有尹、多尹、臣、小臣、多臣等。臣的种别很多，有王臣、小王臣、耤臣等，多臣当是其总称。甲骨文中反映的武职官的名称有马、多马、亚、多亚、射、多射。史官的身份复杂，当与巫者有关，其地位特殊，常与商王一起主持占卜祭祀活动。

数字　商代甲骨文中有从一到九完整的基数，也有十进位、百进位以及千、万等数字。



甲骨文记载的商代六十干支

第三节　甲骨文单字释读

干支类　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发展为干支纪日，即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顺序配对，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60日一周循环使用。

十　甲：甲骨文甲字写成现代汉字十的形状，其结构或释为“画押”、“鱼鳞”、“龟形”等多种，意义无法确定。假借为天干字。

𠂇　乙：甲骨文乙字的结构意义不明，有“鞋子”、“脖子”、“斜长的草木”、“鱼肠”等多种解释，尚无定论。假借为天干字。

　丙：甲骨文丙字的形状据说象鱼的尾巴，又说是某种物体的底座。初义无法确定。假借为天干字。

　丁：字的结构象人的头顶。后来又在口下增添一个尖状物，为钉子的形状。假借为天干字。

　戊：字的结构为象形字，象斧钺的形状，假借为天干字。

　己：字的结构象绳索系扎的形状，假借为天干字。

　庚：字的结构象古代某种乐器的形象，假借为天干字。

　辛：字的结构意义不明，假借为天干字。

　壬：字的结构象古代织布所用的一种工具，假借为天干字。

　癸：字的结构意义不明，假借为天干字。

　子：字的结构意义不明，假借为地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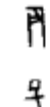
　丑：字的结构象手指甲的形状，假借为地支字。

　寅：字的结构象古代箭矢的形状，后来又加上一些笔画，成为地支字。

　卯：字的结构象将一件东西从中间对剖的形状，假借为地支字。

　辰：字的结构象耕田之犁的形状，假借为地支字。

　巳：字的结构象孩童的形状，假借为地支字。

 　午：字的结构象编织的绳索形状，假借为地支字。

　未：字的结构象树木有枝干根须的形状，假借为地支字。

　申：字的结构为闪电的形状，假借为地支字。

　酉：字的结构象尖底陶瓶的形状，假借为地支字。

　戌：字的结构象古代斧钺类兵器，假借为地支字。

　亥：字的结构意义不明，假借为地支字。

数字方向类

　一至四：是甲骨文中最基本的数字，分别写成一至四横。

　五：甲骨文的基数从五开始变化，五字的写法构造意义不明。

　六：甲骨文的基数六字，字体构造意义不明。

　七：甲骨文七字的形状像现代汉字大写的十字，只不过一横短、一竖长。七字构造意义不明，作为基数是假借字。

　八：八字像相背之形，初义不明，假借为数字。

　九：九字的形状像手肘，假借为数字。

　十：十字写成一竖，其构造初义不明。

　廿：写成两竖在下端相连。

　卅：写成三竖在下端相连。

　四十：写成四竖在下端相连。

　五十：写成十字在上、五字在下的合文形状，甲骨文中数字写作合文的形式十分普遍。

　七十：写成现代汉字大写的十字的形状，为了与七字相区别，其一横较短，而一竖的上半部分特长。

　八十：写成一竖在八字中间。

　百：甲骨文百字早期的写法可以作数字，也可以作黑白的白字。晚期在原来的结构上增加一横，作为数字专用。

　千：是在人(侧立形)的下面加一横组成，加两横为两千，三横为三千。

　万：字像蝎子类爬虫，以其多足引申为数量之多。

　上：由上面一根短直线和下面一长弧线组成，短直线在空间上表示在长弧线的上面，引申为上下的上。

　下：由下面一根短直线和上面一根长弧线组成，短直线在空间上表示在长弧线的下面，引申为上下的下。

　东：字的原形像两头扎住的一个口袋，在甲骨文中假借为东方之东，用作方向和东方的土神。

　南：因同音假借为南方之南，甲骨文中用作方向字和南方的土神。

　西：字的原形像一只张口的口袋，甲骨文中用作方向字和西方的土神。

　北：字的原形像两人背靠着背。因为同音假借为北方之北，又可作北方的土神。

　内：字的结构好像人在某种场合之内，甲骨文经常用作人名。

　左：字的形状像人的左手，甲骨文中以左手表示左面，后来又演化成在手下加上工字的固定写法。

　右：字的形状像人的右手，甲骨文中以右手表示右面，后来又在手下加上口字，成为固定写法。

　中：字的结构由一个圆圈、一竖和上下数条飘带三个部分组成。中字同古代的军事有关，在战争中军队都要建立指挥所，在古代称为中军。圆圈表示中军所在，一竖是树立的旗杆，飘带则是帅旗的象形。后来引申为中间之义，在甲骨文中有时用作人名。

人体类

　人：字的结构像人侧立形状。

　大：字的结构像人的正面形象，甲骨文中用作人名。

　元：字的结构像人的侧面形状，并用两横突出颈部和头部，有头和首的意思。

　夫：字的结构为大字上面一横，大是人的正面形象，一横表示人的某种高度，达到这一高度，即可为夫，因此夫有成年人的意思。

　友：字的结构为两只手并列的形状。.

　自：字的结构像人的鼻子的形状，后来又加上表示声音的畀旁，成为形声字。

　目：字的结构像眼睛的形状，是目的本字。

　口：字的结构像人的口部形状。

　耳：字的结构像人的耳朵的形状。

　舌：字的结构像舌头伸出口外的形状，有的字还加有数点，表示唾液。

　身：字的结构像人体的形状，当中突起部分像腹部，也可解释为孕字。

　众：字的结构写成日下三人形状，三人寓意人数众多。众的身份比较复杂，从字面理解，为在太阳下劳动的奴隶。也有人认为，众是商代的基本群众，从事农业劳动和军事战争，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并：字的结构像两个人前后站在一起。

　从：字的结构为两个侧立的人一前一后相互随行。

　交：字的结构像一个人两脚相交之形。

　齿：字的结构像人的口中有牙齿的形状。

　足:字的结构像人的脚上有脚趾的形状。

　首:字的结构像人头的侧面形状

　心:字的结构像人的心脏的轮廓之形。

动物类

　牛:字的结构像正面看牛的形状,突出两个弯曲的牛角。

　羊:字的形状突出弯曲的羊角。

　马:字的结构像马的侧面形象,有马的长脸,大眼睛,瘦劲的长腿和飞扬的马鬃等特征。

　豕:字的结构像一头猪的侧面形状,有的字形突出尖利的鬣毛,又似野猪。甲骨文中有时用作人名。

　彘:字的结构为一支箭矢射中一只猪,表示狩猎所获的野猪。

　犬:字的结构像狗的侧面形象,有细长的身子和弯弯的尾巴等特征。

　狼:字的结构由表示声音的良字和表示意义的犬字组成,狼属于犬科动物。

　狈:字的结构由表示声音的贝字和表示意义的犬字组成,狈与狼同类,均属犬科。

　牢:字的结构从宝盖头从牛,表示关在牛栏中的牛。由于商代祭祀频繁,使用牛羊等牺牲不但数量多,而且还有毛色、性别等要求,因此,提前喂养特殊的牛羊,以备不时之需,是十分重要的工作。牢的本义就是这类特殊喂养的牛。

　兔:字的结构像兔子的形状,突出长耳朵和翘尾巴等特征。

　鼠:字的结构像老鼠的形状。甲骨文中主要用作女子的名字。

　象:字的结构为像的形状,突出象的长鼻等特征。

　鹿:字的结构像鹿的形状,突出枝形鹿角、细腿等特征以及鹿奔跑跳跃的动态。

　鱼:字的结构像鱼的形状,细腻刻画出鱼鳍、鱼纹、鱼睛、鱼尾等鱼的特征。

　龟:字的结构像龟的形状,突出龟首、龟壳、蹼形脚以及短细尾巴等龟的特征。

　蛇:字写作它,为蛇的原形,突出细长弯曲的身躯。后来加上虫旁,使意义更加明确。

　物:字的结构为从牛从勿,甲骨文中作为杂色牛的称呼。

牡:字的结构从牛旁从土,是公牛的意思。甲骨文中其他动物如羊、豕、马等,都可以从土旁,从土旁的动物即表明为雄性。

 :字的结构从牛旁从匕,匕即妣,为已故的女性先祖,牛旁从匕,表示母牛的意思。其他动物如羊、豕、马等,也可以如此造字,从匕旁的即为雌性。

 虎:字的结构为老虎的象形,突出老虎的大口、长尾巴以及虎皮斑纹等特征。

 雀:字的结构从小从隹,隹是鸟的象形,雀就是小鸟的意思。

 雉:字的结构由表示声音的矢和表示意义的隹两个部分组成,雉的意思为野鸡。

 鸟:字的结构像鸟的形状。

 龙:字的结构似龙的形象,由龙头、龙身和龙尾三个部分组成,尤其突出龙尾的弯曲虬长。

 凤:字的结构为美丽漂亮之鸟的象形,突出高耸的凤冠和长曳的羽毛。

 鸡:字的结构由表示声音的奚旁和表示意义的隹旁组成,古文字中从隹从鸟相通,都是鸟类用词。

植物类

 草:字的结构像小草的茎和叶。

 木:树木的象形字,由树躯、枝干和茎须几个部分组成。

 林:字的结构由双木组成,取双木成林之义。

森:字的结构由三木组成,三在中国数字中表示众多的意思,三木即表示树木茂密的森林。

 果:字的结构像树上长了果实的形状。

 杜:字的结构从木从土,木是形旁,土是声旁与现代汉字的形体相同。

 柳:字为上下结构,由表示声音的卯旁和表示意义的木旁组成。

 杞:字为上下结构,由表示声音的己旁和表示意义的木旁组成。

 柏:字为上下结构,由表示声音的白旁和表示意义的木旁组成。

 桑:字的结构像桑树的形状。

 蒿:字的结构由表示声音的高字和表示意义的草字组成,是芦蒿的简称。

农艺食物类

 农:字的原形由林和辰两个部分组成。林指杂树荆棘,辰是犁的象形

字。农字的本义是指开垦荒田，后来引申为与农业相关的各类事项。

　力：字的结构像一种农具的形状。

　艺：字的结构像人种树的形状，后来引申为园艺。

　耒：字的结构像一种农具的形状。

　田：字的形状像阡陌纵横的田地。

　藉：字的结构由表示声音的昔字和表示意义的耒字组成，有播耕田地的意思。

　尿：字的结构像人直接施尿于田地的形状。

　屎：字的结构像人直接施粪于田地的形状。

　麦：字的结构从来从“倒止”。来为某种农作物的形状，有杆、穗、根茎等特征，“倒止”像下垂的麦穗。

　米：字的结构像去了皮壳的某种粮食。

　栗：字的结构像树上长有毛栗的形状。

　黍：字的结构像农作物黍的形状，突出其下垂的穗等特征。

　来：来为某种与麦相近的农作物的形状，有杆、穗、根茎等特征。

　廪：字的结构像用来储存庄稼的仓库。

　禾：字的结构像庄稼禾苗的形状，有杆、穗和根茎等特征。

　年：字的结构像人扛着庄稼的形状，表示收获的意思。

　圃：字的结构像在划定界限的土地上种植了草木的形状，表示苑圃的意思。

　鬯：字的结构意义不明，似在某种容器中贮物的形状。在甲骨文中作一种黑米酒的名称。

自然地貌类

　山：字型像山的各种形状。山在甲骨文中被认为是自然神的一种，主管风雨变幻，祸福人间，因而受到祭祀。山字在甲骨文中有时也会用作地名。

　丘：字的结构像小山丘的形状。

　岳：字的结构像山上有峰，在甲骨文中用作岳神的专名，与河神一样受到隆重祭祀。

　河：字的结构由表示意义的“水”旁和表示声音的“可”旁组成。甲骨文中河作为黄河的专用之名。通常用作河神和商代的先公，受到隆重的祭祀。

　水：字的结构像水流的形状。

　川:字的结构像两岸之间水流流淌的形状。

　火:字的结构像火焰上升的形状。

　石:字的结构像石头的形状。

　阜:字的结构像层层重叠的山坡形状。

　麓:字的结构由表示意义的林字和表示声音的鹿字组成,为山麓的意思。

　洲:字的结构像河流之中的一块陆地。

　土:字的结构像堆土之形,甲骨文中主要用作土神,即后世的社神。

　泉:字的结构像从某处流淌出泉水的形状。

行动类

　往:字的结构从止从土,有行走之义。

　步:字的结构像人的脚步一前一后之形,有行走之义。

　涉:字的结构为"两止"于河的两边,表示跋涉过河的意思。

　进:字的结构从隹从止,本义为鸟向前飞行,后引申为一切向前的行为。

　行:字的结构像十字相交的通衢大道,本义为行(音hang),引申为行走之义。甲骨文有时用作人名。

　降:字的结构从阜从两个向下的脚步,表示下降的意思。

　陟:字的结构从阜和从两个向上的脚步,阜有山坡之义。两者组合表示向上登高的意思,后引申为提拔、升任等意。

　各:字的结构由一个向下的止(脚)和口两个部分组成,表示由外而至,有到的意思。

　采:字的结构由一个手和一个木两个部分组成,像手在树上采摘果子的形状。

　分:字的结构由一把刀和一撇一捺三个部分组成,表示刀将一件东西一分为二。

　启:字的结构由一个户和一个手两个部分组成,本义为手开启窗户,甲骨文中又引申为天气放晴的意思。

　册:字的结构像系编成册的竹简,其本义为记录文件的简册,用作动词有册命、册封的意思。

　出:字的形状像一个止(脚)从一个凹陷处走出来。甲骨文中用作人名。

　刍：字的结构像用手除草的形状，甲骨文中此字有饲养家畜的意思。

　休：字的结构为人倚靠在树木上之形，有歇息之意。

　宿：字的结构为屋内人倚靠席子的形状，表示投宿睡觉之义。

　获：字的结构由一个手和一个隹(鸟)两个部分组成，表示以手捕获禽鸟之义。

　秉：字的结构像一手持禾的形象，初义可能与收割庄稼有关，后来也可用为对其他东西的把持。

　受：字的结构像两个手传递东西的形状，有授予的意思。

　及：字的结构由一个人和一个手两个部分组成，表示手够得到人，有到的意思。

　企：字的结构由一个人和一个止两个部分组成，写成人踮脚之形。

　至：字的结构写成一支箭矢射到地上之形，有到的意思。

　氏：字体的构意不明，甲骨文中有进贡的意思。

　协：字的结构从三力从一口，力是农具耒的象形，一口表示土地，字的本义是指许多人同时进行耕作。后来引申为所有的合作行为。

　折：字的结构写成手折断树木之形。

　言：字的结构像口中吐出舌头的形象，表示说话。

　围：字的结构为两个(或四个)脚围着一个口，“口”的形象在甲骨文中是人口聚集的场所，可以理解为城镇。该字的本义有包围的意思，甲骨文中经常作为人名使用。

　食：字的结构像食物放在器皿之中，再上加盖子的形状，本义为可以食用的东西，又用为动词饮食的意思。

　望：字的结构像人站在地上举目远眺之形。

　奠：字的结构由酉(陶器)和一横两个部分组成，初意为将酒器放置于地上，后来引申为安定、奠定的意思。

　立：字的结构由大字和一横组成，大是人的正面形状，一横表示地面。立就是人站在地上的形象。甲骨文中有时用作人名。

　何：字的结构像人的肩上担货的形象，本义为负荷。甲骨文中有时用作人名。

　即：字的结构由两部分组成，左边为食器簋的象形，右边是人跪着的形

状。即表示人来进膳的意思。

　既:字的结构由一个跪着的人和一个簋组成,跪在簋前的人头向后转,表示进食完毕。因此既有完毕的意思。

　见:字的结构由一个人和一个目两部分组成,突出眼睛部分,表示看见之义。

　夹:字的结构像大人臂下夹着两个小人。

　舂:字的结构像两手握杵捣向石臼的形象。

　取:字的结构像以手取耳朵之形,其本义当与古代战争中记录杀敌人数有关。

　为:字的结构为以手牵象之形,本义为训象。

　毓:字的结构从女从一个倒子之形,子字旁边还有数点,本义为女子生产孩子。

　省:字的结构由一个表示声音的“生”字和表示意义的“目”字组成,本义有视察的意思。

　相:字的结构从木从目,本义为视木。后来引申为相互观察的意思。

　逐:字的结构由一个止和一个豕两个部分组成,本义表示追逐野猪。古文字中的止可以隶定为走字底。从甲骨文看,逐字仅用于动物。用于人的话,只能用追字。甲骨文中逐字有时用作人名。

　斗:字的结构像两人以手搏击之形,有相斗之义。

　溢:字的结构从水从皿,表示水从器皿中满出来的意思。

　乘:字的结构像人爬在树上之形,引申为向上之义。

　娶:字的结构由一个表示声音的取字和一个表示意义的女字组成,本义为男子娶妻。

　集:字的结构从木从鸟,像飞禽栖息于树上之形。后来引申为集合的意思。

　焚:字的结构像焚烧林木的形状。

　媚:字的结构为一个跪着的女子,突出其眉眼部分,表示女子柔媚之态。

　鸣:字的结构从鸟从口,表示鸟鸣之义。

　封:字的结构像栽种树木的形状,可能与古代划定疆界的习俗有关。

　尽:字的结构像一根有毛的刷子在器皿中的形状,表示将器皿清理干

净的意思。

　闻:字的结构为一个人突出其耳朵,表示倾听之意。

　鉴:字的结构像人跪在器皿之前的形状,表示以水为镜子,观察容貌。后来引申为借鉴之义。

　饮:字的结构像人伸出舌头在容器中喝水的形象。

　历:字的结构像人经过农田的形状,后来引申为经历的意义。

　擒:字的结构为长柄上安装网兜的形象。其本义为捕捉飞禽,后来引申为其他与捕获有关系的对象。

　兴:字的结构由四个手和一个凡(盘)组成,表示四个手抬起盘子,有向上提起之义。

　扶:字的结构像一个正面而立的人扶着某样东西,甲骨文中经常作为人名。

军事类

　侵:字的结构意义不明,甲骨文中均用作侵犯的意思。

　牧:字的结构像人手持鞭子放牛的形象,甲骨文中有时用作侵伐的意思。

　伐:字的结构像戈架于人的脖子上,有砍伐的意思。

　兵:字的结构像两手持斧斤的形象,引申为用兵作战的意思。

　征:字的结构像脚步走向城邑的形象,甲骨文中引申为征伐的意思。

　败:字的结构意义不明确,甲骨文中用作与战争有关的意思。

　戈:字的结构像兵器戈的形状。

　矢:字的结构像箭矢的形状。

　弓:字的结构像一支弓的形状。

　岁:字的结构像戈类兵器的形状。

　我:字的结构像兵器的形状,甲骨文中经常用作人名。

　师:字的结构意义不明。甲骨文中用作师旅之义,有时候加上“巾”(军旗),表示军队的意义更加明确。

　武:字的结构由止和戈两个部分组成,表示拿着武器去作战。

　逆:字的结构由一个倒写的“大”和“行省”旁组成,“大”在甲骨文中是人的正面形象,倒写表示由外入内,形省旁表示行走之义。这个字原意是上前迎

接走过来的人。在甲骨文中,逆经常作迎头痛击来犯敌人之义。

 追:字的结构由止和𠂤(师)两个部分组成,有追击敌人之义。

 射:字的形状像箭搭在弓上,有射击之意。甲骨文中射字有动词射击之义,也可表达名词射击者。

 俘:字的结构为以手抓人(子)之形,后来又加上单人旁,有俘获人的意思。

 旅:字的结构像人聚集于旗帜之下,有军队集合之义。甲骨文中有时用作人名。

 族:字的结构由旗帜和箭矢两个部分组成,隶定为族。族在中国上古时期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部队。

职官类

 史:字的结构像手持中(简册的抽象之形),为商代重要的官吏,主管祭祀、册命等。

 臣:字的结构像竖起的眼睛的形状。甲骨文中的臣是一种职官的名称,其意义取自竖目监视。甲骨文中没有大臣,只见小臣,其地位高低不等,职责为协助君主管理国家各类事务。

 亚:字的结构意义不明确,甲骨文中经常用作武官的名称。

 尹:尹的结构像人持拐杖,寓意年事已高,引申为德高望重。尹的地位很高,是辅助商王治理国家的重臣。

 宰:字义结构不明,在甲骨文中用作职官名称,其所司管的职责不太清楚。

天象类

 天:字的结构为大字上面一个口字,本义为人的头顶。后来同音假借为天地的天字。

 雨:字的原形像天上下雨。雨在甲骨文中表示一种自然现象,同时又被作为雨神加以祭祀。

 雪:字的结构像天上下雪之形,雪在甲骨文中表示一种自然现象,同时又被作为雪神加以祭祀。

 雷:字的结构像闪电伴随着雷声的形象。

 雹:字的结构从雨从数个菱形状的小点,像下冰雹的形状。

　星：字的结构由表示声音的生字和表示意义的口（晶，星的象形）字组成形声字，星字成为星星的专用名词，而星星的象形字晶只表示晶莹光亮的意思。

　晶：字的结构像一颗颗星星的形状，本义为星星。由于星能发光，因此晶有光亮的意思。

　月：字的结构像月亮半圆的形状。

　日：字的结构是太阳的象形，在甲骨文中用作自然现象和太阳神。甲骨文对于太阳的自然现象观察十分仔细，有日出日落日食等。

　云：字的结构像云彩之形。在甲骨文中用为自然现象和云神，有主宰降雨的权力。

　风：字的原形为凤凰的凤字，甲骨文中因为音同而假借为风。风表示一种自然现象，由于它同降雨紧密关联，又被商人视为风神加以祭祀。

　虹：字的结构像彩虹的形状。

　延：由一个止和形省旁组成，本意为行走在路上。甲骨文经常与降雨放在一起使用，称“延雨”，在此又有连续之义。

器用类

　车：字的结构为古代马车的象形，有车厢、车轮和车轴等部件。

　舟：字的结构像小船的形状，横线表示船舱的分割。

　鬲：字的结构像陶器三袋足鬲的形象。

　鼎：字的结构像器物鼎的形象。

　甗：字的结构像器物甗的形状。

　朋：字的结构像用绳索系穿起来的两串玉片形状。

　衣：字的结构像衣服的形状。

　裘：字的结构像衣服外有毛皮的形象。

　丝：字的结构像织好的丝的形状。

　帛：字的结构由表示声音的白字和表示意义的巾字组成，巾是古代丝织品的一种名称。

　皿：字的结构是器皿的象形。

　乐：字的结构由丝和木两个部分组成，表示由木和丝做的弦乐器。

　箙：字的结构像放置箭矢的口袋，甲骨文中经常用作人名。

　盂：字的结构由表示器物的皿和表示声音的于两个部分组成。盂是商

代常用的水器之一,主要以青铜和陶器为质地。

门:是门的象形字。

户:是窗户的象形字。

鼓:是乐器鼓的象形字。

聿:字的结构像手持毛笔的形状,其本义为毛笔。

缶:字的结构像一个陶器的形状。

网:字的结构像编织而成的网。

卣:字的结构像一种酒器。

斤:字的结构像斧头的原形。

簋:字的结构像用于盛装食物的器物簋的形状。

磬:字的结构像手持东西击打乐器的形象,磬是古代一种用玉石或青铜制成的乐器。

俎:字的结构像将肉陈列木架子上的形象,与古代的祭祀仪式有关,后来又引申为切菜用的案板。

帚:字的结构像用某种农作物或植物秸杆做成的扫帚,甲骨文中又作妇女的“妇”字。

建筑城邑类

室:字的结构由表示意义的宝盖头和表示声音的至两个部分组成形声字。

家:字的结构从宝盖头从豕,其本义为养猪之圈。后来用作人类的居室。

京:字的结构像建在高地上的建筑物。

高:高的原意为带有门楼的高大建筑物,后来引申为一切高大之意。

郭:字的结构像城郭的形状,有四方的城区和两个城楼。

牢:牢是商代喂养祭祀所用牺牲的地方,后来也可用于关押人犯的场所。

宣:字的结构从宝盖头、从亘,表示大的建筑物。

宫:字的结构由宝盖头和双口组成,宝盖头表示字与建筑有关,双口表示房屋众多,比邻相连之义。

邑:从一个表示城镇的“口”和一个跪着的人形,为城邑的“邑”的本字,甲骨文中有时用作人名。

刑错灾病类

　执：字的结构像一个跪着的人双手被枷锁住的形状。

　服：字的结构像以手从身后将人执住之形，本义为制服。甲骨文中又可作为奴隶的一种称谓。

　灾：有多种写法，字的结构意义不明确，在甲骨文中表示灾害凶祸的意思。

　圉：字的结构像将手被枷住的囚犯关于房中的形状。

　刖：字的结构为用刀砍斫人腿的形象，是古代五刑之一。

　劓：字的结构像用刀割人的鼻子的形象，是古代五刑之一。

　疾：甲骨文中有两种写法，一种像人躺在床上，表示患病；还有一种像箭矢射中人的腋下，表示受到创伤。

　死：字的结构像人在骨殖旁边，有死亡的意思。

时间类

　夕：字的结构像月亮半圆之形，时间表示与夜晚有关。

　昏：字的结构像太阳移到人的下部，表示日薄西山，天色将暗。

　昃：字的结构像太阳西斜人体倾斜，表示已过午后的一段时间。

　旦：字的结构像太阳刚刚露出地平线，表示清早的意思。

　旬：字的结构意义不明确，甲骨文中假借为旬字。一旬为十天。

　今：字的结构意义不明确，甲骨文假借为时间用词，表示现在。

　昔：字的结构象波涛覆于太阳之上，意义不很明确。甲骨文假借为时间用词，表示以前。

　夙：字的结构从人从月亮，表示天还未亮就已开始劳作，有早的意思。

　春：字的结构从日从木，表示春天草木滋盛的意思。右边屯字，表示读音。

　秋：字的结构由火和表示蟋蟀的秋虫两部分组成。火是秋天到来的某种星宿的名称，而蟋蟀是秋天的昆虫。字的所有部分都与秋天有关。

　翌：子的结构意义不是很明确，甲骨文中表示第二天或当天以后的日子。

　朝：字的结构由草木和日、月等部分组成，寓意月亮未落太阳已经出来，表示早上的时间概念。

　暮：字的结构由四草和日两个部分组成，写成日在四草之间，表示太阳

落山、日暮黄昏之义。

祭祀占卜类

 祭:字的结构像将手持祭物的形象,在甲骨文中用作祭祀的总称。

 卜:字的形状像甲骨受灼后显现的兆纹,其读音也应与甲骨受热爆裂发出的声音有关。占卜是商代重要的活动。

 帝:字的原形像花蒂,甲骨文中用作上帝之帝。殷商时代人们将帝视为统治自然和社会的主宰者,受到隆重的祭祀。

 告:字的结构像舌头伸出口中,有说告之义,是商代的一种祭祀方式。

 宁:字的结构像器皿安稳地放置在祭坛上,有稳定的意思。甲骨文中用作一种祈求大风停止的祭名。

 燎:字的结构像以火焚烧架成一定形状的木头,是古代祭天的一种方式。

 沈:字的结构像将牛扔到河中的形象,是商代祭祀河神的一种方式。

 祝:字的结构像人跪在祭坛前,有所祈祷的形状,是商代的一种祭祀方式。

登:字的结构像双手捧着食器进献神灵的形象,是商代的一种祭祀方式。

 舞:字的结构像人的双手拿着某种东西在跳舞,是舞蹈之舞的本字。商代跳舞的目的大多与祭祀求雨有关系。舞字在甲骨文中也被假借为有无的"无"。

称谓类

 老:字的结构像一个长须老者拄着一根拐杖。

 妣:甲骨文初形为匕首之匕,假借为考妣之妣(妣,即去世的母亲)。

 祖:祖字最初的构型像神主的牌位,后来又加上了表示祭坛的示旁。祖在甲骨文中是对所有祖辈先人的称呼。

父:父字为手持斧斤的形象,可能源于远古时期男子开荒垦田的情形。甲骨文中的父是对父辈的通称。

女:字的结构为一女子跪坐形,双手相交,俯首弯腰,颇有柔顺之意。甲骨文中的女字为女子的称呼,有时也可作商王的配偶解释。

母:其基本结构为女子形象,只是在字的上部加上两点,寓意女子乳房,表示已经生育的妇女。甲骨文中的母字是各代君主对母辈的通称。

妾:字由女字和"辛"形组成。凡是写作"辛"形的,皆表示头部装饰。在

动物则为冠,在人物则为头饰。甲骨文中的妾字有配偶的意思。

妇:妇是由声音相同假借而来的字,它最初的结构像一把扫帚。甲骨文中的妇字表示了一种妇女的身份,她们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实权,能够参与祭祀和战争等重大事务。有的妇某还是商王的后妃。

尹:字的结构像手持拐杖之形,寓意年老之人,引申有德高望重之意。

君:字的结构从尹从口,表示由德高望重者发号施令。

兄:由一个侧面的人和一个口字组成,最初的结构不明含义。甲骨文中的兄是对所有兄辈的通称。

妃:字由表示意思的女字和表示声音的己字组成。甲骨文中只见作为一种特定人的配偶,后世引申为君主的配偶。

余:字的结构意义不明,甲骨文中商王称呼自己为"余一人",似有"我"的意思。也可用作人名。

侯:字由广字头和矢字组成,构意不明。甲骨文中的侯字是商代边疆地方的最高官吏。

伯:字的结构似为人首的正面形,引申有尊贵年长之义。后来又加上表示意思的单人旁,使字的意义更加明确。甲骨文中的伯字是商王国四域外的首领或长官。

子:子字在甲骨文中有两种写法,该写法像儿童的形象,毛发上扬,穿着肚兜,表现了儿童活泼的情景。

男:字的结构由一个田字和一个力字组成。力是农具的象形字,力与田结合表示耕田之意。

众:字的结构从日从三人,初义为数人合作事宜,后来引申为众多之义。

第四节 殷商甲骨片释读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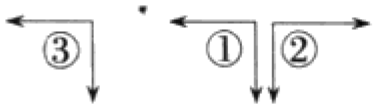
①癸亥日,贞人殷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王查看卜兆后说:"有鬼神作祟!可能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到了第七天的己巳日,果然有不吉利的事情在西方发生。垦地的首领友角报告说:"㐭方出兵侵犯我𡚬地区的土地,并掠走七十人。"

②癸巳日占卜,贞人殷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王查看卜兆后说:"有鬼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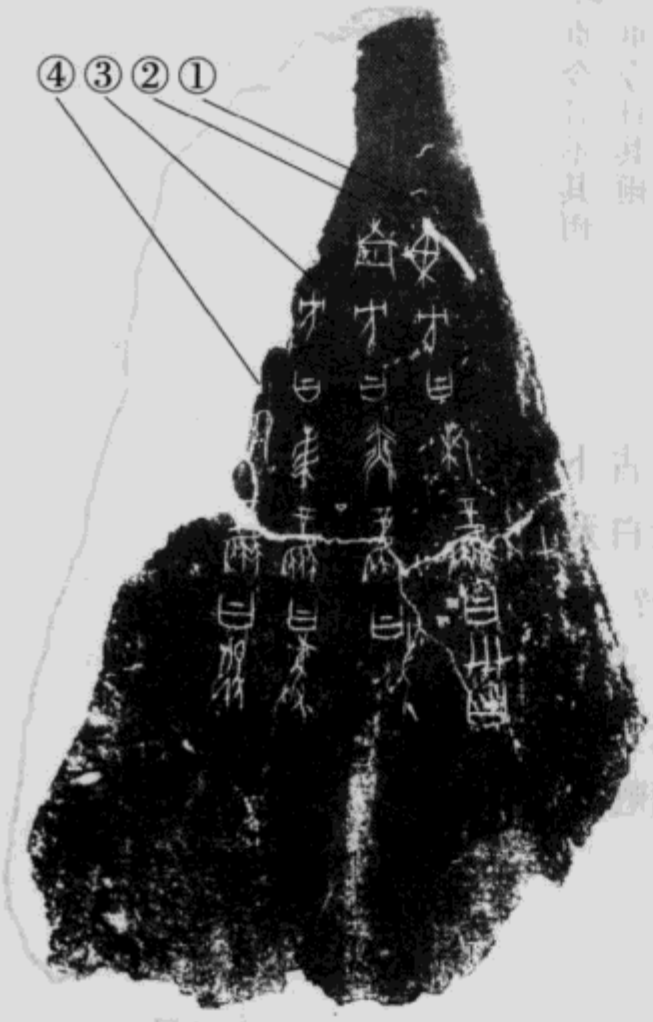
作祟！可能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到了第五天的丁酉日，果然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沚馘报告说：“土方攻打我东部的边邑，使两座城邑饱受兵灾，𢀛方也攻打我西部的边邑，并掠走……”

③癸丑日，贞人殻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王看兆后说：“有鬼神作祟！可能有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到第五天的丁未日，果然有不吉利之事发生……

605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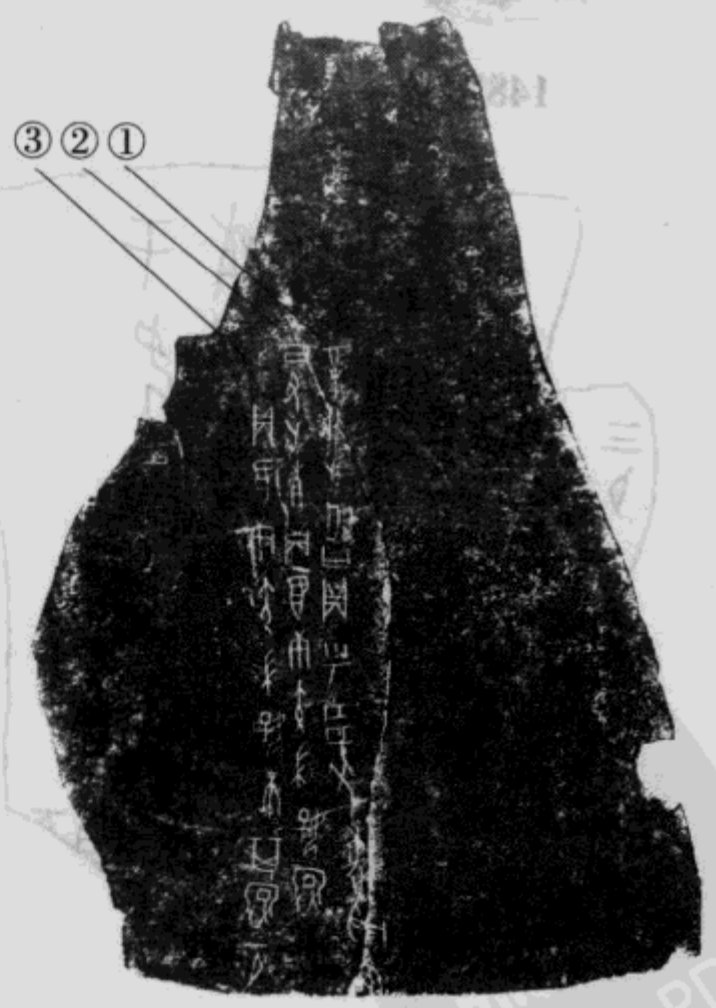
自弖圉六月
有来艱[illegible]卯
来艱五日丁未允
王固曰有祟其有
癸卯卜殻贞旬无祸
王固曰有祟其出来艱迄至七日己
巳允有来艱自西旱友角
告曰𢀛方出[illegible]我于[illegible]田七十人五
癸巳卜殻贞旬无祸王固曰有
其有来艱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艱
自西沚馘告曰土方征于我东啚
𢦏二邑𢀛方亦[illegible]我西啚田



14294号

①东方曰析风曰劦。
②南方曰因风曰党。
③西方曰丰风曰彝。
④北方曰勹风曰役。

东方的神名字叫做析,风神名字叫做协。
南方的神名字叫做因,风神名字叫做党。
西方的神名字叫做丰,风神名字叫做彝。
北方的神名字叫做勹,风神名字叫做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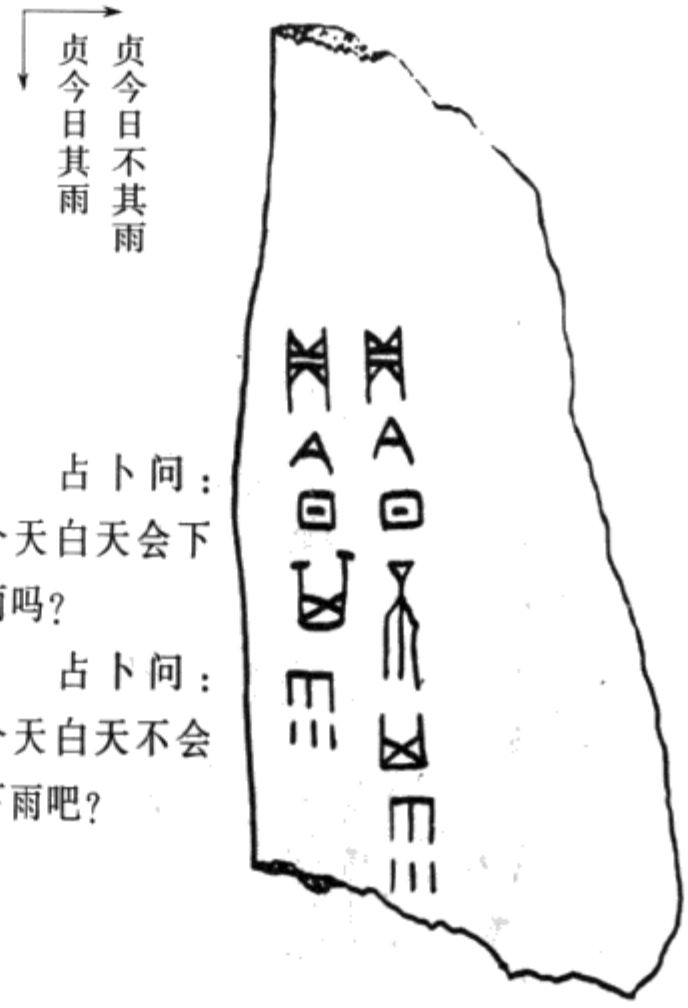


154号

①辛卯卜㞢贞呼多羌逐曰(兔)(双)(猎)。
②己丑卜殼贞翌庚寅帚好娩。
③贞翌庚寅帚好不其娩,一月。

己丑日,贞人殼问:第二天庚寅日,让妇好主持祭祀生育神吗?又问:第二天庚寅日,不是由妇好主持祭祀生育神吗?时间在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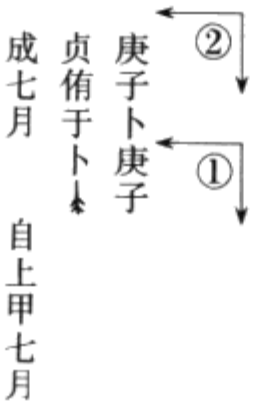
14879号



40265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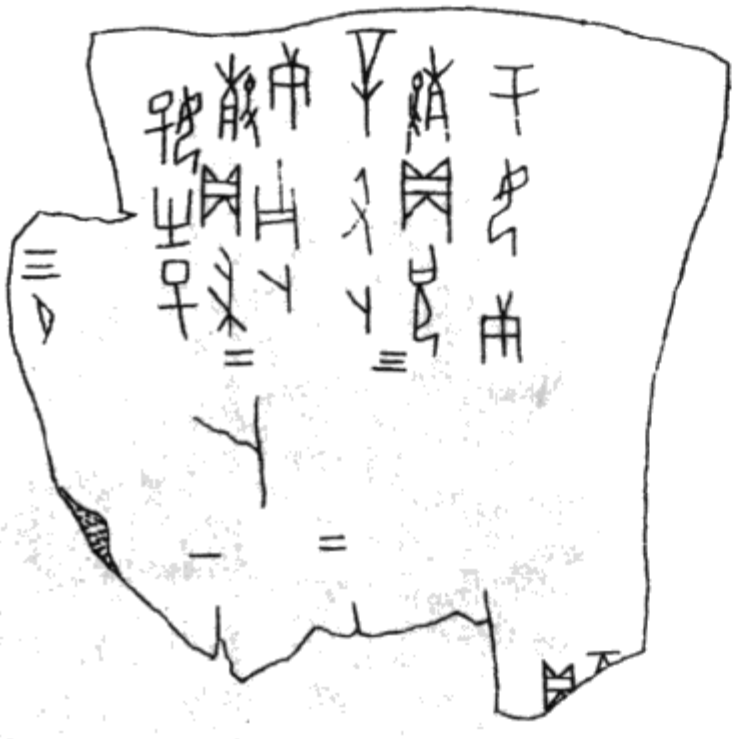
占卜问：今天白天会下雨吗？

占卜问：今天白天不会下雨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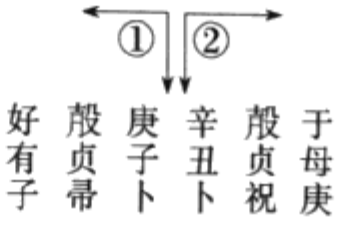


庚子日占卜，对自上甲以来的先王进行𠂤祭，时间在七月。

庚子日占卜，问：向成汤举行侑祭求福吗？时间在七月。



40386号



庚子日占卜，贞人殷问：妇好有孩子吗？时间是在三月。

辛丑日占卜，贞人殷问：乞求得到母庚的佑护吗？……

贞勿
佑于祖
庚

……问：不能从祖庚那里得到福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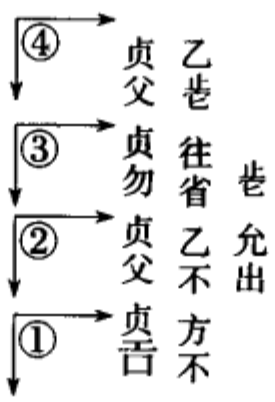
39604号

翌甲
寅勿
寒祖乙

第二天甲寅日不寒祭祖乙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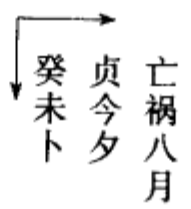
39573号

3962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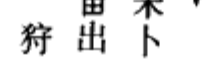


① 问：吾方不会真的出来吧？
② 问：父乙不会有灾祸吧？
③ 问：父乙有灾祸吗？
④ 问：不去视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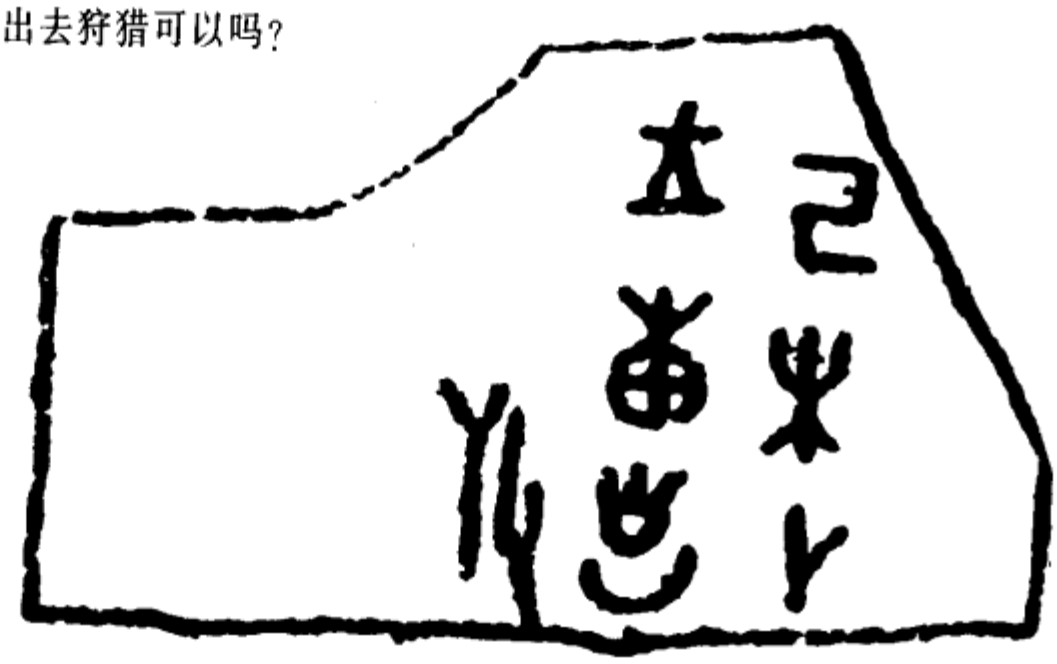
40590号



癸未日占卜，问：今天晚上不会有灾祸吧？时间在八月。



己未日占卜，商王出去狩猎可以吗？



40901号

第二期

22560号

无 尤 羌五
岁暨兄庚 父丁彳伐
宾 妣庚 小丁岁暨
旅 贞 王 贞王宾
庚 午 卜 丁卯卜旅

丁卯日占卜,贞人旅问:王亲自参加祭祀小丁的岁祭与祭祀父丁的彳祭可以吗?

庚午日占卜,贞人旅问:王亲自参加岁祭妣庚和兄庚,不会有灾祸吧?

22899号

丙戌卜行 乙酉卜行 乙酉卜
贞 王 宾 贞 王 宾 行贞王
父丁夕岁 叡 无 尤 宾岁自祖乙
无 尤 在 八 月 至于父丁
无尤

乙酉日占卜,贞人行问:王亲自参加岁祭,祭祀自祖乙到父丁的先祖不会有灾祸吧?

乙酉日占卜,贞人行问:王亲自参加祭不会有灾祸吧?时间在七月。

丙戌日占卜,贞人行问:王亲自参加祭祀父丁的晚间岁祭不会有什么灾祸吧?

40969号

辛未卜
即贞王宾
小辛彡亡尤
在 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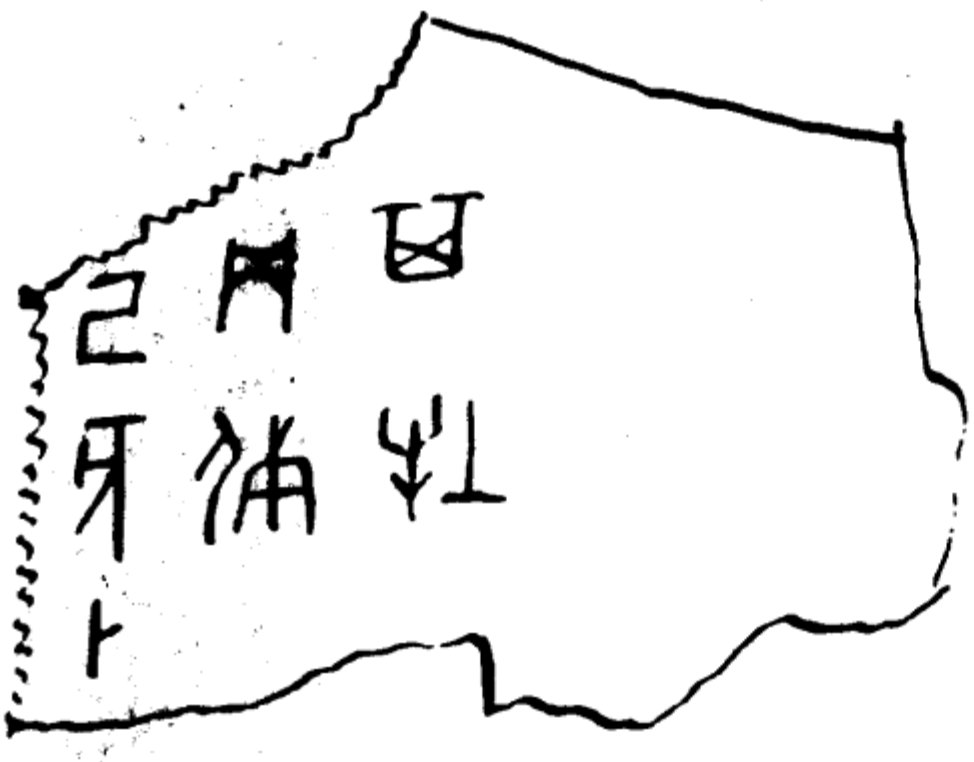
辛未日占卜，贞人即问：王亲自参加敬事先祖小辛的彤祭，不会有灾祸吧？时间在正月。

辛卯卜即
贞王其钟
于祖三月

辛卯日占卜，贞人即问：王要钟祭先祖吗？

时间在三月。

40972号



贞
其牡
姚庚
己亥
卜

己亥日占卜，问：祭祀姚庚要用公牛吗？

40990号

贞
王其田亡
災(灾)
癸酉
卜

癸酉日占卜，问：王出外狩猎不会有灾祸吧？

41079号

41094号

24939号

24659号

甲子日占卜，王亲自问道：今天白天要下雨吗？

雨
王贞曰
甲子卜

②贞其雨
①丙申卜行

于戊戌不雨
贞自今日至

①丙申日占卜，贞人行问：从今天到戊戌日不会下雨吧？

②问：会下雨吗？

室
告于南
重今夕
兄贞
乙酉卜

乙酉日占卜，贞人兄问：今天晚上在南室举行告祭吗？

第三期

27088号

其侑大乙
贞翌乙丑
甲子卜何

甲子日占卜，贞人何问：第二天乙丑日，侑祭大乙吗？……

28249号

五王受佑
于夔五
其来年

用五头牛致祭，向先祖夔祈求赐予谷物的大丰收吗？王能得到佑护吗？

28314号

丁亥卜翌日戊王惟呈田
兹用王擒狐
三十又七

丁亥日占卜，第二天戊子日王到呈地狩猎可以吗？

王擒获狐狸三十七只，大吉大利，这一卜应验了。

2972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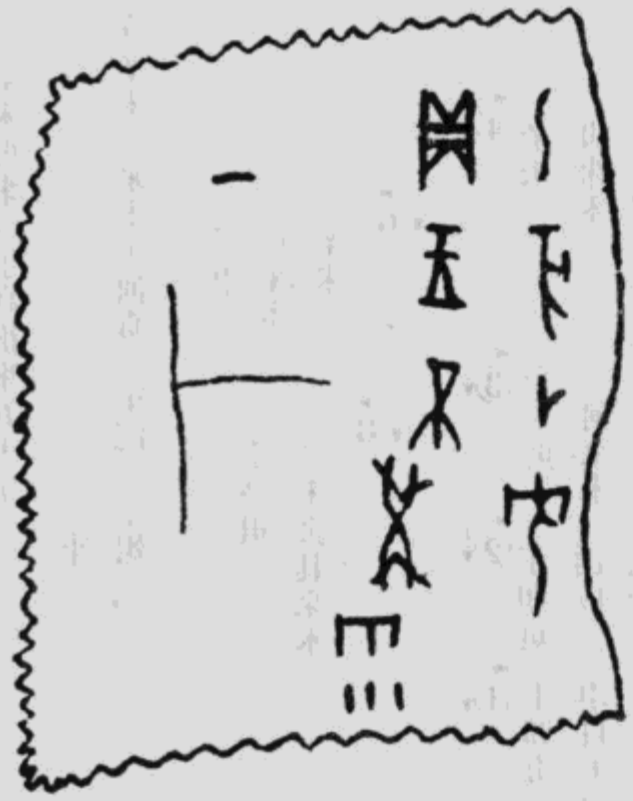
在八月
贞旬无祸
癸未卜何

癸未日占卜，贞人何问：下一旬没有灾祸吧？时间在八月。

29789号

①
曳日中有大雨
②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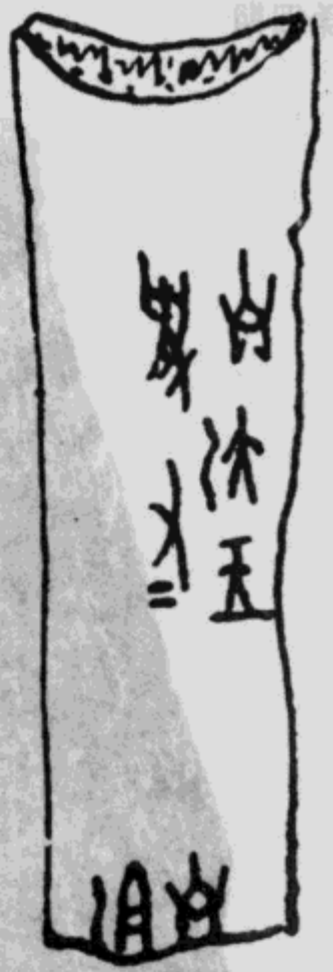
①在日中时分有大雨吧？
②果然下雨了。



41339号

乙亥卜何
贞王不冓雨

乙亥日占卜，贞人何问：王不会碰到下雨天气吧？



41312号

自大乙王
受有佑

王能得到自大乙以来的先王佑护吗？

30048号

无大雨
来辛
自　今辛至
②
①
自今辛至于　来辛有大雨

自这个辛日到下一旬的辛日有大雨吗？从这个辛日到下一旬的辛日不会有大雨吧？

贞王其田亡災　贞王其田亡災
②壬辰卜何
①戊申卜何

①戊申日占卜，贞人何问：王去打猎不会有灾祸吧？

②壬辰日占卜，贞人何问：王去打猎不会有灾祸吧？

28433号

第四期

32028号

⑦辛未贞寀禾于高祖寀五十牛

⑤辛未贞寀禾于河奏三牢沉三牛俎　牢

于岳
贞寀禾　于高祖
辛未　辛未贞其寀禾

⑥　⑧

④
辛未
贞寀禾
高祖河
于辛巳酒

③
辛未贞　②　丁卯贞　①　丁卯贞于以酋羌其
于河寀禾　酋以　用自上甲口至于父丁
羌于
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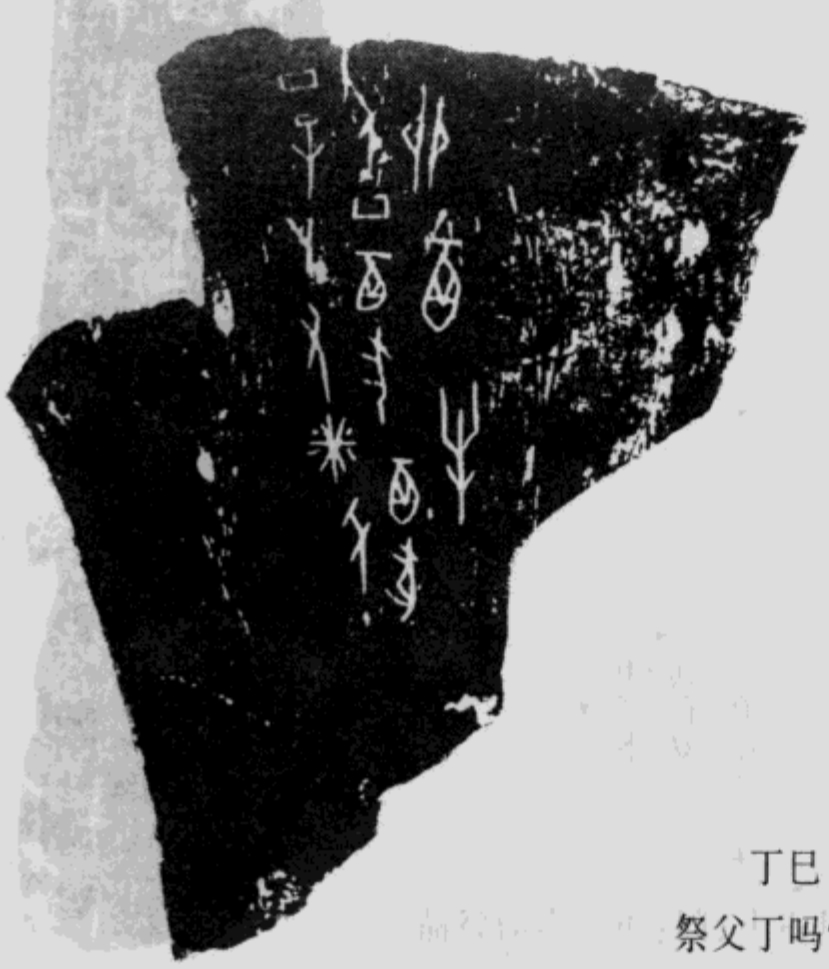
丁卯日占卜,用进献的羌人祭祀从上甲到父丁的先王吗？丁卯日问:用进献的羌人祭父丁吗？辛未日问:向河神祈求好的年成吗？辛未日问:在辛巳日向先祖河祈求好年成,用酒祭和祭吗？辛未日问:向河神祈求好年成,用三牢奏祭,用三头牛沉祭,并用一牢俎祭吗?辛未日问:向祈求好的年成吗?辛未日问:向高祖祈求好的年成,用五十头牛奏祭吗？辛未日问:向高祖祈求好的年成吗？

33017号

①己亥 ②己亥贞
告于令 王
父丁 𢀛追召方 及于
三牛

①己亥日占卜,用三头牛作为祭品,祷告于先祖父丁。

②己亥日占卜,问:命令王族追赶召方,在……追上了。



32674号

卯百牛
父丁百犬百豕
丁巳卜又𡚬于

丁巳日占卜,用一百只狗,一百头猪𡚬祭父丁吗?用一百头牛卯祭吗?

32302号

贞其侑于高祖贡九牛
癸卯贞其侑于高祖贡六牛

癸卯日占卜，问：用六头牛燎祭，能得到高祖的佑护吗？问：用九头牛的燎祭能得到高祖的佑护吗？

32447号

甲子卜
其有岁
于高祖乙三牢

甲子日占卜，问：用三牢的祭品岁祭高祖乙吗？

④乙亥　③乙亥　②癸酉　①癸酉
贞其贞　贞日月　贞日月
侑伊尹侑　有食　有食
二牛伊　口若　惟若
尹！

①癸酉日占卜，问：如果有日食或是月食发生，吉利吗？

②癸酉日占卜，问：如果有日食或是月食发生，不吉利吗？

③乙亥日占卜，问：侑祭伊尹吗？

④乙亥日占卜，问：用两头牛侑祭伊尹吗？

34081号

辛　其　于　妣　羌
巳　秉　妣　丙　白
贞　生　庚　牡　豕

辛巳日占卜，问：用公牛、公羊、白色的猪作为祭品祈求妣庚、妣丙生育好吗？

33694号

33298号

①乙贞禾岳
巳寀于
②乙贞禾高祖
巳寀于

乙巳日占卜,问:举行寀祭,祈求岳神赐给谷物的大丰收可以吗?

乙巳日占卜,问:举行寀祭,祈求高祖赐给谷物的大丰收可以吗?

33462号

戊戌贞其雨
王其田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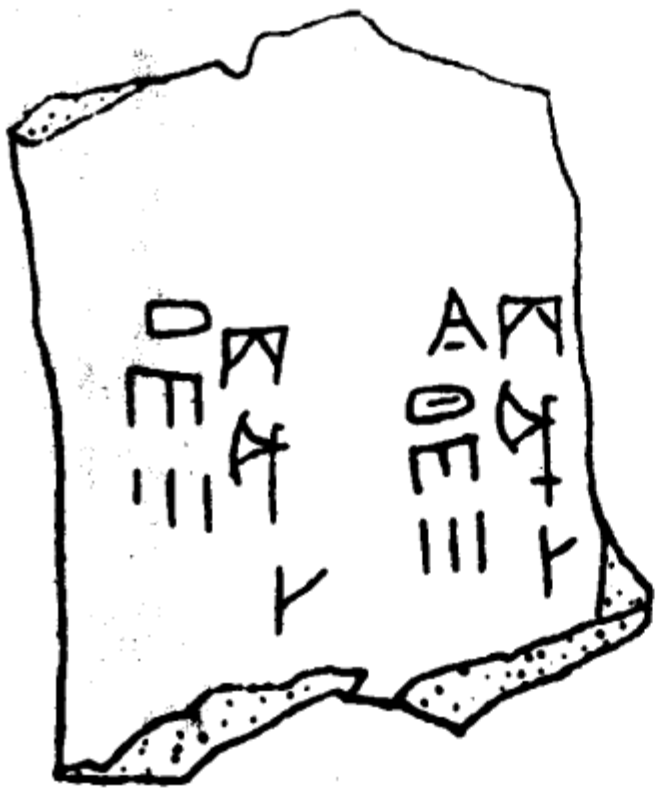
戊戌日占卜,问:王外出狩猎不会下雨吧?

果然下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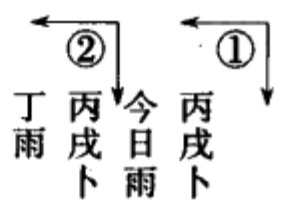
王其田擒十
兹用

王去狩猎擒获十只……,这次占卜应验了。

41544号



41597号



①丙戌日占卜,问:今天白天会下雨吗?
②丙戌日占卜,问:丁亥日会下雨吧?

壬子卜贞
今日延雨

壬子日占卜,问:
今天白天继续下雨吗?

第五期

41863号

北土受 西土受 南土受 东土受 己巳王卜贞
年 吉年 吉年 吉年 岁商受
王固曰 吉

己巳日王亲自占卜,问:商地能有好收成吗?王查看卜兆后说:吉利!

东土应该有谷物的好年成吧?

南土应该有谷物的好年成吧? 吉利!

西土应该有谷物的好年成吧? 吉利!

北土应该有谷物的好年成吧? 吉利!

36975号

36499号

癸丑王卜
贞旬无祸
王来征
人方

癸丑日王亲自占卜，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王要去征伐人方。

35424号

癸未王卜贞旬无祸王固
曰大吉在三月甲申彡上甲

癸未日，王亲自占卜，问：下一旬不会有什么灾祸吧？王查看卜兆后说：大吉！时间在三月。甲申日彡祭上甲。

35529号

①
癸丑王卜贞
旬无祸王固曰
吉在正月甲寅
祭小甲𡆥大甲
祭大甲𢀛上甲

②
癸卯王卜
贞旬无祸
王固曰吉
在十二月甲辰

癸丑日王亲自占卜，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王查看卜兆后说：吉利！时间是在正月。

甲寅日这一天，祭小甲，𡆥祭大甲。

癸卯日王亲自占卜，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王查看卜兆后说：吉利！时间是在十三月。甲辰这一天祭大甲，𢀛祭上甲。

37742号

戊申卜
今日王田其雨
羌不𢓊雨
兹御

戊申日占卜，问：今天王去羌地打猎，不会遇到下雨天吧？这一卜应验了。

果然有雨。

丁卯卜贞 其雨
今日不雨

丁卯日占卜，问：今天白天不会下雨吧？结果下雨了。

38118号

癸酉卜贞翌日乙亥王其有
𠂤于武乙彡正王受有佑二

癸酉日占卜，问：第二天乙亥日，王𠂤祭、彡祭先祖武乙可以吗？进行正祭，王能得到佑护吗？

36123号

丙戌卜贞翌日丁亥王其有𡆥于文武帝正王受有佑二

丙戌日占卜,问:第二天丁亥日,王侑𡆥祭文武帝乙可以吗?进行正祭。王能得到佑护吗?

3616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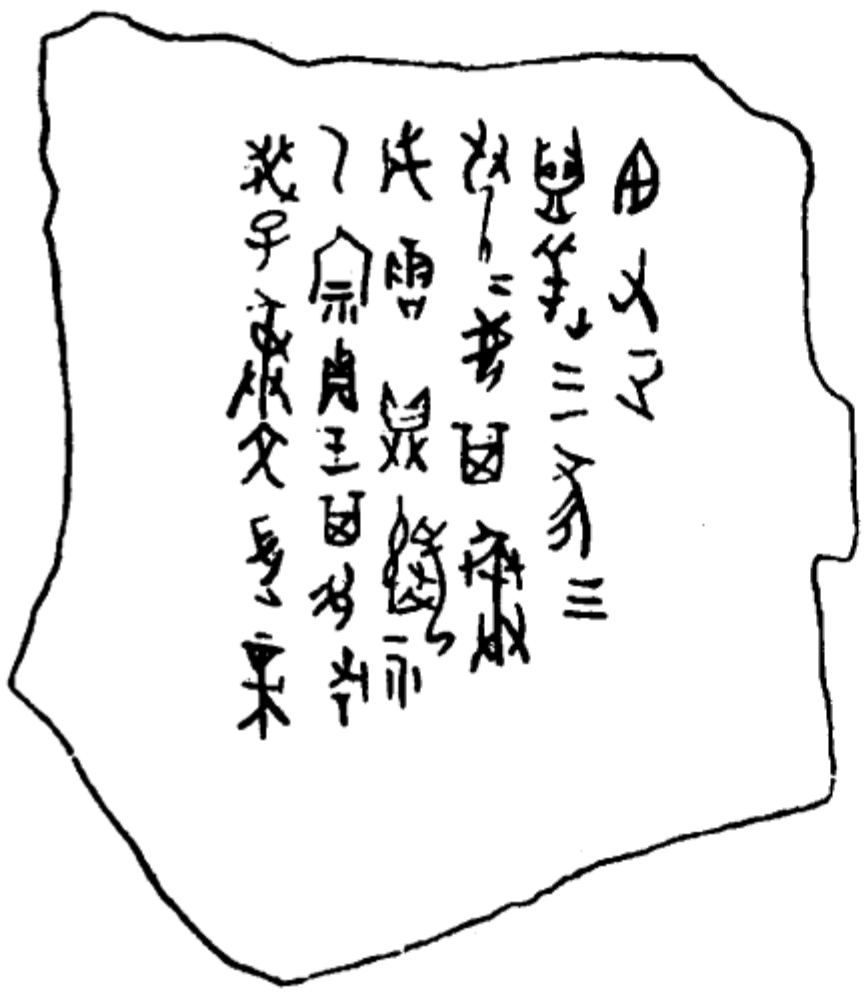
第五节　西周甲骨

概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山西省、北京市和陕西省的一些地方陆续发现了一些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其中以周原的发现最为重要。1977年和1979年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第2号房基时,发现了两个窖穴,出土卜甲和卜骨共

一万七千多片，其中有近三百片刻有卜辞。1979年在扶风齐家也发现五片有字甲骨。其内容有的记述了周人和商王朝及其他方国的关系，也有某些重要朝臣的名号，有的则刻划易卦。

西周甲骨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从甲骨整治方面看，西周卜甲主要是龟腹甲，里面经过铲挖平整，留有宽厚边缘。西周卜骨使用的是牛肩胛骨，一般是先把牛胛骨的骨臼和中脊部分锯割掉，使骨壁变薄，与肩胛扇取平，有的还加挫磨。第二，从钻凿形态方面看，西周卜甲都是方凿，且排列密集、整齐。卜骨都是圆钻，钻孔的排列也不规整，从上到下都有分布。第三，从刻辞卜骨的方位看，殷墟卜骨是以有骨臼的一方为上，而西周卜骨却正相反，无论是竖刻横刻，都不见有从骨臼一端向肩胛扇一端竖刻的现象。第四，从文字特征方面看，西周甲骨文字一般较少，字迹纤细，有的甚至须放大好几倍才能看清楚。⑨

西周甲骨片释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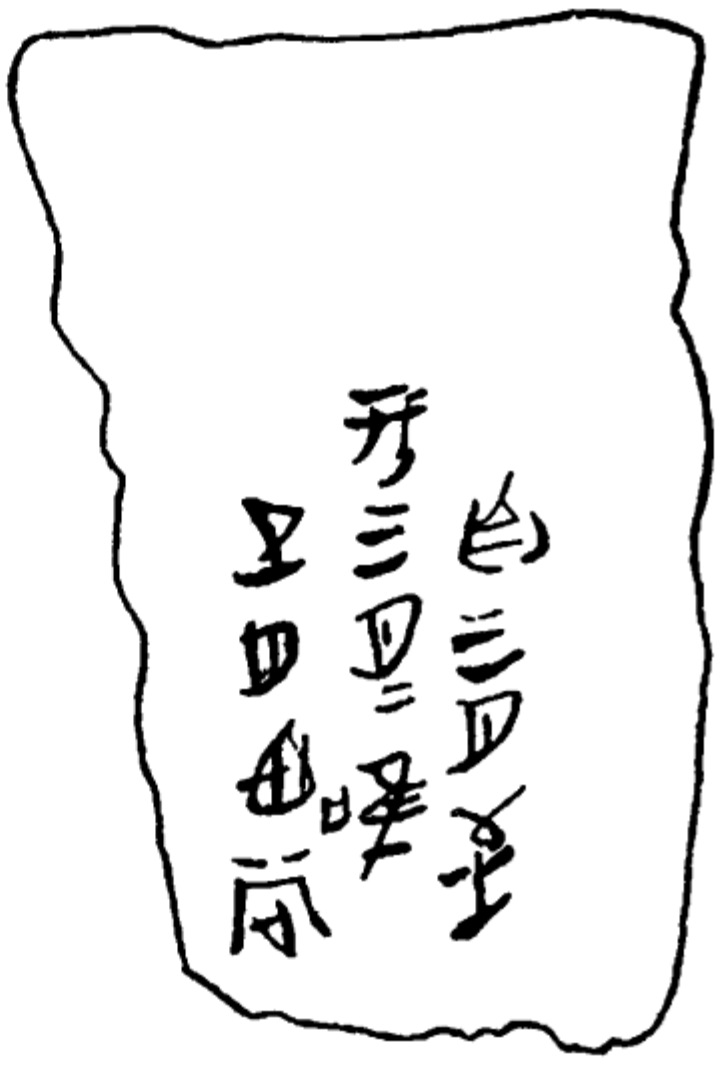
H11:1

癸巳日，在文武帝乙的宗庙里进行彝祭，问：王隆重地向成汤献祭。举行禦祭，用两名女子作为人牲，彝祭的牲血用三头公羊、三头小猪，可以贞问了吧？

H11:3

王
至
于
帛
田
唯
田
衣
王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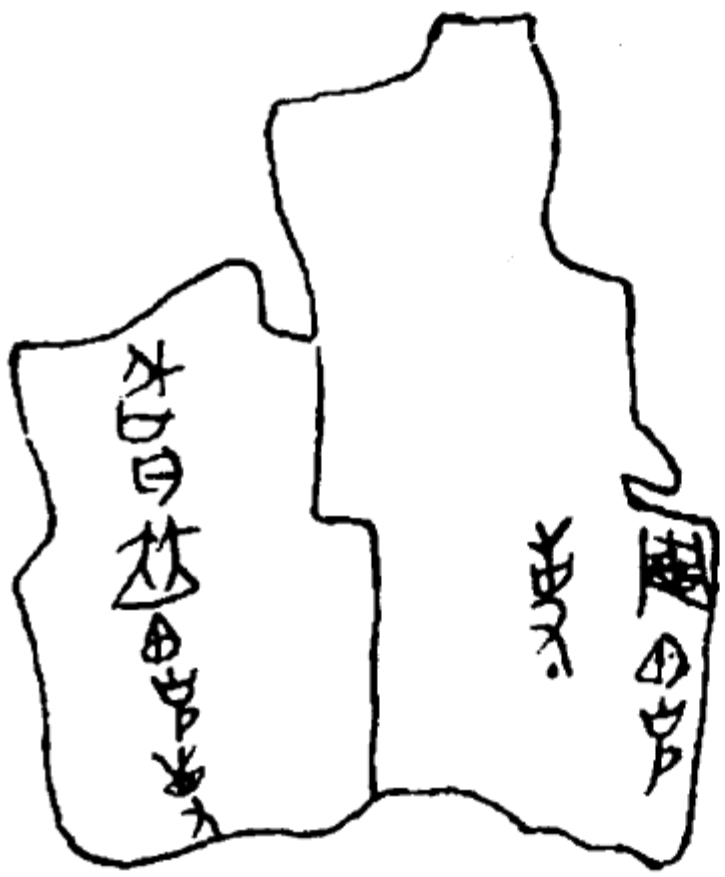
文王到帛地打猎，与殷王一起打猎。



H11:2

自三月至于三月月唯五月亩尚

自三月份开始的三个月，只有五月没有被保佑。



卜曰：茲遘克史

占卜，问：叫兹的这个人可以完成克敌制胜的任务吗？

H11:6+32

隹十月既死口
亡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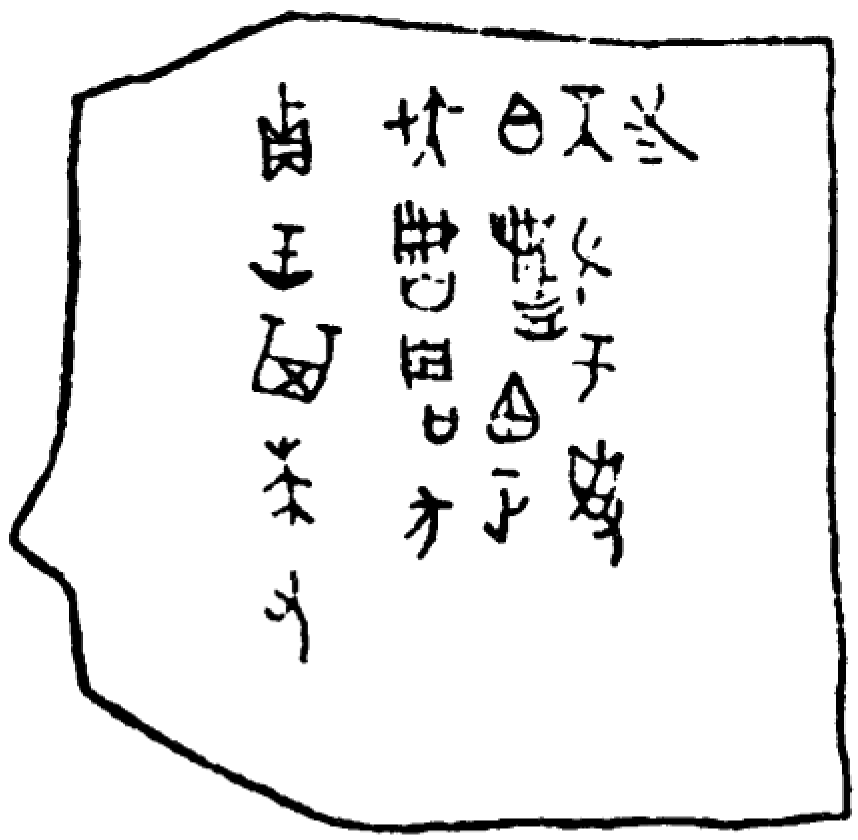
在十月份既死霸这段时间……不会有什么灾祸吧？

H11:55

H11:68

……伐蜀
……兹

(文王)讨伐蜀国。



H11:84

贞王其桒佑
大甲册周方
伯蠱西正
不又于受
又佑

问:王桒祭、侑祭大甲,诅咒周方伯……由于周安定无扰，大甲不予侑助,周方伯得到保佑。

H11:83

曰今秋
楚子来告
父后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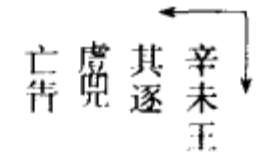
今年秋天楚国国君来，郜父迟到了。

H11:117

祠自蒿
于周

(周王)从镐京到岐周进行春祭。

H11:113



辛未日，卜问：王要在第二天壬申日去猎兕，不会有灾祸吧？

第六节　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汉字的方块形状、线条的纵横布列以及早期文字的物象意味等，使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美观性和艺术性。因此汉字在拥有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能的同时，很自然地涉及了一定的审美情趣。可以说，汉字书写肇始了书法艺术。鲁迅曾经概括了汉字的三种功能，“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表达了汉字与书法的必然关系。东汉蔡邕在《九势》中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说明书法艺术的渊源来自于自然。

当然，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和条件的差异，文字的艺术表象是各具特点的。有的稚拙朴实，接近自然；有的严谨肃穆，制于社会。由自然而抽象，由抽象而成法，是汉字书写法则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因此书法有自然和人为的双重成分。就此而言，先秦时期的文字书写法则，更多的是自然法则的应用，或者说是以自然为基础，逐渐向人为过渡。这一时期的汉字表现形态，反映了书法在早期成形阶段取法天成，简约率性的原生形的艺术手段。它虽然不刻意追求典丽雅致、法则严谨，但却为后世中国书法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郭沫若曾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事而异”，“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10]

先秦时期的文字形式包括了甲骨文、金文、简帛、籀文、石刻等多种。书写材

料有龟甲兽骨、青铜器、竹简木牍、石头、缯帛等等。从字体笔法、点画形态、结体、章法及审美要求来看，先秦时期早期的文字书写的主流是“因势利导”、“随意生发”，较少刻意追求。

商周时期的书法往往表现为个性突出，大小相间，错落自然，单纯简约，古趣横生的自然面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青铜工艺的精湛和繁缛，文字开始注意追求美化和装饰性，字体的结构讲究工整对称，纵横排列整齐有序，布局井然。

先秦时期的书写方法有刀刻、铜铸、笔写等几种形式。甲骨文大部分是以青铜或玉刀具在龟甲兽骨上施行契刻所致，偶见少量的毛笔书写；金文是在青铜器上进行刻模翻铸而成；在竹简帛书上则以毛笔作墨书或朱书。丰富的书写手段，使该时期的书法风格也呈现出了缤纷多彩的面貌。

甲骨文书法与书写工具及方法　殷代甲骨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而又比较成熟的文字，其布局整齐有序，刀法娴熟俊美。但甲骨文是如何写就的，其工具是什么？书写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对于甲骨文的书写工具，专家的意见较为一致，即主要是用青铜或玉石刀双面刀锋契刻而成。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二十多种动物形象的玉质刻刀，此外遗址中还出土过一定数量的青铜刀。这些铜、玉质的刀具应该是供契刻甲骨的工具。另外一种是用毛笔写就殷商时期已有毛笔可从考古和文献中得到证真甲骨文“ ”字，从手握“ ”，是持笔书写的形象。

契刻的方法争论意见较多，大致有三种：一、郭沫若提出酸泡软化契刻法。二、陈梦家提出直接契刻法。他说：“书写的……卜辞所常用的字并不多，刻惯了自然先直后横，本无需先写了作底子……估计一般不必书写起稿，而是依靠熟练的技术，以刀为笔信手刻来而成的。”三、先写后刻法。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说：“卜辞有仅用毛笔书写而未刻的，又有全体仅刻直划的，可见是先写后刻。”[1]三者相较而言，董氏的甲骨契刻方法似乎比较合理。只有先书后刻，才能较好保证一字一气呵成。而且局部先横后竖也不易漏掉笔划，况且契刻中曲笔、折笔屡见不鲜，非横竖所能了事，运刀用力也须十分谨慎，因此先书为底，宜于度势用刀。对于个别契刻技艺尚不成熟的卜官来说，要想使契刻出来的文字工整美观，势必要先用笔书写底稿。在考虑通篇结构和字形美观上也应先写后刻。笔书具有一定的更改余地，写得不理想，可以涂去重写。

单字和整篇甲骨的契刻顺序及方法也颇有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减少

转动骨模的次数,而采取通篇或通行先竖后横的流水作业法。第二种意见,通过模拟刻写甲骨文字的实验表明,卜辞刻字基本上应是一字刻完再刻一字,而不是许多字先竖后横地刻。另外为减少运骨次数,通篇"写"完之后,选取较难契刻的边角方位先行推刻。第三种意见,甲骨文作为一门书法艺术,逐字逐句地刻下来较容易掌握,利于结构严谨,形体美观。

我们认为甲骨文契刻的方式不是单一的,它应该是先审定一个大局,然后根据具体的部位和因势利导的原则,多种方式兼而用之。通常情况是:大字先书后刻,小字则直接契刻,也有的书写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施刻的,但这是少数现象。

甲骨文书法的作者 郭沫若曾说:"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对于甲骨文的契刻者有十分崇高的评价。那么,殷商甲骨文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有多种意见。

殷商甲骨文作者的身份,概括比较主要的观点,有贞人(或史官)之说和王匠之说两种。有学者指出,殷代的贞人属于巫师类的神职人员,他们作为负责祭祀、交通人神的使者,构成了社会上的特权阶层,享有神圣尊荣的地位。甲骨文并不是当时社会上流通的文字,它除了有纪事符号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巫术功能。在殷代政教合一、尊神信巫的文化氛围中,整个社会对于这种神秘的符号怀有敬畏感。因此,钻孔烧灼、视兆契刻的工作只能有具有巫师意味的贞人来进行。也有学者指出,根据甲骨文的表现状态,殷商甲骨文的形成有两个过程,首先由史官(贞人)写好底本,然后交给专门的工匠进行契刻,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甲骨文应是整形加工的工匠们的作品。比较而言前一种观点更具说服力。

甲骨文书法的动感之美 甲骨文造字的方法已具备了"六书"的内涵,所谓"六书",据许慎《说文解字序》等许多文献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和形声。其中的象形字是甲骨文中最早出现的部分。这类字以描摹事物的形象为基础、通过较为抽象的线条来反映对象的主要特征。姜亮夫说:"甲文结构的一般现象,是以象形、象事两体为主。象形指的是一切具体物象而言。象事则指的是无形可象的事或状等类的字。"形象是审美的起点。"形美"是甲骨文的主要审美特征之一。沈尹默说:"我国的文字是从象形的图画发展起来的。象形记事的图画文字即取法于星云、山川、草木、兽蹄、鸟迹各种形象而成的。因此,字的造形虽然是在纸上,而它的神情意趣,却与纸墨以外的自然环境中的一切动态,有自然相契合的妙用。"

甲骨文中有关动物的字千姿百态,优美生动。如"象"字,突出其长长的鼻子

和庞大的身躯( );鹿字的线条或繁缛,或简练,有的正面站立,有的侧立回眸,有的欢蹦跳跃,有的悠然自得( );“虎”字突出其毛皮的纹路和斑斓色彩,以及凶猛的虎口 ( );“ 马” 字突出其修长的马腿和飞扬的鬃毛, 以示矫健身形;而“羊”字则描绘出它的温驯模样。甲骨文中肖形的字很多,无不形象生动,十分传神,而且充满了动感。

此外,人体、器物、植物、天文、地理等大自然中的一切表象,也有同样的创作理念。例如表示一年四季的字,冬写作“ ”, 似冰凌悬挂,春字像草木茂盛。因此,甲骨文象形字具有绘画的一些要素和手段。它所展示的书法艺术,重点是突出物象造型的动感之美。这与后世书法大家张旭“观飞蓬惊沙,公孙大娘舞剑”而顿发创作灵感的意趣是一致的。

甲骨文书法的金石之美　甲骨文大部分是由锋利的刀具契刻而成。据研究,甲骨文字的刀法有切、冲(推)以及单、复刀之别。与后世印章篆刻比较,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甲骨文契刻刀法娴熟,技艺精巧,与书法的用笔之道注重腕力一样,契刻用刀的轻重缓急、起落收放也与运腕相关。与毛笔书法不同的是其效果,笔书显得婉转滑畅,无受阻崩碎之感。启功在《关于法书墨迹和碑帖》一文中所说:“殷墟出土的甲骨和玉器上的文字,笔划的力量的控制,结构疏密的安排,都显示出写者具有深湛的锻炼和丰富的经验。可见当时书法已经不仅仅是记事的简单号码,而是有美化要求的。”

由于甲骨的材质坚硬,契刻时必须用力冲刀刻去,便于刻短而直的,而不便刻长而曲的线条。因此,刻出的线条多为直线,且呈两头尖锐状。圆曲、转折处,往往以两条直钱相接成屈折状。运刀刚劲犀利、古拙厚重。甲骨文的刀势,大致可以分为浑厚的粗笔道和瘦硬挺拔的细笔道。甲骨文用刀契刻,使它的笔划方圆肥瘦、迴环婉转,转折处多呈方形而少轻重顿挫。这种方式为小篆等用笔提供了许多借鉴。甲骨文有细笔、粗笔之分,用笔极其工整,精细凝练,如雕刻、刺绣一丝不苟。下刀果敢含忍,干净有力。笔划效果挺拔、雄俊、犀利。痛快淋漓,潇洒自如,力透骨背。有很强的立体感、力量感和节奏感,结字浑然天成,造型巧夺天工,结构搭配合理。甲骨文字大都呈长方形,大小不一。大者浑厚雄壮,如矗立之山峰,小者瘦劲挺拔,如出鞘之利剑。甲骨文字的这种瘦劲挺直、锋芒毕露的线条,使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断石裂帛般的冲击力,尤其在冲刀时,骨材会发生碎裂,产生类似于刻石的金石效果。

由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看, 殷商在甲骨、玉石和陶片上都留下了墨书的遗

迹，可以发现其基本笔法有落笔、行笔和收笔三个特点，而无藏锋、逆锋等与自然笔顺相背的用笔法。商代在一件玉片上用红色书写了“束于丁”三字，在一件白陶片上墨书一个“祀”字，起笔两头尖锐，中段较粗，有轻重抑扬之势。其起、承、转、提近于隶书的笔意笔势。

甲骨文字结构的变化之美 在尚未完全成熟、定型的甲骨文中，文字可用不同的构件组合而成。如甲骨文“春”字，就有十余种形体，有的从“ ”、“屯”，有的从“”、“木”、“屯”，有的从“日”、“屯”。又如“明”字，既可从“日”、“月”，用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月亮来表示明亮；同时又可写作从“”从“月”，“”者是古代窗户的象形，这一造型用月光照进窗户来表示明亮的意思。除上述异构字外，有的构件虽然相同，但写法不同而形态各异。有的因构件的位置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意味。如“昔”的构意是“洪水泛滥的日子”，几条曲折的线条象征洪水的波浪，有的写在“日”上，字形为洪水吞没了太阳，有的写在“日”下，便成了浪涛中托出一轮红日的情景。

另外，殷商甲骨文字的部首可以上下左右互置，如“好”字，“女”字旁可以写在左边，也可写在右边；“秉”字的“手”旁可以放在左边，也可放在右边；“相”字的“木”旁既可放在下边，也可放在左边。甲骨文的异构字和异写字所产生的形体多变现象，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说明它尚未完全成熟、定型，给文字的使用带来许多障碍。从审美的角度来考察，因其形体变化多姿而形成不同的风格韵味，呈现出一种“韵味美”。

另外，甲骨文刀具镌刻带来的结字特点，使其笔画虽然不很工密规则，但是疏密有致，形体变化多姿，随字异形，大多数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梯形、棱形、三角形、多边形、椭圆形等，规整的正方形和圆形极少，显示出独特的审美意趣。如“鼎”、“曰”、“高”等较方正的字，或为长方或为扁方，有的接近正方也多不规整。“在”、“面”字呈棱形，“臣”“立”、“王”等字呈三角形，“旬”字呈椭圆形，“月”字呈半圆形，皆不规整。

甲骨文随字异形，与今天规范的字形差异很大。这种构件位置不固定及其带来的形体多变，似乎有一种要离开原定的位置，向着某一种特定方向运动的趋势，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倾向性的张力”。甲骨文字千姿百态，绚丽灿烂。“王”字、“吏”字的写法就达数十种之多，“福”字更有一百多种写法，这种形体变化，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是对文字审美情趣的不断提升。[12]

甲骨文字体的大小错落，恰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节律跳

动而丰富。看似无度，实是体现了原始自然的法则。刘熙载《艺概》说："不工者，工之极也。"正是甲骨文书法艺术的确切写照。

甲骨文字的章法之美　一片甲骨文字的总体布局，字与字结构之间的轻重大小、宽窄、聚散和联断，常常是经纬正斜，上下错落，疏密相间，极富变化。结体大小长短不定，这种随意而参差不齐的现象，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体现了"意态天然"的空间特征，充满了变化与统一之美，与甲骨这种古朴的书写材料相映成趣，十分和谐。给人以清新质朴，自然脱俗的感觉。从章法中可以看出契刻者的主体审美意识。

甲骨文字是以视觉的刺激来传递形式美的法则。它的尺度和比例，均衡和对称丰富多样：有左右对称，如行、八、并、北、饗、门等字；有上下对称，如幸、疆、韦、母、宁、涉等字。甲骨文字表现出的形式美法则是多样的统一，松而不散，多而有序，杂而不乱，从总体上去看，具有均衡对称的稳定感。

字体的章法布局方面，根据甲骨文的大小和形状的特征来进行不同的安排，出现了疏朗相间、姿态多变的面貌，或严整、或端庄、或肃穆的风格。甲骨文无论是同一个字的结构之间，还是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是既独立又有紧密联系的，所以显得生气氤氲。

甲骨文字的风格流变　殷代甲骨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文字形式，自其而降，共历8世12王计273年。众多的甲骨文资料的时间归属是研究先秦史，同时也是研究早期书法史的重要课题。

早在20世纪之初，王国维对甲骨文的具体年代分期作过论述。[13]1933年，董作宾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中，明确将"世系、贞人、文法、字形书体"等十项内容作为甲骨文断代的标准。其中的"字形"、"书体"两项对殷商甲骨文的风格流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他把甲骨文的书体风格归为五个阶段，分别是：盘庚、武丁时期约一百年的时间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字大字居多，气势雄伟，挺削峻厉，少量中小型字体，写的工整秀丽；祖庚、祖甲的四十余年为第二阶段，字体大小适度，行款端正，结体严谨；廪辛、庚丁的14年为第三阶段，字体变得粗犷草率、体态自然，朴实无华，始见草书风尚；武乙、文丁约十七年时间为第四阶段，是甲骨文集大成的时代，前期粗疏古拙，后期奇变多姿。帝乙、帝辛时间共87年为第五阶段。字体以小型为主，契刻工整，一丝不苟，可与后世的小楷媲美。其书风方正规整，行气布白匀齐均衡，逐渐向金文过渡，并初步奠定了金文的基础。

郭沫若在《殷契粹编序》中对殷商甲骨文的书法风格也有过总体的论述。他说"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固亦间有草率急就者,多见于廪辛、庚丁之世"。总体而言,商代甲骨文字的面貌是多样的,早期多作大字,雄浑有力,中期柔弱纤细,字体大小参差不一,晚期字体趋小,书写整齐匀称。各时期的书法字体特点明显不相混淆。

西周甲骨文字的书法艺术 西周建国后,除了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外,文化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西周的文字形式在早期只是"因于殷礼,有所损益"而已,基本上保留了商代的传统。《诗经·大雅·绵》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从文献上证明了西周同样存在龟骨占卜的习俗,近年来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相继出土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的实物资料。纵观西周甲骨,可以发现其契刻技术精湛,法度严谨。就体形而言,大字较少,中小型字居多。最小的字仅有一毫米见方。可称得上中国最早的微雕作品。西周甲骨文结构规范,笔画刚劲。从字形来看,存在豪放、严整、飘逸和草率等不同的书法风格。在书法艺术上起到了上承殷商甲骨、下启西周金文的重要作用。

附表:甲骨大事简表

1899年 王懿荣认识甲骨。王襄与孟定生也在天津开始购藏甲骨。

1902年 刘鹗购入王懿荣所藏甲骨,罗振玉在刘鹗家始见甲骨文并为之墨拓。

1903年 第一部著录书,刘鹗的《铁云藏龟》问世。

1904年 第一部研究性专著,孙诒让《契文举例》问世。美国人方法敛及英国人库寿龄、驻潍县牧师柏尔根、英国人赫布金、德国人威尔茨等在潍县、青岛等地搜购甲骨。

1908年 罗振玉确定安阳小屯殷墟为甲骨文的出土地点。

1909年 刘鹗逝世。

1911年 罗振玉获得大骨四版。

1910年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出版。

1913年 罗振玉《殷商书契前编》出版。

1914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出版。

1915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出版。

1916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及《殷墟文字待问编》出版。

1917年 王国维撰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周制度论》,并为姬佛陀编印《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明义士《殷墟卜辞》出版。此书为西方学者所编第一

部甲骨著录书。

1923年　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叶玉森《殷契钩沉》出版。

1925年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襄《簠室殷契征文》出版。

1927年　王国维自溺身亡。

1928年　中央研究院派董作宾赴安阳调查发掘殷墟遗址。郭沫若《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一文发表。

1929年　进行第二、三次殷墟发掘，得“大龟四版”。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发表。

1930年　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出版。

1931年　董作宾发表《大龟四版考释》。第四、五次殷墟发掘开始。

1932年　董作宾撰写《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第六、七次殷墟发掘开始。

1933年　郭沫若《卜辞通纂》一卷、《考释》三卷、《索引》一卷在日本出版。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问世，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问世。第八次殷墟发掘开始。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郭沫若《殷契余论》问世。

1934年　第九次殷墟发掘得“大龟七版”。

唐兰作《殷墟文字记》。

孙海波《甲骨文编》十四卷，合文及附录、检字、备查各一卷出版。

1936年　进行第十三、十四次殷墟发掘，于YH127坑得甲骨一万七千余片，包括完整甲骨近三百版。

1937年　进行第十五次殷墟发掘工作。

郭沫若《殷契粹编》、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问世。

1939年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问世。

1940年　罗振玉病逝。

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初编问世。

1944年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问世。

1945年　董作宾《殷历谱》出版。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一、二册问世。

1946年　胡厚宣《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问世。

1948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出版。

1949年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问世。

1950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曾毅公《甲骨缀合编》问世。

1951年　陈梦家《甲骨断代学》、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问世。

1952年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问世。

1953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下辑问世。

1954年 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问世。

1955年 山西洪赵坊堆村出土有字西周甲骨。

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殷墟文字缀合》,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胡厚宣《甲骨续存》问世。

1956年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问世。

1957年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上辑一、日本贝塚茂树《古代殷帝国》问世。

1958年 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周鸿翔《商殷帝王本纪》问世。

1959年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问世。

1961年 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问世。

1962年 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问世。

1963年 董作宾逝世。

1965年 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问世。

1966年 日本伊藤道治《古代殷王朝之谜》问世。陈梦家逝世。

1967年 日本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问世。

1972年 日本白川静《甲骨文之世界》、许进雄编《殷墟卜辞后编》、《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问世。

1973年 小屯南地获得甲骨五千多片。

1975年 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有字甲骨。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甲骨集成》问世。

1976年 周鸿翔《美国所藏甲骨录》问世。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妇好墓"。

1977年 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西周甲骨一万七千余片。《董作宾全集》甲、乙编共12册、李济《安阳》(英文版)问世。

1978年 郭沫若为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开始陆续出版,这是甲骨学史上新的里程碑。郭沫若逝世。

1979年 古文字学家唐兰、著名考古学家李济逝世。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古文字研究》创刊号,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问世。

陕西扶风村发现有字西周甲骨。

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上册一、二问世。

1981年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唐兰《殷墟文字记》增订本问世。

1983年 古文字学家容庚逝世。

《甲骨文与殷商史》、美国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下册一、二、三问世。

1984年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问世。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逝世。

1985年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严一萍《商周甲骨文总集》问世。

1986年　《英国所藏甲骨集》问世。

1987年　伊藤道治《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甲骨文集》问世。

1988年　姚孝遂等《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胡厚宣《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问世。

1989年　姚孝遂等《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问世。

古文字学家徐中舒逝世。

1991年　《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问世。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窖穴H3内发现大批有字甲骨，是继1936年YH127甲骨窖藏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1992年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杨升南《商代经济史》问世。

1995年　胡厚宣逝世。

1996年　姚孝遂逝世。

胡厚宣《甲骨续存补编》、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问世。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城址内发现有字西周甲骨。

1998年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台北召开。

1999年　“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甲骨学一百年》、《甲骨文合集补编》、《百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甲骨文合集释文》问世。

注释：

① 见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条”下载：此地埋藏甲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

② 王懿荣(1845~1900年)，山东福山人，著名金石学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义不苟生，拒绝出逃，投井而死。

③ 明义士：《甲骨研究》，方辉整理，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④ 刘鹗《铁云藏龟》自序说：“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甲骨)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

⑤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收入《王国维论学集》，第207页。

⑥ 古董商谎称甲骨发现地是河南卫辉、汤阴等等。

⑦ 殷墟规模巨大，范围广阔。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南起刘家庄，北至后营，长约六公里，宽约五

公里，总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殷墟的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放形制的古代都城。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后冈遗址和众多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

⑧ 李铁映：《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贺信》，1998年10月20日。

⑨ 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歧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0期。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3期。丁乙：《周原的建筑遗存和铜器窖藏》，《考古》1982年第4期。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⑩ 郭沫若：《殷契粹编·序》，见《郭沫若全集》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⑪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董作宾先生全集》，台北艺文印书馆。

⑫ 见朱顺龙《先秦古文字发展嬗变研究例》，载《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二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⑬ 见罗振玉、王国维：《殷墟书契后编》。

第九章　商与西周金文
——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二

先秦时期称铜为金，因此后人便把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或是吉金文字。另外，因为殷周时期鼎和钟作为重器，其上面的铭文在铜器铭文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过去还有人把金文称为“钟鼎文”。青铜器常用来祭祀祖先，是宗庙的常备之器，旧时通称为彝器，所以其上面的铭文又有彝铭、彝器款识、彝器文字等名称。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名称逐渐趋于科学与准确化，现代一般把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铜器铭文或金文。

金文是指刻铸在铜器上的文字，所以在学习之前应该对青铜器有一个总体了解。青铜，是指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锡合金为锡青铜，铜铅合金为铅青铜等。人类社会最早使用的铜是自然铜，如西亚伊拉克的札威·彻米发现的公元前一万年左右的铜质装饰品等，就是使用自然铜的例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铜因为硬度不高等因素，人们开始探索更高级的铜制品，铜与其他元素的合金应运而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青铜。

中华民族使用铜以及铜器的年代，最早可以推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质刀、钻、凿以及甘肃齐家文化出土的刀等铜质工具，说明在当时成熟的制陶工业等条件下应该是可以产生铜器的。另外文献的记载以及文明发展规律也为此做了佐证。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了商周时代，铜器制造与使用达到了黄金时期。商代的铜器虽然铭文比较少，但是巨大的体量、繁缛的纹饰、复杂的门类、精美的造型都说明了这个时期铜器制造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西周时期是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它突破了商代铜器铭文文字少内容单一的特点，从性质、内容、形式、数量以及书体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观，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长篇巨制式的铭文，如多达498字的毛公鼎等。并且从出土数量、铜器种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礼器开始衰弱，日用器开始大增；王室器减少，具有地方特

色的列国器大增。从器形、纹饰到铭文、用途都有着很大的改变。战国以后由于青铜文化逐渐结束，铜器渐被铁器、漆器、陶瓷器所取代，铜器纹饰几乎全废，铭文又回到简单的“物勒工名”的情况。①

第一节　青铜器简介

青铜器一般分为农具、工具、兵器、饪食器、酒器、盥水器、乐器、杂器等大类，每类下面又根据形体的时代特征分为更加详细的种类，下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

1 鼎，主要用于烹煮肉食或盛放祭品等，用途相当于现在的锅。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2 鬲(lì，音历)，一般用于煮粥，一般为侈口、三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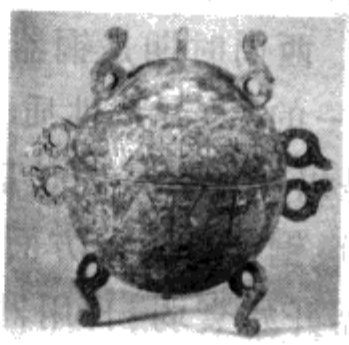
3 甗(yǎn，音演)，是蒸饭的器物。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箅，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以利食物的蒸煮。

4 簋(guǐ，音轨)，用来盛放饭食的器物。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5 盂，盛水、冰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6 簠(fǔ，音甫)，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7 盨(xū，音须)，盛黍、稷、稻等饭食的用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8 敦(duì，音对)，盛黍、稷、稻等饭食的用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由鼎和鬲形制结合而成，产生于春秋时期，盛行于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消失。

9 豆，盛肉酱一类食物用器。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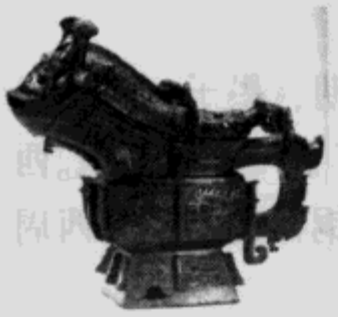
10 爵(jué，音决)，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尾，旁有鋬(把手)。

11 角，饮酒器。自宋代以来一般是把形似爵而前后有尾，没有流和两柱的酒器称为角。有的还有盖。

12 斝(jiǎ，音甲)，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13 觚(gū，音姑)，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

14 觶(zhì，音志)，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15 觥(gōng，音公)，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16 尊，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

17 卣(yǒu，音有)，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在祭祀时盛放香酒。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鸮鹆形或虎食人形。

18 盉(hé，音和)，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19 罍，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20 壶，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箪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21 盘，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22 匜(yí，音仪)，《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器物作一简要介绍：

以上介绍了部分食器与酒器的名称与特征，其他还包括乐器，有：铙、钲(口皆向上、执而击)，钟(皆悬而击之)、铃，铎(皆有舌，其口向下，持而振之)和鼓诸类。兵器如戈、矛、戟、剑、刀、镞诸类，不在此一一介绍。

第二节　金文的研究

金文资料的充分利用，除了隶定文字、梳理文意之外，应该结合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先进行断代的研究，然后综合各项成果，才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

根据文献记载，金文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墨子·非命下》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2]说明时人对铜器铭文有了一定的认识。西汉宣帝时期，张敞考订出美阳出土的铜鼎的文字，确认了这件铜器的年代为西周时期，开了金文研究的先河。

北宋时期对青铜器和铭文有了系统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铜器以及铭文的著录。较著名的有刘敞的《先秦古器记》、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王黼等《宣和博古图录》等。二是对铭文的考释与青铜器的初步研究。铭文的考释在具有开创之功的刘敞的著作里，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铭释，他在序言里具体点明攻究古器之法：曰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了了数言尽开后世金石学研究之风。后来欧阳修《集古录》及

跋尾、吕大临《考古图释文》、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钟鼎款识》等著作继承了这一传统，除了释文外，有的还有部分考证。这一时期，在青铜器的定名与分类方面虽然有不合理之处，但给后世以很大启发。

元明时期的金文研究处于低谷期，到了清代中期至民国时期则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由于朴学的发达，学者们把金文研究与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科学考古学等成果结合起来，使金文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在著录方面，清廷组织编写的《西清四鉴》，私人编写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筠清馆金文》、《攀古楼彝器款识》、《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奇觚室吉金文述》、《三代吉金文存》等种类，丰富多样，可谓成果卓著，风气大炽。

其中，吴大澂利用说文研究，与铜器铭文、泉货、玺印等材料相互比较，开拓了古文字研究的新的境界。孙诒让利用偏旁分析法，写出了《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著作，为后来的古文字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几部著作在辨识文字上也多有创新。

罗、王二人继承清人遗绪，在汇集资料、铜器考订、铭文训释上贡献卓著。王国维收集在《观堂集林》中的金文研究文章以及诸如《散氏盘跋》、《毛公鼎考释序》等文章，都是文辞简约、逻辑缜密、论述极为精到的科学著作。

郭沫若以其渊博学识，除了在金文上有贡献之外，对文学、史学等研究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金文研究著作，如《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金文丛考》(1932年)、《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多是旅居日本时所作。他在研究中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标准器断代法，把铭文、纹饰、器形三者相结合，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并且依靠标准器的标示作用，排列出一个大致的铜器发展的谱系，改变了传统的“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具有开创意义，至今仍为金文研究者所沿用。

建国后随着大量铜器材料的出土，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辩正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陈梦家、朱德熙、李学勤、裘锡圭等人均有相应的突出建树。同时港台与海外的学者，如香港周法高、日本白川静、台湾严一萍等人也为金文研究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集大成之作，如容庚等人的《金文编》(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严一萍的《金文总集》、周法高的《金文诂林》、华东师大编纂的《金文引得》等，为学者研究提供了便利。③

第三节　金文的年代

商代金文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有铭青铜器，属于商代中期，至商代晚期（前14~11世纪）渐趋成熟。这一时期金文最常见的形式有：一、族徽，用以表明作器者身份。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氏名，即作器者在署有家族徽号的同时，还署有其家族所从属的更高级别家族的名号，从而显示了一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徽号铭文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尚有不同的见解）。二、先祖的名号。多数以当时习见的干支形式为名。三、作器者名号。由于家族首领的个人名号往往被用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文除了反映作器者的个人名号外，个别的（如“子某”）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名号。

由于商代中晚期铭文多数属于上述内容，故其字数一般只有几个。在一些金文著录书，如《殷周金文集成》、《金文总集》所收各类器铭中，凡字数只有几个，字形上首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大小不统一且铭文布局不齐整等特点的，大致可以入该一时期。其数量相当多，在商周金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从商代金文可以了解当时商人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信息，可谓“言短意深”。

商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有较长铭文者，如《我方鼎》、《戍嗣子鼎》、《宰甫鼎》诸器可为代表。其中《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41个字。其内容多涉及商代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现在仍是疑点很多。

西周早期金文　西周早期金文可以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嬴卣》、《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等为代表。武王、成王时期承继晚商遗风，仍存在较多的族氏铭文，同时，长篇铭文开始盛行，内容也变得丰富起来，包含许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实及当时的册命、官制、军制等。从字形上看，大小仍不均匀，象形性还较强；笔画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而首尾出尖，笔捺皆有波折；布局上还是不够规整，行列感不强。上述特征可从武王时期的利簋与成王时期的《保卣》、《麸侯鼎》及康王时期（约偏早）的作册大方鼎的铭文中得到说明。康王、昭王时期铭文多为较长篇或长篇，内容范围多涉及当时的战争、政治、册命等重要史实。这一时期，族

徽铭文已少见，字形趋于规整，布局上也很美观，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

墙盘

西周中期金文　这一时期金文中记录周王册封之礼的铭文大量出现，并逐渐形成特色。“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之类嘏辞开始流行，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

这一时期长篇铭文更为普遍，典型的有共王时期的《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等诸器。只有极少数仍有徽号铭文。从字体形式上看，穆王、共王时期的铭文基本上沿袭昭王时期出现的那种规整、拘谨的字型，总体显现出一种整洁的风貌。文字的象形感已经消失殆尽，如其表现人体的字多不再作下跪状而转为下肢向下伸展。共王至懿王时期，部分铭文布局仍很规整，但笔划已粗细一致，进一步向线条化、平直化方向发展，波折与粗肥笔画也已消失，这一方面是为了使书写更加便利，同时在字形上也有所变化，略显活泼，如共王时的墙盘铭文即是一例。还有一些另类风格的铜器，铭文布局比较散漫，字体比较粗犷、敦厚。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铭文存在规整为主与粗犷相辅的两种风格。

西周晚期金文　指夷王至幽王时期。该时期存在较多长篇铭文，内容多为程式化的的廷礼册命，有关军事征伐、土地制度等方面内容亦较多见。宣王时出现最长的西周金文毛公鼎铭，达498字，记宣王对毛公的诰命，是金文作品中的极品。此外，这一时期铭文末尾也盛行“万寿无疆”之类嘏辞。还有许多器铭属于韵文，如作于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日的《虢季子白盘》，通篇为韵文，与《诗经》“六月”、“采薇”等篇相类。其书法线条婉转而不失凝重，气韵整肃而又有节奏感，布局疏朗，为战国时期青

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出土情况

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远眺

铜器铭文所承袭,也为石鼓文所采用。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27件青铜器,是西周末年青铜器的重大发现。这些铜器除了一件盂为西周中期之外,其他都是西周晚期宣王年间的铜器,其中12件铜器还明确标明为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赏赐"单"氏家族一个名叫"逑"的人(铭文中"逑"可能还被称为"单五父"、"叔五父"、"单叔"等,或者是单氏家族历代祖先的名称,此处存疑)。每一件都有铭文,其中有三种铭文都非常长,有的在280个字以上,而逑盘更是有21行共达373字,比建国以来出土的微氏史墙盘(284字)还要长。铭文多记录着"单"氏家族从皇高祖单公到逑八代人的荣耀史,另外还记录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文王、武王"撻殷",昭王、穆王"剿征四方"和"践伐楚荆"等。铭文多为漂亮的韵文,读起来琅琅上口,其中每一段的最后一字为"谐韵","逑鼎"上的铭文共有19个谐韵字句。这次出土的青铜器被誉为新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个窖藏出土27件青铜器,并且件件有铭文,这很罕见;第一次出土了系统介绍一个家族八代世系事迹的西周青铜器;第一次在同时出土的青铜器上将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集中多次使用,对西周晚期青铜器的谱系和断代研究提供了标准器;另外在铜器铭文中,还第一次完整记载西周王朝从文王到厉王11个王的世系、位次和有关事件,是记述历代周王最多的一次发现。

西周晚期铭文,布局工整规范,在少数器铭拓本上可看到清楚的长方格,表明当时在制范时是采用先画格后按格作字的。字形特征较明显:一是普遍作长方形,字形大小相近同;二是笔划绝大多数为细劲均匀的线条,仅个别字,如"天"字上一横,"旦"字下一横仍有作圆点状的,"丁"字仍多写成圆点。金文字体旧或称为"玉箸体"。"玉箸体"源起于中期末叶,盛行于西周晚期。如:夷王时的《史颂鼎》铭文,夷王或厉王时期的《大克鼎》铭文等可视为该体的范例。由于字形典雅,行列整齐,所以这一时期的铭文总体上显得庄重、肃穆。

第四节　金文的内容

商周时代的金文大致可以分为祭祀典礼、政治军事、经济、法律诉讼以及其他内容等五个方面。

祭祀与典礼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代初年,周公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宗法制度，以维护和巩固新建国家的统治。祭祀上帝和祖先在整个殷周社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青铜器是祭祀的礼器，器上的铭文是书写祭辞、祈求上帝保护、颂扬祖先的最好形式。例如商周之际的《我方鼎》，铭文中“御”义为祀，“禦”是血祭，这一类的金文可以和文献记载相参证，以此来考稽古礼。其他如《天亡簋》记载衣祀文王、事喜上帝；《克盨》记载言享祖考等。有关具体典礼的金文也很多，如《膳夫山鼎》铭文记载了王命山管理饮献人等事物，并赐给他玄衣等规定的舆服，整个册命过程通过铭文很完整的展现出来。另外《南宫柳鼎》、《此鼎》、《裘卫簋》、《王臣簋》等几十件铜器上均记载有西周的典礼。

天亡簋铭文

政治与军事　分封册命是属于政治层面的重大事情，也是管理国家、巩固统治的手段之一。大臣因为得到王的赏赐和册命而倍感荣耀，特铸器刻铭以示纪念。赏赐的物品从贝、甲胄、金车、牛、鹿、白马到香酒、土地、奴隶等五花八门。如《宜侯矢簋》铭文记载了周王赐予宜侯的物品以及授土授民的数字。《大盂鼎》记载周王一次赏赐给盂奴隶和家臣达到了1726人之多。[4]井侯簋赐臣三品等，赏赐同时一般还有更为重要的册命，内容多为周王命某人承袭其祖或父的职务或者是任命某人担任职务，并赐予相应的物品。如《颂簋》、《师兑簋》、《井侯簋》等器铭即属此类。关于西周的职官制度，以前一直以《周礼》记载为根据，然而《周礼》成书之时离西周已经很遥远，不是西周礼仪的真实记录。金文的有关内容则补充了这个缺环。从《毛公鼎》铭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存在卿士僚与大史僚两大官署，是执政的最高机关，而由毛公统一领导。《令方彝》记载明保尹三事四方，领导卿士僚，对所有官员发布命令等古代职官的具体内容。除此之外，西周初年有一些铜器记载着文武建邦、营建都邑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如利簋以不太大的篇幅记载了武王伐纣灭商的重大事件，何尊记载了成王五年开始营建成周都城，对武王举行丰福之礼的情景。

西周毛公鼎及其铭文

西周时期进行了多次征伐战争，来巩固新生

政权和社会秩序,这方面的金文资料也十分丰富,如《兮甲盘》记载了兮甲从王征伐玁狁,有所斩获,王赐给他车马,并命他管理成周四方诸侯以至淮夷的事迹。《小盂鼎》记载了康王命盂征伐鬼方,前后两战,攻克鬼方国都,擒获其首领的显赫战果。杀敌近四千人,俘虏一万四千余人,还缴获战车一百多辆、马一百多匹、牛羊近四百头等,双方参战士兵达到二三万人的描述,可见战争规模之大。《虢季子白盘》记载了宣王时抵御玁狁,虢季子白率兵将玁狁阻击在洛河以北,杀敌五百余人,俘虏五十人的战争场面。《禹鼎》记载了禹奉周王之命,平定鄂侯驭方的叛乱。铭文生动地描绘了叛乱的情境,周人惊呼"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四国",周王则下了把反叛者赶尽杀绝的命令("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这些材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秩序、民族关系、军事组织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帮助。

经济 首先是有关土地交易与制度的铭文,这应该提到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四器。铭文记载了裘卫与矩伯之间的土地交易,第一次裘卫用价值八十朋贝的一件玉璋,换得矩伯十田土地;第二次用价值二十朋贝的两个玉扈、两件麂韨等换得矩伯三田土地。《九年卫鼎》载裘卫用一辆车子与各种马具换得矩伯一个邑里——林氏里。《散氏盘》则载矢散二家交换田邑之事,双方以山川道路等自然标志为界,并请人为证。涉及土地制度的金文,还可以举出《师永盂》、《大簋》、《格伯簋》等。在西周社会中,土地由周王授予,非私人所有,授田者必须交纳赋税,有关这方面的金文有西周中晚期的《鲁方彝》、《公臣簋》、《兮甲盘》、《驹父盨盖》、《琱生簋》等。其他如公臣簋载虢仲命公臣"司朕百工",即管理虢仲的手工业作坊;《鲁方彝》记载齐生从事贸易,并从中获利等等,反映了西周经济的多种情形。

法律 与法律有关的金文内容,主要涉及到类似后世的民事契约、刑事惩罚以及案件的诉讼和审判等方面。如《曶鼎》铭文前半部分记载了曶与效父为了买卖五个奴隶的讼诉与判决,后半部分是记载了匡季支使自己的家奴抢掠曶的庄稼的讼事。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条令的记载,如《兮甲盘》记载关市赋税的征收,对于淮夷当地的诸侯和百姓的管理等都有规定。《子禾子釜》、《陈纯釜》等则是有关量值的规定。

其他方面 除了上述金文的内容,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如媵器铭辞,反映了西周晚期特别是春秋时期,周王的"共主"逐渐名存实亡的事实。地方诸侯的势力大涨,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切身利益,往往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联系。同时也揭示了陪嫁的媵器大量出现的原因。这种器物铭辞格式一般较简单,由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嘏辞等三部分组成。

第五节 商、西周金文句读释读

殷商时期

1. 殷商帝乙、帝辛时期《作册般甗》

王宜人方。無敄務。咸。王商賞乍作冊般貝。用乍作父己障尊。來冊。

2. 殷商帝乙、帝辛时期《六祀𠨘其卣》

乙亥。𠨘其易賜乍作冊孥[illegible]一瑱。用乍作且祖癸障尊彝。才在六月隹唯王六祀。羽翌日。亞{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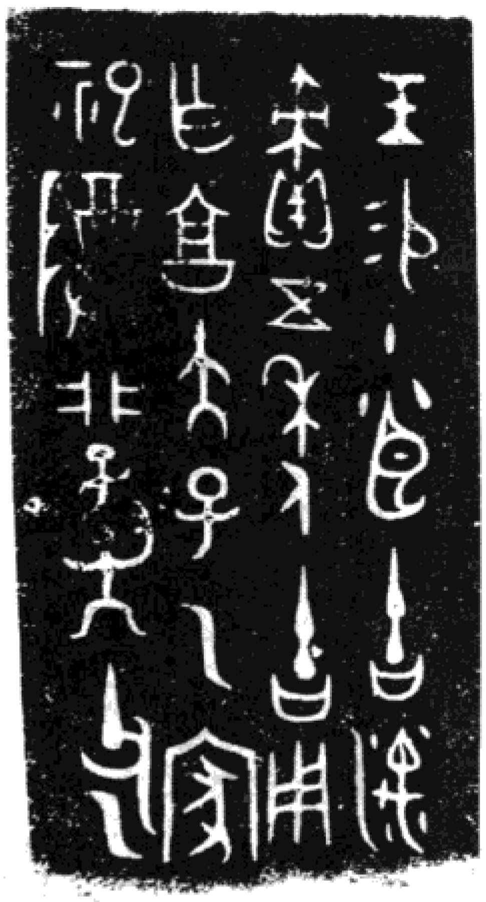
3. 殷商晚期《宰甫卣》

王來獸獸自豆彔。才在禝師。王卿饗酉酒。王[illegible]宰甫貝五朋。用乍作寶𩰫。

4. 殷商晚期《戍嗣鼎》

丙午。王商賞戍嗣貝廿朋。才在𨜠宗。用乍作父癸寶䵼。隹唯王㱃飲𨜠大室。才在九月。犬魚。

5. 殷商帝乙、帝辛时期《小臣缶方鼎》



王易賜小臣缶湡
責積五年。缶用
乍作亯享大子乙家
祀隮尊。㠱父乙。

6. 殷商晚期《毓祖丁卣》

辛亥。王才在廙。降
令曰。歸祼于我
多高厈山。易賜嫠
用乍作毓且祖丁隮尊。[illegible]。

7. 殷商时期《逦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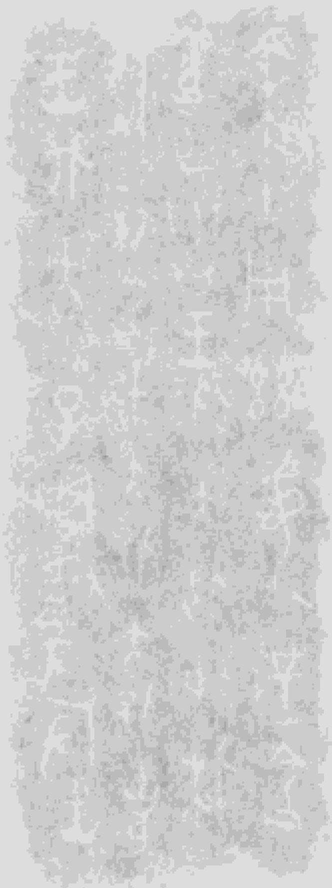
戊辰。弜師易賜肄
[illegible]戶䆤乘貝。用乍作父乙
寶彝。才在十月一。隹唯王
廿祀劦日遘祊于匕妣戊
武乙奭儷。豕一。旅。

8. 殷商时期《听簋》(又名《小臣艅犀尊》)

丁子巳。王省夒且。
王易賜小臣艅俞夒貝。
隹唯王來正征人方。隹唯
王十祀又五。彡肜日。

9. 殷商帝乙时期《小臣俞尊》

辛子巳。王盦飲多亞
耶聖亯享京麗。
易賜貝二朋。用乍作大子丁[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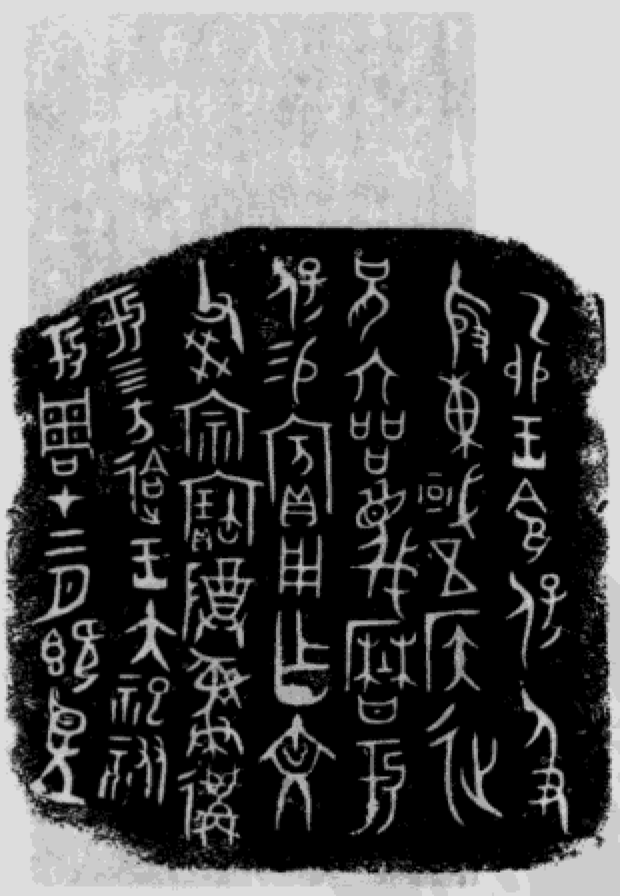


西周时期

1. 西周武王时期《利簋》

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歲
鼎。克䎽昏夙夙又有商。辛未。
王才在䦎自。易賜又有事利
金。用乍作旜公寶隣尊彝。

2. 西周武王时期《保卣》



乙卯。王令保及
殷東或國五医侯。征誕
兄荒六品。蔑曆于
保。易賜賓。用乍作文
父癸宗寶隣尊彝。遘遘
于亖四方迨會王大祀。祐祐
于周。才在二月既朢望。

3. 西周成王时期《太保簋》

王伐彔子耶聖。𠭯厥反。王降征令玙于大太保。大太保克芍敬亡𢌳遣。王衍大太保易賜休余土。用丝兹彝對令。

4. 西周康王时期《大盂鼎》(局部)

隹唯九月。王才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不丕顯玟文王受天有佑大令命。在珷武王嗣玟文乍作邦。閥闢
厥匿慝。匍有亖四方。畯允正厥民。在雩于𠙷御事。𠭯。
酉酒無敢酖酖。有粥柴蒸烝祀無敢𩚤醻。古故天異翼臨
子。灋廢保先王。□有亖四方。我䎽聞殷述墜令。隹唯
殷傷邊𥎦侯田甸雩與殷正百辟。率䏌肆于酉酒。古故喪
𠂤師。巳。女汝妹昧辰晨又有大服。余隹即朕小學。女汝
勿剋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即井型啚于玟文王
正德。若玟文王令二三正。今余隹令女汝
盂𩰫召焚榮芍敬雝雍德坙經。敏朝夕入闌諫。亯享奔走。

5. 西周昭王时期《召卣》

唯九月才在炎𠂤。甲
午。白伯懋父睗赐𥃝召白
馬。每䋣黃髮散。用[illegible]
不杯。𥃝召多用追于
炎不暜白伯懋父
畓友。𥃝召萬年永
光。用乍作團宮䢅旅彝。

6. 西周穆王时期《静簋》

隹唯六月初吉。
王才在莽鎬京。丁卯。
王令靜𤔲司射學宮。
小子眔服
眔小臣眔尸僕學射。
雩八月 初吉庚寅。
王吕以吳桒呂剛剛卿會
𤸰盩𠂤 邦周射于大池。
靜學教 無罭睪斁。
王易賜靜鞞剢。
靜敢捧拜䭬首。
對𬂛揚天子不丕顯休。
用乍作文
母外姞隣尊𣪕簋。
子子孫孫其萬年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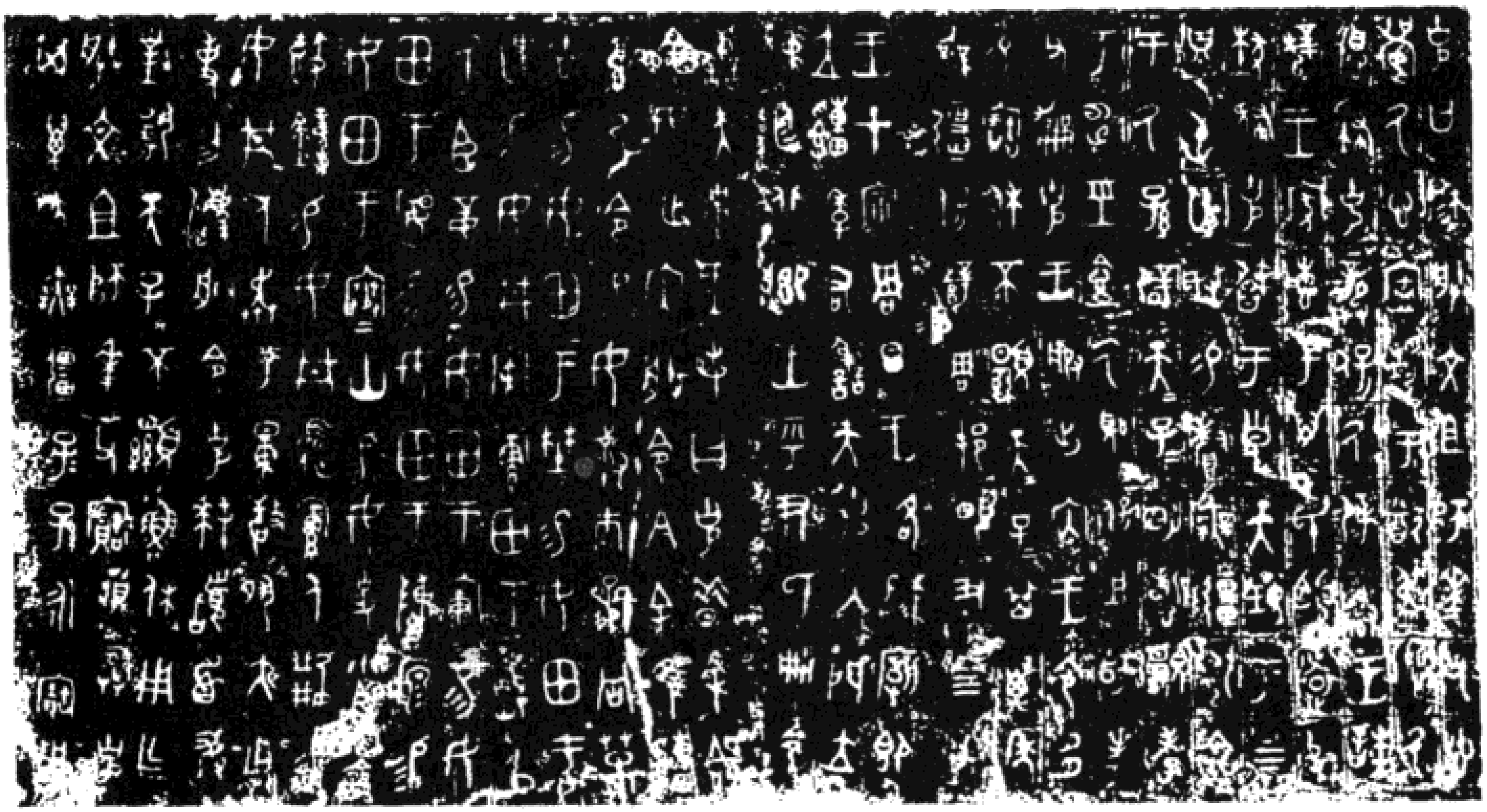
7. 西周恭王时期《师酉簋》

隹唯王元年正月。王才在吳。各格吳
大廟。公族[illegible]𡍮釐入右師
酉立中廷。王乎呼史䛺牆冊命
師酉。𤔲司乃且祖啻適官邑人虎
臣西門尸夷㚄尸夷𣪘秦尸夷京
尸夷畀身尸夷。新易賜女汝赤市朱
黃中㬎絅攸勒。敬𡖊夙夜
勿灋廢朕令。師酉捧拜䭬首。
對䫸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用乍作
朕文考乙白伯宄宮姬隣尊𣪕簋。
酉甘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8. 西周中期《史墻盘》

曰古文王。初盭盭龢于政。上帝降懿懿德大甹屏。
匍撫有上下。迨合受萬邦。䚄圉武王。遹征正亖四
方。
達撻殷。畯畯民永不巩恐狄惕。虘。Ꜥ伐尸夷童東。
害憲聖
成王。𠂇左右綬柔𢾓會剛鯀。用肇肇𢽾徹周邦。[illegible]
睿悊哲
康王。分遂尹啻億彊疆。弘宏魯卲昭王。廣𢿚楚刑
荊。隹唯
寏南行。祇覭穆王。井型帥宇訏誨。䌹緟寧天子。
天子
圝屖文武長剌烈。天子眉無匄𧀠祁上下。亟
獄逭宜慕謨。昊紹昭亡無昊斁。上帝后[illegible]九保受天
子
綰綰令厚福豐年。方䜌蠻亡無不𧡊見。青靜幽高
且祖。才在㣲微霝處。雩武王既𢦏殷。㣲微史使剌
烈且祖
廼來見武王。武王鼎則令周公舍圂宇于周。卑俾處。
甬叀惠乙且祖逨弼匹氒辟。遠猷𦣻腹心。子𠳐䜭粦
明。亞且祖且祖辛𢿚毓子孫。𩅦繁猶祓多孷釐。
椟炎角祿龔熾
光。義宜甘其禋祀。害舒犀遲文考乙公遽競趩爽。
得屯純
無諫。農嗇穡戉越曆。隹唯辟孝春友。史牆夙夙夜
不
彖墜。甘其日蔑曆。牆弗敢沮沮。對羯揚天子不丕
顯
休令。用乍作寶障尊彝。剌烈且祖文考弋翼竈休受
牆
爾䰧福褱懷。猶祓彔祿。黃耇彌生。龕事氒辟。甘
其萬年永寶用。

9. 西周孝王时期《大克鼎》



克曰。穆穆朕文且祖師華父。恖𩰫襄厥心。宖靜于猷。盄淑悊哲厥德。肄克龏恭保厥辟龏恭王。諫敕辥乂王家。叀惠于萬民。𩕢柔遠能𤞷邇。肄克□于皇天。頊于𠄟上下。𢔶得屯純亡敃。易賜賚釐無彊疆。永念于厥孫辟天子。天子明悊哲。䫔孝于申神。巠經念厥聖保且祖師華父。勵克王服。出内納王令。多易賜寶休。不丕顯天子。天子甘其萬年無彊疆。保辥乂周邦。晄畯尹亖四方。王才在宗周。旦。王各格穆廟。即立位。䜌季右佑譱膳夫克入門立中廷。北卿嚮。王乎呼尹氏冊令譱膳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汝出内納朕令。今余隹唯𤕌緟𦎫乃令。易賜女汝叔市參冋絅𦯕中恖。易賜女汝田于埜。易賜女汝田于渒。易賜女汝井家𩁹田于䛇。吕以厥臣妾。易賜女汝田于𢊁康。易賜女汝田于匽。易賜女汝田于𨹮原。易賜女汝田于寒山。易賜女汝史小臣霝龠籥鼓鐘。易賜女汝井遂𩁹人𦖞。易賜女汝井人奔于量量。敬夙夙夜用事。勿灋廢朕令。克𢷎拜䭫首。敢對𩛥揚天子不丕顯魯休。用乍作朕文且祖師華父寶䵼彝。克甘其萬年無彊疆。子子孫永寶用。

10. 西周历王时期《散氏盘》

用夨𨚕薄散邑。廼即散用田眉堳。自濡涉㠯以南。至于大
沽。一弄封。㠯以陟。二弄封。至于邊奅柳。復涉濡。陟雩越𠭯𡨦𨸏
㠯以西。弄封于敉𩏂城楮木。弄封于芻逨。弄封于芻衝。内入陟芻。
登于厂湶。弄封剳庥枿𨸏陵剛崗庥枿。弄封于𩁹單衝道。弄封于原衝道。
弄封于周衝道。㠯以東。弄封于韓東彊疆石。還。弄封于眉郿衝道。㠯以南。
弄封于𥳑逨衝道。㠯以西。至于堆莫。眉堳井邑田。自桹木衝道
广左至于井邑。弄封。衝道㠯以東一弄封。還。㠯以西一弄封。陟剛崗三
弄封。降㠯以南。弄封于同衝道。陟州剛崗。𢍰登庥枿。降棫。二弄封。夨人
有𤔲司眉堳田鮮且敝武父西宮𡨦豆人虞丂彔貞師氏右眚。小門人繇。原人虞𦬊艿。淮𤔲司工虎。𢍰𦉢豐父
堆人有𤔲司刑丂。凡十又五夫。正眉堳夨舍散田。𤔲司土徒
屰逆𢀛𤔲司馬𩁹單𡢁𩏂人𤔲司工騵君。宰德父散人
孚小子眉堳
田戎。敝微父效𠬝父𡨦之有𤔲司𩁹。州𡨦焂從𠷎。凡散
有𤔲司十夫。唯王九月。辰才在乙卯。夨卑俾鮮且𢍰旅𣂏誓。
曰。我𤞞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則爰
千罰千。傳棄之。鮮且𢍰旅𠜱則𣂏誓。廼卑西宮𡨦武父
𣂏誓。曰。我𤞞既付散氏溼隰田𤰈田。余有爽𡨦。爰千罰千。
西宮𡨦武父𠜱則𣂏誓。氒爲圖。夨王于豆新宮東廷。
氒广左執綏。史正中𩁹農。

11. 西周宣王时期《颂鼎》摹本

隹唯六年八月初吉己
子巳。史白伯碩父追考孝于
朕皇考𧶠釐父王母泉
女隮尊鼎。用旛祈匄百彔祿
𩰫眉耆壽綰綽永令命。萬年
無彊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亯享。

12. 西周宣王《無㠱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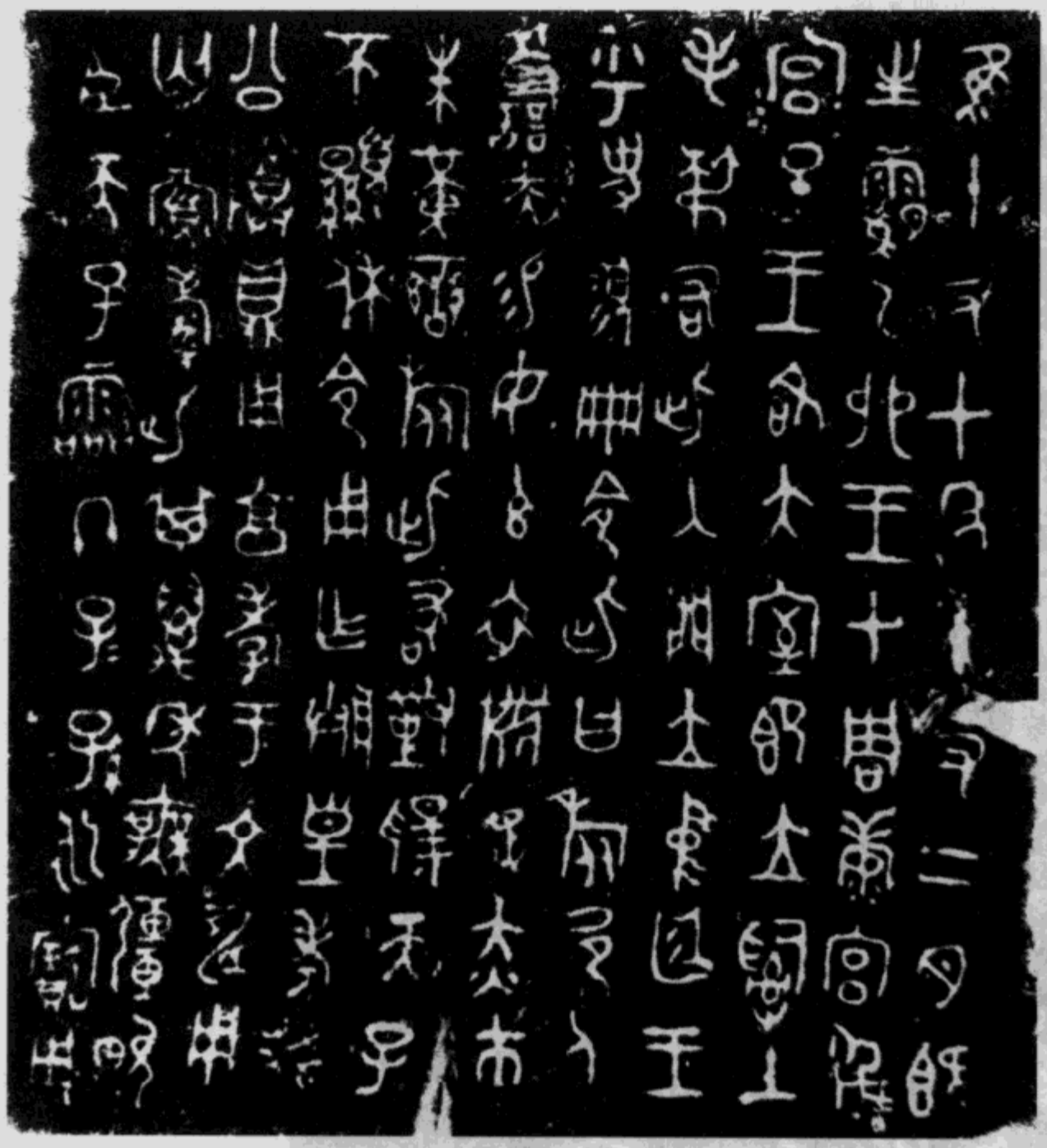
隹唯十又三年正月初
吉壬寅。王征南尸夷。王
易賜無㠱馬三四匹。無㠱
𢷎拜手䭫首。曰。敢對䫉揚
天子魯休令。無㠱用乍作
朕皇且祖釐季隮尊𣪘簋。無
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13-1. 西周宣王时期《毛公鼎》拓片之一

13-2. 西周宣王时期《毛公鼎》拓片之二

王若曰。父厝。不丕顯文武。皇天引
猒厭氒德。配我有周。雁膺受大命。衒率褱懷
不廷方。亡不閈于文武耿光。唯天酱將
集氒命。亦唯先正襄辥氒辟。爵恪堇勤大命。
肆皇天亡昊斁。臨保我有周。不丕巩共先王配命。
敃旻天疾畏威。司余尘小子弗彶。邦酱將害曷吉。
麣麣四方。大
從縱不靜。烏嗚虖呼。趯余小子圂湛于囏艱。永巩共先
王。王曰。父厝。[今]余唯肈肇巠經先王命。命女汝辥乂我邦
我家内外。惷于小大政。甹屏朕立位。虩許上下若否。
雩與四方。死尸母毋童動余一人在立位。引唯乃智知余
非。𦣞庸又有聞聞。女汝母毋敢妄荒寧。虔夙夙夕。惠我一人。
雝擁我邦小大猷。母毋折威。告余先王若德。用
印仰卲昭皇天。𤕌𤕌大命。康能亖四國。俗欲我弗乍作
先王憂。王曰。父厝。雩越之庶出入事于外。尃敷命尃敷
政。埶藝小大楚賦。無唯正聞昏。引甘其唯王智智。迺
唯是喪我或國。厤自今。出入尃敷命于外。氒非
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母毋又敢惷。尃敷命于外。王
曰。父厝。今余唯𤕌申先王命。命女汝亟一方。𢍰宏
我邦我家。母毋顀推于政。勿雝壅建庶口害。母毋
敢龏橐。龏橐迺敄務鰥寡。譱善效乃友正。母毋
敢湛于酒。女汝母毋敢彖才在乃服。圝夙夙夕。敬念王。
畏不睗易。女汝母毋弗帥用先王乍作明井刑。俗欲女汝弗
㠯以乃辟圅陷于囏艱。王曰。父厝。巳曰及丝兹卿
事寮寮大史寮寮于父即尹。命女汝𤔲嗣司公
族。雩參有𤔲司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
㠯以乃族干扞吾敔王身。取𧻚卅寽鋝。易賜女汝秬
鬯一卣。
祼圭瓚寶朱市悤黄玉環玉琭。金車桒𦅫較
朱𩍐𩐁靳虎冟幎熏裏右厄軛畫轉畫輯金
甬錯衡金嶂踵金豙𩵦金簟弼魚箙馬
四匹。攸勒金𠭯金雁膺朱旂二鈴鈴。易賜女丝兹关
賸。
用歲用政征。毛公厝對揚揚天子皇
休。用乍作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14. 西周宣王时期《四十二年逨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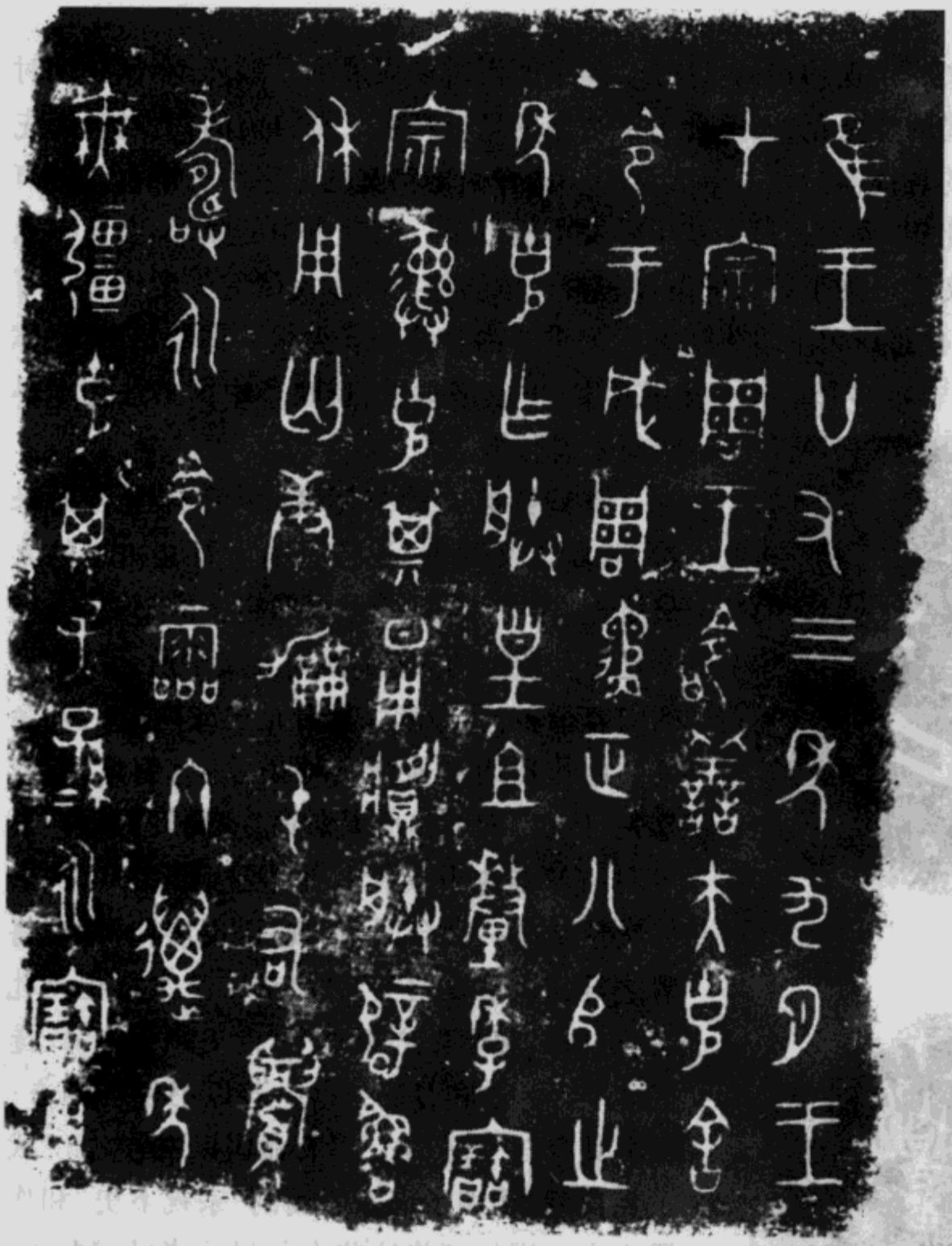


隹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
生霸乙卯。王才在周康宮徲
宮。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𤔲司土徒
毛弔叔右此入門。立中廷。王
乎呼史翏冊令此曰。旅邑人
譱膳夫。易賜女汝玄衣黹屯純赤市
朱黃䜌鑾旂。此敢對𩰫揚天子
不丕顯休令。用乍作朕皇考癸
公隮尊鼎。用亯享孝于文申神。用
匄釁眉耆壽。此𠂤其萬年無彊疆。畯畯
臣天子。霝令冬終。子子孫永寶用。

16. 西周幽王时期《元年师兑簋》

隹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
才在周。各格康廟。即立位。同中仲右
師兑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内
史尹冊令師兑。疋胥師龢父
𤔲司𠂇左右走馬。五邑走馬。易賜
女汝乃且祖市五黃赤舄。兑捧拜
𩒨首。敢對𩰫揚天子不丕顯魯
休。用乍作皇且祖𩰫城公𩰫𣪘簋。師
兑𠀠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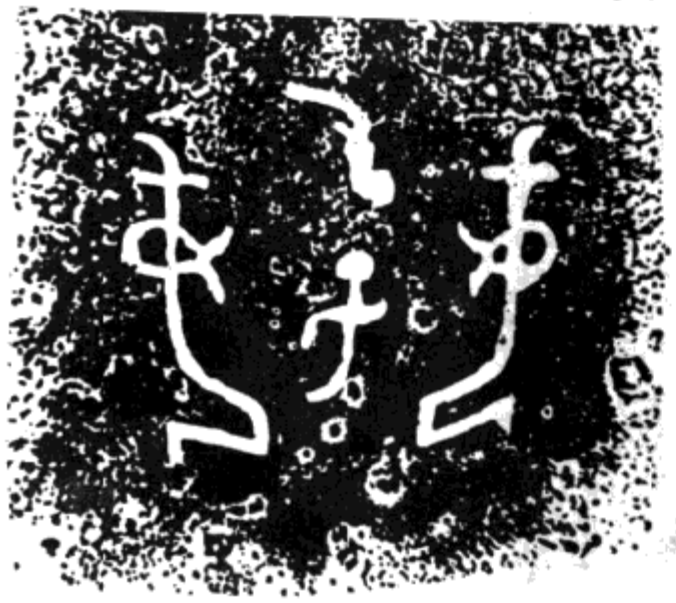
17. 西周幽王时期《小克鼎》



隹唯王廿又三年九月。王
才在宗周。王令譱膳夫克舍
于成周遹正八𠂤師之
年。克乍作朕皇且祖釐季寶
宗彝。克其日用𩰫。朕辟魯
休。用匄康勛樂屯純右祐。
釁眉耋壽永令命霝令冬終。邁萬
年無彊疆。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第六节　殷商西周金文的书法艺术

青铜器铭文的出现约在商代中期，到了西周时期发展到了颠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又呈现出了浓厚的地方特色。据目前的初步统计，先秦时期有铭文的青铜器约在六千五百件。从青铜器铭文的文字结构来看，形声字占了很大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在甲骨文中的数量。而六书中的象形、会意字退居其次，说明文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古代铜器铭文除了是研究先秦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外，也是研习上古书法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大量的铜器铭文，字体清晰鲜明，书体丰富多彩。其上接甲骨文，下启篆隶楷，反映了中国书法艺术早期的发展脉络。⑤



妇好鼎

四祀𠂤其卣

青铜器铭文的书写者　从字体等方面来看，殷商金文的书写，还是由甲骨文占卜的人员所控制。从事宗周青铜器铭文的书写者，应该是一种专门的人员。西周金文中所记“命书”的内容很多，受命者大部分是史或内史。《师汤簋》由作册内史册命，《师晨鼎》、《免簋》、《走簋》、《休盘》皆由作册尹册命。《周礼》卷六“大史……与群执事读礼数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弊之日，执书以诏王”，“小史……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书王令……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郑玄注：“王有命当以书致之。”武王克商后，接纳了许多殷商的“宗祝卜史”和作册史官。周初还将这些人分封给诸侯，《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王“分之（诸侯）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官司彝器”。郑沅《吉金余录》曰：“而为之铭者又皆出于一时之贤人君子，非才艺优善者不能与其选。”昭王时期，由于连年征伐，造就了一大批有战争功名的家族。因其背景不同，铭文书写者的文化承袭比

小臣艅犀尊

戍嗣鼎

寝出簋

司母戊鼎

较复杂，故受赐青铜器上的铭文风格也呈现了瑰异奇放的特色。

周代史官一职可以世袭，使得铭文书写者上下各代有一定的延续性。据考证，由作册大书写的铭文有《作册大鼎》、《成王方鼎》、《太保方鼎》、《王壶》等。作册矢令书写的铭文有《作册令方尊》、《作册令方彝》、《作册矢令簋》等。铭文风格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风貌。前者书风随意自由，线条张力强，字形结构稚拙，肥笔现象较多；而后者字形工整，注意整体的修饰，字形较长，较有规律。

殷商金文书法风格　商代在制作甲骨文的同时，从中期的青铜器上也开始出现了文字形式。商代有铭青铜器的数量在二百件左右（据《中国青铜器全集》统计），铭文的字数不多，少则一两个字，一般10-30字。最多的也不超过50字。殷商金文，多为图腾族徽、勒物王名之属以及祭祖等内容。这类铭文多见于鼎、簋、觚、爵、卣、戈、壶等器物上。族名较为常见者有“矢、亚伐、受、圉、冉、启、天、子刀、卜”等。族徽文字有很强的象形意味，尚未脱离图形文字的形态。晚期金文字数增加，通常在20~30字之间。书写风格端绪颇多，或笔势凝重、气象雄奇，如《父癸角》之铭文；或宏放恣肆，有很强的波折感，如《嫉鼎》之铭文；或秀丽古朴，如帝辛时代的《四祀卯其卣》和《戍嗣鼎》之铭文；或笔调大方，优美洒脱，如《古亚簋》之铭文；或宏伟苍劲，灵秀清逸，如《小臣艅犀尊》之铭文。

商代金文书法的特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笔势，二是行款，三是布局。商代金文的笔势大致有三种，一是起笔、收笔皆露锋，首尾尖锐，锋芒毕现，中间肥润。这种写法一般见于人名和族徽，如《司母戊》的“司”字；二是起

宰椃角

射女鼎

亚鱼鼎

笔藏锋，收笔出锋。这类字体开笔或圆浑润厚、或方正端庄，字的尾部轻提上扬，笔势飘逸，如《二祀𠂤其卣》之铭文；三是起、落笔皆藏锋，笔势沉着，刚劲有力，如《寝出簋》；有的笔道十分坚挺，类似汉印刀法，如《射女鼎》、《史鼎》、《亚址方罍》之铭。

就行款而言，商代金文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一种是行距纵横规整，布列工齐，体势凝练，肃穆庄重，如《宰椃角》、《戍嗣鼎》等。一种是字体大小错落，纵横间距左倚右靠，散而不乱，如《亚鱼鼎》等铭；有的结体散逸，已有草书的若干意味，如《父葵角》之铭。

在整体布局上，商代金文已体现出明显的主观意识。除了部分铭文的布列章法工整有序、不偏不倚外，大量的铭文在书写时根据字体大小、长短、形体等特征，进行了错落有致的安排。达到了疏密得体，揖让有致，顾盼生姿，富含节律的艺术效果。更有特色的是商代金文在布局上有意识地将文字和族徽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如《亚鱼鼎》铭开了后世书法与印章相结合之先河。这一艺术表象，提示我们对于殷商书法的创造力要有足够的认识。

西周金文书法风格 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西周自武王建国，共经历了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宣、幽十二王，凡257年。西周青铜器不仅种类和数量大大超越了前代，而且铸造精美，工艺精湛，尤其是青铜礼器上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铭文，如《大盂鼎》铭文19行291字，小盂鼎铭文20行近400字，大克鼎铭文28行290字，《毛公鼎》铭文32行498字，《散氏盘》铭文19行357字，《史墙盘》铭文18行284字等，成为了青铜时代灿烂文明的典范。西周金文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册命、赏赐、征伐、诉讼、颂祖等。

西周金文书法的风格有早、中、晚三期之别。一般

以武、成、康、昭四王为早期。早期的铭文继承了殷商风格，字数较少，仍以族徽和勒物工名为主。这一时期有较长铭文的器物数量不多，成王的《眉县大鼎》，不到30字；昭王时期的《召卣》不到50字；武王的《天亡簋》，约七十余字；超过百字的仅见康王的《大盂鼎》铭，达291字。

旂觶

德方鼎

史墻盘

天亡簋

西周早期金文的风格笔画粗细不一，注重线条对字形的表现。风格也有较大的差异。书风处于不定和稚嫩的阶段。武王时期的《利簋》，行款整齐，简朴有力。成王时期的《成王方鼎》和《德方鼎》铭文，字体很大程度上因袭殷制，起笔、落笔锋芒毕露。康王时期的《史㝬簋》，起笔尖锐，转折处圆笔、方笔兼用，出锋夸张。昭王时期的《令簋》，起笔厚重，收笔轻起。《旂觶》两头露锋，体态修长。《士上盉》字体，笔画扁平，竖细横粗。总体而言，西周早期的书法风格，仍旧处于殷系文字的影响之下，笔势有显著的波磔感。同时也可以看出，金文的书写开始关注整体的布局行气，章法逐渐整齐规范。早期金文以康王《大盂鼎》的铭文最具特色。用笔方正，字体凝重恣放，苍劲雄浑。排列齐密，气势雄贯，通盘毫无苟且之作风，是西周早期金文的经典。

进入西周中期以后，商代遗民的风俗习惯、审美观念逐渐趋同于周文化。这种变化使青铜器铭文的风格脱离了殷商的遗风而具有了典型的周代风格。西周中期包括穆、恭、懿、孝四王，金文书法的总体特点是行文布局齐整，其中以穆恭

班簋

大克鼎

善夫克盨

豳生盨

时期的铭文字体沉着润挺，懿孝时期则纤弱柔美。

穆王时期是西周早期向中期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长篇铭文十分普遍。笔画一改初期的肥笔尖锋，转为沉稳匀圆。笔势匀柔秀美，结体紧密平稳，章法纵横有据，布列有序，形成了质朴平实的书法风格，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初步格局。如穆王时期的《静簋》，字体柔和含蓄：《班簋》字体，起笔较重，笔势圆润，纵横排列整齐。恭王时的《史墙盘》，严谨工整，雍容秀丽；《五祀卫鼎》铭文，字体基本上藏头露尾，起笔重而圆，已具篆意，纵横排列细密，一丝不苟。孝王时期的《大克鼎》，舒展端庄；《善夫克盨》铭文，字体笔触纤细，弱而不挺，迴曲多姿，行款整齐划一。懿王时期《王伯姜壶》铭文，笔画粗细不一，笔力疲而欠拔。《朕匜》笔画纤细柔媚，行款舒展，字体诘奇。《师虎簋》字体圆润俊秀，柔和优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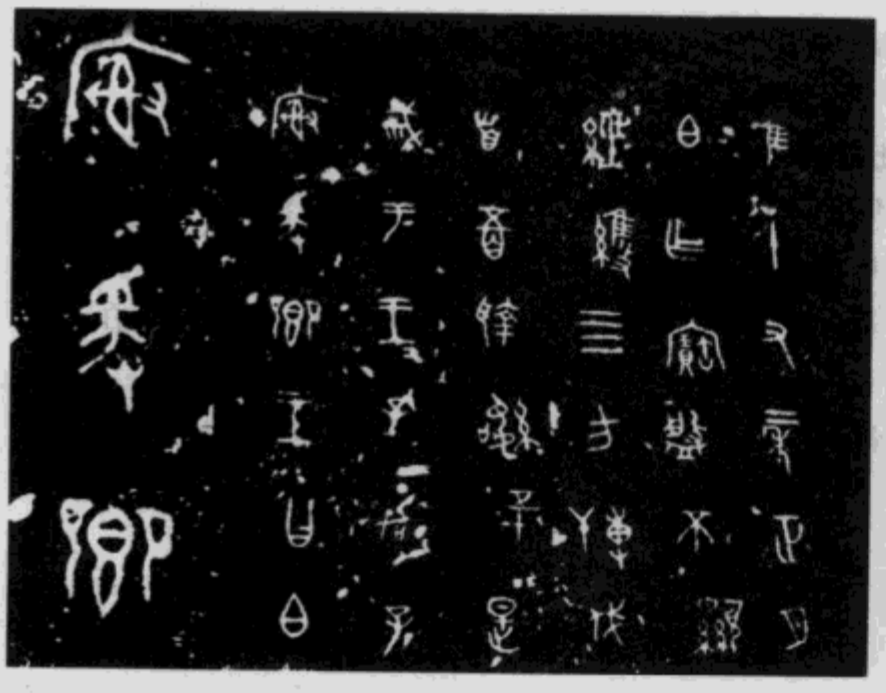
夷、厉、宣、幽四王属于西周晚期，是金文发展的高峰时期。夷王时期铭文，用笔圆润，大多为藏锋，偶见出锋。字体方正，排列谨严，无明显的波磔感。《矢人盘》铭文，字体呈扁圆状，宽舒俊秀，奇丽异常。厉王铭文风格一部分与夷王相近，但更有自己的特色。如《豳簋》铭，笔力纤弱，收笔处常见露锋，字体大小基本一致，字体转折处多用方笔。《豳生盨》铭文，笔势有明显的波磔感。《晋侯稣钟》铭

文，字体修长。起笔较重，笔画粗细均匀，已有若干小篆意味。

猷簋

西周晚期的金文，除了拥有周王室典型的面貌外，它还与其他地域和春秋时期的文字形式有关联。其中与籀文的的关系尤为密切。籀文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写。《说文解字序》说："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世谓之籀书者也。"王国维考定其为战国时期的"西土"（秦国）文字。《史籀篇》早已经遗失，今天我们只能从《说文解字》保存的二百多个籀文中去了解大概。容庚《金文编》中，记录与籀文相应的字有九十多个，其中相同、相近的占了一半。通过将籀文和与晚周金文作详细的比较，尤其从西周末年的《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铜器上的文字中，很明显可以发现籀文的面貌。因此西周晚期的铭文，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宣王时的青铜器，于清道光末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该鼎有铭文32行，连重文共498字。毛公鼎铭文约刻铸于公元前827年，是迄今发现的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全文以记言为主，辅以叙事。字体呈长方形，匀称规矩，用笔纯熟，字划圆劲，气势磅礴。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字形扁平，写法草率，体势斜侧，奇丽生动，似乎已有"草篆"痕迹。同时期的《虢季子白盘》，字体狭长，圆润灵秀，笔力尖峻，笔锋藏而不露，无明显的波磔感。线条粗细整齐如一，布局纵横有



虢季子白盘

散氏盘

散氏盘

致，爽洁疏朗。这三篇铭文的字体已开小篆之先河，对后世秦系文字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 本部分参考：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墨子·非命下》（注释本），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4 页。

③ 参见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香港中华书局 1958 年版；严一萍《金文总集》，台湾艺文印书馆 1983 年版；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大盂鼎铭文记载："邦司田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服，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⑤ 详见朱顺龙《先秦书法风骨论——甲骨文金文的书法艺术》，《书学》（日本）2003 年第五期。

第十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
——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因为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形成了具有区域性书写风格的文字形式。这一时期除了青铜礼器上的文字外,兵器、货币等物品上面,也多刻有文字,体现了春秋战国金文丰富多彩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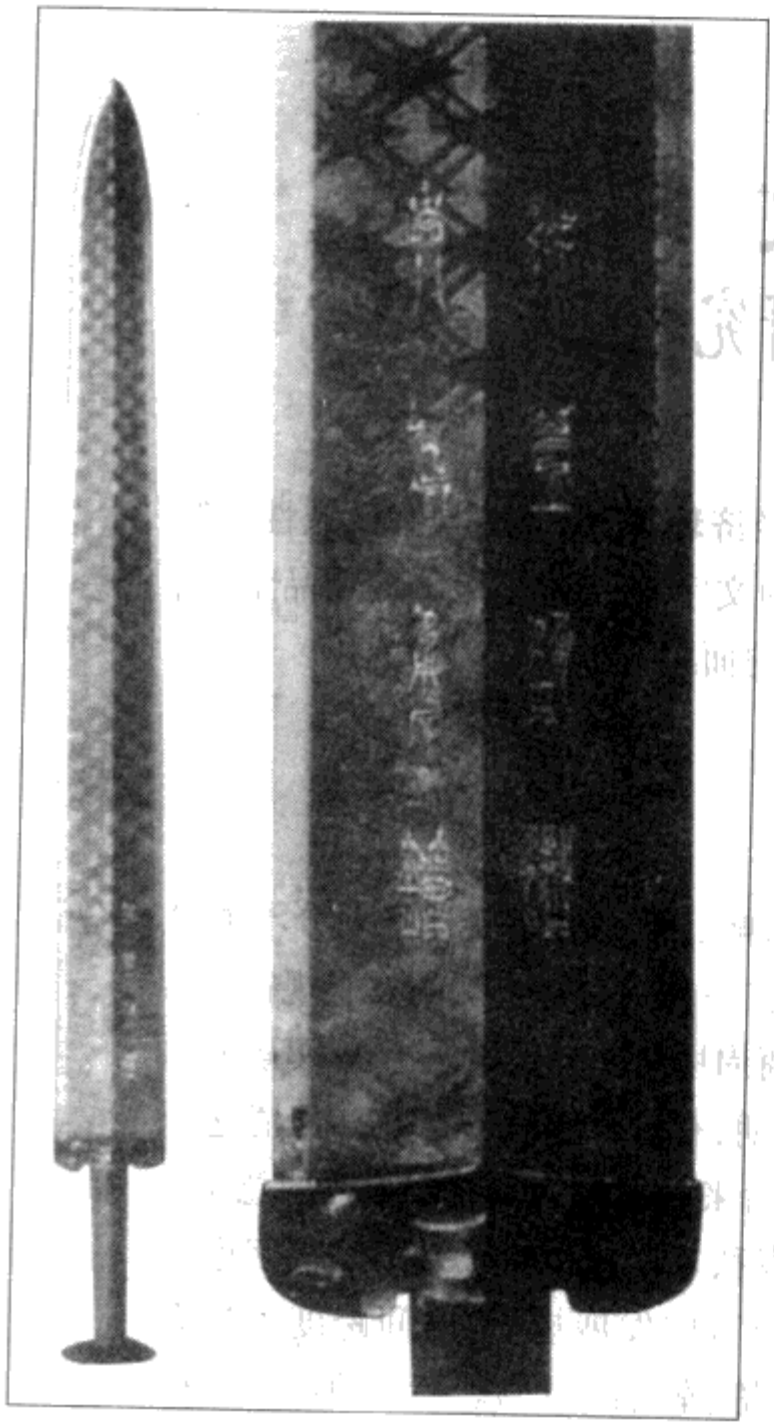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概　述

一种文字的发展无疑要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但是文字变迁的划分不能简单地比附历史时期的划分,而有着与语言结合在一起的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春秋战国文字就是如此。这个时期的文字上承商周甲骨文、金文,下开秦汉篆隶的先河,处于上古文字向现代文字变化的过渡时期,有着分水岭的意义。理清这个时期的古文字对于深入研究甲骨文、金文以及后来的隶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春秋文字,时间上大约是在西周末年到春秋末期这一阶段。战国文字也不仅仅限于历史时期的划分,而是兼顾了文字语言的发展规律,时间跨度为从春秋末期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区域广泛,包含齐、楚、秦、燕、赵、魏、韩等地区。春秋战国金文共同表现了古文字在这一阶段的变化发展。

平王东迁以后,周王虽仍是名义上的"共主",但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形成了诸侯力政的局面。同时诸侯国内部也出现公室衰微、卿大夫竞相把持朝政甚至分割政权的情况。这就是史家所称的"礼崩乐坏"的时代。

这一时期,"僭越礼仪"的事情非常普遍。青铜礼器的使用、用法、铭文也就有了新的时代特征。金文形体因为诸侯势力的增长,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特点,当然"同出一源"的特点决定其差别只是书写风格的差异,而字体结构仍保持大体一致。这一时期还形成了铭文装饰化、美术化的特征。秦国发源于宗周故地,铭文直接承续西周金文特征而稍有变化,即字体更加方正瘦劲,这可以秦公钟、秦公



春秋晚期越王勾践剑

且不成系统，不在这里详述。

第二节　金文选读

中原及北方地区的金文

篆为例。东方各国文字圆润秀美，字体多呈修长之态，如晋国栾叔缶等器铭文。南方的吴越楚等国文字也曾流行修长的文字形体，故作扭曲之态，如曾侯乙钟、吴王光鉴、蔡侯盘铭文等；有的还加上鸟形或虫形纹饰，即通常所说的“鸟虫书”，这可以王子午鼎、越王勾践剑等为代表。

战国时代传统金文仍然流行，同时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其他载体的文字书写形式，因战争频繁，所以大量的兵器上刻有文字；当时生产力大大提高，工商贸易发达，货币大量发行，因而泉货文字大量出现。

春秋战国早期的铜器铭文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西周晚期的风格，字体笔画遒劲凝重，字数也很长，内容多为叙述作器缘由，以及祝愿子孙永保用之类的话，典型器物有哀成叔鼎、陈侯午敦等。乐器铭文以钟铭为主，内容也是描写祖先功绩的赞颂之辞，文字规整，行款优美，如章钟等。中晚期铭文，笔画纤细，款式工整，但是内容开始贫弱，只是以“物勒工名”的形式出现，这可以兵器刻辞为代表。铜器铭文除了上述形式之外，还有符节、量权等种类，因为出土少

1. 春秋晋《栾书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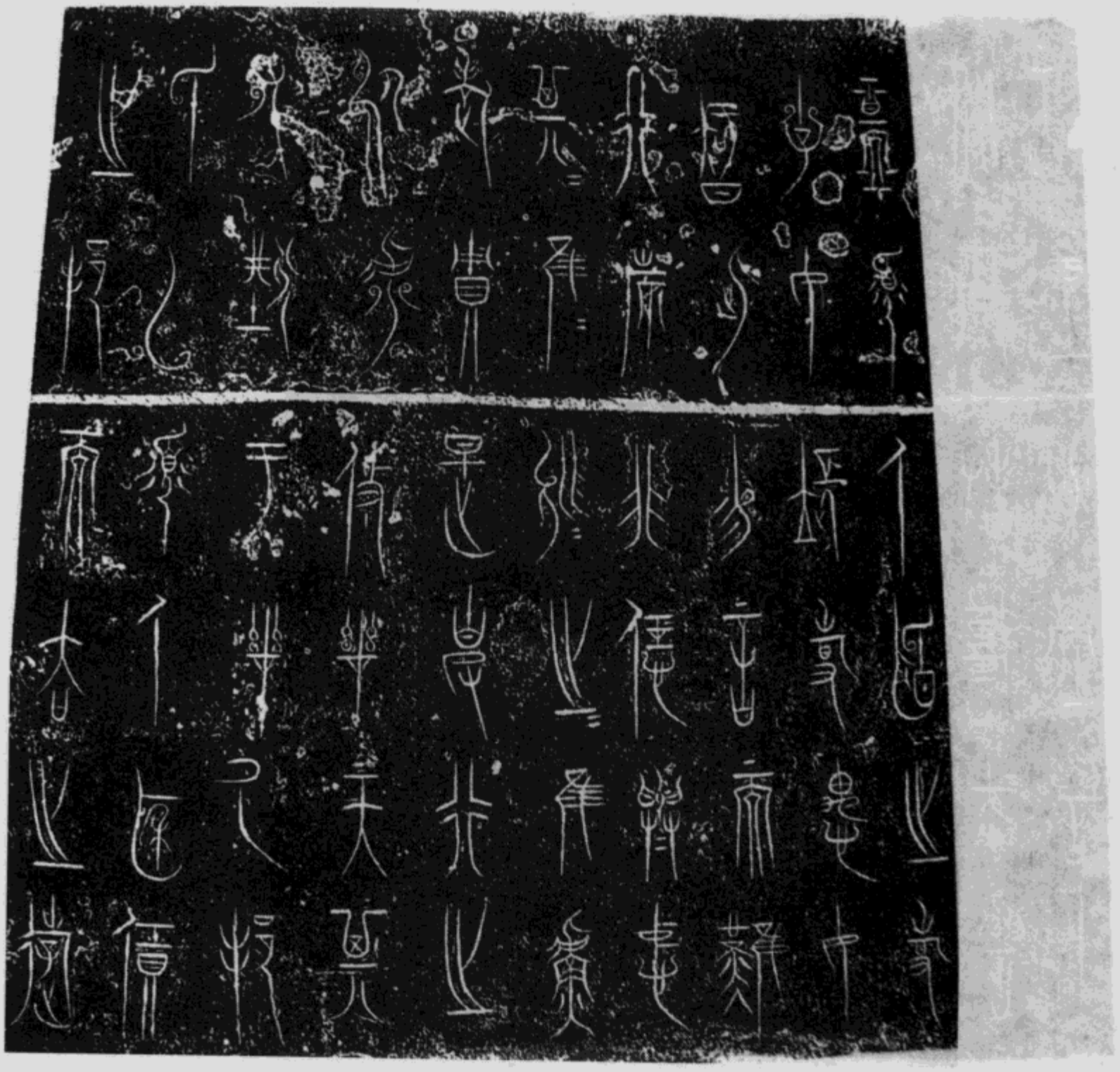
正月秄季䛒春。元日己丑。
余畜孫書也。斁擇其吉
金。㠯以㕣作𩰫鑄鉓缶。㠯以祭我
皇祖。𧆞吾㠯以斤祈𩰫眉耋壽。䜌樂
書之子孫。萬𣂏世是𥨊寶。

2. 战国中山《中山王譻鼎》

隹唯十四年。中山
王譻詐作貞鼎。于銘
曰。於嗚虖呼。語不竣悖
孥哉。𠦪寡人聒聞之。蔑
其汋溺於人施也。寧
汋溺於困淵。昔者。郾燕
君子徻。覩弇夫
猎悟。𧶠長爲人宗。閈見
於天下之勿物矣。
猶粯迷惑於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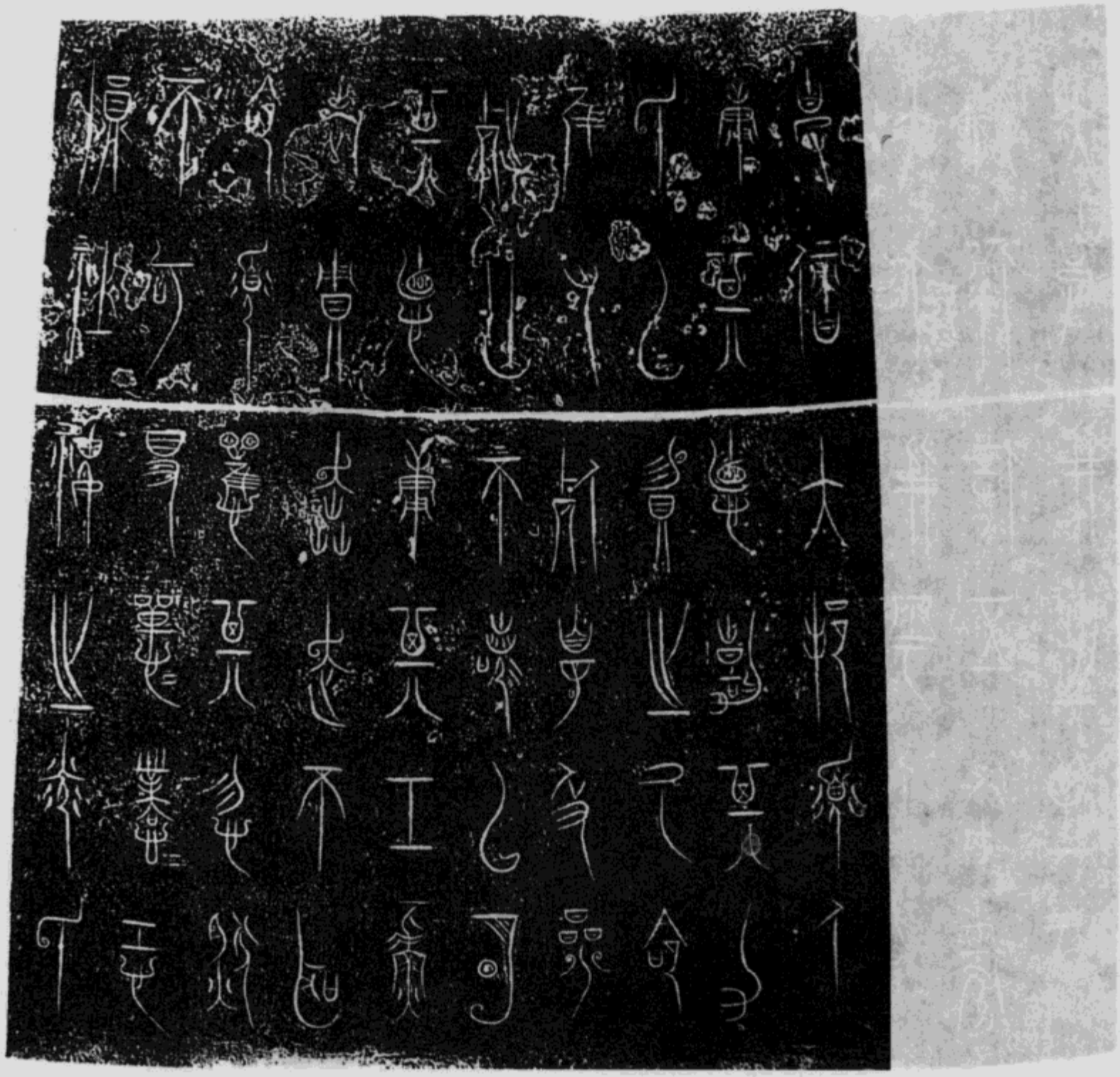
而迄亡其邦。爲天
下殏。而皇況才於
孚少君虖乎。昔者。虘吾
先考成王早弃
羣臣。𡨦寡人孿幼𡋯童
未甬通智。隹唯俌傅侮姆
氏是從。天降休命
于朕邦。又有氒忠
臣賙。克𢘅順克卑俾。
亡不率仁。敬𢘅順

天悳德。㠯以猨左右𠬝寡
人。使智知社稷之
賃任。臣宗之宜義。敃夙
夜不解懈。㠯以諱道導
𠬝寡人。含今余方壯。
智知天若否。侖論其
悳德。眚省其行。亡不
巡順道。考尼宅隹唯型。
於嗚虖呼。新欣𢆶哉。社稷
其庶虖乎。氒業才載



祇。𠬝寡人聒聞之。事
孚少女如𧶠長。事愚女如
智。此易言而難
行施也。非恁信與忠。
其隹誰能之。其隹誰能之。隹唯虘吾
老貿賙是克行之。
於嗚虖呼攸𢆶哉。天其
又有𢦏刑。于𢆶在氒邦
氏是㠯以𠬝寡人匡賃任
之邦。而去之遊。

亡悤慵惕之忌慮。昔者。虘吾先祖祖趄桓王。卲昭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㠯以憂愁勞邦家。含今虘吾老貫賙罽親率𠬝參軍之眾衆。㠯以征不宜義之邦。𢿱奮桴晨振鐸。闢啓尌封疆。方嚮數百里。剌列城嚮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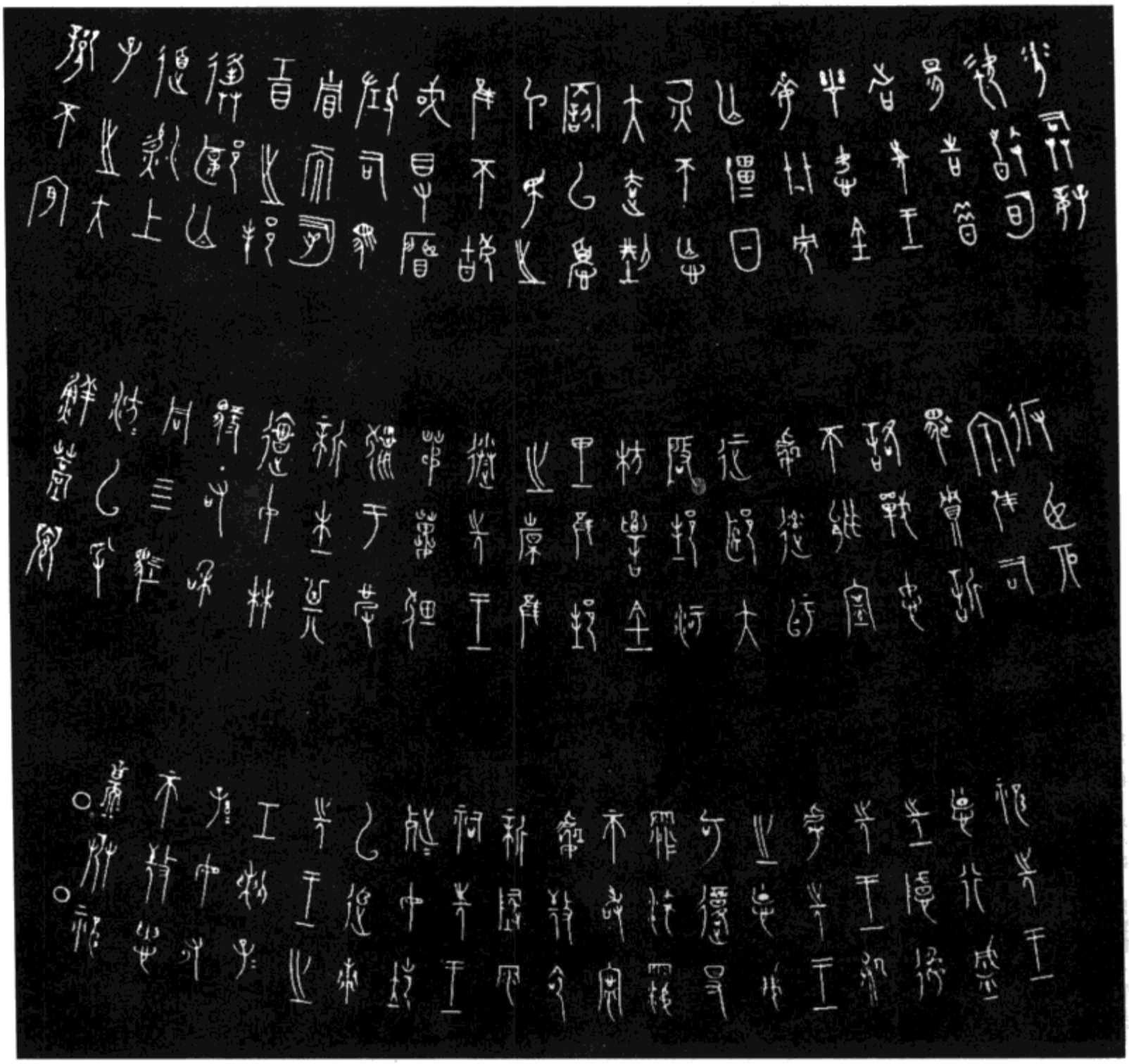


克倍敵大邦。𠦪寡人
庸其悳德。嘉其力。
氏是㠯以賜之氒命。
隹雖又有死辠及𢍰參
𣥂世。亡不若。㠯以明
其悳德。庸其工功。虘吾
老貫賙奔走不耶聽
命。𠦪寡懼其忽然
不可旻得。憚憚㦰㦰。忑恐
隕社稷之光。氏是

㠯以𠬝寡許之愻謀忌慮
虘皆從。克又有工功。智
施也。詒死辠之又有
若。智知爲人臣之
宜義施也。於嗚虖呼。念之
𢆶哉。後人其庸庸之。
母毋忘尔邦。昔者
吳人并雩越。雩越人𩛥修
教備恁信。五年覆
吳。克并之至于

含今。尔母毋大而惰肆。母毋富而喬驕。母毋眾衆而囂。哭鄰邦難寎親。我仇人才在彷旁。於嗚虖呼。念之紲哉。子子孫孫。永定俘保之。母毋竝替毕邦。

3. 东周中山《𠦪盗壶》



胤㫚嗣好
盗。敢明
昜揚告。昔
者先王
䜌慈炁愛百
每媚。竹篤胄
亡彊疆。日
夙夜不忘
大㚅去型刑
罰。㠯以慐憂
氒民之
隹罹不㤅辜。
或旻得㬅賢
㚤佐司馬
賙。而冢重
貢任之邦。
逢郾燕亡無
道㶏上。
子之大
辟不宜義。
仮反臣丌其
宗。隹唯司
馬賙訢新
詻諤戰僤忞怒。
不能寍寧
處。率師
征郾燕。大
啓邦㳄宇。
枋方譻數百
里。隹唯邦
之榦。隹唯
送朕先王。
茅蒐狃畋
獵。于皮彼
新杢土。其
逾會女如林。
馭馭右和
同。亖四駐牡
汸汸。㠯以取
鮮薑蘳。卿饗
祀先王。
悳德行盛
生皇。隱㝃逸
先王。於鳴
虖呼。先王
之悳德弗
可復旻得。
霖潸霖潸流霖涕。
不敢寍寧
處。敬命
新墬地。雨禴
祠先王。
枼世枼世毋毋㞷。
㠯以追庸
先王之
工功剌烈。子子
孫孫。毋毋又有
不敬。寅寅
祗丞烝祀。

4. 春秋宋《宋公䜌簠》

有殷天乙唐孫宋公䜌乍作
其妹句敔敔夫人季子媵匿簠。

山东齐鲁系金文

1.东周鲁《鲁伯愈父鬲》

魯白伯愈乍作鼄邾姬𡰥夷
朕朕羞鬲。甘其永寶用。

2. 东周鲁《鲁大司徒簠》

鲁大𤔲司徒厚氏
元乍作䭪媵𠤳簠。𠀠其𩕾眉
耆寿萬年無彊疆。子子
孫孫永寶用之。

3.战国齐《陈纯釜》

塦陳猶立事歲。
䜌月戊寅。各格
丝兹安陵亭。命
左關帀師發。敕
成左關之谷釜
節于數稟谷釜。𢿢敦
者曰塦陳純。

4. 战国齐《陈侯午敦》

隹唯十又四年。
陸陳厌侯午台以羣
者諸厌侯獻獻金乍作
皇妣妣孝大妃
祐祭器𩰫錞錞。台以
烝烝台以嘗。保又有
齊邦。永枼世母毋
忘。

5. 春秋齐《齐侯盂》

齊厌侯乍作朕媵子
中仲姜寶盂。其
釁眉耆壽萬萬年。
永倸保其身。子子
孫孫永倸保用之。

6. 春秋陈《叔父甗》(又名陈公子叔原父)

隹唯九月初吉丁亥。
陳陳公子子弔叔邍原
父乍作遴旅獻甗。用征
用行。用鬻糈稻沙粱。
用旂祈釁眉耆壽萬年
無彊疆。子子孫是尚。
1275　陳公子叔原父甗　春秋早期

7. 东周陈《陈侯壺》

陳陳庆侯乍作嬀
櫓朕媵壺。廿其
萬年永寶寶用。

8. 东周邾《邾公钓钟》

陸𩰫之孫邾公釛乍作氒
禾龢鍾鐘。用敬
卹盟祀。旂祈年
釁眉耆壽。用樂我
嘉宄賓及我
正卿。揚君霝君㠯以蓳萬年。

9. 东周邾《邾公华钟》

隹唯王正月初吉乙亥。
鼄邾公華䍙擇氒吉金。玄鏐
赤鏞。用盟鑄氒龢鐘。台以
乍祚其皇且祖考。曰。
余𢍰畢𢍰恭威畏
忌。恖淑穆。不
豕墜于氒身。盟鑄其龢鐘。
台以卹其祭祀盟祀。台以
樂大夫。台以
宴士庶子。
昚慎爲之名銘。元器
其舊。哉載公釁眉耆壽。
鼄邾邦是保。其蓳萬年無彊疆。
子子孫孫永保用亯
享。

10. 东周杞《杞伯簋》

杞白伯每亡乍作鼄邾
嫜寶餒簋。子子孫孫
永寶用亯享。

11. 战国齐《陈曼簠》

齊陻陳曼不敢逸
康。肇肇堇勤經德。乍作
皇考獻獻弔叔餴廄。
永保用匿簠。

楚系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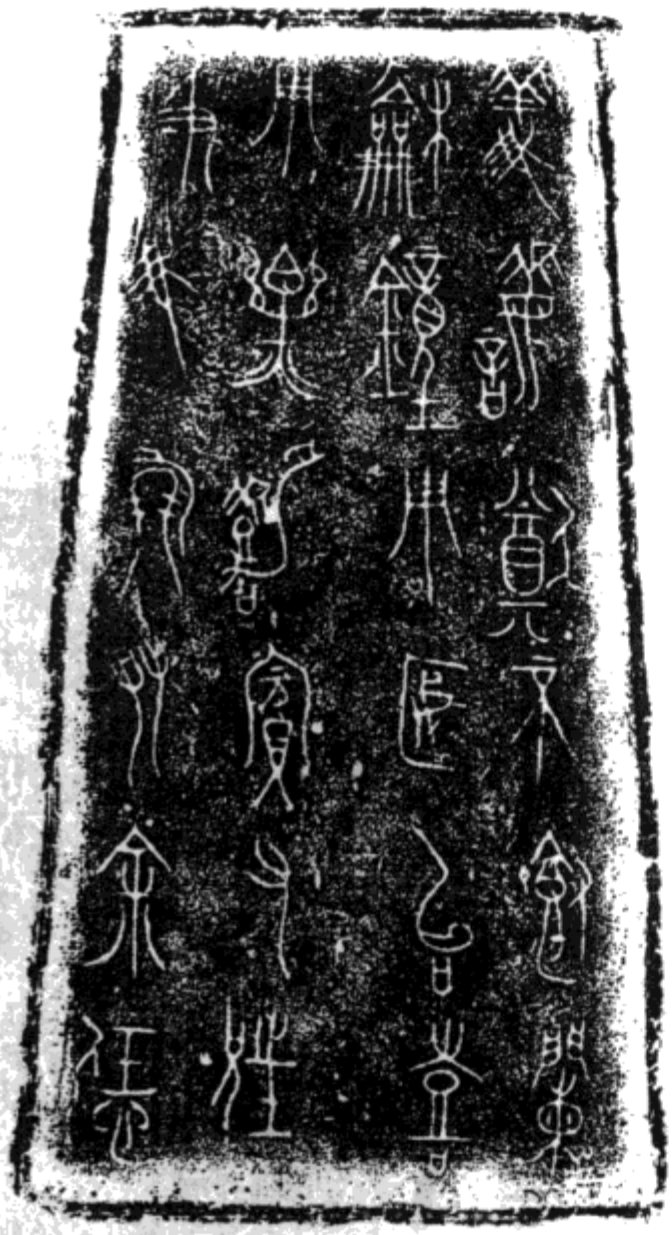
楚地铜器铭文的形式反映了楚王族的文化传承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开始强盛的楚国，正以一种充满自信的心态，显示其对于中原文化，也就是三代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出土的楚金文，其字体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大体上在春秋中期以前与中原诸国无异，春秋中后期虽出现了作为装饰目的使用的鸟虫书，但并非楚所独有，应用范围很有限，使用并不普遍，且战国中期以后，字体渐趋方正规整。与中原各国文字相比，楚文字在字形与笔划的增减上有所不同，但同是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字系统。

1. 春秋楚《王孙遗者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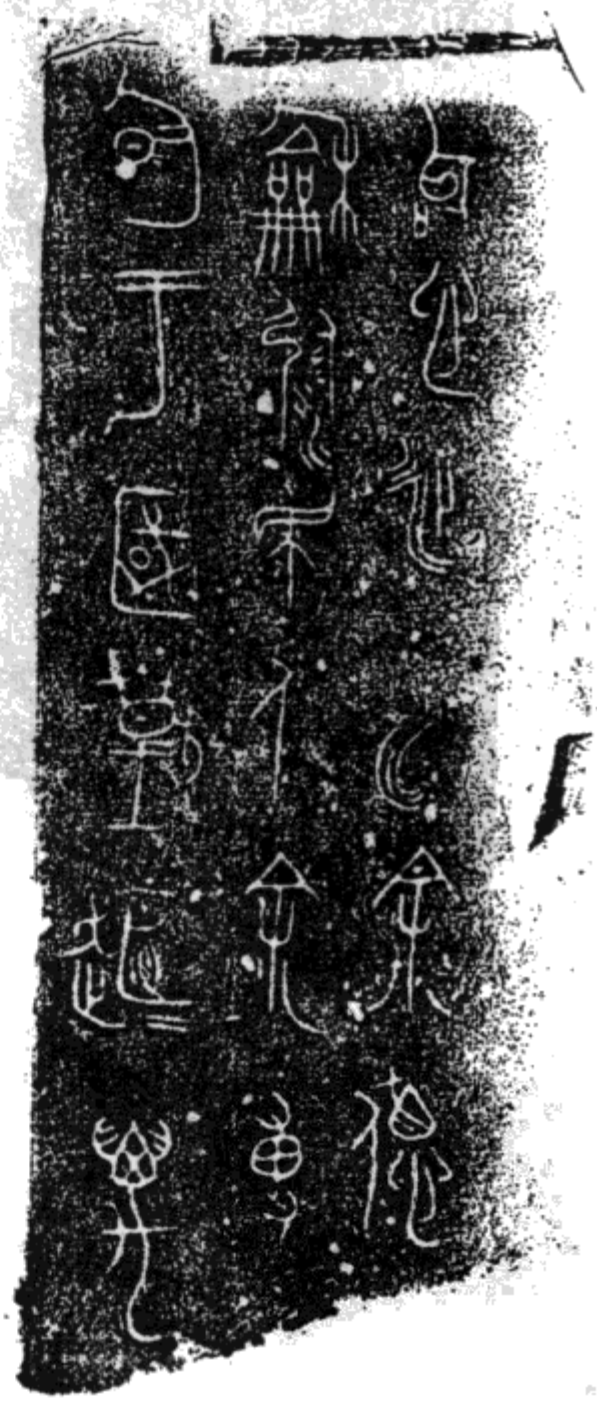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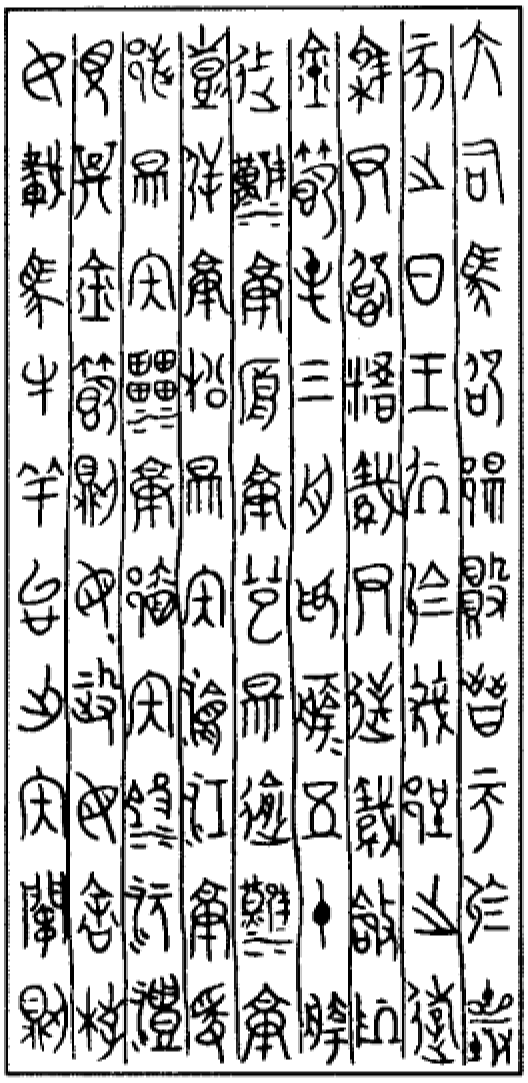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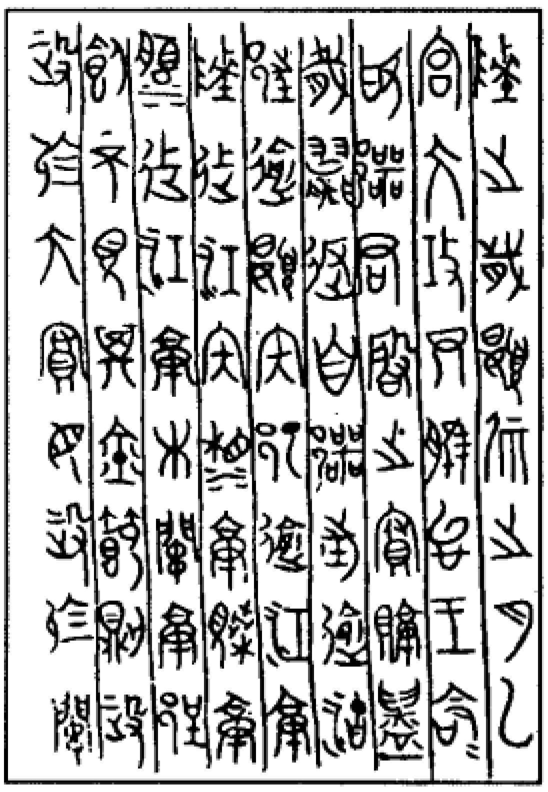
5

6

隹唯正月初吉丁
亥。王孫遺者睪擇
其吉金。自乍作龢
鐘。中終翰輸叡且旟揚。元
鳴孔皇。用亯享台以
孝。于我皇且祖文
考。用旟祈釁眉耆壽。余
圅函龏恭𢓊屖。敃畏嬰忌
趩趩。肅哲聖武。惠
于政遠德。忎淑于威
義。誨猷不丕飤飭。闌闌
龢鐘。用匽宴台以喜。
用樂嘉賓父𧿹兄
及我倗友。余恁
訇心。征誕永余德德。
龢溺民人。余專數
旬于國。皝皇皝皇趄熙趄熙。萬
年無諆期。枼世萬孫
子。永保鼓之。

2. 鄂君启节





大司馬卲鄒(陽)敗(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戢(歲)。頣(夏)层之月。乙亥之日。王尻(居)於茂郢之遊宮。大攻尹脽台(以)王命命集(集)尹悶𦷓裁尹逆裁敂(令)阬。爲鄲(鄂)君啓之廎(府)賹盥(鑄)

金節。屯三舟爲一舿舸。五十舿舸。戢(歲)罷(能)返。自鄲(鄂)生(往)。逾沽(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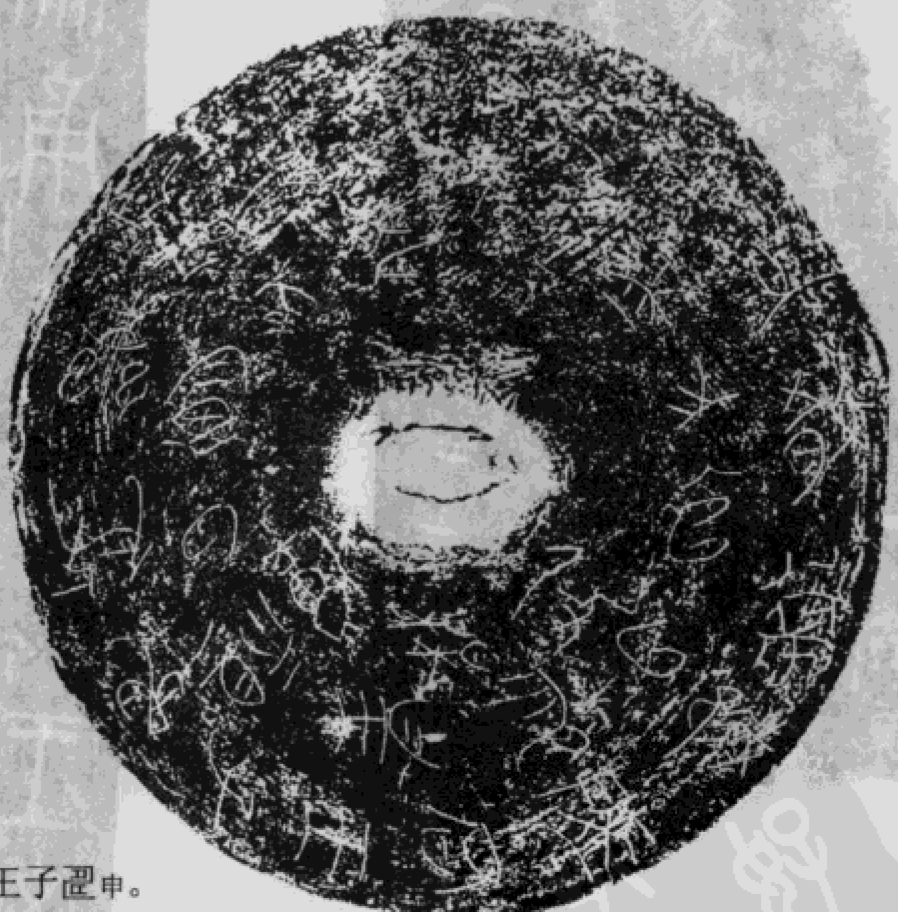
让灘。庚廥。庚芑昜(陽)。逾灘。庚邽。逾頣(夏)。内(入)郘。逾江。庚彭。弼(逆)庚松昜(陽)。内(入)瀋(瀘)江。庚爰陵。让江内(入)湘。庚䏢。庚䣝昜(陽)。内(入)灛。庚鄗。内(入)檠(資)沅澧澗。让江。庚木閘(關)。庚郢。

見其金節則毋政(徵)。毋舍桴飤。不見其金節則政(徵)。女(如)載馬牛羊。台(以)出内(入)閘(關)。則政(徵)於大廎(府)。毋政(徵)於閘(關)。

3. 春秋楚《王子申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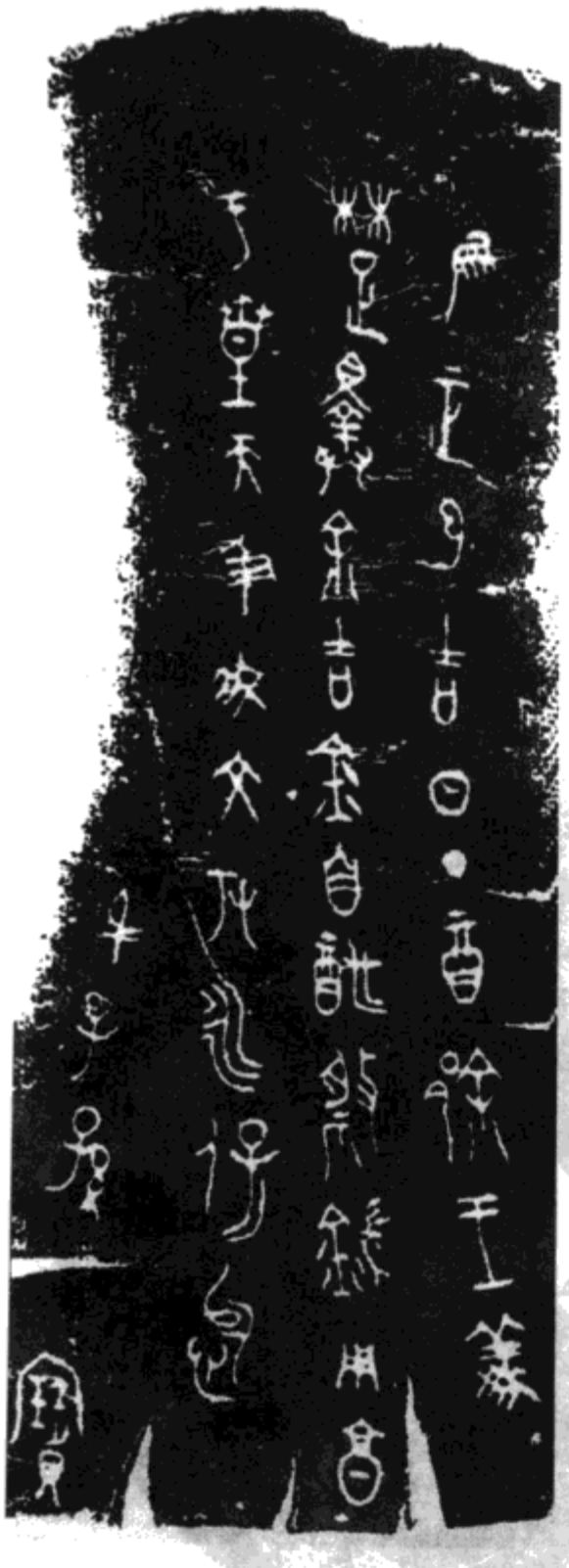
王子申乍作嘉嬭
盞盂。其𦣻眉耇壽
無碁期。永保用之。

4. 战国楚《郵陵君豆》



郵坴陵君王子䢅申。
攸絭哉。𢼸造金監鑑。
攸立歲嘗。
㠯以祀皇祖。
㠯以會父佳兄。
羕永甬用之官。
攸無疆。

5. 春秋徐《徐王义楚锴》



隹唯正月吉日丁酉。郐徐王義楚羿擇余吉金。自酢作祭鍴。用亯享于皇天。及我文攷考。永保𠂤身。子孫寶。

6. 战国早期《曾姬无恤壶》

隹唯王廿二又六年。聖趄之夫人曾姬無卹。虐安丝茲漾陲。蒿告閼簡之無嗎。甬用乍作宗彝尊尊壺。後嗣甬用之。𢦏職才在王室。

7. 东周蔡《蔡公子果戈》

蔡公子
果之用。

8. 东周番《番伯𠂤盘》

隹唯番𠂤白伯者
君自乍作寶般盤。
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亯享。

9. 东周鄀《鄀公平侯鼎》

隹唯鄀八月初吉癸未。
鄀公平厌侯自乍作隮尊鋕鼾。
用追孝于氒皇且祖晨晨
公。于與氒皇考屖𡧊公。
用腸賜𩰫眉耆壽。萬年無
彊疆。子孫永寶用亯享。

10. 东周纪《纪伯盨》

㠱紀白伯子𡨦父
乍作𠀠其延征盨。𠀠其
陰𠀠其陽。㠯以延征
㠯以行。割匄𩰫眉耆壽
無彊疆。慶其㠯以減臧。

11. 东周《番君召簠》

番君䝮召乍作𩞁
匿簠。用亯享用耆孝。
用旂祈賁眉耆壽。子子
孫孫永寶用之。

吴越系金文

1. 春秋吴《吴王夫差鉴》

吳王夫差羼擇氒
吉金。自乍作御監鑑。

2. 春秋吴《攻吴王夫差鉴》

攻吴王大夫
差羿擇氒吉金。自乍作御監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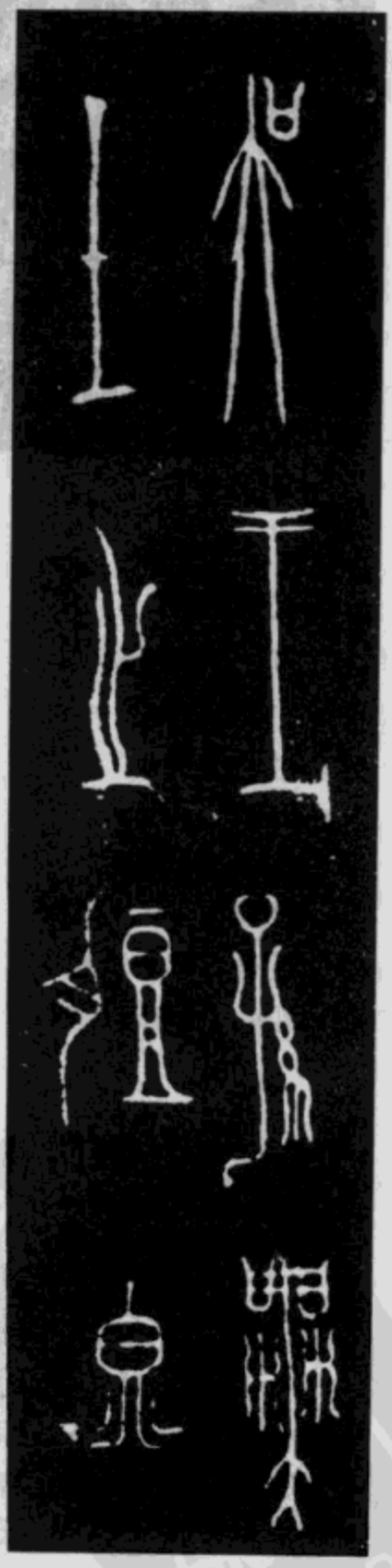
3. 东周越《越王州句剑》

戉越王州句
自乍作用僉劍。

4.《蔡侯产剑》

蔡侯產
作戟戈。

5.东周吴《无壬鼎》



吴王孫無
壬之脰鼎。

秦系金文

1. 春秋秦《秦公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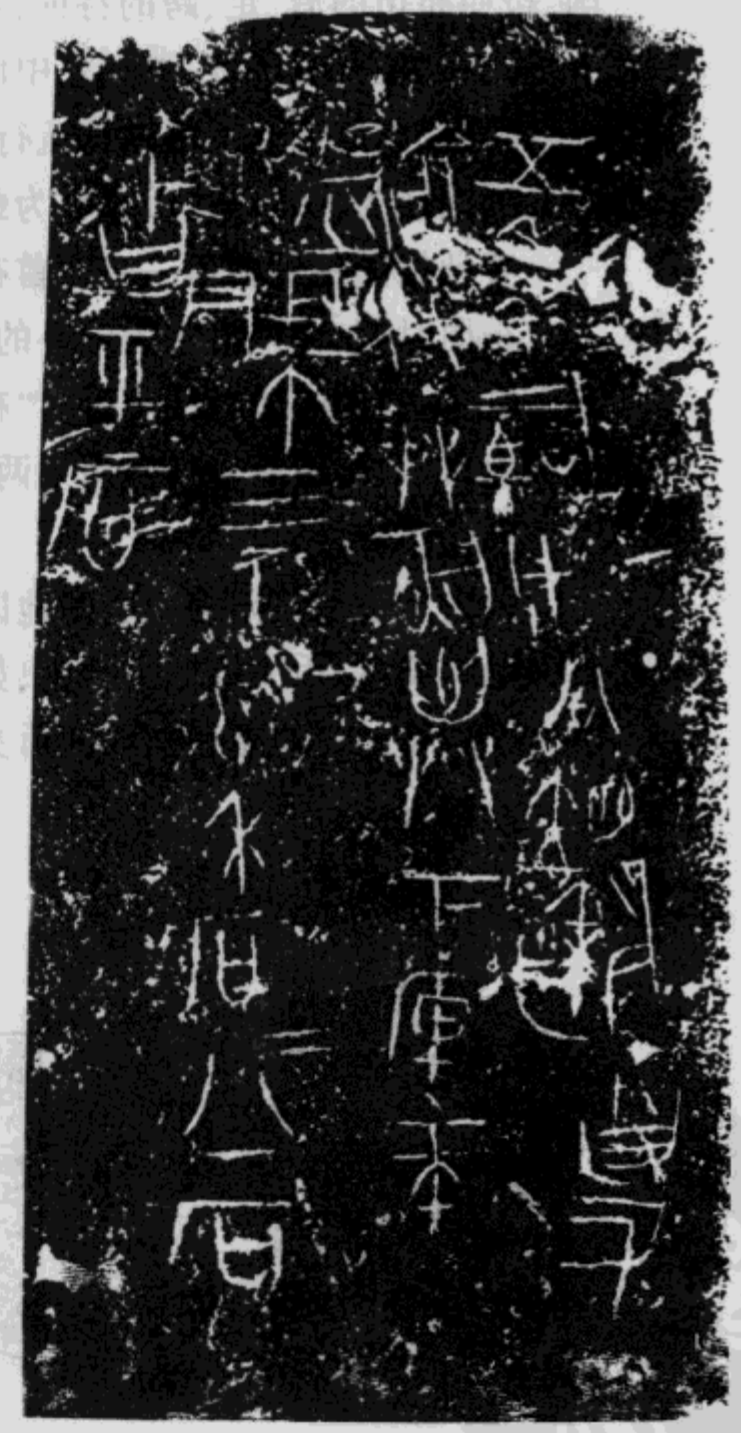
器銘：
秦公曰。不丕顯
朕皇且祖受天
命。鼏宓宅禹賚迹
十又二公。才在
帝之矿。嚴弊恭
夤寍天命。保𤔲業
氒秦。虩事使䜌蠻
夏。余雖孚小子。穆穆
帥秉明德。剌烈剌烈
趄桓趄桓。邁萬民是敕。

蓋銘：
咸畜胤俊士。盩盩文武。鋘鎮靜不
廷。虔敬朕祀。乍作𢀛宗彝。㠯以
卲昭皇且祖。𡢁其嚴𢧵各格。㠯以受屯純
魯多釐。釁眉耆壽無疆。畯畯疐才在
天。高引又有慶。竈造囿佑四方。宜。

2. 战国秦《新郪虎符》

甲兵之符。右才在王。左才在新郪。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符。乃敢行之。燔隧事。雖母毋會符。行殹也。

3.五年司马成公权



五年。司馬成公劻立歲事。命令成代。刃冶與下庫工帀師孟。口師四人。已以禾石。半石留平石。

第三节　战国货币文字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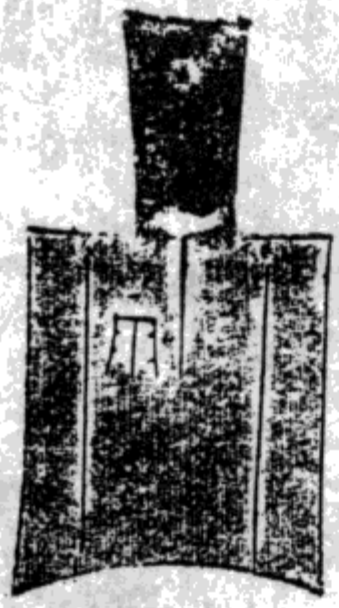
铸币在春秋时期开始应用，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各国在货币上铸文以示纪念和区别，货币文字多标记地名、吉语、封邑和币值等内容。现代出土或传世的的多为战国遗物，除了楚国发现有金质的“郢爯”(过去多释为“爰”，实误)之外，多为铜质货币。

战国货币按照形制大体可以分为布币、刀币、圜钱、贝币等四种。布币造型也呈铲形，现在一般多认为与农业上铲形除草工具有关，多流行于韩、赵、魏、燕等国。按照布币的肩、足、跨的特征，可以分为空首、方足、尖足、联体等种类。刀币呈刀削之形，主要用于齐、燕、赵、中山等国。圜钱造型类似于当时的玉璧形状，出现的较晚，战国后期几乎各国都流行圜钱。形制有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两种，其中以秦国圜钱为代表。贝币原称为蚁鼻钱，形象贝壳，只行用于楚国。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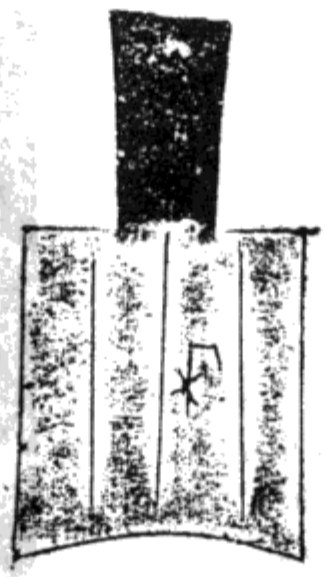
春秋战国宗周货币——空首布

东周时期，在以洛阳为中心的部分地区，作为货币流通的是空首布——一种源于农业工具“镈”的货币，因为“布”在古代与农具“镈”字通假，因此人把这种货币称为布币。布币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首空可以纳柄的空首布阶段和布首不空的平首布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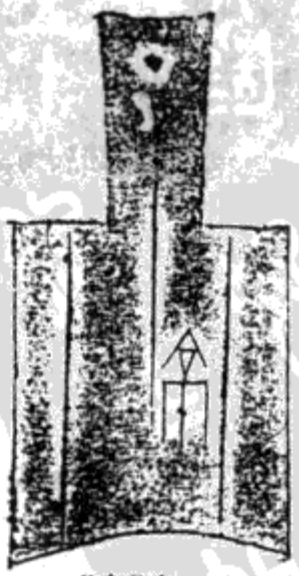
因为出土在洛阳为中心的地区，且币文笔画纤细，可以看出应该与甲骨文有某种继承关系。币文以单字为主，如商、亳等，可能表示地名；有的是天干地支，如甲、丙等；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币文，如：



“雨”字



“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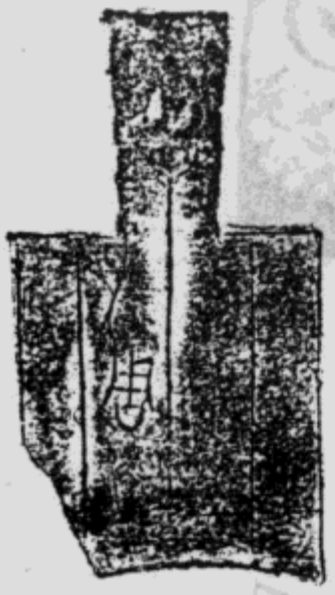
“京”字

“雨”,周王畿铸币,钱文多为记号,表示名物、干支、纪念物等。

“禾”,表示农作物。

“京”(旧隶定为“亳”,不确),京为地名表示在京地铸造或纪念京的布币。

“周”为地名,即成周,在今河南洛阳东北,表示在成周铸造的布币。另外,还有“西周”、“东周”等。



“周”字

“西周”

“东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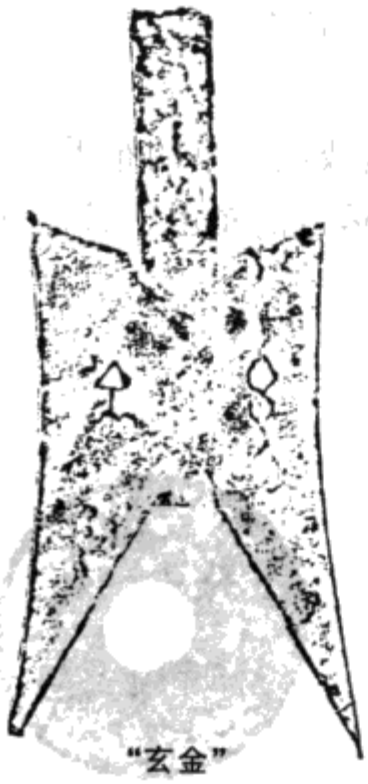
春秋战国晋国货币——钭币

经济贸易的发展,要求货币必须具有轻便耐用、易于计数等,因此在春秋晚期,出现了相对轻巧的平首布,这主要流行于三晋地区。其币文主要以地名为主,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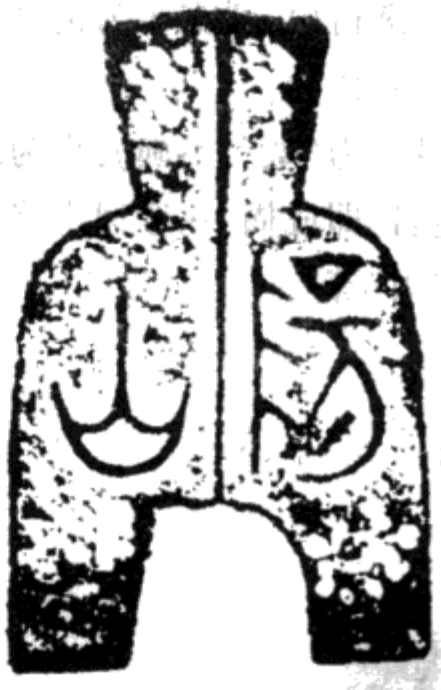
“玄金”,玄为地名,表示铸于玄地或以玄地命名的布币。

“山阳”,地名,在今河南修武,表示铸于此或以此地为名的布币。

“晋昜(阳)”,地名,在今山西太原,表示铸于此或以此地为名的布币。



“玄金”



“山阳”

“晋阳”

“甘丹”

“甘丹(邯郸)”,地名,在今河北邯郸。

春秋战国赵国货币——三孔布、无孔布、刀币

赵国是三晋故地,因此仍流行布币,但比过去的空首布轻小许多。布币多为平首、平肩、平档、方足体薄的方足布。不过后也向着圆首、圆肩、圆足等方向发展。币面上多铸有古赵国的地名,如下所示:

“大金”,即“大阴”,地名,在山西霍县。

“兹”，地名，在今山西汾阳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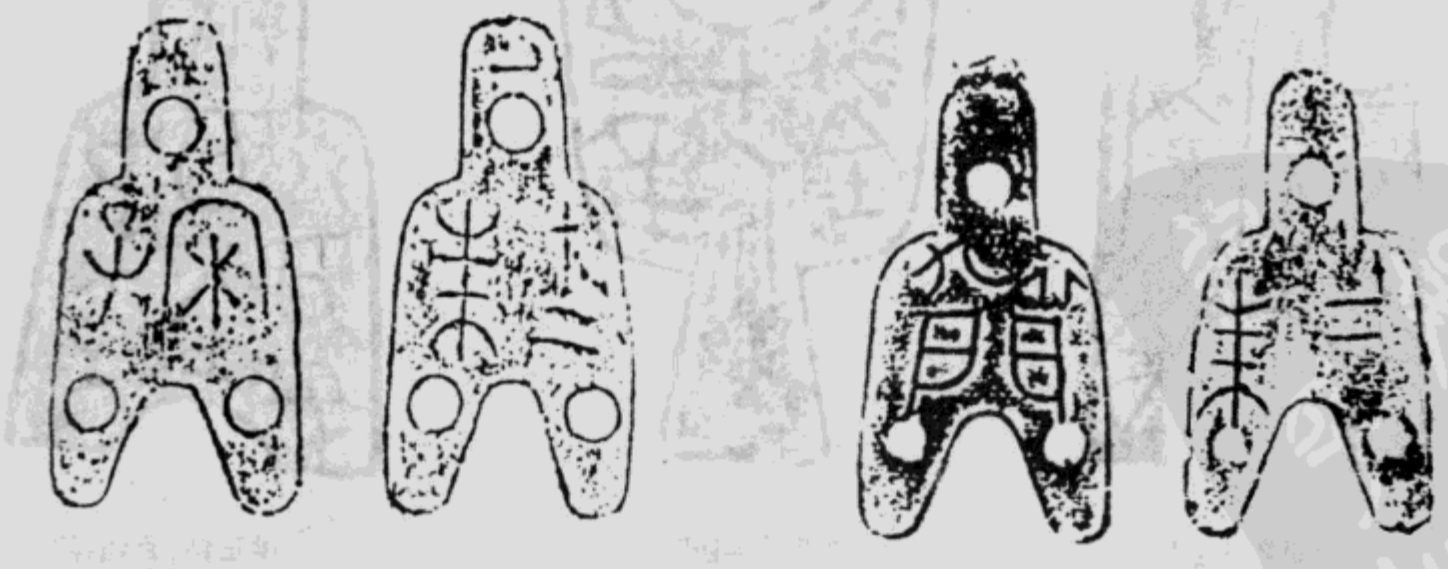
（面文）“宋子”（背文）“十二朱”，宋子为地名，在今河北赵县。此地原属于中山国，战国晚期入赵。朱，即“铢”，古代的一种衡制单位，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此处十二铢相当于“半两”钱。

“北九门”，北九门，地名，在河北藁城县西北，本属于中山国，后入赵。

赵国也铸造了自己的刀币，币身多铸造有“甘丹（邯郸）”、“卤”等地名。特征是刀身平直，因此又称为直刀。

“卤匕直刀”，表示在卤地制造的直柄刀币。

“大金”　　“兹”



“宋子”　“十二朱”　“北九门”　“十二朱”

春秋战国魏国货币——桥足布

魏国通行的货币是桥足布，即平首、圆肩、平足、弧档，宛如桥拱形的布币，此种货币分为三种：二釿、一釿、半釿等。在“口釿”前面多是表示地名的币文。如下：

“阴晋一釿”，表示在魏国阴晋铸造的币值为一釿的货币。

“卢氏半釿”，表示在卢氏铸造的币值半釿的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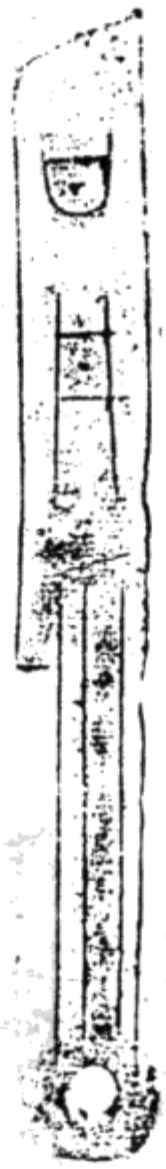
“梁正鋗，百鋗孚”，梁为地名，即魏国首都大梁。币文意思是大梁铸造的币值为一鋗的货币，一百枚相当于一孚。

“梁半鋗，二百鋗”，表示梁的铸造地币值为半鋗的货币。

“卢氏半釿”，在卢氏铸造的币值为半釿的货币。

春秋战国齐国货币——齐刀及圜钱

齐国是东方临海的诸侯大国，自古渔猎十分发达，刀在社会生活中地位重要，因此齐国的货币就是由原来作为一



“甘丹”

“卤匕直刀”

“阴晋一釿”

“卢氏半釿”

“梁正鋗，百鋗孚”

“梁半锊，二百锊”

“卢氏半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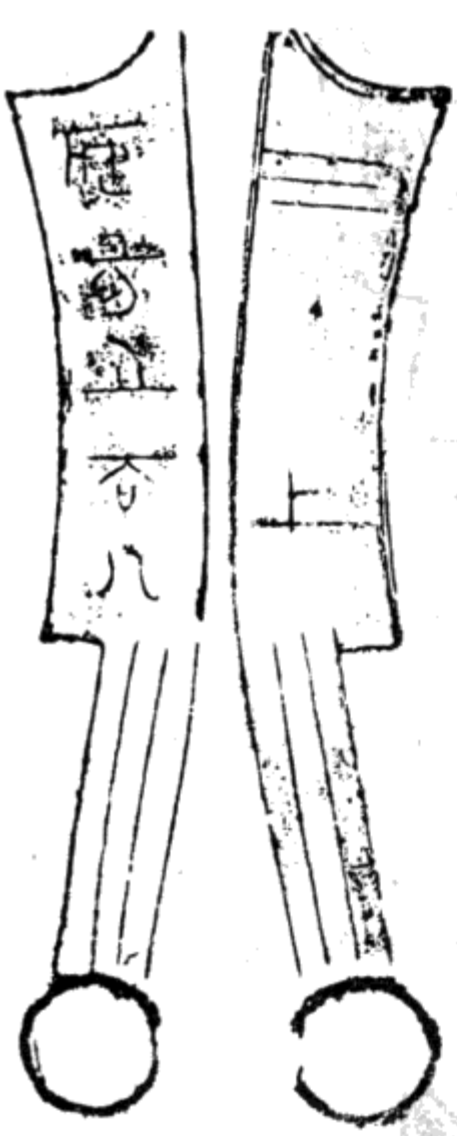
般等价物的刀转化而来。齐国的刀币厚重而精美，特别是币面上铸有“齐法化”文字的更是如此。币文多以地名或事件纪念为主，如：

“齐近邦法化”，近邦即开拓疆土之义。币文是指为纪念齐国开拓疆土的国君齐湣王而铸造的刀形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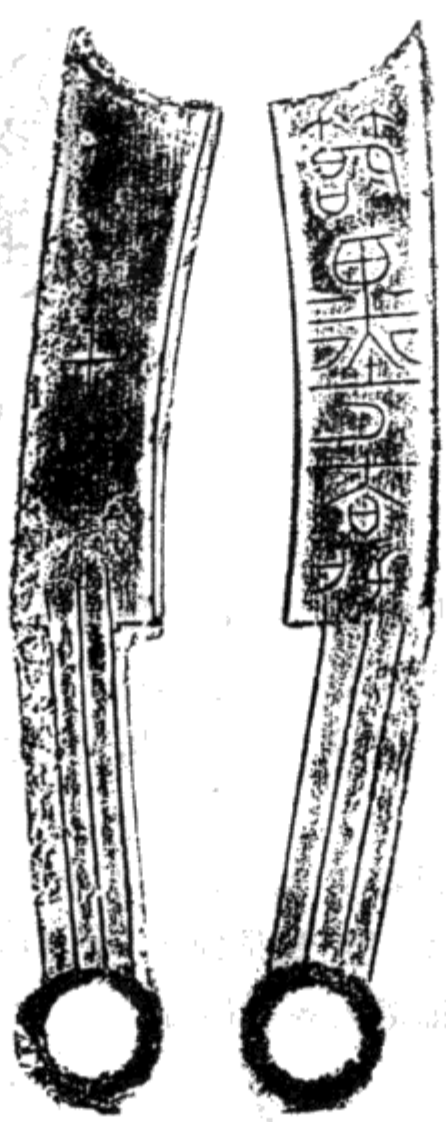
“安阳之法化”，齐国在公元前549年伐莒，取得安阳之后在此铸币以为纪念。

“節墨法化”、“節墨之法化”，“節墨”就是即墨，本刀币是为了纪念齐灵公十五年（前567年）灭亡莱国，其属地即墨人齐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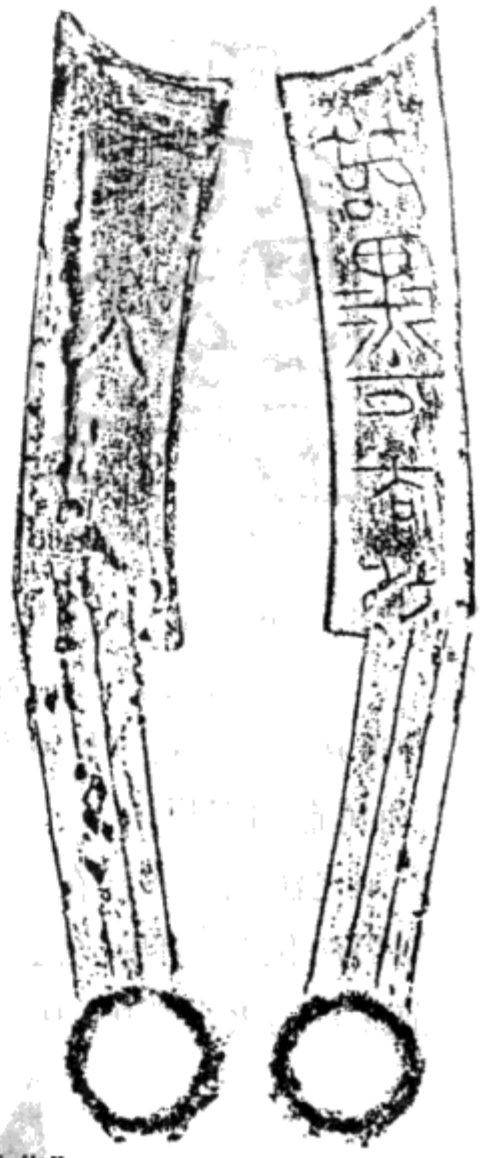
“齐近邦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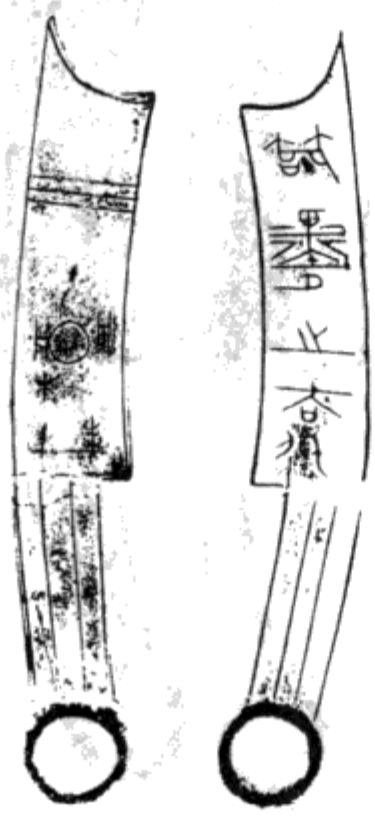
“安阳之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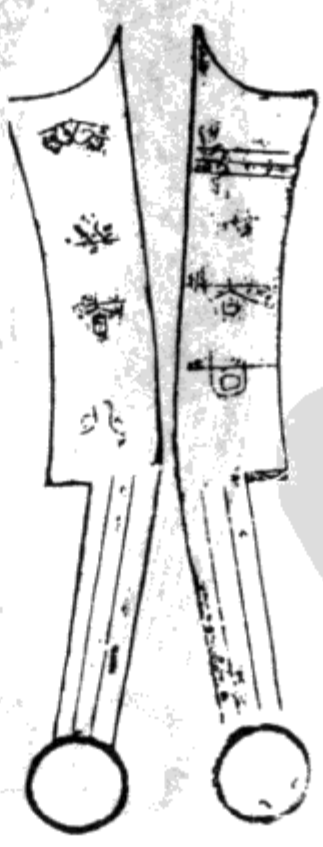
“節墨法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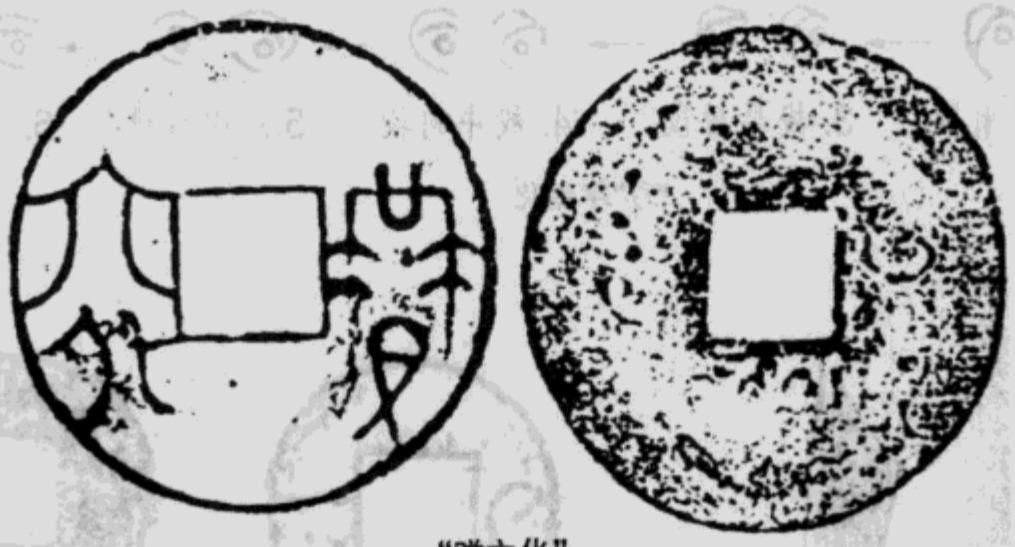


“節墨之法化”



“齐之大刀”





"赚六化"

"齐之大刀",表示姜姓齐国铸造于国都临淄的刀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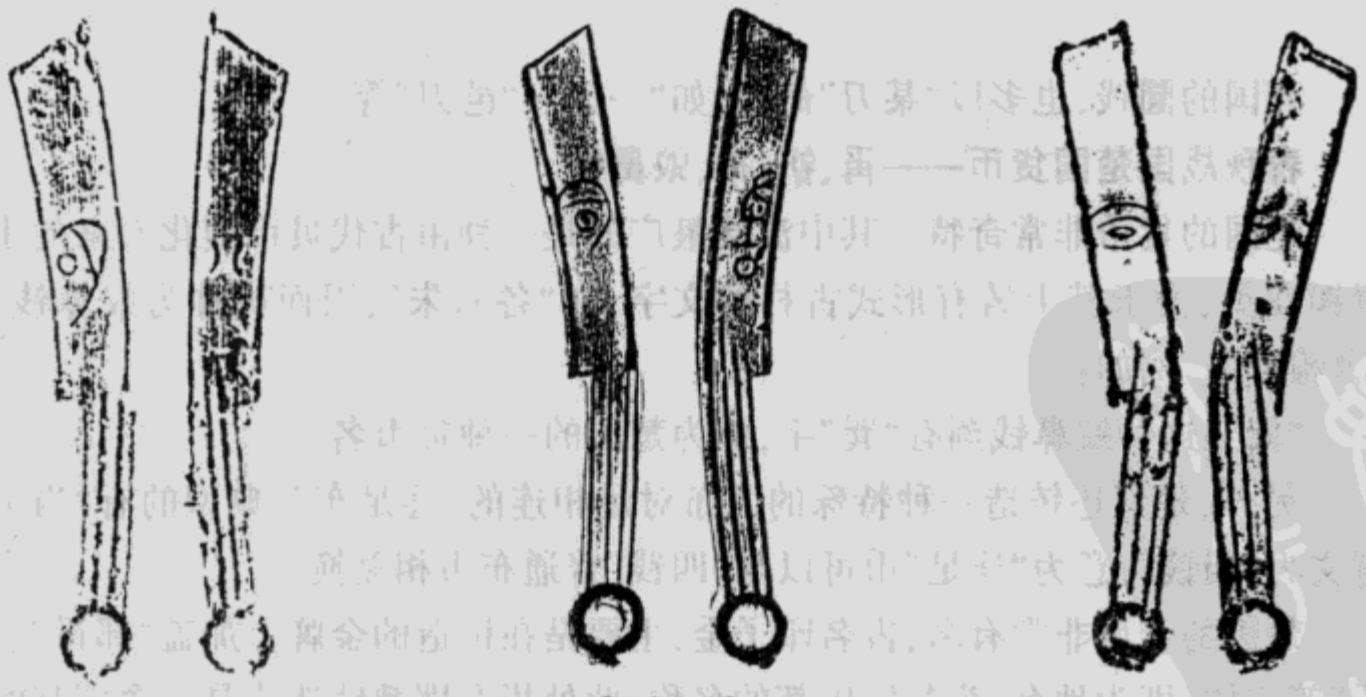
另外,齐国除了刀形币之外还有自己的圜钱,主要有三种:赚化、赚四化、赚六化等。

春秋战国燕国货币——尖首刀、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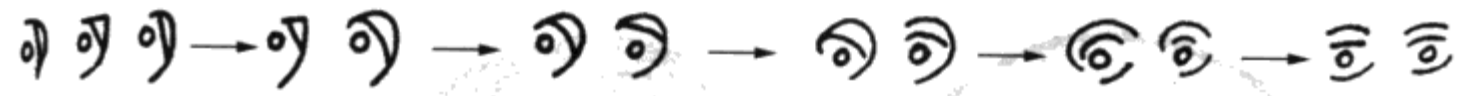
燕国与齐国类似,是临海的诸侯国,亦流行刀币。所铸刀币多有一个"邑"(有的隶定为"明",聊备一说),人称"邑字刀"。此种刀币,又名为折刀,有弧折、磬折两种。面文为"㔾"的隶定为"邑",因为与燕字为一声之转,所以应该是燕国的国名,通过以下三图可看出字㔾型的变化顺序:

"吉",此刀刀币,铸有个"吉"字,文字清晰美观,取大吉大利之义。

"鱼",此刀刀币刻有一个"鱼"字,用来记述名物,也可能是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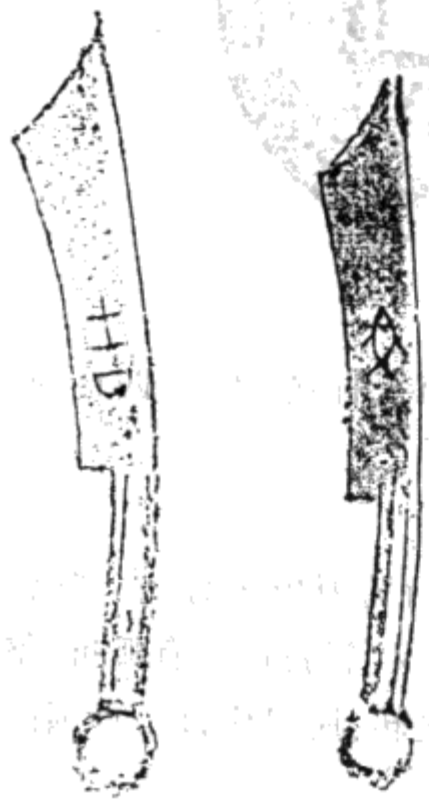


"㔾"字刀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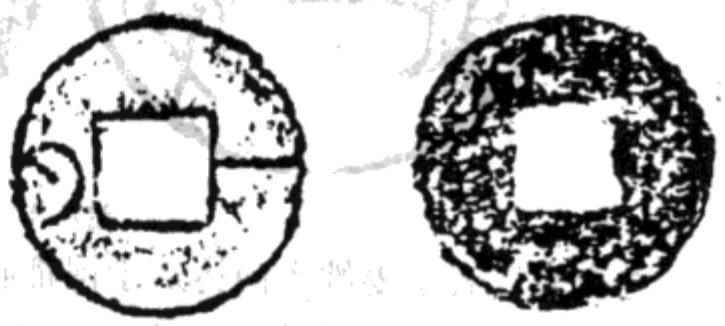


1. 春秋晚期　2. 战早前段　3. 战早后段　4. 战中前段　5.战中后段　6.战国晚期

"刁"字变化



"吉"　　"鱼"



"一刀"

"邑刀"

燕国的圜钱，也多以"某刀"命名，如"一刀"、"邑刀"等。

春秋战国楚国货币——禹、钫、布、蚁鼻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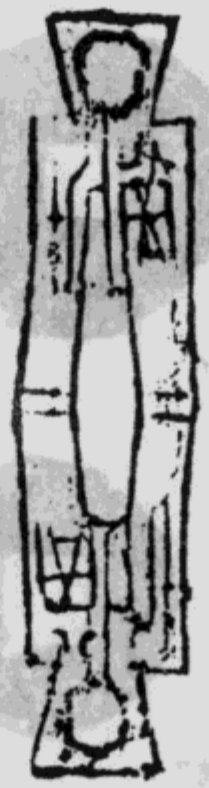
楚国的货币非常奇特。其中流通最广的是一种由古代贝币演化而来的小型青铜器贝，由于其上铸有形式古朴的文字，如"各六朱"，因而被称为蚁鼻钱，或"鬼脸钱"。例如：

"巽"，这种蚁鼻钱刻有"巽"字，似为楚国的一种货币名。

另外，楚国还铸造一种特殊的两布对足相连的"连足布"，典型的有"当忻"，背文为"四钱"，意为"连足"币可以与"四钱"普通布币相兑换。

楚国的金币非常有名，古名印子金，主要是在铸造的金牌上加盖"郢禹"、"陈禹"等字样。郢为地名，为楚国国都的名称，此处指在郢都铸造或是纪念郢都的货

巽



当忻

行

鄂禹

币。

除此之外，典型的还有：

“行”，吉语，似指楚国的货币畅通无阻之义。

春秋战国秦国货币——圜钱、两甾圆钱、半两圆钱

秦国的货币均为圜钱，共有三种：“一两”钱、“两甾”、“半两”钱。圜钱源于古代的纺轮，其中前两者是圆形圆孔，而到了秦惠王二年“初行钱”时，已经开始使用圆形方孔钱了。

圜钱“半两”，指的是币值为半两的方孔圆钱，即相当于十二铢。

“文信”，秦国文信侯吕不韦铸造的以己封号命名的铸币。

“长安”，为战国末年，秦国长安君成矫铸造的圆形方孔钱。

“两甾”，“两甾”与“半两”是币值相同的铸钱。一“甾”为六铢，两甾即十二铢。

除此之外，秦国在占领的赵国土地上铸有“蔺”、“离石”等钱；在新占领的魏国土地上铸有“平备”、“济阴”等钱。

“半两”

“一珠重一两十二”

“文信”

“长安”

“两甾”

第四节　战国玺印文字选读

玺印与兵符专门用于政治、军事上的官职标衔、职权交接，一般是用金属、玉石和竹木等材料制成，上面大多刻铸有相当讲究美术意味的书法文字，后世称之为“录文”或“印玺文”。由于一些竹木雕刻制造的符印可以改变书写办法，譬如烙印，或者先用丹砂之类颜料书写再烙刻，其文字书法多多少少比纯粹的刻铸更加严谨、圆润、秀挺一些。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方式说明了专门意义上的书写工具譬如毛笔，有了诞生的可能。②

齐国官私印

齐国的玺印一般以具有特色的官印和私人人名用印为多，见下列例子：

“司马之鉨”，司马，官名。此为官印。类似的还有“右司马鉨”、“左中军司

马”、“苹大夫之鉩”等。

另外。典型的还有“右司马皈”、“射都師鉩”、“大车之鉩”、“安阳水鉩”等。私人印主要有“陈臧”等。

“司马之鉩”

“右司马鉩”

“左中军司马”

“苹大夫之鉩”

“右司马皈”

“射都师鉩”

“大车之鉩”

“安阳水鉩”

“陈臧”

楚国官印

楚国的玺印以官印居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制情况。

“伍官之鉩”，伍官为军中官职名，这是一方官职为伍的官玺印。

“郢粟客鉩”，郢，地名，此处指的是安徽寿县。粟客为官名，是主管粮食的官职。此玺当是主管粮食的官印。

“计官之鉩”，计官，军官名。类似的还有“正官之鉩”、“司寇之鉩”、“江陵行邑大夫”等。

“陈之新都”，陈本为国名，在今河南淮阳，曾多次被楚国兼并，在公元前479年终为楚国所灭，地并入楚。楚国后来迁都于此，这枚官印当是此后所铸。

“大庾”，大即大府，《周礼·天官·大府》：“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人，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是国家的财政机关。1958年，在安徽寿县发现楚国铜牛一件，腹下有铭文“大庾之器”，“庾”字的书法风格与《铸客鼎》、《王子齐镈》及此玺印完全一致，可断定此印为楚物。

“伍官之鉩”

“郾粟客鉩”

“计官之鉩”

“正官之鉩”

“司寇之鉩”

“江陵行邑大夫”

“陈之新都”

“大庾”

燕国官印

燕国的官印特征，主要是在官职前面多有明确的地名，如下面的几个例子：

“夏屋都司徒”，以地名加一个“都”字的玺印，现在一般推断为燕国玺印。此处夏屋为地名，战国时属于燕，司徒为官名。

“平阴都司工”，平阴为地名，战国是属燕，都司工为官职名。

“洵城都右司马”，洵城，地名，战国当属燕国。都右司马，官职名。类似的还有“庚都右司马”、“甫阳都右司马”。

其私印以人名用印和吉语印为主。

如:“尚”、“中”、“登”、“长共”、“长文”、“余幻”、“韩城”、“长生起”、“北宫受”等。

三晋官印

“夏屋都司徒”

“平阴都司工”

“洵城都右司马”

“庚都右司马”

“甫阳都右司马”

“尚”

“中”

“登”

“长共”

“长文”

“余幻”

“韩城”

“长生起”

“北宫受”

三晋地区玺印多具有类似的特征,因此此处一并论述。其官印也是多以地名加官职的形式出现。如下所示:

“襄阴司寇”,襄阴,地名;司寇,官名。

“平匋宗正”,平匋,地名,战国时赵国城邑。宗正,似为掌管亲属的官吏。此为官印。

“左邑余子嗇夫”,左邑,战国时魏国地名。余子,为卿大夫之子,守卫王宫之人;嗇夫,为司空的属员。

“左邑发弩”,发弩,官名,此为军中官职印。

“春安君”,此件玉玺是颁发给封地在春安的“春安君”的官玺。是战国封君制

度的见证。

“肖軓器容一斗”,这是容量为一斗的容器上的文字。

私印以人名印和吉语印等为主,如下所示:

“长義”、“长相如”、“长亡忌”、“长生”、“长母”、“高昌”、“高安”、“高乘”等。

秦官私印

秦国由于处于宗周故地,所以较多保留了西周后期金文比较规整的特点,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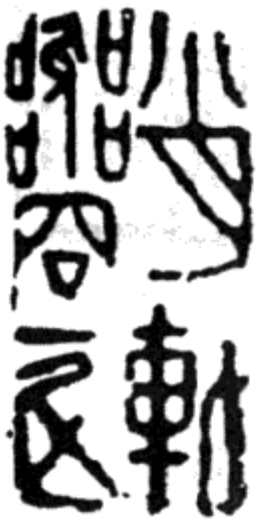
“襄阴司寇”

“平匋宗正”

“左邑余子嗇夫”

“左邑发弩”

“春安君”



“肖軓容器一斗”

“长义”

“长相如”

“长亡忌”

“长生”

“高昌”

“高安”

“高乘”

在官私印方面有很好的体现。

其中,封君类的官印主要有“昌武君印”等。政治或军事类的职官印主要有“上林郎沱”、“宜阳津印”、“王兵戎器”、“右褐府印”、“右司空印”、“中官徒府”、“曲阳左尉”等。吉语印主要有“敬”、“禄”、“志从”、“君事”、“日敬毋治”、“相思得志”、“高志”等。

另外,秦国不论职官印,还是私人印,印文最后一个字多为“印”,这也是区别

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特点。

第五节　战国兵器刻辞选读

“昌武君印”

“上林郎沱”

“宜阳津印”

“王兵戎器”

“右褐府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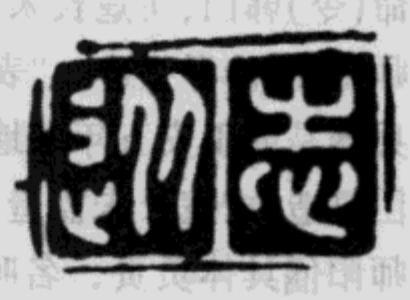
“右司空印”

“中官徒府”

“曲阳左尉”

“敬”

“禄”


“志从”

“事君”

“日敬母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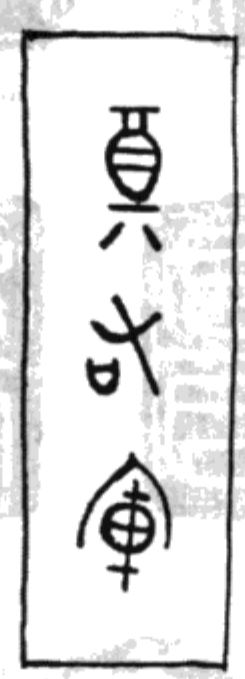
“相思得志”

“高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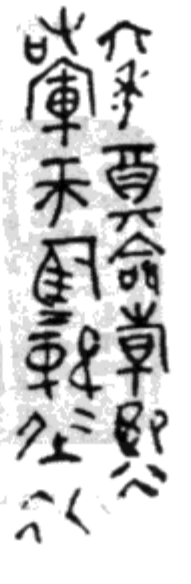
兵器刻辞主要是为了勒物工名，兼载一些有关地点、时间等，内容简单，字迹草率。从商周时代开始，在戈、矛、戟等兵器上，铸上宗族的族徽和使用者的名字。春秋时期，在制作精良的青铜兵器上书写篆书，由于字体以鸟首起笔，虫尾收笔，又称为鸟虫篆。战国时诸侯蜂争，战事频繁，兵器的制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大大超越了以前。在这些兵器上，记有各级官吏的名称以及其他内容。兵器刻辞是研究先秦时代战争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各国官吏工匠制度的重要资料。

韩国兵器刻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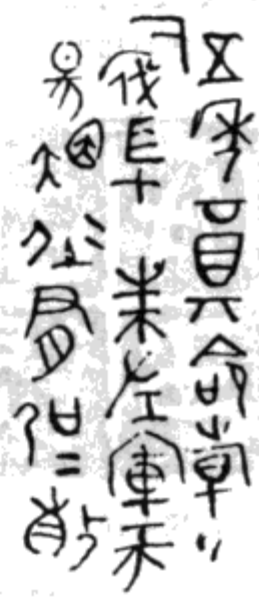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初期的兵器刻辞都很简单，仅记地名与库名，还没有“勒物工名”。如“郑右库”，此处“郑”是地名，即韩国都城郑，郑地铸造兵器的工场至少分属四库：武库、左库、右库、库等。从刻辞可以了解到，此戈为郑地右库所铸。刻辞内容后来变得复杂，一篇刻辞犹如具体详细的“说明书”，时间、负责人、主持人、制作人等一应俱全。如：“六年奠(郑)命(令)韩熙，右库工帀(师)司马，鸱冶狄。”表明这种兵器是韩桓王六年(前267年)由郑地令韩熙督造，右库的工师司马鸱监造，工匠狄制造。又如：“五年奠(郑)命(令)韩口，司寇长朱，左库工师阳倗，冶尹弭造。”表明这种兵器是韩王安五年韩地的令韩口督造，司寇长朱监造，左库工师阳倗具体负责，名叫弭的工匠(冶尹)制造。此件兵器是韩国兵器制造的代表，记载了令、司寇、某库工师与冶或冶尹的四级负责制度。相同文例的还有“四年奠(郑)命(令)韩半，司寇长朱，武库工师戛口，冶尹欹



“郑右库”



“六年郑令”



“五年郑令”

“四年郑令”

“八年新城大令”

敳”

再如:“八年亲(新)城大命(令)韩定,工师宋费,冶偖。”

新城为韩国城邑,也铸造兵器。除此之外还有脩鱼、阳人、仑氏等地,由地方上地长官(令)督造,工师监造,工匠具体操作兵器生产事宜。

赵国兵器刻辞

赵国与韩、魏均处三晋故地,因此兵器刻辞有类似的风格。时间、地点、主持人、制造人等内容一应俱全。如下所示:

(面文)“八年相邦建郳(信)君,邦右库工币(师)郱𨸏,冶𦔻口执齐。”(背文)“大攻𦔻(君)韩口。”

反映此器为赵悼襄王八年(前237年)相邦建信君督造,邦左库工师郱𨸏监造,工匠口造。赵国朝廷兵器的铸造形式一般是相邦—邦左库或右库工师—冶(尹)三级负责制,最后的“执齐”二字与韩国兵器上的“造”意义相似,也是区别二者的标志之一。

“三年相邦春平侯,邦左库工币(师)肖(趙)口,冶韩口执齐。”

春平侯,即春平君,春平君与上文提到的建信君时代较为接近,都曾担任过赵国相邦一职。

(面文)“十五年守相杢波,右库工师韩亥,冶巡执齐。”(背文)“大攻𦔻(尹)公孙桴。”

守相为官名,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说的“假相国”一职,杢波即廉颇。此件兵器由当时担任假相国的廉颇督造,右库工师韩亥监造,工匠巡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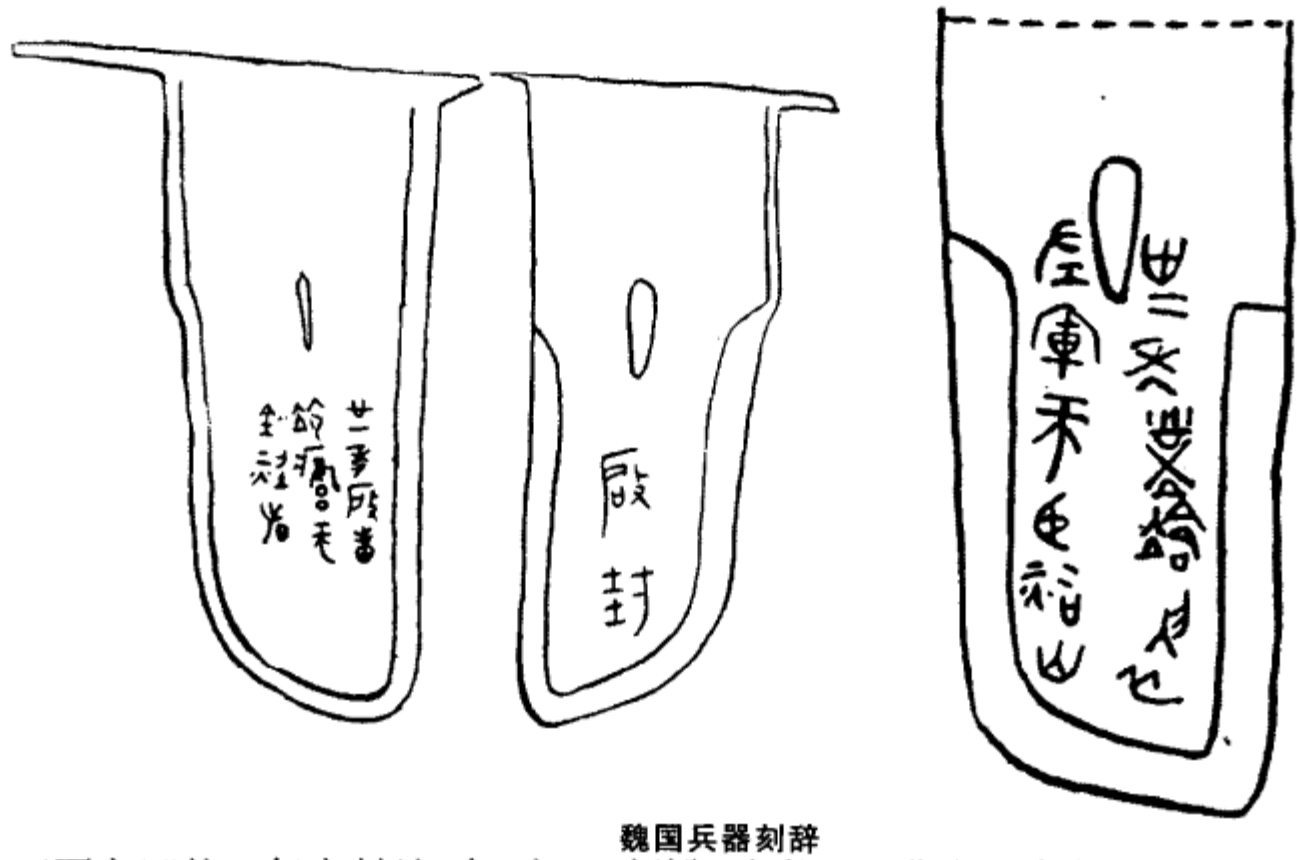
赵国兵器刻辞

“王立吏(事),南行阳徐(令)瞿卯,左库工帀(师)司马郃,冶导执齐。”

“王立事”即某王元年,南行阳为地名,即《史记·赵世家》中所说的“男行唐”,在今河北唐县以北,原为中山国属地,后入赵国。

魏国兵器刻辞

从形式上看,韩国兵器刻辞与魏国、赵国所铸相似。由“邦司寇”督造的兵器目前认定为魏国兵器的特殊形式。“邦司寇”即魏国首都大梁司寇。下面这此件兵器由中央政府督造。



魏国兵器刻辞

(面文)“廿一年启封诸(令)靡,工师钦,冶者。”(背文)“启封”

启封,即开封,魏都大梁即今天的开封市旧址。大梁与开封两地相距不远,唐初合而为一,宋代时称为开封府,将国都称之为汴梁。

“卅二年业诸(令)狄,左库工师臣,冶山。”

业诸即邺地长官,此件兵器为某王三十二年邺令狄监造。

秦国兵器刻辞

秦国兵器刻辞与三晋等地类似,不过因为有确切的时间、负责人等,一望可知其铸造地点。如:“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雕矛”

鞅,即商鞅,他在秦孝公元年入秦后,渐为秦国重臣,孝公十年担任大良造的官职。这件矛,应是其担任大良造庶长时所监造。

“八年相邦吕不韦造,诏事图,丞蕺,工竭。”

一般说来制造兵器多由朝廷监管、地方督造或是由中央授权的特殊机构，人寺工、诏事等直接领导铸造。这件兵器上的刻辞，是由当时的相邦吕不韦监管，由领导机构诏事负责人图直接领导，担任丞的官员具体负责，工匠竈制作。兵器刻辞即有这么一个特点，多数是铭刻制作此件兵器各级负责人的官职和姓名，以示区别，以明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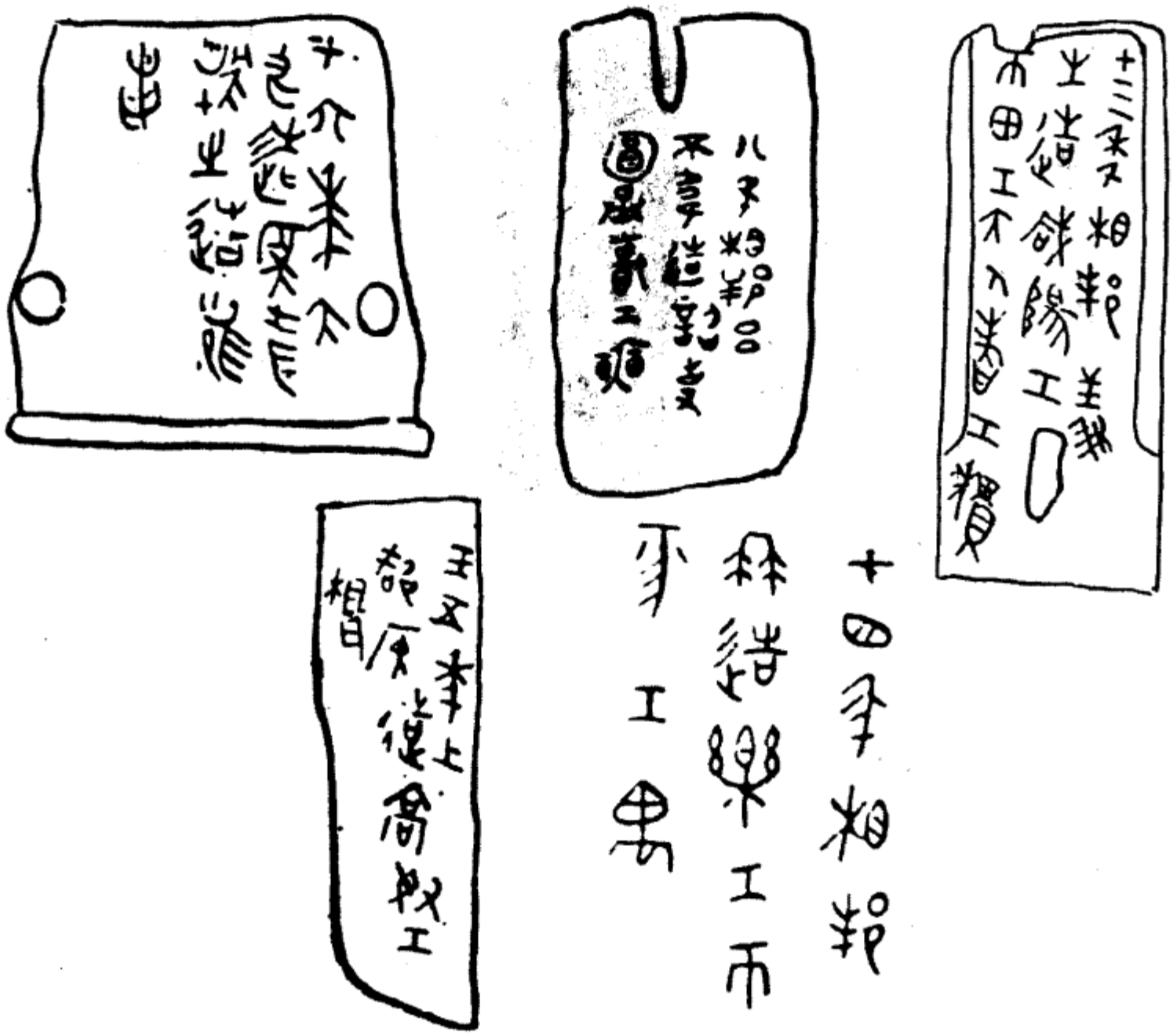
“十三年相邦义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穜。”

这件兵器是秦惠文王十三年由相邦张仪督造，咸阳的工师名叫田的直接领导，担任工大人的耆具体负责，工匠穜铸造。

“十四年相邦冉造，乐工师匆，工禺。”

秦诏王十四年相邦魏冉督造，乐地工师匆直接领导，工匠禺制造。

“王五年上郡疾造，高奴工椙。”



秦国兵器刻辞

上郡为地名,高奴是上郡管辖下的一个地区名。意思是本件兵器于秦惠文王五年,由上郡太守樗里疾监造,高奴公相是具体负责制造的一件兵器。

燕国兵器刻辞

燕国的兵器刻辞,形式上较为简单,根据所见的多为某王命令制作兵器的内容,并且,多标明是"郾王□"命人制作。举例如下:

"郾王职作王萃。"

郾即"燕","郾王职"即燕国公子职,后被立为燕昭王。此件兵器当为燕昭王时期所铸。

"郾王职作巨攸锯。"

燕昭王职督造地名为锯的兵器。

燕国兵器刻辞

"郾王喜造羌者钛。"

郾王喜即燕国的末代君主——喜,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国灭燕,虏走燕王喜。

齐国兵器刻辞

齐国的兵器,因为出土不算多,因此较难归纳其特征。大致为形式简单和有可靠的地名。

"陈余造钱",齐国人陈余铸造的一件兵器。

"平阿右戈",平阿为地名,今天徐州以北地方。

"陈侯因咨造","陈侯因咨"即陈侯午之子齐威王因齐所造的兵器。

齐国兵器刻辞

"墜子翼造戈"，墜即陈，陈子翼也是齐国人，故此戈为齐国兵器。

第六节　春秋战国金文的书法艺术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地位的不断消弱，礼崩乐坏，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社会格局。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摆脱了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约束，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殷商以来的文字形体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浓厚的地方特色。长篇巨制的铭文已不多见。文字形式开始出现对艺术化的有意识的追求。郭沫若说："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④

春秋初期的金文还保持有浓厚的西周晚年风格，各诸侯国之间的差别也不大。自春秋中期开始，列国青铜器的差异显得十分突出。铭文字体追求美术性和装饰化。文字分野渐成体式，蔚为风气。到了战国时期，在青铜器上施以错金银等技术，也扩展到了文字的书写和装饰上。使文字的绚丽华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的最大的特点是，文字结构上存在着极大的地域性。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出土春秋战国有铭铜器将近五百件，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编中，对春秋时期吴、越、徐、楚、江、黄、邓、蔡、许、郑、陈、宋、曾、邾、鲁、纪、祝，齐、晋、戴、苏、虢、虞、秦等国近八十件有铭青铜器进行了考释和分类，为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期金文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

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金文书法可以分以下几个地域：

中原及北方地区 以晋、郑、虢、中山等国为主，重要的有铭铜器包括《晋姜鼎》、《栾书缶》、《禺邗王壶》、《哀成叔鼎》和《郑臧公之孙鼎》等。北方地区以晋国为代表，出现了尖头肥腹、形似蝌蚪的文字，如晋国《智君子鉴》和《少虞剑》铭文。

《智君子鉴》

《栾书缶》

《中山王譽鼎》

春秋晚期的青铜器上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它来错嵌金文。晋国《栾书缶》有40个错金字，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文字金灿夺目、富丽高雅。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譽鼎》铭文，结体竖笔引长下垂，末端尖锐，开魏晋时代“悬针篆”的先河。

山东地区 包括齐、鲁、邾、陈、滕、薛、杞、曹诸国，比较重要的有铭青铜器有《庚壶》、《陈喜壶》、《陈公孙父旅瓶》、《杞伯簋》、《曹伯狄簋》等等。东周齐国青铜器具铭文的数量不多，比较重要的有《子禾子釜》、《因敦》、《叔夷钟》、《恒子孟姜壶》以及《齐侯壶》、《齐侯鉴》和《齐侯盂》等。齐国的文字有的用点子来进行装饰，近于图案的花体字。春秋晚期的《齐侯盂》铭文，法度谨严，字体修长，运笔流畅，粗细一致。战国早期的《陈曼簋》，起笔呈方形，收尾尖锐，转折圆畅，工整对称，比例挺拔。《陈纯釜》铭文，在竖笔上加圆点。《齐侯敦》铭文笔划细弱。东周鲁国青铜器的数量比齐国要少。有铭文的铜器基本上属于春秋时期。铭文书体风格较为多样，有的作肥体，如《鲁士商簋》；有的作瘦长体，故作波磔，如《鲁侯作姬媵鼎》。

《陈曼簋》

《邾公钫钟》

《陈纯釜》

《鲁大司徒簋》铭文，在有意求工的基础上，加强了字的装饰性。邾国《邾公钫钟》铭文，字体修长，布局严谨，笔势流畅，结构匀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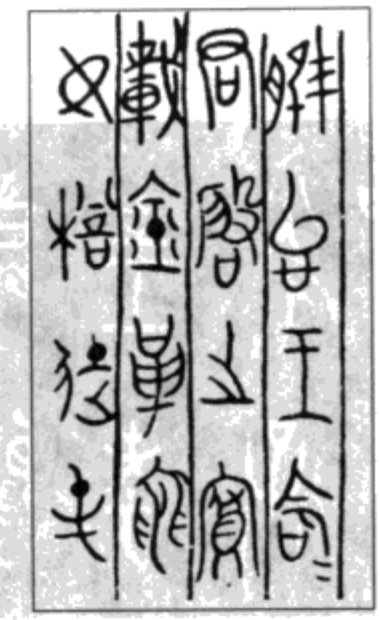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国家的文字外，该系中有些国家的文字显得相对落后。如杞国《杞伯敏亡簋》铭文，字体大小不一，排列松弛，转折处用笔较涩。薛国《薛子仲安簋》铭文，笔力纤弱，书风草率。曹国《曹公子沱戈》铭文，字体方正，笔力粗厚，不甚规范。

以楚国为中心的江汉地区　包括蔡、曾、黄、息、樊、番、许、邓等诸国。建国后楚国古文字资料大量发现，兴起研究热潮。楚国有铭青铜器大量出现，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铭铜器有《楚王申盏》、《"救秦戎"钟》、《王子婴次炉》、《楚子超鼎》、《王孙遗者钟》、《王子反戈》、《曾侯戈》、《朴君述鼎》、《中子宾缶》、黄君孟铜器群等。楚国金文的主要功用有两个，除了作文字本身用途外，还可以起装饰作用。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楚公家戈》以及《楚公逆簋》上的铭文，字体奇肆雄伟，是目前所见楚国最早的书法。楚国春秋早期的书法面貌，可以从湖北枝江和河南西关出土的铜器上得到了解。其总体特征是宽舒古朴，婉转流畅，类似大篆。从春秋中期开始，楚国书法艺术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殊风格。从河南淅川出土的《王子午鼎》和《王孙诰钟》是其代表作品。与前期相比，字形向纵长发展，行款整齐有序，字体圆劲激扬，诡异飞动。笔划虬蟠扭曲，带有明显的装饰意味，已初具鸟虫书体的端倪。春秋晚期以来，楚国文字呈

《王子午鼎》

现出修长劲锐、仰首伸脚的形象。笔画形态多姿，笔势中有明显的波磔弯曲。这种弯曲状态至春秋晚期发展尤甚。

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楚国铭文在用笔上变得持重收敛、流畅停匀，结构繁简统一，但还是保留了修长的风格。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楚王熊章钟》等铭文。到了战国中期，楚铭文字趋向方正，与竹简、帛书之体接近。如《鄂君启节》错金铭文在风格上与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大体一致。应该说，从战国开始，楚国的文字已呈脱离大篆之势，慢慢向小篆过渡。郭沫若说："南方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方重事实，字多浑厚。"胡小石也说："齐楚之分，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



《鄂君启节》

总之，同以齐、晋为代表的北方书派相比，以青铜器铭文、竹简帛书为代表的楚国文字，充分体现了南方书法华丽的艺术魅力。这种书法特征，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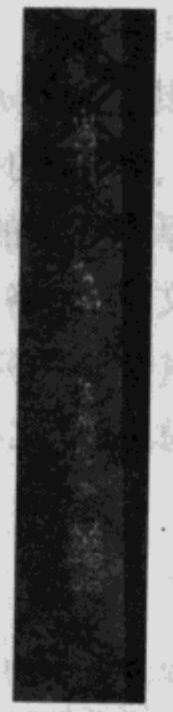
楚系地区春秋早期，曾国的铭文是文字端庄，结体对称均匀，如《曾仲斿父簋》铭。到了战国时期，曾国字体开始变化，或向修长发展，如《曾侯乙鼎》铭文；或在一字平行的两竖笔常常作外侈状，风格独特，如《曾侯乙簋》铭文。

《曾侯乙墓甬钟》

吴越青铜器铭文，字体修长，清新秀丽。线条弯曲灵动，粗细划一，圆润柔和。结体多用纵式，行笔工整。整体风格与楚器近似。早期以《吴王夫差鉴》、《越王者旨钟》为代表，字体结构修长，笔划修整，华丽典雅。随后又进一步发展为结构繁缛，笔划回环，形成独特的花体。字体大多用卷曲的蛇虫形纹饰或鸟形进行装饰。鸟书形态变化多姿，字与鸟的搭配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并无定制。"鸟书"笔画，多加曲折和拖有长尾。《吴王夫差鉴》铭文，行距、字距之间均有清晰的距离，显得疏落大方。字体有的修长，有的方正，有瘦有肥；有的规整均匀，有的草率急就；有的力感很强，有的柔弱无力。吴国《者减钟》铭文常在两笔交接处加圆点。《越王勾践剑》有"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八字"鸟虫书"，字体典雅秀丽。

《曾仲斿父簋》

《吴王夫差鉴》


《越王勾践剑》

《黄季鼎》

《樊君盆》

《秦公簋》

本系其他国家如蔡、黄、樊、番等国的铭文风格，有的与楚国相类，有的很有自己的特点。蔡国文字字体修长，笔划诘曲，十分秀美。为求美观，通常在字体上加饰笔。如纵形的字上加横笔，在竖笔中加圆点。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鸟虫书。鸟的位置不定，如《蔡侯产剑》铭文中鸟形多在字的左侧，而有的却在右侧。蔡国文字到了晚期，变得复杂。唐兰曾指出蔡侯墓三篇文字的复杂趋势。黄国铜器《黄季鼎》铭文，字体方大，笔划粗细不一，用笔圆润，起笔轻缓，收笔尖急。整个形体显得旖丽偏颇。樊国铜器《樊君盆》铭文，结体端正，起笔沈顿，收尾尖锐。番国铜器《番昶伯者君鼎》铭文，笔势悠扬流畅，结体严谨端庄，肃穆中见婀娜。起笔收笔皆作先轻后重之法。

以吴、越、徐、舒等国为主的吴越地区　吴国青铜器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开始露世。其中，特别重要的当属有120字铭文的《宜侯矢簋》。吴国青铜器，以剑、戈、矛为代表。这一地区春秋战国铜器有铭文的有《庚儿鼎》、《徐王炉》、《错金鸟书戈》、《吴王光剑》、《吴王钟》、《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剑》、《吴季子剑》、《吴王年戟》、《徐国汤鼎》、《"者旨於赐"钟》、《次口缶》以及《舒城鼓》等。

西土秦国地区　秦系文字继承了西周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总体而言，秦系文字可以分为规整和草率两类。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简化趋势增强。反映秦春秋金文的主要铜器有《秦公及王姬钟》、

《秦子戈》、《秦子矛》以及《秦公簋》、《秦公簠》等等。

秦国因其封地岐山，是周人的发祥地，故其文字继承了西周王室的传统，以大篆(籀书)为基础。可以看出，秦公诸器钟、簠、簋、壶的铭文风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虢季子白盘》。在西周金文的浑穆凝重、厚实壮美的基础上，更加飘逸秀美，法度严整形体普遍修长，行笔圆润。秦公诸器文字，风格大致一致，但其中也存在着前后因循关系。其中《秦公簋》的文字最早，《秦公钟》在簋的基础上，变得方正劲瘦，秀美可观。总之，秦系文字的发展比较稳定，变化不多。

注释：

① 本章钱币部分，主要参见下列资料：《中国古钱谱》，国家文物局《中国古钱谱》编撰组，文物出版社1989版；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郭若愚《先秦铸币文字考释和辨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黄锡全《先秦货币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② 本章玺印文字部分，主要参见《古玺汇编》，故宫博物院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罗福颐：《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西泠印社1982年版。

③ 详见朱顺龙《先秦书法风骨论之一——甲骨文金文的书法艺术》，《书学》(日本)2003年第五期。

④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辨正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第十一章　春秋战国石刻铭辞
——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四

石头是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物质。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总是会看到它为我们服务的印记。石头还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感情、记录思想的载体，原始社会的大量岩画、后来的石块雕刻以及刻文等，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社会状态。石刻因为质地的原因保存较悠久，大量不同形制的石刻遗留到今天，为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艺术史学等各个领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我国的古代石刻历史比不上西亚、北非等地的古代文明创造的悠久，在灿烂的商周文化中很少看到文字石刻的遗存，这很值得研究。但中国古代石刻因其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特别是拥有铭文的石刻，更是在世界石刻史上有着独特地位。

商周时代，仅有殷墟出土的有铭文的石簋等物品，不过从殷墟、周原等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玉雕所反映的工艺水平看，产生石刻文字应该是不会很困难的。真正出土或传世的石刻主要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这个时期比较典型的石刻文字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石鼓文和诅楚文。除此之外还有峋嵝碑、小件的守丘刻石等。[①]

第一节　石刻铭辞研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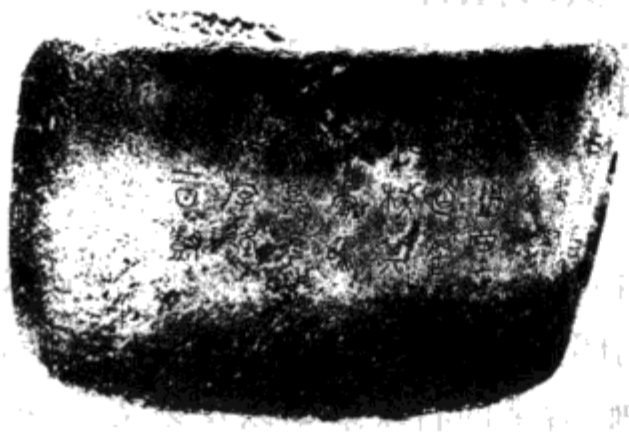
公乘得守丘刻石　又名《守丘刻石》，此石原由七汲村农民于1935年秋发现。1974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在平山县三汲村一带征集而得，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守丘刻石是一块天然的河光石，长0.90米，宽0.50米，厚0.40米。在一面之上刻有两行19字，字体为大篆，清晰美丽，刻技娴熟。此石大约刻于战国时期中山王死后至中山国灭亡之前（前310~前296年）。从石刻文字的布局、大小、清晰度和

娴熟程度来看,刻字应出自一名刻工之手。

守丘刻石作为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碑刻之一,说明了石刻文字从战国前期到秦统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不仅石料由自然天成发展到人为加工,在内容地由简单的记事发展到被统治者正式用作宣传的手段,甚至留作告谕后人的遗言。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的石刻文字,已由商周的萌芽阶段进入到蓬勃发展时期。因此,守丘刻石对研究我国石刻文字和石刻艺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守丘刻石拓片



石鼓文拓片

原文:"监罟尤(囿)臣公乘得[②],守丘、(其)臼(旧)、(将)曼敢忐(俶)贤者。"

意为:"为国王监管捕鱼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旧将曼,敬告后来的贤者。"

石鼓文 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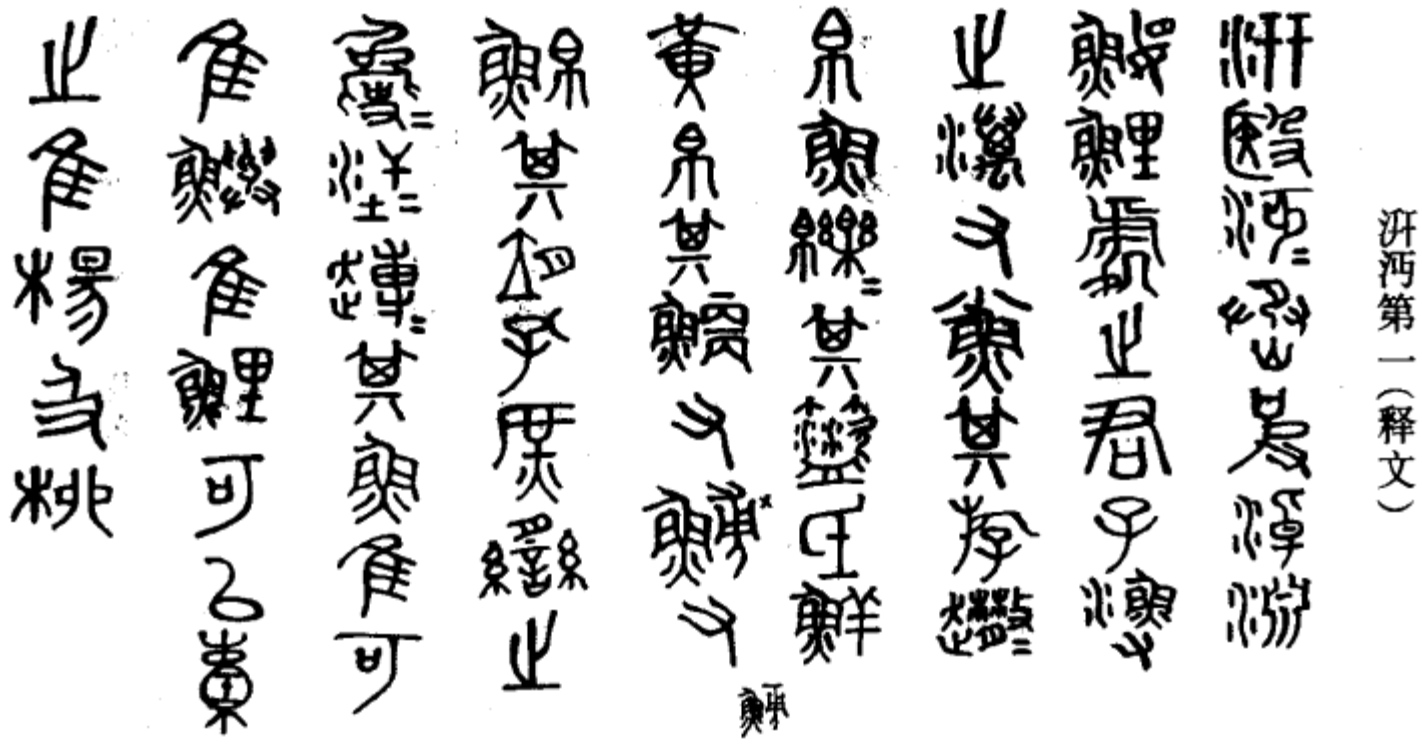
唐代初年,石鼓出土于天兴三畤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畤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又被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子辟雍,用金符字嵌起来。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现藏故宫博物院。

石鼓文是用韵且文辞优美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高价值。其文字环刻在鼓形石头上,每石上刻四字诗一首。字体为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文字,又称为"籀文"或大篆,比金文更加规范、严正,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中的过渡性书体。诗歌体裁与《诗经》相同,特别是《吾车》篇,篇首二句与《诗·小雅·车攻》首二句完全相同。石鼓的制作年代历来说法不一。近代以来,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所作。(综合马衡、郭沫若、唐兰等人的查证。)

由于历代捶拓,兼有风化,今天石鼓残损严重,仅存272字。所以了解石鼓文

原貌必须依靠原石的拓本。其中较为有名的是明人安国所藏的北宋拓本三种，分别称为“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三本互相校读，可以见到大约500多字。郭沫若所写的《石鼓文研究》即用的这三种拓本[3]。

石鼓文刻辞释读[4]



1. 汧沔第一(释文)

汧河水啊流水潺潺，
河水中有那清澈的深渊。
鲶鱼、鲤鱼在水中结队遨游，
君子们下河去捕捉。
小鱼在齐胸深的水面上，
立即四处游散。
白色的鱼儿闪烁耀眼，
水中的小鱼偷食交游其间。
黄麻编织的鱼网中，
大鱼仍在挣扎，小鱼却已气息奄奄。
要做的鱼鬻很好很好，
刳鱼时鱼儿活蹦乱跳仍想逃窜。
大家满头是汗，
但仍忙着去干。

车工第六（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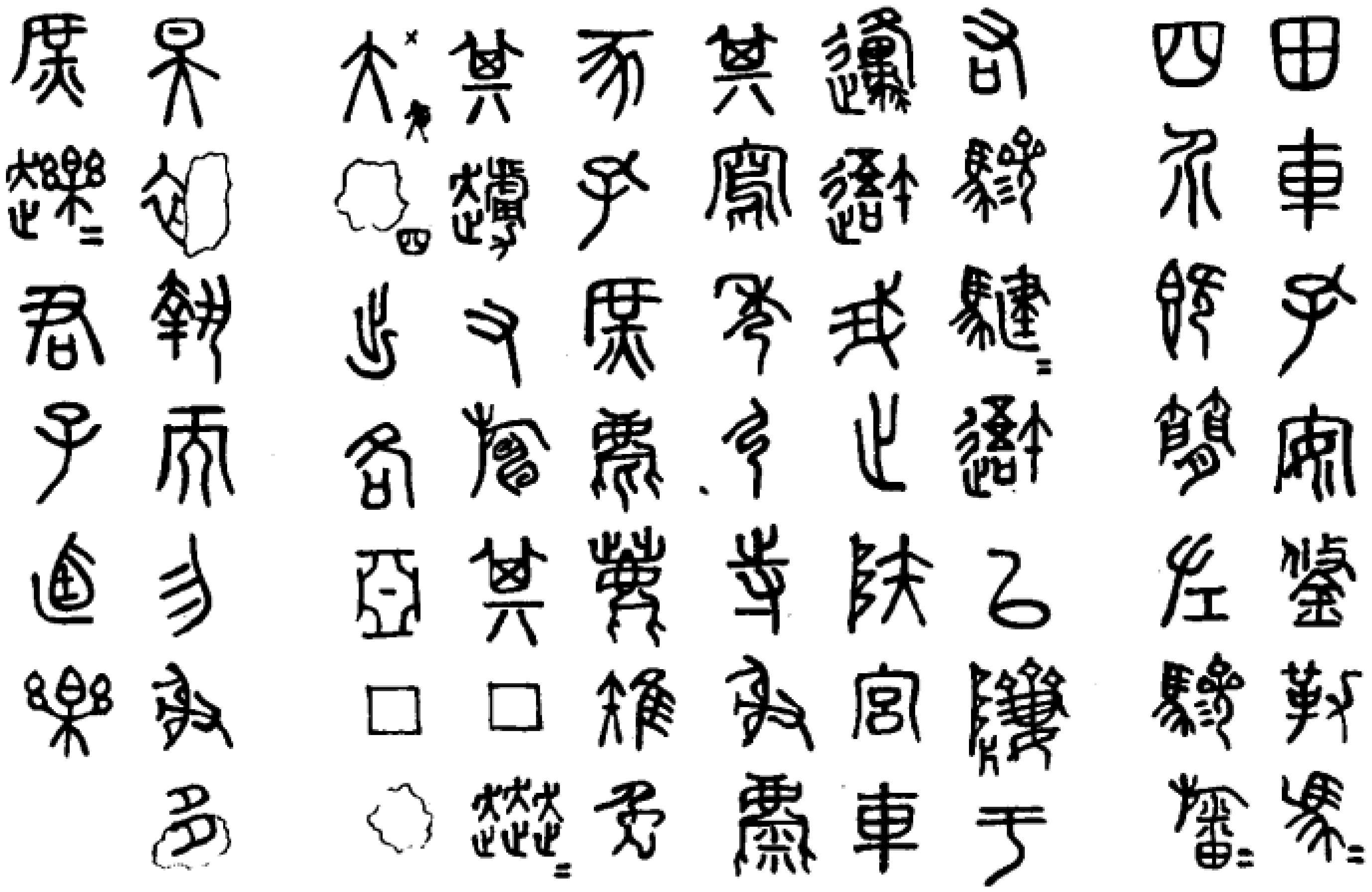
车工第六（隶足）
遬车既工遬马
既同遬车既好
遬马既骀君子
员员邋邋员斿麀鹿
速速君子之求牸牸
角弓弓麀麀寺，遬
歐其特其来趩趩
趮趮簨簨即遬即时
麀鹿速速，其来大
次遬歐其朴其
来遭遭射其貒蜀

都有些什么鱼呢？
尽是一些鲤鱼与白鲢。
河水的两岸，
仍然是杨柳依依，垂罩岸边。

2. 车工第六（释文）

我们的马车很坚固，
我们的马匹很齐整。
我们的马车质量好，
我们的马车很强盛。
君子们一起去狩猎，
君子们一起去田猎。
雌鹿、雄鹿扬蹄驰骋。
正是君子们狩猎之所求。
他们用精良的弓箭，
等待狩取这猎物。
我们围追这雄性野兽，
赶得它们奔来，
奔跑时扬起漫天飞尘，
我们立即迎上去，伺机狩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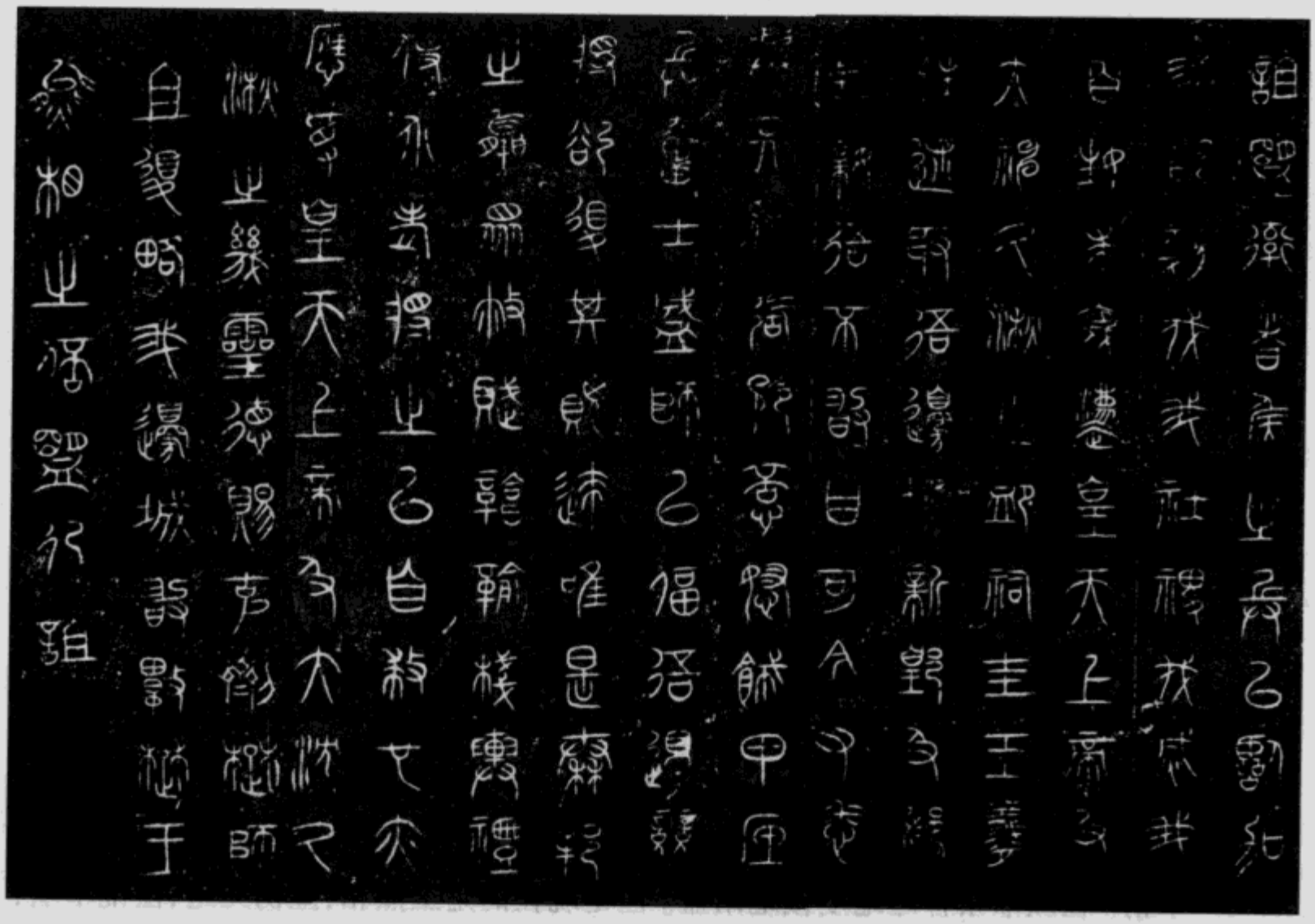
鹿群恐慌不安，
野兽乱跑狂奔。
我们围堵这雄性野兽，
被围后到处乱跑，
我们射中了那离群的三岁野兽。
3. 田车第七(释文)
狩猎的马车很安全，
戴上铜勒的马跑的更快更欢。
四马拉的车简洁又轻便，
左边的马车旌旗飘展，
右边的马车快捷轻健。



田车第七(原文)

田车第七（隶定）
田车孔安鋚勒马马
田介既简左骖旛旛
右骖騝騝遨㠯陵于
原遨戎止陕宫车
其穹秀弓培养射麋
豕孔庶麀鹿雉兔
其趩又旃其囗[illegible]
夜囗出各亚囗凵

田车第七(释文)
我们栖息在平原上，
我们的战车、兵士就驻守在平坦的山坡上，
卸下马的车驾，
手持华丽的弓箭。
麋鹿与野猪很多，
公鹿、母鹿、山鸡、野兔也很齐全。
迅速装束好马车，
士兵们迅速追赶，
不知不觉已越过了营区的栅栏……
众人意犹未尽而星河已西偏。
手执弓箭不再射出，
众人手舞足蹈笑声欢颜，
官员们回到处所奏起音乐，舞姿翩跹。



第二节　诅楚文研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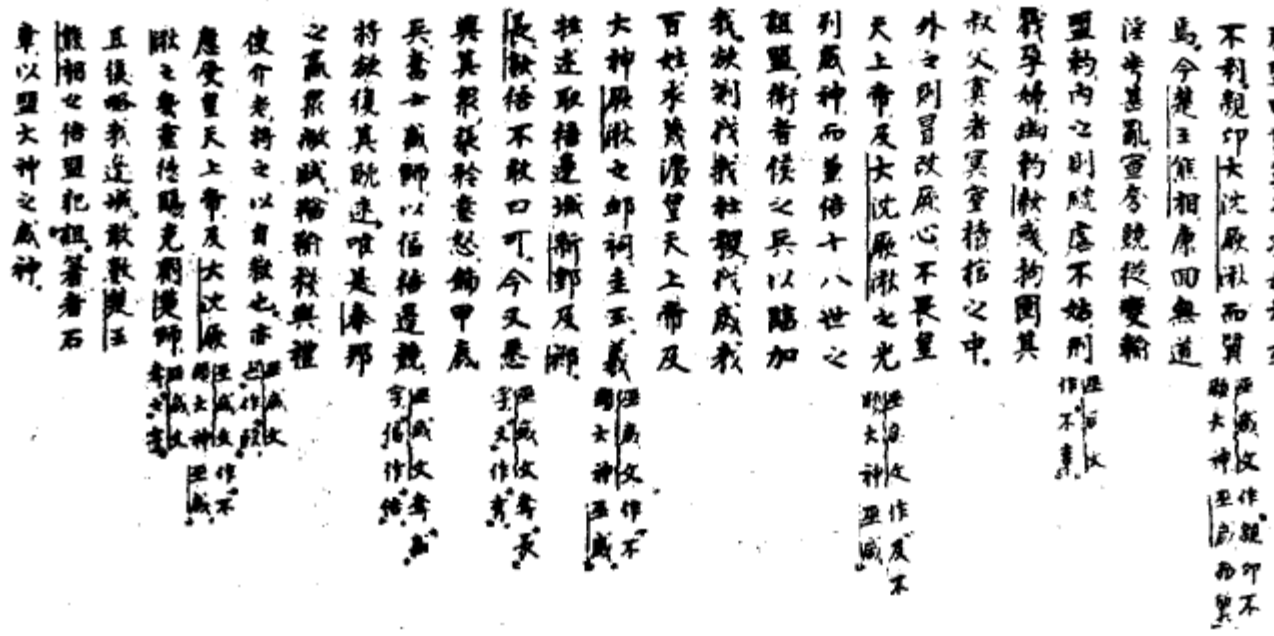
诅楚文写作、刻石的年代，稍晚于石鼓文。诅楚文刻石共有三块，相传出土于北宋嘉祐、治平年间。三石刻有秦王使宗祝在神前诅咒楚王，并祈求“克剂楚师”的文章，所以后世通称为诅楚文。三石字数、文辞大体相同，但所祈求的神有大沈厥湫、亚驼、巫咸的不同。“巫咸”文共有326字，其中34字漫灭不存；“大沈厥湫”文存318字；“亚驼文”有325字。

诅楚文三石早已亡佚，现在我们只能依靠拓本来了解它的情况。现存最早的拓本是宋元以后的翻刻本，原拓本不见踪迹。如郭沫若的《诅楚文研究》所用的拓本，即是依据元代至正年间中吴本。

诅楚文作于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后元13年，楚怀王17年）。时楚怀王统领六国攻打秦国，于是有此檄文。其字形与石鼓文接近，与当时东方六国文字，以及后来的秦国小篆也互有异同。

诅楚文刻辞研读[5]

原文：



诅楚文隶定部分参考《郭沫若全集·诅楚文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节译：

……当初我们先王秦穆公与楚国成王，戮力同心，两国像是一个国家一样，并且内部以联姻，外部结盟以巩固两国的友谊，承诺世世代代不做对对方不利的事情。在厥湫祭神之地虔诚地结盟。但是现在的楚王熊相，虚伪无道，淫乱不堪，竞相奢靡，毁弃盟约。内则残害无罪之人，暗中杀害敉的俘虏，幽禁他的叔父，把他置于冥室棺木之中；对外则是贸然改变他们的想法，不怕皇天上帝诸神的惩罚而历经十八世的诅盟。率领诸侯部队侵犯我国。想毁灭我国家，消灭我百姓。轻易废弃祭祀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湫的祭品，接着攻取我国边境城池新、郪、长亲女等地，我们奈何不了他们。现在，他们又倾国出动，手持长矛、弓箭，激励他们的将士，向我国边境(蓝田一带)进发，想再一次满足自己求取商、於之地的欲望。希望我们秦国能依靠羸弱的民众、不宽裕的财赋、低廉的战车以及全国人民进行自救，并能受到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湫的恩赐与佑护，翦灭楚国部队，夺回我们失去的边城，勇敢地列举楚王熊相背弃盟约、违反诺言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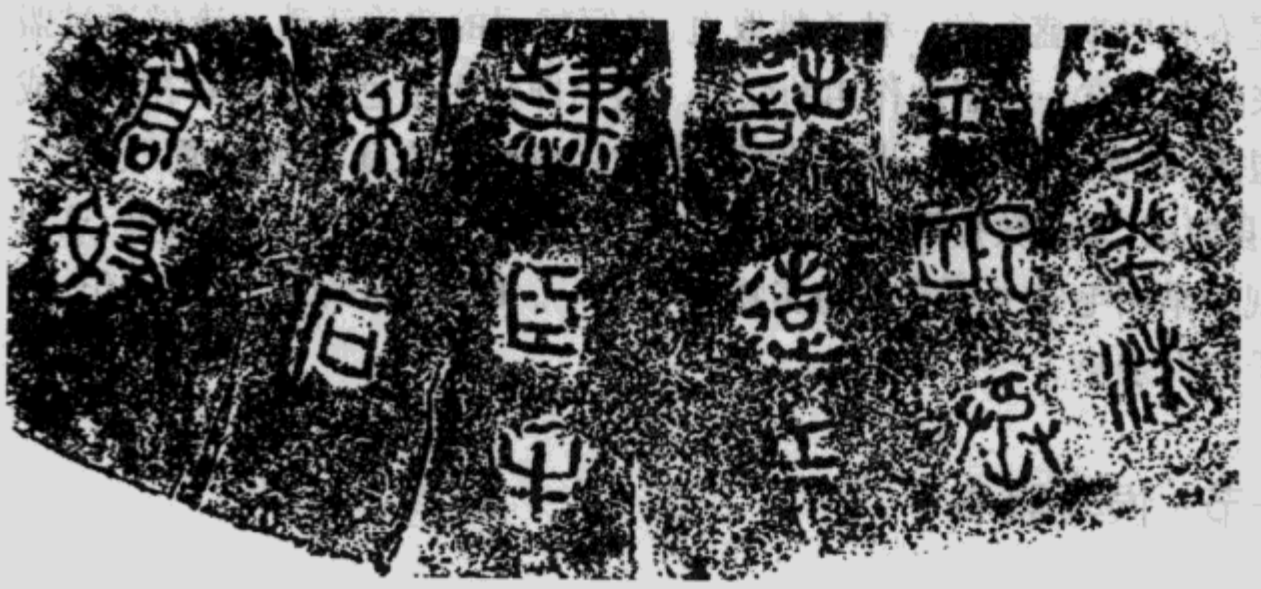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战国秦高奴禾石权研读

权是一种原始的物物交换工具，同时，又与后来交纳贡赋的赋税制度相关联。从现有出土和传世的各种权来看，我国最早的权，是战国时期流传较广的秦

权和楚权。秦权为馒头状，顶钮系球形，也间有觚棱形；楚权则多作圜形，铸有半圆形环钮，常由十个组成一套，供在天平上使用。

建国以来，湖南清理发掘的近两千座楚墓，其中101座出土有天平和砝码，谓之称钱天平。使用时要以钱权作砝码，这种砝码刻有“四铢”等标明重量的文字。战国中期的司马成公权，铭文记载了造权的有关人员和权的轻重、称量标准。1964年，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铜质高奴禾石权，是秦昭王十三年或二十三年铸发给高奴(陕西延安东)使用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曾把它调回检定。

高奴禾石权铭文释读



三年。漆工臣丞诎造。二隸臣牟。禾石。高奴。

高奴禾石权图片

注释：

① 参考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9 年版；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监罟”，是中山国所设的一种掌管捕猎的官员，但此名不见于历代职官，守丘刻石具有补史的学术价值。

③ 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卷》，《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 参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卷》，《石鼓文研究·重印弁言》，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⑤ 参考《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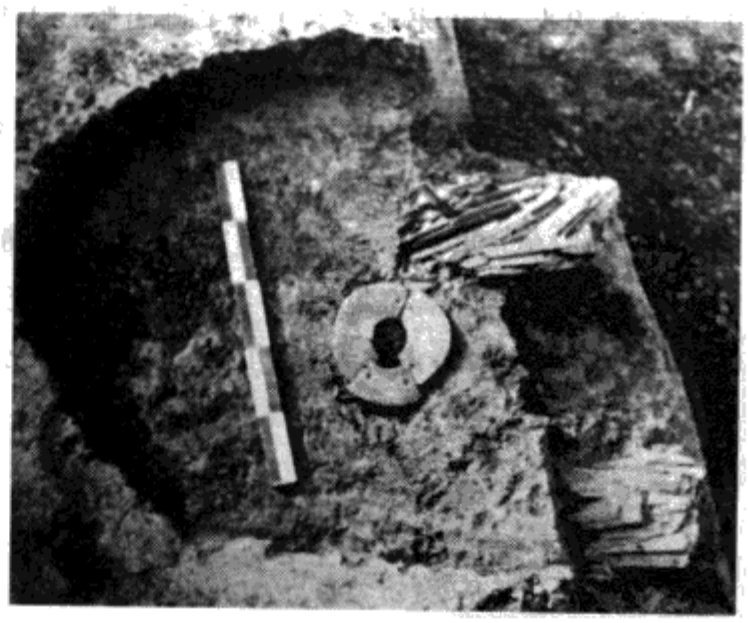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春秋盟书文字
——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五

盟誓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杀牲取血、血写誓词的政治活动。诸侯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即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片或石片上的盟约。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盟书类文字资料主要有“沁阳玉简”、“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数量最多的，当属山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侯马盟书，这也是目前发现较早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实物资料之一。时间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距今已有二千四百余年。

第一节　侯马盟书

1965年，在山西侯马市东部浍河北岸战国初期的晋国遗址，出土了一大批“盟书”。主盟者名嘉，盟辞内容为举行集会、制定公约、对天盟誓的誓文，分为“自

晋国遗址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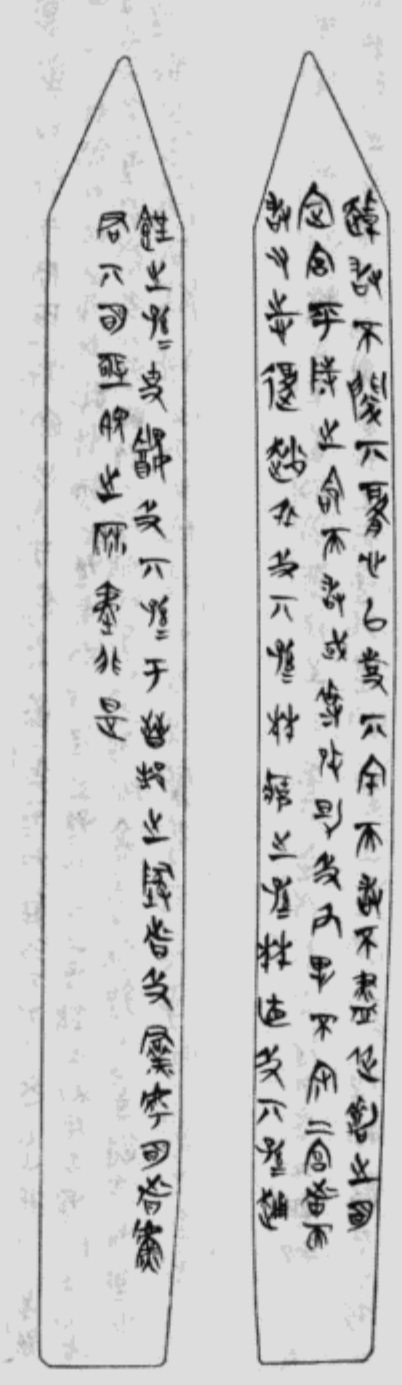
盟书出土情况

侯马盟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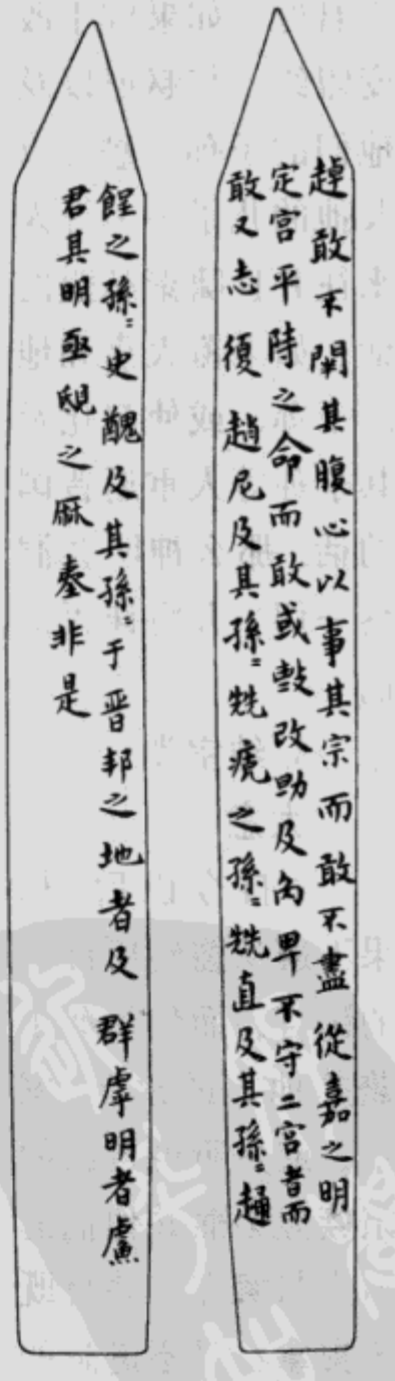
誓”、“反纳室”、“宗盟”以及“诅咒”、“卜筮”等。文字绝大部分为朱书，亦有墨书。书于石策或玉策上。策则呈圭形，也间有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总数达五千余片，朱书尚存者六百五十余片。字数不等，多者达二百二十余字。书体为古文，少数为籀文。能辨识文字的有653件，总字数多达三千余字。除去重复，单字也有近五百个。这批文物，既为研究东周文字提供了可靠资料，也是研究我国书法史的宝贵实物资料。[①]

侯马盟书墨迹选读[②]

1. 宗盟类二



摹本



隶定本

大意:

趠不敢不剖明心腹,以崇敬的心情侍奉宗庙,如果不完全听从嘉的盟约,和定宫、平畤的赐命;如果敢于改变诚信,背离盟誓,使其不守卫宗庙中的亲庙和祖庙;如果敢于蓄谋使赵尼和他的子孙,兟疣的子孙,兟直的子孙,趫餭和他的子孙,史觀和他的子孙返回晋国,并且啸聚私盟。那么我们的盟主会清楚的洞察背盟之人,并将诛灭他们的族氏。

2. 委质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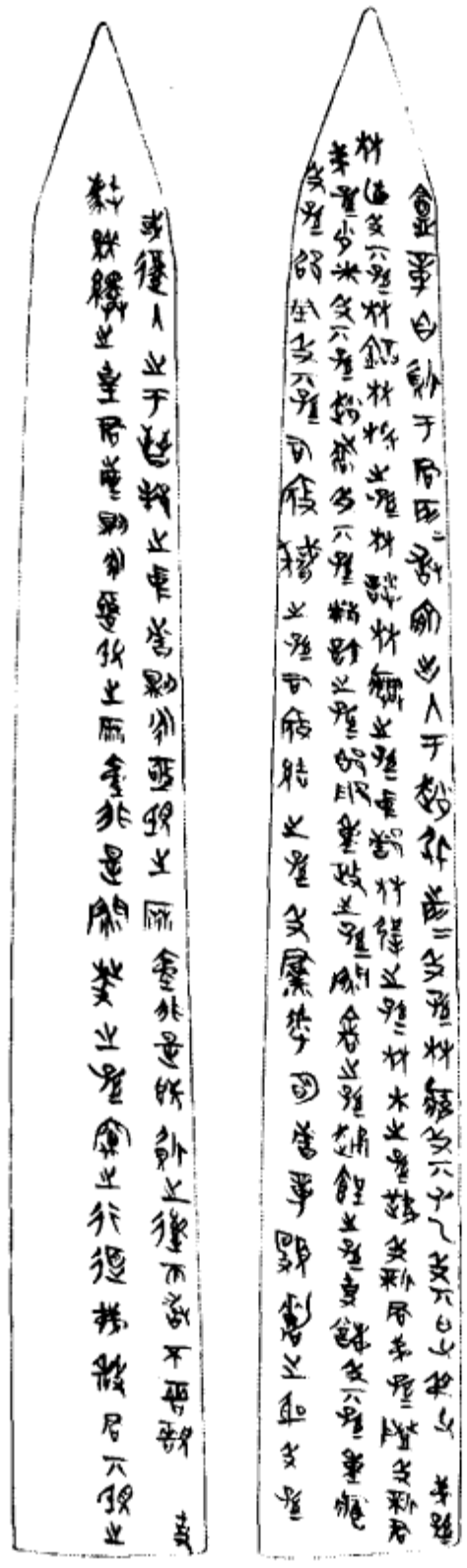
大意:

龠章将自身也抵押出去,作为质,奉献于君处。如果敢于改变盟约,与赵尼以及他们的子孙、兟疣以及他的儿子……等人来往并且啸聚私盟的话;如果覆灭嘉和他的子孙,或使赵化及其子孙等人重返晋国的话,那么神明会洞察一切,并将诛灭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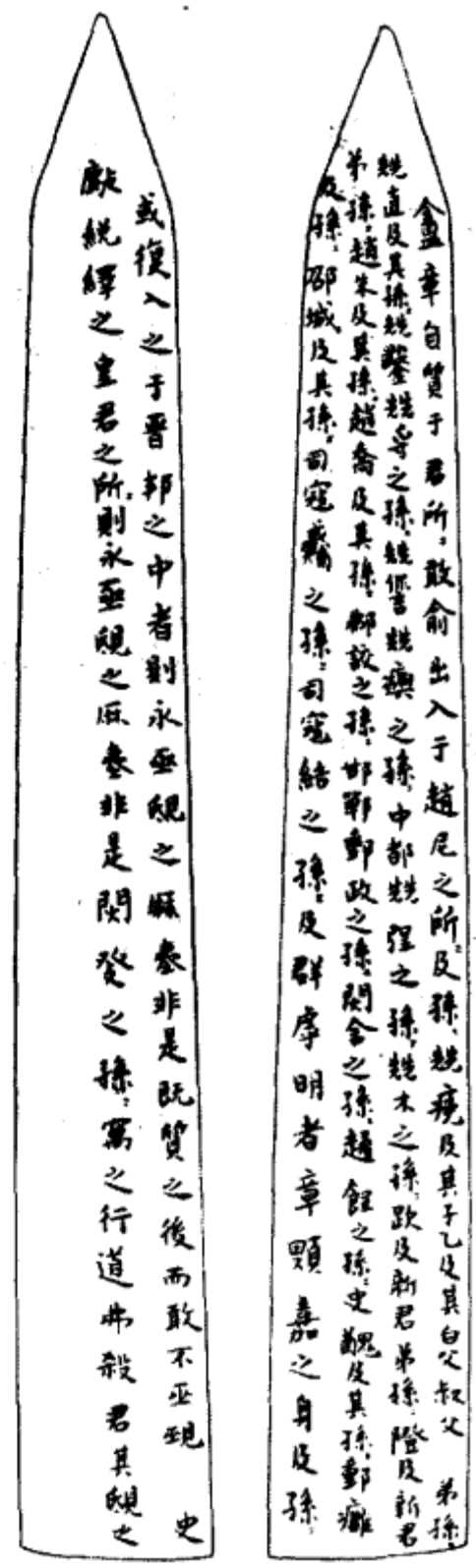
3. 纳室类

大意

𠂤自今以后,如果不遵从盟约所许下的诺言,而仍然敢于兼并他人的财产、家室,或是听说自己的宗族兄弟兼并他们的财产与家室,并且既不捉拿,又不进献的



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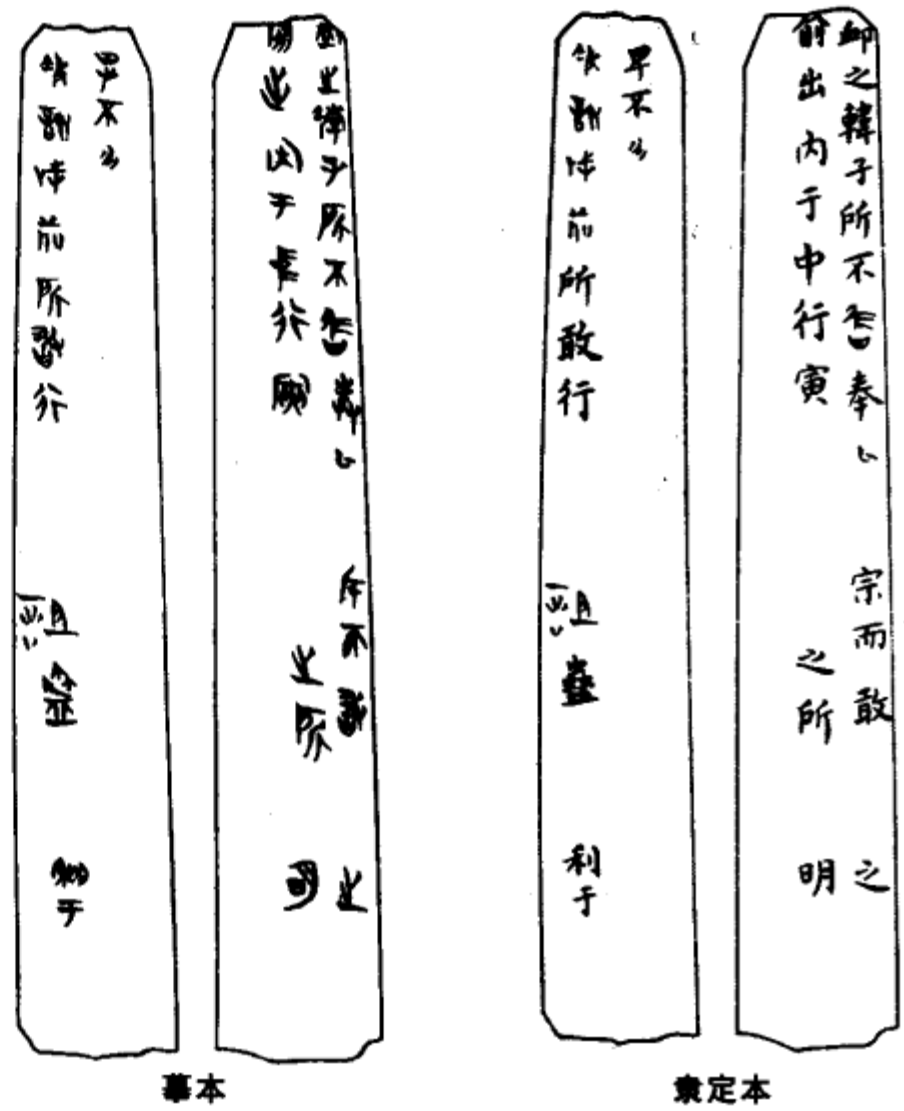
隶定本

话。伟大而显赫的晋出公以及他的宗庙，会洞察一切，并将诛灭他们的族氏。

4. 诅咒类

大意：

如果韩子不诚心奉事宗主，而敢于改变誓言与中行寅等人来往的话……其必然蒙受疾病或灾祸之苦。



摹本　　隶定本

第二节　温县盟书

1980年3月至1982年6月，在河南温县东北的晋国遗址中，考古人员发掘采集到一万多片写有盟誓类墨书文字的石片，这就是有名的温县盟书。

通过对温县盟书文字的研究，可以知道主盟人属于晋国的韩氏家族，名叫“竣”，即为韩简子。这些盟书对研

摹本　　隶定本

究古代盟誓制度、晋国历史及古文字学，都有重要价值。

侯马盟书为赵桓子嘉之盟，因此时代当在在晋哀懿公十二年（前434年），且盟誓时间或有持续；而温县盟书中有“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的字样，则推定其时间为晋哀懿公十五年（前43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温县盟书出土这地，应该就是侯马盟书所称的“赵化（浣）之所”。

温县盟书墨迹句读释读

温县盟书1.

原文：

“辛酉，自今以坐（往），𩛥敢不忞忞焉中心事其宝，而敢与贼未徒者，丕显晋公大冢，遰悉覛女，麻𡗜非是。”　（T1坎1:3780）

大意：

从辛酉日（二十七日）以后，𩛥不敢不心悦诚服地对主人竭诚效忠，忠贞不二，如果敢参与乱臣一伙，伟大的晋国先公在天之灵，仔细审视你，灭你的氏族。

温县盟书2.

原文：

“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自今台（以）坐（往），鄱朔敢不愍愍焉中心事其宝，而与贼为徒者，丕显晋公大冢，遰悉覛女，麻𡗜非是。”（T1坎1:2182）

大意：

自晋哀懿公十五年（公元前43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后，鄱朔怎敢不诚心敬意的侍奉主人！如果参与乱臣的阴谋活动，伟大的晋国先公在天之灵，会仔细审视你，让你断子绝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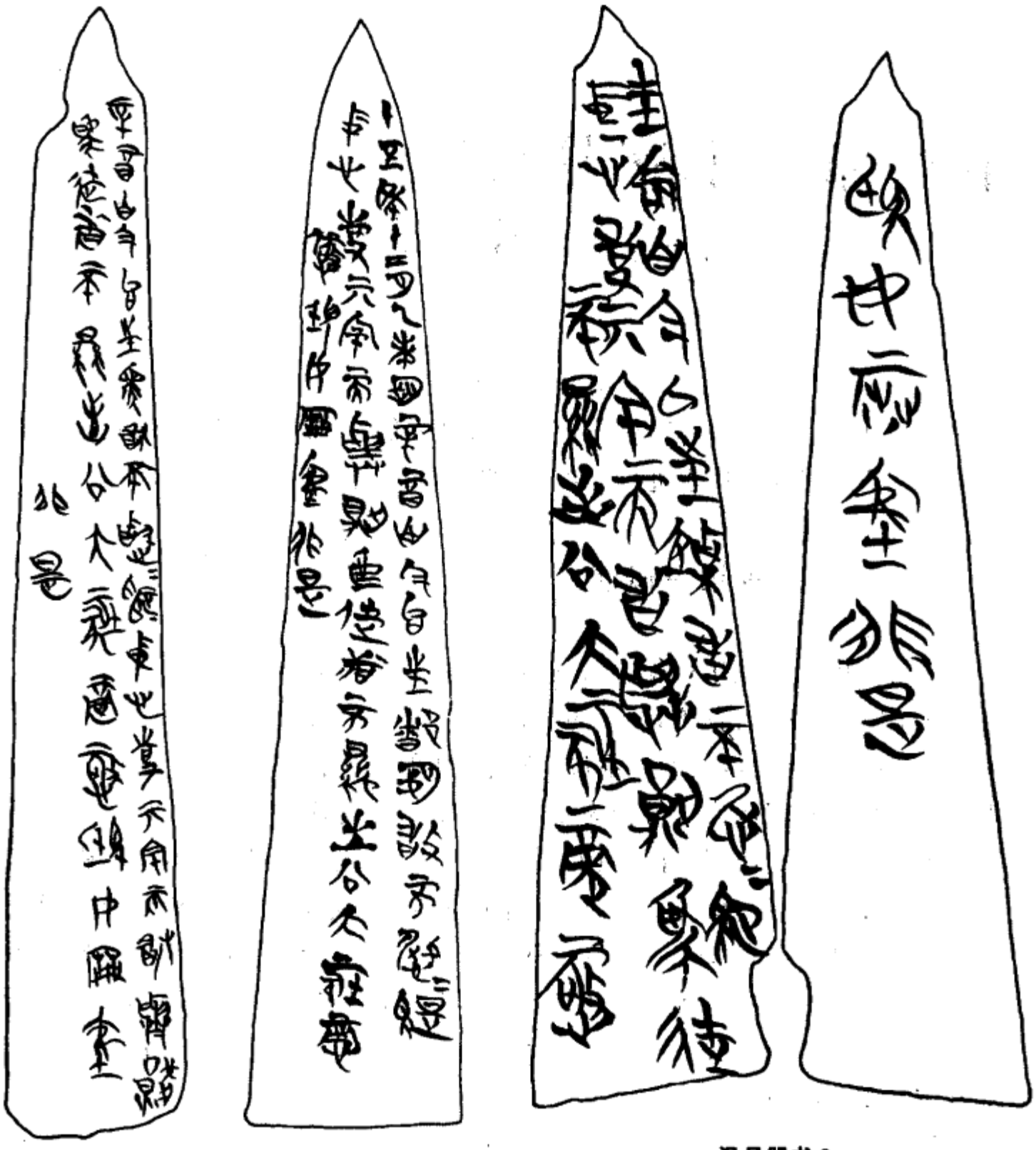
温县盟书3.

原文：

“圭命自今以坐（往），竦敢不忞忞焉中心事其宝，而敢与贼为徒者，丕显晋公大冢，遰悉（以下转背面）覛女，麻𡗜非是。”（T1坎1:1845）

大意：

圭上有命，竦自今日以后，怎敢不诚心敬意的侍奉主人！如果参与乱臣的阴谋活动，伟大的晋国先公在天之灵，会仔细审视你，让你断子绝孙。



温县盟书 1　　温县盟书 2　　温县盟书 3

注释：

① 参考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 1976 年版。

② 参考《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 1976 年；隶定参考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简帛文字
——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六

本章首先从竹简、木牍以及帛书的出土情况、形制等方面，进行简单介绍。然后，以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楚系简牍，龙岗秦简、里耶竹简等秦系简牍以及楚帛书等为代表进行分析，以期反映简帛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第一节　简牍帛书概述

简帛在中国的使用有很悠久的历史。甲骨文已有“册”字的写法，古代文献也记载了“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史料。由此可知，殷商时期，使用这种竹木制的书写材料，应该是可信的。不过，商代简册的使用仅限于宫廷册命，其书写和使用者也是政府官员或身份较为复杂的巫史。此时简册的使用，与后来民间作为传播媒介而广泛使用，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商代的简牍，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用于信息传播的书写材料。同时，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在甲骨文中，也有“丝”、“帛”和“桑”等字，文献也表明殷商时代的蚕丝业相当发达。安阳殷墟中曾有粘附于青铜器表面的丝帛残迹的发现，或织成菱形花纹，或有刺绣的图案。由于竹木丝帛易于腐烂，难以保存，致使我们目前尚未发现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帛墨迹。

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简牍的属系有二：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为楚系竹简；第二类为秦系简牍。尚未发现东方六国的竹简。体现该时期东方诸国墨书风格的，是玉、石简上的文字。王国维曾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这种说法从各种相关出土文字材料看，有相当的道理。

历代简帛出土情况

由于自然或人为(盗墓)原因，汉晋时期就经常出土战国简牍。据文献记载，西汉时，鲁恭王孔子在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大量战国竹简，内容包括《尚书》、《礼记》、

《论语》、《孝经》等几十篇儒家“经典”。“壁中书”的发现，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正如王国维所说的“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同时也有了历时数千年的经学研究的今古文之争 。此事在《汉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此后，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或认为是魏安釐王的墓），出土了竹简书籍数十车，即有名的“汲冢竹书”，这是我国古代发现大批简牍的最早记载。经过当时学者的整理，竹简内容共有16种75篇 。这两次发现所留下的古文《尚书》、《论语》、《礼记》、《孝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重要典籍，对于古代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地不爱宝，二十世纪，特别是50年代以后，更是简帛大批出土的时期。伴随着简帛材料的出土，简帛学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性显学。大批简帛的出土，直接改变了我们对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代学术文化的基本看法。

先秦简册最早的实物发现是在战国时期，1941年以后，在全国各地都出土了简牍材料：1951年湖南长沙五里牌楚墓，1953年长沙仰天湖楚墓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楚墓，1957年河南信阳台楚墓，1965、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1、2号楚墓，1973年湖北江陵腾店1号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地秦墓，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墓、湖北随州曾侯乙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湖南临澧楚墓，1981年湖北江陵九店东周墓、湖北江陵马山砖场1号墓，1983年湖南常德德山夕阳坡2号墓，1987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湖南池利石板村36号墓、湖北江陵秦家嘴楚墓，1989湖北江陵九店621、411号墓，1991~1993年湖北黄冈曹家岗5号墓、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等等。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了帛书（1945年流入美国），此外在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等地发现在玉简上书写的盟书等，无论是写在竹木玉石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青川县郝家坪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王家台出土的战国秦的简牍，展示了小篆出现之前的秦国书法。详见附表《春秋战国、秦出土简牍帛书一览表》。

第二节　简牍帛书的形制

清代学者已经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但由于缺少出土实物的佐证，他们只是根据文献记载，进行研究。最早结合实物进行形制研究的是王国维。他的《简牍

检署考》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虽然,此文写于出土材料非常零星的1912年,但王氏依靠自己学术悟性,仍然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这是我们进行此领域研究的必读文献。其次,就是陈梦家,他写于1962年的《由实物所见汉代简策制度》一文,在王氏研究基础上,根据磨咀子出土的大量汉简,进行新的探讨。

不过他们没有赶上七八十年代以来大批战国秦汉简牍出土,因此这方面还有重新总结的必要。

一、修治形状

竹简经过工具制作,多呈两端平头(有的简端也作梯形和圆形)的长条状,但是还必须经过"杀青"的一道程序才可以使用,即用火烤去水分,变湿为干。有的还在竹简表面涂上一层用于防蛀的特殊胶质液体,再交付使用。

竹简有两面:青面和黄面。《说文》称前者为"筴",后者为"笨"。字多写于黄面,此为简之正面。但简背也有时写字,多为篇题之类的文字。

木牍则是断木为板(多用松木制成,叫"槧",),刮削而成。这种木板,或称"方",或称"版",但最为普通的名字还是"牍"。如果作为书信使用的话,还要在写字木板上面,再加一块板,叫做"检"(相当于信封);上面书写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叫做"署";然用丝绳捆扎,叫做"缄"(相当于粘贴信封),然后加盖封泥,叫做"封"(相当于欧式信件的火漆)。这方面的详细材料,还是需要参看王国维的长文《简牍检署考》。

战国时代的丝织品种类很多,"帛"是它们的总名,根据生熟、疏密、精粗、颜色的不同,各有不同名称。过去子弹库帛书出土时,人们称之为"绢画"、"缯书"等,现在通用的名称还是"帛书"。古人用白色的绢帛书写,称之为"素书",黄色的则称为"黄书"。

二、长度

从历代简牍出土的情况看,简牍长度规格多样,但主要有3种:

第一种长汉尺3尺,约70厘米(以一汉尺当23.3厘米),用来写诏令法律、历谱,以示其重要。战国时期的遣策不少是用3尺竹简写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遣策竹简,长72~75厘米,是迄今发现的最长的一批简牍。

第二种长汉尺2尺4寸,约56厘米,用来写六经。在魏襄王墓发现的《易经》等"汲冢书"竹简,据荀勖、傅瓒校定后所作《穆天子传序》及《春秋左氏后序》,长古尺2尺4寸,合今55厘米。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仪礼》简,其长度有56和50.5厘米两种。湖南长沙走马楼大木简长49.8~54.3厘米,宽2.6~4.3厘米,长近

汉尺2尺4寸,用来写佃田租税券书。这种形制不论是出土实物,还是古代文献中都未见过,与已知的西北出土的各种经济类文书也不相同。它的大量发现拓宽了简牍研究者的视野。

第三种长汉尺1尺(23.3厘米)左右,比现在的32开书本稍长,也称尺牍,是历代出土简牍中最多的一种形制,可写内容很多,如遣策、名刺、文书、诏令法律、户簿、图书、历谱等,几乎无所不包。汉以后,尺牍大小稍有变化。据1979年南昌高荣墓出土的东吴竹尺,吴尺比汉尺长,1吴尺约相当于24.2厘米。长沙吴简发现之前的三批吴简(湖北鄂城水泥厂吴墓、江西南昌阳明路吴墓和安徽马鞍山吴墓共出木简46枚),加上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中写司法文书的木牍,均长24~25厘米左右,为东吴尺牍。而长沙吴简中书户籍的竹简长23.2~23.5厘米,未达吴尺1尺,合汉尺1尺,可能是沿用汉制。

另外,还有2尺(46厘米左右)、半寸等多种长度的简牍。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的《儒家者言》竹简长11.5厘米,只合汉尺半寸。王充曾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又云:"二尺四寸,圣人之语。"这与简牍实物是相符的,也反映出古人的确有"策之长短以别书之尊卑"的制度,即根据书籍的重要程度,分别书于不同长度的简策。至于《孝经》、《论语》也用短简,钱存训指出,那是"因《孝经》和《论语》直到公元9世纪才正式被列入儒家经典的缘故。

三、编联方式

竹简的编联多用丝线,其中又有白丝线、黄丝线、黑丝线、青丝等差别。而西北地区的木简也用麻绳,简文本身称为"绳"。从出土实物看,编联方式有1~5道编。凤凰山167号墓的74枚遣策,长23厘米,用1道编。走马楼吴简中的司法文书木牍及户籍竹简,分别长23.4~25厘米和23.3~23.5厘米,都是用的2道编。甘肃放马滩秦墓竹简长27.5厘米,用3道编。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墓中书《仪礼》的长木简用4道编。《仪礼》丙本竹简用5道编。其中,以2、3道编为最常见。编数多少与简的长短并无必然联系。例如信阳长台关楚简长68.5~69.5厘米,比用5道编的长56厘米的《仪礼》丙本竹简还长,却只用2道编。为了不使编绳滑动,常在简侧系纶处刻三角形契口,如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2号楚墓竹简;也有不刻的,如1989年云梦龙岗秦墓竹简。

关于编联方法,龙岗秦墓竹简是上、中、下三道打结编联,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简用麻绳上下两道交错编联。简策可以先编后写,也可以先写后编。简策书写时,还有留天头、地脚的情况,如山东银雀山1号汉墓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晏子》的竹简上下各留出1~2厘米的空白。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竹简上下除留

出1厘米的天头地脚以外,天地头两面还粘有深蓝布片,推测是在编册后,曾用布包裹粘托,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装帧的起源。

第三节　发现竹简举例

一、楚系竹简举要

1. 荆门郭店竹简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约八百余枚,共一万三千余字。这批竹简经整理编定为十六篇,其中除《老子》、《五行》二篇与马王堆帛书同名篇章大体相似,《缁衣》一篇与传世文献基本相同外,其他十二篇儒家类的书籍和一篇道家类的书籍,都是首次面世。其中,十四篇儒家经典,正是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郭店楚简

通过对郭店竹简的研究,我们发现早期儒家事实上非常崇尚情性。其主要观点为:性自命出,命由天降,情生于性,道始于情。郭店竹简的出土,还解决了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难题。对孔子《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两千年来人们一直有不同理解。郭店竹简中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身教重于言教。

早期儒家思想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原始精神。这些可贵的东西在儒家思想被政治化以后渐渐失却了。此外,竹简中《老子》的面貌也与传统

包山竹简

说法大有出入。一般认为老子以闭关自守、老死不相往来为处世的基本原则。而则竹简反映老子胸襟广博,与人为爱。此外,他还具有中庸的思想。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后世在传抄的过程中,将文字搞错了。郭店竹简的出土和研究,给中国思想文化界带来的变动将是巨大的。

2. 信阳长台关楚简

属战国时期竹简,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竹简文字是战国时期楚国古文。字体呈方形,结构紧密,用笔平缓流畅,笔划均称,平入顺出,无波磔,呈遒劲挺拔之势。

3. 曾侯乙墓竹简

1978年夏天,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州市城西北约一公里名叫擂鼓墩的地方,发掘了一座战国早期大型木椁墓——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以及竹简等文物约七千余件。出土文字资料,以二百四十多枚墨书竹简最为珍贵,总共约有六千六百多字,具有较高的考古断代、历史与艺术史研究的价值。

4. 包山竹简

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大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两件有长沙之名,一为"长沙正"名"龚怿",一为"长沙公之军"。包山2号墓的时代,为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00年。以上竹简资料证明,长沙地名的出现不晚于战国中期,可能早于公元前11世纪。

5.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抢救回了一千二百余枚流散在外的楚简。从字体看,与已出土的郭店楚简风格接近。1200枚完、残的竹简内容庞杂,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政论、音乐等。经过整理,发现涉及先秦古籍《易经》、《诗论》、《缁衣》、《鲁邦大旱》、《孔子闲居》、《乐书》、《性情论》、《颜渊》、《曾子立孝》、《赋》、《子路》、《恒先》、《四帝二王》、《曹沫之陈》、《武王践阼》、《曾子》、《彭祖》、《乐礼》等81种,其中多为佚文。

通过分析其中的31枚楚简,发现对《诗经》的许多论述,与现今文学史上的记载相悖。这使人们对《诗经》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批暂定名为《孔子诗论》的竹简,主要论述赋诗、奏乐、著文必须具有的志、情和言,提出"诗毋离志",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

“乐毋离情”,“文毋离言”。“诗毋离志”是说赋诗的人必须有自己意向,即要表现吟咏者的态度。“乐毋离情”,乐是指乐曲、奏乐,指音乐是道德情感的反映,孔子就音乐和道德情感的关系提出了颇多见解。“文毋离言”,即文章须直言。孔子关于诗、乐、文这三条准则性的提法,在文学史上还是初见。从以往的文学史来看,《大雅》、《小雅》、《国风》除了“美”、“刺”邦君外,多为厉、宣、幽三朝国君的“美”和“刺”。而从《诗论》来看,诗是公卿大夫必修课,引诗言事和赋诗明志的风气,在春秋时期已相当流行,恰当的引用诗,乃是官方场合中雅致地表现意见或见解不可缺的语言艺术,因此,不存在“美”、“刺”之说。

上海博物馆获得的这批战国竹简,将对中国先秦战国时期的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填补众多空白,并产生极大影响。

6.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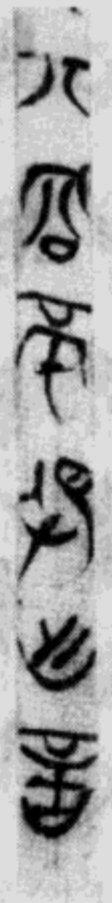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简牍259枚。其中战国楚简10枚,内有1枚书写《缁衣》文字,1枚书写《周易》文字。

7. 新蔡楚简

1994年8月,河南新蔡李桥镇葛陵村东北的一座楚墓中,出土总数达一千三百余枚的竹简。墓主是战国中期的一位楚国封君。墓葬年代为公元前340年左右的楚宣王时期。简文内容大多是祭祀祈祷的记录,与望山、九店、包山楚简中的有关文字相似,祭祷对象有楚文王、平王、惠王、简王、昭王、声王、平夜文君、子西等。另外,还有十余枚遣策。

8. 慈利楚简

1987年6月,出土于湖南慈利城关镇石板村36号战国墓,竹简登录多达4371枚,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前段。这些竹简中保存最长者36厘米,短者不足1厘米。竹简均较薄,一般厚1~2厘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藏简牍

米，宽4~7厘米。慈利简的书写特征和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以及包山楚简的风格一致。其内容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传世文献可资对勘的，如《国语·吴语》和《逸周书·大武》等；另一类是《管子》、《宁越子》等书的佚文或古佚书。《逸周书·大武》有两种写本，一种字体方正，类似楷书；一种则结构随意，略显潦草。慈利简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国语》抄本，慈利简中《吴语》的发现，证明了《国语》在楚地的流传。慈利简中《逸周书·大武》篇的发现证明《逸周书》早已流传于世，而不必晚至汲冢的发现。另外，从《逸周书》和《国语》的部分章节同出一墓中，可证两书关系密切，或许两者原是一书而后世学者将其分开。虽然残存的简文极为有限，但仍不失为珍贵的史料。

二、秦系简牍举要

睡虎地秦简

1. 睡虎地秦简

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余支。竹简抄写时间不一，估计不出战国末年至秦初这段时期。这是继银雀山竹简、马王堆帛书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这批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秦始皇二十年南郡郡守腾的文书、法律条文、治狱案例、论“为吏之道”的书籍、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大事记以及占卜书籍等。关于法律的简文，有秦律三种，是我国发现最古的法律条文，其中有统一度量衡的条文、《游士律》等，还有保护妇女、严惩教唆犯的规定。

这些条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情况的某些侧面。在治狱案例中，有许多关于审讯、调查以及法医检查等具体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法律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竹简中的大事记，对于判断秦墓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2. 王家台秦简

1993年3月，荆州博物馆在楚都纪南城东南五公里处，发掘了秦汉墓葬16座，其中的15号秦墓出土一批竹简。尽管竹简因编绳腐朽而散乱，但仍可以看出这些竹简分三层叠放。根据其叠放位置，将这批竹简分为八组，并按从上到下的顺序编号，共计编号813。各组的编号及主要内容如下：

A组，编号1至180，以《日书》中的《日忌》为主，间杂有《五行

王家台秦简

忌》、《生子》和《归藏》;B组,编号181至304,内容以《归藏》、《效律》为主,间杂有《日书》之《疾》《启门》、《六畜忌》、《置室》和《祭祀忌》等;C组,编号305至342,其内容为《归藏》;D组,编号343至401,内容为《日书》之《病》、《疾》、《启门》、《启闭》、《六畜忌》,间杂有少量《归藏》;E组,编号402至538,内容为《归藏》和《效律》;F组,编号539至602,内容以《归藏》、《政事之常》为主,间杂有《日忌》;G组,编号621至729,内容为《日书》之《死》、《建除》、《稷辰》;H组,编号730至813,内容均为《灾异占》。

王家台秦简使用的文字分为三种。《归藏》形体最古,接近楚简文字,应是战国末年的抄本;《日书》、《效律》、《政事之常》为秦隶,与睡虎地秦简文字风格一致;而《灾异占》则用比较规范的小篆体,可能是秦始皇"书同文字"后通行的篆书。王家台秦简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归藏》、《效律》、《政事之常》、《日书》和《灾异占》。

《归藏》编号者264支,未编号者230支,共计四千余字。王家台秦简《效律》共96枚残简,其中编号者72支,未编号者24支。《政事之常》共65简,其中两支空简未编号。其形式是用直线、斜线画成图表,然后书写文字。王家台秦简中《日书》数量最多,但大部分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同。

3. 龙岗秦简

1989年10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等在云梦城郊龙岗,发掘了九座古墓,其中六号墓出土了一批简牍,这批简牍后来被称为"龙岗秦简"。

4. 青川木牍

1979~1980年间,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50号战国秦墓,出土了秦木牍一枚。此木牍长46厘米、宽2.5厘米、厚0.4厘米。两面修治平滑,都有墨书文字。正面是秦武王二年(前309年)命丞相甘茂、内史匽更修《为田律》的文字,共三行121字。背面文字四行33字,内容是与律文有关的纪事。更修《为田律》出土于四川青川,表明这是秦政府针对蜀地新移民的情况而更修的,其目的在于维护新移民的土地私有权。

青川木牍早于云梦睡虎地秦简80年,属战国中期作品。一部分字形,出现了隶书的笔势、笔顺、笔画连结方式。与篆书相比,它减少盘屈,化繁为简,圆者使方,变字形的狭长形为正方形或扁形,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由篆向隶演变的过渡

性字体的书法作品。

天水放马滩秦简成册于战国晚期至秦始皇八年(前239年)。它的“甲种本”成书似早于“乙种本”,此册书写率意,于漫不经心中时见草法笔意。往往以轻挑短笔、延展字尾之法,曲尽笔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快速书写横画时自然形成的起笔粗重、收笔轻提,当是汉隶的典型笔画“蚕头燕尾”的雏形。上述这些实物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秦统一之前就存在着大篆向隶书演变的过渡性字体。这些两年多年前的无名书工,以当时民间流行的实用的新型字体,为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隶书的产生时期的断代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

第四节　战国竹简文字选读

楚系简牍之一——湖北荆门郭店竹简[8]

《老子》

1. 甲本(从第六简“以道”到第八简开头)

原文: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事好<还>。

释文:用道来辅佐君主的人,不想靠兵力逞强于天下。好的辅佐君主的人只求达到目的而已,但不是通过强力来取得。成功而不夸耀,成功而不骄横,成功而不自负,这就是所说的成功而不逞强。如此做事便有好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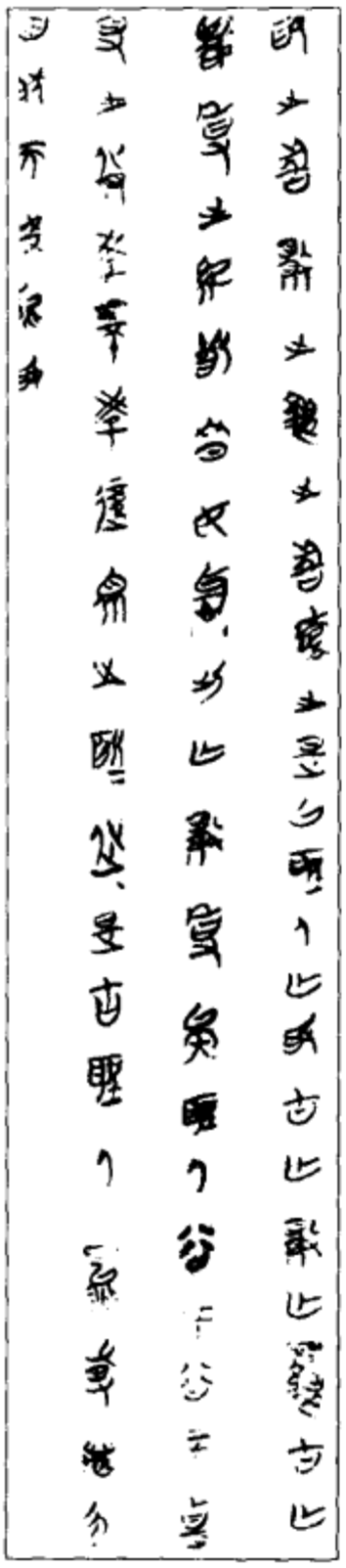
2. 甲本(从第十简到第十三简)

原文:为之者败之,执之者远之。是以圣人亡为故亡败;亡执故亡失。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亡败事矣。圣人欲不欲,不篡难得之货,教不教,复众之所过。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

释文:刻意做某事,反而会把事情搞坏;刻意控制某物,反而会远离初衷。所以圣人无为所以无所败,无所执所以无所失。处事的准则,是在结束时仍像开始一样慎重。这样,做任何事都不会失望。圣人以“不欲”作为欲,因而不以难得的东西为珍贵;以“不教”为教,因而能补救众人的过失。所以圣人能够帮助顺应万物本来的样子,而不会有意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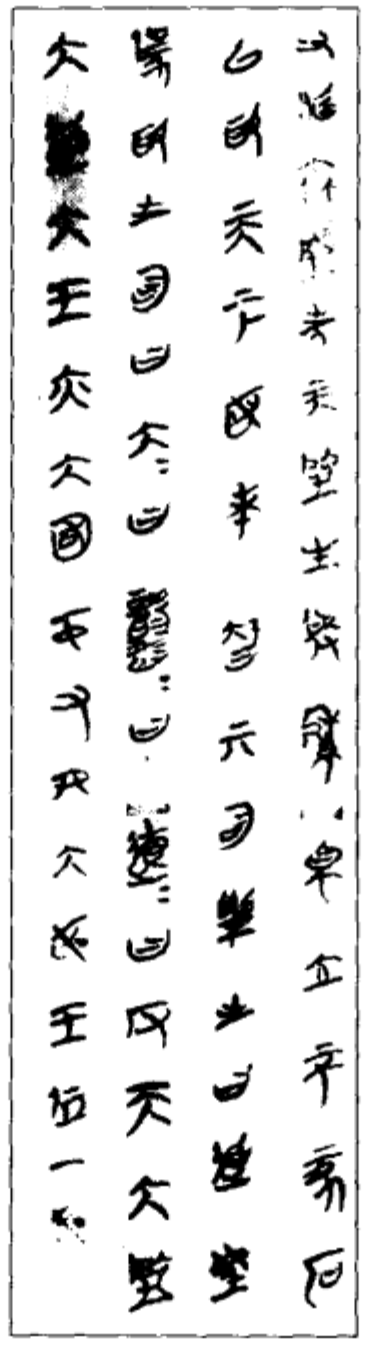
3. 甲本(从第二十一简“又”开始到第二十二简)

原文:又(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獨立而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



2.《老子》甲本第十简至第十三简

1.《老子》甲本第六简至第八简



3.《老子》第二十一简至第二十二简

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

释文：在天地形成之前，有一种混沌状态。它没有声音，没有形体，它独立，不受外物支配；它永恒，不改变自己的本性。这可以为万物之母源了。人们不知道它的名字，因此给它取名为道，我再勉强给它取个名字叫大。物盈必亏，物极必反，终于又要复归本原。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宇宙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中之一。

4. 乙本(第三简)

原文：(为) 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

释文：为学是一天比一天进益，为道则是一天比一天减损。减损又减损，以至于“无为”。虽然“无为”，但是事实上又无所不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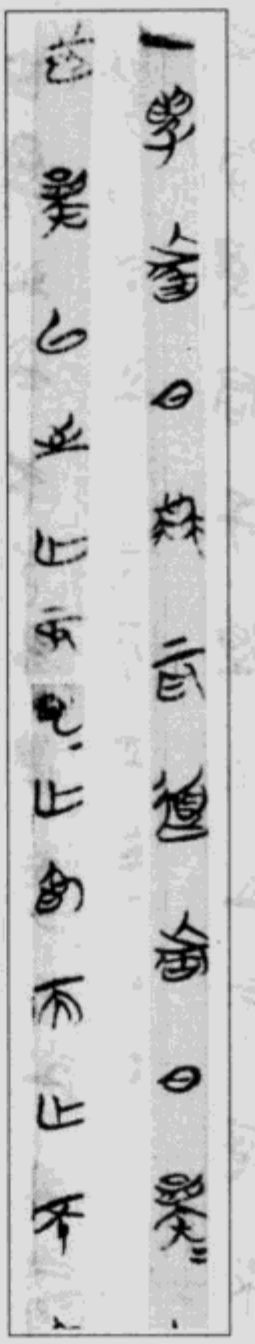
5. 乙本第九简至第十简

原文：上士闻道，仅能行于其中。中士闻道，若闻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弗大笑，不足以为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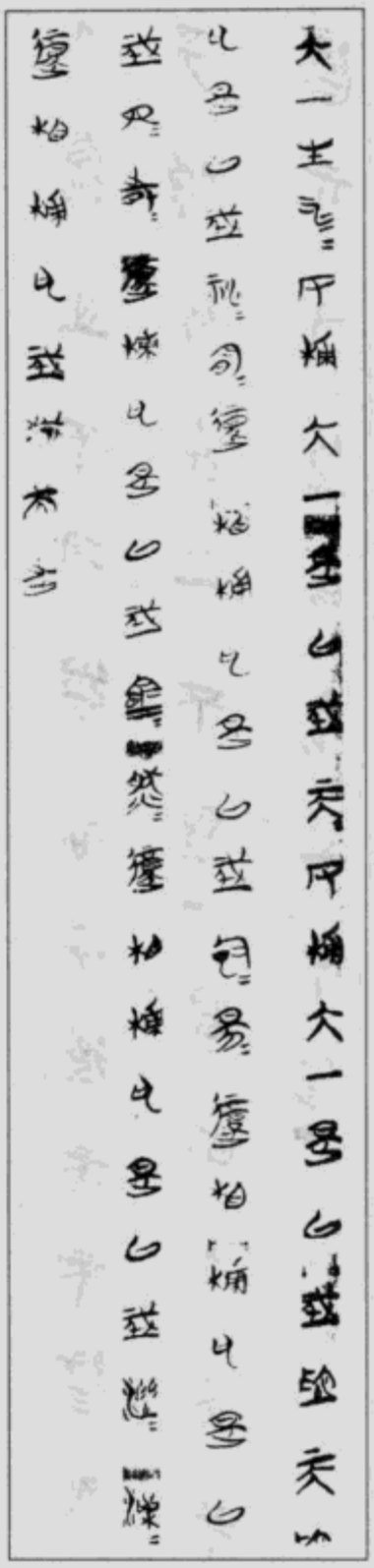
释文：不同的人对道的理解与反应是不同的。上士闻道，由于其把握了道的真谛，便只是依道行事而已。中士闻道，好像理解，又好像没有理解，似懂非懂。下士闻道，完全没有理解便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于是沾沾自喜，以至于大笑，认为不大笑就不足以表示自己已经依道

6.《老子》丙本
第一至第二简

5.《老子》乙本
第九至第十简



4.《老子》乙
本第三简



7.《太一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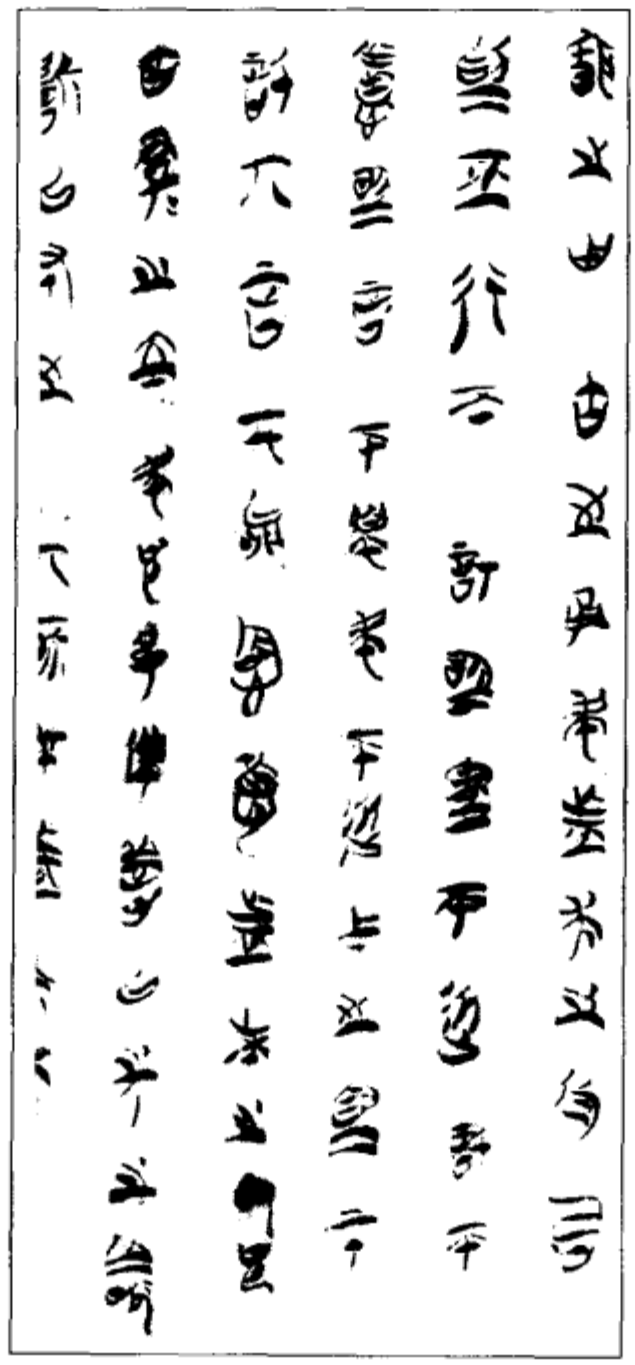
行事了。

6. 丙本(第一简第二简)

原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乎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

释文:最好的社会,人民仅仅知道君主的存在而已;其次的社会,人民亲近并称誉他;再次的社会,人民惧怕他;再其次的社会,人民轻侮他。怎么会发生不信任君主的事情?那是君主城信不足的原因造成的。如君主遇事考虑周全、珍视承诺,事业就会成功了。百姓会说:“我们本来就可以这样的。”

8.《五行》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简



9.《成之闻之》

7.《太一生水》

原文：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

释文：太一先创生出水，水反过来辅助太一，于是形成天。天又反过来辅助太一，于是形成了地。天与地相互辅助，形成了神明。神与明相互辅助，形成了阴阳。阴与阳相互辅助，形成了四季。四季之间相互辅助，形成了寒热。寒与热相互辅助形成了湿燥，湿与燥相互辅助，最后形成了岁（一年）。

8.《五行》（第二十二——二十四简）

原文：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未尝见贤人，谓之不明。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见贤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谓之不智。

释文：没有听到并理解君子之道，叫做不聪。没有见到并理解贤人，叫做不明。虽然听到并理解君子之道，但不知道这就是君子之道，叫做不圣。见到并理解贤人，但不知道贤人是有德的，叫做不智。

9.《成之闻之》

原文：……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命，不信其言，而能念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立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

释文：曾经听说过："古时的君主役使人民，均以反求诸己为急务。如果君主的举动无诚信，人民就不会听从他的命令。如果人君的诚信不能彰显，人民就不会高兴地执行他的命令。人民若是连君主的命令都不听从，他的政令也不服从，而还能思念他的恩德，这是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的事情。所以君主治理人民，以自身完备的善德为表率，并恭敬谨慎地守护（人民受教的变化），这样的教化才会深入人心。"

10.《六德》

原文：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圣与智戚矣，仁与义戚矣，忠与信戚矣。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亲父子，和大臣，归四邻之抵牾，非仁义者莫之能也。

10.《六德》

释文：何谓六德？指的是"圣智"、"仁义"、"忠信"。"圣"与"智"、"仁"与"义"、"忠"与"信"，都是相辅相成的。始作礼乐，制定刑法，以教化民众，使他们生存有所归依，不是有圣智之德的人，不能有如此作为。能使宗族之内有亲近，使朝臣之间有和睦，更能平息四邻诸侯的纷争，不是有仁义之德的人，不能有如此作为。

楚系简牍之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

1.《孔子诗论》（第一简）

原文：孔子曰"诗亡隐[9]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

释文：孔子说："人心的真实情志都反映在诗、音乐和语言中，而无法隐匿与

矫饰。”(此句大意是解释“诗言志”)

《缁衣》

2.(第二、三简)

原文: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其(臣,臣)不惑于君。《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尹诰》云:‘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

(解释略)

3. 第十简

原文: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教此以失,民此以烦。《诗》曰:‘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解释略)

4. 第十六简

原文: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则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解释略)

5.《性情论》

原文:“(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

释文:人的本性根源来自于一切存在物的显发,而“显发”产生于自然之天的本然运作。“道”的形成与操作,是由“情”(此处指的是人性的自然体现,或可称为人性展现的实际情况)的出现而开始的,而“情”又源于人的本性。(因为“道”的规划和操作由“情”开始,所以)一切人性始源均近于“情”,一切人性的终极均近于义(即人文价值的标准)。只有能通晓人存之实情者,能发起(人道的规划和操作),也只有能通晓人文价值之本

1.《孔子诗论》第一简

4.《缁衣》第十六简

3.《缁衣》第十简

2.《缁衣》第二、三简

义者，能包容一切人存事务的处置。

6.《民之父母》

原文：(子)夏问孔子："《诗》曰：'凯悌君子，民之父母。'敢问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

释文：子夏问孔子说："《诗经》上说：'君子具有凯悌的德性，所以可以称为民之父母。'那么具备怎样的条件才算是民之父母呢？"

6.《民之父母》

5.《性情论》

7.《鲁邦大旱》

原文：鲁邦大旱，哀公谓孔子："子不为我图之？"孔子答曰："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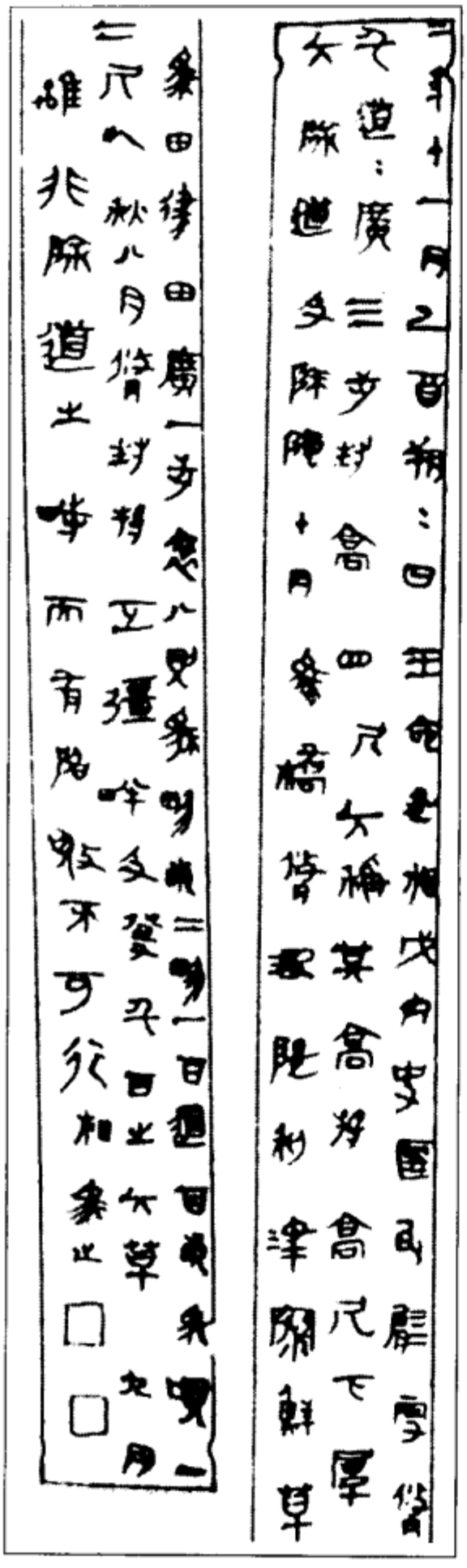
释文：鲁国有很严重的旱灾，鲁哀公对孔子说："你不为我提供治理灾害的谋划吗？"孔子回答说："由于大旱所引起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加强刑、德之治吗？"

秦系简牍之一——青川木牍[10]

M50:16

原文："二年十一月乙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民臂(僻)，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及千(阡)百(陌)之亡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险败不可行，辄为之。"

释文：二年十一月乙酉，秦武王命丞相甘茂与内史匽，百姓邪僻不守法度，现对《为田律》进行修订并重新公布：农田宽一步，长八步，就要造畛(此处指的是分界作用的小道，可能也有特殊的意义与作用)。每亩有两道畛，一条陌道；一百亩为一顷，一条阡道，道宽三步，封高四尺，大小与高度相当；埒高一尺，基础部分厚



《青川木牍》

达二尺。在秋季八月，修筑封埒，划定田界，并除去阡陌上的杂草；九月，大规模的修筑道路和难行难通之处；十月，建造桥梁和陂塘堤坝，使渡口与桥梁保持通畅，清除杂草。不在规定修治道路的时节，如道路破坏不能通行，也应该立即修治。

秦系简牍之二——龙岗秦简

1. 第四简

原文："詐(诈)伪、假人符传者，皆与闯门同罪。"

释文：以欺诈的方式得到符传、伪造符传、向他人借用符传，以及把自己的符传借予他人，都与擅自闯入门禁者同罪。

2. 第二十七简

原文："诸禁苑为耎(壖)，去苑里，禁毋敢耎(壖)中兽，取者其罪与到禁中<同>。"

释文：各禁苑为外围设有地，距禁苑四十里，为禁区，不得猎取其内的野兽，在此狩猎野兽与在禁苑中盗猎同罪。

3. 龙岗木牍

原文："鞫之：辟死，论不当为城旦。吏论：失者，已坐以论。九月丙申，沙羡丞甲、史丙，免辟死为庶人。令[11]自尚也。"

释文：请求复审：辟死不应当判刑为城旦。重审官吏的意见：以往的过失(或译作：治狱之吏论罪定刑的失误)，已经承担了责任，依法论处。九月丙申，沙羡县丞甲、史丙宣布：免除辟死的刑徒身份，恢复庶人地位，还他自由。

秦系简牍之三——里耶秦简[12]

2002年6月4日，湘西龙山里耶古城出土了已埋藏二千二百多年的秦王朝简牍，包括木简、木牍、竹

简等，共计二万余枚，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秦简数量的总和。这些简牍文书，极有可能是因秦朝末期战乱频仍，才被迫弃于井中销毁。

这批秦简属秦代当地官署文书，涉及战国至秦代湘西乃至更为广泛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有通邮、军备、算术、记事、行政设置、职官、民族等，极大地增添和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秦朝公文格式的认识。由于秦朝历史短暂，史料匮乏，这批简牍被认为“复活”了秦代历史，考古价值可与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等媲美。

里耶秦简的大部分文字字体属于秦隶，从小篆演化而来，和湖北龙岗睡虎地秦简的字体相似。字全部是笔墨书写，字迹工整，运笔流畅；简牍字体繁简有别，姿态各异。这些文字全用中锋，笔画遒劲，意境酣畅淋漓。秦简文字中的许多笔划，特别是撇、捺、竖、点等笔划十分漂亮。这样大量的简牍文字对于研究小篆、隶书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 龙岗秦简第四简　2.龙岗秦简第二十七简　3.龙岗木牍

1. 书检

邮书检，即当时邮传文书的封缄标识，用以说明邮传的发文、收检地和邮传方式。

原文：

迁陵以邮行

洞庭。

大意：

(邮传文书)由迁陵以步递的方式，发往洞庭郡。

1.里耶秦简书检

根据这枚邮书检的文字，可知这是要求该文书以步递方式由迁陵发往洞庭的邮传文书的封缄标识。此邮书检所言“迁陵”自是指文书签发地迁陵郡而言无疑。迁陵正是洞庭郡的属县。

2. 九九乘法表

原文：

〖九九〗八十一 〖八九〗七十二 七九六十三 六九五十四 五九卅五 四九卅六

三九廿七 二九十八 八〖八〗六十四 七八五十六 六八卅八 五八卅 四八卅二

三八廿四 二八十六 七〖七〗卅九 六七卅二 五七卅五 四七廿八 三七廿一

二七十四 六〖六〗卅六 五六卅 四六廿四 三六十八 二六十二 五〖五〗廿五 四五廿

三五十五 二五而十 四〖四〗十六 三四十二 二四而八 三〖三〗而九 二三而六

二〖二〗而四 〖一二〗而二 二半而一 凡千一百一十三字

这枚战国简牍，是我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普遍运用，是发现的最早的乘法口诀表。与过去发现的“九九表”不同，这个表多了“二半而一”一项，这实际上已经是小数运算。最后说“凡千一百一十三字”，是表中所有的乘积之和。比较同出木牍“九九表”，文末也写有“凡一千一百一十三”，可见这里的“字”字是衍文。

2. 九九乘法表

3. 迁陵丞郴(诘)之启陵之一

原文：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五(伍)成里勾、成，成为典，勾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

正月丁酉旦食时，隶妾冉以来。/欣发。

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郄[13](诘)之启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为典，何律令？

應[14](应)：尉已除成、匄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气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

正月丁酉旦时，隶妾冉以来。欣发。壬手。

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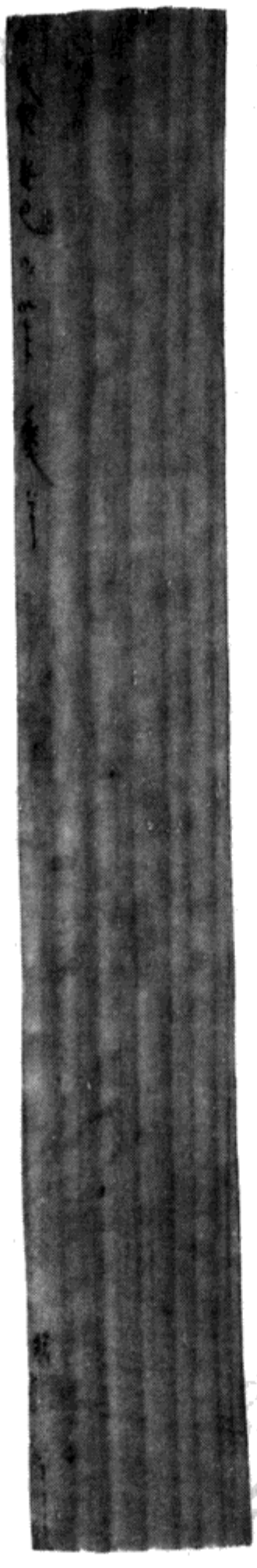
秦始皇三十二年正月十七日由启陵乡啬夫上报迁陵县丞说，成里里典和启陵邮人缺，提拔成为成里里典，士伍匄为邮人，请县令、县尉核准。正月二十日旦食时，隶妾冉将上述内容的信带交到县府。这份文书经“欣”手打开。正月二十日当天，迁陵县丞昌发文提出质问说，[成里]一共二十七户，已经有一个里典，为什么又设一个里典，有什么律令为依据？接下来，对启陵乡啬夫应的批复说：县尉已批准提拔成、匄为启陵邮人。文书由“气”经手。正月二十一日日中，迁陵县守府以快件发出。由“壬”经手。

这一材料使我们看到秦代基层官吏任命的情形。其中一个问题是，迁陵县尉的职权、迁陵丞昌与尉的关系。《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启陵乡啬夫应的公文是报给令、尉的，没有提到丞。丞提出严厉的诘

3.迁陵丞郄(诘)之启陵之一(正)

3.迁陵丞郄(诘)之启陵之一(反)

4.迁陵丞郴(诘)之启陵之二(正)



4.迁陵丞郴(诘)之启陵之二(反)

问,但迁陵县尉否决了县丞昌的意见,批复同意由成、匄担任启陵的邮人,显示其权力大于丞。当然,他也绕开了丞昌提出的成里二十七户人已经有一个里典,为什么还要增设的问题,将报上的两个人都任命为邮人。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今已不可考知了。

4. 迁陵丞郴(诘)之启陵之二

原文: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椭(樛)敢言:前日言競(竟)陵薆(荡)阴狼叚(假)迁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柂(棹?)

以求故荆积(绩)瓦,未归船。狼属(嘱)司马昌官,谒告昌官令狼归船,报曰:狼有逮(律?)在复[15]狱,已卒史衰、义所[16]。今写校券一牒上谒,言之卒史

衰、义所,问狼船存所,其亡之,为责(债)券移迁陵,弗□□属

谒报,敢言之。/ □六[17]月庚辰,迁陵守丞敦狐郴(诘)之司空,自以二月叚(假)狼船,何故□□辟□,今而

补[18]曰谒问覆狱卒史衰、义,[衰、义]事已,不智(知)所居,其听书从事。/庆手。即令□□行司空。 J1⑧-134正

□十月戊寅□己巳以来。/庆手。 J1⑧-134反

大意:

秦始皇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司空守椭给县府写信说,竟陵荡阴地方一个叫狼的人,借了迁陵公家一条船,船长三丈三尺,说是为了在荆楚故地找寻存积的瓦,结果一直

没有归还。狼是司马昌官的属下，遂告知司马昌官，让他催促狼还船，司马昌官回复说：狼有官司在身，案子正在复审中，人在卒史衰、义处。今特写将财物校验清点文书抄录一份上报，通过卒史衰、义向狼讯问船方在什么地方，如果丢失，就写一份债券给迁陵方面。

六月二日，迁陵守丞敦狐问司空：狼二月就借走了船，为什么〖这么久不查寻〗，到现在才来问复狱的卒史衰和义。衰和义复狱完毕，不知狼到哪里去了。庆经手。立即命令将公文送交司空。

十月二十九日，文书由□□带来。庆经手。

5. 追讨赀赎文书之一

原文：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赀余钱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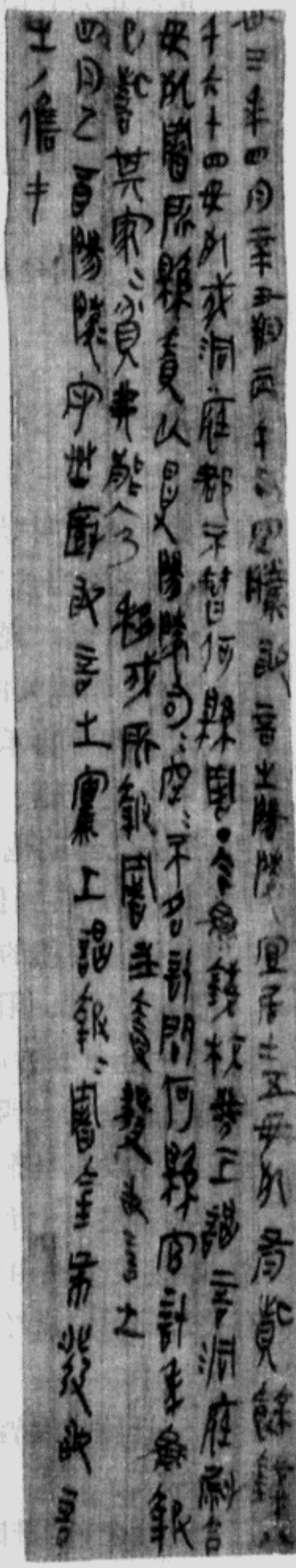
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

毋死署所县责以受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

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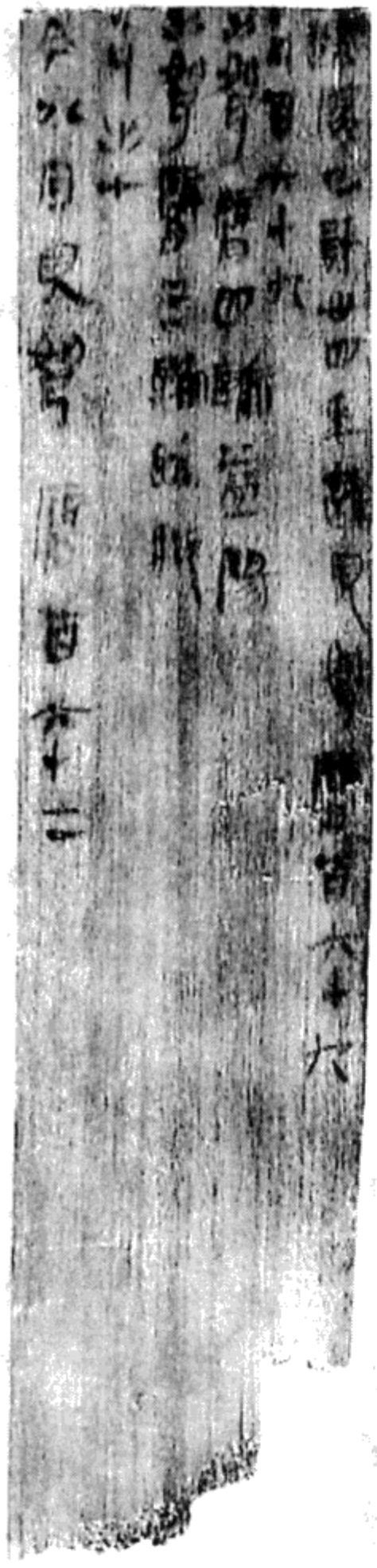
四月己酉，阳陵守丞厨敢言之，写上谒报，报署金布发，敢言

之。/僭手。



5.追讨赀赎文书之一(正)

5.追讨赀赎文书之一(反)



6.迁陵出弩臂输益阳、临沅

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阳陵守庆敢言之，[至今]未报谒追，敢

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觸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

陵，其以律令从事报之，当腾腾。/嘉手。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敬手。

大意：

秦始皇卅三年四月初六，阳陵司空腾报告说，阳陵县宜居里士伍名叫“毋死”的，积欠赀钱八千六十四，需要追讨，但毋死充当戍卒，现不知在洞庭郡哪一个县服役，归哪一个县管辖。现制作一份财务校验文书，上报给洞庭尉，命令管辖毋死的县里追讨欠债的情况告知阳陵司空。阳陵司空现不再承担上报这笔债款的责任，查明欠债戍卒由哪个县管辖，即由哪个县负责统计在上报的年报表中。过去已经向他的家庭追讨过欠款，因家里贫穷无法缴纳欠债，只好转到他服役之处。文书送达后要回报，文书由管辖追讨欠债的部门开启。

四月八日，阳陵守丞厨将司空腾的报告转批给主管财务的“金布曹”，责成上报。由儋经手。

秦始皇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阳陵守庆发现，上述公文至今没有呈报。由堪经手。

秦始皇三十五年四月初七，洞庭假尉觸通知迁陵丞说，阳陵戍卒现由迁陵管辖，应按律令处理，将文书抄录有关部门。由嘉经手。公文用“洞庭司马”印章封缄发送。由敬经手。

6. 迁陵出弩臂输益阳、临沅

原文：

迁陵已计：卅四年余见弩[19]臂百六十九。

凡百六十九。

出弩臂四输益阳。

出弩臂三输临沅。

凡出七。

今八月见弩臂百六十二。

这是迁陵库，存储武器装备出库统计文书。文书起首说“卅四年余见弩臂百六十九”，是讲秦始皇三十四年初核计弩臂数量为169个。到三十四年八月仅仅出库弩臂七个，盖其时天下太平，并无战事，武器的使用更新都很少。

统计截止八月，是秦代制度的规定。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统计上报受灾田亩数字“尽八月”；《仓律》规定小隶臣妾八月傅为大隶臣妾，十月起“益食”。这都是因为秦以十月为岁首，九月地方要派员进京上计，呈报户口、土地、赋税、财务、器具统计，所以数据截止八月。

从今天看来较为偏僻的迁陵，输出弩臂到临沅（常德）、益阳等洞庭湖畔的繁华都市，可见当时迁陵的重要性。秦人可以由涪陵溯乌江而上到今天的贵州松桃一带。由乌江入酉水不过几十里，然后顺酉水而下威胁楚的江南，里耶（迁陵）当时是秦粮秣兵甲重要的中转站和补给点。

7. 洞庭郡发送的公文

原文：

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穀、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

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缶为言，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

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即）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

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殿（也），不欲兴黔首。嘉、穀、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

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夬（决）泰守府，嘉、

7.洞庭郡发送的公文

穀、尉在所县上书。嘉、穀、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　　J(16)-5正

大意：

秦始皇廿七年二月十五日，洞庭守礼通知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穀、属尉等：令规定："凡是有传送运输的任务，必须首先派遣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债等身份者。有紧急任务不能耽搁的，才能征发百姓服役。"今洞庭郡的军械装备调往关中以及巴郡、南郡、苍梧等地，运输军械装备需要的运力很大。如果需要传送运输的话，必须首先派遣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居赀赎债、司寇、隐官、县里的践更者。在农忙期间，不得征发百姓服役。卒史嘉、假卒史穀、属尉等，要清点核查各自所负责的县里的乘城卒、徒隶、居赀赎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的名簿，有能够参加传送运输军械装备的人，而县里没有派遣他们，却征发百姓服役，征发百姓服役本来可以尽量少征发一些，却没有尽量少征发一些，而多征发的，要立即向县里举报，县立即按律令治罪论处，应当坐者言将名字报到郡太守府，由太守府决断。卒史嘉、假卒史穀、属尉等要从各自所在的县里上书报告情况。卒史嘉、假卒史穀、属尉等要告诫各级吏员日日夜夜修身正行，不得有失。

第五节　帛书选读

概述　帛书是写在丝织物上的文字。从文献记载的年代与出土文物来看，帛书的使用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之间，距今约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根据文献所载，春秋时简帛就已成为流行的书写原料，《国语·越语下》"越王以册书帛"，可见在当时简册与帛书是通行的。而孔子"韦编三绝"的记述，表明了春秋晚期简册已成为通行的书写材料。到了战国时期，简帛的使用则更为风行。《墨子·明鬼篇》："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先王寄理于竹帛"。由于原料的因素，简牍的使用更为广泛和平常。

长沙子弹库帛书　通常也叫楚帛书、楚缯书或楚绢书，解放前在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战国楚墓盗掘出土。出土不太久即落入美国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之手，现存放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物主是亚瑟·M·萨克勒（Arenur M Sackler）。因为是盗掘，流传海外亦十分秘密，所以出土和流出国外时间众说纷纭。但据商承祚先生之说，盗掘时间为1942年9月，

1946年被考克斯从上海带到美国。

帛书上下高38.5厘米，左右宽46.2厘米，中心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段文字，一段13行，一段8行，可分为甲、乙编。四周是作旋转状排列的12段边文，其中每三段居于一方，四方交角用青、赤、白、黑四木相隔，每段各附有一种神怪图形。另外帛书抄写者还用一种朱色填实的方框作为划分章次的标记。全篇共有九百多字，考释论著甚多，但各家注释则有差异。甲篇文字最多，作者特别强调"敬天顺时"。乙篇主要是讲神话。丙编是边文12章，每章代表一个月份，略述该月宜忌，如嫁娶、行师用兵、营筑屋宅等等。各月都附有一种神怪图形。丙篇所反映的是阴阳家的"术数"之学，专讲占星、堪舆、卜筮等迷信活动。

楚帛书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虽只有九百多字，但内容丰富，对研究战国楚文字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根据帛书内容，可以了解到春秋战国前，湖湘地区的土著蛮越民族，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各种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楚人南下后，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这两种原始宗教、神话互相影响，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具有特色的宗教和神话。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文字选读[20]

1. 甲篇

原文："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敄奠四亟。日非九天则大敃，则母敢蔑天霝。帝夋乃为冒=之。□共攻夸步，十日四寺。□⧄神则闰，四□母思。百神风雨，晷祎乱乍。乃迷冒：以遡相□思。又宵又朝，又昼又夕。□"

释文：于是炎帝命令祝融用__等四时之神，青木、赤木、黄木、白木等四木之神降奠，并且施奠于三天、四极等。能配九天而行，不敢有蔑视天命之举，则可得大安谧。帝俊的妻子生了十日和十二月，因此有了日月之行，则就能得到正常之道了。共工有子生岁十二，因此十日、四时为其所出。……与辰相违背，因此出现了逆乱失次的现象。因此应当按照日月运转之象每天对它们迎来送往。

2. 乙篇

原文："月则绲绌，不得其当。旹、颞、眛、昏，又□尚=冒=星昏，乱达其行。绲绌达□，卉木亡。"

释文：月亮圆缺运转不很正常，所以不能达到堂堂荡荡的情况。日月星辰运转也是乱违其次，因为运转的不正常所以草木也都是生长无常。

3.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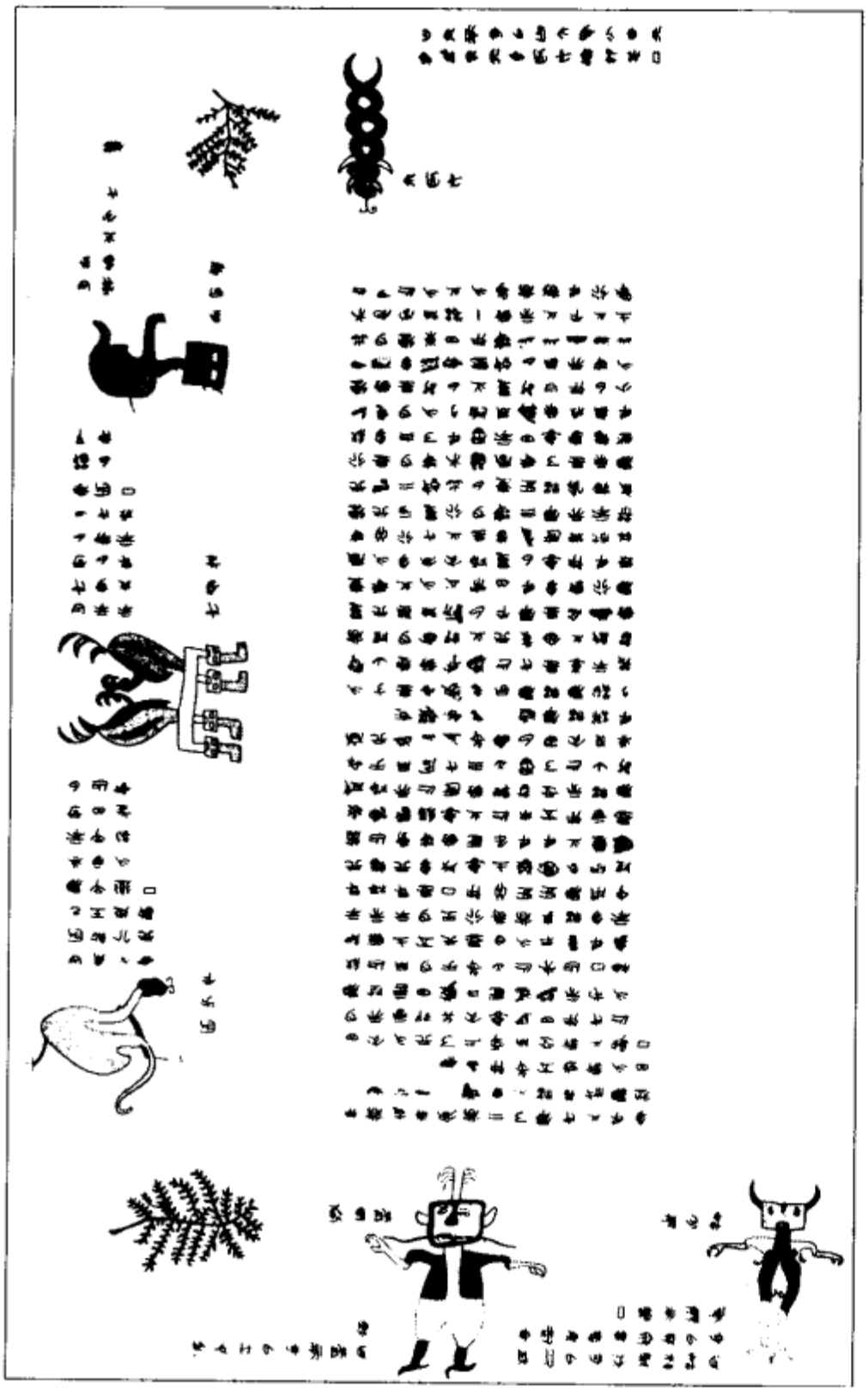
原文："取于下 曰取乙则至。不可以□杀。壬子、吾子，凶。乍□北征，衔有

咎。武□□其戡。□”

释文:正月又名孟陬之月,鸟乙(此为一个字)鸟飞来了,但因为有煞气所以不可以杀戮,壬子、丙子等日子不吉利。这个月北征不利于主帅,因为与太岁相冲突的缘故。因此应该“用武于其辅”。

原文:仓莫得,曰仓,不可以川,□。大不讫于邦,有枭,内于上下口。”

释意:



楚帛书摹本(部分)

七月又名为仓月,不可以作沟洫之事,因为有名叫枭的恶鸟入于上下作祟,所以对于邦国得和乐不利。

姑分长

原文:曰:姑。利战伐,可以攻戚,可以聚众,会者侯,型百事,缪不义。

释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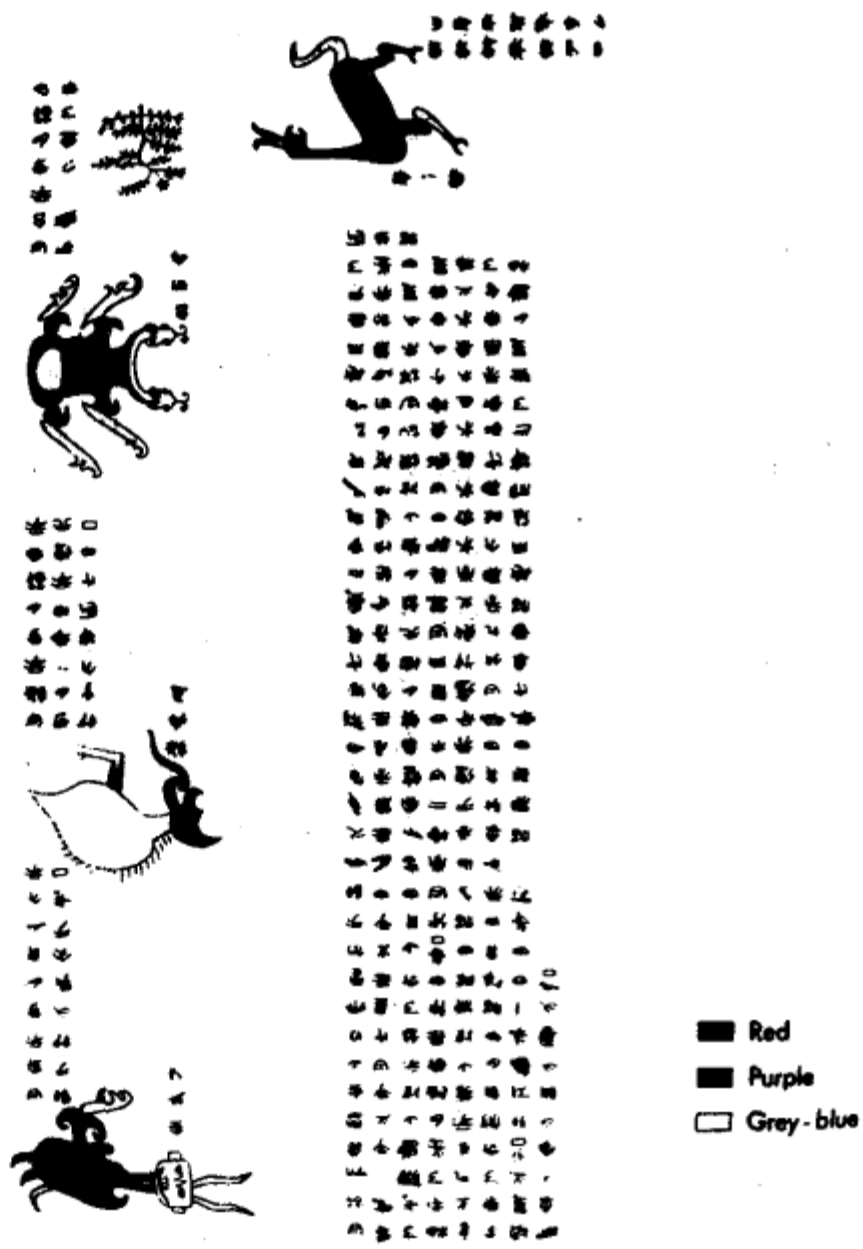
十一月又名姑月,可以侵伐,可以攻城,可以集民聚众,也可以大会诸侯,处理刑狱之事,可以杀戮不义之人。

第六节　春秋战国文字的书法艺术

目前竹简帛书主要出土于两湖和西北地区,反映了历史时期楚国和秦国的书体风格。此外,在河南、山西境内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盟书,就是墨书或朱书在玉片、石片上的盟誓文字,我们称之为玉简或石简。这种文字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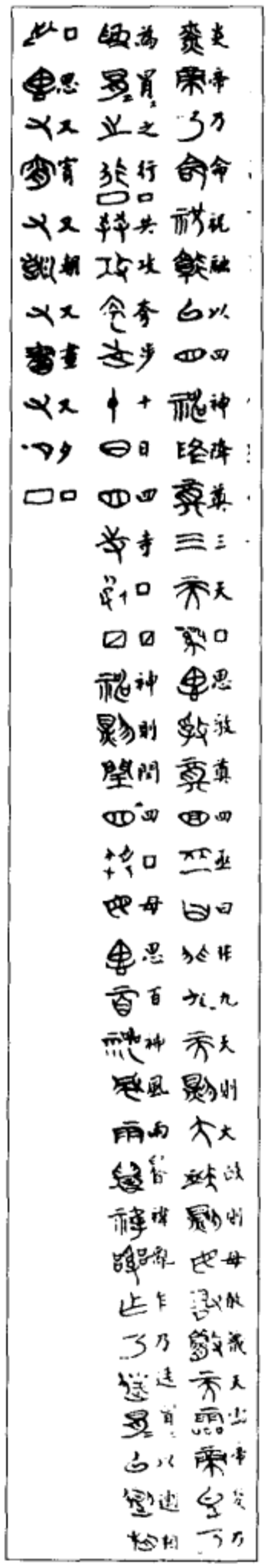
方诸国”(相对于秦国而言)在该阶段的书写风格。以上三类书写材料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墨迹的重要资料。另外,为了看出上古书法发展的转折和过渡的连贯性,在此还将秦统一后的若干简牍一并纳入讨论。

春秋战国开始，战争连年,社会动荡。形成了超出常轨、任意省改、草率从事、以求急就的社会风气，也导致这一时期的字体因省改、伪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商周时期严谨厚重的书风渐趋消失，代之以流美简略的书写风格。尤其是以软质工具手书,因此字体的表现形式极富弹性。从简帛文字的书法风格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是文字从实用走向艺术化的关键时期,从朴拙趋于秀美,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础。



楚帛书摹本(部分)

简牍帛书的书写工具　春秋战国时期发现的大量墨迹,为研究中国书法史提供了翔实资料。在研究这一时期书法风格的同时,这些墨迹究竟由什么工具所书,也成为重要的讨论课题。因为用笔的不同,直接导致书法风格面貌的差异。目前讨论的关键是这些墨迹由硬笔写就，还是软笔(毛笔)所书。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资料看,春秋战国时期使用毛笔的证据很多。大多数学者持毛笔书写论。但是也有人从盟书笔画及结体风格出发,提出不同意见。其观点包括:首先,侯马及温县盟书笔画边缘不凸不凹,平齐如削。若用毛笔,其笔画边缘必现摇曳波动、或提按轻重之迹,不得尽如刀销。由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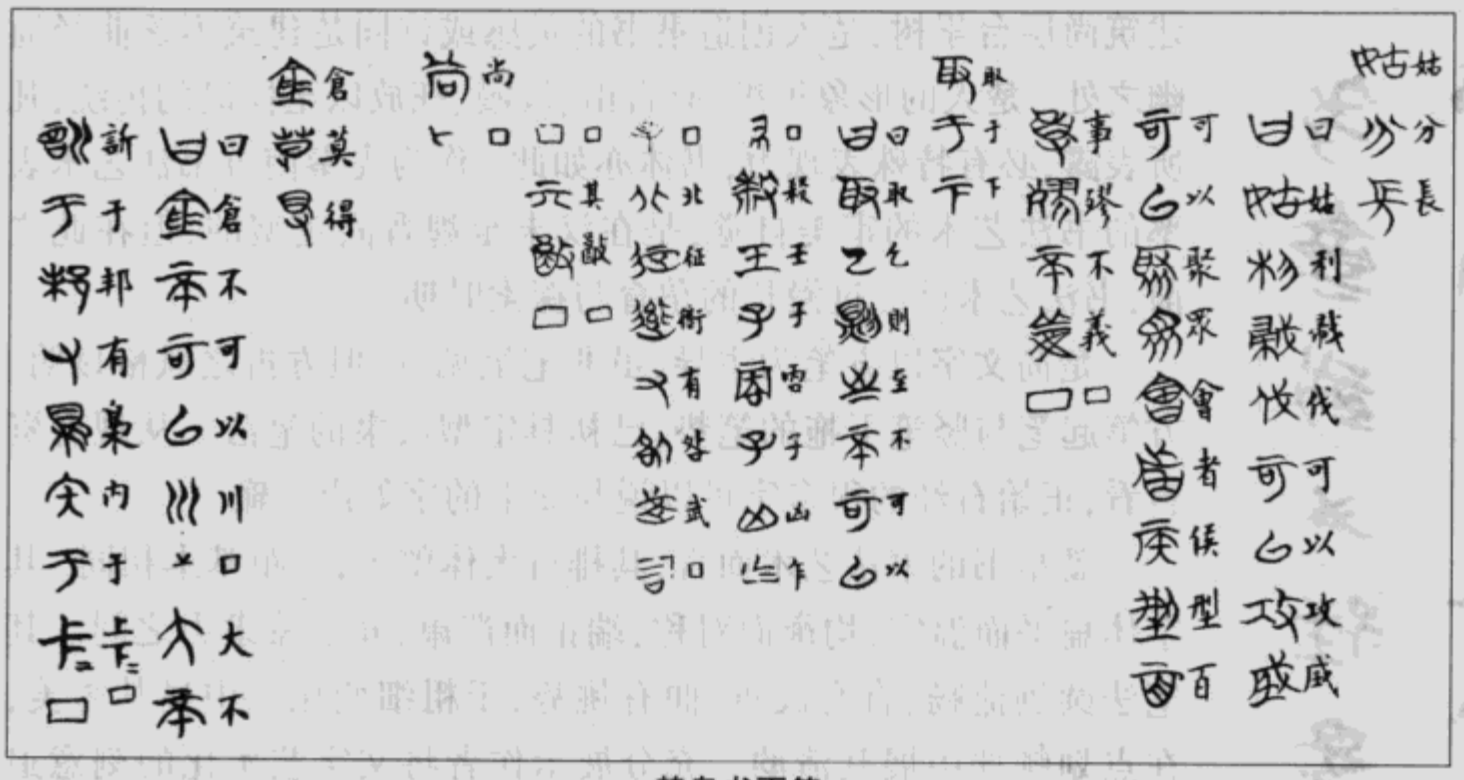
楚帛书甲篇

楚帛书乙篇

推知侯马盟书必为硬笔所写。其次，晋国盟书的字结体坚劲犀利，气势迅疾；下笔浓重，行笔一掠而过，毫不反顾，故有“丁头鼠尾”的形态。如为毛笔所作，其笔画墨色会产生上淡下浓层次之别。其代战国及秦代墨书简牍、帛书笔划也皆不作面性渲染，线条粗细均匀、道地本色：不回锋、藏锋，无顿笔等。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完全保持硬笔书写特点，充分体现硬笔书体特有的品质。并就此推测，战国及秦代毛笔似乎尚未广泛用于书写。

我们认为，后者所言，没有充足的说服力。首先，晋国盟书的笔画并非如其所说平齐如削，很多字的笔迹，起笔顿抑，收笔清扬徐缓，笔画富有弹性和凝力。一些竹木简字体的笔画更是体现了软质工具书写的特征。如湖北荆门包山楚简的墨迹，顿笔清晰，提勾轻重自然，铺展收缩自如，笔触饱满，粗细有致。虽然没有明显的笔锋，但是反映了这个时期墨书文字书写的基本方法，具有典型的时代气息。我们不能用后来十分成熟的书法理论去作决定的比较。我们必须分清楚，利用软质工具书写与毛笔书法理论是两个概念。一个理论的确立必有它的发展过程，当发展的量变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软质工具书写的起源与发展时期，到战国末、秦代，毛笔书写开始逐渐成熟。到汉代，开始奠定书法理论的基础。如果我们无视春秋战国这一重要的发展过渡时期，那就是无本之木，令人难以信服。

隶书之辩 长期以来，隶书由秦人始创的观点，成为不刊之论。晋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然而，早在战国中晚期的楚国竹简上，就已出现隶书雏形。如江陵楚简有些字的末笔有明显的波法和挑势，但还不成熟，使用不很普遍。以字体结构而言，在秦汉简帛隶书文字中的写法，已在楚简帛书中习见。郭沫若曾说战国楚帛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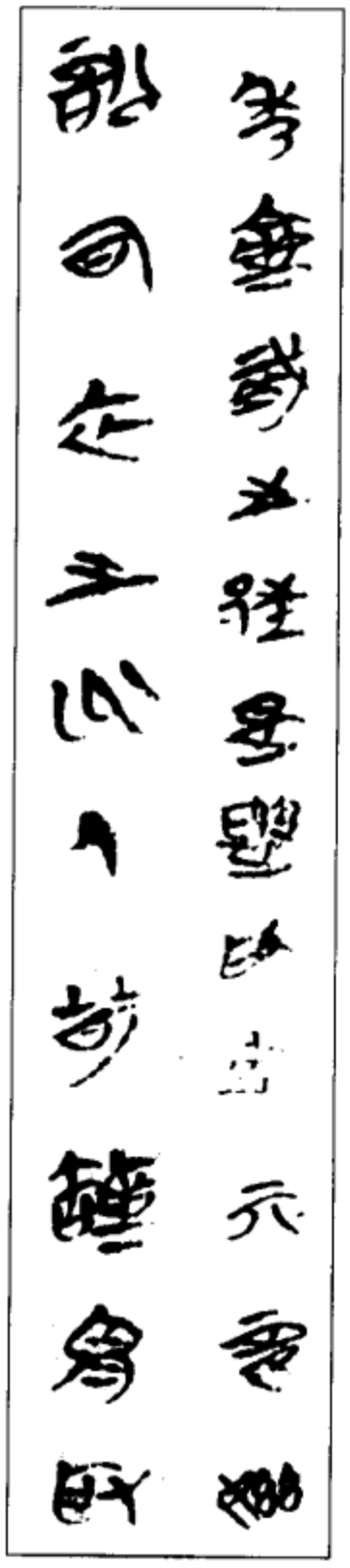
楚帛书丙篇

文字，“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世的隶书”，此论甚确。因此，隶书的始创应与战国时期的楚人有关。隶书对笔法进行了创新。将笔势由曲转变为直折，在圆笔的基础上产生了方笔，因多用提按，而使用笔出现了节奏感。

假如以东汉碑刻上的隶书为标准，则隶书有下述特点：字的结体一般呈扁方形，向右下方的斜笔大都有略向上挑的撇脚。较长的横画收笔时也往往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撇脚式的尾曳。先竖后横的弯笔收笔时大都上挑，而且幅度往往比较大。向左下方的斜笔，收笔时多数也略向上挑。收笔时上挑的横画，整道笔画往往略呈微波起伏之势，较长的捺有时也有这种笔势。这些就是所谓的隶书书法特点的“挑法”和“波势”。

楚简帛书与战国时期南方的书法特点　楚人初创的隶书，用笔化篆书的曲线为直线，结构平衡对称，给人以整齐安定的感觉，但它向上下左右挑起的笔势，却能在安定之中给人以飞动的美感，人们常说隶书“高下连属，似崇台重宇”，说明隶书美同建筑美有某种神似。楚人的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战国包山楚简

建筑尚层台累树，楚人创造隶书的灵感或许同楚建筑不乏曲径通幽之处。楚人的形象思维，有自由、浪漫、狂放以至怪诞的传统，凡所表露，必有特殊表现力，书体亦如此。作为先秦南方书法艺术表率的书法艺术的审美自觉，是在汉末至魏晋间定型的，但在此之前，书法艺术已经过漫长的孕育与探索时期。

楚简文字以方笔为主导，虽非笔笔见方，但方折之风格显明。方笔起笔与竖笔下拖的笔势，已初具定型汉隶的笔法。从现有资料看，正始石经的很多字可以说与简上的字如出一辙。

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其字体扁平而温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力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划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秦系简牍与战国、早秦时期西北地区的书法特点　跟六国文字相比，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显得比较保守，同时字形有所简化。从总体上看，其形体跟两周晚期写得比较规整的金文仍然颇为接近。但是秦国人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也在不断破坏、改造旧的字形。在秦国文字里，俗体也在发展。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国的铜器铭文、印文和陶文等资料里，可以看到很多俗体的写法。有不少写法跟后来的隶书已经极其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战国竹帛文字已可看出隶书笔意的滥觞，秦代与小篆并行的民间俗体秦隶与之一脉相承。

在正体和俗体的关系上，秦国文字的情况跟六国文字很不一样。六国文字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秦国的俗体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从秦简墨迹书体上，可以看出其字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

帛书书法

隶书在战国晚期的秦国已经初步形成。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的简文，就是早期的隶书。秦简是最早的简册墨迹之一，也是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这部分秦简写在篾黄上，少数两面墨书，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简文系多人书写，有的写于战国晚年，

汉张迁碑

礼器碑

有的写于秦始皇时期。尚带篆意的浑朴，已有明显的隶书风格。左旁从“水”的字屡见，“水”旁几乎全都写作三短横。此外还有不少跟汉代的隶书相同或相似的字形。吴白匋在《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一文中指出：“小篆和隶书都是对于秦统一以前的文字进行简化的结果。‘省改’和‘约易’，从发展的方向说，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隶书比小篆简化得更大，更彻底。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成其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云梦睡虎地秦简大量简册的发现，使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秦隶。”用笔划符号破坏象形字的结构，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秦简书体欹斜相依，肥瘦相间，节奏鲜明平稳，笔划饱满生动，气势连贯，开合有致、风神俱在，抑扬顿挫。具有鲜活、别致，有劲道、有质感、有弹性的书法魅力，形成质朴而秀朗的书风，是研究隶书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资料。

青川木牍书体，与睡虎地秦简相似，只是籀文的意味更浓一些，重于实用而行笔略显草率。此木牍比秦简出现的时间要早一些。其字体秀劲清丽，笔力沉静，笔势流畅，结体自然，布白疏朗，有轻松恬淡之美。可以看出秦国文字早期演变的轨迹。青川木牍和云梦秦简中有的字有篆书的结构，是篆隶递变中的古隶。其中的似、一、入、户、上等字不但笔道方折，而且有了“蚕头”、“波磔”，这是今隶所具有的特征。这些隶书的字形为正方、长方或扁方，不拘一格，结构方圆相辅，笔画浑厚，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用笔有轻、重、缓、急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珍贵资料。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一千一百余枚秦简，在书风上是丰富多彩的。它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的文字。对比一下与它同时的小篆是非常有意义的。小篆结体圆、正、均衡；秦简结体欹、侧、倾斜；小篆有转无折，秦简转折兼施，隶书与篆书的重要区别——圆转与方折初见端睨；小篆线条均匀不强求节奏，秦简用笔出现明确的提按和运动的节奏感；小篆笔画横竖一样，秦简出现了横细竖粗；小篆无波

秦简书法

挑，秦简开始出现波挑与利掠笔……这一切初步展示了篆书与隶书对比过渡之繁杂关系的成果。

青川木牍早于云梦睡虎地秦简八十年，属战国中期作品。有与篆书笔法形体完全相同的字形，有与汉隶相当接近的字形，这两者都是少数，大多数字形出现了隶书的笔势、笔顺、笔画连结方式。与篆书相比，它减少盘屈，化繁为简，圆者使方，变字形的狭长形为正方形或扁形，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由篆向隶演变的过渡性字体的书法作品。

天水放马滩秦简成册于战国晚期至秦始皇八年（前239年）。它的“甲种本”成书似早于“乙种本”，此册书写率意，于漫不经心中时见草法笔意。往往以轻挑短笔、延展字尾之法，曲尽笔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快速书写横画时自然形成的起笔粗重、收笔轻提，当是汉隶的典型笔划“蚕头燕尾”的雏形。

上述这些实物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秦统一之前就存在着大篆向隶书演变的过渡性字体。这些二千多年前的无名书工，以当时民间流行的实用的新型字体，为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隶书的产生时期的断代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

晋、豫玉简与春秋晚战国早期的书法艺术

我国古代有杀牲取血、血写誓辞的做法，春秋时期尤为盛行。侯马盟书是我国春秋晚期晋国的官方文书。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较早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实物资料之一。时间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距今已有二千四百余年。

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笔书写而篇章完整的古人手书真迹。文字书法非常熟练，有的纤巧，有的洒脱，均出字自“诅咒”人之手。从字的大小和体式来看，不是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0.2厘米，笔锋仍然非常清晰，可知其文字必然是用柔软而有弹性毛笔书写的。侯马盟书的笔画起笔画，粗细有致，率意自然，其风格与铜器《栾书罐》、战国楚之帛、信阳简书、《魏正始三体石

经》上的古文的字体相近，略具浑厚风格。

在写法上，许多字都下笔粗重，收笔尖细，形成钉头鼠尾，类似于史书上说的“蝌蚪文”。由于不是一人所书，风格不同，字的好坏之间差别甚大。其中最好的字笔画浑厚劲健，结字疏密得当，章法错落有致，颇得自然之趣。按其功力来说，甚至可同《石鼓文》媲美。只是因为用途不同，一庄重，一随便而已。

侯马盟书的书法艺术独具风采，别具一格，从中可以看出晋国人用毛笔手书的文字真迹。盟书书体章法自然流畅，呈现出或浑厚凝重，或飘逸洒脱的面貌。盟书辞文在书写运笔中强烈展示出柔软毛笔特有的弹性韵律，行笔轻重有度，既潇洒秀劲，又不失古朴典雅。

侯马盟书文字书写笔法特点是，运笔出锋，即笔锋外露明显，经常有收笔自然回勾的笔意，它是毛笔手写熟练快速自然形成的。侯马盟书的字都是当时随手写的，应是当时通行的笔法。

古简帛书等各种不同形态的书法，虽然是在其民族特定的审美观趋势下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例如字体的造型，书法的装饰性，布白的疏密，线条的粗细等。苏东坡曾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纵观先秦简牍帛书的书法，正是“无意于佳乃佳”的绝好例证。这些书法的作者，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没有太世俗的功利所趋势，在自然的状态下完成了线条的营造，在不经意间使逆与顺、藏与露、曲与直、方与圆、肥与瘦、疾与涩等矛盾得到了较好的统一。它们的有序构成，体现了稚朴深厚的时代内涵，散发出沈厚的浑然天成的艺术灵性。

侯马盟书书法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不过分追求字体的均衡平稳，也不十分在意笔触的轻重适度，它们体现出的笔断意连，迹断势在，形断气连，气不可断、势不可遏的自然法则，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幼稚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注释：

①《尚书·多士篇》。

② 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③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收入《王国维论学集》，第207页。

④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⑤ 参见《晋书·束晳传》。

⑥ 详见陈梦家《汲冢竹书考》，收入《尚书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 详见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章节，以及后面的附表部分。

⑧ 图片见于《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隶定参看上书以及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注：1.原来隶定的字因为复杂难写，而直接以黑体字所代表的现在通用字代替。详细的可以参看《郭店楚墓竹简》。2.原文中的数字代表竹简在《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数码。3、< >代表缺失的字，据句意补上。

⑨ 李学勤、庞朴等人隶定为"隐"，马承源隶定为"离"，饶宗颐隶定为"吝"。

⑩ 图片见于《文物》1982年1期。

⑪ 以上为木牍正面文字，"自尚也"为背面文字。

⑫《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释文部分除此之外，还参考了张春龙《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⑬ "郤"应读为"诘"。上古音"郤"为溪母铎部字，"诘"为溪母质部字，声音相近。"诘"，是诘问、诘难之意，先秦、秦汉文献中，其例甚多，兹不赘举。

⑭ "应"字，在这里写作"應(广为疒)"，我们怀疑，"应"是启陵乡啬夫的名字，又见于16~9，"启陵乡应敢言之"，不过写法略有差异，作"應(心为十)"。这里说"應(应)尉已除成句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应"，是对启陵乡啬夫的称谓，下面是告诉"应"的话，也就是对启陵乡啬夫应的报告的批复。

⑮ 胡平生认为是"覆"，见简帛网胡平生《读里耶秦简札记》一文。

⑯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又推断可能是"报"字，见《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⑰ 胡平生认为是"九"，见简帛网胡平生《读里耶秦简札记》一文。

⑱ 胡平生认为是"誧"，见简帛网胡平生《读里耶秦简札记》一文。

⑲ 原文作从"弓"、从"如"之字。下同。

⑳ 图片参看饶宗颐、曾宪通的《战国楚帛书》摹本与隶定本，隶定参看饶宗颐、曾宪通的《战国楚帛书》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㉑ 见《尚书·多士篇》。

附　录

表 1:春秋战国出土简牍帛书一览表

时代	名称	国属	出土时间(年)	出土地点	数量	其他
春秋末战国初	玉简	晋	1965	山西侯马市东部浍河北岸晋国遗址	653	
春秋	石圭石简	晋	1979～1982	河南温县武德镇	1万片以上	
战国	帛书	楚	1934～1942	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	1	
战国	竹简	楚	1951	湖南长沙五里碑406号墓	38	
战国	竹简	楚	1953	湖南长沙仰天湖墓	43	
战国	竹简	楚	1953	湖南长沙杨家湾楚墓	72	
战国	竹简	楚	1957	湖南信阳长台关楚墓	229	
战国	竹简	楚	1965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	273	
战国	竹简	楚	1966	湖北江陵望山楚墓	66	
战国	竹简	楚	1973	湖北江陵藤店楚墓	24	
战国	竹简	秦	1975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	1157	
战国	竹简	楚	1978	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	70	
战国	竹简	(曾)	1978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	240	
战国	木牍	秦	1980	四川青川县50号墓	2	
战国	竹简	楚	1980	湖南临澧楚墓	不详	
战国	石简	晋	1980	河南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晋国盟誓遗址	10000	

（续前）

时代	名称	国属	出土时间(年)	出土地点	数量	其他
战国	竹简	楚	1981、1989	湖北江陵九店楚墓	190	
战国	竹简	楚	1981	湖北江陵马山砖场1号墓	1	
战国	竹简	楚	1983	湖南常德德山夕阳坡楚墓	2	
战国	简牍	秦	1986	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	470，木版地图7	
战国	竹简	楚	1986、1987	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	448	
战国	竹简	楚	1987	湖南慈利楚墓	4557	
战国	竹简	楚	1986、1987	湖北江陵秦家嘴楚墓	41	
	简牍	秦	1990	湖北江陵场家山315号墓	75	
	简牍	秦	1990	湖北沙市关沮秦汉墓	500	
战国	竹简	楚	1991～1993	湖北黄冈曹家岗5号墓	7	
战国	竹简	楚	1993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	804	
战国	竹简	楚	1994	河南新蔡楚墓	1500	
战国	竹简	楚	1994	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香港征集、据报道为湖北出土	1200	

注：本表的排列以年代先后为顺序

表 2:汉晋简帛出土情况一览表

时代	出土时间(年)	出土地点	数量	其他
秦	1989	湖南云梦龙岗 6 号墓	283， 木牍 1	
秦	1993	湖北江陵王家台 15 号墓	800	
秦	1993	湖北沙市周家台秦墓	390	
秦	2002	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	36000	
汉	1907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708	
汉	1913、1915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89	
汉	1920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7	
汉	1930、1931	甘肃额济纳汉边塞遗址	10100	
汉	1930、1934	新疆罗布泊汉边塞遗址	71	
汉	1944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48	
汉	1959、1981	甘肃武威磨嘴子 6、18 号汉墓	550	
汉	1971	甘肃甘谷刘家坪汉墓	23	
汉	1972	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	92	
汉	1972	湖南长沙马王堆 1 号墓	361	
汉	1972	山东临沂银雀山 1、2 号墓	4974	
汉	1973	河北定县八角廊 40 号汉墓	100 余枚	
汉	1973、1974	甘肃额济纳汉边塞遗址	19637	
汉	1973	湖南长沙马王堆 3 号墓	617 枚，另帛书 26 件	
汉	1973～1975	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	622 枚，竹木牍 10 方	
汉	1976	广西贵县罗泊湾 1 号墓	15	
汉	1977	安徽阜阳双古堆 1 号墓	6000 余枚	
汉	1977	甘肃玉门花海汉边塞遗址	91	
汉	1979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 号墓	约 300	

（续前）

时代	出土时间(年)	出土地点	数量	其他
汉	1978	江苏连云港花果山墓	13	
汉	1979	甘肃敦煌马圈湾汉边塞遗址	1217	
汉	1979	江苏邗江胡场5号墓	26	
汉	1981	甘肃敦煌酥油土汉边塞遗址	76	
汉	1981	甘肃武威磨嘴子墓	26	
汉	1983、1984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	2787	
汉	1984	江苏仪征胥浦101号墓	20	
汉	1986、1988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37	
汉	1987	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	数十	
汉	1989	甘肃武威旱滩坡墓	16	
汉	1990	湖北江陵高台18号墓	4	
汉	1990、1992	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	约20000	
汉	1993	江苏连运港东海县尹湾2、5号墓	133,另木牍24	
汉	1999	湖南沅陵虎溪山墓	1336	
汉	2000	湖北随州孔家坡8墓	500多枚,另木牍4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259	
魏晋	1901、1914	新疆古楼兰遗址	421	
吴	1979	江西南昌阳明路墓	23	
吴	1981	湖北鄂城水泥厂1号墓	6	
吴	1984	安徽马鞍山墓	17	
吴	1996	湖南长沙走马楼	10万多枚	
晋	1901、1908	新疆古尼雅遗址	66	
晋	1966、1969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	1	
晋	1974	江西南昌东湖1号墓	6	
晋	1985	甘肃武威旱滩坡9号墓	5	
晋	1986	甘肃高台常封墓	1	

表 3:甲骨文著录书目全、简称对照一览表

简称	书名全称	作者	出版时间(年)
《铁》	《铁云藏龟》	刘鹗	1903
《前》	《殷墟书契》	罗振玉	1913
《菁》	《殷墟书契菁华》	罗振玉	1914
《余》	《铁云藏龟之余》	罗振玉	1915
《后》	《殷墟书契后编》	罗振玉	1916
《殷图》	《殷墟古器物图录》	罗振玉	1916
《虚》	《殷虚卜辞》(摹本)	明义士	1917
《戩》	《戩寿堂所藏殷虚文字》	姬佛陀	1917
《龟》	《龟甲兽骨文字》	林泰辅	1921
《簠》	《簠室殷契征文》	王襄	1925
《拾》	《铁云藏龟拾遗》	叶玉森	1925
《传古》	《传古别录》	罗福颐	1928
《写》	《新获卜辞写本》(摹本)	董作宾	1928
《四版》	《大龟四版》	董作宾	1931
《书》	《书道全集》	下中弥三郎	1931
《真》	《殷虚文字存真》	关百益	1931
《周汉》	《周汉遗宝》	原田淑人	1932
《福》	《福氏所藏甲骨文字》	商承祚	1933
《契》	《殷契卜辞》	容庚	1933
《通》	《卜辞通纂》	郭沫若	1933
《后冈》	《释后冈出土的一片卜辞》	董作宾	1933
	《甲骨文》	王子玉	1933
《续》	《殷虚书契续编》	罗振玉	1933
《佚》	《殷契佚存》	商承祚	1933
《沪亚》	《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藏甲骨卜辞》	吉卜生	1934

（续前）

简称	书名全称	作者	出版时间(年)
《邺》	《邺中片羽初集》	黄濬	1935
《郼》	《郼斋所藏甲骨拓本》	金祖同	1935
《库》	《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摹本)	方法敛	1935
《衡斋》	《衡斋金石识小录》	黄濬	1935
《柏》	《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	明义士	1935
《相》	《殷虚甲骨相片》(照片)	白瑞华	1935
《诞》	《中国的诞生》	顾立雅	1936
《侯》	《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	董作宾	1936
《粹》	《殷契粹编》	郭沫若	1937
《邺二》	《邺中片羽二集》	黄濬	1937
《拓》	《殷虚甲骨拓片》	白瑞华	1937
《录》	《甲骨文录》	孙海波	1938
《七》	《甲骨卜辞七集》	方法敛	1938
《天》	《天壤阁甲骨文存》	唐兰	1939
《铁零》	《铁云藏龟零拾》	李旦丘	1939
《珠》	《殷契遗珠》	金祖同	1939
《邺三》	《邺中片羽三集》	黄濬	1939
《缀存》	《殷契缀存》	曾毅公	1939
《金》	《金璋所藏甲骨不辞》(摹本)	方法敛	1939
《诚》	《诚斋殷虚文字》	孙海波	1940
《中》	《中央大学藏甲骨文字》	李孝定	1940
《双图》	《双剑誃古器物图录》	于省吾	1940
《甲》	《殷虚文字甲编》	董作宾	1940
《宝》	《河南安阳遗宝》(摄影图片)	梅原末治	1940
《叙圖》	《叙圖甲骨释要》	何遂	1941

（续前）

简称	书名全称	作者	出版时间(年)
《摭》	《殷虚摭佚》	李旦丘	1941
《骈三》	《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	于省吾	1944
《厦》	《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	胡厚宣	1944
《六》	《甲骨六录》	胡厚宣	1945
《骨》	《骨的文化》	怀履光	1945
《七版》	《战后殷虚出土的新大龟七版》	胡厚宣	1947
《龟卜》	《龟卜》	金祖同	1948
《乙》	《殷虚文字乙编》(上、中辑)	董作宾	1948～1949
《摭续》	《殷契摭佚续编》	李亚农	1950
《缀》	《甲骨缀合编》	曾毅公	1950
《宁》	《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摹本)	胡厚宣	1951
《掇》	《殷契拾掇》	郭若愚	1951
《南》	《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摹本)	胡厚宣	1951
《掇二》	《殷契拾掇二编》	郭若愚	1953
《京》	《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	胡厚宣	1954
《乙》	《殷虚文字乙编》(下辑)	董作宾	1954
《缀合》	《殷墟文字缀合》	郭若愚	1955
《续存》	《甲骨续存》	胡厚宣	1955
《综述》	《殷墟卜辞综述》	陈梦家	1956
《外》	《殷虚文字外编》	董作宾、严一萍	1956
《日见》	《日本所见甲骨录》(照片)	饶宗颐	1956
《巴》	《巴黎所见甲骨录》(摹本)	饶宗颐	1956
《丙》	《殷虚文字丙编》	张秉权	1957～1972
《汉城》	《汉城大学所藏大胛骨刻辞考释》	董作宾	1957
《书博》	《书道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摹本)	青木木菟哉	1958～1960

（续前）

简称	书名全称	作者	出版时间(年)
《海》	《海外甲骨录遗》	饶宗颐	1959
《日汇》	《日本所见甲骨文字搜汇》(摹本)	松丸道雄	1959～1960
《京人》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甲古文字》	贝冢茂树	1959
《甲零》	《甲骨文零拾》	陈邦怀	1959
《甲释》	《殷虚文字甲编考释》	屈万里	1961
《吉大》	《吉林大学所藏甲骨文字》	姚孝遂	1963
《小川》	《故小川睦之辅氏藏甲骨文字》	伊藤道治	
	《方法敛摹甲卜辞三种》	白瑞华校	1966
《棪斋》	《棪斋甲骨展览》	李棪	1966
《中图》	《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甲骨文字》(摹本)	金祥恒	1966
《大原》	《大原美术馆所藏甲骨文字》	伊藤道治	1968
《联邓》	《联合书院图书馆所获东莞邓氏甲骨简介》	李棪	1969
《何异》	《卜辞贞人何在同版中之异体》	李棪	1969
《欧美亚》	《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	饶宗颐	1970
《善斋》	《善斋藏契萃编》	刘体智	1970
《北美》	《北美所见甲骨选粹》	李棪	1970
《藤井》	《藤井有邻馆所藏甲骨文字》	伊藤道治	1971
《桧垣》	《桧垣元吉氏藏甲骨文字》	伊藤道治	1972
《安新》	《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	郭沫若	1972
《明后》	《殷墟卜辞后编》	许进雄	1972
《安明》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	许进雄	1972
《临孙》	《临淄孙氏旧藏甲骨文字考释》	胡厚宣	1973
《纳尔森》	《美国纳尔森美术馆藏甲骨刻辞考释》	严一萍	1973
	《介绍一片伐人方的卜辞》	沈之瑜	1974
《缀新》	《甲骨缀合新编》	严一萍	1975

（续前）

简称	书名全称	作者	出版时间(年)
《铁新》	《铁云藏龟新编》	严一萍	1975
《七三安》	《1973 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	考古所	1975
《李》	《李光前文物馆所藏甲骨文字考释》	李孝定	1976
《缀补》	《甲骨缀合新编补》	严一萍	1976
《美藏》	《美国所藏甲骨录》	周鸿翔	1976
《关西》	《关西大学考古学资料室藏甲骨文字》	伊藤道治	1977
	《日本所见甲骨录》	伊藤道治	1977
《合集》	《甲骨文合集》	郭沫若	1979
《怀特》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许进雄	1979
《东文》	《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	渡道兼庸	1979
	《释流散到德国的一片卜辞》	胡厚宣	1980
《西瑞》	《西德瑞士藏我国殷墟出土德甲骨文》	徐锡台	1980
《屯南》	《小屯南地甲骨》	考古所	1980～1983
《安博》	《安阳博物馆馆藏卜辞选》	安阳博物馆	1981
《孟》	《孟广慧旧藏甲骨选介》	李先登	1983
《东化》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	松丸道雄	1983
《山西》	《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收藏德甲骨》	胡振祺等	1983
《黑川》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藏甲骨文字》	伊藤道治	1984
《京都博》	《国立京都博物馆藏甲骨文字》	伊藤道治	1984
《总集》	《商周甲骨文总集》	严一萍	1985
《法藏》	《法国所藏甲骨录》	雷焕章	1985
《英藏》	《英国所藏甲骨集》	李学勤等	1986
《屯缀》	《小屯南地甲骨缀合篇》	肖楠	1986
《上新》	《甲骨卜辞新获》	沈之瑜	1986
《天理》	《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甲骨文字》	伊藤道治	1987

（续前）

简称	书名全称	作者	出版时间(年)
《苏德美日》	《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	胡厚宣	1988
《爱米塔什》	《苏联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藏甲骨文字》(《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	胡厚宣	1991
《乙补》	《殷墟文字乙编补遗》	钟柏生	1995
《续补》	《甲骨续存补编》	胡厚宣	1996
《中岛》	《中岛玉振旧藏甲骨》	荒木日吕子	1996
《德荷瑞比》	《德荷瑞比所藏一些甲骨录》	雷焕章	1997
《所选》1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购甲骨文选释》	钟柏生	1997
《山博》	《山东省博物馆精拓甲骨文》	刘敬亭	1998
《所选》2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购甲骨文选释》	钟柏生	1998
《合补》	《甲骨文合集补编》	彭邦炯等	1999
《瑞斯》	《瑞典斯德哥尔摩古物陈列馆藏甲骨文字》	齐文心等	1999

表 4:青铜器著作举要

书名	简称	作者	时间(年)
考古图		吕大临著	宋元祐七年(1092)
博古图录		王黼等著	宋宣和(1119～1125)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薛尚功著	宋绍兴十四年(1144)
啸堂集古录		王俅编	宋
西清古鉴	《古鉴》	梁诗正等著	清乾隆十四年(1749)
西清续鉴甲编	《续鉴》	王杰等著	清乾隆五十八年 (1781)
西清续鉴乙编	《续乙》	王杰等编	同上
宁寿鉴古		乾隆敕编	清乾隆时期(1913 年涵芬楼依宁寿宫写本影印)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阮元著	清嘉庆九年(1804)
怀米山房吉金图	《怀米》	曹载奎编	清道光十九年(1839)
筠清馆金文		吴荣光著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
两罍轩彝器图释	《两罍轩》	吴云著	清同治十一年(1872)
古籀余论		孙诒让著	清同治十二年(1873)
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		吴大澂编	清光绪十一年(1885)
攈古录金文		吴式芬编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觚室吉金文述		刘心源著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长安获古编		刘喜海编	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从古堂款识学		徐同柏著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陶斋吉金录	《陶斋》	端方编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国朝金文著录表		王国维编	1914
周金文存		邹安编	1916
梦郭草堂吉金图		罗振玉编	1917
古籀拾遗		孙诒让著	1918
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		王国维编,罗福颐校补	
梦坡室获古丛编		周庆云藏器,邹寿祺著	1927

（续前）

书名	简称	作者	时间(年)
宝蕴楼彝器图录	《宝蕴楼》	容庚著	1929
新郑古器图录		关百益著	1929
贞松堂集古遗文		罗振玉著	1930
澂秋馆吉金图		陈承裘藏器,孙壮著	1931
秦汉金文录		容庚编	1931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郭沫若著	1931
金文丛考		郭沫若著	1932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大系》	郭沫若著	1932
颂斋吉金图录		容庚著	1933
武英殿彝器图录		容庚著	1934
贞松堂吉金图	《贞松堂》	罗振玉编	1935
海外吉金图录		容庚著	1935
十二家吉金图录		商承祚著	1935
邺中片羽初集		黄濬编	1935
小校经阁金石文字	《小校》	刘体智编	1935
缀遗斋彝器考释		方濬益著	1935
楚器图释		刘节著	1935
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初集		黄濬编	1936
善斋彝器图录		容庚编著	1936
邺中片羽二集		黄濬编	1937
三代吉金文存		罗振玉编	1937
西清彝器拾遗		容庚著	1940
商周彝器通考	《通考》	容庚著	1941
岩窟吉金图录		梁上椿著	1944

（续前）

书名	简称	作者	时间(年)
海外中国铜器图录		陈梦家编	1946
商周金文录遗		于省吾编	1957
殷周青铜器通论		容庚、张维持著	1958
金文编		容庚编	1959
积微居金文说		杨树达著	1959
青铜器图释		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1960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	1962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编	1964
中国古青铜器选		文物出版社编辑	1976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编	1979
随县曾侯乙墓		河北省博物馆编	1980

常用甲金篆隶文字备查

1 乙	佚二五五	铁三七·二	父已鼎	侯马盟书	睡虎地简 四三二〇五④	熹·春秋·僖 廿七年	
2 又	甲三八四	甲三九六	散盘	武威简	熹·公羊·僖十年		
3 九	前三·二 二·七	前四·四 〇·三	沂方彝	古币	睡虎地简 一二五一	新嘉量	
4 千	甲二九 〇七	林一·一 一·一三	散氏盘	楚帛书	居延简甲 七一一	新嘉量	
5 才	铁一六 〇·三	后一·一 〇九	旂鼎	小臣遘簋	三体石 经无逸	定县竹 简九五	
6 川	前四·一 三·三	矢簋	楚帛书	古币	纵横家书 二二七	熹·易·益	
7 女	铁一六 四·一	甲二四 二六	蠹女觶	免簋	熹·书·盘庚	汉印徵	
8 亡	佚二九	京津五 八五	甲二六 九九	天亡簋	杞伯壶	克鼎	
9 子	铁一二 二·一	佚三〇〇	甲六二二	铁二五 六·一	乙四一三	利簋	
10 元	前三·二 二·六	前四·三 二·五	师兑簋	鲁左司 徒元鼎	一号墓竹简 一三九	晋辟雍 碑阴	

11 天 甲三六 九〇 乙一五 三八 刺鼎 泰山刻石 定县竹 简一三 干甕亭·吴 天纪堵

12 中 甲五四七 前六·二·三 京都二 六九 中簋 一号墓竹简 一八五 侯马盟书

13 王 乙七七 九五 前五·一 五·五 戍角鼎 王子午鼎 越王者 於賜矛 楚帛书

14 屯 甲二八 一五 乙三四 四二反 秦公镈 迟盨 古币 鲁峻碑

15 少 甲二九 〇四 封孙宅盘 侯马盟书 三体石 经君奭 睡虎地简 一三·五 曹全碑

16 公 甲一三 七八 粹四〇五 公史簋 睡虎地简 二五·三九 鲁峻碑阴 位至三 公镜

17 牛 甲五二五 乙三二 一九 舀鼎 睡虎地简 二五·四四 一号墓 木牌六 熹·仪礼 ·公食

18 止 甲六〇〇 乙三七 九七 申鼎 古鉩 睡虎地简 曹全碑

19 卅 甲四七八 甲六三五 甲七九五 甲九五四 铁九七·二 粹四三〇

20 父 甲七九五 乙五二八 散盘 侯马盟书 居延简甲 五七七 熹·易·文言

21 尹 甲一七 一二 前七·四 三·一 彦鼎 尹弔鼎 尹阳布 韩仁铭

22 及 甲二八 四五 京都三 九五 侯马盟书 石鼓 睡虎地简 二三·一 曹全碑

23 友 前四·二 九·三 大鼎 杜伯盨 定县竹 简九一 仙集题字 杨叔恭 残碑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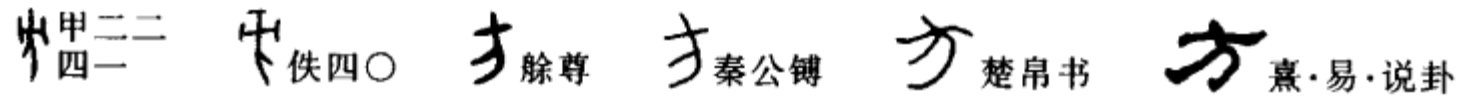
24 木 甲六〇〇 父辛爵 散盘 侯马盟书 楚帛书 一号墓竹简 二九二

25 丰 后一·二 ·一六 明藏六 三三 佚四二六 乙亥簋 侯马盟书 古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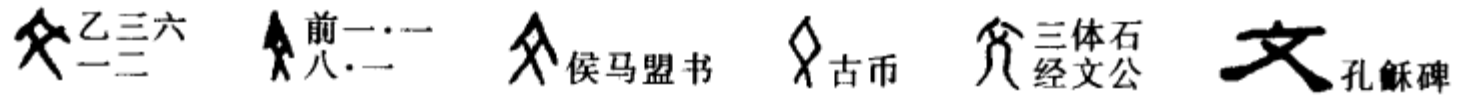
26 日 铁一三·三 后二·三 一·八 服尊 日癸簋 楚帛书 史晨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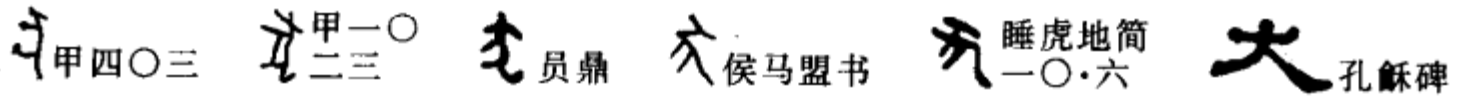
2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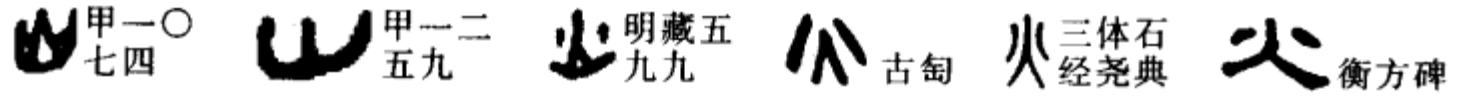
28 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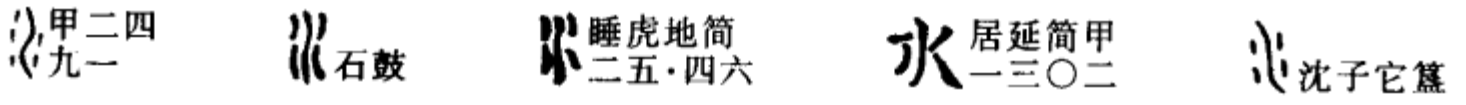
29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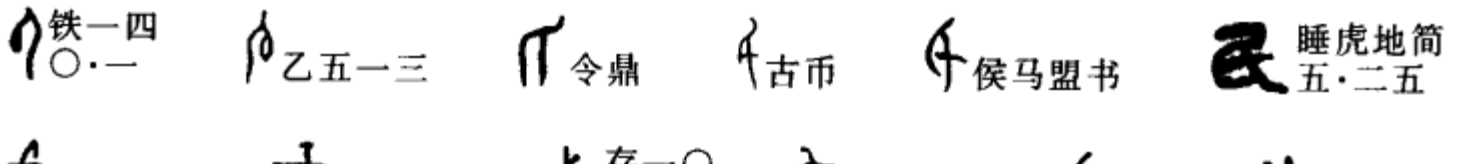
30 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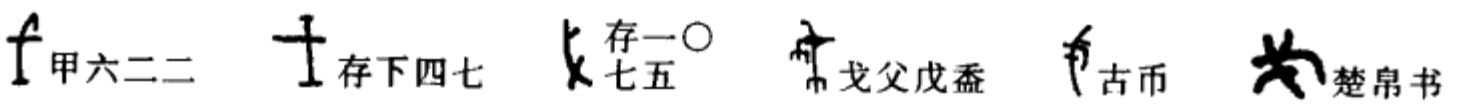
31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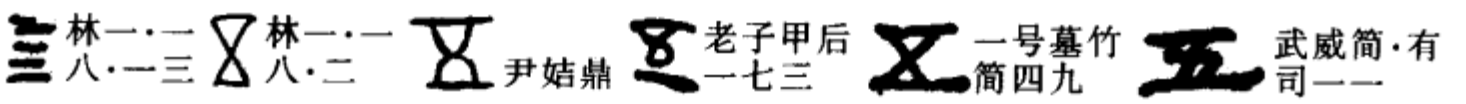
32 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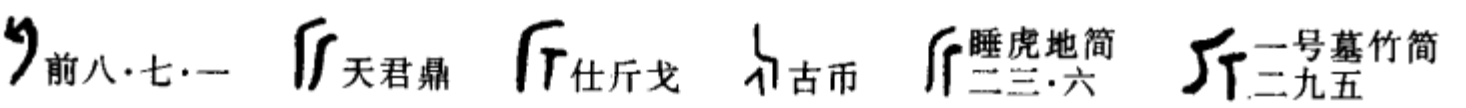
33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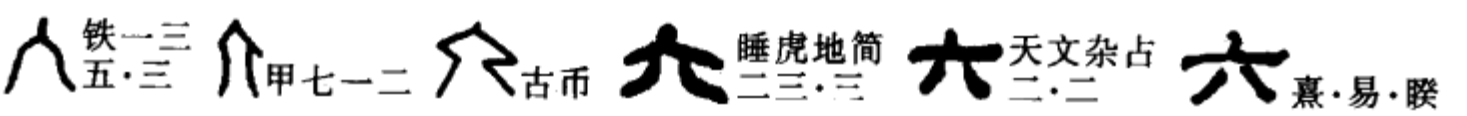
34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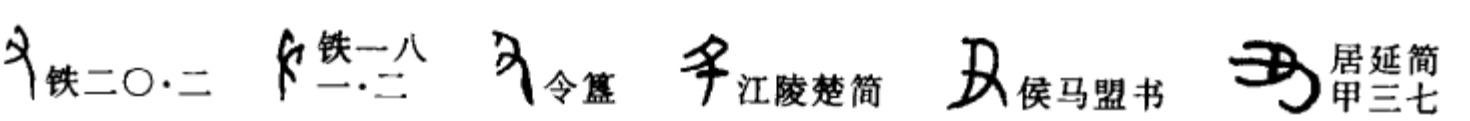
35 氏 

36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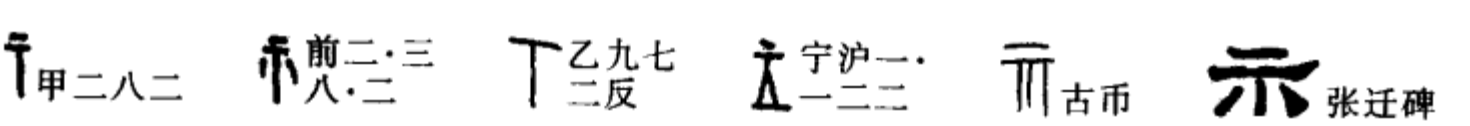
37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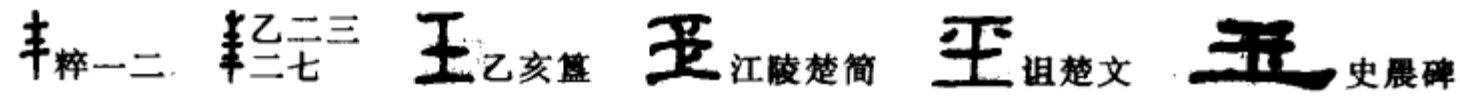
38 斤 

39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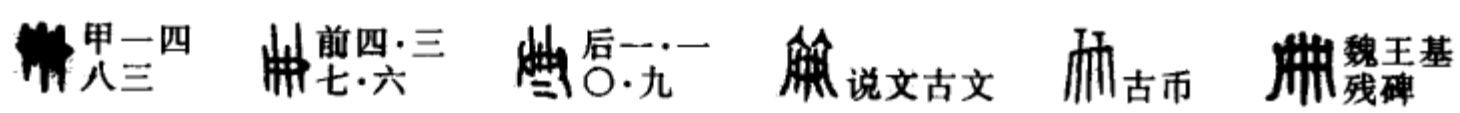
40 丑 

41 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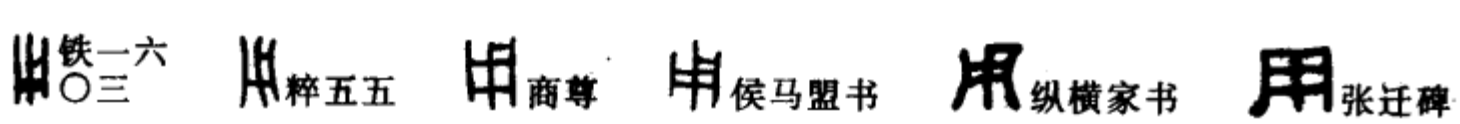
42 示 

43 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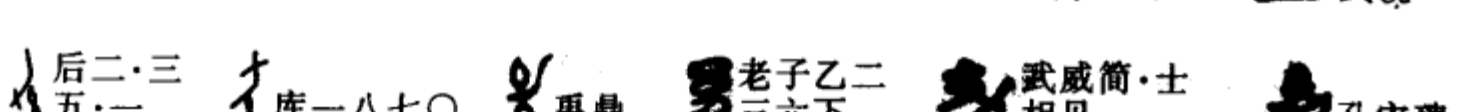
44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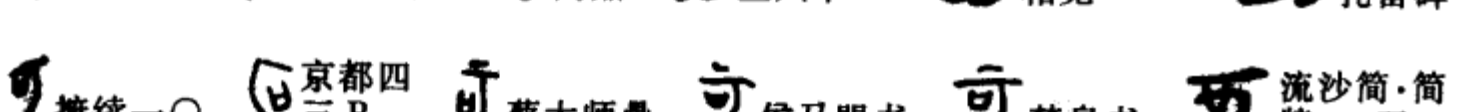
45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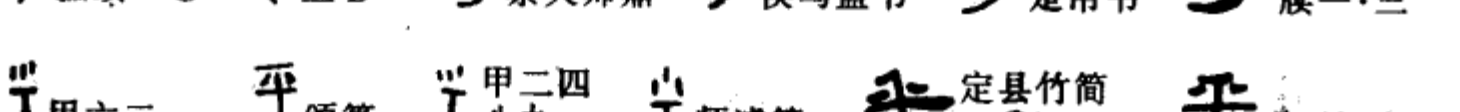
46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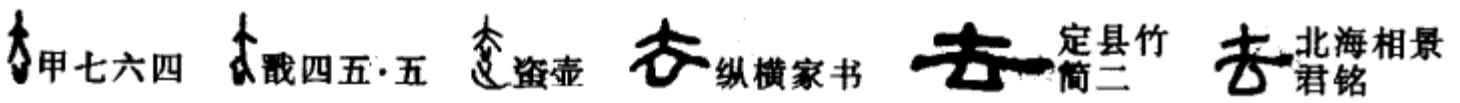
47 用 

48 目

49 幼 

50 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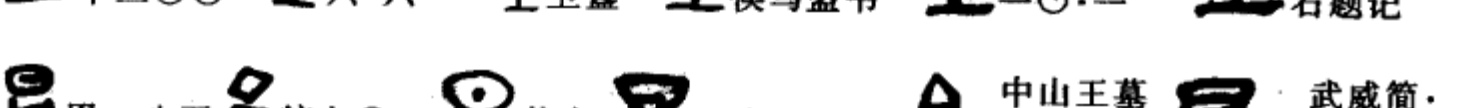
51 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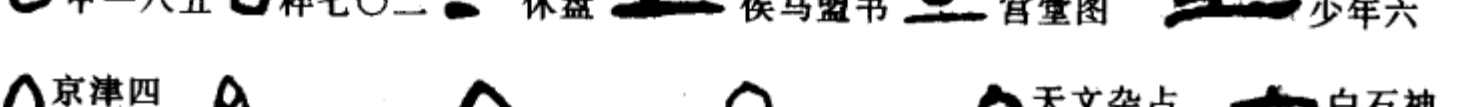
52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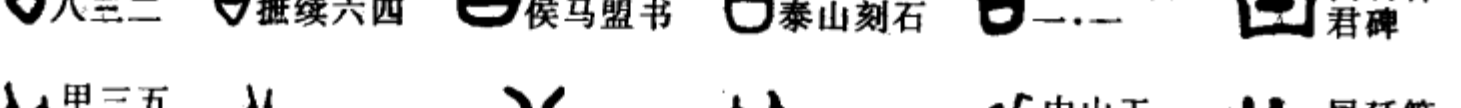
53 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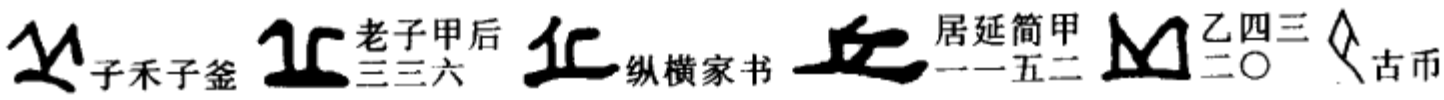
54 出

55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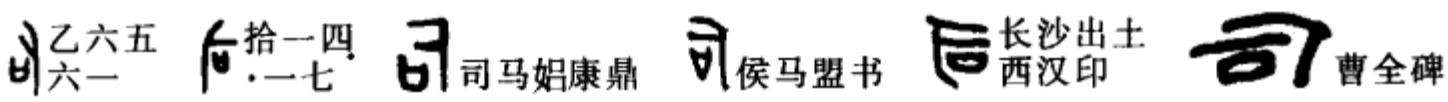
56 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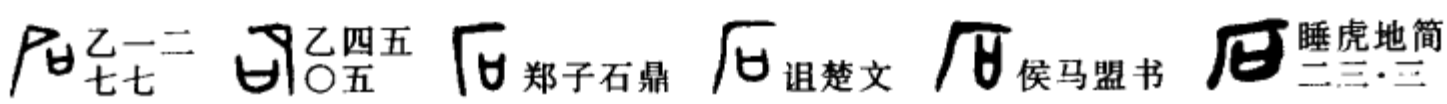
57 白 

58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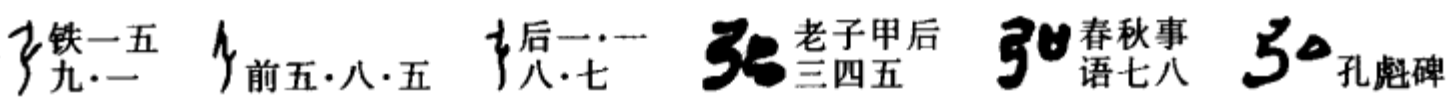
59 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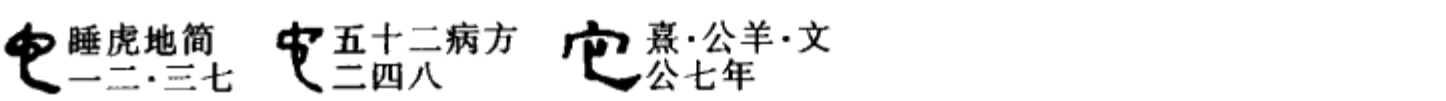
60 令

61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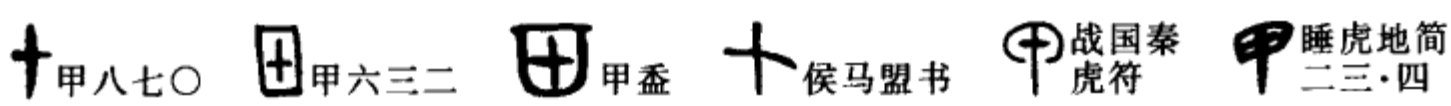
62 石 

63 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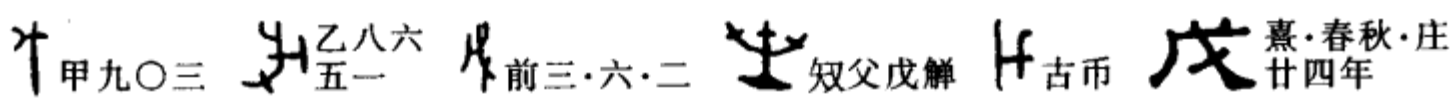
64 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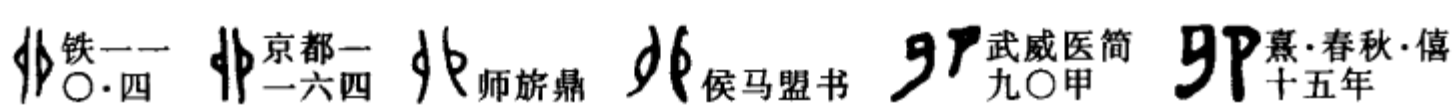
65 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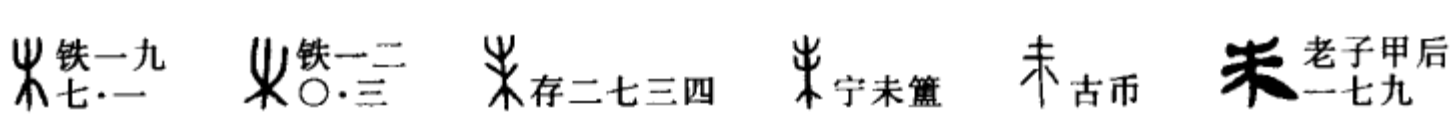
66 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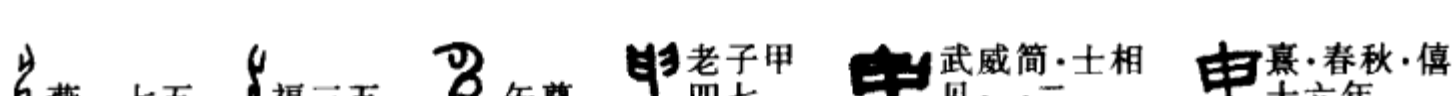
67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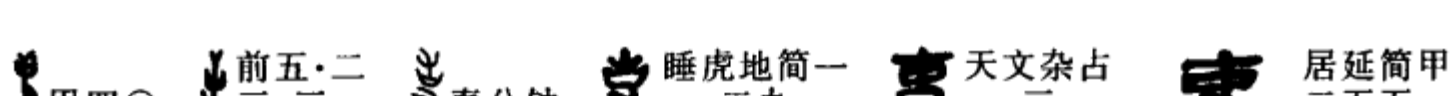
68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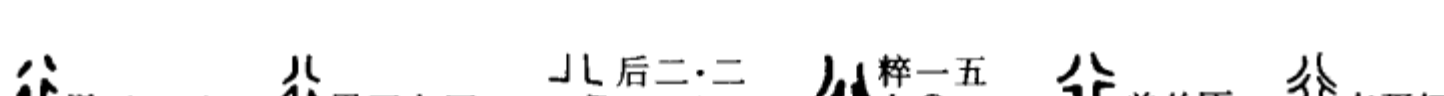
69 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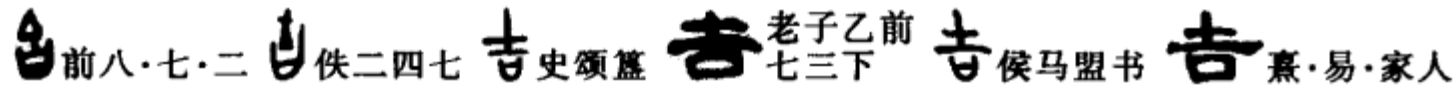
70 卯 

71 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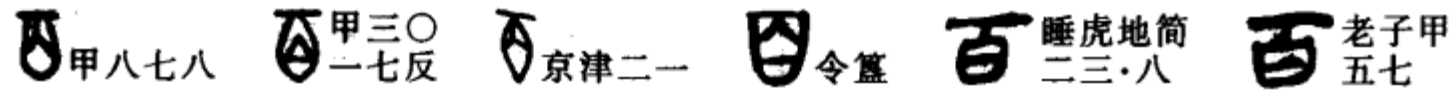
72 申 

73 吏 

74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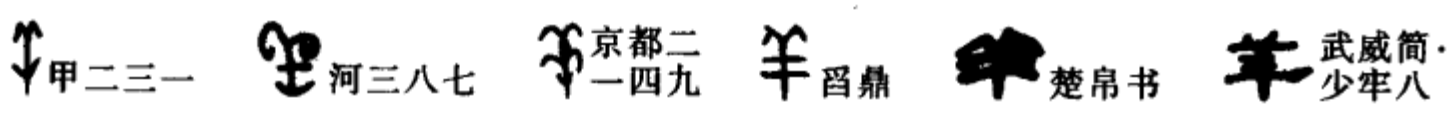
75 吉 

76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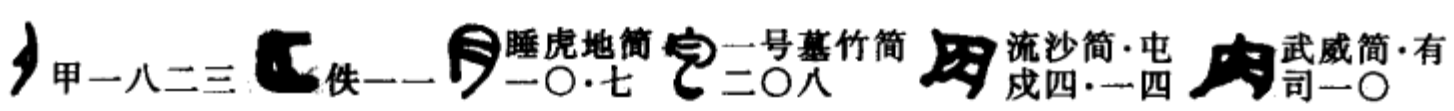
77 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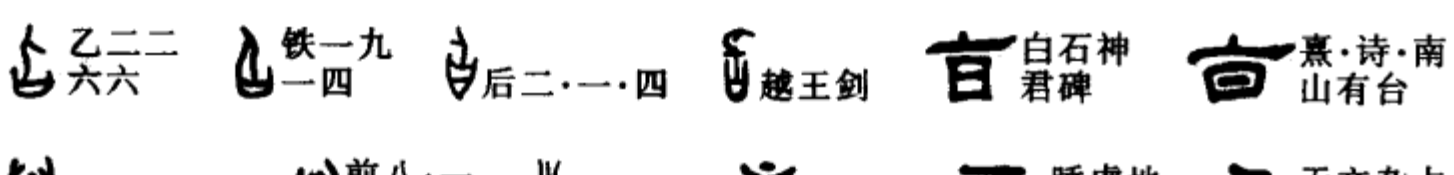
78 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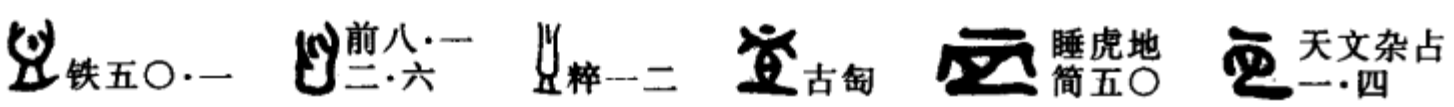
79 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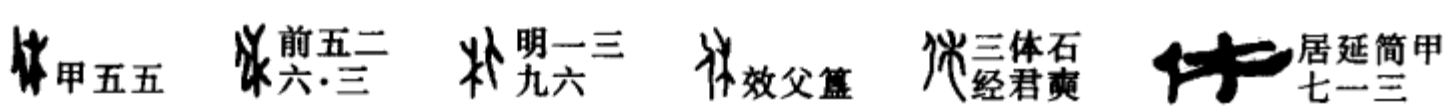
80 羊 

81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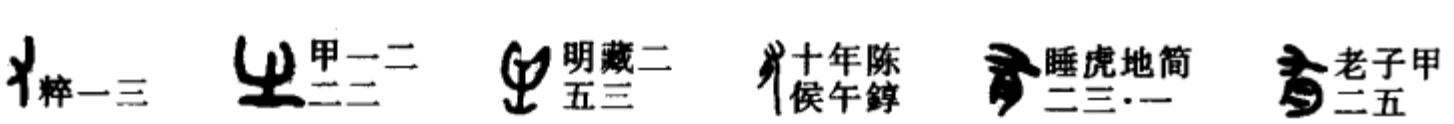
82 肉 

83 旨 

84 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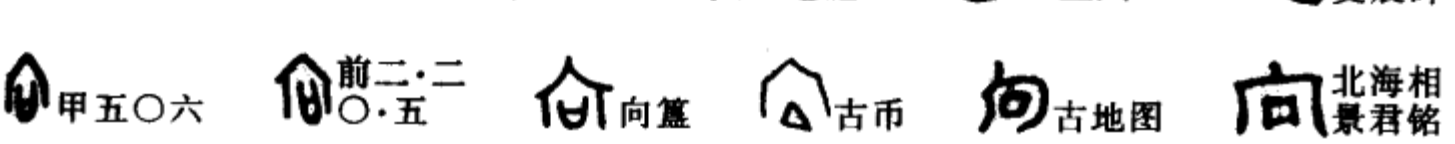
85 休 

86 因

87 有 

88 年

89 宅

90 向 

91 安 甲二八八 佚八四七 睘尊 石鼓 睡虎地简一三·五七 熹·论语·阳货

92 同 甲三九一六 矢尊 诅楚文 楚帛书 老子甲三八 赵君碑

93 网 甲三一一二 乙三九四七反 戈网卣 古鉨 魏上尊号奏 晋张朗碑

94 企 前五·二七·六 前五·二七·七 佚八一八 库一〇九一 鲁峻碑 说文古文

95 伊 甲八二八 京津三九五五 伊生簋 睡虎地简四·一四 衡方碑 熹·诗·大田

96 伐 前七·一五·四 佚五八〇 存下二二四 后一·二二·六 睡虎地简一〇·四 小臣𨗨簋

97 并 甲二九八 甲七七四 乙三二六二 中山王𠦪鼎

98 衣 甲三三七 甲一五四九 復尊 睡虎地简一二·四八 居延简甲一八二八 汉印徵

99 老 燕六五四 珠一〇〇八 诅楚文 睡虎地简一三·六一 老子乙二〇五下 淮源庙碑

100 舟 甲六三七 乙九三〇 父戊舟爵 石鼓 孙膑一一二 魏上尊号奏

101 先 甲二一八 掇二·一二九 沈子它簋 睡虎地简二四·二五 定县竹简三四 熹·书·盘庚

102 次 后二·四二·六 次卣 史次鼎 老子乙前九上 鲜于璜碑 熹·易·夬

103 旬 甲一〇五五 王来奠新邑鼎 佚九八〇 睡虎地简一〇·一三 天文杂占二·三 佚九八〇

104 光 明藏二五八 前五三二·七 禹鼎 诅楚文 老子乙前六三下 孔宙碑

105 交 甲九六一 交鼎 江陵楚简 三体石经尧典 孙子八二 尹宙碑

106 州 粹二六二 鬲比盨 睡虎地简三七·一〇〇 西陲简·五一·一九 熹·春秋·成十八年

107 至 甲八四一 佚七七七 矢尊 周原卜甲三 楚帛书 礼器碑

108 西 前六·三七·三 前四·六·一 甲七四〇 秦公簋 居延简甲二一〇八 熹·仪礼·乡饮酒

109 耳 铁一三八·二 后一·三〇·五 甲三八七七 亚耳簋 古鉩 睡虎地简二五·四五

110 好 铁一一二·一 佚六四九 仲卣 老子甲后三三〇 居延简乙一三三·四B 北海相景君铭

111 如 铁一三·一 前五·三〇·三 佚一〇八 睡虎地简二三·一二 古地图 熹·春秋·僖廿八年

112 系 乙六七三三 乙一二四 系父壬爵 居延简甲二七〇 武威医简一〇 铜华镜

113 虫 燕六·三一 铁四六·三 戩二·一〇 甲虫爵 汉印徵 武威医简

114 成 前五·一〇·五 甲三〇四八 乙一九〇四 前一·四四·三 翻卣 成侯钟

115 亥 铁八三·三 京津六四八 吴方彝 申鼎 睡虎地简八·一 熹·春秋·僖十八年

116 每 粹三四〇 甲一五五五 陈五六 甲一六三〇 杞伯簋 汉印徵

117 折 前四·八·六 京剌都三一三一 折觥·折 武威简·泰射一四 鲜于璜碑 张寿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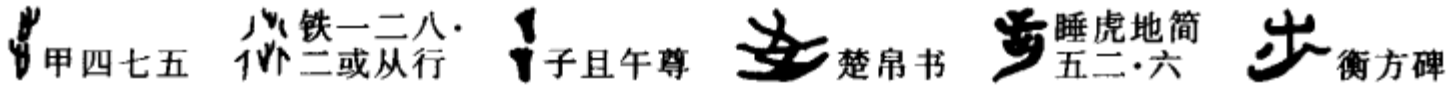
118 余 甲二七〇 林一·二二·一一 何尊 石鼓 老子甲一二一 石门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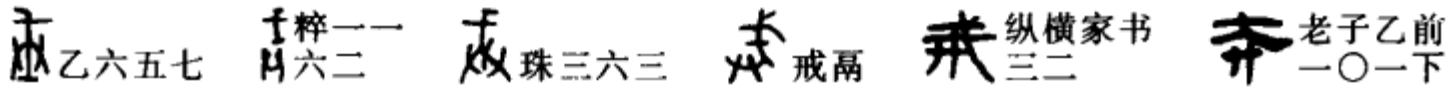
119 牡 甲六三六 前一·二九·五 乙一七六四或从豕 从士？鼎 老子甲四八 熹·诗·车攻

120 牢 甲三九 前一·七·二 京津四八三一从马 貉子卣 睡虎地简四二·一九六 武威简·少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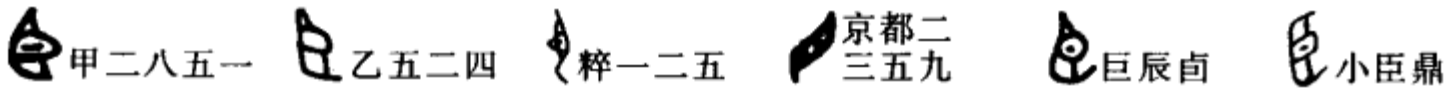
121 吹 甲二九七四 乙一二七八反 后二·二四·一四 吹方鼎 虞司寇壶 武威简·士相见一二

122 君 燕二八 天君鼎 小子省卣 侯马盟书 老子甲后一七三 定县竹简四一

123 步 

124 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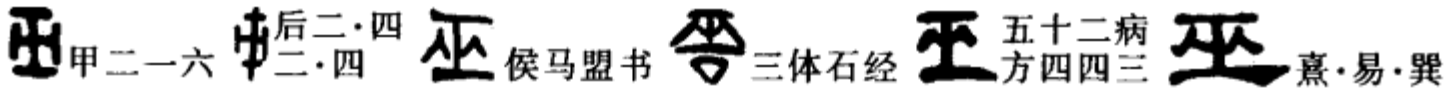
125 兵

126 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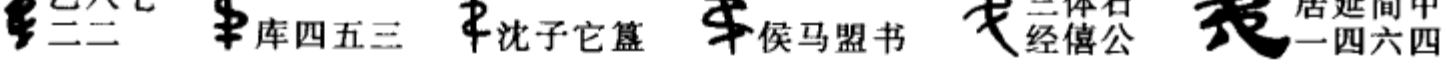
127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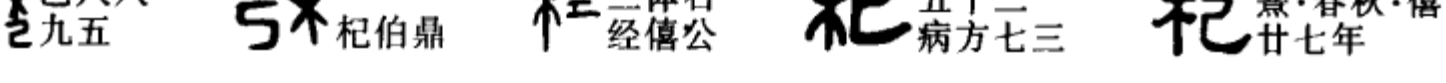
128 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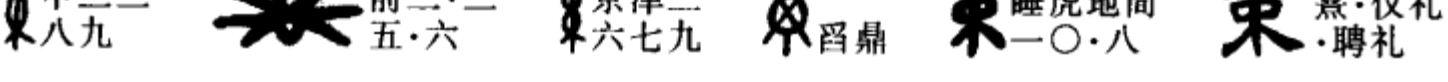
129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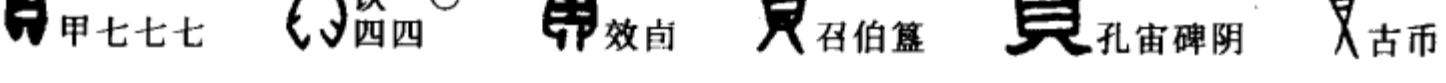
130 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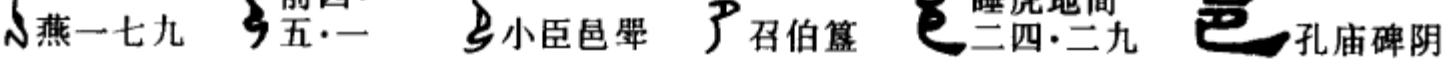
131 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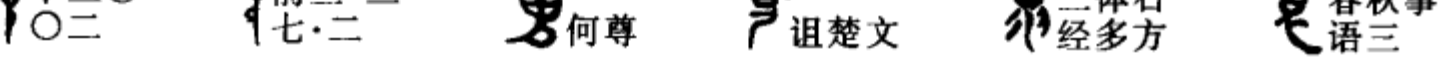
132 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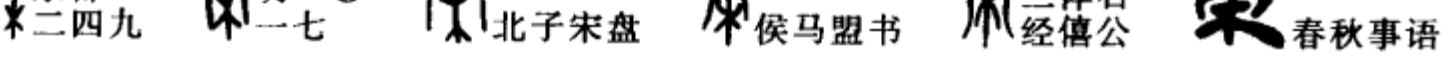
133 杞 

134 束 

135 贝 

136 邑 

137 克 

138 宋 

139 伯 后二·四·一一 鲁伯愈父鬲 古币 古鉩 老子甲后二七〇 纵横家书一五四

140 作 铁八一·三 颂簋 楚帛书 睡虎地简八·二 老子甲后三八三 天文杂占一·三

141 孝 金四七六 颂簋 鄀孝子鼎 纵横家书 定县竹简八四 居延简甲六七六

142 尾 乙四二九三 随县战国墓漆二十八宿匿 古鉩 孙膑三〇七 西陲简五四·一三 流沙简·屯戍一三·一〇

143 见 甲二一二四 粹一一七三 见尊 侯马盟书 睡虎地简二三·一二 定县竹简三四

144 赤 铁一〇·二 菁九·五 麦鼎 古币 睡虎地简一七·一三九 天文杂占二·六

145 夹 河六六九 河六七〇 盂鼎 古匋 汉印徵

146 谷 前二·五·四 佚一一三 格伯簋 信仰楚简 纵横家书 汉印徵

147 妊 乙一三二九 前八·一四·三 吹鼎 彝妊觚 格伯簋

148 我 甲九四九 乙四五二四 京津一四一 甲二七五二 我鼎 舀鼎

149 医 前二·二三·一 天九六 河九 前二二·三二 古鉩

150 男 铁一三二·二 前八·七·一 京津二一二 矢方彝 三体石经僖公 老子乙前七上

151 车 明藏六四一 乙八〇八一 明一九〇六 吴方彝 温县盟书 定县竹简五〇

152 辛 前四·二四·一 乙七六八九 索谟爵 温县盟书 武威医简七七 一号墓印一七九

153 辰 铁二四二·一 甲四二四 林·一·一五·四 父乙臣辰簋 古币 武威医简九〇甲

154 酉 铁二八·四 乙六七一八 佚四二七 酉父辛爵 楚帛书 睡虎地简一五·一二

155 祀 甲六六八 甲二〇〇六 甲二九七 蠤卣 天文杂占四·二 武威简·服傳二四

156 物 后一·四·一五 存一九一七 戩六·六 戩六·七 睡虎地简二三·一 武威简·燕礼五二

157 命 铁一二·四 穌簋 命簋 天文杂占二·五 定县竹简六〇 老子甲后三二九

158 周 甲四一九 河六三五 乙二一七〇 臣辰卣 沈子它簋 定县竹简二四

159 往 铁一·二 吴王光鑑 鄂君启舟节 三体石经 睡虎地简三二·四 定县竹简五二

160 征 续一·三·二 利簋 曾伯簋 禹羌钟

161 何 后下二二·三 京津二二〇八 何尊 十六年戟 老子甲一二八 西陲简五一·一九

162 妾 乙八三六 金四八一 克鼎 楚帛书 侯马盟书 睡虎地简一二·四八

163 具 甲三三六五 前八·六·四 弔具鼎 老子乙前五上 一号墓竹简一九六 武威简·士相见一二

164 秉 后二·一〇·一四 后二·二一·一三 秦公簋 弔向簋 一号墓竹简二七九 仓頡篇三五

165 叔 前一·三九·三 师簑簋 叔鼎 弭伯簋 诅楚文

166 取 甲一四五 甲二〇二 取尊 楚帛书 老子甲四九 定县竹简四八

167 事 乙二七六六 矢方彝 九年卫鼎 楚帛书 老子甲三〇 定县竹简八五

168 牧 甲三七八二 乙二六二六 佚一三〇 小臣遘簋 睡虎地简一四·八四 老子乙二三八上

169 羌 甲一一九 前四·五〇·七 佚三八六 羌尊 春秋事语九二 仓頡篇

170 受 戩四七·七 铁二三五·四 前八·一〇·三 何尊 睡虎地简一〇·八 定县竹简六〇

171 其 乙三四 ○○ 前三·一·一 睡虎地简 二三·一 老子甲 三八 定县竹 简六

172 虎 甲一四 三三 乙二九 ○八 召伯簋二 江陵楚简 睡虎地简 二九·二五 定县竹 简四六

173 盂 甲三五七 戳一一·七 甲三九 三九 盂鼎 苏公作 王妃盂簋 五十二 病方九五

174 京 铁九三四 后二·三 九·一一 辛巳簋 师酉簋 古币 礼器碑(阴)

175 来 甲二一 二三 粹一五 九三 舀鼎 睡虎地简 一二·四六 马王堆 易二 定县竹 简九

176 采 乙一二 乙一六 佚二七六 趞卣 睡虎地简 三二·七 居延简甲 一八二六

177 析 甲三五 ·七五 乙一五 六八 格伯簋 睡虎地 简四·九 相马经 五上

178 东 前六·三 二·四 京津四 三四五 子壬父 辛爵 楚帛书 孙子一 五四 武威医简 八〇甲

179 林 京津五 五五六 粹七二六 汤叔盘 侯马盟书 睡虎地简 一〇·四 纵横家 书五七

180 楚 粹七三 周原卜 甲八三 令簋 侯马盟书 老子甲 一五三 孙膑一 八九

181 桑 前一·六·六 续三·三 一·九 秦封宗 邑瓦书 睡虎地简 三二·七 老子甲后 一八四 武威医 简七五

182 师 铁四·三 师寰簋 石鼓 睡虎地简一 六·一一一 老子乙前 一四五下 居延简甲 三五九B

183 南 前一·一 三·三 甲二九 ○七 前四·四 四·四 盂鼎 睡虎地 简八·一 孙子一六

184 巢 班簋 五十二病 方·目录 老子乙前 一四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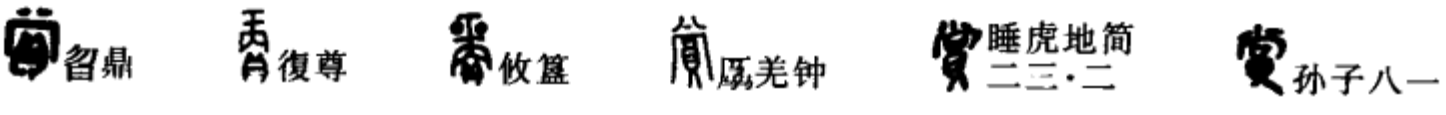
185 東 王来奠 新邑鼎 令狐君壶 江陵楚简

186 剌 甲六四四 坊间一·七一 召伯簋 无车鼎 麩簋 扬簋

187 国

188 员

189 贤

190 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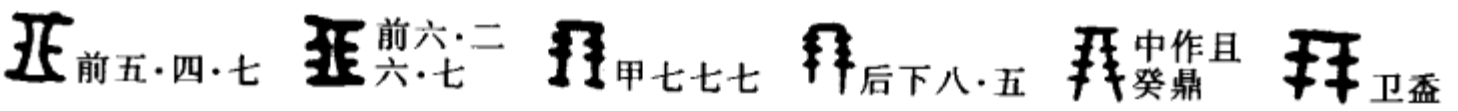
191 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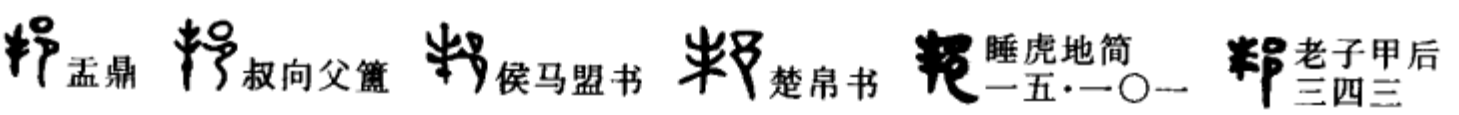
192 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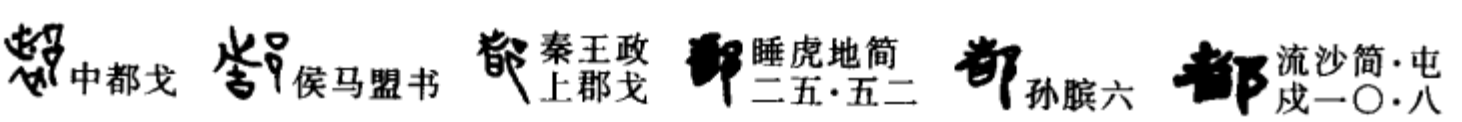
193 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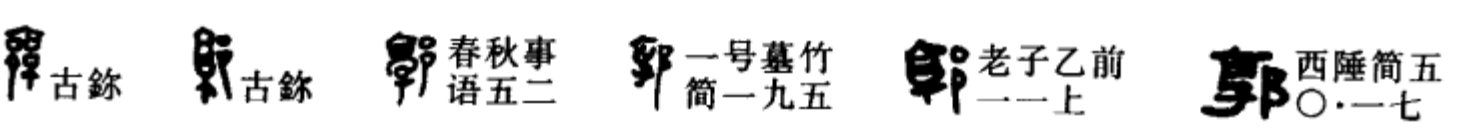
194 责

195 买

196 朋 

197 邦 

198 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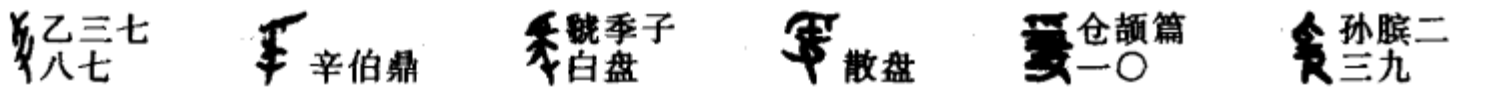
199 郭 

200 麦

201 幽

202 惠

203 再

204 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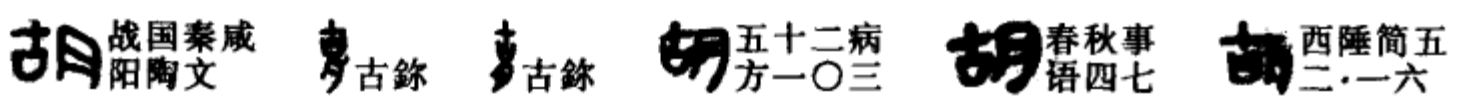
205 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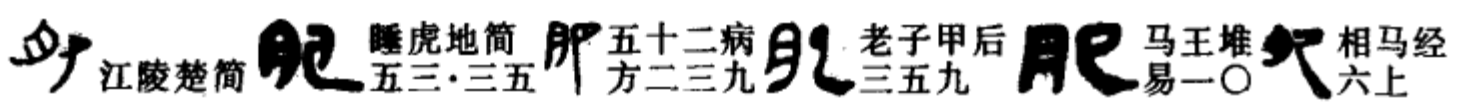
206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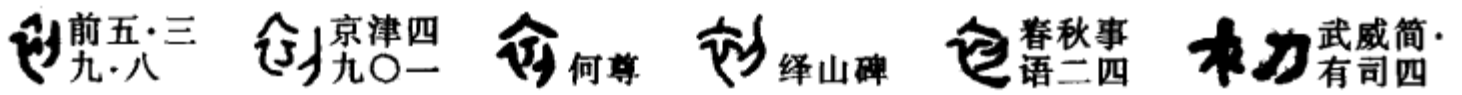
207 胃

208 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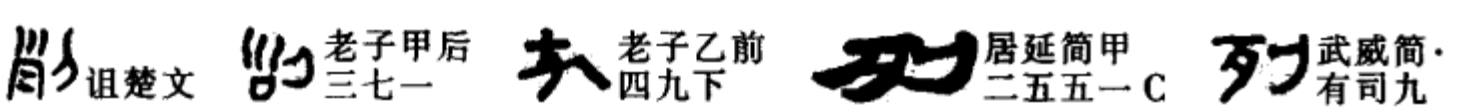
209 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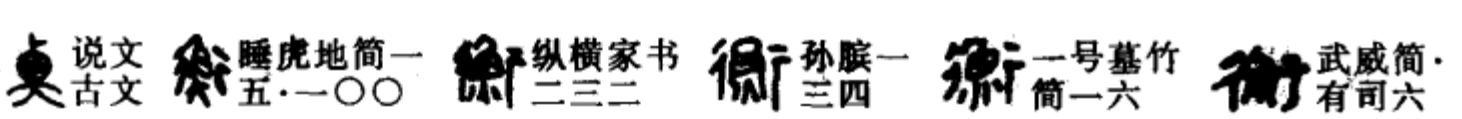
210 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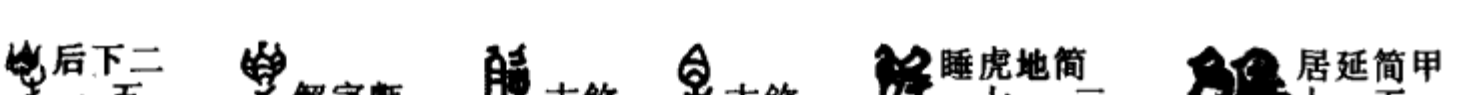
211 肥 

212 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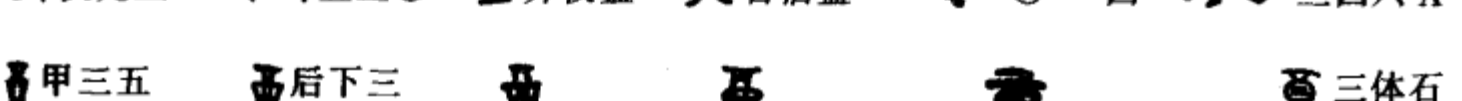
213 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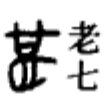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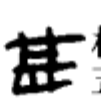
214 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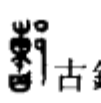
215 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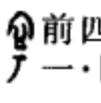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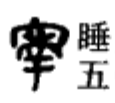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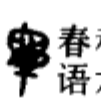
216 解 

217 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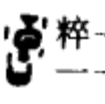
218 奠 

219 甚 甚鼎 说文古文 睡虎地简八·七  老子甲七三  相马经五七上 武威简·王杖十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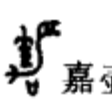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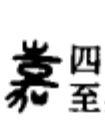
220 曹 前二·五·五 赵曹鼎  古鉩 睡虎地简八·一三 武威简燕礼一 光和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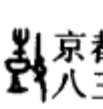
221 宁  前四·三一·四 臣卣  睡虎地简五〇·九四  春秋事语六二 老子乙一七六下 孔宙碑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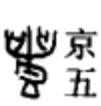
222 奇 古鉩 江陵一六七号汉墓简五三 春秋事语九一 纵横家书二〇九

223 喜  粹一二一一 前四·一八·一 白喜簋 侯马盟书 居延简甲九五六 睡虎地简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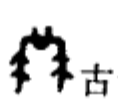
224 彭 戳四三·一 甲二六四二 彭女簋 古匋 春秋事语九五 西陲简五一·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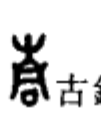
225 嘉  嘉壶 陈侯作嘉姬簋 侯马盟书 石鼓  四时嘉至磬 上林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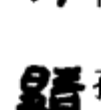
226 鼓 京津一五六〇  京都一八三九 克鼎 信阳楚简 老子乙前九四下 武威医简五四

227 丰  京津一五五 京都八七〇B 后上一〇·九 卫簋 仓颉篇五 武威简·泰射四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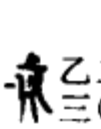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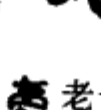
228 盆 彭子中盆 曾大保盆 魏其侯盆 鄯阁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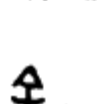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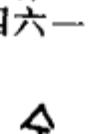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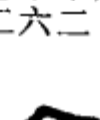
229 益 铁二二三·四 班簋  古鉩 睡虎地简一二·四七 老子甲三七 相马经五上

230 青 吴方彝 墙盘  古鉩 老子甲后四二二 天文杂占一·二 武威医简一三

231 静 班簋 静卣 秦公簋 三体石经康诰 老子甲四二  孙子一一六

232 既 乙六六七二 颂鼎 侯马盟书 楚帛书 老子甲后一七九 居延简甲九七一

233 爵  乙二一三〇 京津二四六一 睡虎地简三八三〇  老子甲后二六二 流沙简·屯戍一三·二

234 舍  矢方彝 墙盘  侯马盟书 睡虎地简一五·一〇一  老子乙前八上 定县竹简七〇

235 会　战国秦虎符　楚帛书　睡虎地简二一·一九九　相马经二八下

236 侯　佚三七二　保卣　三体石经文公　侯马盟书　楚帛书　孙子八五

237 知　汤鼎盖　老子甲后一九七　春秋事语五七　定县竹简三

238 市　兮甲盘　古鉩　睡虎地简一三·六五　老子甲五一　纵横家书二二七　孙子一二

239 央　菁一·一　虢季子白盘　中央勇矛　老子甲三一　老子乙前九下　孙子一一六

240 厚　佚二一一　趞鼎　墙盘　鲁伯盘　老子甲八三　孙子一三五

241 良　乙二五一　乙三三三四　格伯簋　季敫盉　睡虎地简五四·三七　居延简甲一九A

242 爱　中山王壺　睡虎地简五四·五一　老子甲后一九二　夏承碑

243 夏　秦公簋　鄂君舟节　楚帛书　古鉩　睡虎地简一〇四　西陲简五一·一八

244 舞　甲二八五八　粹七四四　余义钟　纵横家书一五八　马王堆二号墓简　华山庙碑

245 韦　乙二一一八　乙八三二〇　侯马盟书　吕不韦戟　睡虎地简一四·八九　三体石经无逸

246 弟　乙八八一八　应公鼎　侯马盟书　睡虎地简二八·六　居延简甲一四六四　武威简·士相见一一

247 乘　乙七四五　佚八七五　虢季子白盘　睡虎地简一〇·一一　老子甲六四　居延简乙六二·一三

248 桃　古币　五十二病方二二　相马经二四上　武威医简七九　武威简·有司一六

249 柳　柳鼎　散盘　侯马盟书　睡虎地简一七一三一　西陲简五四·八

250 桐　豦生盨　宜桐盂　古鉩　五十二病方三四八　相马经一七下

251 柏 佚一九五 甲六五三 古鉩 五十二病方一九五 相马经九上 老子甲后二七〇

252 枚 粹一〇六〇 父辛簋 父枚丙卣 马王堆·十问四 一号墓竹简一九八

253 格 甲二五六 前五·二四·六 格伯簋 格氏矛 老子甲一六五 老子乙二五下

254 柔 睡虎地简五三·三五 老子乙前四五上 老子甲八五 武威简·少牢二二 范式碑

255 乐 京津三七二八 癲钟 侯马盟书 石鼓 睡虎地简五三·三一 老子甲六三

256 梁 侯马盟书 大梁鼎 刊江王奉世墓木觚 武威医简四六

257 贵 泰山刻石 古鉩 老子甲四〇 孙子一七一 武威简·服傳八

258 邯 侯马盟书 古鉩 睡虎地简六·五〇 纵横家书六八 孙膑一

259 鄲 侯马盟书 鄲孝子鼎 古鉩 纵横家书三一六 孙膑一

260 昭 匽羌钟 睡虎地简四·一 泰山刻石 建昭雁足镫

261 晉 佚六〇〇 鄂君舟节 侯马盟书 古鉩 纵横家书五五 孙子一二九

262 戾 前七·四三·二 前四·九·一 古鉩 古匋 三体石经无逸

263 昔 乙一九六八 鄴初下·四五·五 何尊 善鼎 老子甲五 孙子二七

264 昆 古鉩 老子甲一四〇 居延简甲一八〇三

265 朝 佚二九二 后下三·八 盂鼎 楚帛书 老子甲一三八 武威简·燕礼四八

266 施 中山王鼎 睡虎地简五四·五五 老子甲后二一三 武威简·泰射·九八 老子乙前一四一上

267 旅 甲九二九 甲二六 四七 河二五八 家尊 古鉩 睡虎地简 二五·四一

268 族 后下四 二·六 甲九四八 京津二 一〇二 班簋 侯马盟书 相马经 二八下

269 参 前七·二 五·四 葡参父 乙盉 五年琱 生盉 睡虎地简一 七·三八 定县竹 简九

270 霸 令簋 兮甲盘 老子甲后 四三五 纵横家书 一三一 仓颉篇 二六

271 夜 周原卜甲 效卣 夜君鼎 中山王鼎 睡虎地简 一〇·四

272 梦 乙一四 二八 前八·一 三·二 佚九一六 戬三四·七 后二·三· 一八 老子乙前 八四上

273 齐 前二·一 五·四 前七·一 四·一 乙八二 六七 春秋事 语四五 定县竹 简二九

274 鼎 乙九〇 七三 父辛爵 五十二病 方三七八 一号墓 竹简一 武威简·有 司一五 武威简· 少牢九

275 穆 甲三六 三六 通簋 蔡侯盘 王孙诰钟 仓颉篇五

276 稻 乙四五 六七 佚四〇〇 曾伯黍簋 陈公子甗 睡虎地简一 一·三五 一号竹简 一四五

277 康 前一·一 二·八 辅仁六一 矢方鼎 毛公鼎 石鼓 老子乙前 三一上

278 秋 侯马盟书 楚帛书 古鉩 三体石 经僖公 睡虎地简一 六·一二〇 老子乙前 八五下

279 秦 洹秦簋 古鉩 睡虎地简 二八·五 春秋事 语三四 纵横家 书二一 天文杂占 一·一

280 黍 铁七二· 二 前三·二 九·六 前四·三 九·七 乙六七 二五 睡虎地简一 一·三三

281 梁 伯公父簋 五十二病 方九二 纵横家 书五 孙膑一 居延汉简 甲七·八反

282 气 睡虎地简 二四·二九 睡虎地简 四三·二〇七 老子甲后 二三三 天文杂占 三·一 武威医简 八〇甲

283 家 甲二七七七 拾一四·一〇 寡子卣 古鉩 老子甲四一 春秋事语一六

284 室 甲四九一 扬簋 古币 睡虎地简一五·一〇〇 相马经一〇上 居延简甲七一三

285 宣 后上二四·七 虢季子白盘 石鼓 泰山刻石

286 宏 毛公鼎 王子午鼎 汉印徵

287 定 前六·二四·六 佚九九二 伯定盉 卫盉 蔡侯钟 侯马盟书

288 宴 宴簋 邾公华钟 王孙诰钟 熹·诗·凫鷖

289 实 散盘 国差𦉜 睡虎地简四三·二一 春秋事语三〇

290 宝 后下一八·三 甲三三三〇 粹一四八九 戍嗣子鼎 嬴氏鼎 江陵楚简

291 宰 粹一一九六 佚四二六 宰鼎 素命镈 老子甲二九 武威简有司五

292 守 守宫卣 大鼎 中山王墓刻石 侯马盟书 老子甲三〇 纵横家书一四一

293 宠 瘐钟 沕其钟 曾伯从宠鼎 老子甲四九 古鉩 魏受禅表

294 宜 盗壶 三体石经君奭 睡虎地简二〇·一八六 老子甲四九 纵横家书二三四

295 宿 粹九七 宁沪一·三八四 宿父尊 古匋 五十二病方九四 武威简·有司四

296 寡 父辛卣 毛公鼎 秋氏壶 睡虎地简五二·二 老子甲六四 曹全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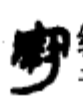
297 客 师遽簋 铸客鼎 古鉩 睡虎简一一·三五 甘谷汉简

298 寒 寒姒鼎 克鼎 睡虎地简一四·九 老子甲一八 居延简甲一九A

299 害 害叔簋 伯家父簋 大簋 石鼓 睡虎地简八·一

300 突 拾五·七 佚七七五 古鉩 睡虎地简二五·四二 天文杂占末·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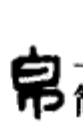
301 疾 后二·三五·二 上官鼎 侯马盟书 江陵楚简 睡虎地简一〇·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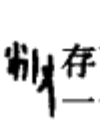
302 冠 老子甲后四二四  纵横家书四六 武威简·服傳一 北海相景君铭

303 胄 盂鼎二 胄簋 中山王墓宫堂图 侯马盟书 魏上尊号奏

304 罗 乙四五〇二 古鉩 古鉩 古地图 一号墓竹简二七四

305 帅 佚八三一 前四·二八·二 前七·二一·四 录伯簋 毛公鼎 石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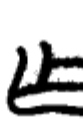
306 帛 前二·一二·四 召伯簋二 老子甲后四二四  一号墓竹简一一九

307 敝 拾六·一一  存下八一一 诅楚文 睡虎地简一五·一〇四 定县竹简八三 武威简·士相见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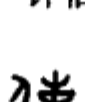
308 保 保鼎 父丁簋 癸爵 京津一一七 后下一四·八 周原卜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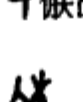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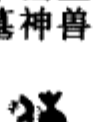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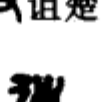
309 佩 颂鼎 善夫克鼎 纵横家书二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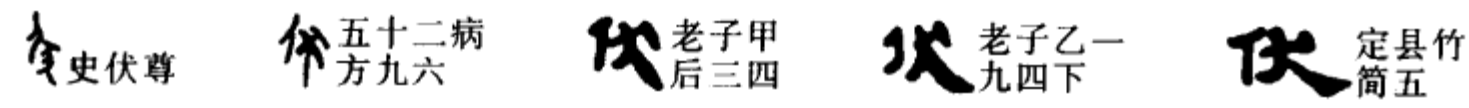
310 依 前六·三四一 乙四七六一 睡虎地简二〇·一九八 武威简·士相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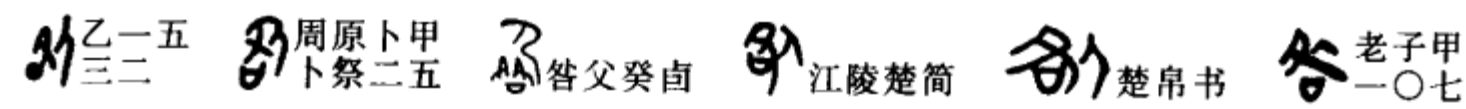
311 作 铁八一·三 粹八三五 利簋  楚帛书 睡虎地简八·二 老子甲后三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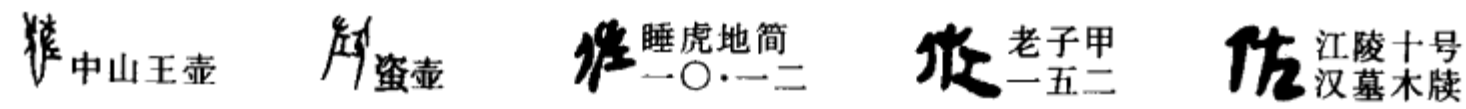
312 侵 菁一·一 菁一·一 钟伯侵鼎 三体石经 老子甲后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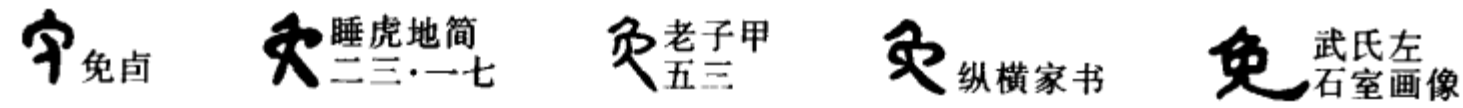
313 使 甲六八 倗匜 中山王墓神兽  诅楚文 睡虎地简一二·四六 定县竹简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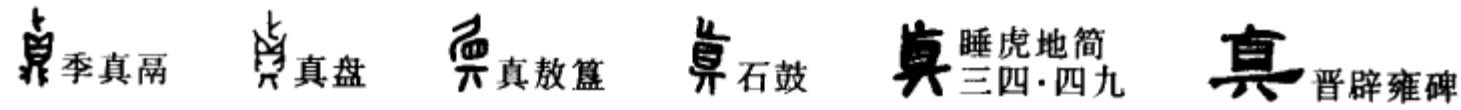
314 传 后下七·一三  佚七二八  傅尊  古鉩 老子乙前五八下 居延简甲七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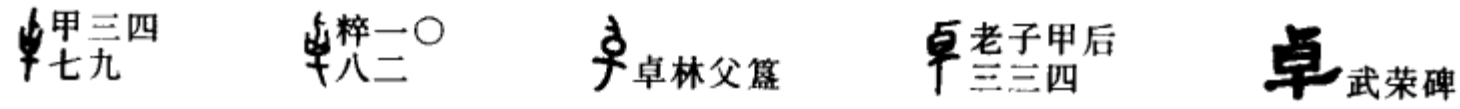
315 伏 

316 答 

317 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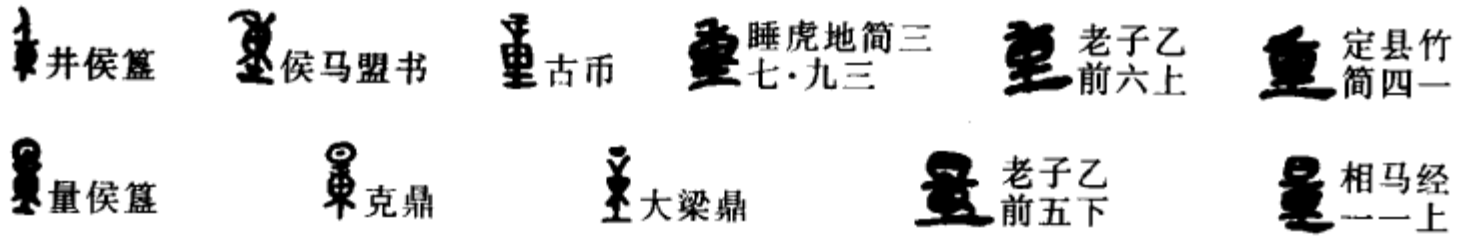
318 免 

319 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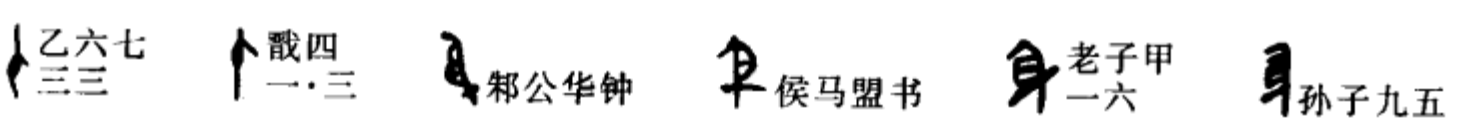
320 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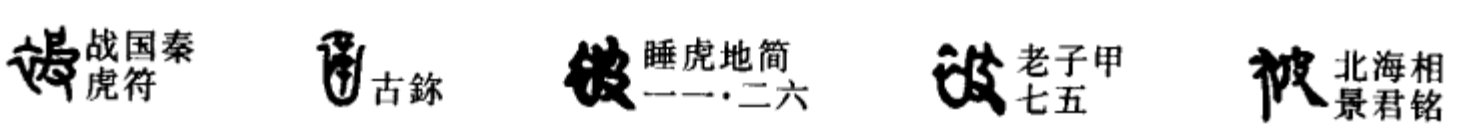
321 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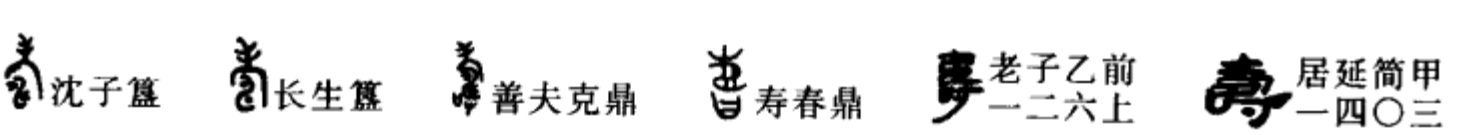
322 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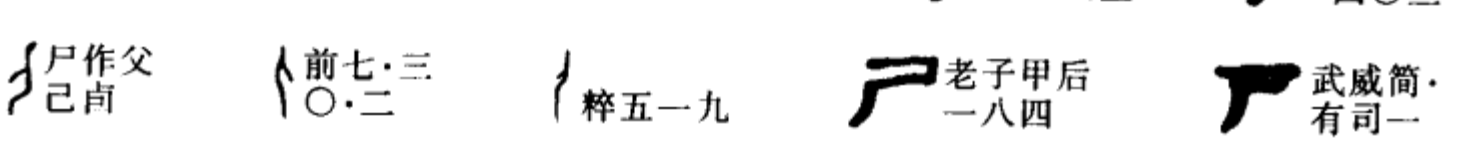
323 重 

324 量

325 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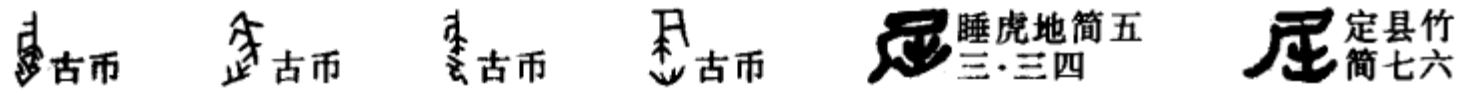
326 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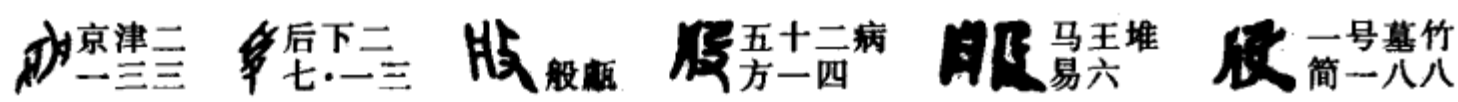
327 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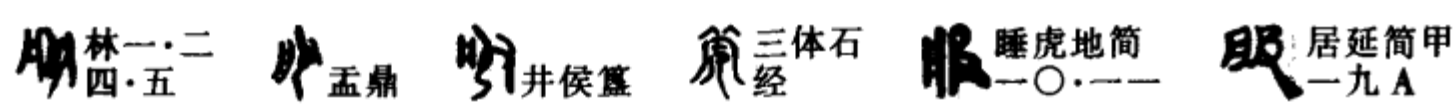
328 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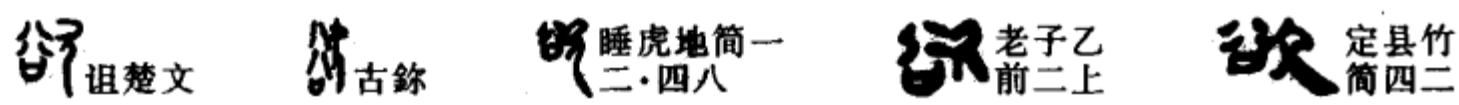
329 尸

330 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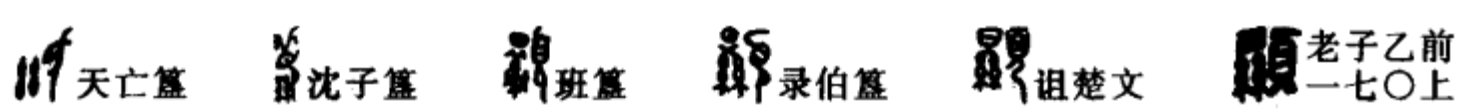
331 屈 

332 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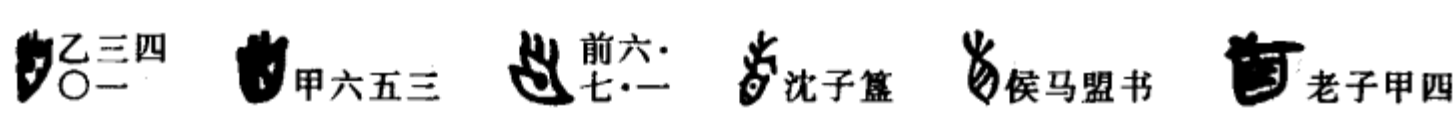
333 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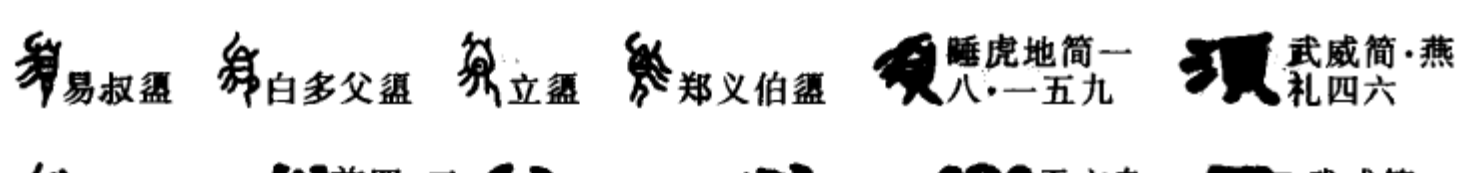
334 欲 

335 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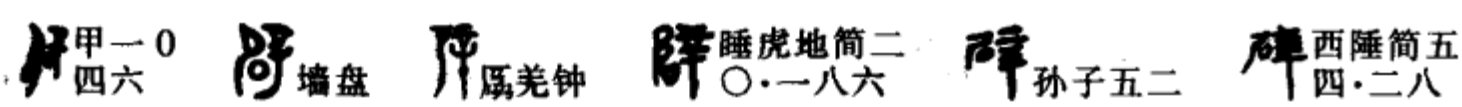
336 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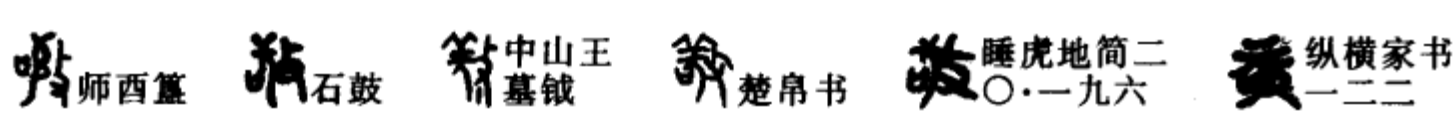
337 面

338 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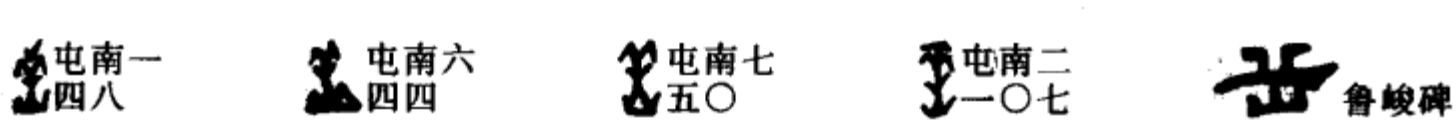
339 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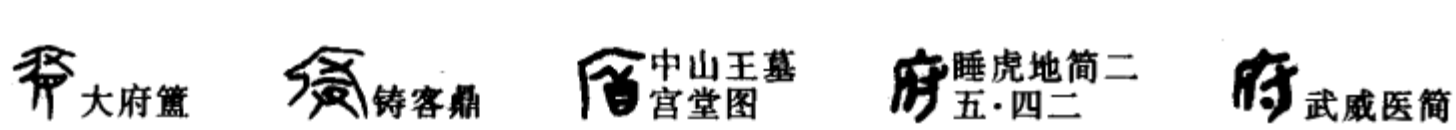
340 卿

341 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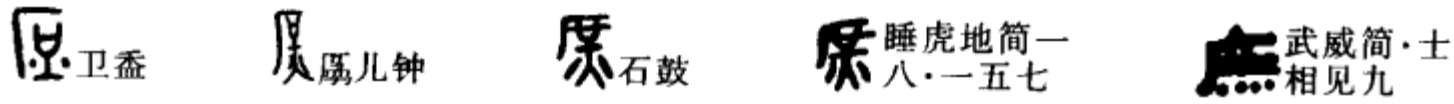
342 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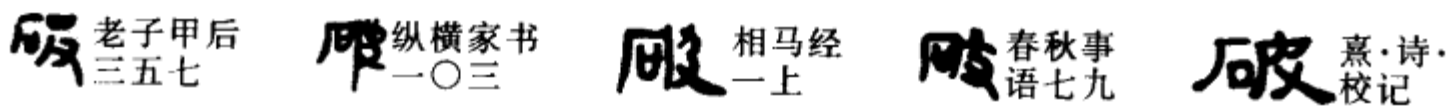
343 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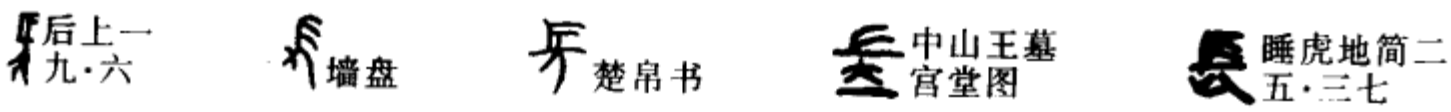
344 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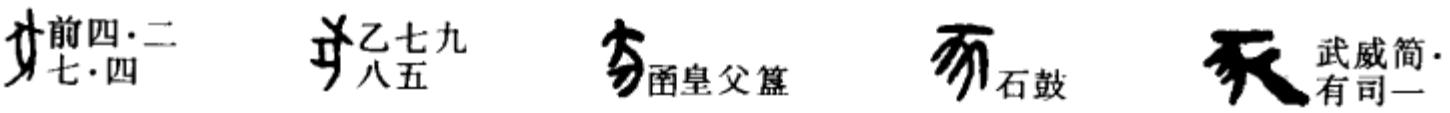
345 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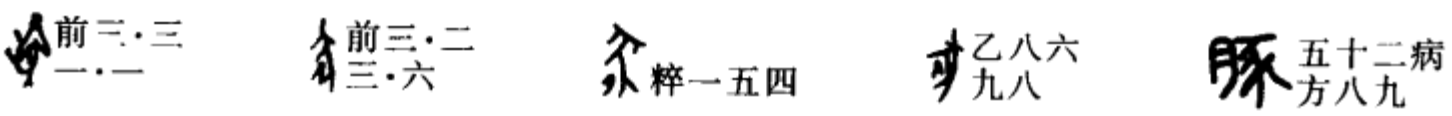
346 序

347 庶 

348 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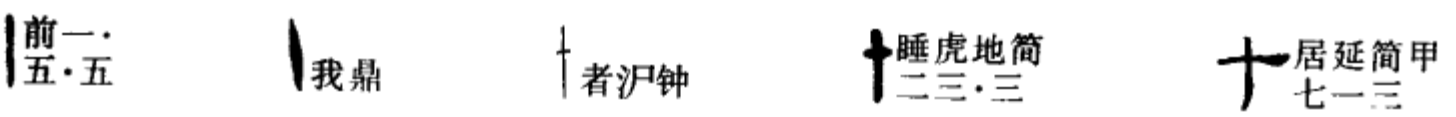
349 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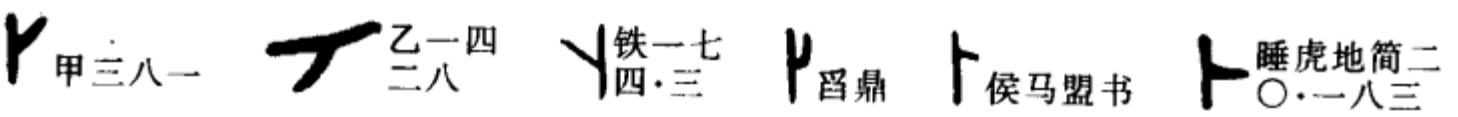
350 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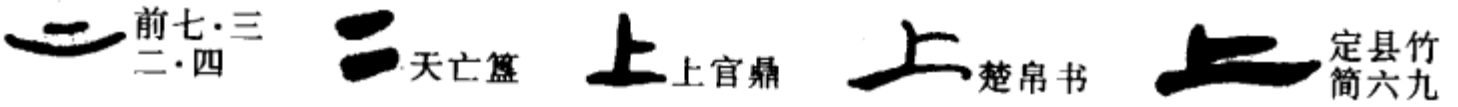
351 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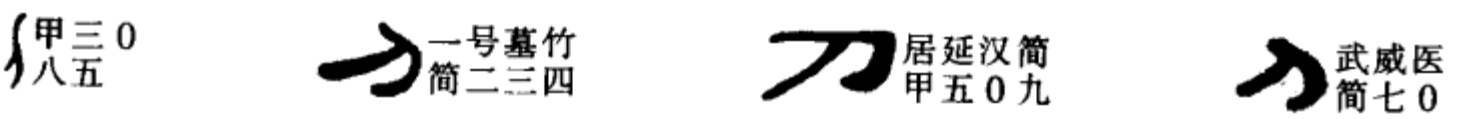
352 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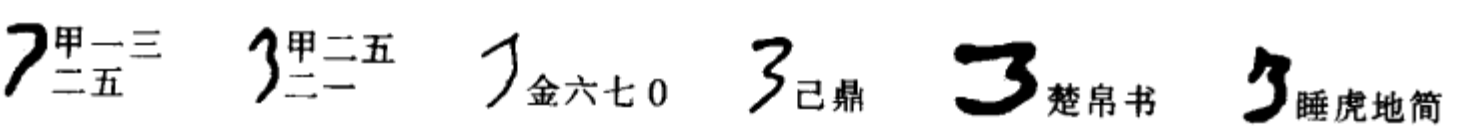
353 马

354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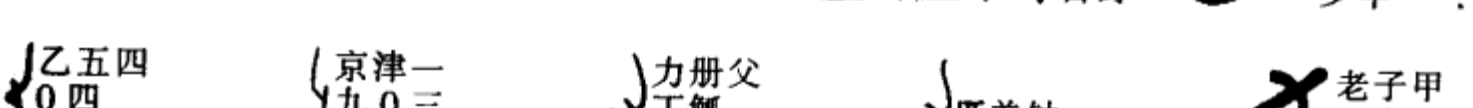
355 卜 

356 上 

357 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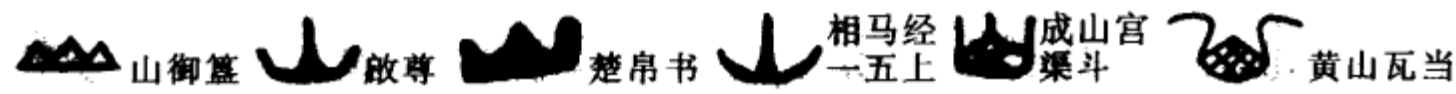
358 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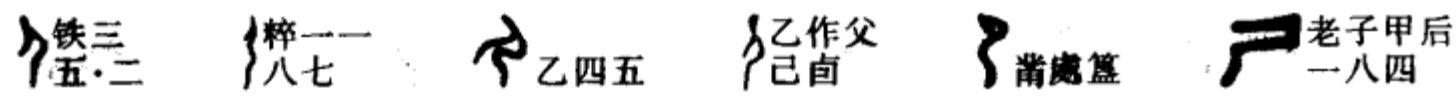
359 丁

360 力 

361 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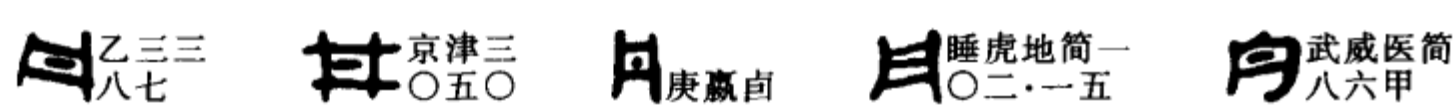
362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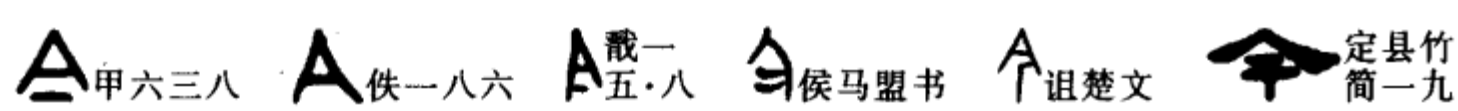
363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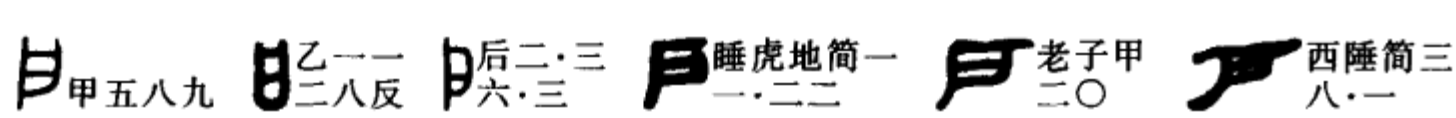
364 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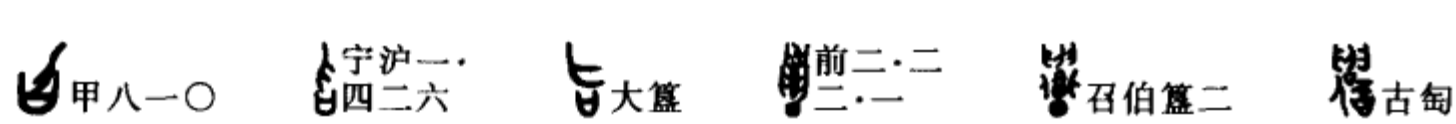
365 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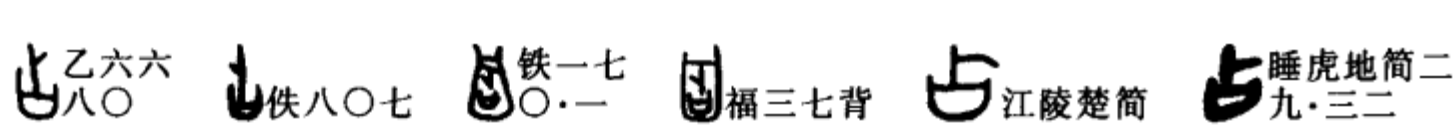
366 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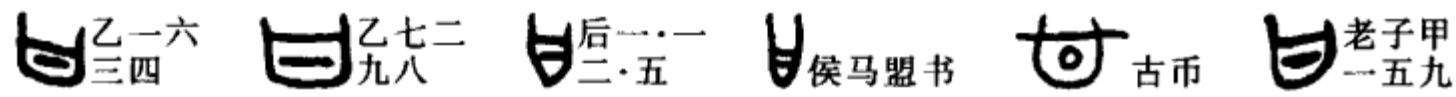
367 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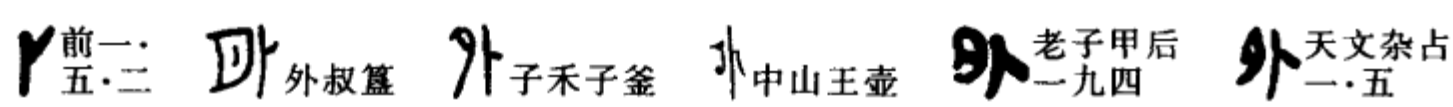
368 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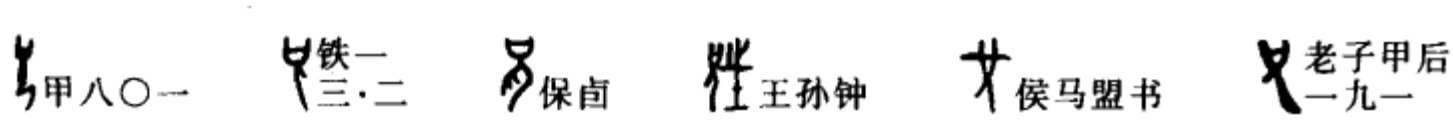
369 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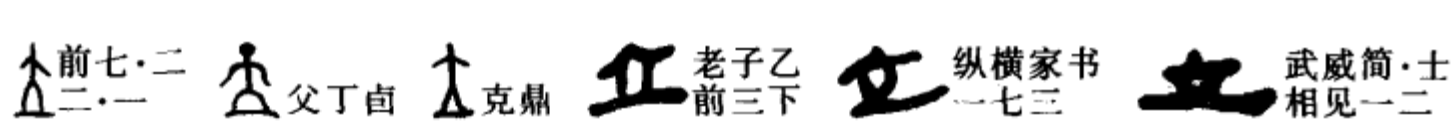
370 召 

371 占 

372 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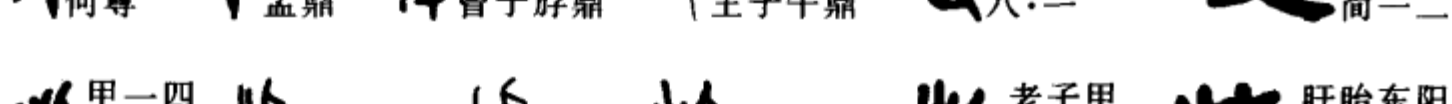
373 外 

374 兄 

375 立 

376 永

377 民

378 此 

379 名
甲三四八八
前六·一·四
召伯簋
信阳楚简
睡虎地简一一·二五
定县竹简八四

380 各
前五·二四·四
虢季子白盘
庚羸卣
楚帛书
睡虎地简二三·七
西陲简三八·三

后　记

1994年起，本书编著者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开设“古文字学”本科课程，迄今已有十个年头。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教材的选择。客观而论，时至今日，古文字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十分丰硕，各种资料、文献和书籍浩如烟海，但适合大学作入门基础的教材却并不多见。

随着高校提倡素质教育，古文字学越来越引起广大学生的兴趣。选编一本内容比较浅显、知识结构相对完整的古文字学基础读本，是本书编著者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然而，考虑到向来视古文字学为畏途的实际情况，以及囿于学识所限，本书的编著工作迟迟不敢动手。

新世纪初，复旦大学文博系领导根据学校对于本科通才教育的重视，结合近年来文博系的教学发展情况，经过缜密的研究，提出了主要由本系教师编撰的“复旦大学文博系列教材”的构想。经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沟通和交流，获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该社社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承载先生，亲率有关人员赴复旦，就出版体例、种类、时间等问题与系领导作了详细的探讨，最终商定了编写的方向。

本次确定的“文博系列教材”涉及考古学、博物馆学和文物学等相关领域，共有教材十多部，计划每年出二到四种。由于许多教师手头尚有多种项目在进行，故由著名史前考古理论学家陈淳先生和本书编著者作首批教材的编写工作。本书之编撰由此开始。

本书的写作前后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第一年主要用于检索、阅读各种已有成果，对有些著作，如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高明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等，更是反复通读，从中获益匪浅。对于其他先生的论著，也尽可能地领会其思路与宏旨，加以学习和借鉴。在此基础上，作了数十万字的资料长编，临摹了教材所需的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数千字，拍摄、扫描了各种相关图片近千幅。

次年开始编撰。写作方向与宗旨是:通俗、方便、全面。鉴于这么一个出发点,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古文字学的学术史回顾与总结,即第一至第七章。历述史前至今的汉字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两汉以降、迄今为止的古文字学研究状况,上下数千年,纵横国内外,并附有相关的统计表格,以便比较分析。读此部分,可以基本了解古文字学较新的发展与研究的总体面貌。第二部分为古文字学分类研究,即第八至第十三章。分别阐述了甲骨学、金文和战国文字等具体门类的研究概况,并选择有代表意义的读本,分"拓本"、"隶定"和"释文"三方面进行单字或全文释读,以使学生在掌握了第一部分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古文字的具体内容。

书稿草就后,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校订,又历时数月。其间在章节、文字和体例上又作多次修改与变动。本书责任编辑、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研究生任海平女士,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稿子进行了严格的编辑工作。时至今日即将付梓之际,仍感惶惶然焉。好在写作此书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其中若有错识,师友们是会指出并不吝赐教的,想到此,编者之心稍觉释然。

本书的编撰,引用了大量的已有成果,并在每章的章后注中详加注明,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承蒙复旦大学文博系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这本教材得以出版,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朱顺龙

2004 年 12 月 29 日于复旦大学 200 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古文字学基础
作者=朱顺龙　何立民编著
页数=４００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ＳＳ号=１１３５９６７１
ＤＸ号=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d=２０４０１８３５０E１５３ABB９B７３FEBC８２B５６７１５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第一章　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意义
第一节　中国古文字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第二节　学习古文字的基本方法及其意义
第二章　汉字的发展沿革
第一节　汉字起源的传说
第二节　汉字的萌芽、起源时期
第三节　汉字的逐步成熟时期
第三章　汉代小学的兴起和隋唐文字学研究的发展
第一节　小学的萌芽与兴起
第二节　汉代小学的建立和发展
第三节　汉代童蒙正字字书的编定
第四节　汉语训诂学和方言研究的发端
第五节　《说文解字》与汉代小学研究
第六节　六朝隋唐的文字学成就
第四章　两宋金石学的鼎盛和元明文字学研究的低迷
第一节　“二徐”的《说文》研究
第二节　宋元明时代对“六书”的探讨
第三节　宋代金石学的发展和繁荣
第四节　宋元明时期的字书、韵书编纂
第五章　清代考据学的崛起和金石学小学的复兴
第一节　“乾嘉学派”的相关贡献
第二节　“《说文》四大家”的成果
第三节　清代金石学的复兴和繁荣
第四节　清代大型字典、词典的编纂
第五节　晚清甲骨学的奠基及“罗王之学”
第六章　２０世纪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第一节　现代田野考古学的创立及其对古文字学研究的贡献
第二节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古文字学进展
第三节　建国后古文字学以及甲骨学研究成就之一
第四节　建国后甲骨学研究成就之二
第五节　西周甲骨学
第六节　建国后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新进展
第七节　战国文字的研究
第八节　国际显学——简帛学研究的巨大进展
第七章　海外学者有关中国古文字学的研究
第一节　２０世纪前期的相关研究
第二节　２０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的甲骨文、金文研究
第三节　２０世纪下半叶海外学者的竹简帛书研究
第四节　台湾、香港地区的古文字学研究
第八章　甲骨学——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一
第一节　殷商甲骨文
第二节　殷商甲骨文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甲骨文单字释读
第四节　殷商甲骨片释读
第五节　西周甲骨　附：甲骨大事简表
第六节　甲骨文的书法艺术
第九章　商与西周金文——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二
第一节　青铜器简介
第二节　金文的研究
第三节　金文的年代

第四节　金文的内容
第五节　商、西周金文句读释读
第六节　殷商西周金文的书法艺术
第十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三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金文选读
第三节　战国货币文字选读
第四节　战国玺印文字选读
第五节　战国兵器刻辞选读
第六节　春秋战国金文的书法艺术
第十一章　春秋战国石刻铭辞——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四
第一节　石刻铭辞研读
第二节　诅楚文研读
第三节　战国秦高奴禾石权研读
第十二章　春秋盟书文字——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五
第一节　侯马盟书
第二节　温县盟书
第十三章　春秋战国简帛文字——古文字学分类研究之六
第一节　简牍帛书概述
第二节　简牍帛书的形制
第三节　发现竹简举例
第四节　战国竹简文字选读
第五节　　帛书选读
第六节　春秋战国文字的书法艺术
附录
表１：春秋战国出土简牍帛书一览表
表２：汉晋简帛出土情况一览表
表３：甲骨文著录书目全、简称对照一览表
表４：青铜器著作举要
常用甲金篆隶文字备查
后记＆朱顺龙